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苏 联 解 体 亲 历 记
(上)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谨将此书献给 1987—1991 年间在美国驻莫斯科使馆及基辅和列宁格勒总领馆工作的先生们和女士们，他们以其才智和献身精神服务于国家

苏联解体亲历记（上）

第一章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3〕

俄罗斯是一个难以预言其历史进程的国家。

尤墨·阿法纳西耶夫 1993 年 5 月①

1991 年 12 月 25 日的黄昏，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从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中出来，穿过大厅，进入一间装有褐色木板、淡绿墙围和天鹅绒窗帘的房间。通常，这间屋子是用来接待访客的，今天则有一个电视摄制小组在等待着。

当克里姆林宫的大钟敲响七下时，戈尔巴乔夫坐在了正对摄像机的桌前，开始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总统的身份向全国发表最后一次电视讲话。以前，他讲话大多是预先录制，这一次则是现场直播。

“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戈尔巴乔夫宣布道。虽然他的声明含义清楚，但他所选择的词语却显得奇怪，似乎在说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总统职位仍然存在。如果他是说因他所领导的国家崩溃而使得他所承担的工作不复存在，那么含义会更明确些。

在对全国讲了 20 分钟话之后，戈尔巴乔夫回到办公室，并吃惊地得知苏联的国旗已从克里姆林宫降下。在此之前，他一直认为这会晚些时候发生，或许应是在年底、而非他宣布辞职后的几分钟内发生。俄罗斯的白、蓝、红三色旗即将升起，但出现了问题。行动笨拙的守旗卫兵未能将旗帜套紧旗杆，只得再套，然后用力一拉，才使旗帜升到旗扦顶端。

自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成为了历史——令人猝不及防，但却有其必然。

这一新的旗帜标志着一个民族国家的诞生，但权力的转移尚未完全结束。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沙皇一直在距现苏联总统办公地不远的乌斯宾斯教堂举行加冕仪式，但在沙皇尼古拉二世被废除和谋杀后象征帝王统治的王冠和节杖一直静静躺在克里姆林宫的军械库中。不过，在 1991 年，权力不仅是象征性的，而且因为苏联核武库所具有的破坏性超出任何一个俄国帝王的想象更具实质意义。盛大的加冕仪式和庆祝游行对加强统治者权力已不再必要，此外，继位者——俄罗斯总统还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

两天前，戈尔巴乔夫总统和鲍里斯·叶利钦一致同意，在戈氏发布辞职声明后立即在戈氏的办公室会面，正式移交控制苏联核武库的密码和装置。

同更换国旗一样，移交仪式也未能按戈尔巴乔夫预期得那样进行。当他回到办公室时，等待会面的并非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而是国防部长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将军。将军解释说，叶利钦对戈告别演讲中的某些话不满，因而拒绝按先前商定的那样前来会面。对此，戈尔巴乔夫认为争论或延续这种不快已无意义，就径自将装有举世闻名的“核按纽”的小皮箱交给了沙波什尼科夫。其他帝国或许是在战争或革命的压力之下崩溃，但苏联却是悄悄地瓦解。将核武器控制权移交给新主人几乎是漫不经心、悄悄进行的。正当大多数美国人打开礼物或准备圣诞晚餐时，俄罗斯瞬〔5〕息之间就取代苏联，一跃成为一个核大国。②

俄罗斯虽已掌握苏联所有的中央机构，并将继承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但只拥有前苏联一半多一点的人口，因此，有 1.4 亿多曾是苏联公民的人，从 1991 年开始将居住在俄罗斯以外的国家。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四个月前已被承认为独立国家，其他 12 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也正在谋求独立。

戈尔巴乔夫结束电视讲话后，负责安排这次演讲的戈的助手戴维·切克瓦伊泽也返回自己楼下的办公室，瘫进椅中。当然，他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但是现在它终于发生了。两个小时过去了，他一直呆呆盯着墙壁，因不确定的未来而陷入沉思。

戴维是一个聪明、年轻的苏联外交官，在格鲁吉亚出生长大。因其性格开朗、乐于助人的精神和地道的美式英语，在他早期任职于苏驻美大使馆时，就成为华盛顿受欢迎的人。如今，他发现自己不再了解自己是谁。作为一个自豪和爱国的格鲁吉亚人，他忠实而又卓著地服务于苏联政府，将第比利斯和莫斯科都视为故乡。他和他妻子决意让他们的儿子先学格鲁吉亚语，再学其他语言。

直到这一刻之前，这一切尚不成问题。他是格鲁吉亚人，又是苏联人，两者之间并不矛盾。那么现在他是否会被迫作出选择呢？他很愿意作一个格鲁吉亚人，但也视自己为一个强大但已不复存在的国家的一员。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是呆在莫斯科、作一个俄罗斯人，还是回到第比利斯、指望在那里找一份工作？或试图以“外国人”身份留在莫斯科？所有这些都不是他能自由选择的。

我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于戴维·切克瓦伊泽，但我也同样对所发生的巨变感到震惊，并陷入长时间的沉思。

〔6〕我和我妻子丽贝卡在两处度过了 1991 年 12 月 25 日。在多年未与家人共度圣诞后，我们打算尽可能地去看望所有家人。因此，我们先去了弗吉尼亚的亚历山大里亚的女儿家，与她的一家、我们的两个儿子以及我们的兄弟聚在一起吃早餐、交换礼物，然后飞到德代尔堡与母亲团聚，我们最小的儿子也从田纳西州赶到那里。

圣诞节对我们家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天，因为我们来自南方新教徒家族。不过，那一天我的思绪却不时偏离宗教和家庭，我意识到一个决定性时刻正逼近苏联。就在一周之前，我在莫斯科还见到了戈尔巴乔夫。当时，我发现他似乎要同准备推翻他的军队妥协，这虽然不可避免，但难以让人完全理解。我与叶利钦等俄罗斯领导人也很熟，并视他们中的许多人为私人朋友。我还认识他们的对手，在他们中间亦有朋友。但我更为关切成千上万的普通苏联人，从理发师、工人到诗人、教授、银行家和议员。我曾在他们中间生活多年，与他们的悲哀和希望如果说不上是分享，至少也有共鸣，他们似乎是我们家庭延伸的一部分。同戴维·切克瓦伊泽一样，他们将承受这天在莫斯科所发生事件的后果。

在用过晚餐、打开礼物之后，我回到楼上卧室，将计算机插孔插到电话孔中，查寻来自莫斯科的消息，从那里可以得到比电视更详细的情况。我正是从这里了解到戈尔巴乔夫的辞职讲话和莫斯科的事态发展，包括新国旗已在克里姆林宫升起的消息。

所发生事情的巨大影响不久就减低下来。我曾预见到这一结果，但也认识到，就我对苏联社会及其政治家们的了解，就我对一些事件的参与，我并不能确切地解释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毕竟，苏联拥有地球上最大的军事机器，该机器为一个史无前例的、强制性的、一党专制的政治权威所控制，它的官僚机构遍及和深入到其国民生

活的每一角落，它的意识形态旨在揭示如何利用历史潮流的秘诀，这样的一个国家怎么会轻易自取灭亡呢？

如果一定要找出答案，我尽可以轻描淡写地这样说：苏联制〔7〕度本身有毛病，迟早是要灭亡的；苏联领导人对人类犯下了滔天大罪，历史是有办法讨还血债的；苏联的经济制度不合理，难以在当今世界中竞争；苏联的意识形态已失去对人们信念的控制；苏联试图用武力建立霸权和“威望”是在自取灭亡，等等，这些看上去都有道理，每一点都很好地构成答案的一部分，但它们都不能确切地解释这一切是怎样和为什么要这样发生。

我知道，除苏联领导层的人之外，我对过去七年中莫斯科政治变化的了解不亚于任何其他人，尽管如此，我却不能确切地回答苏联崩溃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它发生在 1991 年底，而不是几年之后或几个月之前？促使崩溃的关键性事件是什么？有无可能产生另外的结果？苏联制度能否通过改良而继续存在几十年？

这些问题令人困扰，如果我不能回答，那么还有谁呢？历史学家？或许，但只有在苏联档案全部开放、当事人出版了回忆录以及几代学者对这些记录加以筛选和分析之后才行。无疑，许多细节会在未来披露出来。无论是谁，只要是仓促作出结论，都会在许多方面出现错误。

即使在拥有较为充分信息的情况下，未来历史学家也很难对这一变化的意义达成一致，正如我们现在仍在讨论罗马帝国衰落和灭亡的原因一样，且不说我们还在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这类重大变化通常会产生多种解释。要想得出精确答案是不可能的，但问题仍很重要，哪怕能帮助我们同继承国打交道亦可。

但是，并非这种功利性考虑最令人困扰，这里还有一个我应该了解、但实际上却不了解的秘密。虽然任何秘密都具有挑战性，但这一秘密对我的生活和工作是如此重要，因而它不仅是挑战，而且我还有义务去解决它。基于我为了解苏联所付出的一切，如果我不去了解苏联的崩溃，那我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

〔8〕如果苏联只是我外交生涯中的最后一站，我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事实上，我成年生活中的大部分时光都直接或间接地在与苏联打交道。

许多人对其先辈的祖国有浓厚兴趣，这是自然的，但我毕生爱好俄罗斯文化却并非基于这一理由。第一代马特洛克家族是在 17 世纪从英国的德比郡来到北美，他们是辉格会教徒，是出于宗教自由的原因而移民。我 1929 年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伯勒，当时，家里人都记不清自己在这里已定居多久，我的祖父母也说不清自己是英国人、还是苏格兰—爱尔兰人。虽然有些亲戚仍是辉格会教徒，但祖父母已不再是该派教徒。

在我成长的 30—40 年代，我很少接触到外国文化，但开始对外语着迷，并试着自学一点俄语。不过，在格林斯伯勒没人能教我发音，我自己也不会背字母表。

1946 年，我进入杜克大学。当时学校尚未开设俄语课，我在课外阅读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撰写、康斯坦斯·加尼特翻译的《罪与罚》等书的过程中增加了对俄语的兴趣。

以后，学校增开了俄语课，我在第一班注册。在最后一个学年，我和丽贝卡都选修了俄国历史和文学。当时，学校很少开设这类课，但教学质量弥补了这一不足。教授历史的是约翰·柯蒂斯，他能够分辨俄罗斯历史进程中

的细微差别，却又不至于使证据去牵强附会于某些理论或偏见。教授文学的是汤姆·温纳，这是他的第一个专职教学工作，除了俄罗斯之外，他还以极大热忱引导我学到了更多的东西。他写了一篇有关哈萨克民间传说的论文，我帮他校对最后文本，从中我了解到哈萨克在苏联殖民主义统治下的悲惨命运，这一主题逐渐成为我的一个关注点。

1950 年，丽贝卡和我决定读研究生，为在大学执教或是进入外交机构，或许是为这两者做准备。在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研究所完成学业并在达特茅斯学院教了一段俄罗斯语言文学后，我于〔9〕1956 年进入外交部。

我的第一项工作是写一份有关苏联内部发展的报告，对此我不太乐意，因为我想去海外，但这份工作开始为我带来幸运。由于我比我办公室中职位较高的外交官们对苏联事务有更广泛的学术背景，我很快得到提升，且比其他苏联问题专家声望要好。在奥地利任职 2 年和在德国任职 1 年之后，我终于在 1961 年 9 月抵达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而这一切距离我在杜克大学第一次注册俄语课已有 13 年。

赫鲁晓夫的“解冻”刚刚开始，将苏联公民与外国外交官隔绝开来的大墙已经裂开了一些小缝隙。我和丽贝卡决定走出外交圈，在不给苏联人带来危险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同他们打成一片。我们采取了各种我们所能想到的办法去见俄国人，但通常在火车或旅馆与他们偶然相遇后，他们就中止交谈，有时抱歉他说再一次会面不方便，大多数时候则不加任何解释。显然，克格勃已警告他们不要来见我们。

只有两种情况例外。第一种情况是，我们开始邀请来苏联的大学学习的美国人或其他外国学生（这时已开始有这种交流）来我们的公寓做客。随着我们与这些学生日益熟悉，我们就鼓励他们将其苏联朋友带来。前来的苏联人主要有两类：一是警察局密探；一是政治异议分子，后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后者能准确辨认出前者，我们也很快学会将那些伪装者拒之门外。

我们还得知，某些被允许访问美国的苏联文化人士在访问前后可以与我们会面，作为交流的一部分，前来访问的美国知名人士来莫斯科也可以会晤苏联同行。这样，我们得以会见和招待作家和学者们，特别是在 1962 年罗伯特·弗罗斯特访苏期间。

在我们任职莫斯科的两年间，我们逐渐结识了许多苏联人，包括作家、艺术家、戏剧导演等，其中许多人成为我们终身的朋友。在苏联 15 个加盟共和国中，我们去过 14 个，我们的家庭也由 3 个孩子增加到五个，其中一个还出生在莫斯科的一家医院。〔10〕以后的七年，我们是在非洲度过。这不是因为国务院有意忽视地区和语言方面的专家，而是我自己要求去的，因为我想看看那些殖民地是如何形成新国家的。我意识到，苏联本身是一个帝国，60 年代在非洲所发生的一切有朝一日会与苏联有关，而且苏联统治者自然会尝试在已崩溃的英国和法国帝国内坐收渔人之利。验证这一切将非常有趣。

首先，我们被派往加纳，然后是桑给巴尔岛，以后是坦桑尼亚。此时，苏联的影响开始上升。我特别注意到，被派往这些国家的苏联人士大多以外交官、记者或教师的身份进行活动，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要有机会就想叛逃，以摆脱苏联对其生活的控制。此外，他们中许多人不快乐，与非洲人的关系也不融洽。我向华盛顿发回报告，指出他们的存在不仅不会成为苏联意识形态的传染源，而且还有可能成为预防苏联意识形态传播的疫苗。

70 年代，我恢复了与苏联直接打交道的工作，先是回华盛顿国务院担任

苏联事务主管，然后任驻苏大使馆副主管。此时正是缓和时期，美苏关系比60 年代要好些，但尚未完全解冻。克格勃仍试图禁止我们同苏联人的交往，只有一些勇敢者（如诗人兼小说家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及其妻子、作家卓娅·波古斯拉夫斯卡娅）愿意定期与我们会面。尽管如此，我们的交际网仍在稳步扩大，直至 1978 年我们返回美国为止。

1981 年，我们又被派往莫斯科，这次是在罗纳德·里根就任总统之后奉命代管大使馆工作。在那里，我们呆了大半年，直到秋天里根任命的阿瑟·哈特曼大使上任为止。这一段时期正值美苏关系高度紧张：一年前苏联入侵阿富汗，参议院在激烈辩论之后拒绝批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不过，我们发现仍有很多朋友愿意与我们会面。

在布拉格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两年之后，我被调回华盛顿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负责欧洲和加拿大的事务，侧重于苏联。我〔11〕被指定帮助设计一项有助于缓和紧张，减少军备的战略。当这项任命公布后，我从未谋面的记者卢·坎农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称我为“ 军事上的强硬派 ”。

这一形容只有一部分正确。就反对苏联帝国暴行及其强加给众多人民的虚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言，我的确是一个强硬派。我认为，除了显示我们的决心和力量去阻止苏联入侵之外，别无选择。但在涉及俄罗斯人民和其他在苏联统治下的民族时，我则不是强硬派。我认为，他们的真正兴趣与我们一致，即期望生活在和平自由之中，使他们内在的创造力得到发挥，而不被一个无所不在的政治机器所扼杀。虽然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制度下，但我相信他们是友好的。与东一西对立双方的空想家不同，我相信苏联是会改变的，而且我们应鼓励这一变化。里根总统也开始相信这一点，他赞成将坚定性与谈判的意愿结合起来、并将尊重人权置于首位的政策。

在 1986 年的圣诞节前，总统让我去莫斯科接替阿瑟·哈特曼的大使职位，这样我便得到了机会去实施我帮助制定的政策。

当我于 1987 年春天第四次抵达莫斯科时，改革尚处于初期。苏联领导人对经济不满，想要变革，但证据表明，改革并未超越早期表面上的、偶尔爆发出火花然后又悄然消失的“ 宣传 ”阶段。

无论声称要采取怎样的激进政策，不付诸实施就不会有太大变化。这意味着，如果我打算去理解所发生的事情，我就不得不同莫斯科以外的事态变化保持联系。我决心在任职范围内定期四处走走。在苏联所有的加盟共和国中，我只有一个未曾去过，但这次我要全部走遍，且不止一次，而是尽可能地去我能去的地方（我们自己的政策规定波罗的海国家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12〕这次旅行很紧张，但也很值得。它不仅富有启发性，而且使我有机会去准确阐述美国的立场。苏联当局向人民解释说其扩张军备是为了对付美国的威胁（但从未具体描述，以免公众反对其巨大开支），我为什么不表明美国事实上是一个有意关心别人的国家并以此来戳穿这一谎言呢？

我还知道，在苏联境内有众多民族有着令人自豪和古老的传统，他们需要我们保证不会忘记他们。许多非俄罗斯人害怕在单一苏联文化（如语言上的俄罗斯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列宁主义）统治下失去其民族特性，害怕被整个世界遗忘。

1963 年，我同大使馆同事、后来任美驻保加利亚大使的杰克·佩里一同对波罗的海各共和国进行了一趟旅行，印象很深刻。与往常一样，我们设法摆脱官方旅行机构的包围，在大街小巷、剧院餐厅四处漫游，尽量多会见普

通人，同那些敢于同我们谈话的人畅谈。在这些谈话中，一个主旋律常是：“请不要认为我们是俄罗斯人，我们不是俄罗斯人，我们是爱沙尼亚人（或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当然，我们早知这一点，但现在才了解其背后的那种渴望。铁幕阻塞了准确信息在东西方问的流通。同莫斯科所称的其他“民族共和国”一样，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日益被外国人视为“苏联俄罗斯”的一部分。

诚然，我不能自以为是地说所有美国人都了解苏联境内所发生的事情，但我知道对人权被侵犯的民族表现同情和理解，是我国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

随着我对苏联兴趣的加深，我努力地学习其语言和文化。虽然在正式场合我是说俄语，但在非俄罗斯区域，我则尽量说当地方言。这样做是想表明，我的确知道我所访问的这个国家是独特的，我尊重它的民族特性，这种兴趣和尊重足以使我克服困难，去学习他们的语言，哪怕只是简单的几句也行。

“美国之音”的工作人员尽力帮我准备去格鲁吉亚、亚美尼〔13〕亚和乌兹别克的演讲稿，我在莫斯科的朋友则帮我准备去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哈萨克和车臣的演讲稿。

每一次旅行都有发现，即使是那些已经去过的地方也是如此。随着公开性的扩大，人们变得更加坦率，一些敏感问题成为谈话中心，许多过去见不到的人现在则可以见到，当局有时甚至鼓励人们同我们谈话。

丽贝卡通常不仅和我一道旅行，而且独自行动，因为她经常被邀请去展示自己拍摄的照片和设计制作的挂毯。

我们的意图是让人们敞开心灵的大门。人们可以感觉到我们对他们的兴趣，他们同样对我们及美国作出感兴趣的反应。我们对他们以诚相待，他们亦如此回报我们，久而久之，我们就能感受到气氛在发生变化，薪的态度在出现。

在同苏联人沟通时，我们得到了苏联媒体的重要帮助，苏联报纸、杂志、电视台及电台一度不向外国外交官，特别是美国人开放，现在它们开始采访我们，到 1990 年几乎没有一天我们不被媒体提及。

在莫斯科，我们既吃惊而又愉快地发现自己已成为苏联社会的一部分。许多来客，其中大多是苏联人，一周在我们的公寓——斯帕索别墅聚会几次，谈音乐、电影、艺术展览，共进早餐或晚餐，以后则是讨论政治和经济问题。当新议会成立后，在我们的斯帕索别墅里所谈论的话题通常是议会将要正式辩论的议题。

随着苏联社会的开放和两国关系的缓和，苏联领导人更加公开地同我们打交道，讨论他们的计划、希望乃至征求建议，特别是有关民主制度及其实施方面的建议。在我们大使馆富有活力的外交官们的帮助下，我们逐渐认识了莫斯科所有著名政治家，还有莫斯科以外富有影响力的许多人物。

1989 年，布什总统要求我延长任期，我同意了，但到 1991 年春天，我感到转向其他方面的时候已到。担任驻苏大使的四年虽〔4〕令人振奋，但也颇耗精力。我亲眼目睹了冷战的结束。很显然，共产主义已告别苏联，苏联自身要么朝着更为民主的方向转变，要么面临瓦解。摆在美国决策者面前的任务将大大不同于过去。

现在是让新手来莫斯科任职的时候了。对于我来说，则是离开公共事务，重操进入外交界前的写作和教书旧业的时候。4 月，我告知布什总统自己想

在夏天离开莫斯科，最后，我们确定 8 月我离开莫斯科一周后，戈尔已乔夫的同事组成了一个反对他的小集团。当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度假时，他们要求戈尔巴乔夫把权力交出。当戈尔巴乔夫拒绝后，苏联瓦解过程中的最后一幕就开始了，我是在美国看到这些事件的，但我了解这些制造事件的人，因而容易想象这一局势。在春天，我曾同我的俄罗斯朋友站在一起去保护他们的白宫。当叶利钦站在坦克上高呼反抗阴谋者时，我也是站在他的一边。

随着苏联成为历史，我在考虑如何为它发布讣告。如果一个品行不佳的人去世，我会这样说："人无完人"，回避客观的评价。但是，一种政治制度并非一个人，对苏联帝国的消亡，没有理由悲哀。

希特勒入侵苏联导致 2100 万人丧生，斯大林所杀的人比这还要多。数以百万的、只有小小过错的人都被杀害，农民的土地被没收，牧民的牲畜被占有，农业的衰落引起灾荒。成功的农场主要么被处死，要么被关进近乎死亡的集中营，只因他们曾经卓有成效、富于创造、并因此给集体主义社会树立了坏榜样。他们代表的是一个专制海洋中的自治岛！

全部民族被放逐，只因怀疑他们不忠（如朝鲜人或伏尔加河的日耳曼人）或有朝一日可能不忠。

苏联政府为其工作人员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强制工具，但却无有效手段去防止他们滥用职权，唯一的限制是实际操作的限制以及对政治经济影响的估计。

是的，这是一个邪恶帝国，但这一帝国同 1991 年 12 月 25 日〔15〕消亡的那个国家是一回事吗？旧的苏联帝国——即邪恶的那个——是否因苏联共产党在 1991 年 8 月解体而一起完蛋了呢？

以后则是各共和国在一起谈判，通过签订联合体条约来建立一个不同千过去的国家结构，因此，一些人（包括许多当选为苏联议会议员的人）说，1991 年 12 月的选择不是在苏联帝国和一组独立共和国之间进行，而是在一个自愿的民主联盟与众多独立国家间进行，这些国家中的许多国家仍是专制国家甚至比这更槽。

正当我在内心酝酿讣告时，一个我不能准确回答的问题产生了，即已崩溃的这个国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是旧的、没有几个哀悼者的苏联，还是有许多哀悼者的另一类国家？

但有一个问题我很清楚，即苏联帝国是邪恶的，不过它不是由邪恶人民组成的帝国。在俄罗斯人和前苏联其他民族之间划分好坏，很有可能类似于在其他民族和社会之间划分好坏。

苏联体制会在其人民中间产生败类，但它不能阻止勇敢和高尚行为的出现。这一体制虽是苏联领导人推行不人道政策的工具，但它不能消灭正义和道德，阻止人们对自由的渴望。很少有人像安德烈·萨哈洛夫、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那样，有勇气直接面对共产主义统治者——尽管有许多人曾冒险作过惊人之举。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虽不愿冒巨大个人风险去支持堂吉诃德式的目标，但他们是在心照不宣地做着无声反抗，这比起积极支持现政权者，自然显得不同寻常。

当变革由可能成为现实时，促使苏联体制崩溃的大多数人（虽不是所有人）曾是这一体制的参与和受益者，一些还是高层人物。前面提及的问题这里再一次出现：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一个执政党怎么会在未作任何有效抵抗的情况下就自行灭亡呢？一个尚未在重大战争中失败过的强有力的军事机

器是怎样土崩瓦解的？

在 1991 年 12 月 26 日的凌晨，趁着睡意还未来临之际，我决心通过回忆和反省苏联崩溃前的一些事件来努力找出答案。〔16〕写到这里，我应该先表明我的观点。

当我赴莫斯科就任大使时，我的首要职责是代表自己的国家和利益，这些利益在那时与苏联制度及其政府政策有很多冲突，但它们同苏联人民的真正利益没有冲突。我们的目标是防止苏联侵略，消除引起东西方紧张的根源，而非现象。一个能对其人民负责、保护他们权利的苏联政府，是我们未来拥有和平的最好屏障。我认为，也希望过，专制的苏联帝国最终会从世界舞台消失，但它来得如此迅速，则是我始料未及的。

自 80 年代未以来，我常被苏联记者问及，是否相信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变化将会发生，我常回答道：“ 当然会。 ”但在看到提问者吃惊的表情后，我又加一句：“ 我希望我的孙子会活着看到它。 ”

在整个改革期间，我对苏联的民主变化从理智和感情上都是支持的。这种变化当然符合我自己国家的利益，但更符合苏联人民的利益。我认为，获得自由对波罗的海国家是重要的，因为这正是它们的人民所追求的，还因为苏联兼并它们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公认的行为规范。一个基于协议、而非武力建立起来的苏联，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而且，自愿性联盟也会为参加者带来好处。

虽然我同情被兼并进苏联帝国的各国，但我从不反对联合的主意。独立下一定是发挥一个民族潜力，保护其自由的唯一方法。一个权力有限、基于自愿成立且有民主机制有效加以约束的联盟，能够提供自由并建立起更有效的经济发展结构。在这点上，戈尔巴乔夫总统和我一样清楚，他始终在维护自愿联盟的价值，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

不过，我认为，这种联盟只有在旧的国家结构被新的、由各〔17〕级民选领导人组成的国家结构所取代才能产生。如果组成苏联的各国不相信新联盟符合其利益，无论旧的“ 权力中心 ”如何努力，或国外领导人如何为其使劲，这种联盟都难以建立。

在我看来，民主是试金石，它的定义不仅是指自由选举，而且还指政府工作体制权力有限、遵守法律规则、保护民众和少数民族权益。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毫不怀疑，这样的国家——无论它是由几个国家组成的联盟还是一个较小的民族国家——都将是我们的朋友和潜在的伙伴。一个独裁或专制的国家，无论大小，无论是“ 左倾 ”还是“ 右倾 ”，都是个问题。这一问题直接影响其人民，最终影响到我们大家。

制定目标是一回亭，实现这一目标则是另一回事。我知道我没有准确的答案，也怀疑别人是否会有。我们都在直接或间接地摸索，人们在变化，社会在变化，但并非所有的事物都在变。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其过去的特征都不会完全消失。在这一变革的大漩涡中，最困难、也是最不确定的任务是，将新的特征与旧的特征进行比较并估价它的力量。对个人尚不太好评价，对整个民族、社会乃至帝国就更加困难。

我还感到，如果一个民主的苏联或俄罗斯繁荣兴旺，美国将会从中受益。我从不赞成一些观察家所说的俄罗斯衰弱符合美国利益的论点。即使我们这样希望，我想我们也不一定能做到。我还认为，让俄罗斯衰弱下去是愚蠢的。如果民主取胜，那么一个强大的俄罗斯是有益于我们大家的。如果民主失败，

那么俄罗斯就会经历曾导致苏联灭亡的那许多弱点的折磨。不管怎样，这是俄罗斯人必须作出的选择，美国人不能为他们作出决定。

我并不奢望写一本有关苏联崩溃的准确的历史书籍，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事件才发生不久，历史尚未完全定论。我也不打算具体论述改革的所有特征或记述这一时期美苏关系的所有大事。我将重点论述与这几个基本问题有关的事件：苏联帝国是如〔18〕何崩溃的？何时？关键事件是什么？谁（如果有的话）将承担主要的责任？苏联帝国是在 1991 年 12 月 25 日终结的吗？或者说其继承者是在那时出现的吗？一个民主联盟曾经可行吗？最后，未来或世界其他国家会从中得到启迪吗？

我的论述将不涉及与这些问题无关的事件，即使它们在其他方面很重要。我的论述是对苏联崩溃进行解剖，而不是为它立传，而解剖旨在找出死亡的原因，进行解剖的病理学家并不需要了解死者生活中的每一重要方面。

但即使解剖也需要了解死者生前的身体状况。那么，我们对 1991 年瓦解的帝国该说些什么呢？将它联系在一起的是什么呢？受其束缚的都是些什么样的民族？

〔19〕第二章帝国

世界上最为民主的宪法。

约·维·斯大林论 1936 年苏联宪法

虚伪是罪恶赋予道德的贡品。

拉罗什富科 1961 年 11 月 26

当我驱车进入苏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首府斯大林纳巴德时，天气和煦温暖。该城市坐落于与中国、阿富汗交界处不远的山谷之中。我和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艾伦·埃伦德一同坐在苏制 “ 海鸥 ” 牌黑色轿车的后座。

埃伦德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环球旅行者，但这次旅行不太愉快。他拟定了周密的计划，坚持一天花 10—20 小时去参观工厂、农场和办公室。作为驻莫斯科大使馆的陪同官员，我的职责是让他得到准确的翻译（有时替换一下翻译），记下我们的所见所闻。在每一次的旅行之后，参议员都要对他的发现写一份很长的报告。这次他的目的是要去 30 年代以来很少有人去的地区（在那之前也很少有人去），了解当地的农业和工业发展。①

我们在斯大林纳巴德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奇特景象。尽管太阳〔20〕已下山，温度尚在 17 度，但从远处看，这座城市似乎处在一片雪白之中，同远处环绕我们的群峰融为一体。进城后，我们才发现这片白色并非白雪，而是棉花。在巨大的中心广场，除了留出不足两个车道宽的细长道路外，其他部分都晒满了一堆一堆潮湿的棉花。

东道主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说，在收割棉花时下了一场大雨，不得不在广场和其他空旷地带将淋湿的棉花放在冬日之下晒干。

在我们驱车入城时，俄罗斯导游讲解道，以前这里只是一个名为杜尚别的小村庄，但当它成为有 30 万人口的塔吉克斯坦首府时，这一名字就显得过时。很幸运的是，约瑟夫·斯大林非常仁慈地允许用他的名字来命名。

当尼古拉·赫鲁晓夫在苏共 20 大攻击斯大林的报告发表 10 天后，这城市又恢复使用杜尚别的名称。

无论何时，也无论这个城市的名字是什么，棉花总是这里的国王和王后，而且日益如此——这是开玩笑。棉花也是周围邻国的主要农作物，如乌兹别克和土库曼大部分干旱地区都种植棉花。事实上，中亚的整个农业经济都从水果、蔬菜的生产转向棉花生产，前者在苏联大部分地区都短缺。

在这些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生产棉花，需要很多的水加以灌溉。在许多地方，土壤中的盐分很大，不得不在每年春季播种前冲洗一次，以使庄稼更好地生长。为此，就要挖掘沟渠以引进更多的水。巨大的咸海流量越来越少，水位开始下降。水还不是唯一的问题。由于化肥、农药、脱叶剂日益被无限制地使用，河流和地下水被严重污染。早在 1961 年，就有人担心环境能经受多大的破坏而不致使土地变成荒地。

〔21〕当我们问及此事时，主人向我保证，社会主义政府与资本主义政府大为不同，用不着担心。社会主义政府永远关心人民，破坏环境的事自然是不允许的。

我们在中亚城市所会见的大多是俄罗斯人或其他欧洲人，很少见到当地人。不过，在中亚农村地区则几乎全是当地民族。②城市化虽发展很快，但

结果不是当地人迁往城市，而是外来移民增多。

这种人口流动是否会产生裂痕？当然不会！我们的谈话对象这样向我们保证：我们都生活在完美的统一之中，因为，你知道，我们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歧视。

1961 年，当我同参议员艾伦德在中亚和外高加索旅行时，我的头脑并非一片空白。我研究苏联已有多年，对其地理、种族及历史都有兴趣，甚至还读了许多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书。然而，书面上阅读和吸收是一回事，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和感受则是另一回事。

我对那一年秋天的所见所闻进行了思考，显然，我认为自己亲眼目睹了殖民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尽管我们的官方东道主否认这一点，但对未被意识形态观念蒙蔽的旁观者来说，这是一目了然的。当地的政治和经济决策不是由当地人民自己作出，而是由莫斯科的“ 计划者 ”作出。这里的人，无论是外来的还是土生土长的，唯一能做的就是贯彻上面的指示。“ 上面 ”就是莫斯科，它是至高无上的。这一政权是公开的、在当时也是非常好战的无神论者，它只符合卡尔·马克思和弗拉基米尔·列宁定义的“ 历史 ”。在我看来，当我们到达这个当时称做斯大林纳巴德的城市后，迎接我的那一片湿棉花正是这一帝国某些特征的强有力标志。

对于中亚而言，生产一定数量的棉花并以国际市场价格销售或供给当地棉纺厂，是有利可图的（我们不敢肯定，因为它从未被尝试过），但建立一种单一经济以便为苏联其他工业区提供廉价的原材料，这肯定不符合这一地区的利益，也不会发生在考虑成〔22〕本和效益的市场经济下。

只有在计划经济下、当国家的各个组成部分被视为殖民地时，这种情况才会发生，在某种程度上，它只在没有私有土地的国家发生，因为私有者对保护其资本——土地自身的质量——有巨大的兴趣。国有财产理论上属于每一个人，实际则不属于任何人，至多是属于那些只对大规模生产感兴趣的中央计划者。

由于这一“ 体制 ”为棉花生产制定了越来越高的目标，因此不得不将日益匮乏的水用于棉花灌溉，对基本的经济因素（如资本投资的适当回收）或其对环境的影响则不加考虑，这样，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准和健康条件开始下降。此外，年复一年对产量提出更高要求为谎报材料提供了刺激因素，日趋严重的腐败使弄虚作假既可能又有利可图。

所有这一切的根源在于，需求棉花的苏联纺织业主要分布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且不愿用硬通货从国外购买（实际上，这更为经济）。当你能迫使你的“ 领地 ”上的人为你生产廉价的原材料时，为什么还要花费硬通货去买呢？当局不准人们问：“ 谁因廉价而收益？ ”

在我看来，同棉花一起作为象征的还有两个特征：许多城市的名字及其“ 面貌 ”。

认为塔吉克斯坦人自愿要求用斯大林的名字命名自己的首府，认为吉尔吉斯人真心愿意用曾率红军入侵的米哈伊尔·伏龙芝将军的名字命名自己的首府，显然都是荒谬的。同样，认为将外来民族迅速地、而且常常是强制性地迁入可以巩固“ 民族友谊 ”，也是不可信的。

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完全站在一边，所有这些正是“ 缺席政治统治 ”的典型特征，我们通常用一个词来形容它，那就是“ 帝国 ”。无论苏联体制还有些什么别的特征（它的确还有很多其他特征），它的确是一个帝国。

〔23〕是俄罗斯人还是苏联人？

不过，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帝国。罗马帝国、大不列颠帝国、法兰西帝国、西班牙帝国，它们都是因一国入侵另一国而产生的。结束于 1917 年革命的俄罗斯帝国亦是如此。侵略国成为其殖民地所依附的“宗主国”。

与之相反，苏联帝国则是政党入侵的结果，该政党将官僚和意识形态合而为一。所谓宗主就是共产主义统治阶级，即官僚阶层，它没有国籍之分。正是共产党将俄罗斯，当然还有乌克兰、格鲁吉亚、乌兹别克等都殖民化了。

然而，有许多人仍视俄罗斯人为殖民者，其理由是：俄罗斯人比其他民族的人数都多，他们占据了共产党中央机构，通常是迁入非俄罗斯地区的主要移民。许多非俄罗斯人认为共产主义统治是俄罗斯统治的一种形式。此外，苏联帝国继承了俄罗斯帝国扩张的历史。它将俄语作为一个统一要素。在许多人看来，以牺牲其他语言为代价扩大俄语的影响，这同俄罗斯扩张并无多大区别。

相反，许多俄罗斯人则认为其国家一直被一项国际阴谋所支配，这一阴谋既排斥其他国家的传统价值观，也排斥俄罗斯的传统价值观。一些俄罗斯人因怀念已被碾碎的传统，开始对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一句名言产生共鸣，即没有人比俄罗斯人自己更多地经受了共产主义统治的磨难。

这种奇特的自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者将承认这种依受害程度来衡量美德的努力）很难加以证实。毕竟，俄罗斯人并不像鞑靼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和伏尔加河畔的日耳曼人那样，被全部赶出了家园并付出了无数的生命，也未经历过斯大林在乌克兰、哈萨克所实行的农业集体化。他们未被剥夺用自己的母语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也未因是俄罗斯人而受苏联当局的歧视。反之，当他们移民到非俄罗斯人占多数的地区时，他们享有保护和特权，并〔24〕敦促人们学习俄语，仿效自己的生活方式。

不，尽管俄罗斯人不像其他民族那样历经折磨，但他们内心的痛苦也够多的了。在斯大林时代，他们同样生活在专制统治的恐怖之下，所谓的富农或政治嫌疑犯并不因其是俄罗斯人而受到庇护。斯大林式的恐怖对任何人都是一视同仁。为了支持共产党的官僚机构和军工企业，税收负担很重，这无疑影响着每一个人，而俄罗斯人因其作为一个民族人口更多，因此比其他民族遭受到了更大的掠夺。

大多数俄罗斯人对苏联帝国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他们视整个国家为自己所有，但又经常不满于将资源运往俄罗斯境外，特别是中亚地区。他们为苏联的规模和力量感到自豪，但又不满于共产党为维系这一帝国强迫他们作出牺牲。他们强烈感到，他们与波罗的海人、中亚人、高加索人不同，许多人认为摆脱这些民族会使俄罗斯更加强大。反之，他们将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视为自己的“小兄弟”，认为在法律上没有理由将他们与俄罗斯分开。

俄罗斯人既是殖民者，也是被殖民者，因此大多数俄罗斯人对苏联帝国并无明确态度，直到 1990 年时，还很少有人特别关注如下问题：究竟是苏联等同于俄罗斯帝国呢，抑或俄罗斯只是苏联帝国的一个殖民地。然而，在 1990 年以后，这已成为关系到未来命运的重大问题之一。

俄罗斯帝国

或许可以说俄罗斯曾是苏联帝国的一个附庸国，但毋庸置疑，俄罗斯人曾经拥有过自己的帝国。他们花费了几个世纪的时间，通过断断续续但又是持之以恒的扩张建立起这一帝国。有时，这一扩张是和平进行的，如俄罗斯

农民开荒者和哥萨克人向东迁移，定居在荒无人烟的土地上（这是相对而不是绝对而言，因为一些〔25〕土著民族总是受害者，正如北美土著民族曾受到白人定居者的压迫一样）。另一些时候，扩张则是军事侵略的结果。

不变的是扩张本质，可变的只不过是所采用的方式。结果是，一个多民族帝国不断地试图强迫少数民族加入到一个统一的俄罗斯国家之中。因而，在 19 世纪的几十年中，要想用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或采用拉丁字母的立陶宛语出版书籍，就是违法行为。虽然一些领土是被公开兼并的，但另一些则是逐渐被蚕食的，如格鲁吉亚在 18 世纪早期尚处于俄罗斯的保护之下，但很快就成为帝国的一个部分。芬兰起初还有其宪法，但很快就沦为俄罗斯帝国的一个省份，因为沙皇是决不允许在他们的帝国中出现一个独立者。

总之，俄罗斯帝国当之无愧，没有必要用诸如宪法、民族权利、自治权等虚假词语来搪塞。沙皇是一个独裁者，他就是想建立一个帝国。

当沙皇尼古拉二世在 1917 年 2 月被推翻时,俄罗斯帝国中的大多数非俄罗斯国家即开始同莫斯科保持距离。1917 年 3 月，乌克兰中央议会成立，要求乌克兰自治。8 月，白俄罗斯成立了一个类似议会，其他非俄罗斯国家亦大多如此。此时，它们并未谋求独立，它们所想要的是一个邦联，而不是单一的俄罗斯国家。

彼得格勒的临时政府当时正倾全力应付对德战争和日益严重的社会动荡，因此，它顺应潮流，将宪政问题交给将于战争结束后选举出来的立宪大会。

然而，1917 年 11 月布尔什维克的上台，使本来只是尝试性地要求自治的运动很快就转为要求完全独立。开始，布尔什维克发表声明加以鼓励。在那些最初发表的法令中，有一个是《俄罗斯各民族权利宣言》，对“平等”、“主权”、“包括独立在内的自由自决”以及“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作出了保证。许多非俄罗斯人不计后果，按自己的理解对布尔什维克的号召作出了响应。

乌克兰中央议会拒绝承认列宁政府为“中央”，阻止当地布尔〔26〕什维克占领基辅省政府机构。顿河流域的哥萨克人（说俄语，从未视自己与俄罗斯民族有区别的群体）也拒绝遵守布尔什维克规则。12 月，白俄罗斯全国议会宣布自治。

那时，波罗的海国家为德国占领，但独立运动也迅速蔓延。高加索和中亚也经历了发生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那些变化，11 月 15 日在梯弗里斯，执政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全民族党组成了一个临时政府，称“外高加索委员会”。

大约 3 周后，哈萨克议会宣布自治，自治区域即现在的哈萨克斯坦。与此同时，乌兹别克穆斯林于 12 月在浩罕宣布自治，成立突厥斯坦，这一地区大致位于哈萨克以北和伊朗、阿富汗以南之间的地区。其他几个民族国家也相继于 1917 年末和 1918 年初成立。

帝国重新组成

从表面上看，《俄罗斯各民族权利宣言》的承诺很明确，但追溯一下共产党含糊不清的历史，就会发现漏洞。如果只是解释而不是歪曲的话，列宁的立场是，各民族有自决的权利，但只有无产阶级才有权利决定，进一步说，只有共产党才能为无产阶级说话。

这一公式就使得布尔什维克能在合适的时候摆出解放者的姿态（即当其

他人尚处在政治统治地位时），而当自己已强大到足以占主导地位时就否定独立。当“ 民族解放 ”运动的对手是“ 帝国主义者 ”或“ 资产阶级政府 ”时，他们要求独立就会被视为是正确的，值得大家给予支持。但是如果民族领导人要求与一个共产党国家享有同等待遇时，这只能证明他们不是为无产阶级说话，因而他们的要求应予以拒绝，他们本身也应被当作阶级敌人予以消灭。

在布尔什维克夺得权力之前或刚刚夺得权力的时候，在共产党人中间进行的有关“ 民族问题 ”的辩论，只是就这一问题的形式，而非本质加以辩论。列宁强调脱离权的宣传价值，坚持它事〔27〕实上只是一个学术问题。另一方面，斯大林愿意更直截了当，在讨论列宁对俄罗斯沙文主义提出的“ 警告 ”时，斯大林指出：

有时自决权与另一更高的权利——工人阶级巩固其权力的权利会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含糊——自决权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工人阶级实行专政权利的障碍。③

当各国开始脱离分崩离析的俄罗斯帝国时，这一“ 逻辑 ”即被付诸实施。无论何时，只要可能，任何谋求独立的企图都会被武力粉碎。

夺权之后仅仅几周，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就采取了一个策略，这一策略将在以后成为布尔什维克觊觎别国领土时同该国打交道的惯用手法。这一策略的做法是：先为军事干涉制造一个借口，最早的例子是，他们向乌克兰议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允许俄罗斯红军自由通过乌克兰领土去镇压哥萨克人的起义。当乌克兰议会拒绝时，他们便借机入侵乌克兰，并于 1917 年底在哈尔科夫成立了由俄罗斯人领导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同一周，俄罗斯红军又以武力推翻了明斯克的白俄罗斯国民议会。

1918 年 1 月，红军占领了位于伏尔加河以东、曾是土耳其分离主义运动中心的奥伦堡，解散了哈萨克和巴什基尔国民议会。2 月，受布尔什维克支配的塔什干苏维埃派俄罗斯军队向南扫荡了突厥斯坦自治政府所在地浩罕，然后将那些来不及逃走的穆斯林全部杀害，放火焚烧了这座古城。

然而，布尔什维克武力镇压的能力开始受到严重限制。为了结束同德国的战争，列宁被迫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停止向西扩张领土。与此同时，对布尔什维克的反抗也在升级，特别是在边界地区。

布尔什维克的反应是建立一个名义上独立的“ 民族—共产主〔28〕“ 义 ”体制。如果当地共产党力量薄弱，难以控制局势，就让他们同当地民族政府签订条约。这一手法使得布尔什维克成为民族独立的斗士，从而分化了敌人，从一开始，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就视这一政策为权宜之计。

在这些短命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中，最为短命的要数白俄罗斯。它成立于 1917 年 12 月，但在 1918 年 1 月中旬，莫斯科共产党官员就决定将它与俄罗斯苏维埃合并，命令下达给白俄罗斯的“ 同志们 ”，要他们在预定于 2 月召开的苏维埃大会上开始合并进程。起初，白俄罗斯人表示反对，但最后还是放弃了。

即使在布尔什维克试图通过民族主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时，他们仍要确保这种虚构的“ 国家结构 ”独立不致扩展到已握有政治大权的共产党体系内。1918 年 3 月，俄罗斯共产党召开第 18 次代表大会，会议决议明确指出：

俄罗斯共产党及其领导机构的所有决议无条件地约束党的所有成员，而不考虑其民族成分。立陶宛、拉脱维亚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具有党的地区委员会权力，完全隶属于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④

由此可见，直到 1991 年它崩溃之时，苏联帝国始终坚持的一个核心准则是，外表上是一个国家“联邦”，实际上在“联邦”的背后站着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党。1989 年，这一准则曹受到挑战，但共产党领导人不愿作出改变，从而导致成立一个自愿性联邦的所有努力都归于失败。

在 1918 年和 1919 年，乌克兰曾是一场错综复杂斗争的场所。它有一部分领土被德军占领了几个月，后被非共产党的民族主义者拉达夺回。拉达包括两个不同的政党——布尔什维克和非布尔什维克,作战的另一方是安东·邓尼金将军率领的俄罗斯白军。当战斗结束时，红军成了胜利者，并成立了共产党政府。列宁迫使两〔29〕个政党合并，而且，最初乌克兰的共产党还要受“全国共产主义者”支配。

不过，全国共产主义者尚未强大到在所有地区组成政府。芬兰和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就成功地维护了独立，尽管四国的共产主义者都曾为并入苏联而战斗。莫斯科的军事力量不足以占领这几个国家，当这一态势明朗之后，莫斯科便正式承认了它们的独立，于是，芬兰于 1918 年、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于 1920 年宣布独立。

在外高加索，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也组成了独立政府，大多数西方国家承认它们为事实上的独立国家，22 个国家还在 1921 年 1 月承认格鲁吉亚为法理上的独立国家。然而，它们最终还是被红军所占领，其国民政府被推翻。

阿塞拜疆因盛产石油，成为苏联入侵的首要目标。1920 年 3 月，列宁下令占领巴库。4 月 25 日，红军跨过阿塞拜疆边界，占领了高加索以北的地区，三天后占领其首府。

巴库被占领的那天，当地共产党成立了“阿塞拜疆苏维埃独立共和国”，并向莫斯科发出电报，请求兄弟般的援助。这一手法以后经常被采用：先是莫斯科军事干涉，然后扶植当地亲莫斯科分子上台，再由他们出面请求援助。这一手法最近一次被采用，是在 1979 年 12 月的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克格勃和“阿尔法行动队”先扫荡了总统府，杀死总统哈菲祖拉·阿明，然后扶植巴布拉克·卡尔迈勒上台，再由他出面向苏联请求“援助”。

1920 年，格鲁吉亚军队设法驱逐了来自阿塞拜疆的侵略者，但独立的亚美尼亚于 12 月被占领。短时间内，格鲁吉亚看上去会苟延残喘，因为它与俄罗斯在 1920 年 5 月签订了一个和约,俄罗斯无条件承认格鲁吉亚独立。然而，这一神圣承诺毫无意义。来自阿塞拜疆的苏维埃军队在 1921 年 2 月占领了这一独立的共和国。〔30〕当内战于 1918 年和 1919 年在中亚、西伯利亚和远东蔓延时，布尔什维克时而利用、时而镇压民族主义分子和地方运动。无论如何，一旦他们得手，就会像以往一样对这些地区实施控制，将它作为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兼并。⑤

到 1922 年苏联正式成立时,共产党政府已设法将沙俄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重新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重要的例外是，在从芬兰至摩尔多瓦的广阔西部地区，有许多国家被承认独立，如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还有一些地区被划归罗马尼亚等国。

当时，各“加盟共和国”的政府都落在共产党手中。在 20 年代，俄语及其文化曾有迅速发展，特别是在乌克兰和高加索以外地区。不过，30 年代却首先经历了集体化，接着就是一场对全党和知识分子的大清洗。

仅在乌克兰，就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集体化。⑥在哈萨克斯坦，死亡

人数的比例更高。30 年代中期，斯大林的大清洗几乎使整个乌克兰中央委员会消失。约有 1000 多名非俄罗斯作家被处死或流放到劳改营，从而使许多国家的文化进步遭受打击，这一严重后果延续至今。

同希特勒的交易

尽管在一场消耗性的内战中获得了胜利，但莫斯科的共产党政府已虚弱不堪，难以在西部重组其帝国。在 20 和 30 年代，领导层一直忙于恢复战争创伤，强制推行集体化、混乱的工业化和突然的清洗。然而，从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判断，斯大林一直不甘心“失去”俄罗斯帝国的任何一部分势力范围。只要有机会，斯大林即向西扩张苏联的版图。

这一机会在 1939 年出现了。当时，希特勒决定首先进攻法国和英国，这就给苏联以可乘之机。一系列的秘密外交显示，斯大林保证给德国一个和平的“后院”，但条件是：允许苏联自由向西〔31〕扩张。当两国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和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于 1939 年 8 月 23 日在莫斯科签署了举世震惊的互不侵犯条约时，他们有意隐瞒了一个更重要的秘密议定书。

该议定书的微型胶片直到 1945 年才被盟军缴获,其内容是希特勒和斯大林瓜分东欧：波兰被两国瓜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划归苏联。几周后，该议定书又有修改，将立陶宛划归苏联，苏联则给予德国物质援助，并将波兰划归德国。⑦

在里宾特洛甫离开莫斯科恰好一周之后，德国即从西面入侵波兰。9 月 17 日，苏军从东面发起攻击，迅速占领了纳粹让给苏联的领土。在这年秋天，苏联还进入了波罗的海独立国家。1940 年 6 月，这 3 个绝望的国家在枪口面前“请求”加入苏联。8 月，苏军占领了罗属比萨拉比亚，随即也将它并入苏联。

1941 年夏至的晚上，希特勒转而进攻苏联，迅速占领了被斯大林侵占的那些地区，并向前推进，但在希特勒被击败后，除波兰部分地区外，斯大林不仅设法收复了全部失地，而且还扩大了版图。波兰边界向西移动，占领了德国的一些地区，但其东部的许多地区则被纳入白俄罗斯、立陶宛和乌克兰。东普鲁士部分地区成为俄罗斯联邦的一个州——加里宁格勒州，它曾被立陶宛分离出去。捷克斯洛伐克最东端地区——外喀尔巴阡被纳入扩大了的乌克兰版图之中。摩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重新成立，以纪念从罗马尼亚夺回比萨拉比亚。作为战败的德国盟国，罗马尼亚除了同意割让，别无选择。

美国和大多数西方大国虽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同苏联结盟，但从未承认苏联兼并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合法性。不过，对苏联〔32〕在欧洲扩张版图并将结果写入和约或其他国际协定之中，美国并未表示异议。

斯大林及其所有的继任者（包括戈尔巴乔夫）对西方的不承认政策都不当回事。西方的政策已落后于时代，只能损害西方自己的利益。当西方清楚地认识到苏联的边界将被永久地固定下来时，它将不得不改变这一政策。

当斯大林将一个接一个的国家并入自己的帝国时，他或许从未想到他和希特勒瓜分领土所引起的政治震动已经使这些国家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斯大林的遗产：虚假的民族国家

这些并非斯大林唯一的过失，另一过失可追溯到苏联刚成立的时候。

作为人民委员,斯大林在 1922 年苏联正式成立时对其结构的确立发挥了直接影响。以后，他保留了这一结构，只在 1936 年的宪法中作了一些具体修

改，此时他已大权在握，因而认为是他确定了苏联的基本特征并非没有道理。

从字面上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主权国家的自愿性联邦。在理论上，这一联邦要比美国松散，因为各创始国保留有公开的脱离权。

但是，与美国不同，它的政治联合是基于特定的种族集团的。生活在一定的领土范围内的每一种族集团被赋予政治实体的地位。众多的民族组成‘加盟共和国”，拥有自己的议会、部长会议和各级政府机构。

在此以下，还有“自治共和国”，它类似于加盟共和国（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已发生一些改变），但没有脱离权。大多数自治共和国位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

再以下，就是一些人口极少的自治州和民族区，它们有一些〔33〕权利，但从未拥有过自己的国名。

这种结构的根据在于，每一民族都有自治权，并以自己的名义组织政治实体，来保护其利益。然而，在苏联的整个历史中，这一理论只是一种幻想。事实上，这个国家一直是采取单一形式进行统治，民族和地方利益并不是考虑问题的原则。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宪法实体并没有实际政治权力。苏联所有的政治权力都集中在共产党手里，而苏共又是以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虽然除俄罗斯以外的其他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共产党，但这些政党都被莫斯科视为一个单一组织的省级分支机构。

正是这种单一的政党构成了苏联专制结构的支柱，各共和国和其他实体只是一种点缀，虽然好看，却不具备结构性的功能。

然而，这些实体还是存在下来了。尽管它们受共产党的控制，但仍有自己的政府结构，这种政府结构形式上类似于特殊的民族集团。一旦苏联开始对外开放、发展某些民主机构时，所谓民族自治的虚假性就昭然若揭。

分而治之

对于那些喜欢看到一个整齐划一、民族单一国家的人来说（这也是苏联模式理论上的含义），很遗憾，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实际模式如同别的许多国家一样，并不与之相符。苏联的主要城市，特别是各加盟共和国和地区首府，无一例外都是许多民族的家乡。在农村，个人定居点则较为单一，主要是由一个民族群体构成一个村庄，但它们通常四处分布，使人联想到由各色花布拼起的百衲被。

〔34〕例如，当你驱车经过乌拉尔山以东盛产石油和天然气的巴什基尔部分地区（自 1991 年开始称巴什科托斯坦）时，就会发现景色轮流交替，一会儿是由传统伊斯兰建筑和穆斯林墓地组成的村庄，一会儿是由俄罗斯建筑和东正教堂以及带有十字架的墓地组成的村庄。在俄罗斯人的村庄，各家房屋都有雕花窗户和彩色门框。相对混杂定居的模式很普遍，而不是仅仅存于各加盟共和国交界的地方。

这种定居模式表明，边界不可能只按意想中的民族因素来划分。从好的方面看，有时必须作出妥协，使少数民族分布在边界两侧；从坏的方面看，政治考虑居于主导，边界划分旨在造成地方对立。防止出现任何一种与莫斯科作对的地方合作，似乎是当局每天的任务。

这种情况在高加索、中亚、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更为突出。一个亚美尼亚人占大多数的“飞地”却处在阿塞拜疆管辖之下，而不是由亚美尼亚管辖。

政治决定边界的另一重要例子是，1956 年赫鲁晓夫命令将克里米亚从俄

罗斯划到乌克兰。该半岛在 18 世纪就被俄罗斯人从鞑靼人手中夺过来，其绝大多数居民也都是俄罗斯人。这样做的原因却从未得到圆满解释。

中亚是这种分而治之最典型的例证。历史上，这些地区并未被统一在诸如亚历山大大帝或帖木儿等独裁者手下，而是被划分为几个汗国，而且这些汗国也不是按民族划分的。当中亚被并入俄罗斯帝国时，它是以突厥斯坦的名义加入的。大部分当地人说土耳其母语，使用单一的查加泰文字。在南方，许多波斯人也说土耳其语。正宗的波斯人，如撒马尔罕、布哈拉城的波斯人，既说土耳其语，也说波斯语。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因素是宗教而非语言，他们都属于穆斯林逊尼派。

到 20 年代早期，共产党领导人在重新占领这些地区时，先是考虑建立一个统一的突厥斯坦，以后则是以民族为界，也就是基于语言和部落的不同将它分裂成几个新“ 国家 ”，这样，乌兹别克、土库曼、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它不是加盟共和国，只是自治共和国）就应运而生。

这些新的民族国家在成立之前的确有其民族特性，并且最终〔35〕形成了固有的民族特性。毫无疑问的是，将它们分开的最初动机是要防止它们融入穆斯林土耳其集团之中。事实上，苏联当局几十年来一直禁止当地领导人成立区域集团，禁止学者们成立土耳其研究中心，以免亲土耳其的细菌找到可以繁殖的温床。

就是在语言文字规范等非政治性领域，分而治之原则也是显而易见的。苏联当局先是限制使用几种独立“ 国家 ”的文字，指定它们采用新的字母去代表发声仍相同的词语，以使文字与过去显得不同。查加泰文字本是阿拉伯语中通用的文字语言，但当局禁止使用，却引进了拉丁字母。不久，当局又发现使用拉丁字母也很危险，因为土耳其也在使用拉丁字母。为避免因此而可能出现的交流，30 年代末，当局又引进西里尔字母，以使相似的语言尽可能地显得不同。

要明白这种语言隔离的后果，可从德语去联想，看看当德语在统一文字标准并成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德国人的共同遗产之前，如果类似手段被采用会有什么样结果。不同的德国方言在外地人看来，是不太容易理解的，如巴伐利亚方言在汉堡或德累斯顿街上就几乎难以让人明白，柏林的方言在慕尼黑亦如此，但事实上，德国人却能互相理解，并感受到共同的特性，因为他们使用的是同一文字，即路德翻译《圣经》时所用的文字。

如果 15 或 16 世纪的占领国希望德国不成为一个统一国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使地区语言多样化，让每一语言有自己的发音和语法标准，禁止教授或书写一种跨方言的全国性语言。只要有足够时间，这种手段就会造成独立的巴伐利亚、萨克森、莱茵兰、普鲁士以及其他“ 国家 ”的语言。统一，在未来将更难于实现，因为语言确定了每个人的国家感。

〔36〕共产党在中亚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在给统一设置障碍方面做得非常成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于同样的原因，苏联在摩尔多瓦采取了同样策略，但这一次不是在摩尔多瓦人之间进行分割，而是要割断它同罗马尼亚的文化联系。从任何一种合理的定义看，摩尔多瓦人所说的语言都是罗马尼亚语，虽然有些方言差别，但这种差别类似于亚拉巴马和马塞诸塞州的英语差别。

基于这种细微差别，当局宣布独立的“ 摩尔多瓦语 ”诞生。由于难以区分这种差别，当局就用西里尔字母取代了罗马尼亚使用的拉丁字母。表面上，

这的确显得不同，如果你不懂西里尔字母，你就很难将以这种语言表达的‘ 我爱你 ” 同英语中的同义词联系在一起。

当机会来临时，摩尔多瓦人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恢复使用拉丁字母，重新称呼其语言为罗马尼亚语，而不是摩尔多瓦语。

保持触角……与抵触

苏联确立的边界和文化政策是为了防止任何反对莫斯科统治的区域合作，投资政策的实施也是为了防止政治区域出现将导致自治的超经济结构。

虽然苏联计划者热中于建立庞大的企业，并将生产集中在一个或几个工厂里，但习惯上还是将工厂设施分布在不同的地区和加盟共和国。例如，莫斯科的汽车装配厂所需要的汽化器可能来自乌克兰，雅罗斯拉夫尔轮胎厂所需要的化学材料可能来自塔吉克斯坦，只有生产最简单产品的最原始工厂才完全依赖于本地。

这种实践使许多经济学家大为不解，钢铁厂附近有所需要的资源，但它却从几千英里之外获得煤或矿砂。但这种设计却自有其道理，即不能让任何人感到，离开莫斯科事无巨细的控制，他们也能生存。

〔37〕我的一个朋友管理着位于俄罗斯太平洋沿岸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北的一个大矿山。他对我说，他那里出产的所有矿砂都必须用船运到几千里以外的西伯利亚和乌拉尔进行加工。当我问为什么不就地建一个冶炼厂时，他说：“ 如果他们这样做，我们就可以离开莫斯科而生存，更具体他说，没有莫斯科的有色金属冶金部，我们就可以生存。 ”

政治与官僚形成了一个让人生畏的组合。

另一个加强了各地联系、但也成为关系紧张之源的做法是，将民族群体，特别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分散到苏联全国各地。

每当有一新工业建立，就有人要被派到那里去工作，且通常是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在某些地区，如哈萨克斯坦北部的“ 处女地 ”，就有组织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

1990 年 2 月，我在基什尼奥夫（即现在的基希讷乌）为摩尔多瓦民族阵线的伊翁·纳迪尔萨等领导人举行了一次晚宴。他们大发牢骚，其中之一就是不满俄罗斯人、其次是乌克兰人占据了当地工业中的大部分好职位，使摩尔多瓦技校的毕业生难以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

我问及原因何在，他们归咎于莫斯科中央计划者所订的标准和程序，认为也许莫斯科并无明确的歧视政策，但它对各地的遥控实际上却造成了这种效果。

“ 就说邮电部决定在我们这里建一个开关厂吧， ” 客人举例解释道，“ 由于以前我们没有这类工厂，因而一时找不到熟练工人，只得从全苏联招募。与此同时，在得知要建工厂的消息后，我们也着手训练这里的摩尔多瓦人。但是，到他们毕业时，已无空缺，而来自俄罗斯的工人又不想回去，因为他们已定居下来，感到这里的天气和食品供应都比他们家乡要好。这样，摩尔多瓦人就不能参与自己家乡的建设了。 ”

就这样，民族扩散所产生的民族间联系被滋生着妒忌和不满的现实状况所抵消。

形式上的民族主义，实质上的社会主义〔38〕

“ 形式上的民族主义，实质上的社会主义 ”，这是一句常被用来描述苏联民族政策的标语，译成日常英语就是：“ 只要按我们的想法去说，用任何

语言说都行。”

这是描述实际情况的几条标语之一。事实上，各民族都被允许保护自己的语言，没有文字的还可以自己创造一个。在农村小学，一般都是以本地语言进行教学的，政府资助的出版物、电视、电台也都是使用本地语言，但政府要对其内容进行审查，而且这种审查比使用俄语的出版物更为严格。

尤其是任何与“民族主义”有关的主题，更是受到压制，只有在 20 年代中期和 60 年代初期时政策有所松动。任何贬损俄罗斯人影响的论述，都被视为不能接受的民族主义。⑧曾反抗过俄罗斯扩张的民族领袖被定为历史罪人，更糟的甚至还会被定为叛徒，沙皇时代的镇压行为，如 1916 年吉尔吉斯人因拒绝征兵而惨遭大屠杀，因此而相形见细。

虽然当局允许使用非俄罗斯语言，并在一些方面给予支持，但也日益强调作为“新苏维埃人”，更应学习俄语，后者则是苏联体制所要实现的目标。因此，俄语成了各个领域的人优先选择的语言。在许多共和国，望子成龙的父母们都是将自己的子女送到俄语学校，而不是那些使用自己语言教学的学校去学习，以此希望子女能在以后的生活中获得一技之长。

那些移居到民族区域的俄罗斯人，除少数人外，大多未被要求去学习当地语言，哪怕只是一些基本的礼貌用语。俄语日益成为上流社会的语言，各地方言则只是它的附庸。在大多数共和国，最好的学校和最先进的学术文章，都使用俄语。即使在使用当地〔39〕语言进行教学的学校，俄语也是必修课。除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外，各地区的高等教育很少有不使用俄语的。

当局为年轻人建立了一整套全国性的军事服役制度（唯有一些高干子串能够逃避），且军队中都使用俄语，这就意谓着，实际上每一个男性公民在服役期间都必须掌握最基本的俄语知识。

这些做法刺激了有民族自尊心的知识分子，但当他们关注这一问题时，官方的反应是将他们视为危险的异己分子。例如，60 年代，乌克兰学者伊万·久巴向当局提交了几份备忘录，提出这一做法违反了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当局遂将他定为诽谤罪，并令他撤回备忘录，公开认错。同样，许多采取更为激进方式的抗议者遭到了逮捕并被判处有期徒刑。⑨

除了语言俄罗斯化之外，非俄罗斯文化还面临其他的、使其丧失主流地位的压力。在这些压力之中，有些是 20 世纪的普遍问题，如都市化和工业化（当然，苏联的做法通常加剧了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但有些则是苏联帝国所特有的。

苏联公开宣称自己是无神论国家，在武力扩张时期尤其如此。宗教遭到压制，传教和信教都受到严格限制。例如，向未成年人传教是犯罪行为。任何人如果公开宣布自己信教，就不能加入共产党（这有效地防止了大部分的干部信教），而且会在其学校或工作机关经受一定的压力。许多教堂和清真寺以及犹太教堂都被关闭，公开作礼拜的日益限于老人。

这一反宗教政策对那些文化与传统宗教融会在一起的民族影响尤甚。穆斯林在很大程度上被割断了与其文化渊源的联系，犹太人几乎完全世俗化和俄罗斯化。一时间，即使教授希伯来语，也被视为犯罪。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新教和天主教教堂很少有存留下来的，只有立陶宛、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设法保护了在全国有强大影响的教堂。但是，在这里和其他地方，共产党当局花费了很大精力，让克格勃渗透进去，以控制牧师。

尽管这一体制公开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但它出于政治目的〔40〕也的确支持了一些宗教团体。例如，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东正教堂就得到包括警方在内的官方支持，意在对付那些不从属于莫斯科东正教堂的教会，特别是乌克兰天主教会和乌克兰东正教自治会，这两个教会因暗中支持分离主义而被法律禁止。

当然，“社会主义”是强制性的经济体制，这意味着，无论传统如何，所有的加盟共和国都必须建立集体化农业，成为以中央计划与管理为特色的联盟经济的一部分。的确，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但它们都隶属于莫斯科全苏计划委员会。各加盟共和国政府不能自筹资金，也无权根据情况变化去改变莫斯科制定的价格或标准。

中央官僚机构不顾各地情况坚持一刀切，这是荒谬的。1990 年，改革在理论上授予地方政府更大程度的自主权，但在土库曼首府——阿什哈巴德市，该市市长仍向我抱怨莫斯科的条件不灵活。这一地区的天然气很丰富，他希望铺设一条天然气管道，以为该市居民供应做饭和取暖所需的天然气，但莫斯科不愿为此划拨必要的资金，让市政府自己筹集。

该城市的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票价是 7 个戈比，而莫斯科规定全苏联一律为 5 个戈比。市长打算将票价提高到 10 个戈比，以便将其中的利润以及交通补贴用来资助天然气管道工程。市议会支持这一动议，但莫斯科不予批准。从原则上讲，并无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去否定市政府对划归它们的资金拥有分配权，只要它认为是合适的即可。但在实践中，地方的动议常被否决，只因莫斯科的各部委不愿其他人侵入其权力范围。

〔41〕事实上，莫斯科工业部门的态度不只是为了争夺官僚机构的市场份额，在他们控制的工业部门中，官员们将遍及全国的各项设施都视为该部门财产——实际上也是他们自己的财产，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处置。当然，在法律上，事情并非如此。财产属于国家，各部门只是对它进行组织和管理。但管理者很容易忘记这一原则，如同美国公司的官贝们有时忘记了不是他们，而是股东拥有该公司一样。

在 1990 年斯帕索别墅的一次招待会上,我向苏维埃邮电部长提起立陶宛的独立要求，这位部长反应强烈，“这些人是极端分子，”他咆哮道，“他们认为自己是立陶宛所有财产的主人，但他们不是。为什么？我的部就在那里有三家工厂，我们是用自己的钱开办的，它们理当属于我们。”

我评论说，虽然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我认为苏联的官员们一定是，令我不解的是，他如何将其对那些工厂的态度与财产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原则协调起来。各部门只是受人民的委托掌握那些财产，人民也有权将财产从他们手中收回。

“这与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关系？”他气愤地问道，“事实是，我们为那些工厂付了钱，它们就属于我们！”

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他的态度同马克思主义绝对没有关系，但人们可以从其对各共和国和省份的态度上很快领会到其意义所在（这一态度在莫斯科各部委中非常普遍）。正如他们清楚地看到的那样，所有重要的工业部门都是受莫斯科的管理，就好像是各部委的私有财产一样。

缺席的所有者对他们的计划如何影响环境并不关心，有的建筑设计并不安全，甚至是建在断层面上。钢厂、化肥厂和造纸厂没有清除排放物的配套设备。植树造林只是某个单位的事情，也只能粗略估计是否已有足够的资金。

1989 年，仅乌克兰就排放了八倍于美国的污染物，这一记录是不太光彩的。

我们可以列举大量的环境犯罪行为，这些行为是由苏联的集〔42〕权经济造成的，而这一集权经济又是由莫斯科的各部委所操纵。⑩由于有关环境破坏的事实日益为人所知，促使各地的人们对苏联帝国及其活动产生不满。毕竟，是现场的人民，而不是莫斯科的高官们，亲身感受环境破坏对自己生活的影响。

行政部门决定商品价格，这是苏联模式的“ 社会主义 ” 的一个显著特点，也为民众的不满提供了理由。各共和国的主要商品和产品，其价格都被定得极低，而它们购买进来的、主要来自莫斯科的工业品则价格较高（当然，仍比世界市场的价格低）。然而，人们强烈地感到这一价格体系是用来欺骗他们的，投资政策有利于俄罗斯而非边远地区，这种情形在中亚尤为突出。

如同控制俄罗斯地区一样，共产党也控制了非俄罗斯地区。为确保地方官员不对“ 民族主义倾向 ” 心慈手软，通常，党的第二把手都由俄罗斯人担任（第一把手是当地人）。实际上，大多数非俄罗斯官员都奴隶般地屈从于莫斯科的独裁者。他们明白，对 他们忠诚的任何怀疑都会使他们的官运终结。

尽管如此，它仍不能阻止非俄罗斯官员逐渐在许多共和国形成骨干力量。实际上，在勃列日涅夫推行的“ 互利 ” 政策下，许多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都设法在党内发展“ 黑手党 ”。只要他们通过贿赂而使其莫斯科上司高兴，服从于莫斯科的政治和经济独裁者，他们就可以慷国家之慨去营建自己的小圈子。

各加盟共和国和各省份领导人的地位，就像中世纪的贵族一样：只要他们忠于莫斯科的总书记（他们的国王），并吹捧莫斯科的政策，他们就可以在自己的领地里为所欲为。

苏联这一国家只不过是共产党的工具而已。就是在改革的最后两年里，尽管改革的口号叫得十分响亮，党的地位仍然高于政〔43〕府。当不能将两者职位合而为一时，共产党的总书记（有时称第一书记）就高于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它只是有名无实的国家元首）和部长会议主席（政府首脑）。这一模式延伸到每一级别，直至县和区。

官方文件中很少提及共产党的地位，但首脑会晤时例外。在那种场合，我们被告知，应给总书记以国家元首的所有荣誉。其实，也没有必要总是将党的地位挂在嘴边，因为社会等级观念已被灌输到每一个苏联公民的生活之中。当我和丽贝卡去苏联各地旅行时，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一点，有时它令我们吃惊，有时又令我们感到有趣。

在旅行时，我们总设法会见社会各阶层的人，常常在当地旅馆举行招待会、午餐或晚宴，邀请当地党政官员（如无上级批准，他们是很少出席的）和其他各类人。

虽然我们总设法去接近普通人，但当地的习惯常常使我们的努力受到阻碍。在伊尔库茨克，一个比得克萨斯州稍大但人烟稀少的州府，如果没有党的首脑出席和首肯，决不会有一个苏联客人敢跨进我们招待会的大门。即使有时客人们被千方百计请进了宴会厅，他们也只有在党的高级官员到达、同我们干杯之后才敢吃东西或喝饮料。这不是说他们对自助餐不感兴趣，只要当地领导人答谢完我们的欢迎词并碰杯后，餐桌上的食品很快就被一扫而光，然而，他们都知道如何去服从政治权力。

“ 被解决的民族问题 ”

由于共产党对帝国的控制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许多观察家们怀疑潜伏着的全国性紧张是否能动摇这一体制。尽管这种紧张不时在这里或那里爆发，但强有力的专政支柱会防止帝国崩溃。

大约在 1985 年,苏联官方认为相对来说国籍问题是一个不很重要而且容易解决的问题。这一体制的政治领袖们相信，一个没有民族特征的“新苏维埃人”的时代就要到来，人民说的是俄〔44〕语，但国籍却是“苏维埃”，这一新的类型将稳固地取代乌克兰入、拉脱维亚人、摩尔多瓦人、哈萨克人以及俄罗斯人。在他们服中，未来属于这一新的“国际”类型，即使有时出于策略考虑，不得不对恢复旧的民族文化的强烈要求作出一些让步，从而使这一进程比预想的时间要长，但是，当局仍有足够的手段去对付那些反抗历史潮流的幻想。（11）

戈尔巴乔夫赞成这一观点。甚至在他就任总书记两年之后，在他已将改革描述为“革命性转变”之时，他仍满怀信心地写道：“苏联在人类文明史上（在防止民族冲突方面）是独一无二的例努力受到阻碍。在伊尔库茨克，一个比得克萨斯州稍大但人烟稀少的州府，如果没有党的首脑出席和首肯，决不会有一个苏联客人敢跨进我们招待会的大门。即使有时客人们被千方百计请进了宴会厅，他们也只有在党的高级官员到达、同我们干杯之后才敢吃东西或喝饮料。这不是说他们对自助餐不感兴趣，只要当地领导人答谢完我们的欢迎词并碰杯后，餐桌上的食品很快就被一扫而光。然而，他们都知道如何去服从政治权力。

“被解决的民族问题”

由于共产党对帝国的控制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许多观察家们怀疑潜伏着的全国性紧张是否能动摇这一体制。尽管这种紧张不时在这里或那里爆发，但强有力的专政支柱会防止帝国崩溃。

大约在 1985 年,苏联官方认为相对来说国籍问题是一个不很重要而且容易解决的问题。这一体制的政治领袖们相信，一个没有民族特征的“新苏维埃人”的时代就要到来，人民说的是俄〔44〕语，但国籍却是“苏维埃”，这一新的类型将稳固地取代乌克兰人、拉脱维亚人、摩尔多瓦人、哈萨克人以及俄罗斯人。在他们眼中，未来属于这一新的“国际”类型，即使有时出于策略考虑，不得不对恢复旧的民族文化的强烈要求作出一些让步，从而使这一进程比预想的时间要长，但是，当局仍有足够的手段去对付那些反抗历史潮流的幻想。（11）

戈尔巴乔夫赞成这一观点。甚至在他就任总书记两年之后，在他已将改革描述为“革命性转变”之时，他仍满怀信心地写道：“苏联在人类文明史上（在防止民族冲突方面）是独一无二的例

第三章〔45〕火炬的传递

戈尔巴乔夫开始攀登一座山峰，他甚至看不见山顶。

鲍里斯·叶利钦 1989 年①

我在 1985 年仍然相信制度是可以改进的。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1992 年②

计划的艰难、成功的不确定及执行的危险，都不亚于试图引进新的制度……

马基雅维里 1514 年③

1985 年 3 月 10 日晚上，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去世。苏联领导人的去世本应成为当天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但情况并非如此，苏联的新闻媒介并未中断它已安排好的节目。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决定，在继任者选出前，不宣布契尔年科的死亡。政治局当晚开会做出了选择，并于次日召开党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加以确认。飞机当夜从苏联各地起飞，载着党的首脑前往莫斯科参加秘密会议。一位资深政治局委员、乌克兰的共产党首脑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要一直从加利福尼亚飞回去。他是唯一有幸在部分航程中乘坐美国空军飞机的政治局委员，美国空军飞机把他从旧金山送到纽约，一架苏联飞机被派到那里接他。

事实上，组织紧急运送谢尔比茨基一事，为我们在华盛顿提供了有关契尔年科去世的最初消息。契尔年科的健康状况很差，我们曾常〔46〕听到有关他去世的谣传，但最后都证明是不可靠的。当时我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有关苏联和欧洲事务，刚好在两天前，即 3 月 8 日，我给总统的国家安全助理写了一份备忘录，指出最新的传闻看来是可靠的，总统应该就届时是否去苏联参加葬礼一事做出决定。

丽贝卡和我当时正前往马里兰东海岸瓦依种植园内的阿斯彭学院会议中心，参加一个有关美苏关系的周末讨论会。我在星期天下午回到家，电话正响着。来电话的是马克·帕尔默，一位才华横溢、精力充沛的助理国务卿帮办，他负责苏联和东欧事务。他告诉我，我们接到请求，请我们帮助谢尔比茨基迅速返回莫斯科。我同意请求白宫授权空军把他送到纽约，在那里有一架苏联飞机接他，我们还就此事的明显含义进行了讨论。接着，我们两人都收拾行装匆忙前往莫斯科，参加又一个葬礼。

尽管有我们的帮助，但谢尔比茨基仍然到得太迟，没有参加那两次会议。哈萨克斯坦的共产党首脑丁穆哈迈德·库纳耶夫也没有及时赶到。这两位共产党保守派官员没有参加关键性会议一事，使人们后来推测，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当选，是以 5 比 4 的微小优势战胜了莫斯科的共产党首脑维克多·格里申的。④

这份有意思的报告是为苏联政策问题的专家写的，它很可能是不真实的。无论如何，戈尔巴乔夫本人和其他直接参加会议的人都否认这种说法。⑤问题并不在于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坚定地支戈尔巴乔夫，而是在于，反对戈尔巴乔夫的人在 3 月 10 日的会议上没有投票权。

实际上，在 1984 年和 1985 年初，格里申就通过阴谋手段，想使自己被提名为契尔年科的继承人。如果他的阴谋得逞，勃列日涅夫时代一定还会再持续几年。但是格里申在 1984 年有关继承人问题的斗争中失败了，当时他没

有得到有影响的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的支持。乌斯季诺夫在 12月去世一事，使格里申的希望死灰复燃，他企图得到契尔年科的认可，为达此目的，他利用其势力范围内的新闻媒介，进行了臭名昭著的阿谀奉承活动。

然而，戈尔巴乔夫在各方面都依靠其智慧战胜了格里申。叶戈尔·利加乔夫当时是中央委员会中负责人事的书记，他有计划〔47〕地安排戈尔巴乔夫的潜在支持者担任全国各地的州级共产党首脑；如果政治局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发生分歧，这些人在中央委员会的票就是决定性的。契尔年科对情况了如指掌，因而他根本不注意格里申拍马屁的举动，也可能他曾极为严肃地加以抵制：他没有阻挠戈尔巴乔夫有效控制中央委员会组织机构的努力，除了戈尔巴乔夫，他没有再提名其他继承人。这可能并不是很重要，但它将给戈尔巴乔夫赢得全票带来许多麻烦。有一点更为关键，戈尔巴乔夫设法使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站到他的一边。

此外，契尔年科去世时，如果不是立即做出决定，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中的敌人，包括总理尼古拉·吉洪诺夫、列宁格勒共产党首脑格里戈里·罗曼诺夫和格里申，就可能密谋互相吹捧。戈尔巴乔夫的迅速行动阻止了这种企图。

作为事实上的第二书记，戈尔巴乔夫头一个得知了契尔年科去世的消息。他立即召集了政治局会议，坚持应毫不拖延地做出决定。他不让政治局委员们离开房间，直到得到了他所希望的东西：由他担任治丧委员会主席（按惯例由明确的继承人担任），由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推荐他为总书记。

第二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匆忙召开会议。它只能确认政治局的推荐，因为没有任何人做好了挑战的准备。格里申及其朋友们认识到，向戈尔巴乔夫挑战不但是徒劳的，而且可能会使他们立刻很痛苦地退休，因而他们与其他人一道投了赞成票。

过去领导人的幽灵

契尔年科的领导能力和他的健康状况一样糟，这是一个令人难堪的问题。事实上，他已经是第三个这类领导人了。在他前面，勃列日涅夫庸庸碌碌，尤里·安德罗波夫在短暂任期内疾病缠身。从一切客观标准来看，人们早就期望着出现一个新的不同类型的政治领导人。

〔48〕10 年来，苏联的国家政治领导人都是年迈而自满，他们缺乏创造力并坚决镇压任何有新思想的人。

勃列日涅夫是个沉闷的政治寡头，即使在其权力鼎盛时期也是如此。他喜欢谄媚、奉承、奢侈品、高速轿车和年轻女人。他用权力分赃的方法笼络党的官僚，以维持其统治。武装力量和军事工业的排位紧随共产党权势集团之后，每个有影响的利益集团都分享到其中的一份。斯大林的恐怖、赫鲁晓夫的轻率试验，都导致散发着臭气的腐败。统治者之间的个人联系决定了一切。

安德罗波夫是帝国的最高“执法者”，他担任克格勃首脑达 15 年，他利用所掌握的有关腐败问题的情况削弱勃列日涅夫派，竭

力争得了权力。但这时他的肾出了毛病，才一年多时间他就退出了政治舞台。

安德罗波夫曾推荐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为其继任人，但在他去世的时候，勃列日涅夫派进行了报复，他们排挤了戈尔巴乔夫，代之以勃列日涅夫的密友契尔年科。

我第一次见到契尔年科是 70 年代初在华盛顿。

我当时在国务院负责苏联事务，苏联驻华盛顿使馆外交官与我联系，要求对即将来访的人给予特殊接待。当时，我并不知道契尔年科其人，他们解释说，他在中央委员会负责档案，如果不是因为他是勃列日涅夫的密友之一，那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职位。他对美国国务院如何归类和分发函件很感兴趣，因为他正在寻找改进苏联有关系统的方法。

我不知道国务院安全官员能否同意让苏联官员参观密码间，但我同意问一下。

使我惊讶的是，我们的人认为此行没有问题。实际上，他们力图尽可能好地接待他，在他参观期间不处理任何机密函件，并安排用无关紧要的和不保密的文件演示如何对文件进行分发、归档和使用可恢复程序。

契尔年科根据商定的时间准确到达，他的圆脸上堆着憨厚的微笑，就像丘比娃娃的笑。他衣服崭新，皮鞋亮得耀眼，我甚至怀疑是漆皮的。在安全官员的严密监视下，我和我们的通讯专家陪同他参观了国务院的设施。他对所有向他介绍的情况都仔细倾听，问一些有关分发系统和计算机工作情况的问题，并对我们的〔49〕热情接待一再表示感谢。

以后，我只在远处看到过他。在政治局参加的公开集会上（例如最高苏维埃会议），他总是正好坐在勃列日涅夫的后面，有时被叫出去拿文件夹。他总是先把它交给勃列日涅夫，然后再拿给其他几个在场的政治局委员。每个人在文件上签名后还给他，他再交给下一个人。显然，他只是负责保管文件而已。因此，勃列日涅夫把他提拔到政治局令人感到很惊奇。他看上去并不是负责制定政策的那种人。但在当时，勃列日涅夫就是那样办事的。个人关系决定一切。

契尔年科被勃列日涅夫派选中，以推迟他们认为安德罗波夫及其一派想要进行的变革。他无疑是最高层中的一个消极，平庸的人。但是，与他的某些前任不同，他不是一个邪恶的人。他拒绝支持政治局中那些想取消戈尔巴乔夫继任资格的人。

3 月 11 日中午刚过，契尔年科去世的消息终于向世界宣布了。几小时后，在晚间新闻广播的黄金时间，塔斯社宣布，米哈伊尔·谢尔盖那维奇·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总书记。这一天新闻报道的中心是戈尔巴乔夫，而不是契尔年科，其意义第二天早晨便为苏联报纸的读者所知，他们发现，有关戈尔巴乔夫的消息登在报纸的第一页，而契尔年科的讣告在第四页。

3 月 13 日的葬礼看来只是走过场，或者是世界各国领导人的一个机会，他们可以参加葬礼为由，赶往莫斯科拜会新的总书记。美国的代表是副总统乔治·布什，因他曾参加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的葬礼，⑥但是，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德国总理科尔和法国总统密特朗都亲自前来参加葬礼。在进行了简短的礼节性拜访后，他们都同意撒切尔夫人的判断（上一年 12 月，她曾在伦敦与戈尔巴乔夫会见），认为戈尔巴乔夫最终是一个能够与之打交道的人。

新的首脑〔50〕其他任何一位苏联领导人的上台，都没有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受到国内外的欢迎。人们都不想看到苏联帝国掌握在一个衰弱无能领导人的手里。正像一位美国新闻记者达斯科·多德尔当时所说：“他步履矫健，谈笑风生，衣着合体。”因而他使世界感到惊奇和迷惑。

在华盛顿，我们对戈尔巴乔夫的了解，比对他的那些前任在就任时了解

得略多。长期以来，苏联新闻媒介一直被禁止宣传政治领导人的私生活。情报机构不得不设法一点一滴地搜集这种敏感的情报，比如某位政治领导人有几个孩子，他们叫什么名字，从事什么工作，等等。安德罗波夫去世时，美国白宫工作人员必须进行广泛的研究，以弄清他的夫人是否仍在世，以便发去唁电。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儿子，但不清楚他的夫人是否仍活着。

对戈尔巴乔夫的了解要多些。我们知道他毕业于苏联最著名的大学莫斯科大学，因而可能比他的前任受过更好的教育（列宁是个有争议的例外）。他来自农村，在共产党机关中开始其政治生涯。他设法克服了曾主管苏联农业的政治上的不利条件。比起他的前几任领导人就职时的情况，他去国外旅行得更多，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也享有一个实用主义者的名声。他的夫人赖莎很有魅力，她衣着得体，受过良好的教育，政治上很活跃，与前几位第一夫人形成了鲜明对照。

然而，米哈伊尔 · 戈尔巴乔夫的背景和个性在很多方面仍是个谜。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以往一般避免接触外国人；因此，甚至

没有什么人见过他，更不用说了解他了。

1975 年，当美国驻苏大使离开时，我曾临时负责驻莫斯科使馆事务，我访问了斯塔夫罗波尔，我特别请求拜访当地的共产党领导人，一位年轻的（我们几乎是同龄人）、以试验者和政治“新人”而〔51〕著称的官员。我希望，他不像大多数州那些墨守成规的领导人，而能破例接见一个美国外交官。但我没有能够如愿以偿：接待我的是州政府首脑，他安排我在该地区进行了经过精心选择的旅行。我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坐汽车和出席宴会上。米哈伊尔 ·谢尔盖耶维奇当时同其他州的共产党领导人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

1985 年 5 月，即在那次失败的尝试之后过了 10 年，我终于见到了戈尔巴乔夫。机会出现在美国商务部长马尔科姆 · 鲍德里奇访问莫斯科的时候，他是一位有魅力的前牛仔，仍酷爱在竞技活动中骑马，两年后从马上摔下来，悲惨地死去。他注意到戈尔巴乔夫来自产马的农村地区，就带了美国西部马鞍作为礼物。戈尔巴乔夫高兴地接受了他的礼物，机智地避免提到他早年曾是一名拖拉机手，而不是骑手的经历。

新任总书记与我们的会见有两个多小时。我曾就近观察过他的若干前任。和他们相比，他非常能说会道。他坐在勃列日涅夫曾使用过的长条桌旁，面前放着文件夹，那或许是准备好的提要。但他从未动它们。以前，当勃列日涅夫专注地看放在他面前的稿子、试图弄明白眼前模糊不清的字母究竟是什么意思时，曾发生令人尴尬的停顿，现在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也不再出现助手纠正领导人口误的现象。

戈尔巴乔夫控制着谈话；他对客人的每个问题或评论都要发表看法。然而，他看来确实在倾听，他的答案也并不总是我们在前苏联领导人那里经常听到的那种老生常谈。例如，他没有宣称他们有最好的制度，他还动感情地谈到需要改进经济管理方法。但是，他在谈话中也进行了某些辩护。对于美国国防部长卡斯珀 · 温伯格最近所说的苏联不再能满足人民对食物的需要的话，他进行了抱怨。

我记得，他当时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为什么你们总是贬低我们？英国或德国也必须进口食品才能满足其人民的需求，你们为此而谴责过它们吗？我们的确满足了人民的食品需求，像它们一样，我们进口了某些食品来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付了钱，付了现金，就我所知，你们的农民并没有拒绝拿

这些钱。至于所涉及的产品，我们所生产的小麦比你们更多，即使按人均计算也是如此。我们的问题是浪费得太多。那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我们正在就此采取措施。如果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你们的农民就将失去〔52〕一个主要的市场——但那是你们的问题，或许我们将不得不忍受说我们不能满足人民食物需求的恶意嘲笑。”⑦这就是典型的戈尔巴乔夫：骄傲、严阵以待、在辩论中很机敏，并不是完全不顾事实。我后来对华盛顿的同事说，美苏会议开始有趣了；也许那种沉闷、令人昏昏欲睡、无休止地倾听和重复同样论点的会议，现在要被更有活力的辩论所取代。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并不仅仅在个性上与其前几任领导不同。他还决心改变制度，而勃列日涅夫派则要使之永远存在下去。

然而，他的辉煌的 100 天改革并没有对国家产生什么显著的影响。其原因在于，首先，他的政治地位不稳定，其次，他的计划有所局限，没有涉及国家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正如他后来所承认的，在 1985 年，他仍然相信能够用修补制度的办法来治理好国家。

1985 年春，残存的勃列日涅夫派仍据高位。自从勃列日涅夫死后，还没有举行过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因此，党中央委员会为极端保守的人所把持。如果戈尔巴乔夫走得太快，他作为总书记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⑧毕竟，尼基塔·赫鲁晓夫也曾经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创议。但当改革开始触及特权分子的利益及赫鲁晓夫同僚们的舒适习惯时，他就被无情地抛弃了。这段历史在每一个想要进行改革的人的心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教训在于，除非苏联领导人能够避免被保守的共产党领导人赶下台，否则不可能进行任何改革。

从外表来看，斯大林以来的苏联领导人通常显得比他们实际上更强有力。通过狡诈的和冷酷无情的手段，斯大林实现了独裁统治。然而其继任者中，没有任何人去设法做到这一点。那个喜怒无常的暴君在人们心头留下了创伤，从那时起，斯大林的继任者确信，共产党的寡头政治能够使独裁得到控制。这种做法绝不是什么民主政治，而更像是暴徒之间相互防范的盟约。

总书记既没有固定的任期，也没有明确规定的权威。他的权力来自他对大多数同事进行说服、哄骗或胁迫的能力。一般来说，〔53〕“多数”意味着意见一致，而不是变动的票数，它通常取决于默认，而不仅是得到 51%的票。在理论上，如果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个委员支持并建议选举其他人任总书记并得到多数人的赞成，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就可以罢免原总书记。但在实际上，只要政治局的多数派同意，就可以罢免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在 1964 年的情况就证明了这一点。

鉴于这种情况，戈尔巴乔夫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计划控制共产党的最高层领导。只有罢免了他的主要对手，或至少是罢免了足够多的对手，并提拔那些准备支持他的人，他才能拥有可靠的多数，才能够进行领导。

一俟就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就竭力设法控制政治局，一年后，他的地位已像其前几任领导人那样稳固，而仅次于当年处于权力顶峰的斯大林。如果他后来没有着手改变制度，他本来可以比勃列日涅夫掌权的时间更长。

1985 年 4 月，在就任总书记 6 星期后，戈尔巴乔夫经过策划，选举叶戈尔·利加乔夫、尼古拉·雷日科夫和克格勃主席维克多·切布里科夫为政治局正式委员，从而得到了政治局中的多数。后来，戈尔巴乔夫同这三个人断绝了关系，但在当时他们还是支持他的。

到 7 月份，他的地位已经足够稳固，可以把最可能威胁其领导地位的格里戈里·罗曼诺夫从政治局赶走，罗曼诺夫是列宁格勒的共产党首脑，他以傲慢、独断和粗野而闻名。据传闻，他的姓是郑重地取自最后一个沙皇王朝的姓，他还随意取用埃尔米塔日博物馆中前沙皇的收藏品。据说，在他女儿的婚礼上，胡闹的客人曾打碎了一些特意从博物馆“借”来的珍贵的有历史价值的瓷器。

赶走了罗曼诺夫，戈尔巴乔夫又进行了重要的提拔：鲍里斯·叶利钦进入党中央书记处，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成为政治局正式委员。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又表示将亲自负责外交政策。安德烈·葛罗米柯曾担任了 28 年外交部长，既负责制定外交政策，也负责〔54〕执行，他被“明升暗降”，担任了受尊敬但却无权的挂名的国家元首。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他曾长期担任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共产党首脑，戈尔巴乔夫对他很了解，因为格鲁吉亚邻近斯塔夫罗波尔地区。

到秋天，雷日科夫取代了戈尔巴乔夫最顽固的对手之一、80 岁的尼古拉·吉洪诺夫，担任了总理。到 1986 年春天，高层领导中残留的勃列日涅夫派已经调离、退休或者安排到政治上不重要的位置。1986 年 2 月，共产党代表大会如期举行，它导致了党中央委员会人员构成的重要变化。40%以上的正式中央委员是新人，这是比以前历次党代表大会所发生的更为重大的变化。但实际上，这种变化的意义并不太大。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换汤不换药。中央委员会仍然极为保守。

改革派后来认为，党代表大会提早了一年，他们感到，戈尔巴乔夫没有时间进行适当的“准备”，确保由志趣相投的官员占主导地位。看来，戈尔巴乔夫很可能对他打算进行的改革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见解，因而他不可能知道谁会支持他。即使他了解其改革方向，他也难以在共产党的上层发现对其改革有帮助的人。旧制度的提拔过滤系统仍在照常运转。

无论如何，戈尔巴乔夫在就任总书记第一年所采取的加强个人权力的斗争，是极为漂亮的政治行动。即使某些尖锐批评他的人也承认这一点。例如，鲍里斯·叶利钦在 1990 年曾指出：“在改革计划刚刚提出的最关键时刻，他表现出惊人的手腕。”⑨

领导班子成员

1985 年底，戈尔巴乔夫关于国内政策有两个最重要的助手，他们是尼古拉·雷日科夫和叶戈尔·利加乔夫。

雷日科夫比戈尔巴乔夫年长 1 岁半，55 岁时被任命为总理。与高层领导中的多数同事不同，他没有在共产党机关中度过其主

要的职业生涯，而是作为工业的、特别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管〔55〕理人员而得到提升。他曾在苏联最大的工业企业之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巨大的乌拉尔机器厂工作了 25 年，并最终担任了其领导。1975 年，在勃列日涅夫的权力鼎盛时期，他来到莫斯科，担任重型机器制造部部长，接着又调到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重工业和武器制造工作。

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安德罗波夫让他把全部时间都用于党务工作，1982 年任命他为负责经济问题的中央委员会书记。10 年后，雷日科夫对我追忆此事，他说他对调做“党务工作”感到很惊讶，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个实际工作者，而不是典型的党内官僚。然而，安德罗波夫坚持要他去，因为他正试图把更注重实际的人集结起来，以便改进工作效率，并同腐败做斗争。⑩

在雷日科夫调入中央书记处前，他同戈尔巴乔夫没有在一起共过事，从1978 年起，戈尔巴乔夫开始在中央书记处工作，负责农业问题。安德罗波夫把他们两人叫到他的办公室，指示他们，对专家们就苏联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和有助于改善管理的措施所做的一系列研究，他们共同负责。这项工作未经政治局讨论，而是秘密进行，直到它完成。

该项计划尚未完成，安德罗波夫就去世了，但此时戈尔巴乔夫已成为总书记，他和雷日科夫在办公室的保险箱中已积累了约 120 份由他们委托进行的研究报告。这些研究报告成为在 1985 年 4 月的全会上公之于众的有限改革计划的基础。

我第一次见到雷日科夫是在斯德哥尔摩。那是 1986 年 3 月，他担任出席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葬礼的苏联代表团团长。他同意在城里会见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

他是个英俊的男人，身穿剪裁合体、做工考究的西服，浅蓝的衬衣，戴着雅致的格子领带，看上去就像是在美国任何最大公司的会议室里。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善于管理众多官僚。当我们处〔57〕理有倾向性的问题时，他显得更像一个实用主义者，而不是理想主义者。他显然非常熟悉苏联对重要国际问题的立场，但他只是阐述它们，而不像谢瓦尔德纳泽那样就此进行协商谈判。他的兴趣和责任是苏联的经济和发展对外贸易。他热切地谈到外国对发展规划进行投资的前景，并向我们保证减少军品生产，以便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生产民品。然而，他并未暗示他预见在制度方面将发生根本的变化。他似乎认为，管理方式的改变和投资重点的逐渐转移，能够使发展速度正在减慢的苏联经济恢复活力。

当雷日科夫出任苏联政府机构的首脑时，叶戈尔・利加乔夫实际上担任着共产党的二号人物（当时没有正式的副总书记，但是由利加乔夫主持书记处会议，这使他能够直接掌管日常工作）。

利加乔夫比戈尔巴乔夫大 10 岁。像雷日科夫一样，他受过技术教育，但他是在西伯利亚的共产党机构中开始其职业生涯的。他那红色的脸膛和蓬乱的白发，显示出他在寒冷气候中奔波于户外的经历。安德罗波 夫让雷日科夫就任共产党高层职务，把管理专长引入领导工作，与此同时，他也让利加乔夫进入书记处，主管人事安排的工作，以便更努力地同腐败做斗争。利加乔夫名声清白，这一点打动了安德罗波夫。像安德罗波夫一样，利加乔夫也认为应该由共产党来推行改革。后来，当戈尔巴乔夫要求共产党进行自身的改革时，利加乔夫开始反对他。

戈尔巴乔夫最初伙伴中的第三个人在权力阶梯上的地位低于雷日科夫和利加乔夫，他是共产党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不是正式

委员。但他显然注定要成为这三个人中最重要的一个。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是难以驾驭的前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共产党的首脑，在 1985 年圣诞节前夜被任命为主管莫斯科共产党组织的工作。

戈尔巴乔夫公认的对手格里申曾任莫斯科党组织的首脑，这是全国各地区党组织中最重要的职位，因为它包括统治着广大帝国的中央官僚机构。叶利钦的任务是清除自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以来在这个关键的党组织中逐渐积累起来的腐败。他精力充沛，非常认真地投入这项工作，并善于引起公众的注意，不久，他就成为普通莫斯科人心目中的英雄，成为有很强权势欲、并对其领导层同僚构成潜在威胁的对手。

一个有限的计划

注明改革的时间在共产党中已成惯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始于 1985 年 4 月，他当选为总书记后的第一次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那次会议以“四月全会”而著称。实际上，这次会议批准的计划并不是最终为世界所了解的那个改革计划，即政治和经济的根本改革计划，而是一个十分有限的计划。它应更准确地称为“安德罗波夫宣言”，因为它基本上是在他的鼓动下写出来的。

从一开始，某些支持者就敦促戈尔巴乔夫进行更激进的改革，但遭到了他的拒绝。在办公室里，他公开指派两个有改革思想的同事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负责“四月计划”的最初起草工作。他们被送到郊区的别墅，不受干扰地工作了几个星期，这是戈尔巴乔夫一再使用的办法。据波尔托拉宁说，当戈尔巴乔夫看了他们的草案后，他删去了所有涉及政治改革的段落。“那是以后的事情，”戈尔巴乔夫说，“首先，我们必须进行演习。（11）”

戈尔巴乔夫最初采用的口号是“促进”——换句话说，就是加快现已存在的趋势。只要有更严密的纪律、更严格的管理、更少的腐败、更多的节制和对传统管理方法的某些调整，就能够达到这一目标。

普通老百姓从两个方面感受到新的政策：努力工作的压力增加了，含酒精的饮料更难得到，更贵了。

消费品短缺是苏联的痼疾，管理人员对雇员花两三个小时出去吃“午饭”通常视而不见。很多人必须花时间排队才能买到每天的生活必需品。为了减少这种现象，对工作人员进行了更严格的监督，并在正常的工作时间把视察员派到商店，以便核实顾客〔58〕是否从自己的单位溜号。实行更严密纪律的运动本来能够起作用，如果同时增加消费品的话。然而，消费品短缺的情况更加严重了，仅仅敦促更努力工作的做法激怒了公众。几个月后，这一运动停止了。

1985 年 5 月宣布的反酗酒运动，给公众甚至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酗酒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采取削减烈酒、葡萄酒甚至啤酒产量的办法，则使情况更糟糕。伏特加深深植根于俄罗斯的文化中。1000 多年前，基辅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决定以基督教而不是伊斯兰教为国教，因为他认为，他的臣民的生活中不能没有烈性饮料。此外，缺乏更有益于健康的消遣娱乐的机会，在有些地区几乎不存在这种机会。对很多苏联人来说，除了喝酒之外无事可干。

反酗酒政策被推向自我毁灭的极端。中央命令减少含酒精饮料的生产，但在很多地方，官僚们决定走得更远，他们停止了所有饮用酒的生产。在南方，所有的葡萄园都被犁除，尽管消费葡萄酒并不会导致严重的问题，而且葡萄酒在许多非俄罗斯的文化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

据雷日科夫说，在一年内，官方允许的蒸馏法伏特加的产量减少了一半，葡萄酒的产量减少了近 2/3，啤酒的产量减少了 1/2（12）。

由于获得含酒精饮料的合法来源受到了限制，许多酒鬼干脆去买非法酿造的酒，甚至是更危险的调制酒。在两年内，糖的消费量上升了 14%，正像戈尔巴乔夫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沮丧地指出的：“我们都知道它用于生产什么。”

反酗酒运动的一个结果，是政府减少了数百亿卢布的税收，并第一次出现了巨额预算赤字。雷日科夫估计，从 1986—1988 年的 3 年时间，国家税收

减少了 670 亿卢布，按照当时的官方兑换率为 1000 亿美元。对伏特加的需求为犯罪分子提供了机会，该政策导致了有组织犯罪活动的突然增长。

尽管限制饮酒的政策在 1988 年悄悄地撤消了，但它的影响却长期存在。伏特加的产量迅速恢复了，但是葡萄酒的产量却滞后了好几年，甚至到 1992 年，在俄罗斯的餐馆中也难以得到葡萄酒：唯一的选择常常不是伏特加，就是白兰地，几乎不鼓励人们喝低度酒。

从外表看，反腐败运动的效果更好些。从 1985 年冬季开始，〔59〕戈尔巴乔夫及其盟友在很多共和国和州都以犯有腐败罪为由进行了广泛的清洗。然而，在非俄罗斯人居住的地区，这些运动常常搞得很混乱，如果将非俄罗斯人免职，即使他们很不正派，但也很可能被看作清洗当地民族，以利于俄罗斯人取代他们。

事实上，这些新的领导人在 1986 年 12 月栽了个大跟头，当时他们以俄罗斯人取代一个公认为腐败的哈萨克族共产党领导人。它导致了一场严重的民族骚乱，一些人伤亡，很多人被逮捕。当时，苏联领导人和很多外国观察家都认为这是不正常的。

开始政治改革

到 1986 年夏天，很显然 1985 年开始的有限“改革”已经无路可走。戈尔巴乔夫开始发表更为激进的讲话。6 月，他攻击了有影响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到夏末，他开始谈到改革政治制度。到那时为止，还很少使用“改革”一词，仅仅在有限的场合使用，例如“改革经济管理制度”。

那年夏天所流行的另一个新词是“公开性”，从字面上看，意为“公开讲话”或“公布事实”。这个俄语词没有确切的英语对应词，这就使美国弄不清该政策的真实含义。它并不像某些外国观察家所认为的那样，是指言论自由或新闻自由，而是指官方机构的运作应该是开放的，因而它同我们的概念“透明度”相似。其目标不是新闻媒介的自由，而是为政策的变化进行更有效的宣传。戈尔巴乔夫最初认为公开性是他的工具，可以用来同反对他改革计划的那些官员进行斗争。

维塔利·科罗季奇曾担任过数年《星火》杂志的编辑，他后来说，当戈尔巴乔夫宣称公开性是改革的一部分时，他心里的感觉是“让一个老妓女洗个海绵擦身浴，再穿上干净的衣服，以为这会使她变成处女”。（13）

尽管外界当时不知道，但包装这个老妓女的是前苏联驻加拿大大使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戈尔巴乔夫很早就把他吸收为改〔60〕革伙伴，1986 年，雅科夫列夫开始负责共产党宣传部门，他的主要任务是挑选新闻媒介的领导。尽管主要任命仍需要得到政治局的批准，但他能够主动提拔他所选中的人。

1986 年春天，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悲剧性事件，并遭到错误的处理，它给雅科夫列夫提供了机会，把某些活力注入死气沉沉的苏联新闻媒介。当放射性尘埃开始沉降、这场巨大灾难的某些情况开始为克里姆林宫所知时，如果进行改革，那么显然对过去事件过分保密的做法就不能持续下去了。苏联领导人的国际地位动摇了。由于未将真实情况告诉世界，正当他们最需要信誉的时候却失去了它。

切尔诺贝利事件仅仅是一个突出事例，长期以来，许多观察家已对这类问题掌握了很多情况：即使作为宣传工具，苏联的新闻媒介也一钱不值。报纸和电视迟钝单调，缺乏信息，根本引不起苏联公民的注意；如果他们想知

道所发生的事情，就去收听外国的无线电广播。那些不收听外国电台的人，要等好几天才能得知有关切尔诺贝利事件的消息，而且即使到那个时候，这些消息也是很不完全的。

科罗季奇引进《星火》周刊的方式是有启发意义的。尽管他的专业是医生，但他像以前的契诃夫一样，从医学转向文学。开始时，他用乌克兰语而不是俄语写诗，逐渐他转到新闻工作，到 80 年代，他在家乡基辅出版的一个青年杂志担任了编辑。

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几天，科罗季奇收到了来自莫斯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话。这是很不寻常的，因为他的出版工作是由基辅的乌克兰共产党负责监督，而不是莫斯科党中央委员会。打来电话的是他的一个老熟人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他刚刚搬到老广场的办公室。

雅科夫列夫问科罗季奇，他是否愿意到莫斯科，接管《星火》杂志的编辑工作。《星火》杂志是一份历史悠久的杂志，是最老的连续出版的俄语周刊。有一段时间，它曾经很受欢迎；在 30 年代，它似乎模仿美国的《生活与观察》杂志：它登载人们感兴趣的文章、短篇小说、一些侍及大量图片。然而，在许多年里，它〔61〕由整个苏联宣传界最庸俗的两个雇佣文人管理，因而其订户暴跌。雅科夫列夫知道科罗季奇具有独立思想，如果给他机会，他会力图使杂志更符合公众的兴趣。

科罗季奇并不想离开基辅，他对雅科夫列夫的询问含糊其词，但是几天后，他收到了一份不能驳回的命令：指令他两天后的上午 11 点到利加乔夫的办公室。

利加乔夫当时负责人事安排，在把候选人的名字呈送政治局正式批准之前，他通常要同他们谈话。与科罗季奇的谈话很短，而且几乎是秘密的；利加乔夫提到，他们调查了科罗季奇的情况，查明他没有建立“个人秘密组织”。他在工作时看来完全不受外界影响干扰。当科罗季奇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能经得起这种压力表示怀疑时，利加乔夫向他保证，他们检查了他的医疗记录，确信他很强健。显然，利加乔夫的办公室做了彻底的背景调查。

在进行了简短的谈话后，利加乔夫带着科罗季奇去了政治局的会议室，介绍说他是选为主持《星火》杂志编辑工作的人，并问是否有人反对这项提议。人们都不反对，他告诉科罗季奇，“很好。到此为止”并指着门。

任命科罗季奇时所用的程序，表明在共产党的人事制度下如何进行任命工作。一个有着“全联盟”重要性的职位的候选人，要先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相关部门进行审核（这一次是宣传部门），再由主管人事安排（在共产党的术语中称做“干部”）的书记进行复审，最后由全体政治局正式通过。这种任命程序不仅有关任命重要杂志的编辑，而且涉及任命苏联部长会议成员、大型工业公司领导、各州“首脑”、各民族共和国第一书记、大使、重要大学校长以及各军区司令。共产党控制着所有涉及监督其他部门的人员任命工作。工作越重要，所需要的批准级别越高。如果一个机构被认为有着“全联盟”的重要意义，那就意味着要由政治局亲自批准。

当新闻媒介被认为需要恢复活力时，便使用了传统的方法：干脆撤换原有的负责人。但尽管程序是传统的，人员却是全新的。亚〔62〕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显然想创立一个更独立的刊物。他比利加乔夫和戈尔巴乔夫更了解有关人员。正如已经发生的情况，新的编辑们所进行的改革，比他们的共产党领导更彻底，但当后者发现这一点时，他们已不能继续按老路走下去了。

科罗季奇并不是从外地引入宣传界的唯一编辑，腐朽的苏联新闻媒介曾由宣传界原来的那些人所把持。在 1986 年,《莫斯科新闻》周刊、《文学报》、政府的日报《消息报》及有名的月刊《新世界》和《旗帜》也被任命了新的编辑。

尽管这些任命发生时我仍在华盛顿，但我对他们很有兴趣，因为我对大部分有关人员都很了解，一些人是亲自认识，其他人则是久闻其名。我不知道他们将会做什么，但是所有的人看来都是比较独立的那种人，是潜在的持不同政见者，以前他们没有得到施展能力的机会。

我在 1970 年曾会见过科罗季奇，当时他正随苏联作家团访问

美国。这次旅行后，他回到莫斯科，有时也应邀来吃午餐或参加宴会。我们很少谈论政治问题，但当我们谈论政治问题时，他很谨慎（在那个年代谁不谨慎呢？），但也很坦率。

当他后来撰写有关美国民族和种族仇恨的文章和书的时候，我感到很惊愕，但并不像我的某些同事那样震惊。为了享受去国外旅行的优惠，他必须做点什么，而且他通常能够正确地理解事实——他言过其实，断章取义，但他并不捏造事实。在我看来，他的诗更能证明他的性格（我可能是美国政府官员中唯一读过这些诗的人）。它表现出一种敏感的和极为坦诚的个性。那对他成为一个伟大的编辑并不是必要的，但它提供了希望，如果他认为能够蒙混过关，他就会比他的前任更为大胆。

费德罗·布尔拉茨基在莫斯科的外交官中享有盛名，他受命主持《文学报》。他曾与赫鲁晓夫在一起工作，关系密切，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这对他的前途是很不利的。此外，他继续做新闻记者，并经常设法在苏联的报刊上偷偷发表一些伊索寓言式的文章。〔63〕这些文章中通常有一个含义隐晦的寓言，指出当苏联同其他国家产生麻烦时，它也要承担某种责任。尤其是，他在文章中对肆意使用武力的危险提出了警告。

例如，在布尔拉茨基的一个讽刺剧中，他描绘了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在华盛顿举行的虚构会谈：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拒绝了美国军方提出的进攻古巴的要求，相反，他接受了他的兄弟罗伯特提出的建议，与赫鲁晓夫订立了秘密条约。熟悉情况的读者知道他指的是莫斯科和苏联军队，而不是指华盛顿和五角大楼，他变换了事件发生的地点，以便他的剧本能够通过检查。万一我们美国人太迟钝，不能理解他这样做的意思，布尔拉茨基便会在招待会上把外交官叫到一边，把真相告诉他们。

所以，即使我们不可能知道费德罗在《文学报》将要做什么，但是我们也可以推测，如果共产党领导层中的某个人不想看到出现更多的“大胆”文章，那么费德罗就不会被任命去主持该报的编辑工作。

我还会见过《新世界》和《旗帜》杂志的新任编辑，但我更熟悉他们的著作，而不是他们本人。《新世界》杂志的谢尔盖·扎利金已经 73 岁，是这伙人中最年长的，他对环境保护有极大的兴趣。他将报道今后的切尔诺贝利和咸海事件吗？

格里戈里·巴克兰诺夫被派到《旗帜》杂志，他也是位著名的小说作家。他擅长写战争小说，这种题材在苏联已经写滥了，但巴克兰诺夫知道如何表现真正的人民。他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不是那类充斥于大多数苏联战争小说中的刻板模式，而是同真实的困难做斗争的可信人物。在 70 年代，我曾读过他的一些著作，它的坦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巴克兰诺夫可能没有讲出全

部，但他所叙述的是真实的生活。在他的人物身上，人们能够体验到苏联生活中的真正问题以及共产党制度所造成的道德上的进退两难。人们可以确信，除非拴住巴克兰诺夫的手，否则《旗帜》将成为论述社会精神问题的重要论坛。

我不认识《消息报》和《莫斯科新闻》的新编辑伊万·拉普季夫和叶戈尔·雅科夫列夫，因而不知道该对他们期待什么。《消息报》是中央政府的日报，有很大的潜力，但是，却没有什么人注意《莫斯科新闻》。它被认为是对外国人的宣传机构（它出版英语版、法语版、德语版、西班牙语版和若干其他语种的版本），俄罗斯人不怎么读它，尽管也出不多的俄语版，但它可能是为党的〔64〕宣传部门那些只懂俄语的官员出版的，以便他们能够了解为外国人写了些什么内容。

然而，这两种报纸都曾轰动一时，当你提到“雅科夫列夫”时，他或她会问：“哪一个雅科夫列夫，亚历山大还是叶戈尔？”他们俩不是亲戚，但每个人都是有关公开性的重要人物。

电影导演们赶走了那些坚持电影家协会“纪律”的共产党信徒，并以最有才能的某些同事取而代之，这些人也是改革的积极分子。有时候，外国发言人也在苏联电视上发表和官方路线不同的见解，使苏联的电视观众大吃一惊。长期被禁止的作品出版了，并在舞台上演。

以前遭禁的少量作品现在出现在新闻媒介上，苦役营的大门偶尔打开，释放一两个政治犯。安德烈·萨哈罗夫是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仍住在伏尔加河边的高尔基城，在流放中苦度岁月，高尔基城以前和不久以后都称做下诺夫哥罗德。12 月 15 日晚上，克格勃的工作人员来到萨哈罗夫的住所，匆忙地重新安装了电话，他们以前为了使他与世隔绝曾把电话拆掉。第二天，戈尔巴乔夫亲自打来电话，通知萨哈罗夫，他可以返回他在莫斯科的住所。

1986 年底，苏联领导人仔细考虑了从 20 年代以来共产党的实践中所没有的想法，因为意见不一致，三次推迟了党中央委员会原定的会议。这是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苏联经济能否恢复活力？能否既谈论政治改革，又不违背该制度所赞成的一切？

全体会议最终于 1987 年 1 月底举行,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态度使人们感到吃惊。他把国家的发展阶段称做“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而不是重复人们所熟悉的勃列日涅夫的公式：“发达社会主义。”他甚至赞成地谈到“真正的选举”和秘密的无记名投票。仅仅在几年前，谈论这样的事情可能要使党的官员丢掉工作，如果一再发表这种言论，他就会被送进监狱或精神病院。

1 月份，当戈尔巴乔夫向中央委员会介绍这些仍很笼统的想法时，人们感到很惊讶，但没有提出公开的反对。因为仍然存在〔65〕着遵从总书记的老习惯，并避免对他的见解提出直接的怀疑。很多人可能以为，这些建议是想提高戈尔巴乔夫在公众中作为改革者的形象，而并不意味着要把它们付诸实践。如果对他们来说这确实就是全部含义，那么迁就一下总书记没有任何害处。

除此之外，戈尔巴乔夫在整个春季继续发展他的思想，并在中央委员会 6 月的下一次全体会议上再次谈到这一问题。现在公众开始注意了：这是否超出了过去那种周期性的运动？党的信徒开始提出了疑问：他真的很认真吗？如果的确如此，他难道没有意识到，那种想法可能损害管理国家的唯一可靠的工具共产党的权威吗？

改革的开始

我们外国观察家开始注意到有关的区别。1986 年，我们曾殷切希望戈尔巴乔夫将会证明是一个不同的苏联领导人，真正关心本国的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抽象观念，愿意用更实用主义的态度进行谈判。日内瓦和雷克雅未克的最高级会议向我们展示了他的魅力和健谈。他对军备控制的政策似乎也转变了。

然而，他的国内政策同过去偶尔的“改革”时期的政策相比，没有表现出什么差别。赫鲁晓夫的“解冻”结束了斯大林主义的某些暴行，但接着，甚至在赫鲁晓夫下台前，解冻自身也结束了。在 60 年代，所谓“李普曼改革”，即合理化管理的建议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但它也被遗忘了。70 年代，广为宣传的改善食品供应的计划也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

难道戈尔巴乔夫的国内政策完全不同吗？直到 1987 年 1 月，回答还是坚定的，不。1985 年和 1986 年的政策同以前失败的政策相似：试图对具有内在缺陷的制度进行表面的纠正。这就像试图〔66〕用拔一两颗牙的方法来驯服鲨鱼。除非改变或者摧毁这个制度，否则它会完全破坏那种改变它的零散努力。

但是，戈尔巴乔夫在 1987 年的计划直接指向了制度本身。他掌权头两年的经验使他确信，他从上面所发动的变革，只有得到来自下面的压力才有保证。他现在认识到，制度本身抗拒变革，仅靠来自上面的命令是不够的。在我所参加的 1987 年和 1988 年的会议期间，他有时反复思考着这个问题。

“在我国的整个历史中，”他说（根据我的回忆），“变革来自上面。它总是靠武力来推行。现在，我不能使用武力，否则我将击败目标本身。你不能把民主强加给人民，而只能给他们行使民主的可能性。我们所做的尝试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必须把俄罗斯的历史颠倒过来。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在我们的整个历史中，他们从未被允许这样做。”

尽管这些思想是激进的和雄心勃勃的，但至少可以这样说，他的计划是很不完全的。它们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但其中又包含着错误的前提和令人惊讶的缺陷。

最不足的地方在于，他认为苏联共产党可以充当改革的工具。戈尔巴乔夫就任时，他告诉中央委员会：“如果我们要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就必须继续加强党，强化其组织作用和领导作用。”（14）

假设后来果真如此，那么这种计划很可能被看作玩世不恭的欺诈，但在当时，戈尔巴乔夫相信他所说的话。他想进行改革，并相信他能够使党跟着他走。他在 1987 年 6 月仍然相信这一点，当时他宣称：“只要我们坚定地和始终如一地追求民主化，我们就会取得改革的成功。”（15）到那时为止，他仍然认为党的控制和民主化是不矛盾的。

除了依赖一个不适当的工具去推动国家的民主，他对民主的认识也是模糊的和很不完善的。他赞成真正的选举，赞成代表大会拥有真正的权力，赞成不同权力的分立，赞成保护个人权利，但与此同时，他仍然保卫“社会主义”，反对在土地和大部分工业中的私有财产。他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暴行，希望回到“真正的列宁主义”，但他又不能确定这一概念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还忽视他所统治的广大帝国中那些从属民族的利益，他认〔67〕为民族的差别已经极大地消失了，它们不再需要特殊的注意。

最后，在提出他的民主化计划时，他没有使人了解，改革可能是长期的

和痛苦的。国民对旧的政策感到极为不满，就这一点来说，人们欣赏和支持他的坦率。然而，戈尔巴乔夫使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只要引进民主因素，就能立即使商店里有更多的食品和其他商品。他没有呼吁人民在改革开始时付出代价，这种失误纠缠着他，特别是当经济急剧下降的时候。

尽管他的计划是笼统的和很不完善的，但它的目的在于制度自身的重大变革。当他敦促进行实际改革的时候，党组织内部的抵制无疑也在增长。只有时间能够告诉我们，他是否将按照许诺推行政治变革计划，还是屈服于开始抵抗的制度的压力。

戈尔巴乔夫执政头两年的活动并未完全局限于国内问题。他也开始改变苏联的对外政策。他达到其国内目标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结束军备竞赛，并消除由此所导致的国际紧张局势。

第四章扩大改革空间：减轻外部压力

确保安全日益成为一项政治任务，而这一任务只有通过政治手段才能解决。

米哈伊尔·戈尔日乔夫 1986 年①无论在哪个领域，我们都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即如果不实现苏美关系正常化，我们将一无所获。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 1991 年②“ 如果你们真的使用部署在德国的潘兴导弹，那么导弹打来时，我恐怕连躲进厕所都来不及，更谈不上躲进防空洞。当导弹命中目标时，我们的雷达操作人员可能还在检查设备的毛病！ ” 1984 年冬，当我同苏联共产党国际部的一位高级官员瓦季姆·扎格拉金在莫斯科会晤的时候，他这样说。对于像他那样在克里姆林宫内及其周围工作的人来说，冷战突然变成了完全是个人的事情。

我承认他的处境并不令人羡慕，但我指出，当苏联在 70 年代部署 SS—20 导弹的时候，我们在伦敦、巴黎、波恩、罗马和其他欧洲国家首都的朋友们也面临着同样的潜在威胁。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就是全部销毁这些武器，但莫斯科当时不准备采取这一步骤，在它看来，那完全是幻想。

事实上，在 1983 年和 1984 年，东西方关系非常紧张。北约决定，如果苏联人拒绝撤走 SS—20 导弹，那么北约将在欧洲部署〔69〕美国导弹。这一决定激起了苏联当局的强烈反应，竭力加以阻止。苏联力图说服西方国家议会拒绝部署美国导弹，同时其宣传机器宣称战争迫在眉睫。尽管发生了群众游行示威，德国和其他西欧盟国仍坚持重新部署导弹。苏联政府以此为借口，召回了参加军备控制谈判的所有外交代表。但是，苏联失败的宣传战在国内产生了没有料到的后果。苏联当局无意中在本国制造了战争恐怖。

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同僚们甚至在掌权之前就一定清楚，如果东西方关系不缓和，苏联内部的改革是不可能的。此外，如果不同美国改善关系，要想改善同西方的关系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戈尔巴乔夫甚至在当总书记之前，就运用他的影响，避免与西方的联系完全中断。当他还是第二书记时，政治局就决定恢复与美国的高层对话，于 1984 年 9 月派葛罗米柯到华盛顿与里根总统会晤。接着，戈尔巴乔夫利用 1984 年 9 月应邀访问伦敦之机，表现出他有资格影响苏联的外交政策。他在英国议会发表了调子温和的讲话，他暗示，他将比他的前任更为灵活。一个月后，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政治局决定恢复同美国的核武器谈判。

所以，当戈尔巴乔夫接替了契尔年科之后，已有迹象显示，苏联开始放弃以往那种僵硬的断然否决的外交政策。事实上，从他就任总书记时起就开始了对话，对话使双方关系间断地、逐渐地得到了改善。

里根总统 1984 年一直渴望举行最高级首脑会晤，但先是由于苏联的政策，然后是由于契尔年科糟糕的健康状况（很可能是由于政治局不愿让他与里根见面）妨碍了这一年的会晤。因而当新的身体健康的苏联领导人出现之后，里根没有丧失时机。他派副总统布什向戈尔巴乔夫祝贺，并顺便参加契尔年科的葬礼，送去了由我起草的邀请信，邀请戈尔巴乔夫访美同里根举行会晤。

两周之内，戈尔巴乔夫便作了答复，原则上接受举行会晤的建〔70〕议，但确定会晤的时间和地点花了好几个月。里根建议在华盛顿举行会晤，而戈尔巴乔夫则建议在莫斯科举行。快到 6 月末的时候，双方才最后商定，他们的第一次会晤将于 11 月在日内瓦举行。③

这使双方都有时间进行准备。在戈尔巴乔夫方面，准备意味着继续巩固他的权力，任命新的外交部长，降低好战的宣传调门，降低鹰派成员的级别，以此向美国的欧洲盟友挥动橄榄枝。和从前一样，同苏联的军备控制谈判仍然是艰难的，但至少他们回到了谈判桌前。

新人物

戈尔巴乔夫就任总书记的时候，安德烈·葛罗米柯在各国外交部长中已经是“老前辈”。他担任这一职务近 30 年，从斯大林的奴仆变为政治局的元老，是苏联外交政策的无可争议的设计师和执行者。尽管他很少卷入有争论的国内问题，但是，任何人只要被怀疑染指外交政策领域，触犯了他的领地，都会使他出自本能地勃然大怒。他对共产党的国际部特别反感，禁止该部与西方国家外交官接触，而让它处理与苏联集团中的“兄弟国家”和外国共产党的关系，葛罗米柯对那些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兴趣。他是外交界的高手，知道孰轻孰重。

正是他提名戈尔巴乔夫担任党内最高职务，而他的支持是很关键的，使格里申、罗曼诺夫或吉洪诺夫都不可能对戈尔巴乔夫的候选人地位发起任何有效的挑战。

当葛罗米柯脸部肌肉放松时，他的下嘴唇左侧歪斜，表现出冷淡甚至是轻蔑的神情。摄影师捉住的常常就是这种表情。在许多人看来，他就是“否决先生”的化身。实际上，葛罗米柯似乎更乐于对抗，而不是解决问题。在私下里，他对来访者个人所关切的问题显得通情达理和敏感，甚至闪现出幽默，但是涉及官方问题时，他总是表现得严厉而僵硬。

即使当他决定或者受命作出让步时，在让步之前，他也是先〔71〕为他以前的立场辩护，并在逻辑上和道义上攻击对手。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愿意宣布妥协（或许朝着达成公平协议前进了 1/10 路程），以表示苏联政府的宽宏大量，并证明它愿意尽最大努力确保和平与安宁。

他一生都在努力捍卫苏联的政策——往往是显而易见的宣传，他的那些特点无疑是由此而塑造出来的。即使他的对手掌握了事实根据，他们也可能仅仅因为他的恐吓以及他对会议的阻挠而深受影响。重复取代了说理，“事实”是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有时甚至是捏造的，以适应论战的需要。作为外交政策专家，葛罗米柯的性格形成时期，恰好是斯大林实行最无情镇压的某个时期。的确，如果有谁一夜之间就从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的战士变成纳粹—苏联条约的辩护者，那么，即使华盛顿已经掌握证据，他也能毫不费力地否认在古巴部署苏联导弹一事，并谴责对苏联细

菌武器的质询是蓄意挑衅，当苏联空军击落载有 269 名无辜外国乘客的韩国民航客机时，他却污蔑美国是“侵略者”。

戈尔巴乔夫就任总书记时，有两件事情他肯定很清楚。第一，无论他如何感激葛罗米柯支持他作为最高领导职位的候选人，但只要葛罗米柯担任外交部长，他就别想把苏联的外交政策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葛罗米柯担任此职达数十年，不仅使外交部变成了他的工具，而且该部在许多方面都是按照他的意愿塑造的。他的外交风格贯彻到所有苏联外交使团中。他不得不对斯大林卑躬屈膝，遵从任性的赫鲁晓夫，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他设法使外交部具有了自主权。到了 1985 年，总书记若不听从他对外交事务的领导，就必须撤消他的职务。

第二件事情也与此有关，长期以来，葛罗米柯捍卫以对抗为基础的苏联

政策，这使他很不适合推行合作政策。这并不是因为葛罗米柯必然反对这种转变：他能理解需要一个更缓和的国际环境，他很可能也乐于从事改善与西方关系的工作。

然而，他不是做这项工作的合适人选。他的个人信誉受到他〔72〕过去的沉重负担的影响。如果葛罗米柯继续负责外交事务，其他国家的政府就不可能认真对待苏联公开宣布的任何外交政策变化。一旦戈尔巴乔夫同意与里根举行最高级首脑会晤，在华盛顿，我们将不知道两人会晤时葛罗米柯是否仍然担任外交部长。

我们很快就听到了消息。在宣布 11 月举行最高级首脑会晤的前一天，1985 年 7 月 2 日，葛罗米柯“晋升”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是受尊重然而却是荣誉性的职位，虽然有国家领导人的头衔，但却无权制定政策。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接替了他，这一消息使苏联国内外感到意外。谢瓦尔德纳泽当时担任苏联格鲁吉亚的共产党首脑，以前在外交关系方面并不活跃，只是作为代表团成员偶尔到邻国作短期旅行。

谢瓦尔德纳泽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后，我没有见过他，但是我听到了许多关于他的事情。事实上，他看来是加盟共和国党的领导人中最有能力的人之一。据我所知，他是唯一显示出独立于莫斯科迹象的人。

例如，在整个 70 年代，当苏联犹太人开始移居国外时，我们当中关注移民方式的人都注意到，从苏联格鲁吉亚迁出的移民占有较大比例。这意味着，在准予移民出境方面，格鲁吉亚官员比苏联其他地方的官员都更宽容。当移民抵达以色列后，许多来自格鲁吉亚的移民都说，谢瓦尔德纳泽是可以信赖的。他被认为支持移民自由，并鼓励格鲁吉亚官员准许那些想走的人离开。

谢瓦尔德纳泽还以善于调解而著称。当格鲁吉亚共和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阿布哈兹人举行游行示威、希望获得更大自主权、得到更多的文化、教育设施时，他满足了他们的大部分要求，而不是简单地调集军队进行镇压（他所反对的一项关键要求，是阿布哈兹要求划归俄罗斯而不是格鲁吉亚管辖）。两年后，当格鲁吉亚学生在第比利斯游行反对取消格鲁吉亚语的国语地位、反对所有的博士论文都必须用俄语撰写的要求时，谢瓦尔德纳泽说服莫斯科对此持宽容态度。

我们所听到的也并不都是赞扬。70 年代在格鲁吉亚也发生过逮捕不同政见者的事情，就像苏联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一样。格鲁吉亚最著名的一位小说家的儿子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就是〔73〕一例。在 70 年代，他是一位活跃的持不同政见者，并同几位美国驻莫斯科外交官交了朋友。他被捕究竟是根据谢瓦尔德纳泽的命令，还是莫斯科的旨意？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确实知道，谢瓦尔德纳泽主持共和国工作时，那里仍然存在着政治压迫，尽管其程度或许比苏联其他许多地区要轻一些，他本人还曾担任过该共和国的内务部长，当时这就是共和国的警察首脑。这与一个激进民主派的履历实在不相称。

1985 年 7 月，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对美国官员来说还是有问号的人物。

美苏两国外长如果发现他们在同一个城市参加国际会议，按惯例要举行会晤。恰好在谢瓦尔德纳泽接替葛罗米柯之后四星期，欧洲和北美国家的外交部长在赫尔辛基聚会，纪念由与会者签署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协议 10 周年。在筹划这次会议时，我们认为葛罗米柯将出席。结果，它真的成了谢瓦尔德纳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首次亮相的机会。

舒尔茨国务卿与新任苏联外交部长的第一次会晤令人难忘，我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坐在谈判桌美方一侧的大多数人（习惯上，双方外长在长桌两侧正中相向而坐，代表团其他人则在自己这一侧依次序就坐）都经历过与葛罗米柯仿佛没完没了的谈判（在日内瓦的一次马拉松式会谈不间断地进行了六个小时），看来这已逐渐成为美苏会谈的正常情况。

我们走进房间时感到愉快和惊奇。一位满头白发的人也走进房间，他兴致勃勃，面带从容而迷人的微笑，他与美国人握手，然后用带有地方口音的俄语对他的助手们说：“我在这里是个新手。如果我出了大错，一定要纠正我。”接着，他轻松地笑着转入了正题。

那次会议没有解决任何重要问题，但是由双方代表团所提出的议事日程第一次得到全部确认。谢瓦尔德纳泽简要阐述了苏联〔74〕的立场，如果舒尔茨不同意（往往如此），他只是简单地说：“好

的，考虑一下。我们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你们或许能够提出更好的。”然后，他就转入下一个问题。当舒尔茨提出他不能接受的建议时，他往往这样说：“在这方面我们观点有分歧，但是我们需要解决问题。请考虑我所讲的，我们也将研究你们的想法，或许下一次我们能够更加接近，”

没有任何表演，没有任何长篇的说教，没有进行任何相互指责。苏联的政策在本质上并没有改变，但是表现的形式已经完全不同了。以前，葛罗米柯发言时总好像面对成千上万听众，陶醉于他自己的雄辩之中；而现在，谢瓦尔德纳泽在讲话时口气十分和缓，人们必须集中注意力，才能不漏掉他所说的话。当会议结束时，他转向他的全体同事并问道：“好了，伙计们，我干得怎么样？你们发现我出了多少大错？”没等他们回答，他大笑着说：“别忙，等出去后你们再告诉我吧。”说着，他便同周围的人握手话别，走出房间。

“真不敢相信他就是苏联外交部长！”一个参加谈判的美国代表在谢瓦尔德纳泽离开后惊讶地说。“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完全新的球赛！”我们的确就是这样。

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政策班子中还有一位新人物，他的出现不像谢瓦尔德纳泽那样张扬，但在向谢瓦尔德纳泽提供可行的外交政策方面，他有重要影响。谢瓦尔德纳泽负责处理国家外交事务，与此同时，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创立了理论依据，使苏联外交政策置于新的基础之上。

雅科夫列夫生于雅罗斯拉夫尔附近的农村，那里在历史上是俄罗斯的心脏，他在战争中受了重伤，拄着拐杖回家，使他当农民的母亲感到很惊愕，他不相信正规教育的价值，来到雅罗斯拉

夫尔城完成了教师学业。在那些年中，他的职业从教师转到新闻工作者，从共产党的机关工作转向短期的研究生学习。其中有一段时间是在美国度过的。

1958 年秋天，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始读研究生的众多外国留学生中，有三个人引起学校、报界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更大的注意。这〔75〕三个人就是根据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达成的美苏交流协定，第一批到美国来学习的苏联研究生。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是他们之中最年长的，也是这些人非正式的头。联邦调查局对他很注意，这使他感到，联邦调查局把他当成了克格勃官员，但正像他后来所说的：“我们当中确实有一个人来自克格勃，但那不是我。”

④

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雅科夫列夫在美国外交政策专家戴维·特鲁曼教授的指导下学习。雅科夫列夫感兴趣的领域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的外交政策，有一次他对我说，特鲁曼是一位理想的导师，让他自由从事他所希望的研究，并向他提供精明的建议，告诉他哪些书和文章值得注意，哪些可以忽略。遗憾的是，雅科夫列夫对他在美国的学习所做的公开评论中，几乎没有提到他所感到满意的方面，而是集中在令人不愉快的联邦调查局对他的怀疑上。

后来，雅科夫列夫曾有非常广泛的国外经历，他被任命为苏联驻加拿大大使，在渥太华居住了 10 年。在那些年，莫斯科的谣言工厂称这一任命是从上层政治生活中“流放”，认为雅科夫列夫所写的一篇批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文章导致了此事。⑤然而，雅科夫列夫说，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⑥他感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越来越困难。在其他事情上，他力图降低在他看来对勃列日涅夫过分的颂扬，而只学习属于勃列日涅夫本人首创的东西。当共产党官员攻击他没有事先清理他的文章时，他请求调到国外工作，如果可能，到英语国家工作。

对他来说，旅居加拿大是命中注定的。1983 年，当主管农业的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到加拿大作广泛旅行时，雅科夫列夫就在加拿大。几年前，他们就相识，当时雅科夫列夫还在中央委员会工作，曾为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若干农业管理改革计划进行过辩护，而此时他们有机会进行广泛的讨论。对于大使这样的外交官来说，他必须一直陪同高层来访者。

据雅科夫列夫后来回忆，他被戈尔巴乔夫“坦率而清晰的见解”所打动。⑦他们两人都认识到，“我们不能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了”。几个月后，雅科夫列夫调回莫斯科，在享有盛名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当所长，该研究所的俄语缩写ИМЭМО通常为。〔76〕人们所熟悉。

1984 年 12 月，雅科夫列夫作为少数随员之一，陪同当时还不是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出访伦敦，这是他第一次从事高层外交。如果正是由于雅科夫列夫的建议，才赢得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对其上司的赞扬（“他是我们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那么他便不虚此行。

尽管他长期居住在北美，人们对他并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们的官员对雅科夫列夫的了解仍比对谢瓦尔德纳泽的了解更多。而根据他们在 1985 年对他的了解，不能对他抱什么指望：受到共产党当局的充分信任，是派往西方敌对环境中的第一批留学生。他在加拿大任外交官的 10 年期间，并没有公开表现出向传统苏联政策挑战的倾向。他所发表的言论是恶毒反对西方的。

1984 年，即在雅科夫列夫久居渥太华之后，并即将陪同戈尔巴乔夫访问伦敦之前，他在刚出版的一本书中用如下措辞描绘美国的外交政策：

美国垄断财阀们相信，他们对世界的控制是解决一切国际政治问题的最佳方案。他们认为，战争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催化剂。他们认为支配世界的新机会已经出现，出于这一丧心病狂的思想，武器制造商和高级官员们结成了死亡同盟。他们准备把几十亿人民埋葬在城市的废墟中，仅仅是为了使世界跪倒在他们的脚下。

实质上，战后美国领导人的一贯表现，就像带有核武器魔爪的好斗公鸡，力图与共产主义和苏联作战，以此证明他们的“可靠”、“强健”和“胆量”。⑧

因此，虽然我们没有立即预料到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所做的贡献，即他改变了作为苏联外交和国内政策基石的共产党意识形态，我们也是可以得到原谅的。当他进入共产党书记处并一度进入政治局后，他力图限制共产主义制度的权力、保护人权，并将外交政策建立在合作而不是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此外，他和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都成为戈尔巴乔夫班子中的基本成员，他们承认需要改变苏联对非俄罗斯民族的政策。

美国因素

〔77〕

然而，在 1985 年和 1986 年，潜在的民族问题并不是苏联领导人注意的中心。戈尔巴乔夫已经下定决心，“我们不能继续这

样生活下去了”。如果他想使任何国内的改革计划——无论多么温和的计划——获得成功，他就必须创造一个更为缓和的国际环境。

美国并不是他所面对的唯一外交政策问题。的确，某些不恭敬的苏联问题观察家曾在私下戏言，苏联应该得到特别的同情，因为它是世界上被“敌对共产党国家所包围”的唯一国家。然而，要想缓和引起军备竞赛的紧张局势，关键在于美国。如果与美国的关系不那么紧张，许多其他方面的压力就可以减轻；如果两国仍处于对峙状态，就很难解决其他地方的问题。

里根政府一直警惕着突发事件。美国国防预算的迅速增加（从卡特政府时已经开始），其部分原因是特意向苏联领导人显示，美国不允许因自己退出竞赛，而让苏联占有军事优势。与此同时，特别是从 1984 年初开始，美国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以缩小我们的差距。我同当时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理查德·伯特及其助手马克·帕尔默一起工作，我主要负责起草里根总统有关这个问题的讲话稿及他给苏联领导人的信函。

从 1983 年起，我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我的主要任务是制定与苏联的谈判策略。总统对手下的工作人员明确表示，他加强美国军事力量的目的，是要使美国在与苏联的谈判中能够取得成功。里根政府中的很多人，特别是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的人，怀疑苏联领导人的谈判诚意，但是里根却很乐观。尽管他厌恶苏联的制度，但是他相信，如果施加足够的压力，再加上他个人的谈判技巧，该制度就可以改变。舒尔茨国务卿确信谈判是有意义的，渴望承担这项工作，但是难以驾驭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对〔78〕此很不积极，国防部长温伯格也加以反对。⑨

1983 年 6 月，我搬到毗邻白宫的豪华的老行政大楼的办公室，当时，美国同苏联的关系看来十分紧张，几乎达到直接冲突的程度。阿富汗战争正处于白热化，苏联军队的攻势实际上正在逐步升级。在非洲之角、安哥拉、尼加拉瓜和柬埔寨，苏联政府支持的反叛运动或极权政权正在进行局部战争。在中东，苏联的仆从国伊拉克和叙利亚不仅对以色列施加军事压力，而且被怀疑支持恐怖组织。在 70 年代，每年从苏联移居国外的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有五万多人，现在其数量急剧减少。在苏联，很少有人被允许到共产党集团以外的国家旅行，可以出国的大多数是负有官方使命的政府官员。持不同政见者继续被关押在劳动营、精神病院或在国内流放，新闻媒介受到严密控制。干扰使许多城市地区听不清外国的无线电广播。

苏联和美国在军备控制谈判中的分歧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在日内瓦的谈判代表看来举步维艰。保罗·尼采和尤里·克维特辛斯基试图独自弥合我们在欧洲中程导弹问题上的分歧，但被两国政府所否决。苏联人还威胁说，

如果欧洲部署美国导弹以抗衡 SS—20 导弹的话，就退出所有军备控制谈判。

这种紧张局势促使双方的公开言论日趋激烈。仅仅在我到白宫工作前几周，里根总统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演讲中还称苏联是“当前世界罪恶的根源”。几个月以来，苏联领导人和苏联的宣传机器一直诽谤里根是战争贩子。⑩他们现在指责他并不是想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而是想以此迷惑公众。

尽管有这些明显的摩擦，而且公众感到两国关系正处于最低点和极度危险之中，但我仍以乐观的情绪开始工作。如同我所料到的，基本趋势正明白无误地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由于盘根错节的官僚体制和巨额军事开支，苏联经济日趋僵化，效率〔79〕低下，步履蹒跚。苏联在国外负担沉重，它所支持的反叛活动在战斗中遭到了越来越有效的打击。苏联公众对阿富汗战争及核战争的威胁越来越忧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共产党的信徒中不再有激励作用；在私下里，几乎没有什么人隐藏对此的轻蔑。甚至那些管理这种政治制度的人，也开始怀疑它究竟能在现有形式下维持多久。

在我看来，美苏关系的低谷可能已经过去。它在今后几年仍有可能遇到这样那样的挫折，但既然美苏关系已经降到最低点，那么，如果美国确定了合理的目标并准备进行机敏的谈判，就必然会出现一个稳步改善关系的时期。

确定议事日程

直到 1983 年夏天，白宫官员虽然受到舒尔茨的催促，但仍很少考虑与苏联谈判方案的大致轮廓。然而，在那年春天，里根开始更多地考虑，如何利用他通过增强防务所积累起来的谈判筹码，他同意让舒尔茨在国会作证时概要说明一项前瞻性政策。在冗长的介绍中，舒尔茨称我们的政策是以“现实主义、实力和对话”（11）为基础。“现实主义”是指我们应客观地根据苏联的现实来看待它。“实力”是指我们应拥有必要的经济能力来维护我们的利益，并通过谈判达成合理的解决办法。“对话”是指我们应保持沟通，不中断联系，就像在以前的危机期间某几届美国政府所做的那样。

舒尔茨的证词是一个重要信号，表示我们想与苏联进行严肃认真的谈判。然而，他所提出的三项原则只是表明了我们的姿态，而不是政策。实际上，美国政府还没有制定出前后连贯的对苏政策。美国政府有个装着各种各样个别政策的百宝囊，其中大部分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像关于裁军、人权、贸易制裁、不接受分〔80〕裂欧洲、苏联在其境外的军事干涉，以及其他很多问题，等等。每个人都肯定知道，即使相互关系没有通过政策体现出来，它也必然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时，参议院拒不批准吉米·卡特与勃列日涅夫签订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甚至早在 1974 年，国会就因苏联不允许自由移民而通过了限制对苏贸易法案。然而，美国的各种政策只是混合在一起，并没有形成一个前后连贯的有机整体。

在过去，每当美苏关系有所改善时，美国的政策就变得过分乐观，有时还非常欣快；而一旦遇到挫折，我们就在一段时间内完全拒绝与之来往。当我们需要一个稳定、坚实、可靠的政策时，我们的政策却忽冷忽热、大起大落、断断续续。

当我们试图在某些领域改善关系时，我们却忽略了其他方面的问题，因而难以达到预想的目的。理查德·尼克松试图扩大对苏贸易，却因苏联当局限制犹太人移民和其他践踏人权事件，而未能成功。卡特政府决定优先考虑军备控制问题，并反对苏联在第三国的军事冒险，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参

议院拒不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也未能成功。

当然，避免爆发战争是个紧迫的问题，但我怀疑仅靠控制军备是否能达此目的。美国人民把我国与苏联的关系看作一个整体，如果苏联正在侵略另一个国家，美国人民就会反对军备控制协议，并本能地认为这种侵略行径比军备水平对和平的威胁更大，此外，让犯有侵略罪行的政府去执行它参与制定的协议，会冒极大的风险。这就是说，如果美国政府在试图解决某个领域的问题时，忽略了其他领域的问题，它将铸成大错。与苏联关系或者全面改善，或者根本不改善，苏联领导人有必要认清这一点。

关键的问题是，苏联必须改变，才能从根本上改善美苏关系。如果苏联仍保持原状，我们所能期望的只是去应付相互敌对的状态，而不是协调彼此的政策。尽管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共产党决不会放松控制，但我认为，美国制定一个鼓励苏联内部变革的策略是有意义的。虽然我不能预言苏联领导人将开始进行内部〔81〕变革，但许多迹象表明，苏联领导人已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如果我们能制定一项政策，既保护了我们的利益，又帮助他们渡过某些难关，为何不尝试一下呢？即使苏联现任领导人对此没有反应，但如果我们坚持不懈，扎实努力，将来的苏联领导人有可能加以响应。

虽然我认为苏联制度需要改革，但我认识到不宜公开宣扬这一目标。苏联领导人出于骄傲和其他原因，将拒绝响应我们要求他们改变制度，以便与我们达成协议的呼吁。这将堵塞谈判道路。我们必须另辟间接途径。

苏联领导人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压力，要求他们开放国家、放松控制，这就使美苏两国有可能进行间接的接触。我相信，开放边境、信息自由流动和建立民主制度等，会使苏联制度发生根本变化，但任何着手改革的苏联领导人很可能认为，该制度能够适应更为开放的环境，以提高生产效率。因而我们不应据此认为苏联领导人仍然拒绝揭开铁幕及保障一定的人权。这种改革一旦开始进行，如果不出现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它将发展出自我激励机制，难以逆转。因此，即使这不是其统治者的意愿，苏联终将发生变化。

必须制定一种政策，能够鼓励苏联的开放和民主化。我们需要明确，在支持苏联起变化的同时，必须确保我们的利益和安全。

如果最初苏联领导人不响应我们的呼吁，我们不能丧失信心，而必须准备等待。

1983 年 9 月 1 日，当苏联战斗机击落一架偏离航线、误入苏联领空的韩国民航客机时，我们仍在讨论谈判策略。该飞机被击落，使 269 名乘客丧生，其中包括 1 名美国国会议员及其他许多美国人。苏联政府最初否认它与飞机失事一事有关，接着又声称美国应对此负责，因为它利用该客机作为“间谍飞机”。

飞机被击落一事虽然是很大的灾难，但如果苏联政府承认所〔82〕发生的事情，对此加以道歉，赔偿损失，并采取措施防止再发生类似事件，很可能并不会造成美苏关系的的严重破裂。以前，例如近在 1977 年，也发生过击落偏离航线的民航客机事件，但是伤亡人员要少得多。事后，苏联政府并未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因此，它应该受到严厉谴责。（12）

然而，苏联对这次事件的反应，使之发展成为严重的外交对抗。里根总统重写了他的撰稿人和我起草的讲话稿，并在国家电视上称这次事件为“大屠杀”。几天后，舒尔茨与葛罗米柯在马德里举行会谈，我们本来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建立一个有实际效力的谈判框架，但它变成了一场叫喊比赛，当舒

尔茨要求此次会议仅限于讨论飞机被击落事件时，葛罗米柯异常愤怒，暴跳如雷。

此后不久，安德罗波夫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指出“如果以前人们还幻想”有可能与里根政府打交道，那么这种幻想现在已经破灭。几周后，当第一批潘兴导弹部署在西德以抗衡苏联的 SS—20 导弹时,苏联政府实践了其威胁，撤回了在日内瓦举行的削减中程导弹和战略武器谈判的代表。美苏关系退回到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的状态。

苏联对击落韩国民航客机这一错误的反应，表明苏联的政策已陷入困境。苏联官员撒谎，掩盖公认的事实，并反过来指责对方，当这些都未奏效，他们就进行恫吓和威胁。其结果，恰恰给里根政府提供了在世界舆论面前抨击他们的有力武器。

里根本来已决定对谈判采取主动，但当苏联领导人对空难事件拒不承担责任时，他感觉受到挫折。他和舒尔茨及其他每个政府成员一样，确实感到很愤怒。然而，美国的反应并不是盲目的愤怒，而是有计划地向苏联表达两点重要信息：第一，苏联政府对其错误的反应令人无法接受，它最终将有害于苏联自身；第二，美国仍有兴趣就两国的分歧举行谈判。正当苏联人威胁从日内瓦撤走其军备控制谈判的代表时，我们把美国的谈判代表派回到谈判桌旁。

里根提出的方案〔83〕尽管我们愿意保持交往渠道畅通，但美苏关系仍冻结了好几个月。1983 年秋天，安德罗波夫的健康状况突然恶化，而苏联的政策看来仍处于发泄愤怒状态。但是，有头脑的苏联官员认识到，他们的领导人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由此所引起的国际孤立和敌对态度，使苏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83 年 10 月，我在莫斯科认识的《真理报》政治评论员谢尔盖·维什涅夫斯基从纽约给我打电话，要求和我见面。《真理报》常驻美国记者生病，维什涅夫斯基临时替换他。他说，他没有兴趣为《真理报》进行采访，而是想同我讨论当前局势。我猜想他是想让我向美国政府转达一个非正式信息——过去每逢两国关系紧张时，苏联都使用这种方法。

我邀请维什涅夫斯基在老行政大楼对面的饭店共进午餐。他谈了很多问题。他说苏联领导人的年龄老化，思想僵化，他对苏联的经济状况感到担忧，他知道苏联领导人需要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以便进行改革，但苦于不知怎么做。他们愚蠢而莽撞地制定了一项政策，最终因处理中程核武器谈判和击落韩国客机事件而走入死胡同。他们现在认识到，里根总统不仅将使增加的国防预算得到批准，他还很有可能在 1984 年的大选中重新当选。他预言，苏联领导人将不得不中断谈判，以实践他们以前发出的威胁，随后是几个月的僵持局面，并伴随着刺耳的宣传。但他劝告我们，不要认为我们在 1984 年无事可干。到那一年秋天，苏联领导人将试图逐步恢复谈判。

维什涅夫斯基所谈的是他个人的看法，但我怀疑，他主动到华盛顿来仅仅是为了告诉我他个人的观点，这很可能是苏联领导层中的某个人想让我们得知的信息。实际上，我已经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

〔84〕随着冬天的临近，我认为，美国应该开始制定谈判的议事日程了。由于苏联的好战情绪和安德罗波夫的病情，我们不期望他们马上作出反应，但我们需要为未来的谈判制定一个框架。我们还需要向美国人民和我们的盟国重申，我们准备进行严肃认真的、建设性的谈判。由于继续进行阿富汗战

争、中止军备控制谈判、错误地处理击落韩国客机事件以及继续践踏人权等，苏联在世界舆论中的声誉每况愈下。然而，西方社会的某些重要人物担心，由于里根政府不愿意妥协，美国正在冒核战争的危险。因此，有必要使美国公众和苏联领导人了解，我们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进行谈判。

我建议总统发表演讲，阐述与苏联改善关系的想法。我们都把罗伯特·麦克法兰称做“巴德”，他刚刚接替威廉·克拉克担任了总统国家安全助理，他同意我的想法，并让我准备一个发言稿。因此，把从春天起就一直在我脑子里酝酿的思想整理出来，形成一份完整材料的机会到了。

我向国务院的里克·伯特和马克·帕尔默征求意见。我们在所有主要问题上均看法一致，我们都同意，由我负责起草初步提纲，他们再加以充实。白天我抽不出时间，就谢绝了宴会邀请连夜干。到第二天凌晨 3 点，我感到极为疲劳，同时已完成了演讲稿的 80%，其中包括所有实质性建议。我把它送到国务院形势分析室，让信使在当天就将它送交国务院的帕尔默，请他审查并完成该演讲稿，然后我驱车回家，在预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前我可以睡三个小时，我感到很愉快。

该演讲稿体现了舒尔茨国务卿所阐述的“现实主义、实力和对话”三原则。它还提出了一个谈判框架，主要有三个方面：（1）减少并最终停止以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来解决国际争端；（2）削减“大量储存的武器装备”；（3）通过尊重人权、遵守协议、扩大交往、自由交换信息和进行思想交流，“建立起良好的工作关系”。后来，第三点又分为两个方面，即把人权作为单独一项议程，由此该方案变成了“四点议程”。

我们以前没有把这些问题作如此归纳，也不认为这些问题相〔85〕互关联：即一个问题的进展将推动其他问题的进展。尽管问题之间的联系不是机械的，作决定时也不必认为它们是相互关联的，但我们很清楚，不解决某个问题，就会妨碍其他问题的解决；事情很可能是这样的：或者取得全面进展，或者没有任何进展。除非僵化到自我毁灭，否则，武器控制与武器使用，国外行动与“国内”问题，（13）例如人权和新闻自由等，（14）都是彼此联系的。

苏联的宣传机器对里根进行了谴责，说他把世界上所有罪恶都算在苏联头上。这显然是不正确的，里根在其演讲中说，我们并未指责苏联为地区性冲突创造条件，而是谴责它企图利用这些冲突，武装其中某一派，或者进行军事干预。里根引用了约翰·肯尼迪 1962 年在美利坚大学发表的讲话，表达了我们在紧张关系之后愿意改善美苏关系的信号。当时，肯尼迪提出了有限禁止核试验的建议，从而缓和了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的紧张局势。

我并不指望苏联领导人还能记得肯尼迪的讲话，但我知道他们会收到对里根演讲所作的分析，他们的美国问题专家会指出谈话的用意。此外，里根援引了一位民主党人士的话，提醒国内的听众他正在寻求两党一致的政策。

里根还需要表明，美苏对话中逐渐升级的相互抨击不应妨碍建设性的谈判。因此，我为他作了如下解释：

我坦率他说明我对苏联制度和苏联政策的看法。苏联领导人不会对此感到惊讶，因为他们从不隐瞒对我们的看法。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彼此交往……实际上，在这个核武器时代，我们之间有分歧这一事实，需要我们坐下来进行更紧迫的谈判。

我们本来希望里根在圣诞节之前发表演讲——演讲稿已经过多次校订和

讨论，到 12 月中旬已经准备好，但白宫负责日程安排的人几次推迟演讲时间，而没有对此作明确解释。很长时间后，我才知道，南希·里根在加利福尼亚的占星家应对这些拖延负责。直到 1984 年 1 月 16 日，该演讲才最终进行。（15）

推迟演讲一事并没有造成任何损害。该演讲意味着提出一项，〔86〕长期政策，我们并不指望莫斯科马上作出反应。总统的顾问们最初很想让里根在 1983 年 12 月发表演讲，以便尽量不使新闻媒介把它看作竞选文件。他们认为，如果不是在 1983 年，而是在大选年的 1984 年发表演讲，很可能被认为具有政治动机。

许多美国时事评论家实际上把它看作竞选演说，但我觉得，即使在 1983 年 12 月发表演讲，他们也会那样认为。在那段时间，南希·里根强烈敦促她丈夫同苏联进行谈判，希望他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和平总统”。谁知道事实究竟如何？她的占星家也许是正确的。最终，在这次演讲中简要提出的政策将发挥无可比拟的作用。

为日内瓦谈判作准备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戈尔巴乔夫就任总书记前的一年间，但从 1984 年 1 月 16 日起，直到苏联解体，我们公开提出的建议都是非常正确的。然而在里根政府内，对于某些特殊政策，特别是关于裁减军备及抑制苏联在第三国军事活动的政策，存在着许多争论。而在有关人权和需要敦促苏联人进一步开放社会方面，则表现出广泛的一致性。但是，许多人不相信苏联人会对这些压力作出反应，还有某些人不理解它们与诸如裁减军备及苏联的侵略行径有什么关系。

在 1984 年，苏联始终拒绝就裁减军备进行谈判，于是我们开始寻找能够打破僵局的其他议题。恢复因苏联入侵阿富汗而被卡特政府中止的文化与教育交流协定似乎是最好的赌注，于是我们敦促签订一项新的协定，以便能有更多的人参加交流，人们能够进行更广泛的旅行。6 月，在对美苏交流感兴趣的美国人的一次会议上，里根发表演讲，提出了我们的建议，该会议是由纽约的卡内基公司和华盛顿的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发起的。（16）当时美苏关系似乎正处于历史上最低落的时期，里根的结束语却表现出乐观的情绪：

〔87〕想到可能有一天，各种职业的美国人和苏联公民能够自由来往，访问彼此的家庭，拜访朋友和同行，在一起切磋各种问题，如果他们愿意，还可以彻夜探讨人生的意义及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这似乎是不可能的梦想。

……我并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梦想，我认为你们也不会把它看作梦想。

当戈尔巴乔夫同意与里根在日内瓦会晤时，我认为，我们有必要更明确地提议苏联和美国不再卷入局部战争。我们已经就裁减军备、增加接触、保护人权提出了具体建议，但我们一直没有对如何减少两国在第三国的军事竞争提出明确的设想。特别是，我们还没有表明，如果苏联停止对第三世界冲突各方的军事支持，我们也将停止这种军事支持。

公众看来仍然关注着军备控制谈判和苏联直接或间接卷入的各种热战。在一些人看来，里根关于空间战略防御盾牌的建议——美国政府称之为“战略防御计划”，而批评者称之为“星球大战计划”——不仅是鲁莽之举，而且妨碍了军备控制协议的签订。（17）可以理解，某些人对苏联支持第三世界的叛乱感到很惊恐，他们一般仅仅考虑采取针锋相对的方法，例如向尼加

拉瓜的反政府武装或安哥拉的若纳斯·萨文比提供武器。尽管很多人确信苏联的军事冒险难以成功，但却嘲笑我们的想法——即我们应创造条件，使苏联人能够不丢脸地从军事卷入中撤出。

尽管我们在公开声明中一再强调，我们并不认为军备控制问题是两国关系的核心问题，它只是若干同样重要的问题之一，但是许多政府官员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把它看作核心问题。除了性问题和间谍活动之外，没有什么能像武器系统那样为人们所强烈关注。在美国政府中，大多数争论围绕着我们的谈判代表应该怎样对待这种或那种武器系统的问题。每个专家都有他自己所偏爱的系统，认为任何限制该特定系统的企图部等于纵容投降。这些人一方面拒绝限制我们的系统，一方面又认为我们的谈判代表必须〔88〕说服苏联人消除他们的全部优势。即使苏联日趋衰弱，也决不要指望它会同意这种显然是对单方面有利的安排。

苏联领导人认为控制军备是核心问题，因此，他们一再坚持应首先达成军备控制协议，才能提出其他重要问题。他们这一主张的用意很明显：他们希望缓和军备竞赛，以减轻对经济的压力，而无须被迫进行根本的改革。

由于这些态度，在 1984 年和 1985 年，美苏双方在军备控制问题上的立场似乎是不可调和的，即使苏联人 1985 年回到谈判桌旁时也是如此。如果我把军备控制看作美苏两国关系的核心问题，我就会对此丧失信心。但我并没有感到绝望。我认为，储备大量武器尽管很危险，而且代价高昂，但它只是两国关系恶化的反映，而不是造成美苏两国相互敌视的原因。如果我们能够减少敌意，武器储备就会减少，而不管是否有协议。反之，即使签订了裁减军备协议，也不会起多少作用。实际上，除非设法减少猜疑和敌意，否则，军备控制协议只能引起新的争端，譬如相互指责对方耍花招，违反协议等。

因此，重要的是不要让军备控制问题在日内瓦的首脑会谈中过分突出。当然，武器问题要谈，而且要认真地谈，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到，不管戈尔巴乔夫是否愿意，其他重要问题也必须列入议事日程中。正像里根总统在致戈尔巴乔夫的信中所指出的，它们是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的。

9 月初，我给巴德·麦克法兰写了一份备忘录，建议总统应准备在日内瓦就结束在第三国的冲突、扩大人民之间的交往，特别是中学生和大学生的交往，讨论具体的办法。我还指出，重要的是在日内瓦会议之前，我们应私下与苏联代表讨论新的设想。戈尔巴乔夫很可能怀疑我们最初公开提出的任何建议都是宣传。在公开讨论这些新的设想之前，如果给他充分时间考虑这些设想及〔89〕有关的评论，有助于建立相互信任。谢瓦尔德纳泽计划那个月晚些时候访问华盛顿，它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试验机会，以便在首脑会议之前检验一下这种方法。

我知道，如果让这些设想经过正常的公文经办程序在各个机构间旅行，那么，到谢瓦尔德纳泽访问时也准备不好，官僚们一定会认为它们无足轻重，并向新闻界泄露此事，那就不可能在公开讨论它们之前向戈尔巴乔夫加以介绍。因此，我建议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的四五个专家在小范围内进行讨论。我们把打算做的事情通知了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和中央情报局长威廉·凯西，他们表示不反对这样做。温伯格欢迎任何能够转移公众对军备控制问题注意力的建议，凯西虽然对戈尔巴乔夫是否能接受这些建议持怀疑态度，但他不反对加以尝试。

几天内，我们的小型工作组就这两个问题提出了全面的建议。它特别针

对在尼加拉瓜、安哥拉、阿富汗、非洲之角及柬埔寨正在进行的战争，提出了解决地区性冲突的设想，建议分三个阶段逐步停止苏美的军事卷入，并促使冲突各方的和解：

（1）美苏两国敦促地区性冲突的各方开始谈判和平解决方案。

（2）一俟谈判开始举行，美苏两国代表将决定怎样阻止武器从国外流入冲突各方。

（3）在已实现和平的地区，美国和苏联将合作帮助经济重建工作。

美国第一次向苏联提供了一种途径，使苏联在没有遭到军事失败的情况下，也可以从地区性冲突中脱身。美国没有谴责苏联制造冲突，并表明解决冲突的首要责任在于地区性冲突的有关各方，它还承诺如果苏联撤出，并且支持以谈判解决冲突，美国将结束对这些战争的军事卷入。它还表示，如果冲突能够得到解决，美国支持苏联以和平方式参与该地区的建设工作（直到此时，美国的政策通常是反对苏联在第三世界的任何活动）。该方案呼吁先由交战各方进行谈判，试图尽量缩小对美苏两国的怀疑，以免让〔90〕人以为两个超级大国正在相互勾结，把其解决方案强加给他人。其目的在于消除美苏军事竞赛，这种竞赛正在使冲突加剧。

旨在揭开铁幕的这些建议，包含着具体的设想，即增加人民特别是青年人的交流，允许接触对方的新闻媒介，逐渐增加文化、教育和专业方面的交往。

9 月 26 日和 27 日，谢瓦尔德纳泽访问了华盛顿，里根总统和舒尔茨国务卿向他介绍了这些设想，舒尔茨在同谢瓦尔德纳泽的通信和后来的会谈中，又清楚他说明了更多的细节。仅仅在这个时候，里根才把它公之于众。在 1985 年 10 月 24 日的联合国大会上，他提出了处理地区性冲突的建议，（18）赴日内瓦前，他在面向全国的无线电广播中发表了演说，谈到了他的建议中有关扩大交往方面的某些具体意见。（19）

当我们为日内瓦会议拟订议程时——希望也是为美国今后几年甚至几十年拟订议程——美国新闻媒介却更为关注美国政府对苏联行动的批评，以及被泄露出来的有关军备控制政策方面争论的报告，而对实际上正在谈判的议事日程却不怎么注意。这就是许多美国人对冷战结束感到很突然，感到不可理解的原因之一。

随着日内瓦会议的临近，戈尔巴乔夫也开始调整苏联的政策，但是速度很慢，而且没有像里根那样清楚他说明广泛的目标。在 1985 年春天和夏天，他与里根每隔几周就交换一次信件，语气都很诚恳。但双方在信中谈到关键问题时都极为坦率。仲夏时节，戈尔巴乔夫突然建议暂停核试验，美国官员认为这是宣传手法，因为他在通过官方途径通报这一意见的同时，也向公众加以宣布。这就是苏联不想达成协议时的典型做法。

不过，我们开始注意到，戈尔巴乔夫在阐述苏联的安全政策时，开始使用某些新名词。他在 10 月初去法国旅行期间（普遍认为这是为 11 月与里根会谈作准备）指出，“ 合理的充分 ” 是决定〔91〕苏联军队规模的适当基础，他否认意识形态分歧是决定苏联外交政策的有关因素。这些说法很迷惑人，但其含义太模糊，我们很难确切地理解其真正意思。

戈尔巴乔夫指出，苏联可以就削减中程弹道导弹达成协议，而不要求就战略武器和空间防御问题同时达成协议，这些说法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美国及其盟国早就感到，如果苏联坚持要么全面谈判、要么不谈判的政策，这些

复杂的谈判不可能取得成功。戈尔巴乔夫在巴黎的讲话使我们看到了希望，苏联的主张已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变。

逐步找到共同语言

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两人都有理由对日内瓦首脑会谈感到满意。虽然他们远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他们都已认识到，除了和平，其他任何选择都不合乎情理，而只有正视这些问题才能获得和平，基于这一认识，他们开始找到共同语言。这似乎是不证自明、毫无疑义的常识。但从两国关系史及与之相伴的意识形态负担来看，实际上并非如此。

直到会议前，苏联的谈判代表始终坚持，任何主张和平的声明中，都应表示赞成“和平共处”。在许多局外人看来，这里没有什么可反对的。谁会反对“和平地共同相处”呢？实际上，这个名词隐含着意识形态的陷阱，在苏联的字典中，“和平共处”的定义是“国际范围内非战争手段的阶级斗争”。换言之，和平共处意味着冷战，而不是和平。它意味着西方应被动地接受东方所发动的冷战，而不可能以同样手段予以回击。

问题不仅如此。苏联官员通常为“和平共处”补充这样的短语：“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换言之，“和平共处”不适用于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勃列日涅夫主义”指出，如果“社会主义”受到威胁，“社会主义”国家有权利有责任干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就像 1956 年的匈牙利，1968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和 1979 年的阿富汗那样。

〔92〕在 70 年代初最高级会谈的鼎盛时期，尼克松和基辛格曾同意把这种词写进联合文件中，而不顾像我这样的苏联问题专家的反对。他们两人似乎都认为它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美国公众对此不感兴趣，那是扔给勃列日涅夫这种蠢货的廉价骨头，如果我们对他足够好，也许这样能说服他不要给我们撤出越南的行动设置障碍。不幸的是，这种词对苏联领导人并不是没有意义，我们接受该名词一事（以及其他许多重要原因），使勃列日涅夫及其同伙相信，他们能够派军队介入第三世界的冲突，而不会受到损害。

里根比尼克松更为重视意识形态问题，他决心避免使用对不同的人有不同含义的词汇。苏联宣传机器指责他是“战争贩子”，他却渴望在历史上留下支持和平的记载。但他想在坦率的非意识形态的讲话中表达他的想法，他已在若干次演讲中谈道：“不可能赢得核战争，决不要打核战争。”

我不知道苏联在日内瓦能否接受这个简单的公式。如果他们拒绝，我们就不准备发表任何联合声明。然而，虽然苏联代表最初坚持常用的“和平共处”一词，但在同戈尔巴乔夫磋商后，他们完全接受了里根在其坦率讲话中所阐述的原则：不可能赢得核战争，决不要打核战争。这是苏联政策的重要转折。

由于苏联可以使用常规力量进攻西欧，因此，我们美国的谈判代表坚持，任何联合声明都应宣布放弃常规战争。过去，苏联代表总是坚持两国应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如果西欧遭到苏联常规力量的进攻，这将阻止美国用核武器保卫西欧。令人高兴而惊讶的是，参加日内瓦会谈的苏联代表放弃了以前的立场，同意在联合声明中写上有必要防止“在美苏两国之间爆发任何战争，无论是核战争还是常规战争”。（20）这样，在经过几十年争论后，我们所阐述的观点终于为双方所接受。

一般来说，我不耐烦对宣言或联合声明进行无益而琐细的分析。这些问题常常很琐碎，只有专家能够理解，在文件不具备法律效力的情况下，不值

得为此进行谈判的努力。但是这一次，联合声明中的用语很重要，不仅表现在它所阐述的内容上（该声明反映了两国长期以来所执行的实际政策），而且表现在它进行阐述〔93〕的方式上。戈尔巴乔夫已表明他准备处理战争与和平的核心问题，而无须求助于不真诚的公式。

日内瓦首脑会谈还就事先磋商过的问题达成了很多协议，包括大为扩展的交流计划，其中许多设想是由里根所提出的。

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卡特政府拒绝延长以前的交流协议。尽管苏联军队仍在阿富汗作战，但我们认为这些交流很重要，它们能够对苏联产生长远影响。拒绝支持人民之间的接触只会加强铁幕，而我们本应该打开它，而不是加强它。我认为，使苏联撤出阿富汗的最好办法，是向阿富汗抵抗力量提供具体的帮助。我很高兴，我们终于能够弄清两种行动的区别：一种是真正承担压力的行动，一种是从长远来看导致自我毁灭的行动。

通向雷克雅未克的崎岖道路

尽管日内瓦会议后戈尔巴乔夫的调子有所转变，但 1986 年对他的外交政策来说仍不是平静的一年。里根建议连续召开两次会议，一次在华盛顿，一次在莫斯科，戈尔巴乔夫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意见。但当我们试图安排华盛顿会议的时间表时，他又开始推诿，要求保证在会议上签署实质性的军备控制协议。如果能够达成协议，里根并不反对签署协议，但他不想冒被人指责的危险，说他只是为了开会而让步。因此，他拒绝作出事先的保证，或通过谈判作出为他的顾问所反对的让步。

这使得戈尔巴乔夫怀疑里根是以谈判本身为目的，以此哄骗美国的公众和美国的盟友，而并不打算达成协议。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还是开始逐渐改变苏联的谈判立场。

1986 年 1 月，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一个广为宣传的建议，即到 2000 年分阶段销毁所有核武器，里根对此印象颇佳。与他的多数顾问意见不同，里根认为核武器可以而且应当销毁，而现在，一〔94〕位苏联领导人第一次提出有关这一目的的具体建议。然而，许多细节他不能接受，而且戈尔巴乔夫提出建议的方式（他在发出建议信的同时，又把信的内容透露给新闻界）使人怀疑他的目的是在作宣传，而不想达成协议。

在同一封信中，戈尔巴乔夫重申了他几个月前在巴黎所作的暗示，表示他不再像葛罗米柯那样，硬把三种核武器的谈判紧紧捆在一起：他宣布，苏联不再要求首先就所有三种核武器达成协议，然后再解决其他任何问题。现在，尽管仍在就战略和防御武器进行谈判，也可以先签订有关中程导弹和现场视察的协议。

2 月，戈尔巴乔夫提出了第二个主要的外交政策问题，当时，他把阿富汗战争称做“流脓的疮伤”。他不再夸耀苏联军队在阿富汗仅仅是为了履行其“国际主义义务”。此后，苏联在阿富汗的军事卷入被看作有必要加以解决的问题。虽然在经历了更为艰苦的两年时间后，戈尔巴乔夫才提出了可以接受的建议，三年后，苏联军队才真正撤出阿富汗，但在 1986 年已经看到了终止苏联军事卷入的曙光。

谢瓦尔德纳泽也忙于转变苏联的外交方式。1986 年 4 月，他重新任命了一批苏联高级外交官，5 月 23 日，他召开了有苏联外交官和外交政策专家参加的会议，解释了“新思维”。人们期待苏联外交官今后能够抛弃以前那种大声喊叫和唱反调的策略，而代之以说服的艺术。

西方外交官对“ 新思维 ”很感兴趣，并以谨慎小心的态度对待它。我们大多数人希望看到某种更具实质性的东西，而不仅仅是言辞。但当时我们开始注意到，许多持强硬路线的老外交官正调到莫斯科闲散的咨询机构，而擅长外语、富有社交能力的更年轻的外交官却以空前的速度得到提升。谢瓦尔德纳泽已开始根据他自己的而不是葛罗米柯的面貌来塑造苏联的外交机构。

这些变化并未迅速弥合美国和苏联在军备控制问题上的矛盾，1986 年的整个夏天，华盛顿和莫斯科继续就下一次首脑会议的日期讨价还价。戈尔巴乔夫拒绝赴华盛顿参加首脑会议，除非他能够签署军备控制协议，但日内瓦的谈判进展不大。

初秋，戈尔巴乔夫在一封密信中建议，尽快在第三国举行一〔95〕次“ 预备 ”会议。它并不是取代下一次正式的美苏首脑会议（戈尔巴乔夫同意应在华盛顿举行该会议），而是短期的工作会议，研究将在华盛顿签署的协议。

戈尔巴乔夫表示，他十分希望在两国之间的中立地点与里根会晤，他提出冰岛的雷克雅未克，该地距双方都是四五个小时的飞机航程。他忽略了其前任认为很重要的问题：冰岛并不是瑞士那样的中立国家，而是美国的北约盟国。因此，从政治角度来看，他的旅程将超过一半。

里根虽然想在华盛顿举行正式规格的首脑会议——他特别渴望向戈尔巴乔夫展示美国的情况——但他还是同意举行一次更为有限的会议，1986 年 10 月 11 日和 12 日，他们两人在雷克雅未克会晤。

与公众的印象不同，这次会议并非仓促而草率，两位领导人都对各自的主张作了精心的准备，尽管准备得很迅速，并有严密的安全措施。他们之间的通信和外交联系使彼此都能相当准确地了解对方的观点。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军备控制是关键问题，而对里根来说，军备控制问题尽管很重要，但它只是更广泛议程的一部分。

由于冰岛会议安排为工作会议，而不是正式的首脑会议，因而没有大事渲染，没有任何社交约会。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会谈进行了整整两天，只是在与各自代表团用餐时才中断一下，而两个谈判小组——一个讨论裁减军备问题，另一个讨论地区问题和双边问题——则通宵工作。

10 月 11 日，在美国大使小巧舒适的住所共进工作早餐时，我们与总统一起回顾了关键性问题，然后举行了一次模拟会议。我扮演戈尔巴乔夫讲俄语，由译员进行翻译。在日内瓦首脑会议之前的类似练习中，我曾准确地猜到戈尔巴乔夫的论点；这一次我不打算预测他可能提出什么特别建议，而是模仿他在讨论和争论问题时的方式。

随后，我和国务院的托马斯 · 西蒙斯轮流担任秘密会议的记录员，我是地区和双边问题的谈判小组成员，并参加美国小组中有关军备控制问题的讨论。

在第一天上午的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对内容广泛的军备控制〔96〕协议提出了详细的建议，尽管这些建议有积极因素，但它在某些方面含混不清，令人难以接受。由保罗 · 尼采和谢尔盖 · 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主持的谈判小组通宵工作，以澄清这些问题。与此同时，由罗扎尼 ·李奇韦大使和亚历山大 ·别斯梅尔特内赫主持的另一个小组正在处理地区冲突、人权和双边交流等问题。

到星期天早晨，苏联的态度已很明确。他们在军备控制问题上作出了较大让步，但在其他方面进展很小。（21）在当天晚些时候里根同戈尔巴乔夫

会谈时，可望对武器裁减条约取得共识。从一开始，谈判就很顺利，戈尔巴乔夫接受了美国所提建议，即苏联削减 50%的重型陆基导弹，保留少量中程导弹，进行广泛的现场视察。到中午，有关中程导弹的协议看来即将达成，于是我们急电美国驻西欧各国和日本的大使，请他们找到各国政府首脑，授权他们就谈判条款向各国政府作简要介绍。鉴于此时已是星期天下午，这件事情在许多国家首都很难办到。

下午的会议不时中断，常常要同谈判小组磋商，起草文件。两国代表团都很兴奋，因为即将签订的条约可能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武器裁减条约。看起来，只有两个原则问题尚待解决。第一，戈尔巴乔夫曾提出到 2000 年销毁所有核武器，而里根只同意销毁所有弹道导弹。第二，戈尔巴乔夫坚侍认为，一切有关战略防御武器的研究都应限于在实验室内进行，里根则不同意这一点，他认为实验室以外的试验对于该计划是必不可少的。

使其助手们感到沮丧的是，里根接受了戈尔巴乔夫关于最终销毁核武器的建议，但在有关战略防御计划试验的问题上他毫不让步。结果，两国领导人的会议不欢而散。到晚上，中午那种欢快情绪变成了怨恨不满。两国没有就华盛顿会议——雷克雅未克会议旨在为其做准备——作出时间安排，仅此一事，就足以使新闻媒介把这次会议看作是一个失败了。

在会议刚刚结束的几小时内，我们都没有意识到，里根和戈〔97〕尔巴乔夫已经解决了很多有争论的问题，其广度超过了已往历届美苏首脑会谈。我们的失望情绪影响了最初的新闻发布会，（22）并使我们实际获得的成果没有得到清楚的介绍。实际上，所签订的协议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为会议规定的目标，只是没有确定戈尔巴乔夫赴华盛顿的日期。戈尔巴乔夫同意接受美国的建议，即两国拥有同等的少量中程导弹，并提出两国在全球范围内的限额。他还同意从苏联的武器库中削减 50%的重型洲际导弹，从而满足了美国的目标。在苏联几十年的抵制后，他同意了进行现场视察的意见。

戈尔巴乔夫来雷克雅未克时的权限是，只要协议能够阻止美国突然部署战略防御系统，就可以接受美国的立场。根据两国现阶段的研究程度，实验室工作的重要性超过了空间试验，因此，美国本来就可以接受某种程度的限制，而不会削弱该计划。但是里根对此并不是很清楚，他的反应就好像让他把他所珍爱的孩子扔进正在喷发的火山口。

雷克雅未克会议取得了惊人的进展，为以后的条约扫清了道路，尽管当时并未达成任何最后协议。第二年签订了中导条约，它比在雷克雅未克会议上所达成的协议更好，因为它规定销毁所有中程导弹，而不再允许双方各保留 100 枚。里根同意到 2000 年销毁所有核武器的目标，这给英国和法国出了难题，这两个国家仍决定保持独立核力量，而且他们也并未被告之里根即将作出这种让步。美国的政策在作出如此重要的改变之前，未同我们的盟国进行充分的磋商，这是不妥当的。

美国在未对议程中的其他问题作更大变动的情况下，同意了主要的裁减军备方案，很可能也会使戈尔巴乔夫推迟接受全部议程。戈尔巴乔夫来到雷克雅未克时仍然相信，只要达成了军备控制协议，就可以修补美苏关系。仅仅是在雷克雅未克会议结束后，他才认识到，只有他同意讨论议程中的所有问题，包括人权问题、揭开铁幕问题等，苏美关系才有可能实现正常化。

在回顾过去时，人们有可能作出这些判断，但在当时，他们〔98〕对此看得并不是很清楚。几个月来，苦涩与背叛的感觉笼罩着美苏关系。两国领

导人在接近达成协议时无功而返，他们都指责对方应为谈判失败负责。戈尔巴乔夫尽管作出了较大让步，但仍为空手而归感到窘迫烦恼，他只好对政治局同僚们严厉斥责里根。军事史学家及斯大林传记作者德米特里·沃尔克格诺夫（23）在苏联解体后查阅了苏联档案，他告诉我，戈尔巴乔夫当时的讲话极为刻薄，并带有侮辱性，他不知道以后戈尔巴乔夫怎样再面对里根。(24)幸运的是，正像戈尔巴乔夫后来所说，他同里根“注定要进行合作”。

间谍、外交官和人质

尽管两国领导人在雷克雅未克处理的并不是间谍问题，但正当会谈进行之际，两国却陷入了有关间谍问题的争吵。

这场争吵开始于 8 月，当时，联邦调查局逮捕了联合国秘书处的苏联籍雇员根纳季·扎哈罗夫，指控他违反了美国的间谍活动法。与大使馆中正式委派的外交官不同，联合国秘书处雇员的非公务活动并不享有外交豁免权，因此，如果他们犯法，将要受到起诉。

尽管扎哈罗夫被捕一事有确凿证据，但克格勃决心营救他。但它面临一个难题：在苏联，没有任何美国公民因从事间谍活动可以被合法逮捕。因此，他们决定拿一名无辜的美国人开刀，以捏造的罪名指控他。《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驻莫斯科记者尼古拉斯·达尼洛夫遂成为牺牲品。

这一卑鄙行为，把一般的执法问题变成两国间严重的政治对抗。苏联当局企图以逮捕美国人的手段，迫使美国释放他们的某个间谍，这已不是第一次了。在肯尼迪政府时期，克格勃曾在同样情况下，逮捕了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巴洪，但是当肯尼迪提出抗议后，赫鲁晓夫改变了态度，并下令释放他。

但随后，当没有什么名气的美国人被捕时，尼克松及卡特政府都错误地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各自释放被捕人员。结果，每当没有外交豁免权的苏联人因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而在美国被捕时，在苏联的美国公民也面临着被无辜逮捕的危险。

〔99〕里根总统决定，他不仅要使达尼洛夫获释，而且要终止这种蛮横的行为。为此，他必须确保使达尼洛夫立即获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要使克格勃为其自身利益付出高昂的代价。

里根直接致信戈尔巴乔夫，说明达尼洛夫无辜被指控，坚决要求释放他。戈尔巴乔夫拖延了三个多星期还未作答复，里根下令把在联合国工作的 25 名苏联官员驱逐出境，我们认为他们很可能都是苏联间谍。（25）

与此同时，美国官员致信苏联政府，措辞强硬：如果继续关押达尼洛夫，美国将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不会容忍对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报复行动。我们也不能因为美国对苏联在美国的更大机构采取的行动，而允许美国大使馆遭到报复。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很庞大，而美国在苏联却没有类似规模的机构，即使有，驱逐无辜的美国人也是不合适的，因为指控苏联间谍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是有充分证据的。

因此，我们通知苏联代表，如果发生任何企图报复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行动，我们将坚持苏联驻美外交机构应与美国驻苏外交机构的规模相等。这意味着苏联实际将减少驻美人员。

不到两个星期，达尼洛夫就被允许离开苏联，事前，舒尔茨和谢瓦尔德纳泽通过谈判为此作出了安排。扎哈罗夫也在作了无罪申诉后获释离开美国，但他的获释有个条件，即著名的政治犯尤里·奥尔洛夫应释放出狱，并

允许他与妻子一同赴美。（26）到 9 月底，这个事件看来已经结束。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雷克雅未克会议刚刚结束，苏联人就做了我们明确警告他们不要做的事情：他们下令把五名美国外交官驱逐出境，这是对不久前我们把纽约的苏联人驱逐出境的报复。两天后，我们根据以前的警告，通知苏联撤回它在华盛顿和旧金山的另外 55 名“外交官”（其中大多数人——如果不是全部——看来是间谍），并规定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人员不得超过 225 名，苏联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的人员不得超过 26 名。

规定这种最高限额是基于以下设想：苏联当局将从美国驻莫〔100〕斯科大使馆和驻列宁格勒总领事馆撤走苏联雇员。最高限额要求苏联实质性减少驻美人员，同时，如果苏联雇员被撤走，它也允许我们派出足够的美国人接替苏联雇员的工作。果然，克格勃的行为一如往常，它确实在一夜之间，就从驻苏美国外交机构中撤走了苏联雇员，并驱逐了另外五名美国外交官。

结果，美国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外交官经历了一个极为严酷的冬天，但他们勇敢地面对挑战。到第二年底，当美国人被派到莫斯科从事必不可少的服务工作时，美国大使馆的工作比有苏联雇员的时候进行得更顺利。虽然我们的措施给美国驻苏联的外交官造成了暂时的痛苦，但其结果显然有利于美国的利益：苏联驻美外交机构中的大部分苏联职业间谍被清除了，最高限额的规定使得苏联人不可能以其他间谍完全取代他们的工作，美国驻苏外交机构所受到的安全威胁减少了，因为忠诚的美国人取代了苏联雇员的工作。（27）

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向克格勃表明，如果他们捏造罪名，陷害无辜的美国人，他们自身的利益就将受到威胁。

戈尔巴乔夫与克格勃

但这些与戈尔巴乔夫以及与苏联解体有什么关系呢？

乍一看似乎关系不大，实则不然。

现在已很清楚，戈尔巴乔夫准备支持克格勃这一集团的狭隘利益，即使它危及整个国家的利益也在所不惜。在这一事件中，最终克格勃的损失最为惨重，但这是因为克格勃自己错误地估计了美国的反应，认为里根政府的反应将与其前任在类似情况下的反应相同。肯尼迪对巴洪被逮捕一事提出了抗议后赫鲁晓夫曾试图制服克格勃，而戈尔巴乔夫则企图粗暴地对待里根，尽管里根以个人名义向他郑重担保达尼洛夫不是美国间谍，戈尔巴乔夫仍把他当作人质关押。

〔101〕戈尔巴乔夫的反应不适于在两位领导人之间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鉴于戈尔巴乔夫在正常情况下很擅长同外国政治家建立私人关系，我认为他在许多方面被克格勃所支配，他或者不加批判地接受其假情报，或者担心与之发生争论（克格勃的支持对他担任苏联领导人是必不可少的），或者他感到不得不保护哪怕是错误的政策。总之——他的态度很可能是三者兼而有之——在涉及克格勃利益的事件中，他并不是独立行事。

我对此并不感到惊讶。毕竟，戈尔巴乔夫在其整个生涯中离不开克格勃，而且他还是克格勃前任首脑尤里·安德罗波夫的门徒。但是，他轻易接受了克格勃的假情报，并盲目相信克格勃首脑对他的忠诚，这使他注定要扮演使苏联解体、个人政治前途被断送的角色。

对话走向公开

正当公众和许多官员因雷克雅未克断断续续的军备控制谈判以及戏剧性

的逮捕和驱逐事件而感到迷惑时，其他一些事件正在发生，它们将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如同我们所看到的，苏联的政治犯开始获释。同时，移民人数开始增加，苏联的新闻媒介也向外国发言人打开了一条门缝。

按照传统的做法，只有当指望外国人支持苏联立场或者在不适于争论实质性问题的正式场合时，才允许外国人出现在苏联的新闻媒介上。因此，苏联公众从本国的新闻媒介上，从未清楚地了解到其他国家的政策。苏联的报刊、无线电广播和电视上的每条新闻，都要经过有倾向性的筛选；记者和编辑不仅要经过审查，而且要由共产党的宣传部门进行直接的“指导”，指示他们哪些问题可以报道，怎样进行报道。

在日内瓦首脑会议召开前几星期，苏联当局同意发表苏联新闻工作者代表小组采访里根总统的长篇报道。它发表在苏联的报刊上，内容很准确，尽管它附有一篇“评论”，试图驳斥里根的某些说法。自从赫鲁晓夫的女婿阿列克谢·阿朱别伊 1961 年为《消息报》采访了约翰·肯尼迪后，苏联的新闻媒介再没有采访过任何美国总统。

〔102〕直到 1986 年，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仍然很少出现在苏联的新闻媒介上。因此，当赫斯特报系富于进取心的外文编辑约翰·沃利奇邀请我参加与苏联官员的公开辩论时，我感到很有兴趣。

沃利奇的邀请代表了纽约北部的肖陶扩协会和其他可能的主办者，包括华盛顿的艾森豪威尔基金会。肖陶扩协会每年夏天在具有田园风光的地方举办一系列定期的会议、演讲和对话，1985 年夏天，它举办了为期一周以美苏关系为主题的活动，并邀请了许多苏联官员参加。现在，由苏联的“友好”委员会发出的邀请是对上次活动的回报，会议期间，美国发言人将应邀与苏联发言人进行辩论。苏联的主办者保证，届时将有五六千听众，并由包括电视在内的苏联新闻媒介对会议现场作全面报道。作为白宫的高级苏联问题专家，我应邀作主要发言，并担任美国官方代表团的领导。

苏联举办这次会议含有某种企图。苏联人希望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附近的旅游城市尤尔马拉举行这次会议，但是我们不承认苏联吞并拉脱维亚。美国高级官员参加在拉脱维亚举行的会议，会不会向人们暗示美国承认拉脱维亚是苏联的一部分？我看不会。毕竟，我曾多次参加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召开的讨论美苏关系的会议，但没有人认为那些国家是我们正在讨论的国家，即美国或苏联的一部分。

并非每个人都同意我的看法，国务院的马克·帕尔默曾就此与重要的美籍拉脱维亚人的组织进行了磋商，说服它的领导人支持这一计划，条件是美国代表团内应包括若干拉脱维亚裔美国人。

我们向苏联东道主说明了这个条件，他们最初有些犹豫，但最终还是表示同意。

我们都很清楚，这次会议的举办得到了苏联官方特别是克格勃的批准。（28）他们的动机很可能是想检验一下他们能否控制向西方有限开放的进程。他们显然认为自己能够胜任。

即便如此，该建议也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检验公开性的机会，公开性已成为苏联的正式政策。如果苏联新闻媒介忽视这次会议，而且所有与会者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共产党活动分子，那么我们就会明白，苏联的政策没有起任何变化。但是，如果我们得到即使是有限的机会接触苏联的公民和苏联的新闻媒介，那么我们就会〔103〕明白，一个最终能够摆脱苏联政权控制的进程

已经开始。

会议差一点就未能举行。我们刚要按照预定时间启程赴尤尔马拉，达尼洛夫被逮捕。他的妻子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上直接向美国代表团呼吁，要求它在她丈夫被关押期间抵制这次会议。我很难搞清楚这次会议（苏联召开这次会议所冒的风险并非无足轻重）对戈尔巴乔夫在达尼洛夫问题上的决定能产生什么影响。但我们中没有人希望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即我们对他的受难漠不关心，而实际上，为了使他能够获释，我们当时正日夜工作。我们决定在达尼洛夫被关押在苏联监狱期间停止会议的准备工作。在达尼洛夫获释并交给美国驻苏大使阿瑟·哈特曼后不过几小时，我们便乘包机离开华盛顿，人民之间交流的试验又恢复了。

苏联东道主遵守了诺言，有几千人聚集在会场聆听演讲，并向讲演人提问。他们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但是地方的新闻媒介对演讲作了充分的报道，并由莫斯科的“中央”新闻媒介摘要发表。大约 300 名美国人，包括拉脱维亚裔美国人，被颁发了参加会议的护照。

美国主办者选择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发言人，他们将使苏联听众听到苏联新闻媒介一般不予发表的那种坦率的批评。美国认为没有必要派出那种回避有争议问题的发言人，这种人的礼貌放错了地方。许多人，例如弗吉尼亚州的参议员查尔斯·罗布，以及本·沃坦伯格、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和马克·帕尔默等，都是公认的严厉批评苏联政策的人。（29）

虽然我事先已经准备了一个发言草稿，但在我们的包机离开杜勒斯机场之前，我没有机会修改定稿。我特别关注发言开始的那几个段落——已经由美国之音译成了拉脱维亚语——因为我已没有机会对演讲进行练习了。

我们代表团中两位会讲拉脱维亚语的团员为我救了急：一位是外交官英特斯·西拉斯，他曾在美国驻列宁格勒总领事馆工作，一位是奥贾斯·卡尔宁斯，拉脱维亚裔美国人协会的代表，他们和我在飞机上挤在一起，帮助我练习不熟练的发音。〔104〕采访会议的《新闻周刊》记者报道说，我在演讲开始的部分使用的是“不自然的拉脱维亚语”，然后又转而使用“流利的俄语”。他对我的拉脱维亚语形容得很正确，但即使是不自然的拉脱维亚语，也受到当地听众的欢迎。我把演讲的实质性内容放在俄语的部分。在我抗议达尼洛夫被拘禁一事后，我直截了当地谈到那些危害和平的活动，特别是苏联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兼并。我明确表示，美国政府从未承认这种非法占领，它将继续坚持只有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三国的人民有权决定究竟是独立，还是成为更大联盟的一部分。

晚饭以后，苏联官员对美国客人说，我所谈到的美国不承认苏联吞并波罗的海国家一事，冒犯了我们的听众。他们争辩说，拉

脱维亚人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生活得这么好，他们不会背弃改善了他们生活的联盟。

但我却得到不同的印象。当我从尤尔马拉回到我在里加下榻的饭店时，前台的年轻姑娘动人地微笑着迎接我，并且问：“他们说你开始演讲时用的是拉脱维亚语，这是真的吗？”当我向她保证这的确是真的时，她激动地摇着我的手说：“谢谢你，谢谢你，以前还没有哪个外国人这样做。感谢你还记得我们是哪个国家的人。”

与此同时，一些饭店雇员把我围在中间。我的演讲还没有在电视上播放，虽然它将在当晚播放，但他们已知道了我的演讲内容。“美国真的不认为拉

脱维亚是苏联的一部分吗？”有人问。当我予以肯定时，他说：“我们不了解这一点。”另一个人也说：“那么，美国人的确了解我们，我从来没有想到会这样。”六年以后，当参加过尤尔马拉会议的老朋友又在肖陶扩重聚时，拉脱维亚国民阵线的领导人戴尼斯·伊万斯也来了。该阵线领导了拉脱维亚的独立运动。1986 年，苏联当局认为伊万斯太不可靠，因而不让他参加尤尔马拉会议，但他同他的朋友们聚集在会场外面，了解会议的进展情况，并会见来访的美国人。“肖陶扩协会在尤尔马拉推动了我们事业的起步，”他说，“在此之前，似乎什么希望都没有。但会议使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孤立的。”

预言家回家

〔105〕

释放政治犯的举动使美苏关系中某些有争论的问题开始减少。1986 年 12 月，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给安德烈·萨哈罗夫，告诉他可以返回莫斯科。在雷克雅未克的严重挫折及达尼洛夫被逮捕之后，这件事有助于使我们受到伤害的感情得到修补。

早在 1968 年，萨哈罗夫就撰文要求实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并在国内保障言论自由的权利。他警告苏联领导人，如果不采取措施建立民主制度，苏联的经济将迅速地滑到西方的后面。萨哈罗夫受到了外国新闻媒介的注意（他的主张通过无线电广播逐渐传回苏联）。勃列日涅夫对此很恼怒，他下令把萨哈罗夫流放到高尔基市，这是一个封闭的城市，禁止外国人前去访问。

萨哈罗夫在高尔基市度过了七年，在接到戈尔巴乔夫的电话之前，他大部分时间实际上被软禁在家。回到莫斯科后，他仍被苏联官员看作贱民。只是在 1987 年夏天，苏联出版界为了检验公开性的限度，才偶尔引用他的话。

我们认为，萨哈罗夫被流放是违法行为，而更恶劣的是，他的妻子，勇敢的叶琳娜·波纳受到了克格勃的非人道待遇，她唯一的罪名就是毫不动摇地忠诚于他的丈夫，并斥责那些折磨她丈夫的人。我们一再敦促释放他，指出这种流放违反了苏联领导人在签署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时所赞成的原则，我个人也采取了许多措施营救他，我认为，萨哈罗夫从流放地获释一事，对苏联的改革来说是个好兆头。1987 年春天，我出任美国驻苏大使，在我抵达莫斯科后，我坚持尽快拜访他。

萨哈罗夫身材瘦长，动作笨拙，显然不是一个很强健的人，但他的大脑仍然聪明灵活。他说话缓慢，不时停顿一下，以选择最准确的措辞，表达事物之间的细微差别，但他在论证他所支持的事业时总是显示出他掌握着充分的事实。

1987 年我们第一次会面期间，他表现得异常乐观。他对他所受到的对待并没有表现出牢骚满腹，心怀怨恨，而是关注着其他〔106〕方面的问题。他敦促美国政府不要放松对苏联当局的压力，以释放所有在押的政治犯，使个人有权选择他们居住的地方，能够自由旅行，并且通过立法确认这些原则，以便使政策不致因官员个人的一时好恶而改变。

他也表达了对戈尔巴乔夫的钦佩，他相信，戈尔巴乔夫已经“研究和了解了”赫鲁晓夫的错误。他感到，戈尔巴乔夫想通过正确的手段改变社会，尽管他还没有公开说出他的计划。因此，他建议我们应不断地向戈尔巴乔夫施加压力，使他做正确的事情，而只要他前进的方向正确，就要对他给予支持。

戈尔巴乔夫的确从未直接承认他赞成萨哈罗夫的观点，但他对萨哈罗夫

以个人名义所作的呼吁，大多数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但是，戈尔巴乔夫没有理会他有关民族冲突的劝告，而这一问题正引起萨哈罗夫越来越多的注意。戈尔巴乔夫也没有接受萨哈罗夫为一个民主的苏联构筑框架的建议。

戈尔巴乔夫如果更重视萨哈罗夫的呼吁，采取更果断的行动控制克格勃，以选举产生的官员取代党的统治，他的个人命运显然就会完全不同。

但是，戈尔巴乔夫的确赞同使苏联逐渐向世界其他国家开放，他认识到，若不这样做，就不能使苏联成为现代化的、生产效率高的和富有创造力的国家。

1987 年 1 月，苏联不再干扰英国广播公司的频道，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又停止了对美国之音和西德德意志广播电台的干扰。

1987 年 3 月，当玛格丽特·撒切尔访问莫斯科时，她的观点——严厉批评苏联违反人权和在阿富汗的军事卷入——在苏联的新闻媒介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4 月，我刚刚到达莫斯科，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和美国众议院议长吉姆·赖特就接受了莫斯科电视台的采访。

舒尔茨在阿富汗问题上直言不讳（赖特没有提到阿富汗问题，他错误地认为这样做“不礼貌”）。当苏联采访者告诉舒尔茨，苏联军队是应阿富汗的邀请前去时，舒尔茨回答说：“不，他们不希望你们留在那里。他们希望你们撤走。”

［107］在春夏之交，莫斯科电视台的谈话节目开始偶尔介绍西欧和美国的客人，例如西德议会中科尔总理所在党派的领导人沃尔克·鲁赫及其他著名的西德政治家。苏联公众现在不必设法应付那些干扰便已经可以直接接触到西方的观点了。一个已变得很明显的事实是，西方有极其重要的理由关注苏联的政策。

到 1987 年年中,戈尔巴乔夫迫使不太情愿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批准了有限的政治改革。雷克雅未克会谈和“间谍年”已经过去。莫斯科希望在秋天和冬天进行政治改革，华盛顿则希望召开首脑会议，达成销毁中程核导弹的协议。但戈尔巴乔夫进行国内政治改革的目标仍然不明确。虽然 1986 年 12 月在阿拉木图发生了民族暴动，但是莫斯科的政治领导人对于不安定的少数民族问题仍然不以为意。

实际上，首都莫斯科仍在对是否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争论不休。许多共产党官员只是在口头上赞成改革，而同时却抵制进行具体的变革尝试。由于在改革方向和改革速度等问题上的争论，戈尔巴乔夫两年前组建起来的领导班子不久就分裂了。

第五章［108］致命的分歧

外国电台宣传说我们之间有分歧，这纯属无稽之谈，徒添聒噪而已。他们想离间我们，在戈尔巴乔夫与利加乔夫之间，在雅科夫列夫与利加乔夫之间，以及在其他人之间制造对立。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1987 年 10 月 21 日①我们没有宗派之争，没有改革派与保守派之分，但有些人特别希望我们这样。

叶戈尔 利加乔夫 1988 年 7 月 1 日②我与雅科夫列夫第一次公开的冲突应追溯到 1987 年秋。

叶戈尔·利加乔夫 1991 年③1987 年夏，戈尔巴乔夫赢得了中央委员会对政治改革总体规划的支持。这项总体规划旨在为经济改革创造条件。许多细节不为外人所详，但“ 民主化 ”这个新口号似乎已不再只是说说而已。一些新思想，诸如通过选择候选人以及无记名投票来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选举，诸如提高政治透明度等，若真能开花结果那就意味着变化。

这年 7 月份，我到华盛顿进行就任大使以来的第一次述职，其间我汇报说戈尔巴乔夫一直都面临着强大的抵制力量，不过他似乎每次都能渡过难关。依我当时的观察，虽然没有迹象表明他的领导地位受到了动摇，但我预测他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将面临严峻的考验。尽管如此，当时我仍认为他会在政策上取得胜利，并将着手为改革构筑立法框架，一步一步地清除资深官僚中［109］的最顽固分子。但改革能否带来经济发展，其前景并不明朗。大众是没有耐心的，我当时预测在未来的三五年内仍将困难不断。

从“ 右 ”到“ 左 ”

叶戈尔·利加乔夫，这位戈尔巴乔夫政府中的共产党二号人物，很快就被拥护激进改革的苏联知识分子看成是改革的死敌，一些评论家指责他为新斯大林主义分子。

然而，这并不正确。利加乔夫绝不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他尤其不希望回到红色恐怖时代。他的家庭深受大清洗之苦。他的岳父是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手下的一名将军，1937 年被克格勃的前任头子草率处死。而且，他本人由于与一位“ 专政对象 ”的女儿结婚，年轻时一直为此背着黑锅。

利加乔夫不可能是个斯大林主义者，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甚至还是一位改革家。他希望能给经济带来更高的效率，铲除党内早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就已形成的顽疾——腐败现象，希望能有个更加有力的宣传机器来鼓动他认可的这些改革。

然而，利加乔夫认为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进行富有成效的改革。他赞成采取措施，使党更加讲究效率，更加实事求是。但对任何会削弱党对社会的控制，降低党的威信的举措持反对的态度。他坚持认为宣传媒介应在党所控制的范围之内活动，“ 家丑 ”不可外扬。

他也许是 1987 年苏联政治局内唯一一位仍然坚信国家的内外政策应立于马克思“ 阶级斗争 ”概念基础之上的委员。

他为人坚决果敢，常在党的非公开会议上慷慨陈词，表述自己的观点。尽管他与戈尔巴乔大的磨擦自 1987 年以来与日俱增,但戈尔巴乔夫对他所争辩的观点还是予以认真考虑的。毕竟，戈尔巴乔夫在其整个政治生涯中受到了这些观点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利加乔夫不常与外国人接触。然而，他在 1987 年春担任当时仅充橡皮图章的苏联议会对外事务委员会主席期间接见了由众议院发言人吉姆·怀特率

领的美国代表团。我当时刚赴莫斯科出任［110］大使不久，也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见。

会见是在位于莫斯科老广场的一座建筑物内的一个会议室里举行的，这里是苏共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办公地点。会议大厅布置得像一间教室，每把椅子前面配有一张桌子。很显然，这样安排是为了记笔记的方便。

利加乔夫向客人们阐述了实施改革的目标。然而，在这方面他与戈尔巴乔夫的观点大相径庭，但他矢口否认在党的高层领导内部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他强调改革是客观必要的，不依赖于具体某个人。他一再认为党内那些不能适应变化的官员应予以撤职。

很明显，在利加乔夫看来，改革的中心思想就是在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对管理制度进行改革。他所提倡的那些诸如企业“自筹资金”、提高工厂管理的自主性、增加机器制造业的投资等具体改革措施听起来同以前流产的一些计划没什么不同。

他谈到了提高透明度以及民主化的必要性，但他又认为这种民主早就在苏联扎下了根。十月革命创造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权利与经济权利，它们是苏联民主的基础，那种认为苏联民主才刚刚开始的观点是错误的。单就民族问题而言，利加乔夫认为 100 多个民族和睦相处这本身就说明了苏联的体制是“有史以来在这个问题上最完美的”体制。虽然他承认时而也出现一些问题，譬如去年 12 月的阿拉木图骚乱，但认为这并不是由于错误的民族政策所致，而是由于社会的一些恶瘤——腐败现象、裙带风以及“投机倒把”——所引发的。

他认为可以通过党的更加严格的控制来解决这些问题，反酗酒运动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他说三年来饮酒量减少了一半多，而且，工作缺勤现象也少了一半。另外，死亡统计数字表明，1986 年的死亡人数少于 1985 年的 35.4 万人。④

利加乔夫在阐明他的观点时说，他所认定的改革应由一个廉洁而又强大的共产党来领导，可在官方意识形态不做重大变更的情况下予以实施。实质上，利加乔夫的改革观点属于“安德罗波夫计划”，即不进行戈尔巴乔夫已经开始规划的政治体制改革。他［111］当时对外界也许否认这一点，但他事实上却反对戈尔巴乔夫于 1987 年提出的政治改革步骤。他们之间的分歧因该年戈尔巴乔夫采纳更加激进的改革方案而扩大。

到 1987 年，戈尔巴乔夫阵线中的最活跃人士当属时任莫斯科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他满腔热情地拥护政治改革，结交广泛，完全没有党的高级官员那种典型的令人敬而远之的高傲态度。他偶尔出门还乘坐地铁，时常微服私访，逛商店、下车间，还不时参加工人们的劳动，与他们一起装卸货物。

当时商店经理常私匿商品而不在货架上出售，此事一旦被叶利钦发现，他（或她）就大难临头了，可能当场予以免职。当时在苏联由于商店物品的定价比黑市低，国营商店工作人员私存物品以便到黑市上去牟取高价之利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有关叶利钦的评论很快风行莫斯科大街小巷。在市民们眼中，这位莫斯科市党组织的新领导看起来不像他的前任，他是“我们大家的一员”——真诚而又随和，和我们一样挤乘公共交通工具，参加我们的体力劳动，对日常不良现象了如指掌，并下定决心消灭它们。对于莫斯科人来说，叶利钦很快

成了传奇式的人物，他向人们切实证明了改革不是走过场。

但是，传播媒介却很少报道叶利钦的事迹。除非是正式场合的需要，媒介几乎对他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比起以前，传媒在 1986 年与 1987 年这两年里已经变得更加活跃，为什么叶利钦颇具新闻价值的行为却被媒介所忽视呢？

当然，只有天真的人才会这样发问。如果真的有人向一般市民提出这个问题，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因为‘他们’不希望我们了解他。”

“他们”不说也清楚。“他们”就是那些国家的统治者，党的决策人物。“我们”与“他们”的斗争构成了生活的全部。

不过，内部的人会更加直截了当地挑明，禁止媒介报道叶利钦的“古怪”行为的人来自上面，来自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本人。[112] 叶利钦就任莫斯科党主席不到几个月的时间，《真理报》编辑维克多·阿法纳西耶夫就告诉同事说，他已经接到戈尔巴乔夫的指令，对叶利钦的报道要淡化处理，《真理报》不要鼓动叶利钦去进行他的“煽情行为”。

不久，监督传媒的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就被委以此任，致力于淡化对叶利钦的报道。莫斯科党组织自己的报纸《莫斯科真理报》的编辑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是叶利钦的同盟军，他后来告诉我说那时总有人打电话给他，谴责他对叶利钦报道太多。⑤压力越来越大，1987 年 8 月波尔托拉宁的《莫斯科真理报》刊登了叶利钦的一份长篇报告，但没署名叶利钦，这是叶利钦在莫斯科市党组织里做的一个报告。

1986 年和 1987 年时，苏联市民有充分理由不相信他们自己的传媒报道。传播媒介抵制报道事实上也帮助树立了叶利钦在民众中的形象，因为有关叶利钦的事迹在民众中口耳相传，造就了他英雄般超常的品德。如果官方媒介一直对他进行吹捧的话，民众也就不会信任他了。

我与叶利钦的第一次接触是在 1987 年 8 月，当时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特里·桑福德和保尔·萨班斯来访莫斯科市。此时，政治局大多数委员都去度假了，叶利钦没去，他作为高级官员接待了我们。会谈持续了两个小时，他在各种话题上打破常规的言谈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

他谈话不用提醒，不用看笔记，他向客人列举了九条即需纠正的“消极现象”。其中政治方面占了一大半：言论自由的控制、

民主的缺乏、党群关系的脱离、政治领导层中集体习惯（也即团体合作精神）的丧失以及外交政策的僵硬。其余的是有关经济方面的不良现象，如新技术应用缓慢，重视重工业而忽视了消费品的生产，缺少激励机制，容忍平庸，等等。

尽管国内问题是叶利钦关注的主要对象，他的言谈同时也表明他对正在进行的美苏军控谈判中的原则性问题也相当熟悉。他迫切希望通过谈判促成协议的签订。他说：“这样的协议对于改革的实施是必不可少的。”

当时我突发奇想，若换了利加乔夫，他决不会像叶利钦那样 [113] 谈论党群关系的脱离；换了戈尔巴乔夫，也不会谈论集体合作精神的丧失。尽管叶利钦的谈话都是以一党专政制度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前提，都是以他称之为回归“真正列宁主义”的主旨为前提，但他着重强调了被其他人所忽视的或者——至少在公开场合和在外国人面前——所否认的一些因素。

比如说戈尔巴乔夫，他虽然也会毫无疑问地认为与美国达成军控协议对改革是必要的，但他不会如此坦诚地表达出来。他的立场是，美苏两国都需

要裁军，都会从中受益，即便美国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苏联也完全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实施改革。

同盟产生裂痕

1987 年 9 月下旬，包括我们在内的驻莫斯科外交使团都接到一份请柬，邀请大使们去市党委的政教大楼与莫斯科市党组织的第一书记会面。政教大楼靠近莫斯科市百老汇商业路内环，自从它对外开放以来，已逐渐解除了对外国外交官员的限制，至少对来自非共产党国家的外交人员来说是这样。有机会到苏共的党员干部培训基地去参观并再次同叶利钦交谈，对我来说这机会不可抗拒，我欣然前往。

虽然这次会见的目的是为了向驻地使馆的负责人员阐述莫斯科城市的未来发展规划，但叶利钦却谈到了整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他指出目前“ 改革处于非常时期 ”，正处在从建议到具体实施的过渡阶段。社会压力很大，人民迫不及待地要享受成果。如果经理们、政治领袖们不能适应改革的要求，他认为，应该予以免职。他还描述了他对莫斯科党组织进行全面改革的情况。

在会后走廊的闲谈中，我发现一些外交同行们感到叶利钦用词夸大，如“ 非常时期 ”等，他们认为情况并未危急到用这种语言的地步。

［114］然而，在我看来事情似乎确实不那么简单。毕竟，戈尔巴乔夫当时一直告诉民众说改革已经走上正轨，最困难的时期已过，改革正在开始带来积极的结果。但对叶利钦而言，危机依然存在，因为当时改革只是刚开始由决策阶段向实施阶段过渡。我当时认为叶利钦的分析更能说明问题。

会厅里除叶利钦本人之外,没有人知道就在 20 几天之前他给当时还在黑海度假的戈尔巴乔夫写了封信。据后来他出版的回忆录记载，他当时在信中严辞斥责了利加乔夫的总体工作作风，特别是对莫斯科党组织事务的干预。他同时还未指名地提到在政治局里还有其他一些委员反对真正的改革，他预感所有这一切会导向酷似他们曾一度想竭力解决的勃列日涅夫“ 停滞 ”状态。他最后请求解除他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所担当的职责以及莫斯科党组织第一书记的职务。⑥

两人不久就此展开了争论。后来戈尔巴乔夫公开声称叶利钦已经同意等十月革命 70 周年庆典之后再与他商讨这个问题。但叶利钦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却予以否认，并说戈尔巴乔夫当时只是告诉他等“ 以后 ”再同他商谈这个问题。

可是，这一等就是 1 个月。10 月下旬召开了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这时叶利钦主意已定，决定不与戈尔巴乔夫商讨就直接将这一问题带到中央委员会上去。就在戈尔巴乔夫准备结束这次全体会议时，叶利钦向与会代表重申了他对党的书记处的指责，指责它仍未按照最近做出的决定改变其工作作风，人们也因此开始对改革失去信心。他再次请求免去他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所有职责。

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的这次干预极端愤慨，他故意曲解叶利钦的批评，谴责叶利钦有狼子野心，号召大家就此展开讨论。在这位领袖的授意之下，代表们纷纷起来斥责叶利钦。27 人中只有美加研究所所长格奥尔基 · 阿尔巴托夫一人言词比较温和。⑧

尽管叶利钦一再重申他支持改革，否认他自己想分裂中央委〔115〕员会，尽管他为自己选择了一个不当的时机谈论这个问题的行为而抱歉，但戈尔巴乔夫仍然施加压力对他进行批判，还一再歪曲他的发言。

例如，叶利钦说“一些政治局成员”对戈尔巴乔夫与改革的赞扬是虚情假意的，戈尔巴乔夫就打断他的话，指责他对整个政治局培育“个人崇拜”（斯大林主义的代称）的指责是政治上的无知。而实际上，叶利钦并没有指责整个政治局，他只是说有某些政治局成员阳奉阴违，当面赞美戈尔巴乔夫，而背后却试图破坏他的政策。

戈尔巴乔夫继续对他对叶利钦滔滔不绝的责难，不让叶利钦有申辩的机会。当有人高呼叶利钦只考虑一己之利时，戈尔巴乔

夫接过这个话题说：

我也有同感。而且，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们也都了解你。对你来说，只有莫斯科围着你转还远远不够。你是不是想中央委员会也以你为中心？你想要的就是这个，对不对？……

把个人的野心凌驾于党的利益之上，凌驾于我们共同的事业之上，这是一种多么极端的自我主义！

会议结束时通过的决议宣布叶利钦对会议的干预为“政治性错误”，并责令政治局以及莫斯科市党的委员会针对全会上所发生的一切对叶利钦的辞职行为采取行动。

这场冲突没有报道，怕破坏了十月革命的庆祝气氛。

第二天，当国务卿舒尔茨来会见戈尔巴乔夫讨论其访美计划时，戈尔巴乔夫情绪非常低落，会谈也没有达成任何峰会协议。精于看人的舒尔茨断定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他对我说戈尔巴乔夫总是向他提醒，说有一个打不败的拳手，他傲慢、自恃。但当时的情形不同。那时戈尔巴乔夫似乎知道该如何出击。［116］后来还是谢瓦尔德纳泽到华盛顿才解决了戈尔巴乔夫与舒尔茨会谈时未完结的问题，他们很快重新确定了两国领导人的会谈事宜。与此同时，关于中央委员会内讧的谣言开始蔓延。几天之内外国报纸就登出了事情的主要内幕，接着又通过外国电台反馈到苏联。

莫斯科人惊讶万分：难道叶利钦真要被撤销职务？果真如此，这对戈尔巴乔夫所从事的改革来说意味着什么？人们发现叶利钦虽依然与其他领导人一道出席正式的庆典活动，但与他们已不像往常那样小声交谈。

在一次克里姆林宫为外国使团安排的招待会上，我竭力想从中发现蛛丝马迹。大厅里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成员同他们的客人各聚一处，那时想同苏联领导人随便聊聊是不太可能的。叶利钦没有与他的政治局同事们完全站在一起，脸上浮现的笑容也不很自然，他不时倒换双脚，改变站姿，活像一个挨了老师批评的学生。当他看见我时，热情地朝我挥着手，脸上的微笑犹如孩童般天真烂漫。不过，他没有试图走过来与我攀谈几句。我完全理解。如果真像谣言所说的那样，他所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私下里与美国大使好好谈谈。

两天后，风传叶利钦患了重病——有人说他犯了心脏病——但是当时所提倡的公开性还未开明到足以让媒介对此做些报道的程度。11 月 13 日，《真理报》正式证实叶利钦已被莫斯科党委除名。会议记录公开发表，以便让市民们了解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的指责以及叶利钦本人的几乎语无伦次且不打自招的应答。

叶利钦后来说他当时是被戈尔巴乔夫从病床上召去参加会议的。他的医生一开始不让他出院，但后来在戈尔巴乔夫的命令之下才不得已把叶利钦运送到会场，并给他灌了一肚子止痛片。在这种状态下，叶利钦几乎意识不到

他正在说些什么。⑨

据叶利钦的回忆，戈尔巴乔夫当时曾直接告诉他不会再允许〔117〕他重新活跃于政坛。不过，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完全抛弃叶利钦。尽管未曾出现抗议游行，但多数民众，尤其是莫斯科的民众，认同的是叶利钦进行的改革。叶利钦被革除领导职务之后，报界收到了雪片般的抗议信。这些信件虽没公布于众，但都及时送交戈尔巴乔夫过目。如果叶利钦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烈士，那么戈尔巴乔夫就很难说服民众相信他正在从事的正是他所承诺的那个改革。

因此，他为叶利钦安排了一个体面的但却没有什么实权的官职。

当宣布叶利钦的新的任命时，我们正在一位名叫祖拉布·采列捷利的格鲁吉亚画家的画室里与他共进晚餐。电视上说将播出一项声明，我们大家都围坐在电视机前，那迫切的心情就如同美国人丢下一桌丰盛的晚餐来观看第七届世界棒球巡回赛最后一站的比赛。

当听到播音员宣读官方声明说鲍里斯·叶利钦被任命为部长级职务国家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时，我们大家面面相觑，表情复杂，既感到轻松又感到失望。叶利钦毕竟没被完全忽视，这多少令人欣慰；但这职位形同虚设，又多少令人失望。沉默片刻，一个客人苦笑着说，“还是个部长，我看这只能更糟。”

是的，情形更加不妙。但当时萦绕在我的同行朋友们以及许多苏联人脑海中的问题是，为什么叶利钦被人免除了高级领导职务。如果说领导人想致力于他们所声称的政治改革，叶利钦所做的又有何过错？

有关 10 月全会上的冲突的官方文件直到一年半以后才公开［118］发表，⑩是以小册子形式发行的会议摘要。局外人很难凭此断定它的可信度。众所周知，克格勃为了证明某一特定观点很会制造“证据”。

然而，即便如此，人们还是难以置信，戈尔巴乔夫如此大发雷霆仅仅是因为叶利钦偏激的讲话。毕竟，他们所争论的焦点只不过在于实施改革的速度以及苏共书记处直接管理州市的权限等问题。尽管叶利钦加快改革步伐的迫切要求在戈尔巴乔夫看来不理智，并在与同僚打交道时或许缺乏技巧，但他已经成了改革的卓而不群的象征，已经成了向公众保证当时所发起的改革不再只是一场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的“运动”的主要担保人。在失宠的叶利钦眼里，戈尔巴乔夫破坏了他自己倡导的改革计划。

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们为了给他们搞掉叶利钦的动机涂脂抹粉，散布谣言说叶利钦破坏了与戈尔巴乔夫早先达成的一项协议，他曾同意等到 11 月 7 日庆典过后才与戈尔巴乔夫商讨他的处境问题。他们还说叶利钦严重低毁戈尔巴乔夫，以致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免除他的职务，以表明掌权的究竟是谁。有些人断定戈尔巴乔夫此番举措加强而非消弱了他的政治地位。

此间流传的叶利钦在中央委员会上的讲话概要，其中有一段言论是批评赖莎·戈尔巴乔娃干预莫斯科党内事务的。若果真如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的暴怒则是可以理解的。他有理由认为在党的正式会议上批评他的妻子是完全不合适的。

然而，在公开出版发行的文件中却没有包含这段有关赖莎的言论，并且，有好几位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向我保证说，叶利钦的讲话里确实没有此番言论。事实似乎是叶利钦的讲话既不针对戈尔巴乔夫，也不针对他的妻子。这份出版物丝毫也没有解释戈尔巴乔夫之所以如此猛烈抨击叶利钦，之所以如

此恶意曲解叶利钦的观点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尽管中央委员会里的保守派——在委员会中占大多数——不喜欢叶利钦，但如果戈尔巴乔夫真心想挽救叶利钦的话，也易如反掌。戈尔巴乔夫可以这样说：“叶利钦同志所谈及的问题我们应该加以考虑。尽管我对他的某些观点持有异议，尤其是他的有关人身攻击的言论，但他认为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应落实到行动中去，在这方面我与他深有同感。我认为不经过进一步的商讨我们还不能接受叶利钦的辞呈，我建议我们在下一次会议上对此做出决定。”

如果戈尔巴乔夫当时采用了这样的措辞，中央委员会无疑会默认的。叶利钦也许仍然是个麻烦，但已经可以控制他了，而且叶利钦的存在也是对冥顽不化的保守派的有力掣肘。

[119] 1987 年 10 月的这场风波是戈尔巴乔夫从政期间犯下的第一桩大错。嫉妒使他头昏眼迷。他把具有领袖魅力的助手看成是潜在的对手，而不是难得的合作伙伴。这种嫉妒心理不仅进一步恶化了他与叶利钦的关系，而且使他在挑选助手时只选择那些无力与他相抗衡的弱者。然而，这些弱者最终还是背叛了他。

“右派”的迎头反击

搞掉了叶利钦（部分也是出于叶利钦本人的意愿），那些志在阻止政治改革的保守派们认为夺取优势的时机已经成熟。1988 年 3 月，戈尔巴乔夫与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计划出访，戈尔巴乔夫访问南斯拉夫，雅科夫列夫访问蒙古。利加乔夫临时负责党的书记处的工作，当时书记处仍负责监督新闻界的工作。突然有一天，《苏维埃俄罗斯报》这份因与党内保守派关系密切而臭名昭著的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恶毒诅咒改革者。（11）

这篇文章形式上是一封“信”，出自列宁格勒一位名叫尼娜·安德烈耶娃的女教师之手，它占了报纸的整整一个版面。通篇充斥着责骂与影射，具有典型的斯大林主义最黑暗时期的文风。她运用当年斯大林意识形态上的心腹安德烈·日丹诺夫（也是列宁格勒人氏）的文笔遗风，把批评过去的行为斥之为变节，谴责对诸如多党体制和宗教自由之类的“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辩论，顽固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认为这是维系国家政策的唯一可靠基础。她维护斯大林的功绩，称那些聚集在反斯大林口号之下的人们是被十月革命镇压了的阶级的后裔。日丹诺夫在 1948 年这个血雨腥风的意识形态大镇压的年代里演说时所使用的反犹太主义的精典语句，她直接借用来为她的这封“信”添枝加叶。（12）

据报道，这封来“信”原本更长，根据来自上面的指示，由《苏维埃俄罗斯报》的工作人员提炼重写。（13）有谣言说利加乔夫授意刊登了这篇文章。这不仅是因为他当时负责书记处的工作，而且他与该报的总编关系非同一般。文章见报后，他还在一次编辑招待会上对此大加赞扬。

然而，利加乔夫断然否认他与此事有染，尽管在这篇文章发 [120] 表之后，他承认赞成其中的某些观点，（14）如要求严格控制对苏联历史阴暗面报道的观点他深表赞同。他一直强调对“揭示家丑”的出版物如《星火》和《莫斯科新闻》的控制要更加严格，这些出版物以暴露斯大林的过错为专长，公开刊登一些自然灾害的情况，公开呼吁人们注意党的不合理的特权。

此“信”甫一发表，好几个州市的党组织便要求对该信进行“研究”，列宁格勒的党领导更是乐此不疲。

这些反应完全是通常的配合性行动，而且，许多人将其看作是要求对党宣誓效忠的信号，就是说，如果他们愿在即将召开的党的夏季大会之前表达保守的观点，是会受到保护的。

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以及改革家们都认定这篇文章是以运动的形式进行的公开反扑，目的是要葬送 1987 年开始的政治改革事业。1992 年，戈尔巴乔夫在同我的一次私人谈话中回忆说，在 1988 年和 1989 年他无法使改革的步伐迈得更快，“ 他们处处与我作对。1987 年我竭力说服他们，他们才对我的部分改革措施正式表示支持。可我一转身，发生了什么呢？他们拿尼娜 · 安德烈耶娃来袭击我 ”。（15）

不管谁在背后唆使，反正这场尼娜 · 安德烈耶娃闹剧无异于引火烧身。戈尔巴乔夫从南斯拉夫一回来，就要求政治局连续两天就这篇文章展开讨论。戈尔巴乔夫 1993 年公开发表的有关这两天会议的纪要表明，当时戈尔巴乔夫以 “ 这篇文章应被看成是反对改革的讲坛 ” 这样的评语开始了讨论会，他说他怀疑没有人指点，尼娜 · 安德烈耶娃是写不出这篇东西的。（16）他说，令他担忧的不是这篇东西的出现，而是它曾被党的官员看作是具有权威性的文章而加以推荐。

从这份纪要来看，当时只有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果敢地谴责了尼娜的这篇文章。葛罗米柯甚至试图为它辩解，说这是对媒介中出现的 “ 种种诬蔑 ” 的回应。不过，所有发言的人都赞成政治局首先必须步调一致，同心同德；为了党的团结，要在党报上发表有说服力的文章来驳斥尼娜的这封 “ 信 ”。从当时的会议记录来看，利加乔夫要么未出席会议，要么未发言。

［120］1988 年 4 月 5 日，《真理报》刊登了一篇未署名文章（实际上是雅科夫列夫写的），执行了政治局做出的决定，文中对安德烈耶娃信中的观点一一驳斥。几天后，《苏维埃俄罗斯报》被迫在头版为发表该文表示道歉。

戈尔巴乔夫重新确立了主导地位，但观察家们却不敢保证他是否能够控制即将召开的苏共大会。1941 年斯大林曾召开过一次这样的大会，之后就再也没有举行过。斯大林死后，党代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尽管依照党的章程，中央委员会只要需要就可随时召开这样的大会，但当时还不清楚这样的大会究竟能有多大的权威。

戈尔巴乔夫打算举行苏共大会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为了通过一个更加权威性的决议，以支持他的改革观点，因为中央委员会的赞同还不够权威；其二是为了改组中央委员会。他 1987 年 1 月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曾提出要召开一次苏共大会，但这个建议直到 6 月全会时才得以通过。这表明即便是召开这样的大会也有人从中作梗。

一旦改革进入政治领域，中央委员会里的争论就会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戈尔巴乔夫很少能在这种情况下如愿以偿。要使改革实现它的民主化目标，戈尔巴乔夫要么有一个惟命是从的中央委员会，要么想办法绕开党的所有机构。第十九次苏共大会首先就是一次这样的尝试。

当规定只有党代会才有权为中央委员会选举新成员时，戈尔巴乔夫就已经输掉了这场改组中央委员会的战斗。大会上他只能作些有限的变动，使候选人晋升为正式成员，至于从外面引进新成员则是不可能的。

不过情况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安德烈耶娃事件之后，亚历山大 · 亚科夫列夫悄悄地取代了利加乔夫的职位，负责意识形态工作。这样，才可能在他

的督导下完成实质性的提议工作。1988 年 5 月这些提议出台后，成了大会讨论的“议题”。

当这些议题公开发表时，我正在赫尔辛基准备就即将举行的两国首脑会谈向里根总统做情况简述。这时我收到了从莫斯科发来的关于大会议题的俄文文本，并返回旅馆去翻阅，相信这不是什么机密文件，可以带出去，不受什么限制。我当时以为这里面［122］不会有什么令人意外的新东西，大致浏览一下，就足够简述时引用了。其内容很可能是罗列一些早已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以及在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中讨论过的改革方案而已。

可等我翻开一看才发现情况不是这样，新内容比比皆是，我兴奋不已。我从未在一份共产党官方文件中看到对诸如保护公民权利、权力分散、司法独立、在证明有罪之前先作无罪假设等原则给予如此广泛的重视。

有些“议题”似乎是从美国宪法中翻译过来的。除了“社会主义”这个词外，文件与《共产党宣言》、甚至与《资本论》几乎没有一点联系。有关“社会主义”的那些苏联惯用提法也不见了。从某种程度而言，“议题”所谈论的更接近于欧洲的社会民主。

第二天上午，我在总统下榻的饭店的一个房间里向总统一行就莫斯科当前政治局势进行了汇报，这是我的工作。会谈房间的隔音效果由安全专家进行了专门处理，以防我们的谈话被偷听。我先简报了苏共大会将要讨论的“议题”。之后，我对总统说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苏联将会以一个崭新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尽管这些“议题”离我们的民主标准还欠缺一些，但却蕴育着这个国家的自由的种子。如果言论、新闻、集会的自由得到了保障，如果多党选举和无记名投票得以进行，如果司法独立原则得到了合法的确立，那么我敢说共产党一党专政将会很快寿终正寝。

当然，制定这样的目标不等于马上就能实现——也许根本实现不了，但在官方文件中声明这些目标其本身就是向民主程序的建立迈了重要的一步。共产党官僚机构或许会抵制真正的变革，但拥有投票权的明达的公众有可能会施加强大的压力，推进变革。

有一点当时我还不知道，那就是戈尔巴乔夫还想走得更远。他曾为政治多元化以及修改宪法允许建立多党制施加过压力，但政治局否决了他的要求。据当时以观察家身份出席会议的阿尔卡基·沃尔斯基介绍，（17）会上只有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以及维塔利·沃罗特尼科夫赞同戈尔巴乔夫的意见，直到两年多以后共产党才同意结束一党专政。

不管怎样，即便是在政治局通过的压缩文本中，这些“议题”也［123］清晰地表明戈尔巴乔夫肯定接受了我们的四部分议程的内容。争取为人权提供保护的斗争，争取使国家更加民主开放的斗争已经成了改革的明确组成部分。

在红场上亲吻小孩

罗纳德·里根 1988 年莫斯科之行是尼克松 1974 年会见勃列日涅夫之后美国总统首次出访苏联。里根的出访给苏联公众留下了远比尼克松出访更为深刻的印象。毕竟，就在五年前这位总统还宣称苏联为魔鬼帝国，而现在他却来到了这里，并带来了两国关系业已走上正轨且应继续下去的信息。

戈尔巴乔夫需要里根的支持和访问，以向人们证明他的外交政策富有成效。一次成功的首脑会谈会给他召开苏共大会带来强劲势头。戈尔巴乔夫希望这次大会能够通过比他从自己的助手那儿所能得到的更为激进的改革方

案。

就在里根总统到达莫斯科的时候，美国参议院批准了“中导条约”，从而使双方能够举行批准书的交换仪式。这消息令人鼓舞，表明美苏关系正朝着一个建设性的方向迈进，同时也表明裁减军备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加强苏联安全。瓦季姆·扎格拉金也不用再为来不及逃命就遭到致命的打击而担忧了。

当然，里根的支持也为他自己攫取了好处：可以更加坚定地促使人权与民主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计划中优先考虑的课题。甚至在与戈尔巴乔夫举行实质性的会谈之前，里根就在斯帕索宫接见了一群受排挤者和持不同政见者，并在其后的讲话中强调有必要建立民主机制，有必要保护个人权利。

在作家俱乐部里，里根与来自不同领域的知识分子共进午餐，他专门提到了作家索尔仁尼琴，说他的著作至今还没有出版。当我们离开俱乐部时，《新世界》的主编谢尔盖·扎尼金把我拉到一边说：“你告诉总统，我们同意他的观点。我们至今还没有出版《古拉格群岛》，这是一个耻辱。我们会很快付梓印刷的。我将负责办好这件事。”他说到做到，那年年底之前索尔仁尼琴的杰作就以连载的形式出现在一份发行量超过 100 万份的杂志上。

［124］在莫斯科大学，里根对自由大加颂扬，他的演讲使大学生如醉如狂。他对他们说，进步的钥匙“就是自由——思想自由、信息自由、交流自由”。为表明政治与经济的自由同俄国的传统不相矛盾，里根还引用了俄国哲学家罗蒙诺索夫的名言：“开拓现代化时代的人们，他们是创业者，面对未知世界，他们有胆有识，敢于冒险，充满自信。”这位俄国哲人与伏尔泰以及本杰明·富兰克林同处一个年代，莫斯科大学也因他而闻名。就像 1984 年夏在华盛顿呼吁扩大美苏文化交流时一样，（18）里根总统在结束他的演讲时，再一次描述了他所梦萦魂牵的世界：在这里没有旅行的障碍，在这里没有思想交流的障碍。他的年轻的听众为之欢欣鼓舞，掌声经久不息。

在一次会谈间隙期间，这两位领导人漫步到红场上。广场上行人稀少，克格勃安全人员已使游人退避三舍。不过，他们在广场上还是遇到了一对抱着孩子的夫妇，里根向他们问好，并抱了抱小孩，这并不仅仅是政治家在镜头前的惯常行为，这一次它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含义。除了在苏联的“中心”履行政治活动仪式，总统同时还想传递这样的信息：是人类的品德使我们大家走到了一起，他不再是与一个充满敌意的对手打交道，而是与这样的人类打交道，他们同我们一样，正为探索一条通向和平的和更加繁荣的生活之路而奋斗。

在里根结束这次访问回国之前，我和丽贝卡临时参加了由加州企业家阿曼德·哈默在莫斯科的分部举行的饯行晚会。晚会上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尤其是应邀而来的苏联客人更是喜气洋洋。我的一个诗人朋友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兴高采烈地说：“里根的来访是苏联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他早在 1985 年就通过我的介绍结识了里根总统。我当时告诉他说，总统听了你的吹捧后会很高兴的，他对我的话表示抗议，他说“我不是在夸大其词”，里根总统的讲话与姿态鼓舞了全苏联的改革者。俄国的知识分子向来对他们自己国家吸收民主的能力表示怀疑，但里根对改革者们表示了信心，虽然他对苏联的现状并非闭目塞听。这就激励了苏联人民起来结束他们在传统政治中无所作为的状态，去掌握自己未来的命运。

安德烈过于兴奋的话语确实有点言过其实。从来就没有哪一［125］个民

族的自信因某一位政治家的访问而受到根本影响，从而改变它的历史进程。当然，他的话也不无道理。里根对苏联民主的鼓动适逢关键时刻，他早些时候对共产主义严肃的谴责也使他的鼓动言词具有了可信性，这是并不那么直率的人士难以做到的。

他的影响也是久远的。1989 年 12 月，这时里根已经卸任，距他的莫斯科之行也已有八个月之久，可是在一次民意测验中仍有 16.5%的苏联市民把里根看作当年最有影响的风云人物，排在他之前的只有戈尔巴乔夫与萨哈罗夫；里根不但名列当时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之前，而且还位于获得当年 3 月选举大胜的鲍里斯·叶利钦之前。（19）

当然，里根 1988 年对莫斯科的访问对苏联的政治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在为关键的第十九届苏共全会做最后准备的阶段，加强了戈尔巴乔夫的地位。

苏共代表大会

当苏共大会开幕时，戈尔巴乔夫拿出了一项令人吃惊的建议：在各级政府机关，从地方到中央，乃至整个国家，党政高级职位由一人担任。这一思想似乎同党与行政及所选议会职能分开的总体目标背道而驰。而且，它几乎不可能结束党的干部对经济管理的直接干涉。

鉴于这些原因，许多改革者反对此项建议。有些人认为这是非常自私的表现。如果通过这项建议，也就意味着允许戈尔巴乔夫在当选议会主席后身兼党政要职，既可保住党的总书记之职，又可担当政府元首。

我对他们的反对表示理解。如果改革真能奏效，共产党将不得不放弃它对这个国家的束缚。真正意义上的选举就会不失时机地为这样的变化提供动力。但如果党政要职由同一人担任，党很［126］显然仍大权在握。总之，这条建议将会给真正的民主运动带来阻碍。

然而，戈尔巴乔夫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他要与之打交道的是苏联共产党。那些地方与州里的党的官员不愿意把权力移交给选出的议会，不甘心从此退出政治舞台，因此，希望他们在这方面给予合作是天真的。

戈尔巴乔夫的讨好性的建议促使那些固执的官僚们产主幻想，不管怎样，正反两方面他们都可能保住权势：虽然新苏维埃的行动可不受党的直接监督，但党的领导人可身兼二职，并保住他们作为所在州、市或地区“头号人物”的个人地位。

但若果真这样，改革会走向何处？除非实现真正的权力转移，不然，改革毫无意义。对于这个问题，戈尔巴乔夫只做了间接的回答，但细心的听众已注意到了他建议中可能存在的“陷阱”。确实，这条建议允许党的主席去竞选相应地区的（苏维埃）议会主席，如果他获胜，他将身担双职。（20）但换言之，若这位党主席竞选议会主席失利，那么党组织就会不得不对他是否能够胜任党主席一职“做出恰如其分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当选的主席就有可能取代各级党的第一书记的职位，因为那些人已无法凭借自己的权力赢得选举。

当时确有一些第一书记们担忧，一旦这种建议实施后，有可能出现上述后果，但绝大多数的党的官员对此不屑一虑，对即将到来的选举充满信心。他们以往在各自的选区总能获得 99.73%“选票”的支持，这次选举最起码也能获取 51%的选票！

我当时想，戈尔巴乔夫这么做要么是要放弃他的政治改革计划，要么是

要把党的官员推进有史以来的最惊心动魄的角逐之中。对此，只有选举本身才能给出答案。击败那些身居要职的党的官员所需的选举公平度，所需的选举透明度足够充分吗？党会任用凭借自己实力在竞选中获胜的人员来取代落选的党的官员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历史将翻开真正崭新的一页。

对这项建议意见最大的是党内改革派的代表们。叶利钦对此表示疑虑，他建议提交全国人民进行公决。但戈尔巴乔夫的意见取得了最终胜利。

[127] 在党的大会上最有争议的问题是“ 兼职 ”问题，而最富有戏剧性的场面是叶利钦与利加乔夫在会议上争执的场面。他们早在九个月以前的中央委员会上就发生过冲突，不过当时新闻媒介受令未予报道。这次他们的讲话由电视台在全国播放，虽然不是现场直播，而且有点偏向于利加乔夫，但是，他们的讲话当天晚上就转播了。(21) 全文于第二天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登载。

事先并未安排叶利钦讲话，电视播放时对此却只字未提。据叶利钦自己的记述，他事实上是冲到讲台上才被允许发表讲话的。一开始，他的名字并未出现在演讲者名单上，但在大会进行到最后一天，就在午休之前，他离开楼厅上自己的座位，来到下面的主会场，并迈向中间的通道，向面前的议员们挥舞手中的代表证。戈尔巴乔夫派人劝他到讲台后面的房间里去，或者回到原来的座位上，听候决定，但叶利钦没有让步，担心受骗上当。他炫耀性地坐在最前排，直到戈尔巴乔夫同意将他列入发言者名单，他才离开。(22)

终于轮到他发言了。他在发言中先回应了在大会期间他所受到的批判，接着他反戈一击，批评党没有实现预期的更加民主化的基本目标。比照去年的批评，他的此番指责听起来要温和一些。

他从大会本身谈起，提醒人们说，许多地方仍然“ 沿袭旧框框 ”来选择代表。官僚“ 上层 ”并没有得到改组，这是一目了然的现象。

虽然他在发言中要求多花一点时间来考虑党职与对应的苏维埃主席职不分开的建议，但更强烈地表示赞成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新的直接选举，认为这种选举也应在党内进行。他建议政府官员最多连任两届，65 岁就应义务退休，认为这些措施比两党制更能可靠地防止独裁。他称这是真正地回归列宁主义原则的措施。

他还提到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遵从这样的原则，即一旦领导人 [128] 下台，他的一班人马也不能继续留任。他据此批驳在政治局里呆了 10 多年的老政客，指责他们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不思悔改。国家现在这种令人沮丧的局面正是他们一手造成的，叶利钦要他们起来解释，并呼吁大会解除他们的职务。他说：“ 比起死后遭人批判和唾斥，这要仁慈得多。 ”

他接着把矛头直指党内腐败现象。当时党的管理委员会 (负责党风问题) 主席米哈伊尔 · 索洛缅采夫正在会场，叶利钦谴责他只注意微枝末节，对高层领导中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却不闻不问。他也提到了党的财政预算问题，说外人从不知道个中情形，连有权管理它的中央委员会也不清楚。他要求公开党的财政预算，并强烈谴责了党的高级官员的特权。

叶利钦发言所花的时间超过了大多数人讲话的时限。他在念完自己准备的讲稿后，还想再问一个“ 棘手的问题 ”，这时下面发出了抱怨之声，他停了停，抬头看过去，解释说：“ 我只想就 10 月份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后我个人的政治名誉的恢复问题说几句话。 ”会场还是闹哄哄的。他一边收拾他

的讲稿，准备要走的样子，一边小声嘀咕：“ 如果你们觉得时间有限，那就算了。 ”说到这，他转身看了看戈尔巴乔夫，他正坐在讲台后面的“ 主席台 ”的正中央。

戈尔巴乔夫示意他继续下去，说道：“ 鲍里斯 · 尼古拉耶维奇，说下去吧。他们想听。 ”想到去年秋天他在中央委员会上所做的讲话还没有公开发表，戈尔巴乔夫又补充道：“ 同志们，我认为公开叶利钦事件的秘密是时候了。让鲍里斯 · 尼古拉耶维奇畅所欲言吧。大家谁想说，都可以说。 ”

叶利钦转过身，看了看笔记，面对观众又继续说下去。他说大家都已经对 50 年之后才给人平反昭雪的现象习以为常了,而他本人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名誉得到恢复。他回忆说，去年 10 月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称他的观点为“ 政治性错误 ”，而他认为他只错在没有选对时间，他不应在十月革命 70 年庆典期间来挑改革的毛病，它破坏了节庆气氛。但是，为了维护党内自由争论［129］的传统，为了“ 在共产主义者面前恢复我的声誉 ”，他请求本次大会废除中央委员会的决议。

叶利钦前后的讲话风格迥异。他在前面的讲话中言词激烈，挥斥方遒，而在后面这段讲话里则恳请之情溢于言表。他讲话完毕，大会正好午休吃饭。

原定大会下午通过一系列的决议，不料却变成了对叶利钦的发言与恳请的批驳会。这一切看起来像是经过了精心策划，发言者的口径如出一辙。11 位发言人中只有 1 位或多或少地为叶利钦作了辩护。抨击叶利钦最厉害的是叶戈尔 · 利加乔夫。

利加乔夫拿着事先准备好的讲稿走上讲台。他的讲话大都是照本宣科，时常抬头注视一下听众，不过他很会演讲。他的语调、他的停顿、他讲话时的总体风度都极具感染力。尽管他竭力控制着他的腔调，但听众还是能从中体味出他难以自抑的感情冲动。

他的言语更是把他的情感表露无遗。他没有对叶利钦具体的观点做评述，而是直接攻击他本人，还不时沉湎于为自己作一些不言而喻的辩护。所有这一切都颇费心机，其目的就是要唤起作为他的听众的主体——官员们的注意。

他一上来就声称，让他来对此事发表看法，他感到痛苦。这倒不是因为对自己的工作进行辩护他有些惴惴不安。他所感到痛苦的是，正是他一手把叶利钦推上了莫斯科第一把交椅的宝座，并说这是他所犯的一个严重错误。他接着指责叶利钦在来莫斯科之前就犯有严重读职罪，他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实行配给制是他严重管理不善所致（这个指责后来证明是不正确的）。他在讲话中说了句后来家喻户晓的话：“ 鲍里斯，你错了！ ”在这句话中他用了俄语中作为呢称的“ 你 ”来称呼叶利钦，这一称呼一般只在政治局成员私下聊天时才使用，他用在这种公开场合，似乎是为了表达一种居高临下和公然挑衅的心理。

最令利加乔夫不能容忍的是，叶利钦批评党拒绝改革，批评党坚持享有不应有的特权。他花了很长时间为自己给“ 社会主义 ”所做的一切努力以及在环境恶劣的西伯利亚时对党的忠贞不渝大吹大擂。他认为叶利钦在政治局例会上一言不发，而在这里却作出这样的指责，这是“ 极为怪诞的 ”。

在他回到座位上时，大厅里长时间地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毫无疑问，代表们最后拒绝为叶利钦“ 翻案 ”。

利加乔夫发现他的讲话很明显地在与会代表中引起了强烈的［130］共

鸣。然而，当晚收看电视的观众却对他的讲话很不愉快。他们这些观众知道党的官员享有很多特权，这位想糊弄他们的利加乔夫算是老几！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是在为谁说话？叶戈尔·库兹米奇又是在袒护谁？他们心中都很清楚。

很快，年轻的商人们套用了利加乔夫那句名言，在生产的纽扣上用俄语印上“叶戈尔，你错了”！

迈向真正的选举

利加乔夫虽在党的大会上赢得了对叶利钦的胜利，但他的威信却每况愈下。他对政治改革的反对使得戈尔巴乔夫解除了他事实上作为党的二号人物的职务。

戈尔巴乔夫通过分化对手，通过在自己的某些建议上作些让步，通过利用党向来支持领导人做出的决定的传统，赢得了苏共大会对政治改革的正式支持。一些代表虽表示反对，但戈尔巴乔夫控制了大会最后的选票。这次大会之后，戈尔巴乔夫继续扩大优势。9 月份，在急迫投入苏联历史上第一次真正选举的准备活动之前，他在党的上层结构里策划了一场大改组，并重新分配了各自的职责。

党的书记处不再作为一个机构定期开会，利加乔夫的会议主席一职也自此结束，给他安排了一个含糊的差使，去监管农业生产。切勃里科夫的克格勃主席一职也被撤消，安排他去负责党的一个委员会，监督警察和犯罪审理制度。这些新委任的工作听起来都很重要，而且拒绝有能力胜任的职位有违党的传统“伦理道德”。

这次改组有两个目的：其一，党的高级官员再也不能轻易直接干预政府的工作；其二，进一步清除了阻止改革者的组织基础。新成立的党的各级委员会除了颁布一些冠冕堂皇的命令之外，不再行使实权。它们的工作几乎无人注意，政治上其主席一职已被架空。[131] 戈尔巴乔夫由于没能向党的领导层引进足够数量的改革者，只好决定削弱党的领导。当然，他不可能公开挑明这一点，赫鲁晓夫就是前车之鉴。他不得不装作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党的工作更加富有效率，使党能真正起到决定政策的作用，从而把一些琐碎烦人的日常管理事务交给政府部门中不重要的角色去处理。

我与官僚机构打交道已非一日，深知“决定政策”的机构若无权干涉执行政策的机构，那它只是个绣花枕头。我不知道是否有人真正讨论过这个问题。

1988 年整个秋冬，苏联人都在为有史以来真正的选举作准备工作。各委员会都基于苏共大会的决议精神草拟了选举细则,并于 12 月上旬由只起橡皮图章作用的原来的最高苏维埃以法律形式予以通过。

这些细则旨在对政府结构进行根本性的改变。国家最权威的实体一直是最高苏维埃，正如名称中所示，理论上也应是“最高的”。其主席团主席是名义上的国家主席。

然而，在实际运作中最高苏维埃与其说是个真正的组织机构，还不如说是个舞台。它的成员都身兼他职（常常是要职），他们每年定期开两次为期三两天的会议，例行公事般地通过事先草拟的一些建议。这些成员都是从共产党机构事先准备好的单一候选人名单中“选举”出来的。

因此，最高苏维埃所行使的职能纯粹是走形式。真正的决策者是把书记处当作它的差役的党的政治局，它只简单地把立法权移交给最高苏维埃以便

它通过已经作出的决策。因为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大多是共产党员，他们必须服从党纪党规，在这种情况下，最高苏维埃不可能独立行使其职能。

这些细则为一个全新机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建立创造了条件，该机构将由 2250 位成员组成。1/3 的成员按地理区域选出，这与美国的议会选区相似；另 1/3 选自各联邦共和国内〔132〕的“民族”地区以及其他形式上自治的实体；最后的 750 人则选自“公共组织”。细则中最重要的是采取多名候选人互相竞选以及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来进行选举。

这个人民代表大会按常规一年不定期召开两次会议，为期数天，它还要从其成员中选拔出各由 271 名代表组成的小规模两院制最高苏维埃。这些代表作为专职议员不担任他职，但要“轮换”。轮换的比例是 1∶5，这样每年都有新面孔进入两院。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人数与美国参众两院的总人数非常接近，这也许不是巧合。拥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23）这个新头衔的国家元首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接着，由他来任命一位总理，不过，他的任命得由代表大会通过。然后，由这位总理来提名部长候选人，他们的任命由最高苏维埃来通过。从理论上来讲，这种任命方式与美国内阁官员及其他高级职务的任命需由参议院确认很相似，区别仅在于，苏联官员的任命要由全体苏维埃而并非仅由其上院来确认。

我们在使馆一边怀着极大的兴趣跟踪大选的准备情况，一边向华盛顿发回众多有关事态发展的报道，所有这些报道令苏联问题专家感到耳目一新。我们似乎要第一回目睹一次任何人都将无法预测其结果的苏联大选。

1988 年年底，在我评估这些新结构、新规章的意义时，脑海中产生了如下几点想法。

首先，这是一个非常繁杂的、甚至原则上都算不上完全民主的体制。1/3 的代表从共产党控制的“公共组织”中挑选，即使所有其他的选举是公正进行的（而且对这种公正，任何讲究现实的人现在还很难预料），也会出现导致人代会中共产党代表占主导地位的结果。而且，这一规定违反了“一人一票”的选举规则，因为依照此项规定，任何一位市民都可在他或她所归属的所有组织里进行重复投票。大选后，我的一位朋友就对我说他努力投了六次票，而且都是合法的。他以市民身份投了一次票，之前他先后在艺术家协会、艺术学院、老战士协会、友谊协会以及和平委员会投了〔133〕五次票。

其次，立法机构的间接选举给人为的操纵提供了额外的可能性。苏联宪法臭名昭著的第六条规定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指导力量，是苏联政治制度的核心”，这规定当时还是白纸黑字，行之有效。它使得党的领导人可以根据他们的喜好来操纵立法人员的选举。

尽管如此，如果了解一下新规则，哪怕是其中一部分，就会知道苏联公众将可能有史以来第一次行使选举权。即便大多数候选人是共产党员，但他们也不得不参加竞选，如果投票是不记名的，且选票的计算是公正的，那么那些不受欢迎的候选人就有可能落选。

意欲反对当时“体制”的选民们被赋予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规则要求每一位获胜的候选人获得的选票须过半数，不以票数多少为准。选民可以对所有候选人投“否决票”。这样，即使党控制了提名过程，但如果它所提名的候选人不受欢迎，人们也可以把他否决。苏联选民将拥有一项众多美国人梦寐以求的权利，那就是有权“不选名单上任何候选人”，然后还把选票捻成小棍。

当然，这次选举能否带来真正的变化，取决于两个当时还没有答案的问题：其一，这次选举是否是真刀真枪地进行，或者说这次选举是否还像以前那样操纵在共产党官僚手中；其二，这次选举选出的机构能否不受党的官僚们的干预。

我确信戈尔巴乔夫一定会努力带来某些真正意义上的变化。但很明显，阻碍他改革的最大障碍来自根深蒂固的党的官僚机构。他若一如既往地坚持改革，并维持最低的工作安全系数，就需要创建一些替代性机构。

新人代会的设计似乎就有这样的考虑：迫使顽固的党的官员们接受无记名投票，以此给他们带来压力。鉴于戈尔巴乔夫当时在民众中所享有的知名度，不管这种投票选举采取什么样的民主方式，他都会赢得新一届最高苏维埃主席之职。这样，他就不会轻易像赫鲁晓夫那样被党内一小撮敌对集团所推翻。

尽管改革者以及大部分市民对叶利钦被党代会除名抱以同〔134〕情，但许多知识分子都认为他是个政治阴谋家，不可信赖。同时，针对苏共大会上出现的投票表决反叶利钦一事，他们更多是指责利加乔夫，而不是戈尔巴乔夫。事实上，叶利钦已开始在民众中失去光彩，因为戈尔巴乔夫现在掌握着改革运动的主动权。

1988 年年底的民意测验表明，有 55%的人认为戈尔巴乔夫获“年度人物”奖当之无愧，而认为叶利钦有资格的只有 4%。看起来，戈尔巴乔夫最终站在了激进改革的前列，他已把如利加乔夫和切勃里科夫这样的保守派搁置一边（尽管不是完全这样），开始实行他的民主化进程计划。虽然经济失调、商品短缺的现象有增无减，但人们谴责的是雷日科夫政府和党僚们，而不是怪罪戈尔已乔夫。

在帝国的边远地区，这时不满情绪已开始抬头，有些还带有民族主义色彩。尽管这是令人头痛的事情，但在 1988 年年底，这种情况对当时的戈尔巴乔夫来说，还是可以控制的。

对外政策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戈尔巴乔夫的重头戏。他在外交上的努力已开始结出累累果实。这一年，他在外交上的那些成就在国内也是家喻户晓的。

第六章〔135〕“人类的共同利益”

我们完全有理由拒绝承认在和平共处时期存在着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 1988 年 7 月①

我们的出发点是国际关系中的阶级特性。

……积极参与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不应成为阻止社会与民族解放斗争的理由。

叶戈尔·利加乔夫 1988 年 8 月②

武力的使用或武力的威胁不可能、也不应是对外政策的手段，这一点勿庸置疑。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于联合国 1988 年③12 月 7 日

1987 年 5 月下旬一个温馨的夜晚，斯帕索别墅的主会客厅里宾客盈门，人们聚集在巨型吊灯之下谈笑风生。一位美国新闻记者走到我面前说：“我刚才遇到了我平生最奇怪的事情。我的一位苏联朋友在电话中向我打听是否有一架外国飞机降落红场。这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刚才路过红场的时候我特意停下来看了看，天哪，真有此事。你知道，一架塞斯纳正停在那儿，所有的人都不让靠近。从标记来看像是德国飞机，但当我问一名士兵这是什么类型的飞机时，他茫然地盯着我，只喃喃地重复了句‘什么飞机？’”

这就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一事件的过程。一位名叫马蒂亚斯·鲁斯特的 19 岁西德青年驾机从汉堡起飞，并即兴降落在克里姆林宫宫墙前面。

对于外国人来说，在莫斯科生活真是索然无味，有时简直令人沮丧。这个德国小伙子竟大胆巧妙地躲过了自负甚高的苏联防空部队之监控，此事一时成了无数鸡尾酒会上的笑资，要知〔136〕道苏联防空部队连迷失方向的客机都敢击落。不但外国人对此津津乐道，连苏联市民也取笑他们穿军装的部队的狼狈。这些军人在公众面前趾高气扬，高傲自大，人们禁不住总想挖苦他们一下，杀杀他们的威风。而且，一架塞斯纳毕竟不能算是一种军事威胁。

因此，当我在随后的一次聚会上听到苏联人自己取笑这件事时，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在那次聚会上，我遇到了苏联外交部美国处处长维克多·苏霍德雷夫，他以给苏联领导人担当高级英语翻译而出名，他在招呼我时问我：“你听说了吗？人们已把红场给改名啦。”

“不是开玩笑吧！改成什么名字了？”

“噢，当然改成谢列梅捷沃 3 号啦。”谢列梅捷沃 1 号和 2 号是莫斯科附近的两个国际机场。

驯服军队

我不太清楚戈尔巴乔夫是否也拿鲁斯特的恶作剧来取笑，但自己国家的防空系统如此漏洞百出，他不太可能对此幸灾乐祸。不过，这件令人尴尬的事情正好发生在政治局势微妙的时刻。当时在制定更加合作的对外政策方面，军方是主要阻力之一。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没有按照惯例让国防部长谢尔盖·索科洛夫元帅享有完全的政治局成员地位。这本身就在暗示，军队起的作用将不会再像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时期那样重要，此外，戈尔巴乔夫

当时还玩弄一些新颖的但却语焉不详的概念，如“防卫充分论”。

鲁斯特的恶作剧给戈尔巴乔夫提供了一次对苏军领导层进行大换血的机会，并进行得非常迅速。德国飞机是 5 月 28 日降落红场的，而戈尔巴乔夫在两天后，也就是 5 月 30 日就撤换了国防部长索科洛夫，接着又撤换了防空部队司令员及其他一些将军。在选拔新的国防部长时，戈尔巴乔夫沿用古老的政治手腕来培植亲信。他没有看上很多老资格的军官，而是擢任了一位级别很低的将军。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有充分理由相信，这次意想不到的晋升会确保这位德米特里·亚佐夫将军死心塌地对他忠心耿耿。

这位亚佐夫将军 63 岁，面孔黝红，棱角分明，身高 6 英尺多，〔137〕说话直来直去，不过性格随和。他后来曾告诉来访者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使他彻底地改变了看法。1986 年以前，他认为核战争可以打，可以赢。然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使他相信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一个国家即使没有使用核武器也会被毁灭，因为常规武器对核电站的袭击就可以将整个国家夷为寸草不生之地。

这一时期，苏联军方另一关键人物是总参谋长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他与亚佐夫同龄，但官职比他高。当他被封为苏联大无帅（等同于美军五星上将）时，亚佐夫还只是个三星上将。尽管他在国防部中要听从亚佐夫的调遣，但与戈尔巴乔夫更为亲近。这位军方要人是参加与美高级军控会谈的苏联高级军官，并在其中扮演着主要角色。

阿赫罗梅耶夫地地道道出身士兵，逐级晋升。他在会谈中回忆起他第一次打仗时的情形，那时他还是个海军下士，参加二战开始阶段的列宁格勒保卫战。他一点也不夸张他说，他从军的第一个冬天有一个晚上是在没有遮盖的壕沟里度过的。他很快接受了新的委任，升迁很快，在二战快结束时已是一位坦克营的营长了。

战后，他不断被委以越来越重要的指挥任务，其中包括远东军区的指挥资格，这似乎是担当总参谋长一职的必由之路。之后，他又在莫斯科担当最高领导职务达 10 多年之久，这中间有一短暂的间隙，那是在 80 年代早期，他奉命指挥驻阿富汗的苏联军队。

阿赫罗梅耶夫坚决拥护苏联政体，反对削弱中央控制。他诅咒共和国内的民族运动，按照他自己的理解，这种民族运动是背叛祖国的行为。他对共产主义制度表示满意，也接受人民控制军队的原则，同时也是军队荣誉的热情捍卫者。当新闻界对军队进行狂轰乱炸时，他以最强有力的声音为军队辩护。

〔138〕在同我们打交道时，他所关心的重点是确保任何协议都是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则。如果裁军对双方的影响是同等的，那么他就表现得很理智；倘若他认定苏联要付出更大的牺牲，那么他就会采取拒绝的态度。事实上，苏联因其过分庞大的武器库有时必然要比西方多销毁一些武器，可惜他有时不欣赏这样的观点。当然，如果戈尔巴乔夫需要或希望达成某项协议，阿赫罗梅耶夫也愿意帮忙，不过得克制他自己的想法。

即便是在保守的国防部时，阿赫罗梅耶夫的观点也是强硬的。不过，避开他的观点不谈，他本人倒是在打交道的过程中结交了不少西方朋友。他为人很有风度且风趣幽默，他总是设法让别人明白他的观点，对于别人的观点他也乐于倾听。他可以满腔热情地投入到谈判之中，而不带任何个人感情的纠葛。久而久之，他与谈判桌上的我们发展了轻松愉快的个人关系。

随后的两三年里，亚佐夫—阿赫罗梅耶夫联盟（这两个人个性差别太大，说是联盟未免有点勉强）辅佐戈尔巴乔夫，非常融洽。一方面，他们的军绩无可指责，即便是手下的军官也是如此。另一方面，他们愿意控制自己的情感以配合戈尔巴乔夫，维护国家宪法赋予他的政治权威。无疑，他们会在与苏军设置有切身利害关系的政策上进行争执，但一旦戈尔巴乔夫作出决定，哪怕是与他们的观点相异的决定，他们都会支持他，并帮助戈尔巴乔夫做好工作，不让军队中潜在的不满因素失去控制。

苏联的将军们原则上并不反对改革。当苏联在技术进步方面已经落后西方的时候，他们不会看不到苏联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军备竞赛尤其压得苏联透不过气来。这些将军们感到这种落后的局面今后将会更加严峻。从某种程度上说，数量根本不可能弥补质量上的问题，虽然他们明白这一点，但他们并没有停止为谋求尽可能多的数量而施加所能施加的压力。

70 年代时，我曾问我的苏联朋友为什么他们的军官们追求如此巨额的数字优势，他们部署了两倍于北约的坦克，两倍多的大炮以及更多的武装士兵。难道他们没有想到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139〕会因此认为这是一种威胁吗？这种想以绝对的军事优势来建立霸权主义的企图不是昭然若揭吗？

那时，谨慎的苏联市民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往往是否认事实：“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的比你们的多？你们武器布置得比我们的多！你们给我们造成了压力，而且你们还威胁要进行核战争。 ” 如此等等。多一点精细分析的人们虽然不会否认事实，但却找个借口让人予以谅解。

“ 想想看，你们应理解，我们这种神经质是历史的遗传。历史上每当我们拥有与敌人同等力量的时候，我们总是输掉战争。常常在战斗开始之时，我们在数量上处于优势，可是最终还是逃脱不了失败。库图佐夫的兵力比拿破仑多多了，然而，这个小矮子还是打到了莫斯科。日本人在 1905 年只用了很少的一部分人就打败了我们。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不但兵力上比德国和奥地利总和还多，而且在拥有的大炮门数上也占有优势；二战时，我们拥有两倍于韦尔马赫特的军队，装甲车和飞机的优势就更加明显了，结果还不是他妈的险些失败。

“ 事实是，我们俄国人对我们的士兵无法予以充分信任，对我们的装备能否与德国的或是美国的相抗衡尤其不抱信心，也许只能对付对付中国而已。因此，如果在军事上保持同等水平，我们是没有安全感的。 ”

每当听到这样的辩解，我总是试图解释说这借口不能令人心悦诚服，他们装备的武器质量以及他们推行的军事路线只能说明一点，即本质上不是为了防卫。

不过，他们这种辩解确实是受到了一些历史事实的影响。勿庸置疑，在过去苏联军事力量薄弱时，其军事领导人在军事开销上大做手脚，以扩大军费在财政预算中的比例。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他们在这方面登峰造极，政府领导人了解，通过这种慷慨大度可以在苏军中建立他们的名望，树立他们的威信，因此他们对军队总是非常大方。

然而，一块发霉的馅饼，哪怕切得再大也不会勾引人的食欲。因此，只要经济改革不损害军队的利益，将军们理所当然要采取支持的态度。

戈尔巴乔夫则进退两难。要想恢复经济活力，他不得不牺牲军队的特权；要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以便集中精力进行国内改革，他不得不改变苏联军事学说。说得直接一点，如果戈尔巴乔夫欲〔140〕使改革在国内得以进展下去，

他就不得不取得美国和北约的信任；只要西方认为苏联的政策及其军事力量构成了威胁，那么戈尔巴乔夫就无法推行他的改革计划。勃列日涅夫同化了将军们——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是将军们在精神上同化了勃列日涅夫以及他的幕僚——不管是哪种情形，总之，他们的关系是一种共生关系。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想法打破这种习俗，以便他的行动能够不受将军们的干扰。

可以期望亚佐夫和阿赫罗梅耶夫配合戈尔巴乔夫的政治领导，但他们决不是只执行上级命令的傀儡。实践证明他们坚决维护苏联军队的利益，在谈判桌上很难让他们作出让步。不过，当政府决定裁军、决定从外国撤回军事基地时，他们还是执行了，没有公开反对——这种局面至少维持了几年时间。

1988 年，美国国防部长弗兰克 · 卡卢奇相继于春天在瑞士会见了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在 8 月份访问了莫斯科和几个苏军基地。之后，美苏军官数度互访。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应美海军上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威廉 · 克罗之邀在夏天访问了美军几个设施，克罗之后作了回访。

这些接触给苏联军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阿赫罗梅耶夫从美国返回之后，有一次他在斯帕索别墅与我共进午餐，席间他对我说美国热情的招待以及美国军队的现代化程度都给他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在参观美国航空母舰时，他对它的巨大威力充满了敬畏。虽然，想象中他知道存在这样威猛的航空母舰，无奈他以前无缘亲眼目睹，因为当时的苏联海军中还没有与之相匹敌的设备。不过，他说这次出访美国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是在俄克拉何马的布里斯营地的所见所闻。

他因以前当过坦克营营长，所以对当地的坦克演习兴趣盎然。演习完毕后，官兵们列队等候视察。阿赫罗梅耶夫走到一位浑身仍然满是泥土的坦克指挥官面前，停了下来。他问道：“ 少校，你知道我是谁吗？ ”

“ 知道，长官。 ” 他答道。

“ 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吗？ ” 阿赫罗梅耶夫接着问道。〔141〕这位年轻的少校回答道：“ 不知道，长官。但你能来这儿我们很欢迎。 ”

话语中没有敌意，也没有帝国侵略野心，有的只是作为一个职业上的同事之间的对话。

这不是阿赫罗梅耶夫最后一次美国之行，但这无疑是他终生最难以忘怀的一次访问。他的继任者米哈伊尔 · 莫伊塞耶夫将军继续保持着这种联系，他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克罗的继任者科林 · 鲍威尔也建立了亲密友好的关系。双方军队的下级军官的联系就更加频繁了。

如果据此认定双方军事领导人（或者为了同样目的的政治领导人）个人之间的接触会自动带来和平，那是天真幼稚的。历史上许多冲突，包括我们的南北战争，都证明这种接触有时反而带来了恰恰相反的结果。但是，不管怎样，两国军事领导人之间迅速形成的彼此间的了解与尊敬，事实上已经在双方的军备削减谈判中起了一种润滑作用。对手已不再像军事情报部门提供的 “ 人物简介 ” 里介绍的那样云山雾罩、不甚了了，而是有血有肉、同样面对着许多职业上问题的活生生的人。双方都发现——不一定出乎他们的意料，但这消除了所有疑虑——对方也认为可在不迫降或不受辱的任何情况下避免北约与华沙发生冲突这一最坏的结局。

一旦人们对此确信不疑，那么只要没有政治家的干预，其他一切都可通过谈判来解决。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戈尔巴乔夫有充分的理由来寻求与西方的暂时和解。西方所担心的是，他如此迫切地要求改进对外关系是为了将

来的挑战而赢得时间与力量的一种策略呢，还是为了对苏联教条主义进行根本性的改变？

苏联军事学说的改变始自 1988 年。以前的军事思想是基于这样的概念，即以攻击行动来“抗击侵略”。举例来说，按以前的理论，当战争在欧洲爆发之后，苏联将立刻向英吉利海峡进军。苏联这种战争规划以西方“侵略”为前提。事实是这一前提只是一〔142〕种自我安慰，如果苏联政治当局决定发动战争，什么军事路线、军事训练、军事部署都不起作用。

1988 年与 1989 年这两年，苏军参谋人员开始使戈尔巴乔夫早在 1986 年就使用的一个模棱两可但富有启发的术语具体化，“合理充分”渐渐变成了“防卫充分”。这一术语被进一步解释为威慑敌人战略进攻并击退来犯之敌至边境为止所必需的军力总和。

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从美国返回后，在一份军方报纸《红星报》上撰文，称苏军中至今仍有很多人是“旧观念的囚徒”，他自己极力主张以武器质量的提高来弥补其数量的削减，主张改变军事训练指导思想，以适应一种纯粹的防御理论，而且，他还认为苏联军队机构的精简也应付诸实施。④

一些变化很快在苏军的训练与演习中体现出来。但除非对军队进行大幅度削减，军事部署有根本性改变，否则这些进展很快就会付诸东流。不管怎样，与假想敌保持同等水平军事力量的观念在 1988 年底已经失去了思想基础。军事学说的这种变化明确表明苏联承认在核时代试图维持军事力量优势是危险的。没有认识上的这种转变，是不太可能达成即将到来的裁军协议的。

阶级斗争与历史的“垃圾箱”

只改变军事学说还不足以使西方相信戈尔巴乔夫真心准备结束冷战，尚需其他方面出现转变。其中最重要者莫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阶级斗争理论是列宁主义者的国家结构演进观及同西方发生冷战所依据的中心概念。没有它，冷战的理由就不复存在，一党专政的理论基础也就随之消失。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基于各自在生产方式中所处的地位，社〔143〕会被分成了不同的阶级。各阶级为在社会中取得支配地位，注定就要发生斗争，而最终的胜利者将是人数众多并处于被剥削地位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在此基础上，它将建立其对社会的专政，消灭其他阶级，最终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天堂。

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唯一权威代表被赋予对全社会实行专政的权力。可以想象，1917 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的苏联就是如此，只是纯粹的共产主义阶段尚未来到，但曙光常在。

用这条阶级斗争理论来处理与非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关系，其含义是很明显的。这些国家可能还处在“资产阶级”或“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之下，这种统治注定要被胜利的无产阶级所推翻。因此任何与非共产主义政府的联合或合作安排只能是暂时的，一旦其策略依据消失，就要摈弃这种联合或合作。核时代所需的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在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的结束，只是表明当时有必要采取战争之外的斗争方式。

70 年代，西方与苏联之间曾出现过短暂的缓和期，即使这时，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也向苏联公众清楚表明，1972 年反弹道导弹之类的军控协议的签订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理论有所改变。那时经常出现的口号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没有什么缓和期”。虽然上层官员在亲近属于“资产阶级”的西方人，

但是苏联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是封闭的，政府采取措施防范西方思想的腐蚀，如严禁出国旅游，控制新闻媒介，干扰外国电台广播，等等。

不仅如此，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观念还为支持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革命斗争以及 1979 年进军阿富汗提供了决策的理论基础。尽管现实与这个理论并不相符，但上述行动却被勃列日涅夫集团看作是为了阶级的团结而采取的，因而也是合法的行动。如果上述行动能够成功，那就会增强他们的实力，提高他们的威望。他们认为这是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要他们实现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愿望。

由于亲身经历过苏联 70、80 年代坚持阶级斗争理论所带来的后果，我注意到了逐渐修正或废除这一理论的种种迹象。在这一〔144〕理论真正由官方抛弃之前，表明我们之间关系好转的任何变化都可能是虚幻的，最多也是暂时的。只要共产党坚持阶级斗争不放，就很难想象共产党会轻易放弃政权上的垄断地位，或者容忍党内派别羽翼丰满。因此改变苏联国内政策的风险很大。

一开始，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三人总是含蓄地采取行动，以削弱这一理论，仿佛是故意避开直接的辩论。政策上的变动隐含在“ 新思维 ”这个模糊不清的词语里。它的确切含义有待于一步一步的剖析才会清楚。但是到了 1988 年夏，随着雅科夫列夫与利加乔夫在国内问题上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辩论终于走向了公开化。

谢瓦尔德纳泽 7 月就国际事务召开了一次由苏联高级外交官和学者参加的吹风会，主要是告知与会者苏联在其外交方式与实质内容上的一些变化。这次会议不让外国人参加，但《真理报》登载了谢瓦尔德纳泽开场白的概要。7 月 26 日吃早饭时，我打开《真理报》，很快浏览了该文。下面这段话一下子跃入我的眼帘：

（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在他的讲话中说，新的政治思维要在核时代的现实环境中考虑到和平共处。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在和平共处时期不存在什么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

所谓的共处是建立在不侵犯他国领土、尊重他国主权及国家独立、不干涉内政等等这样一些原则之上的。它不能等同于阶级斗争。两种对抗性制度的斗争已不再决定当今时代的走向。现今，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依靠先进科学、现代化设备和尖端技术来加快物质财富生产与合理分配的能力，以及我们开发和保护那些人类生存所必不可少的资源的能力。

我一直孜孜以求的东西终于呈现在我的眼前。阶级斗争这个决定对外政策实质的理论被官方人士宣布予以放弃。如果苏联领导层普遍接受这个改变，那么在未来的几个月内，我就可以听到其他领导人，当然包括戈尔巴乔夫，发表类似的言论。

然而，事与愿违，谢瓦尔德纳泽的立场非但没有得到加强，反〔145〕而出现了驳斥的言论。就在外交部那次会议之后不久，利加乔夫访问了高尔基，这是位于伏尔加河上的一座古城，因它是该地区国防工业的中心，所以禁止外国人参观。传统上该城称做下诺夫哥罗德，不过至今还未恢复旧名。利加乔夫利用这次访问的时机发表言论，驳斥谢瓦尔德纳泽的观点。《真理报》8 月 6 日报道了利加乔夫的讲话，利加乔夫在讲话中最直言不讳地维护着“ 阶级斗争 ”这个传统思想：

我们的出发点是国际关系中的阶级特性。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其他解释

只会造成苏联人民以及国外朋友们的意识混乱。积极参与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的解决，决不能人为地用来作为停止社会和民族解放斗争的理由。

利加乔夫是想鱼和熊掌兼而有之：方便时就一起解决“共同问题”，平时只要有可能就推行冷战策略。

外国大使们一般不把一场意识领域里的争辩写进自己的报告里，这不是一个合适的话题。尽管我们的使馆人员向华盛顿详细地报道了莫斯科在意识领域里的辩论，但似乎只有研究共产主义事务的专家们给予了重视。对于天性讲究实际的美国政客来说，这种争辩没有什么意义，只不过是穷究一些深奥的理论问题而已，与真实生活没有明显的瓜葛。在他们看来，这种争辩就像中世纪神学家们的唠叨，不会伤及他人，只是徒费时间而已。讲究实际的人们最好不要理睬。

在这种态度下，我们从未接到任何指示，要求我们同苏联官员一起探讨或阐明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些观点，不过，我们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只是，我总觉得这场辩论的结果将会决定事态发展的命运。我想让苏联领导人知道我们中有些人对事态的发展非常感兴趣，并认为其结果将会影响我们对戈尔巴乔夫改革诚意的信心。因此，我决定下一次遇到谢瓦尔德纳泽时一定与他探讨这个问题，不是作为官方的探询，而是个人之间的交流。

事有凑巧，为了向谢瓦尔德纳泽传递国务卿舒尔茨的一些口信，我在 8 月 8 日就与他见了一面。会见是在晚上进行的。这时，谢瓦尔德纳泽不像白天那么忙碌（他是出了名的夜猫子，常开夜〔146〕车）。我说完正事，就把谈话引向那个话题，并解释说向华盛顿阐明莫斯科发生的事情是我的职责，因此表述时我要力求精确。我说我已把他的有关阶级斗争的讲话作为一个可喜的迹象向华府作了汇报，可现在我又注意到了利加乔夫在高尔基的言论，我不知道他的观点是否代表着整个苏联领导层的看法。我请他帮忙，使我对目前的形势有个更清晰的理解。

谢瓦尔德纳泽向来不喜欢搪塞敷衍，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是有点不习惯与我进行讨论，这毕竟是国家内部的争辩，他在座椅里不自在地挪动着身体。他向我保证说戈尔巴乔夫的观点具有权威性，戈尔巴乔夫已明确说过他们压倒一切的任务是避免核战争。阶级斗争是在国家内部出现的东西。他评论说利加乔夫的言论肯定是指这个意思。

我根据《真理报》的报道向他说明，利加乔夫很清楚地指出阶级斗争是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指导原则”。于是，谢瓦尔德纳泽避开我的话题，间接地肯定了这种争论，他说道：“好吧，你们的政府领导人不也常常出尔反尔吗？温伯格与舒尔茨的观点有时就不一致。”他在最后向我担保说苏联政府对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争端抱有坚定的信心。

我向谢瓦尔德纳泽提及利加乔夫的讲话，目的并不是为难他，而是为了加强他在苏联国内这场辩论中的地位，不过前提是他得利用我的看法，向他的同僚们挑明说，美国了解这种争辩的含义，继续坚持阶级斗争理论会使两国之间的关系改善变得步履艰难，我认为这么做没有什么不妥。

究竟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当时心里也没谱。然而，就在一周之内，亚历山大 雅科夫列夫在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对利加乔夫的讲话作出了反应(没有指名）。他对这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重新做了明确的解释。他用哲学术语作掩饰，而且不时选用复杂的句型，不通过反复的阅读不能完全掌握它的含义。

而且，支言片语的摘引也无助于理解。下面引用的这段话是他争论的中心部分，我在翻译成英语时力求做到准确：

防止核威胁、以和平的名义裁军、以安全的名义相互信任与合作、关心人类的生存——所有这些都是当今世界所要完成的任务。但是如果我们在历史的范畴里进行思考，完成〔147〕上述任务只是公正地、民主地、合理地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其他问题的一个主要的、最根本的前提。这些问题包括：减少饥饿，维护生命赖以存在的地球环境，合理利用地球上远非取之不竭的资源。

人类共同利益不是哪一位思想家在象牙塔中通过苦思冥想而假设出来的抽象的哲学范畴。在我们这个时代，当整个地球似乎已小得不可思议之时，当人类的命运与历史只要按一下按纽就会结束时，当不用几个时辰全球 50 亿人便对某一事件家喻户晓时，这个人类的共同利益就是具体而又生动的了。

这些确是全人类的利益所在。这也是我们的利益所在，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部分，而且还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把人类凝结在一起的正是这些利益，这意味着它们能够超越几个世纪以来阻碍人类文明发展的那些力量，即分裂、矛盾、对峙以及战争。正是这种共同利益将使对立各方走到一起，因为当哲学的、抽象的、历史的分类与纯粹实践的、世俗的、日常经验的东西融合在一起之时，这种共同利益便使个人的利益融入到了大家的利益里。

因此，马克思主义是从历史观的角度、从所有人类发展的前景出发，是对人类共同利益的诠释。它不是只考虑哪一个国家或哪一个阶级、民族、社会团体的利益。它把那些受剥削的社会最底层的利益放在首位，并在特定的社会结构里将之单独作为一个阶级划分出来，以承担解放人类的历史使命，我们能说社会主义的谛造者们是以这个阶级的利益来对抗所有其他阶级的利益吗？当然不能。

优先考虑人类共同的利益，这个观点很有价值，因为它包含着发展的客观趋势。它要求放弃僵化的世界观、国家观、民族观。它有助于我们现实而又理智地把政体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共处看成是历史的要求，是国际主义者追求全球发展的体现。⑤

这是《共产党宣言》以及《资本论》中的马克思主义吗？用雅科夫列夫的话来说，当然不是。因为马克思的的确确把“ 无产阶级 ”的利益凌驾于其他阶级的利益之上。而且，这一基本理论还导致了他的许多其他错误。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这个〔148〕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 马克思主义 ”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 马克思主义 ”。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人类的确有它的共同利益，如果苏联领导人能认识到他们的利益也包含在其中，那么冷战就会成为历史。

一个平常的议程

当里根总统在 1984 年建议分 4 部分议程来改进与苏联的关系时，他指出，他的这个四点方案在政治上是相辅相成的，其中任何一点的顺利解决都会影响其他三点的解决。总统明白这种政治现实，即如果苏联入侵别国，美国参议院是不可能批准一项重要的军备削减条约的，就像如果苏联政府严重侵犯其国民的人权，国会不会同意取消贸易障碍一样。如果苏联社会依旧封

闭自守，要核实军备条约的执行情况就会更加困难。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 1985 年和 1986 年这两年里，美苏双方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加紧了对话。两国领导人在雷克雅未克非常接近于达成一项史无前例的裁军协定。虽然两国已经开始磋商地区冲突问题，但当时苏联军队仍在阿富汗作战。尽管戈尔巴乔夫在 1985 年的日内瓦首脑会议上同意放松普通市民与西方的接触，但却迟迟不予实施。像葛罗米柯一样，戈尔巴乔夫拒绝在人权问题上进行谈判，并称美国商谈这个问题的企图是对苏联内政的干涉，是难以接受的。尽管在雷克雅未克时戈尔巴乔夫的谈判人员同意人权问题是个合法的话题，但他们一连几个月仍在抵制我们为政治犯和被禁止离开苏联的那些人进行的呼吁。

然而，从 1987 年晚些时候开始，美苏会谈在各个方面开始全面开花结果。对于几十年来一直在就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与苏联打交道的人来说，变化速度之快，简直令人头晕目眩。下面是会谈大事纪要：

1987 年 12 月：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出访美国，参加在华盛〔149〕顿与里根总统举行的首脑会谈。他们签署了旨在销毁由中程弹道导弹运载的各类核武器的条约。从此将结束苏联 SS—20 型导弹对欧洲和亚洲的威胁。美国作为回报，将销毁用来对付苏 SS—20 的潘兴 II 导弹以及巡航导弹。

1988 年 2 月：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兵，具体实施的协议于 4 月份签订。

1988 年 5 月：里根总统出访莫斯科，并多次就民主、自由以及人权向苏联公众发表措辞强有力的讲演。

1988 年 6 月：修改规章制度，大大方便了苏联公民出国旅行；移民和私人旅行也因此直线上升。

1988 年 7 月：谢瓦尔德纳泽召开了一次苏联外交官会议，会上颁布了一项以人类的共同价值为基础的政策。

苏联媒介频频采访外国官员、外交人员，以及新闻记者；

春天，苏联学者批评过去政策的文章开始出现。

与西欧领导人接触频率加快，外国部长级官员屡屡来访，戈尔巴乔夫与各地各级政府领导人的接触也大大增加。1988

年 12 月：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的发言中宣布单方面削减一半苏联军队，保证把“人类共同利益”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基础。

罗纳德·里根 1984 年的议程为我们之间的谈判确立了未曾言明的框架，即裁军、消除在第三国的军事对峙、确保尊重人权及终止铁幕。当戈尔巴乔夫考虑使苏联实现民主化并将其对外政策建立在人类共同利益基础上等建议时，他能够将这些问题上的进展看成是“彼此的”目标。我们将不再玩“零和游戏”，即一方之得必是另一方之失。现在我们都能成为赢家。

因此，当戈尔巴乔夫开始就我们所拟议程上的问题进行谈判时，他并不是在屈从于美国的“要求”。他和他的幕僚们渐渐明白，这四点议程抓住了关键问题，而且，美国的建议也不会对和平的苏联造成伤害。

苏联在人权问题上态度的转变尤富戏剧性。整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初，苏联阵营违背国际公认原则是阻碍我们关系改善的主〔150〕要障碍。它对迁徙和移民自由的限制导致了美国 1974 年贸易法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的通过，该修正案不承认苏联的正常的贸易地位，除非它取消对移民自由的限制。

尽管勃列日涅夫一次又一次地修正苏联的做法以期获取美国的实实在在

的让步，但他总是断然拒绝把人权作为一个合理议题与外国讨论和商谈。

戈尔巴乔夫一开始也是坚持过去的立场,直到 1987 年才同意讨论这个问题，到 1988 年，人权问题完全列入了两国的议事日程。就在这一年 8 月，我拜访了谢尔瓦德纳泽，请求他释放在押的几名政治犯，他立即答应过问此事，并说要么顺利地释放他们，要么解释清楚为什么不能这样（我若向葛罗米柯作此请求，得到的回答可能是一阵怒斥，说我干涉了内政。这两者之间的反差是多么鲜明！）。而且，当时他还向我解释说，并非由于我的请求他才去过问此事，这与苏联的利益休戚相关。既然苏联领导人已决定要建立一个法制的国家，那么强调个人的权利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

我告诉他说这是有所作为的最佳理由。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向苏联施压，要求它对其国民的人权给予更多的尊重，这并不是想从中捞点什么好处，如果我们想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原则。苏联领导人已经明白了这一点，这预示着我们未来的关系将向好的方向发展。

朋友的面孔

戈尔巴乔夫出访美国也促使他愿意按照美国的议程来达成协定。这次出访中发生的一件事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

1987 年 12 月 10 日，这天是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逗留的第三天。戈尔巴乔夫邀请副总统布什到位于第 16 大道的苏联大使馆共进早餐。就这样，开始了这一天的官方活动。早餐后，按计划是戈尔巴乔夫在美国客人的陪同下，驱车前往白宫与里根总统会晤。〔151〕然而，早饭后，他们要求副总统与我们其他人稍候片刻，戈尔巴乔夫要与莫斯科通个话，摸摸底。我们曾向戈尔巴乔夫提交过一份声明，涉及与苏联先前的立场不相符合的战略武器问题，我们当时推测戈尔巴乔夫可能是在签字之前就此对政治局的同僚们作些澄清。

我们只好在一旁等候，等了许久，就是不见动静。他们没有告诉我们出了什么问题，只是说戈尔巴乔夫还没做好出发的准备。

我猜想他肯定是在等候政治局的投票表决的结果。

最后，他出来时已快正午了，我们的车队向白宫出发。我的车没有紧随戈尔巴乔夫之后，中间相隔好几辆车。突然，前面意想不到地一阵急刹车，车队停了。为了安全起见，车队一般都行驶得飞快。事先封锁了所有的十字街口，不让通车，车队可长驱而入，直达指定的目的地。可我们现在却在离白宫还有几个街区的康涅狄格大街上一动不动地停住了。

我钻出车，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六年前，里根总统就在离我们这儿只有几个街区远的地方遭到了袭击。当我看到从联邦调查局开出的几辆“导航”车与克格勃保安人员的车一个 U 形急转弯、护住戈尔巴乔夫的轿车时，我预感大事不妙。直到看见戈尔巴乔夫从车里走出，我才长长松了一口气。戈尔巴乔夫径直向人群走去，人们正成群结队地观看他的车队驶过。戈尔巴乔夫临时决定与这些善意的人们作一次面对面的接触。

戈尔巴乔夫同他们握手致意，不过只持续了几分钟，我们很快就上路向不远处的白宫驶去。在美国，领导人停下来向群众致意问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戈尔巴乔夫在国内也开始模仿这种姿态。我当时猜想这件事是事先策划好的，主要是想上上镜头，曝曝光（确实，第二天各大报纷纷在头版头条报道了此事）。

然而，后来我发现事实并不完全如此。那天，在白宫午餐期〔152〕间，

戈尔巴乔夫告诉我们说，这次接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戈尔巴乔夫在会见里根时说：“ 我今天上午看到的美国人民与别人告诉我的不一样。 ”这些美国人友好，开放，真诚地祝愿他。他深知这一切决不是事先谋划的，因他并没有事先透露他要在那儿停留。他看了看会谈桌对面的里根总统，接着说：“ 我想让你知道我将再也不会用老眼光看待美国人了。”尽管理智告诉他我们两国之间的某些问题只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解决，但他从内心深处明白，不论什么也阻挡不了我们成为好朋友。

这可能听起来有点天真或不自然。但我相信这是肺腑之言。

俄国群众感情不外露，不过，一旦愤怒时，他们的情绪也会变得很激动。每当戈尔巴乔夫走到他们中间时，他们常问些尖锐的问题，即便在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失去民心的时候也是这样。

而美国人却不一样。美国人民把他看作一个英雄或电影明星，人们向他欢呼，向他微笑，争先恐后要与他握手。吝啬感情的人们也许会对美国人这种狂欢的习惯产生怜悯之情，但戈尔巴乔夫清楚地感觉到这种热烈的情绪里藏着真诚的东西，那就是美国民众既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痛苦呻吟、备受蹂躏并决心砸碎枷锁的奴隶，也不同于苏联国内那些发誓要解放受苦受难者的好斗的军国主义者。在康涅狄格大街上看到的这一张张面孔闪烁着自由、富裕和善意的光芒。

这次即兴接触给戈尔巴乔夫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所见所闻与根植在他脑海中的陈旧的观念不相吻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不论过去还是现在，戈尔巴乔夫都喜欢这种盛大场面，喜欢被人们众星捧月般的围绕，渴望人群的欢呼。在国内，他对自己还没有达到众望所归的程度开始感到恼怒，并“ 遏制 ”像叶利钦这样比他更孚民心的政治家。在华盛顿以及此后在西欧各国首都，他都得到了他在国内无法得到的东西：敬慕的人群的崇拜。

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布什、撒切尔夫人、科尔、密特朗以及其他西方领导人都逐渐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这种关系更加强化了他从这次短暂的接触以及后来的接触中得出的重要认识。1987 年 12 月以后，戈尔巴乔夫不再把我们当作一个应予抑制、避开或安抚的敌对力量或潜在敌对力量来打交道，而是当作朋友对待。于是重心也随之转向如何实现我们的共同利益。

戈尔巴乔夫相信西方领导人的诚意，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克格勃提交给他的情报仍然没有忘记提醒他警惕西方的“ 帝国主义威胁 ”。

有人授权维克多 · 切勃里科夫和他的继任者弗拉基米尔 · 克留奇科夫在公开场合散布这种“ 帝国主义威胁 ”论。这两个人一向以给戈尔巴乔夫提交带有偏见的报告而在圈内臭名昭著，他们〔153〕在报告中故意夸大对整个外部世界尤其是对美国的疑虑。克格勃有关国情的歪曲报道使戈尔巴乔夫深受其害，幸运的是，戈尔巴乔夫对国外的发展情况形成了一个客观的评判尺度，并逐渐地依靠自己的观察以及西方不带任何偏见的信息来处理国事。

12 月在华盛顿与美国人民的短暂接触带给戈尔巴乔夫的感受，并非得到了所有同事的认同。在冷战结束之后，有一天，那位曾在裁军问题上不顾个人的伤感给予戈尔巴乔夫有力支持的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一次晚宴上向坐在他身边的我的妻子说，理智告诉他国家需要变化，但感情上却难以接受。在 1991 年 8 月，他的感情战胜了他的理智，支持了那场灾难性的政变。

一条新的“ 普遍原则 ”

以我们探讨过的上述国内大辩论为背景，东西方关系迅速实现了和解。戈尔巴乔夫在国内进行政治改革的决定，既要求也有助于同西方建立友好关系。毕竟，人们不可能在支持建立法制国家的同时依然抓住“阶级斗争”理论不放，正如人们坚持阶级斗争观念就不可能结束冷战一样。

利加乔夫尽管过去一直维护——现在仍在维护——“阶级斗争”观念，但他似乎并不反对苏联为改善与西方的关系而采取的大部分具体步骤。他与戈尔巴乔夫的分歧在于后者拥护政治体制改革，要求推行更加激进的经济改革措施。利加乔夫曾一度赢得了对叶利钦的胜利，但却正在输掉同雅科夫列夫的一场战斗。

戈尔巴乔夫 1988 年 12 月在联大会议上的发言标志着苏联这一年在国内外发展变化的顶峰。他单方面宣布削减苏联军队的举措，证明他已掌握了苏联军队。就在几个星期之前，包括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在内的军方高级将领还在坚持一定要经过谈判协商之后才能答应裁军，而且要求这种裁军必须是双方的。可见，当〔154〕时的戈尔巴乔夫已经完全支持把人类的共同利益作为其对外政策的基石，明确无误地抛弃了阶级斗争观念。

在他的这个发言里，还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选择的自由是条普遍原则；它不应该有任何例外。”⑥

真的是这样吗？假如东欧人民选择脱离华沙条约会怎么样？假如德国人选择统一怎么样？假如波罗的海三国或乌克兰或格鲁吉亚选择独立又会怎么样？

真是没有任何例外吗？

第七章边远地区的骚乱〔155〕

民族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在苏联已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1986 年 3 月 6 日苏联共产党第 27 届代表大会①

让那些喜欢玩弄民族主义或大国沙文主义偏见的人们不要抱任何幻想，不要期盼任何松动。

米哈伊尔 · 戈尔巴乔夫 1987 年 1 月 27 日

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②

有人宣称，在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上不存在任何问题……这已经导致了人们公开的不满，并不时升发为冲突。

1988 年 7 月 4 日苏共第 19 次大会③戈尔巴乔夫要考虑的问题太多，苏联国内的民族冲突不得不暂置一边。他不得不巩固他作为共产党总书记以及国家元首的位置，他不得不迫使他的同僚同意他的基本改革方案，他还不得不规划一条痛苦的经济改革路线。当然，他还不得不通过谈判赢得一个更加和谐的国际环境并从阿富汗撤走军队。他最后需要考虑的事情才是国内边远地区的民族反叛问题。

他本人也希望最后处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毫不奇怪，他一开始并没有力解决这个问题作出任何努力，直到民族问题开始摧垮他的时候，他才开始采取行动。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第一年，民族问题事实上并不严重。在乌克兰，由于弗拉基米尔 · 谢尔比茨基的高压统治，法院仍然继续给人权活动分子治罪判刑。4 月份，乌克兰赫尔辛基小组成员穆科拉 · 霍尔巴尔被判 8 年徒刑，外加 3 年流亡期；8 月份，伊奥西普 · 特雷尔亚因为替乌克兰天主教徒（他们的教堂曾被斯大林封〔156〕禁）的权利进行辩护而被判 7 年徒刑，外加 5 年流放。

长期以来，无数乌克兰人因为维护民族与宗教权利而遭到逮捕，这种严酷的判刑已不再令人瞠目。莫斯科所控制的机构一直在实行自 60 年代后期就开始实行的措施，只要有人胆敢怀疑其权威，它们就会把他们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

然而，在 1985 年下半年，这种局面开始有所转变。遭监禁的著名乌克兰持不同政见者维亚切斯拉夫 · 乔尔诺维尔在年底前从雅库特地区的劳改工厂被释放出来。他已三次因政治罪或被指控的刑事罪被捕入狱。到了 1986 年，在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为争取获得国际社会接受而共同努力期间，被释放出来的人更多了。

在苏共称之为“ 边缘区 ”的共和国，反对莫斯科的情绪迅速高涨。这不仅是因为释放了一些被定性为“ 捣乱分子 ”的人，也是因为几项重要进展使以前被压抑的不满情绪得以发泄出来。

其中最重要的进展就是提倡公开性，这是一个窗口，使得有勇气的编辑、记者和学者敢于涉足以前列为禁区的话题。一开始，只是零星的一两篇文章对党的一般性教条进行质疑，后来，当发现天并没因此塌下来时，写的文章就越来越大胆了。

“ 多一点曝光 ”变成了这些新近获得了自由的记者们和学者们的口号，这是 1987 年一部有影响的电影的片名，影片揭露了斯大林主义所带来的劫难。人们要求对过去的历史多一点曝光，对奥维廉“ 回忆 ”中不让进行公开讨论的黑暗角落多一点曝光，对执政党所犯的罪行和其推行的制度多一点曝

光。

尽管有利加乔夫不断升级的警告，尽管有戈尔巴乔夫企图控制他们的零星努力，但仍有一小部分意志坚决的编辑、导演、作家以及越来越多的学者坚持自己的立场。当他们没有遭受什么麻烦时，更多的人加入了进来。

我怀着惊讶的心情开始注视这种变化，长期以来，苏联的新闻媒介一直没有什么积极的东西，对此我已习以为常。

我是在 70 年代被派到莫斯科工作的，那时我很少读报，只是偶尔翻一些文学杂志，以增加对审查人员予以放行的作品的了解。如果报纸上出现什么重要文章暗示着苏联政策的变动，我的工作人员会及时提醒我注意。要不然阅读这种报纸简直是浪费时间。它总是登载一些人人皆知的东西，而且这些报道往往误导读者，文笔也单调乏味。

我于 1987 年 4 月返回莫斯科时，惊喜地发现情况已发生了很〔157〕大变化。当时苏联报纸在世界上虽然还谈不上最客观、最全面，但已变得生动有趣，非常耐看了。到了 1988 年和 1989 年，新闻媒介对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激烈辩论以及所辩论的话题都予以了报道，令人欢欣鼓舞。

这种新出现的新闻透明度使得公开性突破了原先的限制，开始向少数民族成员和其他利益集团提供令他们对现行体制极度不满的信息。教科书中被删除的整个历史片断逐渐公布于众；以前没有公开的斯大林的具体罪行大白于天下；人们开始讨论政府推行的工业发展计划和农业措施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连 1939 年纳粹德国与苏联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也成了争论的话题和历史研究的对象。

就这样，包括俄罗斯民族在内的苏联各民族开始恢复他们各自历史的本来面目。

阿拉木图：被误读的预兆

态度上的变化和所讨论的具体话题，各共和国都不太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抵制莫斯科政策的情绪越来越强烈。

1986 年 12 月，莫斯科派遣外地官员统治少数民族的做法第一次遇到直接对抗，地点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首府阿拉木图。年轻的哈萨克人抗议在该地区毫无根基的俄罗斯人根纳季·科尔宾取代哈萨克族的丁穆哈迈德·库纳耶夫，就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党主席一职。骚乱持续了两天。

当时，大多数莫斯科官员没有注意到这种警告，都认为是地方上对当时的反腐败运动的一种抵制。库纳耶夫之所以被撤换，是因为莫斯科认为他在哈萨克斯坦的共产党内编织了一个腐败网，当一个外地人被派遣来这里清除腐败现象时，这些贪官污吏们就煽动年轻人上街抗议。因此，这种民族问题虽然存在，但让位给了当时更为紧迫的腐败问题。

戈尔巴乔夫政府继承了安德罗波夫的原班人马，他们当时认为若想使得党或国家的改革取得成功，必须清除腐败现象，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在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这种腐败现象已经侵。〔158〕蚀到了党的最高层。但他们也认为民族分歧正在消失，一个涤除了不同民族特性的“新苏维埃人”已经塑造出来。

在 1986 年 2 月份的党代会上，利加乔夫强调有必要“在各共和国内实行干部交流制”，这意味着委派俄罗斯族官员去非俄罗斯族共和国担任要职。他委婉地解释说这是为了同已经“大权在握”的“地方裙带主义”作斗争。没有理由认为戈尔巴乔夫与利加乔夫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相左，因为利加乔夫

是代表负责人事政策的整个领导集体发表这番讲话的。

在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以及他的同僚们还没有认识到这种“地方裙带主义”和“腐败现象”在地方上却可能被看成是一种积极的现象，当地的民族希望用它来对付帝国中央的霸权野心。事实上，在自以为是的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许多非俄罗斯族的共产党领导人已经设法沿着民族主义的路线来改组地方共产党组织了。

这种现象之所以能发生，是因为这些地方上的党组织靠宣誓效忠党中央，靠奢华礼金的贿赂来收买中央，使中央放手让它们按照当地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旨意开展活动。这在法制国家里被看成是一种犯罪行为，但是这个苏维埃帝国不是一个法制国家。作为民族领导人，他们自然对遥远的、可憎的中央企图用异族来取代他们的亲信的做法感到不满，因为异族的领导人会搜刮走本该在当地进行分配的资源。而且，当中央派遣俄罗斯人来取代他们的腐败官员时，这些当地的民族精英们只要觉得有必要，就很容易靠呼吁民族团结来煽起他们的“群众”的情绪。

这就是 1986 年 12 月在阿拉木图所发生的一切。

库纳耶夫长期以来一直担任哈萨克斯坦的党领导，是勃列日涅夫的心腹。他身材高大，英俊潇洒，有着一双曾被德国总理科尔所特别强调的浓眉，外表酷似勃列日涅夫。他们两人的友谊要追溯到 50 年代，那时勃列日涅夫在阿拉木图工作，库纳耶夫成了他的门徒。勃列日涅夫成了一国之主之后，他让库纳耶夫作为他个人的心腹统治哈萨克斯坦。

1986 年的阿拉木图事件过后约 6 年，我在库纳耶夫宽敞的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寓所里访问了他。他对自己的“政绩”感到自豪，如数家珍般地摆出一系列的数字来夸耀在他当政期间工农业产值的迅速增长。

〔159〕谈话是在他的书房里进行的，我们坐在一起。他的这个书房里摆满了整套整套的文学名著，数目可观的作装饰用的打火机点缀其中（无疑，他的朋友们对他的爱好非常了解）。谈话中，我不时出现幻觉，怀疑我是被带到了神奇地存活到现在的勃列日涅夫面前。勃列日涅夫的藏品及他对书的品位可能与库纳耶夫有所不同，但他们在展示所受礼品以及炫耀塞满书架却没有翻阅过的书籍时所表现出来的得意如出一辙。勃列日涅夫的俄语讲演比起库纳耶夫的雄辩也显得弊脚一些。他讲话的主旨与以前一样：戈尔巴乔夫他们从来就不欣赏我们的成就，他们把我们推到一边，把整个国家搞得乱七八糟。

在哈萨克斯坦，库纳耶夫一直很受人尊敬，即使在了解 1986 年将出现变化的人中间，亦是如此。在他执政时期，哈萨克民族开始恢复元气。以前的集体化政策、强迫合并政策以及成千上万的非哈萨克民族在哈萨克传统的土地上定居的行为，曾给这个民族带来了一系列的打击。

看一看下面的数字就会明白：1926 年，哈萨克人占共和国总人口的 57%，但到了 30 年代，集体化的直接后果是每 3 名哈萨克人中就有 1 人或因饥饿，或因红军镇压反叛而死去。约有 20%的人为躲避杀戮而逃离哈萨克斯坦，其中许多逃亡到了中国。在二战期间以及二战结束时，该共和国的非哈萨克民族的人口增长了 300 万人左右，超出了哈萨克本民族在那里的总人口。

到了 1959 年，哈萨克民族的人口已降到了哈萨克斯坦总人口的 30%，而俄罗斯人却占总人口的 45%，比哈萨克人多 120 万。不过，后来哈萨克族

所占的“人口份额”慢慢地有所恢复，到了 1989 年，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哈萨克民族再次在他们自己的共和国里形成了多数：哈萨克人占了 40%，而俄罗斯人则占 38%。有两个原因导致了哈萨克族人口的上升：哈萨克家庭的高出生率和大规模移民的减少。

库纳耶夫也许与人口变化的关系不大，但他却为哈萨克共产党的“哈萨克化”做了大量工作。他一方面与本地俄罗斯居民维持轻松的关系，抑制任何宣传哈萨克“民族主义”的明显倾向；另一方面，他使共和国党组织的领导权悄无声息但却富有成效地转移到占共和国党员绝大多数的哈萨克人手中，并使他们担任了其中大部分的重要职务。

1961 年我第一次访问阿拉木图时，接待我们的是国民经济委〔160〕员会的高级官员。这个委员会是赫鲁晓夫为管理共和国的经济而建立的。当时与我们谈话的官员中没有一名是哈萨克人。但到了 80 年代，我们所接触的高级官员中哈萨克人有 3/4 或者更多。

库纳耶夫一面向莫斯科大表忠诚之心，一面却在培植哈萨克人担当政治领导，他的这种策略为精力充沛的哈萨克年轻人创造了机会。其中有一位年轻人就充分利用了这种机遇，他就是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

纳扎尔巴耶夫出身于一个贫穷的牧民家庭，他出世的那一年正是希德勒大举入侵苏联的 1941 年。他记得战争爆发以后，在他还很小的时候，他看见很多人从苏联其他地方逃难来到他的村子，他第一次听到了异族的语言。上小学的时候，他与他的一个叔叔住在一起，因为他的父母由于放牧集体农场的羊群，赶着羊群去了高原牧场。

高中毕业后，他决定在阿拉木图的大学里学习化学，但由于受党的高级官员子女们的排挤，他虽然是高分，但仍被拒之门外。他只好改学冶金学，并被派送到位于乌克兰的一所技术研究所去学习炼钢技术，准备学完之后到哈萨克斯坦北部铁米尔套城一家新建的大型钢铁厂去工作。这家钢铁厂是赫鲁晓夫庞大的“发展工程”之一。⑤

纳扎尔巴耶夫在这家钢厂里工作的时间不长，他很快被委派专职做党的工作。紧接着，他很快又晋升为铁米尔套市党委书记，之后又被认命为该省党的第二书记。他曾陪同前来该地区视察的库纳耶夫。此次视察之后，库纳耶夫提升他为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党的工业书记。

在那种“萧条”的年代里，提升的机会很少，纳扎尔巴耶夫神奇般的升迁只是个例外。尽管他本人富有才华，但他如此快速的擢升离不开库纳耶夫对哈萨克人的偏爱。到了 1986 年，他成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总理，是苏联最年轻的共和国总理。⑥这时，他已经有资格竞争该共和国党的领导职位了。

可他没有直截了当地鲁莽行事。他打着 1986 年改革精神的招牌，在莫斯科党的代表大会上发言，提醒人们注意哈萨克斯坦党组织的“严重缺点”。⑦尽管他没有指名道姓，但他的批评使库纳耶夫的领导形象受到了损害，因为库纳耶夫在哈萨克斯坦毕竟工作了 20 多年。有人猜测，纳扎尔巴耶夫之所以这样做与利加乔夫或戈尔巴乔夫或两者的唆使是分不开的，这种猜测不无道理。

库纳耶夫起初对这一事态的反应表现出了他这样经历丰富的〔161〕人不应有的天真，他竟然试图劝说戈尔巴乔夫解除已从忠诚门徒变为潜在对手的纳扎尔巴耶夫的职务。当戈尔巴乔夫拒绝了他的请求时，他一定已经明白了个中缘由。后来，库纳耶夫和他的朋友们不论在什么场合都异口同声他说他

准备自愿退出党的第一书记之职。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那年 12 月，他曾告诉戈尔巴乔夫他打算退休。⑧他的朋友们说他打算在 1987 年 1 月搞个退休仪式，同时也庆祝一下他的 75 岁生日。在此之前，他还在他寓所旁边的公园里竖立了一座他本人的半身像。

然而，戈尔巴乔夫决定在他辞职之前先发制人，以取得政治上的优势。

1986 年 12 月 11 日，政治局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会议，尽管库纳耶夫是政治局的全权代表，尽管他的辞呈还没被正式接受，但他却没有列席会议。与此同时，这次会议在明显没有与哈萨克斯坦的任何领导人协商的情况下就选定了库纳耶夫的接班人。政治局会后派遣了一名代表到阿拉木图向哈萨克党组织传达了它业已作出的决定，完全是一派中央帝国的作风。这位新委任的第一书记就是根纳基 · 科尔宾，他是位职业共产党官员，俄罗斯人，在此之前他与哈萨克斯坦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决定于 12 月 16 日在阿拉木图宣布，很快，示威群众便聚集在党的新建的总部大楼前面的宽阔广场上。总部大楼矗立于阿拉木图市中心的小山上，建得雄伟壮观。当时示威群众都是年轻的哈萨克人，绝大部分看起来像是学生。一开始，他们只是四处走动。后来，示威者越聚越多，足有好几百人，人群中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手势语言。

库纳耶夫回忆说，他当时被叫到总部大楼，要他与学生们进行对话，可后来科尔宾又决定不采取这项措施（据科尔宾说，当时库纳耶夫拒绝向示威人群讲话）。不管怎样，总之，事情一直拖延到下午，党的主要领导人才决定派几个年轻一点的党的书记去与学生们对话，纳扎尔巴耶夫就是其中一员。

但示威活动没有中止，第二天，示威者已壮大到了好几千人。渐渐地，人群开始骚动起来，示威者开始向派遣来的警察以及总部大楼的窗户抛掷石块和其他物体。最后，政府下令驱散示威群众。在驱散过程中，许多人受了伤，还有一些人丢掉了性命。由〔162〕于监狱一下子装不了这么多被捕的示威群众，只好用大卡车把其中好几百人运到四五十公里外的荒芜的大草原上，哈萨克斯坦的这块地方 12 月份寒冷异常。最后，许多示威者被判处长期徒刑，1000 多名学生被学校开除。

因为当时公开性还没有在全国完全普及，在阿拉木图也没有外国记者，因此，人们除了听到一些零星的和歪曲的消息外，对这场骚乱一无所知。苏联新闻媒介只简单地报道了这场由 “ 流氓、寄生虫以及反社会分子 ” 所造成的 “ 动乱 ” 。

有关这次事件的真相一点一点以口耳相传的形式透露出来，直到年底，才在外国报纸上出现了较为翔实的报道。这些报道当然取材于道听途说，难免对伤亡数字有所夸大。⑨《消息报》后来在 1 月份刊登了一篇文章，斥责外国报道的失实。不过，莫斯科新闻媒介决意要忘掉这次动乱，此后再也没有文章提及此事。在当时的总理雷日科夫访问芬兰期间，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有人问及此事时，他嗤之为小事一桩，说只有 “ 一两百人 ” 参加，而且都是一些 “ 堕落的年轻人 ” 。⑩

莫斯科认为此次动乱库纳耶夫本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与它委任科尔宾以取代库纳耶夫这一决定无关。1987 年，库纳耶夫由于领导不善而遭到了猛烈攻击，他本人也因此被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不过，莫斯科也从这次阿拉木图事件中吸取了一些教训，以后再也没有任命像科尔宾这样的俄

罗斯人去非俄罗斯人的共和国担当党的第一把手。在随后的几年里，每当决定撤换共和国的党的领导人时，必然是选择一位当地民族的领导人。

科尔宾本人似乎也从中有所收益，尽管哈萨克斯坦的政客们否认这一点。他们都毫无例外地认为科尔宾是个全然不顾当地实际情况，专横跋扈的人。

事实上，科尔宾在赴阿拉木图就任之前就已具有在非俄罗斯地区工作的丰富经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格鲁吉亚当过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的副手。他身材很高，态度和蔼，脸上常挂着迷人的微笑。至少在我这样的局外人看来，他应该在 60、70 年代就担任过党的高级官职，而且，他没有那个时代高官们典型的武断、粗暴和颐指气使的官风。科尔宾对哈萨克民族所关心的问题并非麻木不仁；而且，出于尊敬和学习哈萨克语的目的，他在公开场合用哈萨克语向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居民发表演讲。（11）对他〔163〕来说这种委任是不幸的，他是在一个不恰当的时候被派到了一个不合适的地方。尽管他在职只有两年半时间，但哈萨克人对他的任命仍然耿耿于怀。

乌兹别克斯坦及其“腐败现象”

在 1986 年和 1987 年哈萨克斯坦政局波动期间，人们对腐败的指责并不强烈，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邻近的乌兹别克斯坦，反腐败运动却开展得如火如荼。

早在戈尔巴乔夫担任党的总书记之前，反腐败运动就已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展开了。勃列日涅夫的好友、长期以来一直担任该地区党的领导职务的沙拉夫·拉希多夫于 1983 年逝世。他的死，使令人触目惊心的贪污腐败现象渐渐地暴露出来。拉希多夫的继任者伊纳姆宗·乌斯曼霍孔耶夫为转移人们对他个人的注意，在抨击其前任的同时，表面上也配合执法官员进行调查工作。审查出的一些案件令人发指，涉及成百上千的官员，他们狼狈为奸，虚报棉花产量，从子虚乌有的商品中攫取钱财。乌斯曼霍扎耶夫想蒙骗警察的企图终究是徒劳的。1988 年 1 月，他被革职，并因多项重大罪行受到指控。

乌斯晏霍扎耶夫的继任者拉费克·尼萨诺夫在 1988 年宣布说，自 1983 年下半年以来，在乌兹别克有 100 名官员因贪污腐败而受到起诉，有 3000 人被革职，另有 1.8 万名党员被开除出党。有两名罪大恶极者被处以极刑。（12）

不管这些指控多么有效（似乎大部分都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乌兹别克的反腐败运动最终并未击中要害。乌兹别克人认为出现这种大规模的腐化现象是整个体制的错误，而单把这些官员拉出来作为替罪羊，令他们深为不满。毕竟，除了一些针对勃列日涅夫亲贼的指控外，许多被指控收取贿赂的人住在莫斯科，而不是在塔什干，但当局并没有做出努力，对那些住在莫斯科的人进行司法审查。而且，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在莫斯科派来的最成功的调查人员（指取供与定罪）中，有两名后来被指控在这一过程中使用不正当手段来榨取供词，并转稼到无辜者身上。他们就是来自莫斯科的亚美尼亚人特尔曼·格德连和来自列宁格勒的俄罗斯人尼古拉·伊万诺夫。直到他俩在指控莫斯科的高级官员时故伎重演，莫斯科才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当外来者（主要是俄罗斯人）被委派到乌兹别克斯坦担当因〔164〕乌兹别克族领导人被捕而空缺的行政职位时，乌兹别克人所受到的伤害与侮辱也接踵而来。外来的领导对这个地区及其习俗知之甚少，更别说是对其语言的了解了。在许多乌兹别克人看来，整个“反腐败”运动不过是帝国主义者的

诡计，目的是使这个地区处在莫斯科更加严格的控制之下。

我在 1988 年 2 月访问塔什干的时候，发现这里的氛围与 70 年代没什么两样。外国来访者仍然无法接近党的高级领导人。我们美国人虽受到了肴撰和优美舞蹈的热情款待，可当我在一个由美国情报局发起的展览会开幕式上发表户外演讲时，看到只来了一些专门由当地政府机构特准的客人，并且，50 码开外的一辆卡车的噪音吞没了我们的喇叭声。政治领导层的气氛那时依然很紧张，不过，对此也不必感到奇怪，因为针对“ 乌兹别克事件 ”而开展的检举活动仍然方兴未艾。

不过，我还是尽力作了两次值得回顾的访问，一次是访问哈萨克斯坦和中亚的穆斯林宗教委员会的总部，一次是拜访它所管辖的那所大学。

那里的清真寺和它的综合图书馆虽得到了较好的维护，但看起来毫无生气，甚至有点死气沉沉。这所图书馆藏有 3000 多卷手稿，近三万册图书。当主人领着我参观这两座建筑的时候，我觉得有种荒凉的感觉。那时对宗教活动的限制才刚刚开始有点松动。虽然穆斯林团体于二三年后在处于萧条的清真寺里组建了几所新的宗教培育学校，但在 1988 年这个时候，人们对未来还把握不定，与外来者进行讨论时也是顾虑重重。

那所大学显得很拥挤。就其建筑风格，特别是就其教员的种族构成而言，与其说它具有中亚风格，还不如说它更具有欧洲特色。甚至从学生的构成来看，似乎非亚洲学生所占的比例也远高于来自当地的学生。

那年有两名美国研究生被录取到乌兹别克国立大学的塔什干分校学习。他俩的专业都是突厥语言文化，他们主要与乌兹别克学生以及其他说突厥语的学生来往。他们要求大学的行政部门开设一门乌兹别克口语课程，并请求我给予支持。正常的课程表中没有安排这门课。我当然乐于帮助他们，只是惊异于学校的管理〔165〕人员为何在宣传民族文化上如此迟钝。宣传民族文化本是大学这样的机构所应尽的职责。毕竟，如果一个人想进一步深造当代乌兹别克语，不在乌兹别克国立大学学习，又能到哪里去呢？

塔什干的政治当局仍然抵制组建一个突厥学中心的建议。斯大林的分而治之的政策仍然大行其道。莫斯科拒绝支持任何这种研究，因为担心它有可能引起说突厥语的各民族意识到他们之间血脉相连的亲缘关系，害怕这种研究会给地方的联合提供讲台，从而损害帝国中央的利益。

共产党官员的担心还在于，不只是哈萨克人和大多数中亚人，甚至连俄罗斯联邦中也有不少民族如鞑靼人、巴什基尔人、雅库特人也都属突厥语系，对这种同源同根的注意可能使他们与土耳其的关系更加亲近。土耳其是唯一一个说突厥语的独立国家。而土耳其不仅是北约的成员，其前身奥斯曼帝国曾经是俄罗斯帝国南边的主要对手。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的内战期间，一些反共产主义的领导人就曾在泛突厥口号下展开过斗争。然而，由于这几个相邻民族之间的渊源关系是如此的明显，官方对突厥学的压制非但没有淡化他们之间的民族情结，反而激怒了突厥知识分子。

高加索的暴乱

1986 年阿拉木图的骚乱过后，虽然地方上对莫斯科推行的过时政策表现出了强硬态度，但在随后的两年里中亚相对风平浪静。可是，在高加索山脉的南边，情况却大不一样。1988 年，这里的亚美尼亚人与阿塞拜疆人发生冲突，开始了一连串持续好几年的暴力活动。

在横跨高加索山脉的几个共和国归入苏联版土时，曾重新划分了各共和

国的边界，亚美尼亚人一直对边界的划分不满。他们认为划归阿塞拜疆管辖的土地中有两个地区理所当然是属于他们的：一块是纳希切万飞地，除一边与土耳其接壤外，其余均由亚美尼亚环抱；另一地区俄语称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完全位于阿塞拜疆境内。随着时间的推移，纳希切万地区的人口中阿塞拜疆人占了绝大多数，而在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地区，亚美尼亚占了多数。

在苏联几十年的统治下，亚美尼亚人一次又一次地为此抱怨〔166〕呼吁，但莫斯科却对此置之不理，好像在说，这些形式上的边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不过，随着公开性开始深入民心，人们对大胆讲话的恐惧心理也有所减轻，这时住在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地区以及亚美尼亚共和国的亚美尼亚人的骚动情绪开始升温。亚美尼亚的知识分子带头揭起了运动的大旗，在 1987—1988 年的冬天，这块飞地上的亚美尼亚人团体三次选派代表到莫斯科，催促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当时多少得出点印象，即戈尔巴乔夫有可能同意他们归入亚美尼亚的愿望。在 1988 年 2 月，亚美尼亚人主导的纳希切万议会投票赞成把司法权移交给亚美尼亚共和国。

然而在莫斯科，政治局却否决了这一要求，并指令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共和国的共产党组织使局势“正常化”。自此之后，戈尔巴乔夫对所有亚美尼亚人的要求都变得愤怒异常；虽然在亚美尼亚问题上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比在阿塞拜疆问题上更加苛刻，但有一段时间亚美尼亚人仍然对戈尔巴乔夫抱有幻想，希望他最终能接受他们的立场。

由于莫斯科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来缓和这种局面，局势很快失去了控制。在亚美尼亚，示威的人群一天比一天声势浩大，不久，参加游行示威的队伍壮大到好几千人。当在阿塞拜疆大街小巷出现了如下传说（实际上是无稽之谈），称有两名阿塞拜疆人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被杀之时，苏姆盖特城（位于工业城巴库之北）的狂热分子暴跳如雷，肆意报复。虽然这些动乱的消息受到封锁，但在亚美尼亚有谣言说，好几百名亚美尼亚人遭到了集体屠杀，苏联塔斯社最后还是发表一篇报道，称有 31 名不同民族的人在这场动乱中死亡。（13）几个星期以后，《消息报》刊登文章说有 26 名亚美尼亚人以及六名阿塞拜疆人死于骚乱。这次屠杀给亚美尼亚人带来的震颤是难以抑制的，他们至今还没从一战期间亚美尼亚人在东土耳其的骚乱中惨遭血腥屠杀的悲哀中舒缓过来。（14）这一次，亚美尼亚人似乎又要面临大屠杀了。

1987 年，有 50 万亚美尼亚人生活在阿塞拜疆，除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亚美尼亚人是生活在农村外，其余的主要居住在大城市里。在亚美尼亚共和国里生活的阿塞拜疆人超过 18 万，主要是居住在农村地区。苏姆盖特事件后，大批大批的亚美尼亚人逃离阿塞拜疆，与此同时，亚美尼亚政府也作出反应，迫使阿塞拜疆人离开亚美尼亚，政府常常派卡车把整村整村的居民连同他们的家什一同运出亚美尼亚共和国。

而莫斯科对此却含糊其词。有时它竭力封锁消息；有时它又〔167〕发表一两则报道，以降低一些不切实际的谣言的影响；有时批评亚美尼亚“极端主义分子”，然后又许诺“公正”处理事端，改正过去的错误。为了缓和事态的发展，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局势，提出相应的建议。

5 月份，两个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均被撤换。新上任的两位第一书记都与现行党的系统没有紧密关系。在选任党的新领导过程中，莫斯科吸取了 1986 年哈萨克斯坦的教训，选派了一名阿塞拜疆人去巴库，一名亚美尼亚人去埃里温。

到巴库赴任的阿布杜尔拉赫曼·维吉罗夫曾任住巴基斯坦大使，他与统治了阿塞拜疆长达 20 年的海达尔·阿利耶夫政府没有什么明显的关系。维吉罗夫虽然 50 多岁了，但仍精力充沛，与他墨守成规的前任相比，他宁愿以劝阻代替镇压，对民间组织及其和平游行活动的态度也比较温和。我第一次拜访他时，他给我的印象是具有戈尔巴乔夫的风范：态度鲜明、比较直率、善于与人搞好关系。

到亚美尼亚上任的苏连·哈鲁丘年（俄语名叫阿鲁丘年）比维吉罗夫年轻九岁，也是与亚美尼亚政府机构无关的局外人。他长期生活在莫斯科，在莫斯科长大，并在那儿读完了高中。

有一次，我访问埃里温，哈鲁丘年向我提起了他当时还在埃里温大学读书的儿子，说他在服兵役之前亚美尼亚语说得不好，不过，参军后他学得很快。我对此很是不解，因为苏联军队里完全使用俄语。哈鲁丘年向我解释说，在军队里，亚美尼亚士兵常在一起活动，相互之间用亚美尼亚语交流，这就使得他的儿子得以提高其母语水平。他们全家一搬到亚美尼亚，他的儿子就成了卡拉巴赫委员会的活跃分子,并参加了 1988 年春以来几乎连续不断的游行和静坐。

那一年，安德烈·萨哈罗夫积极活动，试图解决亚美尼亚人与阿塞拜疆人之间的冲突。他给戈尔巴乔夫寄过不少备忘录，并写过不少信，他个人还与雅科夫列夫以及其他高级官员进行过商谈。12 月，在雅科夫列夫的建议之下，他与妻子叶琳娜·波纳先后访问了埃里温、巴库以及斯捷潘纳克特（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的首府），与双方进行商谈，以期达成和解。

〔168〕尽管他们努力寻找解决分歧的办法，与理应比未受教育者更理智的知识分子进行接触，双方之间的分歧仍是根本无法弥合。最后，他们不得不带着深深的沮丧回到莫斯科。

萨哈罗夫迈出了自认为是原则性的一步。他感到既然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亚美尼亚人占了大多数，就应给他们以所希望的政治地位。如果这样做使阿塞拜疆人不安，那么政府当局就有责任使用武力来制止暴乱。

尽管我对他的正直深感钦佩，但我觉得他的这个建议可能带来危险的后果。正式允许领土转让，不管原则上理由多么充分（当然，这原则本身就值得商榷），这种转让必然要导致大量流血冲突。保护人民生命的安全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除非苏联返回到警察国家的年代，这恐怕是萨哈罗夫最不希望出现的情景。

鉴于这个原因，我认为戈尔巴乔夫拒绝变动宪法所规定的状况是可以理解的。但令人费解的是，戈尔巴乔夫不仅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他对亚美尼亚人的偏见甚至与日俱增。如果想使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仍受阿塞拜疆政府的司法管制，如果想避免以后不再发生领土转让的争端，就应明确警示巴库，要求它必须保护居住在这块飞地上的亚美尼亚人的权利，建立一个合理的监督机构，并采取相应措施，防止两个共和国各自驱除对方民族的居民。

如果放手让他们自己来处理，莫斯科给予必要的支持，像维吉罗夫和哈鲁丘年这样的官员是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作为的。但是，他们没有行动的自由。处在持消极态度的莫斯科和满怀高昂政治热情的共和国之间，他们进退两难。两个民族的态度越来越强硬，旧恨又添新仇。

1988 年，这两个共和国里并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运动，而是分别忙

于寻求莫斯科对其各自领土要求的支持。在这一点上，他们谁也没有对自己在苏联的地位或对“社会主义”所承担的义务表示过怀疑。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大多数负责处理该问题的莫斯科官员认为问题虽尖锐，但并不具普遍性，也不能看成是苏联总体民族政策失败的征兆。

波罗的海寻根〔169〕

在苏联的西北边陲，一种来得更直接且不同于其他共和国的挑战在波罗的海3国正在加剧。20、30年代它们都是独立的国家。

在苏联几十年的统治下，居住在波罗的海的人们不得不在公开场合说话时颠倒黑白，彼此却又心照不宣。据说，当时选举出来的议会自愿请求获得并入苏联的特权。二战后，如果发现谁曾在战时被捕过，就会毫无例外地被定性为与纳粹勾结和犯下了战争罪行的“阶级敌人”。

为掌握自身未来命运的主动权，波罗的海三国首先要做的，是恢复它们的历史真相，尤其是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那份玩世不恭的交易迫使它们并入苏联的真相。关于这一点，莫斯科一直声称这是帝国主义者的宣传。

1987年8月23日，即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议签定的纪念日，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组织了抗议游行活动，以试探一下公开性的容忍度。当时有1000多人参加了游行，莫斯科没有进行过分干预。一年后，示威游行的队伍就扩大到了几万人的规模。

1988年，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对莫斯科的抵制变得更有组织。爱沙尼亚首当其冲，最为活跃。1月份，他们为一个民族独立小组制定了一项计划，此计划提出了今后三年支配其政治辩论舞台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恢复爱沙尼亚被苏联吞并的“历史真相”、公布镇压爱沙尼亚人的种种行径、恢复爱沙尼亚民族语言以及爱沙尼亚民族在共和国中的“主导地位”、保护环境、以自由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保证国际普遍认同的人权、只在爱沙尼亚境内服兵役、多名候选人竞选、重新在海外设立爱沙尼亚外交机构、把爱沙尼亚原来的独立日作为国庆日，等等。

这项声明清楚地表明，其最终目的是恢复爱沙尼亚的独立，尽管计划的起草人愿意“在现行体制下维护爱沙尼亚人的利益，其活动所起的作用相当于爱沙尼亚共产党的一个民族反对党”。（15）〔170〕在当时，共产党是苏联境内唯一的合法的政党，因此在爱沙尼亚和其他共和国内，人们决定组成“多民族阵线”，而不是带有政治色彩的政党。给他们的组织一个有别于“政党”字眼的名称，组织者就可以避免法律上的指控，也可吸引共和国内共产党人的支持。他们还把绝大部分活动冠以“支持调整运动”或改革运动，以避免与莫斯科关系紧张。由此他们也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即他们的运动是支持而不是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

这种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爱沙尼亚人在4月份建立了一个“支持改革民族（或人民）阵线”，并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即声称已达到4万名成员。7月份，立陶宛成立类似组织，此后以“萨尤季斯”而闻名遐迩。萨尤季斯的立陶宛语意思就是“运动”。拉脱维亚也不甘落后，于当年夏秋之交在当地报纸上刊登了计划草案。到10月份，这3个共和国都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通过了一系列方案，其性质类似于1月份爱沙尼亚知识分子起草的那份计划。（16）

这三个共和国的政治运动都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共产党员也参加了进来，这是很有意义的现象。

随着上述组织的建立，公开的示威游行已不再是偶尔为之，而且成了一种经常性的活动。2 月 25 日.大约 4000 名群众在塔林参加游行活动，庆祝爱沙尼亚独立 70 周年。在 3 月和 6 月，3 个共和国都出现了大规模的游行，纪念那些曾在放逐与清洗中受到摧残的人们以及追悼因此而惨死的亡灵。在 8 月份《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的周年纪念日，每个共和国的首府都出现了几万人参加的盛大游行活动。

在日益强大的公众压力之下，首先是爱沙尼亚，接着是立陶宛，相继恢复了独立时的国旗与国徽。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当地共产党本身的支持，那些共产主义强加的禁忌在这些地区接二连三地被打破。

戈尔巴乔夫对波罗的海地区出现的民族主义倾向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认为“ 民族主义 ”的要求，不管是来自亚美尼亚人的，还是来自波罗的海各国的，都是背信弃义的行为，都会给利加乔夫们以及领导层中的其他保守分子以镇压的口实，从而使改革半途而废。按戈尔巴乔夫的理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意味着改〔171〕革的完结，1989 年经选举创建一个真正的人民代表大会的目标将落空，建立法制国家的目标将变成笑柄。

但他又不得不考虑国外因素。毕竟，他正处在结束冷战的道路上，且在 5 月份要会见罗纳德·里根，下半年会见密特朗、撒切尔夫人以及科尔，年底将到纽约在联大上发表一个试图震惊世界的讲话，同时还要确保新当选的布什总统继续里根的合作政策。对独立运动的镇压，尤其是对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镇压，势必使他苦心经营的关系趋于紧张，重新回到与西方对峙的年代。

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对分裂主义分子表示同情。他尚未准备使苏联政府结构的上层去主动结束这一政治结构。而且，他也并没有成为共产党中重建资本主义的第一人。

所以他采取的是推诿的态度，试图发现一种使问题自然消亡的办法。

首先，他试着使当地各共产党组织都有一个全新的更富有人情味的面孔出现。在 6 月到 10 月之间，他撤换了 3 名思想保守的党的第一书记，换上了更能与崛起的民主力量合作的人选。在这三个共和国里，新的共产党领导人为同化这种改革运动做了不懈的努力。

其次，他于 8 月份派遣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访问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试图平息那儿的局势。正是在这次访问期间，雅科夫列夫对利加乔夫坚持阶级斗争的观念进行了猛烈抨击。尽管雅科夫列夫明白无误地拒绝了波罗的海要在海外设立大使馆以及另外发行货币的要求，但对其渴望自治的迫切心情则作出了理解和温和的反应。他的访问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看来等于是戈尔巴乔夫对其愿望的支持，从而使那里的民主力量也深受鼓舞。

但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同情。当雅科夫列夫访问归来向戈尔巴乔夫私下建议不妨在一种邦联的框架内给予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自治权时，无论是戈尔巴乔夫本人还是政治局其他成员，都不支持他的建议。（17）

戈尔巴乔夫非但没有向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让步，还试图从宪法上限制它们退出苏联的权利，以对之进行钳制。10 月份，苏联公布与新选举准备事项有关的宪法修正草案。令波罗的海沿岸三〔172〕国感到惊恐的是，这一宪法修正案规定，新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不但有权废除被认为与联盟法律相冲突的共和国法律，而且有权同意或否决联盟共和国的退出行为。

三个共和国的反应证明民族主义力量已经渗透到了地方政府机构的内部。各民族阵线都对这一草案口诛笔伐，几天之内，好几百万人在抗议信上签了名（在立陶宛，签名的人占了整个选举人口的 2/3）。然而，最引人注意的是这三个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也对否决退出权的企图进行了谴责。要知道，这些最高苏维埃都是在共产党的严格控制之下，而且共产党员占了大多数。

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走得更远。11 月 16 日，它通过了一份主权宣言，宣称只要苏联的法律与爱沙尼亚宪法相冲突，它就有权推翻苏联法律。

直到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才开始表明自己正式的，官方的立场。他召开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要求否决爱沙尼亚的行为。他在讲话中还痛斥爱沙尼亚议会欲控制爱沙尼亚财产以及重新恢复私有财产的企图：

众所周知，私有财产是人剥削人的基础，我们革命的目的正是要消灭这种私有财产，所有的财产归于人民。这种恢复私有财产的企图是倒退行为，因而，也是一个极其错误的决定。（18）

因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依职责宣布爱沙尼亚的行动无效，戈尔巴乔夫赢得了这一轮与爱沙尼亚议会斗争的胜利。但是，由于受到许多共和国的反对，戈尔巴乔夫欲限制退出权的努力不得不暂置一边。从戈尔巴乔夫对私有财产偏激的评论来看，他还远未接受这一实行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概念。

然而，他对民族主义和私有财产的抨击既没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也没在高加索地区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实际上，民族主义从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那里获得了力量。他们将很快在戈尔巴乔夫筹划的那场大选中获得压倒一切的胜利。

〔173〕西部边陲共和国

在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摩尔达维亚这三个西部共和国，虽然没有发生震撼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那样的动乱，也没有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那种来势凶猛的全共和国范围的民族运动，但它们也已开始从依靠不断的压制来营造和维持的政治麻木状态中醒悟过来。这三个并入苏联最晚的共和国自然倾向于带头要求变革。摩尔达维亚，连同西乌克兰及白俄罗斯西部地区，只是在二战后才被完全并入苏联的。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一样，这些地区早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里就被划归苏联管辖，所不同的是，它们在变成苏联领土之前并不是独立的国家。

在这三个共和国里，首先获得民众广泛支持的要求，是给予民族语言一个更加显著的地位。在白俄罗斯，随着大批斯大林命令之下的死难者的坟墓被发现，要求按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模式组建人民阵线的运动进一步扩展。

在摩尔达维亚，作家和其他知识分子加入了“支持改革民主运动”的组织，该组织在 1988 年夏于基什尼奥夫组织了一次有 5000 人参加的集会。这一运动赞同把摩尔达维亚语宣布为该共和国的官方语言，恢复使用拉丁字母，用传统的罗马尼亚三色旗来替代共和国的共产党党旗。

在乌克兰，尽管强硬的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竭尽全力制止共和国内可能对共产党政策产生疑问的政治运动，但莫斯科的新立场使他不可能阻止仅仅限于在当地开展活动的某种“非正式小组”的形成，这种小组当时主要在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以及其他地区进行活动。

维亚切斯拉夫·乔尔诺维尔于 1985 年被释放出狱，返回他的家乡利沃夫，被安排在一家建筑材料厂当司炉工。虽然 1987 年他才直接恢复政治活

动，但在此之前，他就组织了一个称做“乌克兰赫尔辛基联盟”的小组（主要是与其他被释放的政治犯合作），且恢复出版了《乌克兰导报》，该报在乔尔诺维尔被捕前还是地下刊物。

1988 年，他和同事开始组建一个机构庞大的组织，以协调几〔174〕个规模不大的在野团体的行动。7 月份，他们召开成立大会，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原则性宣言。宣言把现行政策称为对乌克兰人民进行“彻底清洗”的政策，要求恢复乌克兰的国家地位，并用独立国家邦联的形式来取代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9）

作为回应，在随后的六个月里，谢尔比茨基对他们进行了（用乔尔诺维尔的话说）“围攻”。（20）当局在利沃夫用高压水龙头和警犬来驱散示威人群。直到第二年，这些团体才得以组成一个全乌克兰范围的组织。尽管如此，在一些文化组织中，包括乌克兰作家协会在内，要求给乌克兰语言的使用与发展以更多重视的情绪仍在高涨。

同样，在白俄罗斯，当明斯克的知识分子开始组织起来的时候，政府当局也采取了强硬的态度。然而，共和国的一些知名作家、艺术家、以及学者仍组建了一个称做“再生者”的协会。正如其名称所示，它的主要目的是复兴白俄罗斯的语言和文化。还有许多人活跃在一个名为“白俄罗斯殉教者”的协会里，该协会旨在调查斯大林对白俄罗斯人所犯的罪行。在明斯克附近一个名叫库罗帕基森林的地方发现了大批的坟墓，二战结束前夕，克格勃的前身契卡曾在此地处决了很多人。虽然政府也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此次暴行，可市民们还是成立了一个市民调查小组。

这些民间小组还为 10 月 30 日筹备了一次盛大游行。尽管他们获得了政府的正式批准，但政府还是召集了防暴警察，粗暴地驱散了示威群众，不过，没有出现人员伤亡。这一天，按常规允许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波罗的海地区进行游行活动，所以当警察干预这次游行时，组织者大骂政府当局卑鄙无耻。在莫斯科知名度很高的白俄罗斯作家瓦西里·比科夫在《莫斯科新闻》上撰文谴责白俄罗斯党的领导人肆意破坏戈尔巴乔夫的政策。

文章发表后不久，比科夫就参加了一个由著名知识分子组成的小组，陪同戈尔巴乔夫出访纽约和联大。他的参加是否得益于〔175〕他对白俄罗斯当局的批评不得而知。他的知名度以及他与人民阵

线运动组织的关系使他没有遭到来自政府方面的任何人身攻击，但白俄罗斯当局对公共聚会的骚扰仍未停止，也不承认人民阵线运动是个合法组织。

在 1988 年底,虽然这三个西部共和国的人民阵线运动都没有形成有如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规模与声势，但却为今后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切勃里科夫的排外情结

1987 年和 1988 年，莫斯科一直对非俄罗斯民族的日益增强的自信感到无所适从。有些事情得到允许，有些虽反对但姑且忍之，有些则遭到了禁止和镇压，但始终没有连贯一致的对策。

然而，克格勃自有其明确答案。在 1987 年，当许多城市出现前所未有的示威浪潮（以前这种现象都是个别的，且为数不多）时，克格勃首脑切勃里科夫认为有必要公开表态。当年 9 月份，他在一次讲话中即指责是西方情报机构在煽动少数民族的情绪。（21）每当形势出现紧张时，这样的指责就会出现，虽然它毫无根据，但却是克格勃一贯的拿手好戏。

无论如何，切勃里科夫毫无根据的指责还是给他的组织带来了某种实际好处。通过把罪责扣到外国人的头上，就可使苏联情报机关首脑避免了把这一切都归罪于共产党的尴尬。同时，他这样做也是警示那些批评政府的人，若他们“执迷不悟”，就有可能背上间谍的嫌疑。切勃里科夫 1988 年不断重复着这种指责，在苏联崩溃前夕他的继任者再次如法炮制。

不管民族骚动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到 1988 年夏，苏联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他们两年前在第 27 届党代会上做出的如意判断证明并不明智。“民族问题”事实上并未得到解决。人们怨声载道，暴力事件频频发生，正成为家常便饭。〔176〕莫斯科所发生的这一切，使我对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利用提倡公开性这一契机提出变革要求并不感到奇怪。他们的不满对我而言也并不陌生。当时的事态确实有所进展，但我一时还无法预料其走向。

首先，莫斯科的改革者们开始支持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要求，并将之看成是推动苏联民主化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些“自由主义者”，如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和社会学家塔基亚娜·扎斯拉夫斯卡娅，鼓励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组织起来，争取它们自己的权利。苏联国家与法律研究所的法学家鲍里斯·库拉什维利第一次在公开出版物中建议，在各共和国里建立一些组织来支持改革运动。他们认为苏联要进行真正的民主改革，就意味着给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人民以选择的自由，对此我完全赞同。他们不仅知道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获得自由并不会损害俄罗斯的自由事业，而且，他们还自愿采取行动以实现这种设想，对此我深感鼓舞。

其次，自治运动得到了当地共产党的广泛支持。这显然使戈尔巴乔夫处于困境。如果他允许地方共产党支持自治乃至最终导致独立的要求，不就等于让它们脱离党在莫斯科的权威机构而自行其是吗？如果他坚持各共和国的共产党组织必须服从莫斯科党中央的统一领导，那他的改革与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的政策又有什么两样呢？

我们只能在以后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1988 年，戈尔巴乔夫似乎想兼收并蓄，两条腿走路。在联大会议上，他谈论了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选择自由；但在国内，他则倾向于给选择自由附加一些条件。

第八章〔177〕华盛顿摸索前进

我认为冷战还没有结束。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1989 年 1 月 22 日①

1989 年 1 月，乔治·布什宣誓就任美国总统。这时的苏联明显已不再具有在境外维持一个泱泱帝国的能力。一旦东欧决定抛弃苏联的枷锁，戈尔巴乔夫除了接受事实之外，别无选择。任何采取军事行动的企图都会使改革和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政治生涯完结。刚刚从那场备受痛苦、不受欢迎的阿富汗战场上解脱出来的苏联人民，不会再容忍克里姆林宫再次把他们的子女送往国外战场，去面临死亡的威胁。

我在 1989 年年初作形势回顾时，曾得出如下结论：这一年可为美国对正在发生演变的苏联体制施加影响提供绝佳机会。我们的政策已经成功地使诸如人权和新闻自由成为苏联议事日程的内容；现在是我们施加经济影响的时候了。我们要摈弃以前在冷战时期采取的经济制裁和惩罚措施，代之以支持行动，把苏联带进〔178〕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使它成为一个合作伙伴。

里根时期所设计的四部分议程有意识地忽略了经济关系问题。那时，在我们看来，建立更加密切的经济关系必须等到苏联结束对阿富汗的干涉，结束对第三世界事务的干预，欧洲结束分裂，一句话，必须等到冷战的结束才予以考虑。同时，我们也想看看苏联大规模裁军的诚意，确信苏联领导层愿意尊重人权，愿意让市民对他们的政府行为有所制约。

到 1989 年 1 月，苏联朝着积极方向发展的趋势愈发明显，当时我认为，在经济领域美国采取更加主动的政策会加速苏联朝着符合我们利益的方向发展。当然，这种经济合作取决于戈尔巴乔夫继续贯彻他业已开始的改革的意愿，但更多的贸易与投资和必要时直接提供某种形式的援助所带来的经济回报，也将有助于戈尔巴乔夫做出他所面对的困难决定。

我不是说要把美国纳税人的钱大量投入到苏联经济中去。这种办法不但政治上行不通，本身也是不明智的。靠外部资金的涌入无法治愈苏联经济。一套马歇尔计划对于苏联来说没有实用价值。1946 年战后的欧洲虽然一无所有，但经济复兴所需的基础设施还在，所以马歇尔计划能够拯救欧洲，这就如同有了一个水泵，才可以往里面注水一样，而苏联现在没有这样的水泵，实行马歇尔计划就如同往沙地里倒水。

不过，我相信美国政府可以找到一种方法，既可以鼓励苏联朝着市场经济方向迈进，同时也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利益。以能源问题为例。70 年代欧佩克石油组织大幅度提高石油价格，震撼了工业发达国家。到 1989 年，虽然石油价格得以稳定下来，但整个世界尚未摆脱依赖中东石油的危险局面。实际上，已知的世界最大石油储量是在苏联，只是苏联管理不善和技术陈旧，它的石油产量已开始滑坡。

如果能够说服苏联政府在能源生产领域改善外国投资环境，那么它就能吸引国外大量资本，不是作为外援，而是作为投资的〔179〕资本。这对各方都有好处：苏联会赢来高效的能源生产和不断增加的外汇收入，西方投资者可获得丰厚利润，世界会保持更加稳定的能源价格，使所有消费者受益。

然而，只要苏联政府继续对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实行中央控制，上述一切就不会发生。所以，应该劝说苏联政府使其石油工业从生产、加工到分配由

富于竞争力的企业来管理。一开始，它们的性质可能还是国营的，但如果将其改组为合资股份公司，将来就会很容易走上私有化的道路。

再拿农业来举例说明。自本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每年要向苏联出售 800 万至 2000 多万吨以小麦和玉米为主的谷物。我们的农民已越来越依赖这项贸易。卡特总统上台后，因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这项贸易受到了限制。②然而，卡特政府的行为却引起了农业州的政治抗议。这项谷物贸易当时由短期信用贷款提供资金，政府“ 商品信贷公司 ”提供担保。虽然苏联一直是准时偿付所欠债款，但如果他们违约，这个损失就得由美国纳税人来弥补。

这种贸易充满了危机。首先，所有的这类贸易都要通过苏联中央机构进行，如果改革成功，这些机构就一定要被解散。其次，苏联政府外债高垒，除非短期内它的出口创汇出现转机，否则将很快无力支付外债。而当时苏联出口创汇形势前景暗淡。因此，如果美苏继续维持这种已经实行了将近 20 年的谷物贸易方式，那么两国都将蒙受重创。苏联将最终无力支付它的债务，美国纳税人将因此遭受重大损失，美国农民也将失却一个重要市场。如苏联因此出现粮食短缺，不仅会使更多人陷入苦难，而且也会给政治领导人带来严峻问题。

当然，机会与危险并存。只要苏联改变它的斯大林集体化时〔180〕期的掠夺性政策，使生产摆脱官僚机构的控制，重新造就一个私有农场主阶级，它就能解决食品问题。只要苏联政府用一个私有的、开放的、富有竞争力的零售贸易体制来取代中央集权的、腐败的、官僚性的零售体制，它就能有效地分配粮食。在“ 社会主义 ”的官僚贸易机构控制下，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到达消费者手中时，往往已经损耗掉了 40—50%。因此，一个现代的、私人经营的批发与零售贸易体制，即便在粮食产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也会大大提高粮食供应。

有些人疑惑不解，为什么苏联解决粮食问题会符合美国利益？他们也许会发问，让苏联依赖美国的粮食出口，让美国农民从中获利，不是比鼓励苏联在粮食上自给自足更好吗？如果苏联改革真的成功了，我们不是失去了一个市场吗？

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鼠目寸光。首先，如果苏联改革失败，它的经济就会迅速恶化，也就无法长期支付同我们的谷物交易。这意味着目前这种局面也不会一直维系下去。其次，即便苏联农业产量提高，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给自足，但因为消费者饮食结构的需要，它还得大量进口谷物饲料。苏联的气候不足以让它充分生产它所需要的粮食饲料，而美国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农业生产国。这就意味着，当苏联生产面包的粮食满足了需求时，我们小麦的出口将因此有所下降，但是我们饲养鸡和牲畜的玉米和大豆的出口将为之增加。

在我看来，问题不是美国帮助苏联改革农业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而是我们美国是否有能力提供帮助。在农业、食品加工业、市场销售业方面进行私有化改造有着重重的阻力。这些部门一贯奉行教条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原理是其理论基础；它们符合法律规定，因为土地没有私有化；它们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因为它们的利税高得惊人；它们具有社会公共事业的性质，因为没有市场经济所需的银行系统，没有投资资本来源，缺乏市场管理机制。一夜之间是不可能清除这些障碍的，而且，戈尔巴乔夫甚至对于是否要取消其中的某些“ 障碍 ”还举棋不定。但是，若有人向他解释市场

的运营规则，我想他的态度是会有所转变的。

我认为有种方法似乎值得考虑。我们目前是通过提供信贷担保资助粮食出口，为什么不可以作这样一个调整，即美国直接在苏联以卢布出售农业产品，然后把卢布直接存放到由美国监督经营的投资银行里，再向从事食品加工业的农民和企业家提供资金〔181〕呢？虽然这样做的前提是苏联政府必须坚定地承诺在食品加工和分配领域进行私有化改造，但我认为我们有足够的影响力来促使这方面业已开始出现的新思想取得进展。

当然，这样做的一个困难是，当贸易赤字继续扩大时，美国联邦财政必须对农民有所补偿。但是，在我看来这样做利大于弊。因为，我们现在所提供的贷款担保——在没有替代计划之前还得继续维持下去——从长期甚至中期来看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如果我们一直坚持这种做法，久而久之，我们的纳税人就会中止对粮食出口进行补贴，我们就会丧失这个市场，美国在苏联也将不会得到公平机会，最终也就得不到当初投资的回报。

再以空间技术为例。苏联有兴趣参加世界太空运载市场的竞争。他们尤其想获取发射通信卫星的订单，也有意出租航空站。出于安全和商业的考虑，传统上我们总是试图把苏联从通信卫星市场（尽管他们有自己的卫星体系）上排挤出去。

我认为我们应该对自己的一贯政策进行一下反思。如果苏联同意大幅度削减他们的弹道导弹，与我们一道加入国际社会，共同控制导弹技术的扩散，开放他们自己的火箭工业让外国人参观甚至合作，那么，允许他们参与民用市场开发不也符合我们的利益吗？他们在卫星发射领域参与竞争可降低通信公司的成本，最终使消费者获益，而且，共同利用他们业已建立的空间站，就不必重复同样的技术，为此也可节约广大纳税人数十亿美元的开支。

上述仅为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可支持苏联融入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实际利益的少数几个例子。除非美国拿出我上面所叙述的〔182〕那类建议，否则，我怀疑戈尔巴乔夫或者其他改革者能否成功地领导苏联进入自由市场经济。他们需要从西方得到前后一致的、切实可行的建议；为使转轨的痛苦可以承受，他们需要西方对具体的合作承诺给予支持。但为使这种承诺富有成效，并经受得起时间考验，它必须是一种合作关系，一种互利互惠的伙伴关系，而不单单只是援助与被援助的关系。

在所有这些领域里，我都不是专家，我深知这些领域错综复杂，需要比我更有知识的人经过仔细研究才能提出可靠的建议。我无意强求实行一些一旦失败只能招致不满的不成熟、不切实际的计划。但令我担忧的是，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的盟国迄今还没有开始考虑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以使我们大家都得益于一个非军事化的民主的苏联。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我们的官僚机构至今仍然陷在冷战时特别重要但现已无足轻重（实际上有时还起反效果）的问题上而不能自拔。

不久，新一届政府将在华盛顿上台执政，我希望新政府探讨一下我们如何加速那些在我看来业已非常明确且又令人鼓舞的发展势头。

乔治·布什接任

我们有理由表示乐观，在处理美苏经济关系问题上布什政府将会以令人耳目一新的、富有创造性的面目出现。乔治·布什与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两人都拥有丰富的商业经验，而且有一大批商业界的朋友。他们都很讲究实际，不甘心成为政府官僚机构的俘虏，因为他们两人都了解由此带来的危害。但

是，又不可能若无其事地忽视这种官僚机构，政策的执行还必须依靠它来进行。政府的官僚机构有一种惰性，总是喜欢墨守成规，因此，在执行新政策时，它需要强有力的领导。

我希望新总统将注意力集中在富于创新的政策上，还有政治上的考虑。布什尽管在里根政府里已是位副总统，并直接参与了里根政府对苏政策的制定，但他会希望在新政府的对外政策上打〔183〕上他自己的烙印。他不可能简单地沿袭里根的政策而没有一点变化；他将不得不采取一些具有个人特色的重大举措。

但是，在涉及苏联问题时，布什有一个里根没有遇到的不利条件：许多右翼共和党人对他不信任。里根不会受到来自右翼的阻挠，③但布什就可能遇到麻烦，在某些条约需要参议院投票表决时尤为如此，他必须获得 2/3 的票数才能使他所签订的条约得以通过。他与右翼脆弱的关系，使他不得不扮演硬汉形象，以取悦他的潜在批评者。

在互相接触的过程中，苏联领导人逐渐认识到他们可以与里根打交道，做交易，而且 1988 年他们与里根发展了令人愉快的个人关系，他们甚至还希望里根再连任一届美国总统。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不过，他们很高兴，布什赢得了 1988 年大选的胜利。他们希望布什的胜利意味着美国政策的延续，而这一点也正是戈尔巴乔夫于 1988 年 12 月在纽约总督岛会见里根和布什时所强调的。

甚至在布什上台以前，我就意识到美国的政策势头可能有所收敛。尽管布什曾是里根政府美苏关系政策小组的成员之一，但他上台后仍将致力于寻找他自己的对策，而在这样做的时候，他还得小心翼翼，避免潜在的右翼批评家说他被苏联的花言巧语所蒙骗。有人说所谓的苏联改革只不过是个天大的骗局，旨在削减美国和西方的军备，从而加强苏联的军事力量。虽然事实上这种说法没有道理，也不合逻辑，因为改革是在削弱、而不是在加强苏联的军事力量，但这种争论的背后所暗藏的政治因素必须认真对待。

也正是基于上述这些原因，我认为华盛顿新政府在一开始的几个月会表现出强硬态度，同时拿出调整对苏政策的姿态，以向苏联获得更高的要价。如果这些努力能为新总统赢得今后从容处理对苏关系的自由，这种暂时的耽搁也是值得的。

尽管我没有接到与苏联人讨论这类问题（不会得到期望的结果）的指令，但我认为有益的做法是告诉苏联人，他们应做好准备，我们两国关系的发展势头可能会放慢，新总统上台伊始的一些强硬声明是为了消除某些人对他的批评，并不预示政策会变得更加强硬。

我认为，把这个信息传递给苏联领导人的最佳方法，是取得〔184〕一位对美国政策多少有些了解的苏联高级官员的帮助，让他来把我们的做法解释清楚。谢瓦尔德纳泽在外交部的重要帮手、曾长期在华盛顿工作的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似乎是最理想的人选。他会完全理解我的意思，知道如何向谢瓦尔德纳泽和戈尔巴乔夫解释，且有足够资格接近他们。

就这样，大选过后不久，我在斯帕索别墅邀请别斯梅尔特内赫共进午餐。当话题转到布什政府时，我告诉他说，我有些心里话要跟他讲。我说我确信布什总统上台后会在我们之间寻求扩大合作。但是为了淡化“布什软弱”之类的批评言论，他有可能会不时地发表一些强硬的声明。如果真是这样，苏联领导人不应认为布什总统对建设性的会谈失去了兴趣，而应理解为这是他

为了我们的关系更加亲密而做的准备活动。同时，我也希望苏联领导人避免采取一些看起来似乎是同美国公众相对抗的措施，因为，这样做会使布什很难推行即将出笼的政策。

别斯梅尔特内赫向我保证苏联领导人无意搞什么对抗。相反，他们把关系的改善看得至关重要。他似乎明白我刚才所提的“ 可能的强硬声明 ”的含义，便提醒说，戈尔巴乔夫在国内也面临着政治问题，从我们美国这边发出的任何不谨慎的措辞也会增添他与我们达成协议的困难。

不过，在 1989 年的整个春天，戈尔巴乔夫与谢瓦尔德纳泽还是对布什总统的政策走向深感担忧。④虽然布什为了消除戈尔巴乔夫的疑虑，不时地向他做些笼统保证，并在执政几天后就给戈尔巴乔夫打了电话。但美国的政策则倾向于裹足不前，并在某些问题上变得更加咄咄逼人。时值新总统评估形势、确定政策路线之际，苏联领导人对开始几个星期出现政策空隙能够理解，但对撤换里根对外政策班子的整套人马，并在 1989 年花好几个月时间搞“ 政策评估 ”深感不安。尽管别斯梅尔特内赫以及其他“ 美国通 ”努力使其上司相信，布什一定会恢复里根的和解政策，但是，那些对改进对美关系持怀疑态度的人，如克格勃头目克留奇科夫以及军方高层领导人则抓住这种在莫斯科广为人知的“ 暂停 ”现象不放，以此证明布什无意同苏联进行公平交易。

〔185〕1989 年 1 月，政府的动向已清楚表明布什将近乎彻底地更换里根对外政策小组的成员。就人员构成来看，这种更换更像是反对党获得了总统选举的胜利，而非前总统所属政党候选人获胜后的惯常做法。这并不令我惊讶。我在白宫毕竟工作过三年，了解“ 里根的人 ”与“ 布什的人 ”之间的紧张关系——当然，作为一个专业人员，我与党派政治毫无牵扯，我与他们两派的关系都不错。

不过，尽管我对布什撤换绝大部分的内阁成员和总统顾问团的成员早有思想准备，但还是对他的这种组阁方式感到意外，这看起来像是充满敌意的夺权，而不是合作性质的过渡。在这转变时期我两度去华盛顿，只是陪同安德烈 · 萨哈罗夫拜访了还未上任的新总统布什外，却没能按计划与布什新任命的外交政策班子的领导人安排会谈。新的外交决策人员尽管经验丰富，对总的局势通悉明达，但对苏联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对美国影响苏联局势走向的日益增长的潜力估计不足。我对自己没有机会与这些将来的政策制定者进行思想沟通深感沮丧。

我回到莫斯科后，着手让使馆工作人员对最近苏联事态的发展作一个全面评价，并设计一套方案，以便美国作出富有成效的反应。当布什总统宣布要全面评价涉及对苏关系的美国政策时，我们已经给华盛顿呈送了好几份报告。

因为我无法当面向新的工作小组成员汇报情况，我决定尽快地、连续不断地提出我个人的看法，以便它们能在新政府的政策评估中及时发挥作用。尽管我身边拥有一批任何一位大使都会羡慕的最优秀的使馆工作人员，但作为领导，我还应作出我自己的判断。我也知道，如果不在实质内容上、风格上以及措辞的差别上对所获信息进行我个人的处理，它就不能真正算作我的东西。

早在二战之前，我们驻莫斯科的大使馆在一个名叫塔拉索夫卡的村子里拥有一块四公顷的土地，作为使馆工作人员度假之用，它离克里姆林宫不远，开车只需一个小时。我和丽贝卡都喜欢那里幽静的环境，在莫斯科工作的早

期，我们常带孩子去那里欢度周末和庆祝特殊的节日。1981 年我负责使馆工作时，到那儿度周〔186〕末的次数就更勤了。大多数的周六夜晚以及周日都是在那里欢度的。

然而，自 1987 年我们重返莫斯科之后，就很少有时间光顾这座乡村别墅了。在莫斯科的公务或到各地的公务旅行，实际上占去了我的全部周末，就是节假日也无法休息。不过我明白，要想使我的建议在决策中产生实际影响，必须尽快将之呈交给新政府。于是，我停下 1 月份最后一个周末的所有其他活动，以便能去那座乡村别墅，在白雪覆盖、林木掩映的清静之地集中整理一下我的思路。

星期五晚上，我与丽贝卡驱车向塔拉索夫卡驶去，带足了两天的食品以及一叠黄色的专用纸和一支自来水笔。我没带任何文件和读物。如果到那时脑海里对自己所要做出的分析与建议还没有准备充分的话，再来填补已为时晚矣。

星期五晚饭过后，我在纸上写下准备建议的提纲，第二天上午开始工作。每干两三个小时，就休息半小时左右，或在雪径上散散步，或用独轮车推点柴禾，或者干脆凝视着经过改造的壁炉里的火焰。这个壁炉是一位俄罗斯工匠按典型的俄罗斯式样改造的，已有几十年历史了。我的大部分建议就是在这样的休息中得以形成。

到星期日下午，我已准备好所要拍发的三份电报的详实提纲，并草拟了前面两份电报。当天晚上，我拿着一卷散步时揣在风衣里、睡觉时掖在枕头下、早已变得皱巴巴的黄纸回到了莫斯科。尽管我不相信苏联人能从阅读我的分析中获得什么好处，但我还是决定不公开它。

第二天，我的秘书奇迹般地辨出了我的草书，并把它誊写出来。接着，我把两份草拟的电报和我的建议大纲送给主要的人员过目。我需要他们提出修正和建议，并补充一些意见。我们先在使馆的密室里进行了探讨；接着每个处室的负责人给我提交一份手写的备忘录。一直忙到那个周末，送往华盛顿的两份咨文才准备好。又花了 10 天的时间总算完成了第三份电报咨文。所有这 3 份东西，不论是从风格上，还是从内容上，都是我自己的，但没有我的同事的众多帮助，我也独木难支。

〔187〕这三份咨文分别是关于三个方面的内容：苏联国内的事态发展；正在演变的苏联对外政策；美国应采取的对策。我认为苏联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必然要考虑国内政治形势，因此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苏联国内发生的一切，然后才能分析它的对外行为。

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一切无异于一场潜在的革命。1988 年苏共代表大会确立了很多目标，如建立一个权力受到一定限制的政府；按步骤创设一个拥有真正立法权的、经过选举产生的议会；允许大家对新观念进行公开讨论，允许大众传媒对新思想进行公开报道，正式抛弃与西方为敌的意识形态基础，等等。政府为实现这些目标正在付诸行动，而这些行动又将不可避免地打破旧的体制。苏联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大选正在筹备之中，不论是从广度还是从深度来看，苏联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尽管反对戈尔巴乔夫政策的力量在滋长，他未来的政治命运也取决于改革路线的连续性，但我感到当时他仍然牢固地控制着局势。

要想使改革获得成功，与西方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关键，因此我坚信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将继续强调保持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合作关系。这就意味

着，如果东欧进行改革，戈尔巴乔夫不可能使用武力来镇压，那样只会牺牲他的国内政策，甚至是他的政治生命。

即使戈尔巴乔夫被某些强硬势力——我不希望出现这种局面——所推翻，他们也不可能在东欧使用武力，因为，这样会在苏联境内引起广泛的、甚至难以控制的动乱。可以说勃列日涅夫教条已经死亡，因为不管莫斯科的统治者意愿如何，它已不再实用。

我知道，华盛顿有些人认为戈尔巴乔夫的统治不会长久，他们建议新政府不要在他身上花费时间与精力。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在我看来，戈尔巴乔夫已经显示出他有能力战胜批评他的人，并在可预见的将来继续显示他的实力。我们不应后退，而是应鼓励他朝着符合美国利益以及苏联人民利益的方向进行改革，毕竟苏联人民的真正利益与我们的利益并不冲突。即使华盛顿的那些人是对的，我们在戈尔巴乔夫当政期间帮助他尽可能多地解决问题，对我们也是有益无损。

还有一种观点令我不敢苟同。这种观点认为改革是个诱惑西〔188〕方的圈套，苏联企图借此恢复经济，并在军事力量上超过我们。⑤当然，改革的目的是促进苏联经济的发展，但戈尔巴乔夫所选择的方式是在削弱共产党和军工企业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只有把整个国家改造成一个其政府由人民控制的开明社会，改革才会取得成功。在这样的社会里，是没有机会把其 1/4 或者更多的国民生产总值充作军费的。

尽管我相信戈尔巴乔夫的目标符合我们的利益，但我并不赞成给他个人以政治上的支持。如果我们认为美国可以挑选苏联领导人，那我们就会误入歧途。只有苏联本身的政治运作过程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对某些个人表示好感，这实际上反而会给他们在国内带来麻烦。我的意思是，我们的支持要针对具体的目标和政策。如果某一位苏联领导人出于本人爱好，支持我们也赞同的事物，与我们发展了良好的关系，并且还从中为自己获取了一定的好处，这当然再好不过，但我们的支持应是针对政策，而不是个人。

我建议我们应继续就里根时期行之有效的四部分议程进行谈判，另外再加上两项内容。原有四点包括削减军备、一起解决第三地的冲突、保护人权以及通过允许东西方之间人员与信息的自由流动来消除铁幕。这些方面都取得了实质进展，但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如果我们再加上两项内容，即经济合作和在处理恐怖主义、毒品交易及环境恶化等跨国界问题上建立一种更密切的伙伴关系，我认为就可使上述进展进一步得到深化。

我知道经济问题尤其复杂。我们的政策所依赖的基础是，为防止苏联军事机器得到加强而限制对它的贸易和投资，因苏联限制其公民的移民权利而否定它的正常贸易地位。虽然改变我们的经济政策必须与苏联的变化保持一致，但除了自由移民的要求之外，我们从未明确过取消贸易和投资限制所需的先决条件。

我在建议中说，我们应该对促使苏联融入世界经济所应采取的步骤进行紧急全面的研究，紧接着就要考虑我们有可能采取什〔189〕么措施去鼓励苏联形成一种消费者取向型经济。我希望我们能利用这一研究成果，加强同欧亚盟国的协商，以便使我们在处理这个日益国际化的重要问题上所采取的行动互相协调。如果我们能及时完成国内的准备工作，秋季我们就可让苏联领导人同我们商谈双方可能采取的合作举措。如果他们愿意减少对美国及我们盟国的潜在军事威胁，并以现实的态度加入世界大家庭，那么我们就可在关

键时候给他们提供支持，使其预定进程得以顺利进展。

我的另外一项建议是双方每年召开一次峰会。这会使我们的领导人保持相互间的沟通与交流，给谈判进程注入活力。然而，这种峰会却一再推迟，其原因是政治领导人担心每次会谈若达不成某项重要协议，就会被认为是一种失败。

我理解双方面临的那种潜在政治难题，但我认为最好的解决之道在于每年定期会面。如果出现特殊情况需要进行会谈，也可另行安排，但一年一次峰会决不过分。届时，公众就不会期待每次峰会都必须出现一次签字仪式，而会将之看成是处理外交关系的一个正常组成部分。

我的第三条建议源于苏联境内许多地区出现的严重分裂主义倾向。我们驻莫斯科的大使馆以及驻列宁格勒的总领事馆一直在密切注意这个多达 100多个民族、横跨 9 个时区、民族与地区分裂倾向越来越明显的国家的动向。就我们一个规模中等的使馆以及一个小得可怜的领事馆而言，要想给予这么一个泱泱大国以必要的注意，显然力不从心。因此，我建议在苏联各共和国首府开设几个办事处，每个办事处安排 4 至 5 名工作人员。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跟踪事态发展，展示美国存在，并不需要什么秘密材料、保密会议室及密码咨文。如果我们的工作人员需要递送什么绝密报告，他可以到莫斯科来，从使馆寄发出去。

美国国务院负责苏联问题的同事告诉我，我的咨文很受重视，很有实用价值；对新一届政府在对苏关系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上都〔190〕进行了一流的分析。然而，事实上，除了那条要求把一些跨境问题纳入议事日程的建议之外，我的所有其他建议似乎对随后几个月逐渐出台的政策影响很小。特别是，拒绝利用经济压力推动戈尔巴乔夫加快裁军和市场改革的建议遇到了强大阻力。

东欧

正当我忙着给新政府起草建议时，我从国务院的同事那儿获悉，国务卿贝克正在认真考虑与莫斯科就东欧的未来进行商谈的可能性。这种考虑源于前任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想法。曾有人告诉我说，基辛格认为东欧很快就要爆发反叛事件。如果美苏之间没有达成谅解，那么这场反叛就会直接导致混乱，或许还会导致苏联的干涉。

基辛格最近访问了莫斯科，并会见了戈尔巴乔夫。尽管基辛格没有与我谈论他的想法，但我推测，他一定会把他的观点告诉戈尔巴乔夫。如果真是这样，他很可能会得到鼓励。因为只要戈尔巴乔夫能够把美国拉到一起来商谈东欧未来问题，不管美国的立场如何，这种会谈都会让东欧的“ 民族主义者 ”感到灰心沮丧。

正因为这个原因，当我听说这件事后，感到非常吃惊。尽管我可以肯定地说，基辛格并不想承认苏联对于东欧的控制是合法的，但一旦发生了这种会谈，也就恰恰从客观上承认了这一点。这种会谈，往最好处说，会被认为是超级大国在限制东欧人民的自由；往坏处说，会被认为是超级大国企图重新瓜分东欧。

我完全了解那些赞成与莫斯科商讨东欧问题的争论。华沙条约国家，特别是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和波兰这几个“ 北部边层 ”国家，表面上仍然处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其形势却是一触即发。一旦其中的一个或更多个国家发生动乱，并导致苏联的干涉，就会重现 1953 年的东柏林事件、1956

的匈牙利事件以及 1968 年的捷克事件 或者会出现由苏联支持的民族共产党政府当局宣布戒严的局面，就像 1981 年波兰出现的情形一样。这样，改〔191〕革的整个进程以及已经缓和了的东西方关系就会中断，就会出现大量的流血伤亡，国际紧张局势就会危险的升级。因此，必须尽可能地避免这种可怕的局面出现。

不过，我反对同苏联就东欧问题进行协商，理由有两个。其一，我认为不可能再出现我们过去所见所闻的由苏联指使的那种镇压活动，这一点勿庸置疑。尽管苏联仍然拥有巨大的军事力量，但莫斯科已无意在东欧地区恢复使用武力。入侵阿富汗已经证明这样做会在社会舆论方面付出惨重代价，戈尔巴乔夫好不容易才把自己的国家从这场失败的冒险中解脱出来。要继续贯彻他的全面改革计划并巩固其目前的政治地位，他就不可能再贸然于欧洲中心地带引起军事对抗。

其二，有清楚的迹象表明，戈尔巴乔夫将鼓励东欧的共产党领导人沿着他试图在苏联推行的改革路线着手东欧国家的改革。如果他真地将之付诸实施，东欧各种被释放出来的力量就有可能推翻共产党的统治，但等到苏联领导人明白这一点时，他们已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事实。采取其他任何措施只会有损他们在国内的统治。

在这种态势下，由美国提出就东欧未来地位问题与苏联进行谈判的建议，只会导致人们认为美国阴谋限制东欧人民的自由。我认为，这样的努力注定要失败，因为东欧人一旦获得了对自己国家的控制，他们就不会再容忍任何对他们行动自由的限制。更为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在道义上无权这么做，而且——回顾一下我们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所采取的立场——我们这么做等于在出卖东欧的民主力量。

这并不是说我们在与苏联会谈时应完全回避东欧问题。我们需要表明的是，我们对该地区没有任何企图，我们也无意于在华沙条约国寻求独立后，向东扩大北约组织，我们同时也应让戈尔巴乔夫明白，如果他使用武力来阻止东欧的民主进程，那么一夜之间，业已改善的东西方关系将不复存在。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就东欧的未来进行专门的商讨，这些问题可以在我们正常的接触中谈论。

〔192〕鉴于这些理由，我加入了国务院东欧室与苏联室的大辩论，我竭力反对被标榜为“ 基辛格首创 ”的这个建议。我是 4 月下旬回到莫斯科的，当我听说国务卿贝克已经决定放弃与苏联就东欧问题进行商谈的建议时，我松了一口气。

苏联对外政策的再生

正当布什还在全面回顾政府政策之时，戈尔巴乔夫已经掀起了一场旨在修正与他国关系的运动，目的是以真诚合作和睦邻友好的对外政策取代传统的武力和威胁政策，运动最终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

他首先履行自己的诺言，于 2 月 15 日从阿富汗撤走了最后一批苏军。紧接着，频频向西欧抛出绣球。他发起了一场营建“ 共同欧洲大厦 ”运动，4 月份出访伦敦，6 月份波恩，7 月份巴黎和斯特拉斯堡，10 月份来到赫尔辛基，11 月份又到罗马进行访问。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为大幅度削减部署在欧洲的常规武器积极活动，加快北约组织与华沙条约组织之间的谈判。事实是，他在谈判中对西方的要求尽量爽快地予以满足，而他的这种态度反而在我们盟国内部引起了相互协调的矛盾。因为有些西方国家原以为苏联无论如

何也不会答应他们的建议与要求，一旦苏联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有些盟国又开始怀疑自己的要价是否太低了。

正当东欧以及东西方关系之类的话题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时，戈尔巴乔夫还抽空出访了其他一些与之有问题的国家和地区。5 月份他访问了中国，从而清除了 20 多年来因苏中之战而遗留下来的战争阴影。他还在这一年出访了古巴和东德。在国内，他接待了许许多多的外国来宾。

与西欧和美国关系的显著改善得益于苏联早期政策的变化。然而，只要那道把欧洲一分为二的铁幕还存在，谈论“人类的共同价值”就没有很强的说服力。戈尔巴乔夫 1988 年在联大会议上承认人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并且宣布，这种自由不附加任何条件。1989 年，东欧使他的承诺受到了真正考验。

在自由门槛前的东欧〔193〕1989 年春，在与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及东德共产党领导人会谈时，戈尔巴乔夫曾明确表示，期望他们在国内效仿苏联正在推行的改革。当时许多人怀疑他是否清楚这种表态所蕴含的意义。

我当时的推测是（现在仍然是），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在东欧的脆弱地位很不满意。当然，他知道东欧的共产主义体制同莫斯科的体制一样，都存在着诸多缺陷。他感到遗憾的是，苏联 1968 年入侵捷克，镇压了他们想建立“有人性的社会主义”的愿望，同时也使苏联意义重大的改革延缓了 20 年。但他一直认为共产主义制度的缺陷可以得到改正，苏联镇压行为导致的后果证明了当时捷共总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在 1968 年布拉格之春期间发表的看法。对社布切克的看法，他不仅表示认可，而且希望给予充分肯定。

令戈尔巴乔夫无法理解的是，在东欧，所有的共产主义政权都已失去了赢得大多数人支持的希望，这不仅因为它们是共产主义政体，而且还因为它们是苏联帝国主义的工具。事实上，在从匈牙利到波罗的海的“北部边层”，他们之所以能掌握政权，只是因为他们有苏联坦克的支撑，一旦失去这种支撑，或使之失去作战能力，他们也将必然垮台。

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之所以不理解他们在东欧的脆弱性，不仅因为他们在心理上难以接受东欧人民普遍仇视共产党这一客观现实，而且还因为他们对东欧实际情况的了解受到了可悲的误导。

苏联情报组织为其分析专家收集的有关华沙条约国的情报堪称无双。每个共产党国家都有一个克格勃样版组织，它们接受苏联官员的训练，对其莫斯科同行附首听命。每个国家都有付钱的与不付钱的线人网络。可是，这种体制却既不能向其本国的政治领导人，也不能向其莫斯科主子提供准确的信息。

〔194〕为什么？因为其领导人所提的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还因为谁提供真实的情报谁就会大难临头。作为领导，他们认为谁怀疑他们的政策，谁就是不忠——怀疑者在这点上通常是正确的。同时，他们还自以为是，认为反对他们的只是少数人，至于这种看法，他们是大错特错。

对于这些傀儡领导人的好大喜功，苏联在东欧的代表们很少予以纠正，因为他们自己也置身于这种体制之中。苏联派驻华沙条约国的大使常常不是职业外交家，而是党的官员，这与美国外交界出于政治原因而任命的官员类似。他们不是凭着自己的业绩赢取了这份工作，而是凭着他们的政治资本。当政治局发现他们呆在国内影响不好时，往往就会将其派到国外，过舒适的流放生活。尽管他们中许多人在自己的领域里有一技之长，但对于其他领域

却难以胜任。可他们与上层有稔熟的关系，对他们来说这就足够了。

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是位才华横溢、工作勤勉的职业外交家，谢瓦尔德纳泽辞职之后他担任了苏联外交部长。

有一次，他对我说，1989 年东欧巨变震惊了莫斯科，因为驻东欧的苏联外交人员没有向莫斯科提供有关东欧形势的准确情报。当外交部得到有关民众不满的消息并问及此事时，这位职业外交家解释说，苏联大使回来总是这样说：“我昨天还刚刚见过昂纳克（或胡萨克或雅鲁泽尔斯基）呢，他说一切都好，我们不要受西方宣传的蛊惑。”

苏联在 1956 年、1968 年对东欧的干涉及 1981 年胁迫波兰宣布戒严，都给东欧人民留下了创伤。经过 1989 年最初几个月的时间，东欧人终于认识到，现在他们可以掌握自己未来的命运了。当戈尔巴乔夫 1989 年春天访问东欧期间敦促他们的领导人进行改革时，东欧人民看到了机会。

在华沙条约国中第一个非共产党政府是于 1989 年 8 月在波兰成立的。苏联新闻媒介对它的反应非常客观，引人注目。有些评论员实际上是在欢呼这种变革。谢瓦尔德纳泽很快就出访了华沙，而且邀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这位新总理到莫斯科访问，并向他表明，克里姆林宫已不再坚持苏联阵营里只能接受共产党政〔195〕府这个教条了。那种坚持认为在其他国家维护“社会主义”乃苏联之义务的勃列日涅夫教条已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历史。

首脑会议的推迟

一二月份草拟建议时，我还认为，新政府会毫无疑问地采纳举行年度首脑会谈的想法。对于安排这种首脑会谈曾遇到的困难，布什总统是清楚的，他在里根政府时期就曾主张这样的首脑会谈要经常举行。我认为应把会谈安排在暮春或初夏，这既可使布什总统有充分时间完成政策评估，也可向戈尔巴乔夫表明，布什真心希望保持 1987 年与 1988 年由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建立起来的两国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

3 月份，在回华盛顿述职期间，我拜访了布什总统，并在向他简要汇报了苏联选举情况之后提醒他说，确定一个首脑会谈日期，达成一年一度举行会谈的协议，对美国有利无害。然而，他的反应令我吃惊，好像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此事。他问道，难道苏联就不会利用这种首脑会谈向我们施加压力，迫使我们在军控谈判中作出让步吗？我当时安慰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当初他们就有这样的企图，但我们顶住了压力，现在我们仍然有能力顶住这种压力。

新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认为，美国民众的期望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如果会议没有达成一项重要协议，那么媒介就会给它扣上失败的帽子。对此，我回答说，我们应该向人们解释清楚，会议的目的在于讨论问题，而不只是为了达成某种协议。如果我们每年都能定期召开首脑会议，民众就会把这种会议当成正常的外交活动，而不再期望每次都能达成某种重大协议。我还说，如果我们拖得太久，人们的期望值就会上升，而且，我们还会因此丧失在苏联处在剧变期影响其政策的绝好机会。

总统在结束这次会谈时说：“好吧，我们研究一下。”但他的口气表明他并没有理解尽早举行这种首脑会议的迫切性。

我 6 月份再次来到华盛顿。苏联室的同事告诉我，他们并没有察觉出任何迹象表明白宫考虑要尽早举行首脑会谈。因此，我找到国务卿贝克，再次重申了我 3 月份的请求。我对他说，我已经觉察到了戈尔巴乔夫与谢瓦尔德

纳泽的困惑，他们对我们花这〔196〕么长时间来制定政府政策感到意外，对将要出现什么结局感到迷茫。尽管国务卿和总统不时作出一些泛泛保证，说我们也希望改革获得成功，并将继续努力改进两国的关系，但莫斯科一直都没有看到任何具体的建议。在我看来，目前存在着这样的机会，既可实现美国的许多目标，同时也可推进苏联的变化，从此结束冷战，发展更加广阔的伙伴关系。但这需要总统亲自来筹划，需要总统亲自与戈尔巴乔夫打交道。首脑会议拖得越晚，我们丧失的机会也就越多。

贝克明显对我的陈述发生了兴趣。可当我们离开国务院赶往白宫准备向总统本人作一个简报时，他却让我把话题限制在只谈论苏联的局势上，不过快到白宫时他又改变了主意，在进入西侧大厅门时，他说，“等等，杰克，何不把刚才对我说的有关首脑会谈的话也对总统讲一讲呢？”

我真的这样说了，这次，我的话看起来是确实引起了总统的兴趣。布什总统让工作人员好好征求一下意见，然后向他汇报结果。

然而，白宫和国务院对我的扩大经济关系建议的反应却并不怎么积极。贝克似乎怀疑戈尔巴乔夫主要感兴趣的是如何努力巧妙地进入关贸总协定这样一些国际组织，一旦进入这些组织，他可能会扮演一个掠夺者的角色。他还担心，任何扩大贸易的主张都可能导致右翼反对派的攻击，批评布什政府对共产主义态度软弱。白宫有些人甚至担心，这样的主张将会削弱国会对政府国防预算的支持。

国务院苏联室的专家们明白，现在是我们能给形势正在发生演变的苏联施加影响的大好时机。如果放弃使用我们的经济力量，我们就会丧失扩大美国利益的一次机会。但是，这些专家们的辩论无济于事，因为政策制定者并不采纳他们的意见。每个政策制定者似乎都有一个堂皇的借口来坚持冷战时期限制对苏贸易、投资及技术出让的传统。他们中没有人愿意冒险，哪怕是研究一下〔197〕我们如何支持苏联的经济转轨，帮助它从一个国家经营的、军事取向为主导的经济体制转向一个以市场原则为指导的、以生产民用消费品为中心的经济体制。

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在双边关系问题上悄无声息，对苏联国内问题又麻木迟钝，令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愈发感到不安。在 1988 年 12 月的联大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单方面宣布准备削减军备，采取军事防御战略，但美国新政府非但没有在中途安排与他会晤，实际上反而在悉数接纳他每一个让步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了要价。华盛顿的态度令人费解。一方面，布什和贝克常常说，他们愿意改进与苏联的关系，希望其改革获得成功；而另一方面，包括斯考克罗夫特、他的助手罗伯特·盖茨和国防部部长理查德·切尼在内的其他人却强调美国要保持警惕，并不时在公开场合暗示，戈尔巴乔夫的地位可能维持不了多长时间。

这些言论免不了要在苏联的传媒中出现，从而给戈尔巴乔夫大规模撤军的努力制造了巨大障碍，当布什宣布他要出访匈牙利和波兰并将着手讨论是否有必要从东欧撤走苏联军队时，戈尔巴乔夫愈发焦虑。这么做当然符合我们的利益，而且也是我们的基本目标，但是，在戈尔巴乔夫面临国内各种压力之时，公开宣布这件事只能适得其反，弊大于利。最后，在 7 月上旬，戈尔巴乔夫利用一次社交机会，让我给布什总统捎个口信。

1989 年的 7 月 4 日是星期二，由于我们计划邀请苏联和外交界的客人前来参加我们的国庆招待会，所以在此之前，我们单独抽出 7 月 2 日星期日的

时间，先为使馆工作人员和所有在莫斯科的其他美国人提前举办了一次传统的国庆会餐。另外，我们还在那个星期日安排了一个特别节目，由范·克莱本公开举办一次个人音乐会,这是他近 20 年来第一次在莫斯科举行这样的音乐会。自从他在 1958 年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大赛中获得大奖之后，他在苏联就成了传奇式的人物。经过多年的沉寂之后，他突然宣布准备返回莫斯科，并举办一次公开音乐会，这令莫斯科人和美国人都很兴奋。

除了一些应到的客人如国家部门或党的领导人之外，戈尔巴乔夫也来参加这次音乐会。他们这些人一般晚上是不参加公共集会的。听众把他们的出席看成是对一位卓越的美国钢琴家的尊重，〔198〕同时也是一种支持苏美两国建立更加密切文化关系的表示。在音乐会间休期间，戈尔巴乔夫的一位助手前来邀请我和丽贝卡在音乐会之后与戈尔巴乔夫以及其他人聊聊天。

当演出结束的掌声还在大厅里回荡的时候，我们就被领到总统包厢后面的一间私人招待室，戈尔巴乔夫在那里接见了范和他的母亲以及他的乐队的其他成员。他们用香槟、鱼子酱及其他一些小吃招待我们，我们为两国的友好关系举杯相庆。范问戈尔巴乔夫他能不能在莫斯科买幢寓所，戈尔巴乔夫说他要以个人名义同莫斯科市政府好好交涉一下此事。

大约这样轻松地谈了半个小时，戈尔巴乔夫说他要和赖莎先走了，因为在音乐会之前，他获悉安德烈·葛罗米柯去世了。他们想在回家之前慰问一下葛罗米柯的家属。当客人陆续离开时，戈尔巴乔夫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拉到房间的一角。

他对我说：“杰克，我有话想让你带给总统。”我一口应承下来。他接着说，他们目前正处在“一段非常复杂而又艰难的时期”。他决心推动根本性的改革，但是反对的力量却越来越强大。他认为他的改革将为改进苏美关系扫清道路，他相信布什总统明白并会同意他的这一看法。然而，华盛顿最近发表的声明给他带来了许多麻烦。“你告诉总统，请他体谅一下我的苦衷。他说的话在这儿有影响。”

他在讲话中用了一个俄文词БНИМаТеЛЬНыЙ，除了有“体谅的”意思之外，还有“注意的”和“深思熟虑的”的意思，在这里，根据前后语意，我觉得“体谅的”一意更贴切一些。我一时确定不了他具体指什么，就试图探问出他的意图，我说：“我肯定会把话带到，不过你能不能说得更具体一些，也好让我给他举出例子？”

“这没必要，你只对他说，有些讲话把这里的事情搅乱了。如果他真想帮忙的话，他应该努力体谅体谅他人。”

我向总统传话时说，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行动或是什么讲话激怒了戈尔巴乔夫，但我猜想可能是随着总统出访匈牙利和波兰的日期迫近，总统以前有关苏联从该地区撤军问题的讲话惹怒了〔199〕戈尔巴乔夫。不管布什主观上多么希望如此，但这种公开催促，不但不会使戈尔巴乔夫轻易同意，反而会引起他的反感。也许，戈尔巴乔夫担心总统在访问期间可能会就这个问题与东欧领导人进行更加细致的探讨。

当布什了解到这个信息之后，他立刻保证说，今后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时，他一定要多加注意。他授权我去更具体地讨论这一问题，如果戈尔巴乔夫希望这样做的话。可是，当我向戈尔巴乔夫表达了这个意思时，他通过外交部传话说没有这个必要。是别斯梅尔特内赫给我传的话，他说戈尔巴乔夫可能在每天必读的简讯上看到了什么东西激怒了他，这几天他一有机会就对

我大发雷霆，三天来一直是这样，目前看来戈尔巴乔夫似乎不想进行这种交流。

不管怎样，我认为，戈尔巴乔夫的话确实起到了他意料之中的作用。布什在东欧访问期间有关苏联在东欧作用的评论，是专门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才发表的，为此谢瓦尔德纳泽还让人传话给布什，对他在访问期间的“负责任的行为”表示满意。

在布什出访波兰和匈牙利之后不久，我们终于说服总统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一次首脑会谈。布什还私下里托人向戈尔巴乔夫转达他的建议，并不假思索地选择了正好在华盛顿拜访他的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作为信使，因为他担心通过国务院来传递这个信息会泄露出去。连谢瓦尔德纳泽一开始也不知道，当他后来得知此事后，感到非常恼火。

尽管这种失策没有造成什么长久的不利影响，因为布什总统以后再也没有出现类似的失误，但这件事暴露了布什一个令人遗憾的嗜好，他总喜欢给新闻界撒点“惊讶”的胡椒粉，玩些小孩子的恶作剧。有时他甚至连一些芝麻粒的小事也对他的工作人员保密，这常常弄得他们张皇失措，无法进行充分的准备。有关布什与戈尔巴乔夫当年晚些时候将要会谈的消息，其保密工作做得天衣无缝，连美国对其最绝密的武器所做的保密工作都自愧弗如。尽管我尊重总统对这次会晤进行保密的愿望，我知道总统希望直到正式宣布时才公开会谈消息，而且，我本人也尽力保守了这个秘密，但对保密的理由我还是很费解，早点让大家都知道这次会谈计划对美国利益到底有什么样的损害？我不得而知。直到举行首脑会谈的前一天，华盛顿才公布有关消息。

〔200〕到了那年夏末，华盛顿似乎一改它早已习以为常的拖拉作风，着手为当年晚些时候召开的首脑会谈进行准备工作，同时，美国还提出了一条新的重要建议，希望大幅度削减部署在欧洲的常规力量，这表明靠总统的领导才能够产生给人深刻印象的结果。⑥不过，在大多数问题上，他的领导权威并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尽管战略武器谈判问题早在里根执政的八年时间里就一直有人在研究，而且，布什任命的一些官员对这个问题也相当稔熟，但是，战略武器的谈判由于布什政府还不清楚它到底能从这项协议中得到什么而陷入僵局。当时，也没有一位高级官员认真思索过要活跃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直到谢瓦尔德纳泽 9 月份访问华盛顿期间催促进行削减战略武器的谈判以及 12 月份的马耳他首脑会谈之后，经济问题才被列入会谈的议事日程。

当华盛顿正在忙于理顺它的政策时，苏联的局势已发生了急速的变化。

第九章〔201〕算数的一票

（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此前所发生的一切……都在表明改革取得了令人信服的胜利，我们的国家也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米哈伊尔 · 戈尔巴乔夫在 1989 年 5 月份召开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①

党在选举中失败了。

尼古拉 · 雷日科夫 1989 年对政治局的讲话②

1989 年 5 月 25 日注定成为莫斯科的历史纪念日。就在这一天，新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尽管这种选举还不完全公正，还不是完全通过无记名投票的形式）将在克里姆林宫的大会厅里召开第一次会议。这是俄罗斯自 1918 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代表议会。

外国大使们也应邀出席这次大会。我的日程总是被各种事务挤得满满当当，不过，幸运的是我总能按时赴约，当然提前是不太可能的。但是，这次我让秘书取消了 9 点以后的所有其他活动安排，我想早点到克里姆林宫去，这不仅是为了能在外交人员座席中占个好位置，而且还为了能有几分钟时间会会已到的代表，与他们聊聊天，体会一下那种氛围。

临行前，我很周到地在我的卡迪拉克车的右前侧插上一面星条旗。我的车顺利通过布罗维茨基大门，然后，驶过修饰一新的雄伟的克里姆林宫和环绕在皇宫广场四周的宏伟的 15 世纪的教〔202〕堂，向左拐，又经过政府大楼，戈尔巴乔夫和总理雷日科夫的办公室就在里面，接着来到了 20 世纪的国会宫面前，四周的墙面都是用清一色的大理石和玻璃砌成的。

这座国会宫是尼基塔 · 赫鲁晓夫的思想产物，其建筑风格与紧挨着的克里姆林宫很不协调。我和丽贝卡在 1961 年第一次游览莫斯科时还参加过它的奠基典礼。对这座建筑的出现，俄罗斯的知识分子至今还在扼腕痛惜：在俄罗斯，怎能容忍最古老的历史古迹受如此武断的现代建筑的玷污？ !密斯 ·范德罗厄和埃罗 · 萨里宁拙劣的模仿品怎能在俄罗斯历史灵魂的圣地有其容身之地？！

这种反对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克里姆林宫本身也不是一座一气呵成的建筑。国会宫容纳了五个世纪的风格，其各部分的结合还算和协，但无论如何，这个粗糙的长方形盒状建筑还是与其周围的建筑格格不入。俄罗斯在 20 世纪把它的首都从彼得大帝的 “ 欧洲之窗 ” 圣彼得堡迁回到莫斯科，批评者说，尽管 20 世纪的建筑可在这座历史圣地赢得一席之地,但它也应体现出对过去的足够尊重。

俄罗斯的爱国者们并不满足于仅仅停留在建筑美学的批评上。他们说，如果 20 世纪的建筑非要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旁边拥有一席之地,它也不应是一座为这个国家所发生的悲剧即布尔什维克革命歌功颂德的纪念堂。毕竟，这座国会宫是为召开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大会而建造的。

然而，今天，这里召开的大会却不是共产党的大会，实际是要召开一次制宪大会，是一个负责为苏联创建一套全新体制的新机构。

我原以为应邀而来的外交人员将被安排在楼厅上就座，就像以往邀请外国客人来参加庆典活动一样，然而，令我惊喜的是我被带到了礼堂观众席左

侧位置较高的地方就座。这里角度极佳，我既可看清正式讲台，也可看清与会的代表，他们在大厅里的就座位置相当于美国剧院的“乐队席”。

在我坐候10点钟的会议议程开始的时候，我出生前11年所发生的一件事突然在我的脑海里浮现，这件事我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认为是俄罗斯历史的转折点，那就是立宪会议在1918年被粗暴解散。当时的那个立宪会议是俄罗斯历史上由普选形成的第一个机构，其目的是为后沙皇时代制定一部新宪法。颇令人深思的是，〔203〕1917年11月选举之前夺取了政权的布尔什维克们在那次选举中的得票率还不到 1/4。经过了一天的考虑之后，军队解散了议会，因为在这一天，大多数议员不准备支持布尔什维克统治的迹象已很明显。解散议会期间，有两名议员被打死。

列宁带着对他遭到失利的选举的蔑视，终止了所有民主程序的伪装。他的态度明确显示，不管他是否获得了民众的支持，他都要牢牢握住统治权不放。布尔什维克统治的合法性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上，而非基于人民主权之上，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建立了一个靠武力来维持的警察国家。

有时我想，如果列宁是个讲求民主的人，那么俄罗斯乃至整个世界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如果他愿意承认他的党派属于少数，只有说服大多数民众在投票中予以支持，他的党才有资格统治国家，那么，列宁就可能在建立国家宪法秩序方面采取合作的态度，从而就可能避免那场内战，避免来自西方的敌意，避免依靠恐怖来治理国家，以及避免那种把斯大林变成暴君的独裁政体。

每当我的思绪这样信马由缰时,我的儿子戴维14岁时所说的话就回响在我的耳边。那时，他对军事历史着了魔，尤其是二战史。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讨论希特勒入侵苏联一事，我当时说，如果纳粹在所“解放”的苏联地区没有把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当成劣等民族，如果纳粹没有对犹太人推行种族灭绝政策，那么他们就可能牢牢地占据苏联，并赢得那场战争的胜利。

我儿子看着我，很是迷惑不解，他问道：“换句话说，爸爸，如果纳粹不是纳粹的话，那么事情不就不一样了吗？”

真是太精辟了。如果纳粹不称为纳粹，如果布尔什维克不称为布尔什维克……20世纪史无前例的悲剧的发生，其原因也正在于纳粹就是纳粹，布尔什维克也就是布尔什维克，皆本性使然。

一个代议制政府

我现在就坐在这幢由布尔什维克人为这个党的执政机构建造〔204〕的建筑里，但今天我将目睹一个全然不同的议会：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个国家的公民选举出来的；它握有正式的权限以建立一套全新的宪法体制；它是在党的领导人授意之下产生，并由这个党组织起来的。

我能否目睹戈尔巴乔夫为列宁反民主的原罪赎罪的情形呢？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不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吗？

我脑海里一边翻腾着这些思绪，一边看着代表们川流不息地坐到自己的座位上。我在他们中间寻找着熟悉的面孔，一旦四目对视，就会忙不迭地相互致以问候。大厅里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每个人似乎都在分享这样的感觉：我们现在正在参与一个历史将为之改观的盛会。

大会于 10 点整正式宣布开始，先由选举委员会的负责人宣读选举的结果。这份宣读结果的报告长得超出了必要，有些代表已面露不悦之色，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进入大会主题。选举结果念完之后，大会第一项是投票通过主

席团成员名单，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位拉脱维亚的代表走上讲台，他建议在此之前先默哀几分钟,以纪念第比利斯 4 月 9 日和平示威游行中死去的人们，他们是在军队驱散的过程中丧失生命的。他继而要求正式向代表大会公布究竟是谁命令军队使用有毒武器来驱散人群，这些有毒物质又是什么。

这是大会所始料不及的。难道这次大会的代表们能充分左右这次聚会？这看起来有点不太可能。戈尔巴乔夫无疑自有打算，尽管他允许大会有些许的偏差，但一部分人可能期望他把整个大会纳入早已设定好的轨道。

主席团成员内定名单按时获得通过。但在大会对具体议程进行投票表决之前，我看到驼背高个子安德烈 · 萨哈罗夫健步走上讲台。这也出乎大会组织者意料之外。我默默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我当然迫切地想知道萨哈罗夫在这次大会上的发言内容，但现在大会正式辩论还没开始，我对他此时究竟想说些什么更是感

到好奇。但对我来说似乎更为重要的是，萨哈罗夫作为一名大会代表，他是否真正有权积极参与大会的每项议程。哪怕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只是确立了萨哈罗夫在苏联政治生活中的合法地位，除此之外什么也没做，它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205〕萨哈罗夫从高加索回来之后，我只拜访过一次，时间也已相隔近两年了。尽管苏联媒介对他很少报道，但他不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首都以外出现麻烦的地区，仍然活跃于政治舞台上。③

戈尔巴乔夫对他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把他看成是难以捉摸的远房亲戚，但又不能把他从整个家族中完全排除出去。因为他喜欢招惹是非，所以戈尔巴乔夫对他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既不鼓励他来参加大会，当他来参加时也不对他过分亲热。早在 1989 年，乐观的萨哈罗夫就宣布戈尔巴乔夫已经开始失去往日的光彩，这比戈尔巴乔夫下台早了两年。虽然如此，他当时仍然一如既往地按照他自己的建议方式向戈尔巴乔夫施加压力，迫使戈尔巴乔夫选择正确的道路，同时尽他所能给戈尔巴乔夫以支持。

现在，这位萨哈罗夫就站在讲台上，作为这次神圣的大会的一名全权代表，他要向他的同事们发表讲演。尽管戈尔巴乔夫面露愠色，但他控制住了自己，没有发作。

萨哈罗夫说他要代表“ 一部分莫斯科代表 ”讲几句话，他在讲话中提出了两条莫斯科代表们认为原则上非常重要的建议：第一条，作为人民代表大会，不应把它看成是低一级的最高苏维埃，它应享有全权的立法权威；第二条，对最高苏维埃主席同时也是国家新元首的选举不应像事先安排的那样在会议之前进行，而应在会议结束时，也就是在完成所有议题讨论并考虑了所有潜在候选人之后进行。在提出这条建议时，他表明立场说他本人支持戈尔巴乔夫当选主席，但他认为在讨论之前进行选举会开启一个不好的先例。

萨哈罗夫讲话时，大厅里一片噪杂，以致最后无法听清他的讲话内容。戈尔巴乔夫打断他的发言，说每位代表只有五分钟讲话时间，萨哈罗夫应该结束他的发言了。紧接着在进行投票表决时，他的建议就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看到这种场面，我的内心很复杂。一方面，允许萨哈罗夫甚至在议程安排的辩论之前发言，这是令人鼓舞的；可是另一方面，大厅里的对立情绪却是一个不祥征兆；代表们的精神状态表明他们的思想并不开放。

同时，我觉得萨哈罗夫和他的同伴并未对其发言选定的主题作出准确判断。不管戈尔巴乔夫已经变得多么自由开放，萨哈罗夫在大会上的发言还是

有一定时间限制的。我怀疑他讲的两个问〔206〕题是否真正就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他就不能等一等，而利用他所得到的有限时间讨论一下更为重要、更为急迫的问题，我对此迷惑不解。

我明白为什么萨哈罗夫会提出只有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通过立法这条建议，他正是考虑到了这次大会是真正选举出来的大会这个事实。由代表大会选出的最高苏维埃至少从理论上讲更易驾驭，其成员的责任也不会局限于某一特定选举人团体。

然而，我却深深怀疑这样一个拥有 2250 名成员的立法机构的办事效率，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有其他的专门工作，因此很难聚在一起开会。另外有一点我不清楚的是，难道规模小一点的机构就比大一点的容易驾驭？我认为，机构不管大小，都应该由一批专职的立法成员组成。如果说他们只有放弃其他工作，才会充满热情地来维护这个立法机构的独立与特权，那么这样他们的热情程度难道不是比偶尔参加一次会议要高得多吗？

当时在我看来，这种由人民代表大会和经其选出的最高苏维埃组成的双层结构所带来的缺陷，可以由大会期间即将草拟并通过的新宪法得到最好的纠正。这也是一个最好在当场予以充分辩论的关键问题。

至于萨哈罗夫的第二条建议，我认为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主要是从理论上而言。戈尔巴乔夫将当选这个有争议的职位，这是毫无疑问的，任何的辩论也无济于事。连萨哈罗夫本人不是也赞成戈尔巴乔夫当选吗？然而，这么做也确实是开了一个不好的先河。我不明白戈尔巴乔夫为什么没有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可以轻松地接受这条建议而不会对他造成任何损害。

这场短暂的交锋使我进一步看清了两人的某些重要区别。尽管萨哈罗夫对政治手腕这门艺术有很强的领悟力——这往往能使一个人对权力的追求如愿以偿，但他对重要原则的辨识力却不及他对政治艺术的领悟力，他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上的观点就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即戈尔巴乔夫，则是个执拗之人。一旦认定某条路，他就会坚持到底，而完全排斥其他可能性，并利用所掌握的全部操纵性技巧来获取某种东西，而对这种东西他本人并不见得有着浓厚的兴趣。戈尔巴乔夫不可能成为一名好棋手，因为他不会为了几步之后能吃掉对方一个马而现在牺牲一个卒。〔207〕5 月份的这天上午，我确实浮想联翩。在进一步对这个新产生的国会进行探讨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回过头来剖析一下新国会的成员，以及了解一下他们是如何取得这种资格的。他们中多数是共产党员，但他们与过去苏联国会那些掌握着枯燥无味的橡皮图章的人是不是一脉相承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先必须回顾一下这次大会之前的那场选举战。

1989 年的选举运动

我确信，当 1988 年 12 月党的中央委员会通过新的选举章程、上一届最高苏维埃又将之制定为法律条文时，绝大多数共产党官员都坚信下会发生什么真正的变化。不错，他们在选举之前确实要通过一个提名过程，并受到强烈鼓励（尽管并非绝对要求），要他们为每一个职位指定一名以上候选人。但这些选举上的技术性处理当时在他们看来决不会失去控制。由于各地党组织将掌管各选举委员会，他们能够主导整个提名过程的走向，并选出一个即便是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也绝对不会失利的候选人名单。

在许多司法管区，尤其是在农村管区，一切都按其所料顺利发展。但在许多其他地方，特别是在主要的大城市，官员们对所发生的一切不由大惊失

色。

共产党命运最引人注目的转变就发生在首都本身，在这里，鲍里斯·叶利钦赢得了决定性胜利，这为他重新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了赢得这场选举的胜利，他不得不与党的机器以及戈尔巴乔夫进行较量。戈尔巴乔夫就置身党的机器之后，只是偶尔露露面，表明他在操纵这台机器。

叶利钦自从被赶出政治局之后，就从新闻媒介中消失了。他已经感觉到这次选举是他东山再起的大好时机。因为这是苏联历史上第一次这样的选举，它有可能通过无记名投票为否定共产党的统治打开通道。

如果提名是根据人民的支持程度而定，叶利钦可以在这个国家任何一个选区获取提名。然而，提名的过程远非这样的简单，确认候选人的选举委员会由当地党组织控制，它们会使出浑身解数，以确保他们所喜爱的候选人不会遇到任何大的麻烦。

因此，为了谨慎起见，叶利钦首先在家乡乌拉尔一农村地区〔208〕借偶然出席当地一次关键会议之机获取提名。而这一切都是在当地党的官员不知不觉中进行的。

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他所寻求的目标比这要重要得多。他把目标集中到了全国政治上最能有所作为的地区，即国家领土第一区，它包括整个莫斯科市 600 万之众的选民。在那儿开展选举运动可以引起全国的注意，倘若叶利钦取得了胜利，仅就人们偏爱宠儿这一规律而言，这种胜利就不可能被篡改。更进一步说，在莫斯科获胜，还将使他尝到战胜该市党组织的快意，毕竟，是他曾领导过的这个组织将他清除并使他受到侮辱的。

最终确认候选人的公开会议就安排在圆柱大厅里召开，该厅在位于红场和克里姆林宫外边的一座历史建筑物内。早先，这幢建筑是莫斯科贵族的俱乐部，后来被改为官方贸易联盟组织的办公地点，并由此得名为联盟大厦，但常常被派作政府组织的活动场所之用。30 年代臭名昭著的大清洗审判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安德烈·维辛斯基曾在这里怒斥斯大林的的政治反对派，并最后以明显错误的指控判处这些反对派死刑：在这里也曾停放过许多领导人火化前的尸体，如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1988 年也正是在这里表演了拉赫玛尼诺夫的《晚祷曲》，那是自 1917 年革命以来这首浑宏的合唱乐曲首次公演：由于它有很深的宗教含义，直到提倡公开性时才被允许公演。

最后的提名大会于 2 月 22 日召开。莫斯科党的官员谨小慎微地仔细安排了此次会议，以期使这次会议既能体现民主气氛，又能实现预定的结果。虽然登台演讲者包括叶利钦在内共有 10 名候选人，但参加会议的代表都经过了精心挑选，目的是确保吉尔汽车厂经理尤里·勃拉科夫和著名宇航员格奥尔基·格列奇科这两位候选人获得最高选票。如果一切顺利，莫斯科党组织就可使这两位候选人得到确认，同时，也将因为赢得了一场充满竞争的选举而感到自豪，并避免出现叶利钦获胜所带来的尴尬。这些党的组织者们对结果充满信心，并让莫斯科地方电视台转播大会实况。这一切都是为了再次羞辱一番叶利钦。

对当晚收看电视的莫斯科人来说，党的官员们将会如愿以偿，〔209〕叶利钦面对的是黑压压的对他怀有敌意的代表们。那天，叶利钦首先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是选择了一些最尖刻的问题，写在纸条上递上讲台，要求演讲者首先予以回答。许多演讲者痛斥叶利钦这种行为，并要求他收回提问，但他在这场暴风骤雨般的批评之中岿然不动。他之所以毫不妥协退让，是因为

他掌握了在座的代表们以及收看电视的观众们都不了解的情况而心中有数：格列奇科曾事先告诉他，说他将在投票之前放弃参加竞选。叶利钦当时请他等到最后一刻再宣布自己的决定，这样党的组织者就没有时间来重新确立一名候选人。

会议马拉松般召开了 12 个小时，连凌晨的电视转播也已停止（或许是因为转播人员已精疲力尽，或许是因为大会组织者发现会议有点失控），直到这个时候，代表们才开始投票。勃拉科夫如预期的那样获得了最多选票，但随着格列奇科的突然退出，叶利钦进入了第二名，这使他成了当然的候选人。

这个时候再把叶利钦清除出去，那真是对整个选举的莫大嘲讽，戈尔巴乔夫担当不起这个责任。

虽然共产党仍然可以通过控制大多数媒介来阻止叶利钦进行竞选宣传，但他的支持者总有办法来加强叶利钦的宣传攻势。宣传材料开始以令人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有一天，一个朋友给我看一份我从未听说过的出版物的复印件，版面上赫然印着“ 推动者 ”，这个单词俄语与英语的拼法与意思都一样。这份宣传品共有四页，载明了叶利钦的竞选纲领。后来人们发现是闻名遐迩的莫斯科航天研究院的院长尤里 · 里若夫指使研究院的学生报纸《推动者》刊载这篇宣传品的（这个研究院不但是苏联高级航天工程师的母校，也是许多政治人物如叶戈尔 · 利加乔夫以及长期任苏联驻美大使的多勃雷宁的摇篮）。印刷者花了大量的时间将这一期比平常多印刷了好几万份。

依其产生的效果，叶利钦也许根本不需要进行通常意义上的政治竞选。随着共产党对他的敌意越来越公开化，他在人民中的威信也如日东升。公众的态度是，凡是共产党厌恶的人，无论是谁，都一定是位英雄。共产党官员掀起的反叶利钦运动不仅无效，还成了叶利钦最强大的政治资产。

〔210〕不过，他获胜的程度还是令人震惊。1989 年 3 月 26 日第一轮投票选举之后，统计结果令当局大吃一惊，叶利钦获得了 89.4%的选票，而勃拉科夫只得到了 6.9%的选票。反对叶利钦的莫斯科党组织全线崩溃。当宣布选举结果时，我问戈尔巴乔夫的几名亲信他们是否感到惊讶，他们的回答众口一词：“ 我们知道他会获得胜利，但他以如此的优势获胜出乎我们的意想。 ”

对我来说，叶利钦大获全胜并没有令我无比惊讶，我感到更为吃惊的是选票的公正统计。尽管可以指责戈尔巴乔夫玩弄阴谋诡计，企图阻止叶利钦东山再起，但通过最后的分析来看，戈尔巴乔夫的表现说明他不会牺牲自己改革苏联政治结构的目标，来换取个人报复心理的满足。这样，通向俄罗斯民主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就竖立起来了。

3 月 26 日那天，叶利钦并不是唯一一位取得选举辉煌胜利的候选人，勃拉科夫也不是唯一的失败者。许多选区，特别是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与共产党官员竞争的候选人都取得了胜利。许多对共产党领导不满的知名学者以成功的竞选向现有的体制发起了挑战。

奥列格 · 博戈莫洛夫这位长期以来一直担任一东欧问题研究所所长的学者就是其中一例。他是在莫斯科一郊区参加三人竞选的。曾有一段时间他感到非常沮丧，因为他的竞争对手之一、当地党组织的一名负责人不但调动党组织为自己服务，而且还通过各种龌龊的伎俩，想方设法来丑化他。在第一轮投票结束后，博戈莫洛夫获得 60%的选票，他感慨道：“ 我没想到与共产党竞选竟有这么大的优势。 ”

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西耶夫也在莫斯科郊区一选区获胜，他在一个负责培训档案保管员的机构中工作。他看起来比他 55 岁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他生就一张粗犷而迷人的脸，又有一副足球后卫的硬朗骨架——也许退出绿茵场已有多年。尽管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但他以激进的改革派知识分子而著称，呼吁建立一个开放、多元的政治体系，对过去滥用职权的现象予以充分曝光，建立一个自由的经济体制，结束警察的镇压活动。他的演讲才能与他强硕的体格相得益彰，在规模盛大的游行队伍面前进行的公开演讲尤其富有感染力。

法学教授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在列宁格勒一个主要由工人阶〔211〕级居住的选区获得了胜利。尽管他面临当地党的机构对他有组织的挑战，包括编织一些诸如生活作风败坏、酗酒、毒打妻子的恶毒谣言对他进行中伤，但他还是取得了选举的胜利。因为公众很快就识破了事情的真相，对这种谣言不屑一顾。像阿法纳西耶夫一样，索布恰克也是个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看起来比他实际年龄 52 岁要年轻的学者。他是位以法治国的热情拥护者，要求对腐败现象严加惩处，成了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中最为活跃的一名成员。

获得大选胜利的候选人并非都声名显赫；一些人很年轻，在选举获胜之前默默无闻。比如，赢得莫斯科工人阶级居住区切廖莫什金选区胜利的美国史专家斯坦凯维奇只有 35 岁；两年前一踏上政治舞台就在莫斯科市参议会赢得一席之地、并且在这次选举中很轻松地在自己家乡取得胜利的物理学家阿尔卡基·穆拉谢夫仅 32 岁；还有当时未满 30 岁的伊利亚·扎斯拉夫斯基。他参加了莫斯科十月选区——为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而命名的地区——的竟选，从未加入共产党，且自孩提时就身有残疾，不能长久站立，没有拐杖也无法行走。

斯坦凯维奇、穆拉谢夫、扎斯拉夫斯基这些人相继在这次民主运动中脱颖而出，成了民主运动中的佼佼者。他们既为他们的资深长者公开摇旗呐喊，也以自己的热情与组织才能筹划了一次富有成效的宣传运动。斯坦凯维奇是众多反对政府政策宣言与出版物的主要起草人，穆拉谢夫是示威游行和公众活动的组织者，而扎斯拉夫斯基则是自由经济和支持残疾人公共事业的最执著的辩护者。扎斯拉夫斯基对苏联现行体制的感受告诉他：一个宣称关心所有大众利益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质上只是为一小部分掌权者谋福利；另一方面，经济上的自由能够提高生产力，也将创造一个能更好地关怀那些真正需要关怀者的社会。

苏联的政治舞台一直是男人们的天下，只是在赫鲁晓夫时期出现过一位女政治局委员，名叫叶卡捷琳娜·福尔采娃。但即便

在那时，她也没有成为领导核心中的真正一员。在中层政治机构以及中层管理机构中虽然有一些妇女官员，但与她们的总人数是不成比例的。上一届最高苏维埃里有相当数量的妇女委员，但吸收她们进去只是要补充为“挤奶女工和纺织女工”非正式保留的。〔212〕代表配额，而且，她们既不可能享有什么政治权力，也没有占据有影响力的位置。

虽然新的人民代表大会里的妇女成员比上届少一些，但她们大都是选举的获胜者，有些还是打败了一些非常难以对付的竟选对手而进入代表大会的。比如，研究人种学的女学者叶夫多季娅·盖叶尔就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选举中击败了远东军区司令员维克多·诺瓦兹洛夫将军，与莫斯科的叶利钦可

说相互辉映。盖叶尔约 55 岁时成了寡妇，穿上鞋也不到 5 英尺高，来自纳纳伊这个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她的胜利犹如一名阿留申部落或特林克特部落的妇女在阿拉斯加赢得了当地角逐美国参议员席位的胜利。所不同的是，她获得了好几百万选民的支持，而不是像在阿拉斯加那样只 10 万多张选票。随后，当共产党的一些坚定支持者向安德烈 · 萨哈罗夫发难时，只有盖叶尔夫人一人站到那个与她差不多高的讲台前，痛斥攻击萨哈罗夫的人无耻。

虽然没有要求候选人非得居住在本人参加竟选的地区，但是，大多数候选人，男性也好，女性也好，都喜欢在他们的家乡或在家乡附近的地区进行竟选。加利娜 · 斯坦罗伏伊托娃这位在莫斯科工作、专攻民族问题的俄罗斯族历史学家却是个例外。她在亚美尼亚开展了一次成功的选举运动，在其首府埃里温的一个选区赢得了一个席位。她后来成为大会改革派中最活跃的领导人之一。

有时，一些共产党官员精心策划一场没有竞选对手的选举，可往往遭到 " 不选名单上任何候选人 " 这样的打击。列宁格勒党组织的大老板尤里 · 索洛维约夫就是这样一位苦命人。在总共 24 万张选票中，他只获得其中的一万张选票，就这样在一场没有对手的竟选中失败。索洛维约夫是政治局中唯一一名遭受这种难堪的候选人，但是较低层的共产党候选人在许多选区都遭受了他这种命运的嘲弄。正如一位俄罗斯朋友所言，在没有对手的选区失利的人肯定不是一般的人，但是，这种不一般的人在党的高层领导人中还比比皆是。

根据新的选举章程，当一个选区出现三名或更多的候选人并且没有一位候选人在选举中获得决定性多数的时候，就要在获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之间重新投票表决。当单一候选人在选举中没有获得决定性多数票或者在第二次投票选举中两名候选人都没有获得决定性多数票时，就得重新进行提名，然后再进行投票选举，而失败的候选人没有资格再竟选。

〔213〕很多原来的候选人都被选民在第一轮投票中淘汰，这为参加第二轮投票选举的候选人提供了新的竞争机会。《星火》的主编维塔利 · 科罗季奇就是这样一名候选人，在第一轮选举中，他曾被一次营私舞弊的提名会议强制性地从莫斯科一选区的候选人名单中除名。当共产党的所有候选人在哈尔科夫选区失败后，他被提名参加该地区的第二次选举，结果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诗人叶夫根尼 · 叶夫图申科也是这样，在第二轮选举中取得了胜利。

55 岁的科学家斯坦尼斯拉夫 · 舒什克维奇在明斯克一选区的第二轮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共产党的候选人在第一轮的选举中均遭淘汰，当时身为白俄罗斯州立大学副校长的舒什克维奇在朋友劝说下参加了新一轮竞选。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后，他经历了一段耀眼而短暂的政治生涯，两年半后，成为新独立的白俄罗斯第一届总统，达到了巅峰。

新人民代表大会 2250 个席位中只有 1500 个席位是在选区选举出来的。总席位中有 1/3 被分配给了一些 " 公共组织 " 里的代表们，如共产党组织及其各下属机构。其目的很明显，就是使一些高层领导人如戈尔巴乔夫不必参加竞选，也不必冒失败的风险，就可进入新的代表大会。从理论上讲，戈尔巴乔夫有权通过党中央委员会提名 750 名代表，因为法律规定共产党是所有有权 " 选举 " 代表的组织的 " 领导核心 " 。

然而，这些组织有些已经摆脱了党的严格控制，其他还没有摆脱共产党控制的组织也在选举运动的刺激下努力摆脱其束缚。苏联科学院的主席团试

图沿用陈旧的方式选出代表，结果遭到了抗议，其影响所及更远远超出了科学院本身。

科学院提出的候选人名单所引起的争议，并非针对已列入名单者，而是针对未列入名单者，即科学院中最富盛名的两名科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和空间科学家罗阿尔德·萨格捷耶夫。两人以拥护激进改革而闻名，且都是当权的共产党信徒所憎恨的对象。当主席团公布候选人名单时，立即引起了学院内外的抗议。〔214〕

选举章程规定主席团的提名必须获得成员总体上的支持，这在过去只是一种形式。但这次已行不通了。院里开始出现了示威活动，要求撤销这个官方提名，强迫主席团出示一份更能被广大成员接受的候选人名单，这份名单至少要将萨哈罗夫和萨格捷耶夫包括进去。

几个选区的居民也催促萨哈罗夫出来参加竞选，而且，如果他被允许列入这些选区的候选人名单，只要他不反对叶利钦这位受人欢迎的人物，就能毫不困难地赢得选举。几经犹豫之后，萨哈罗夫最后拒绝了在院外参加竞选，因为他整个成年期的生活都与这里密不可分，而且他还声明说，如果他最终成了议员，那也将是同事们成全的结果。

结局正是如此，科学院的成员抛弃了大多数原先提名的候选人，迫使院内进行了第二次选举。结果，萨哈罗夫，萨格捷耶夫以及其他不少改革者都获得了多数票。

科学院并不是唯一按自己的方式推选国会代表的组织。例如，电影导演联盟就递交了一份代表名单，全部由激进的改革者组成，这些人在其他知识分子占主导地位的团体里也是引人注目的明星。

经济领域的主要学术出版物《经济问题》杂志的主编加夫里尔·波波夫是由科学和工程协会联盟选进人民代表大会的。波波夫中等身材，头发修剪得很短，几乎是个平头，留一撮小胡子。他平生对打领结很反感，常常在公开场合穿一件运动衣和敞领的 T 恤衫，甚至在正式场合也是如此打扮。以前他着重于理性思维，曾写过不少有关管理问题的文章，但现在正把注意力转向经济与政治领域最根本的一些问题上。

同样，隶属科学院的几个科学协会和社团将塔基亚娜·扎斯拉夫斯卡娅选进代表大会的情况基本类似。她是苏联最杰出的社会学家，也是为数不多的民意测验专家。她的许多调查结果都要保密，以免公众了解到人们对党不恭的事实真相。但是，随着公〔215〕开性的实行，越来越多的测验结果得以公开发表。改革派力量也更多地利用这些调查结果来加强他们加速改革进程的要求。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新国会得到了 100 个席位，是单一组织分配到的最多席位数额。可以肯定他说，戈尔巴乔夫掌握着这个组织的控制权。在代表的挑选上，戈尔巴乔夫做了某种平衡处理：它既包括几名高层领导人，如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也包括一些来自社会各个部门的人员，如经理、军官、作家、农委主席等。

总的来说，其人员构成中没有几位改革家，更多的倒是一些华而不实的官僚。

当选举结果陆续公布之后，戈尔巴乔夫吹嘘说，在这次选举中共产党人取得了胜利，因为选出的代表中 80%是共产党员。雷日科夫则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当时曾反驳戈尔巴乔夫的看法，提醒他说共产党实际上是失败的，

因为有 30 名重要的地区领导在选举中失利，而且，许多共产党员之所以能在大选中获胜，并非因为他们认同共产党，而是相反。④那时，我并不了解他们有此交锋，但我的判断与雷日科夫不谋而合。

虽然并非每个选区的选举都是公正进行的，许多、甚至是大部分地区都不是这样；虽然大选后并未出现一个明确以建立法治基础上的宪政国家为职志的议会，其中的许多代表也还是保守的共产党，他们决不愿失去任何权力，但总体来说，整个大选的结果仍鼓舞了那些希望苏联实现民主的人士。

之所以说选举的结果令人振奋，是因为在苏联的历史上第一次经过选举产生了这样一个重要机构，其中的许多代表面对顽固政治势力依然赢得了竞选的绝对胜利。同样重要的是，有为数不少甚为独断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大选中惨败。这次选举并非最后一次，它传达给广大公众的信息是，只要你认真尝试，你就能够在选举中击败官方提名的候选人。

这次选举运动所产生的另一个结果是公众的态度发生了深刻变化。突然间，人民都不再惧怕直抒胸臆了。这种变化在苏联这样的国家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几十年前只要政府怀疑你持有异议，你就会有生命危险，就在最近，对持异议者也是以蹲监狱或流放加以惩戒。而现在，似乎是一夜之间，每个人都开始对共产党的统治进行最毫不留情的抨击。

〔216〕当我收看 1989 年 3 月 26 日这一选举的晚间新闻时，就强烈感受到了这种气氛。当时选举结果还没有出来，要等到第二天才会知晓，但电视记者采访了正要离开投票点的选民，询问他们赞成的是什么或反对的是什么。虽然电视中只编辑了几个片段，但这些被采访的选民无一例外他说他们是为了变化而投票。一位年轻的妇女干脆这样说：“我投票反对我们目前的一切，我投票赞成我们将来拥有的一切。”一位被采访的老人一开始对他们能否在电视上播出他的讲话内容表示怀疑，当得到保证后，他说：“嗯，我投票就是为了反对他们，他们所有的人，”

对于苏联人来说，希望清除恶棍并不稀奇，熟悉苏联舆论的人也不会对此感到惊讶。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人们开始公开地抒发自己的意见，甚至敢于在电视镜头前这样做，而媒介还播放这些言论。

一种新型的国会

尽管一开始出现了一些与会议计划有点偏差的情况，但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总的来说还是按戈尔巴乔夫及其助手预定的程序进行着。辩论非常热烈，且常常涉及一些根本性问题。在决定性的投票之前往往要经过一番幕后的交易，戈尔巴乔夫在其中明显占据了优势。

这次大会有几次险些使它自己名誉扫地。针对萨哈罗夫的一场有组织的诽谤失去了控制。发言者一个接一个指责萨哈罗夫侮辱苏联军队，其用词大有斯大林痛骂对手的遗风。戈尔巴乔夫也许并没有指使他们这样做，但他也无意去制止这场诽谤。

第二次与叶利钦有关。大会的责任之一是从各级代表中选出最高苏维埃，以作为常设议会机构。其成员构成约占代表大会成员的 1/4，也就是从 2250 人中选出 556 人。叶利钦宣布他有资格成为最高苏维埃的候选人，而且，以他在莫斯科获得的辉煌胜利，如果代表们希望出现一个民主议会，叶利钦受到忽略就是不可想象的。然而，这种不可想象的局面几乎成真。

除俄罗斯之外的所有共和国的代表团都决定按分配给的自己的名额向大会提交一份数量相同的候选人名单。人们期望大会批准各共和国选择的代

表。俄罗斯代表则决定，来自俄罗斯的提名。〔217〕数应超过大会分配的席位数，以便给大会留有选择的余地，并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叶利钦是俄罗斯候选人之一，但当举行无记名投票表决时，他因得票太少而无法进入最高苏维埃。俄罗斯在最高苏维埃中拥有 11 个席位，投票结果是叶利钦得票第 12 位。这次投票进一步证实了已明显存在的倾向：大会中的多数代表更倾向于支持共产党现有体系，而不愿支持有可能削弱这一体系的改革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对叶利钦的抛弃就威胁到了戈尔巴乔夫孜孜以求建立起来的新制度的信誉。

阿列克谢·卡扎尼克这位一直不引人注目的 47 岁法学教授挽救了这一局面。他来自西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城，其刚硬的胡须、黝黑的面颊以及洁白的下巴使成千上万的电视观众从很远就能辨认出他。在俄罗斯争取最高苏维埃职位的候选人中排名第 12 位的他之所以被列入俄罗斯的候选人名单，只是因为叶利钦和其他人坚持要给代表们留有选择余地。卡扎尼克宣布，如果他对叶利钦没有选进最高苏维埃负有责任的话，将无法面对他家乡的选民，因此他要让出他的席位。

代表大会选戈尔巴乔夫为最高苏维埃主席，依过去惯例，他同时也成为国家元首。为追求这一结果戈尔巴乔夫曾两次失去了为民主程序确立先例树立榜样的机会。第一次是他怂恿大会拒绝萨哈罗夫的建议，即先进行议题辩论，而后举行投票选举。第二次是他允许进行对候选人没有选择余地即非差额的选举。

来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一位哲学教授、后在叶利钦政府中成为知名人物的根纳季·布尔布利斯，曾提名叶利钦为竞争最高苏维埃主席一职的候选人，但为后者所拒绝。但无论如何还有一位来自摩尔曼斯克附近一地球物理研究所的 45 岁工程师亚历山大·奥波林斯基，以毛遂自荐的方式，表达了自己渴望成为一名候选人的心情。

对此戈尔巴乔夫未明确表态，后由全体代表投票表决，结果以 2 比 1 的比例反对增列奥波林斯基为候选人。假如戈尔巴乔夫当时要求进行一次竞争性选举的话，这次投票就会带来另一种发展方向。

〔218〕戈尔巴乔夫鼓励党内其他官员参加竞争性投票选举，而他们中有许多人觉得戈尔巴乔夫也应允许第二名候选人与他同台竞选。但戈尔巴乔夫显然无法容忍一些代表可能在无记名投票中拥护其他人的想法。这次投票结果是 2123 票赞成戈尔巴乔夫当选，87 票反对。即便奥波林斯基参加竞选，他的得票数也不太可能超过 87 票。可以想见，如果戈尔巴乔夫允许有人与他同台竞争，反对戈尔巴乔夫的票数只会少于 87 票，因为有些代表之所以投‘反对”票，很可能只是对戈尔巴乔夫无对手竞选的抗议。

无论如何，戈尔巴乔夫的候选人资格也并非完全像过去那样，不会遭到任何非议。在投票之前对此就曾有过广泛而相对开放的辩论。

例如，来自爱沙尼亚的马留·劳利斯庭就在辩论中向戈尔巴乔夫提了三个问题：有关保证各共和国主权的规定到底有何章何款已被纳入新宪法？在一个民主国度里使用军队来对付市民的游行到底能不能容忍下去？4 月份在第比利斯发生血腥镇压示威群众之前政治局里到底有谁事先就知道？另有一位代表诘问戈尔巴乔夫是否正在挪用政府的金钱来在克里米亚营建自己的度假别墅。还有些人提醒戈尔巴乔夫，他的威信正在下滑，因为改革的进展过于缓慢。好几位代表要求，若戈尔巴乔夫当选了这个立法机关的主席，就应

辞去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戈尔巴乔夫在投票之前对其中大部分问题都给予了回答，但对劳利斯庭的问题则没有做出明确答复。

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紧接着召开了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公众日益喜爱（有些人甚至迷恋）收看政治辩论节目，并为此而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欣喜。因此，像人民代表大会一样，电台对最高苏维埃会议也进行了全面实况转播，不过都是在晚上，这样人们就不至于为了收看实况转播而影响工作。

新的最高苏维埃不失时机地展示了它的独立性。总理雷日科夫公布的各部长提名一个接一个地遭到否决。到第 11 位时，我没有再继续数下去（总共约有 60 个部长职位）。晚餐时，代表们开玩笑说，他们坚持的标准比美国参议院高，在美国，参议院很少拒绝已经确定了的内阁提名。

第一次会议的辩论相当激烈。因为我们几乎每晚都很忙，我〔219〕就设置好录像机，让它自动录下白天的会议实况，以便晚上回来再看。因此，我常常熬到深夜，但我觉得这么辛苦价有所值。许多议员提出的问题都是关于新宪法秩序的关键问题，其中的能言善辩之士也决不在少数。对他们在原有体制限制下能保持如此高的素质和迅速适应国会激烈辩论的能力，我只能感到惊奇。

一开始，戈尔巴乔夫白天总是花大量时间来主持最高苏维埃会议，并因此加强了这个新生立法机构的权威性。后来，由于其他事务缠身，他把会议主持工作交给了副手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

卢基扬诺夫与戈尔巴乔夫曾同时就读于莫斯科大学法学院，据此很多人认为他俩从大学时代就开始成为密友。无疑，那时他们都彼此相识，并一起在共产党青年组织（共青团）里共过事。但卢基扬诺夫比戈尔巴乔夫大两岁，他们的关系也并不亲密。但不管他们学生时代是否关系密切，卢基扬诺夫现在是戈尔巴乔夫的接班人，他们一度似乎相处融洽，合作愉快。

卢基扬诺夫在中央委员会里工作的时间非常短，鲜为外界注目。只是担任了最高苏维埃的现任职位后，才开始在新闻媒介频频曝光。电视观众很快就熟悉了他那不苟言笑的表情和维持会议秩序时的粗哑嗓音。他严格地行使着他的职权。也许是因为改革者比保守者讲得多，也许是出于自己的偏见，总之，在限制发言时间方面，人们更常见到他中止激进改革者们的发言。

尽管卢基扬诺夫很少露出笑脸，但他偶尔也会冒出一两句惊世骇俗之语。有一次我参加由他主持的交流会，交流的对象是来自新泽西和马里兰州的美国高中生代表团，这是双方交流计划的一部分，源于我为日内瓦美苏首脑会谈起草的一份计划。我非常高兴地应邀参加了他们与卢基扬诺夫的会谈。

当我发现这群年轻的美国学生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并能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时，更是感到高兴。这项交流计划正像我所希望的那样非常成功。学生们说话言简意赅，而且，他们对苏联的了解甚至超过了一般美国国会议员。

卢基扬诺夫一一回答了他们关于新国会及目前政治形势的问〔220〕题，这时有位美国学生突然对他的回答进行了反驳。这位美国学生问道：“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结识的苏联朋友却不能得到护照，访问我们的国家呢？”

卢基扬诺夫一时语塞，直视着这群美国学生，然后说：“这说明人类的愚蠢行为能够达到何等程度。我们将研究这个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你们的朋友就可以得到护照去国外旅游了。”接着，又有人问：“那么，他们能用

卢布兑换美元吗？”

“这我无法向你们作出保证，”卢基扬诺夫回答道，“我们至今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那一天，卢基扬诺夫的回答至少是诚实而又直率的。然而，在随后几个月里，我发现他的改革主张更接近于利加乔夫而非戈尔巴乔夫的观点。

萌芽期的反对党

尽管改革派没有能够主导新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所属机构最高苏维埃，但他们并非无足轻重的少数。他们中有人曾横扫莫斯科市的选举，有人来自许多其他大城市如列宁格勒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其代表性非常有分量。他们在波罗的海的代表中形成了多数，还有分散在其他地区如高加索、乌克兰及远东的代表。而且，许多由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占主导的组织也都站到了民主活动家的一边。

由于这些代表思路清晰、目的明确，再加上电视的转播，他们虽人数不多，却往往能在公开场合制造出轰动效应。然而，他们的数量毕竟有限，除非戈尔巴乔夫支持他们的立场，帮助他们拉选票，不然他们还是很难施加有效的影响。

很明显，他们需要一个组织来协调他们的政治行动，但他们大多仍是共产党员，而党章又规定禁止搞宗派主义。因此，他们小心翼翼地称他们的组织为“小组”，而不是“宗派”或绝对禁止的对象“政党”。

莫斯科来的代表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在代表大会的第一天，萨哈罗夫就是代表他们的利益而上台讲话的。他们在整个会议期间一直开展活动，网罗那些与他们看法相一致的来自其他共和国的代表。

〔221〕莫斯科的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如萨哈罗夫、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塔基亚娜·扎斯拉夫斯卡娅、加夫里尔·波波夫都加入了一些年轻代表的行列，这些年轻代表里有谢尔盖·斯坦凯维奇、阿尔卡基·穆拉谢夫、加利娜·斯塔罗伏伊托娃、伊利亚·扎斯拉夫斯基。他们还在来自其他地区的代表中找到了知音，如来自列宁格勒的索布恰克和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盖叶尔，与此同时，他们也与叶利钦建立了牢固的联盟。

许多莫斯科的知识分子对叶利钦的改革承诺并不抱什么信心，即使在他获取了莫斯科选举的辉煌胜利之后，这种疑虑还是没有消除。他本人是个地道的非知识分子，给许多人的印象倒像个典型的党老板，只是为了个人的政治野心而与现存政权进行斗争，而非为了实现他政治上的承诺。戈尔巴乔夫 1987 年对他的指责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知识分子对叶利钦的态度，而叶利钦本人则更愿与劳动人民而非知识分子打成一片。

不过，改革派与叶利钦还是互有需求。尽管改革派知识分子在选举中的表现也不俗，但他们还是需要与这位善于在选举中拉拢选票的叶利钦建立同盟关系。至于叶利钦，自从 1987 年被革除领导职务之后，就一直在政治舞台上孤军奋战。这段时间，他合作的对象是列夫·苏哈诺夫领导的小部分报纸编辑人员，列夫·苏哈诺夫是他在国家建设委员会里认识的，再加上少数几个同盟军，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大学教师根纳季·布尔布利斯，莫斯科新闻记者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等，这位记者总能在关键的时候给他出谋划策。当时，叶利钦自己的纲领依然不系统，主要内容是反对共产党的统治，加速推动改革。叶利钦要想对立法施加影响，既需要有系统的政策，也需要有组织方面的支持。

莫斯科的改革派一度曾在党的政教大楼里聚会，但当最高苏维埃临时搬到离红场不远的莫斯科饭店办公时，其起草宣言与规划立场的大部分工作也就改在了为叶利钦配备的办公室里（叶利钦当时任最高苏维埃建设与住房委员会主席）。莫斯科市以外的代表也住在同一个饭店里，它为建立同盟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场所。对于那些以使国家回归真正列宁主义原则为己任的人来说，这里的景致也可提供某种灵感，因为从办公室窗户在外看就能直接看到马路对面用红砖砌就的宏伟的列宁博物馆。

到那年夏天，已有 300 多名代表表示对他们这个活动小组感

兴趣。7 月 19 日，叶利钦向最高苏维埃通报说，旨在组织一个“ 跨地区代表团 ”的协调机构已经建立，计划月末召开成立大会。〔222〕地区间小组的目标是要“ 加速改革的进程 ”，并将为实现这个加速采取更加果断一致的步骤。叶利钦虽然没有明确使用“ 反对 ”这个词，但他却明确了这个在最高苏维埃里属于少数派的小组将要发挥的作用：将作为一个反对派为立法机构起草供选择的建议。就这样，在苏联首次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反对派，并获得了不止一个共和国的支持。它使自己合法化的方法是将自身定性为一个支持改革的组织，这也是此后各共和国民族阵线所使用的方法。

这一组织的创建者还采取了在竞选期间，尤其是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大选中行之有效的策略，即组织群众示威游行。由于在国会中有高票当选的优势，仅在莫斯科一市他们就能够吸引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参加群众集会，随后，他们开始定期举行这样的集会，在最高苏维埃会议期间，尤为如此。由于“ 保守派 ”反对激进改革的主要理由是社会不会支持这种改革，所以这些有能力聚集比其对手规模更大的群众集会的改革派，在即将来临的冬天和春天，越发重视发挥这个潜在武器的威力。

激进改革的支持者认为自己与最高苏维埃中的多数派格格不入，而戈尔巴乔夫当时却认为他们是一个非常忠实的反对派。事实上，大多数人仍然认为自己是戈尔巴乔夫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唤起公众对改革的支持，以使戈尔巴乔夫最终摆脱共产党顽固分子的束缚。有些在戈尔巴乔夫当政之前拒绝加入共产党组织的改革者，现在也已决定加入共产党，以便能向戈尔巴乔夫提供支持。索布恰克和斯坦凯维奇就是这样的两位代表，他们分别于 1987 年和 1988 年加入了共产党。

当时，甚至叶利钦在口头上也坚持说，他的主要任务是支持戈尔巴乔夫采取正确的行动，而不是向他发出挑战或是反对他。3 月份大选获胜后还不到几个星期，我问叶利钦他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如何，他回答说，他们曾私下里长谈了近一个小时，叶利钦希望他们俩能定期接触。“ 我认为他开始能够倾听别人的意见了，”叶利钦补充说，“ 不过，戈尔巴乔夫仍然与利加乔夫和保守派过从甚密。大选也许会给他一些启发。”

为使戈尔巴乔夫对形势的领悟不致过于迟钝，叶利钦安排根纳季 · 布尔布利斯提名他出来与戈尔巴乔夫角逐最高苏维埃主席〔223〕一职，尽管他的本意并不想这样做。叶利钦知道他会输掉国会里的这场投票选举，但他想借此提醒戈尔巴乔夫，如果戈尔巴乔夫继续从自己的阵营中排挤叶利钦，他将会面临来自叶利钦的直接挑战。⑤

第一次代表大会结束还没几天，叶利钦和他可爱的妻子奈娜 · 约瑟福芙娜一起来到我们的住处共进晚餐。我问他对这第一次会议有何评价。

他回答说：“ 不太糟。完成了一半的预定目标。”接着，他回顾了一些

仍亟待解决的问题，后又修正自己刚才的话说：“也许还不到一半，但至少完成了 1/4。”当我问道对这次大会抱有更高的期望是否不现实时，他说，不是这样，一个现实主义者不应感到失望。

他当时态度很乐观，因为他已感觉到社会舆论正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他在大会第二周注意到了代表大会已经变得不再像以前那样敌视他和他在“莫斯科小组”的同盟军，他将这归功于选民向其代表寄出的表达支持改革派心情的潮水般的电报。当时，大多数代表仍然关注自己家乡的第一书记怎样投票并紧紧跟随（叶利钦还比画了一个动作：向旁边扫视一下，然后抬起手臂），对此，他认为这种情况今后将会越来越少。由于电视的转播，会议辩论走进了全国各地，千家万户，大多数人都不希望他们的代表跟着共产党亦步亦趋。

那一晚的谈话中，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叶利钦自认正在同戈尔巴乔夫进行竞争。他仍然在与那些阻挠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势力进行抗争，其公开目标是要使戈尔巴乔夫相信他能够也应该加快改革进程，在这一过程中，他应将叶利钦看作是他的主要助手。也许从长远看，雄心勃勃的叶利钦并不会就此满足，但他当时的态度看起来是诚恳的。至于说随后两年他们变成怨家对头，则是戈尔巴乔夫不断压制他的必然结果。

那天晚上的谈话丝毫没有对戈尔巴乔夫本人的诋毁。然而，这种克制态度在戈尔巴乔夫阵营里却找不到第二个。当谈到他访美的可能性时，我劝他成行时带上奈娜。他的回答非常干脆：“不。决不！我不会让她成为第二个赖莎·马克西莫芙娜！”

他的话对这两位女士都有失公允。尽管他或许永远也不会改〔224〕变对赖莎的看法，但他会很快明白，他比他想象的更需要奈娜。

改革会取得成功吗？

已是 6 月下旬了。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已经成为历史，新的最高苏维埃也已展开工作。我乘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华盛顿去作述职汇报。在飞机上吃完晚饭后，我没有看电视，而是掏出电脑笔记本，记下一些事情。我怀疑克格勃在飞机上安了窃听器，但我知道我可以把这软盘存放在华盛顿一个安全的地方。如果我现在把在华盛顿期间有可能需要回答的问题事先梳理一遍，也许很有帮助。我这样写道：

1.转折点？戈尔巴乔夫说人民代表大会是个转折点。他说得对吗？

也许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但我们目前还确实不能这样说。不管怎样，即使在某些方面有倒退迹象，我还是推测他的说法确实是正确的。目前的确出现了向代表制政府过渡的趋势，这将是难以逆转的；如果这种趋势被暂时否定了，难道它以后就不会重新积聚力量，卷土重来？

那么什么是“新现象”呢？以前曾出现过试图建立代表制机构的努力，如 1918 年的杜马，即立宪会议，只不过流产了。也曾出现过一些普选的因素（比如第一届杜马中出现的共同代表现象）。但在过去，所有这些努力都是来自下面，最高政治机构或多或少都成功地抵制了这种现象。而现在是最高政治机构中占主导地位的领导人在推动宪制进程，并利用群众的激情和参与为这一进程提供了动力和活力。这就大不一样了。

2.消极趋势（如商店里空空如也的柜台、财政赤字、少数民族和民族骚乱等）能构成怎样的威胁？现在有些人甚至说，在随后的二三年里，有可能会出现内战；而另有一些人则预言说将出现饥荒现象。

上述消极现象的确正在形成威胁，而且，如果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开始与民族仇恨合流，那么形势紧张就会一触即发。在费尔干纳和新乌津实际上已出现了这种苗头。如果只是对付民族仇视现象，通过动用充分的武装力量是可以加以控制的。这里的“ 充分 ”是指有足够的力量制止各派往往导致以武力冲突的争执。〔225〕但这些骚动的情绪确有合流趋势，随时都有失控的可能。

最可怕的情景将是：价格持续上涨，商品匮乏更加严重。各自分散的抗议逐渐汇合，随之爆发暴力事件，他们最直接的发泄对象将是当地少数民族、党或者警察总部——或者，只是漫无目的的横冲直撞。对此政府必将试图进行镇压。然而，镇压几乎将是徒劳的，反抗运动会有增无减，从一个城市蔓延到另一个城市。接着会出现什么呢？会再出现一个天安门事件吗？也许这样。政府会镇压吗？也许，镇压至少有短期的效果，但却会为此使改革进程付出沉重代价。而且，没有什么人相信这种方式能真正奏效。镇压只是最后迫不得已的措施。但镇压极有可能发生，对我来说，这样想一想都令我不快，我将竭力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也努力说服我自己不去想这些。

但目前这只是一种最坏情况的分析，不一定是最有可能出现的结局。那么最有可能出现的结局又是什么样呢？一种可能是行动犹豫不决，另一种可能是在骚乱发生时，将之各个击破，但尽量不动用武力。总之，将采取灵活迂回的措施，以免出现大规模的抗议浪潮（暴乱本身也会产生一种厌烦心理，大多数人对暴乱所带来的暴力与动乱的恐惧远甚他们对目前形势的恐惧）。因此，这个国家有出现大量动乱的可能，但同时也存在着解决其中一些问题的可能，而且，随着事情的发展变化，越来越多的团体将确保他们已经得到的利益不要受到武力方法的威胁。难道这是白日做梦吗？也许。但我认为这种前景是具有实际可能性的。

3.戈尔巴乔夫真能坐稳这随后五年的江山吗？如果不能，是什么力量会使他翻船？

对于戈尔巴乔夫在本届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权履行完毕之前被赶下台的可能情形，我一时还无法想象。这种情况理论上当然有可能发生。但在现实之中，谁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克格勃忠诚不渝的话）？我还没有发现这样的人选，也许只有叶利钦最后有可能这样做。但他至少五年之内不会这样。对于整个党的官员来说，叶利钦是不受欢迎的人。这就意味着他唯一的挑战方式要经由直接或间接的选举过程来体现。就是说从现在到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还有五年的时间。那时将有可能出现政治转折，其程度即使是按今天许多经过修改的标准看也将是惊心动魄的。

但请再想一想最坏的情形：全国范围内的罢工和动乱；而政治局在处理意见上又各执一词，这时要么出现一位一呼百应的领。〔226〕导人（目前在政治局里除了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其他领导人有此政治魅力），要么出现一位阴谋家通过公开或隐蔽的方式来积聚力量，构成挑战。其结果是重新恢复传统的体制：中央委员会作出一项决定；而其他政治机构则被迫赞同并通过这一决定。这种可能性之大也是不能忽视的。

4.戈尔巴乔夫若被赶下台会发生什么？

我以前的判断是这会给苏联人民带来灾难，而美国不会受到什么损失。我现在仍然这么想，因为任何继任者都会忙于镇压国内的异己分子和阻止国家走向分裂，而无力在军事上与我们或我们的盟国形成对峙。我认为没有理

由重新修正这一基本判断（有必要注意一下中国在这方面的动向；他们将来会变得更加具有进攻性吗？我有点担心）。

5.会出现有组织的反对改革的现象吗？

答案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说是肯定的，是考虑到一些保守的或是反动的团体正在形成。最近在列宁格勒形成的以尼娜·安德烈耶娃哲学作为行动指导原则的（反犹太人的）阿米亚特和其他一些组织值得注意。但从全国范围来看答案又是否定的。不会出现足够强大的能形成实际挑战的力量。从这种意义上说，有组织的反改革力量目前是不大可能形成的，但我毫不怀疑这种力量会最终出现，尤其是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深入。因此，现在不存在这种有组织的力量并不能保证将来不会出现。

6.共产党机器会默认它们的衰落吗？

不愿意，但它们无可选择。

在华盛顿下飞机时，我已预感到苏联帝国的强权很快就要瓦解了。

〔227〕第十章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率先行动

选举纲要的基石是从苏联的一个完全加盟共和国一步步转向一个不依附于苏联，即不依附一个同盟的国家；下一目标是变成一个非军事化的、中立的波罗的海—斯堪的纳维亚独立国家。

爱沙尼亚《国家先锋报》“选举论坛”1989 年 10 月①

如果民族主义者试图实现他们的目标，那么，对他们来说，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波罗的海国家自身的生存也将打上问号。

苏共中央委员会公告 1989 年 8 月 27 日②

新的最高苏维埃还在开会的时候，我应邀去会见一个立陶宛代表团，他们代表着萨尤季斯这个威震 3 月份大选的政治运动。作为驻苏大使，我总是拒绝会见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官员，因为这种会见有可能被理解为美国接受了苏联对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强行吞并。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拒绝会见作为个人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人。事实上，我们渴望与他们接触，以表明我们对他们命运的关注，并跟上那里的事态发展步伐。与私人公民会见并不违反我们的不承认政策，因为他们并未在苏联认可的加盟共和国政府里任职，与这些人见面也就不具官方性质。

萨尤季斯明确要求举行官方会谈，我在同意之前考虑了它的影响。虽然该组织成员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但他们并没有要求以此种身份举行会谈。他们以萨尤季斯代表的身份而来，而且我〔228〕知道该组织在立陶宛的确深孚众望。更重要的是，即将来访的代表已经在自由选举中获胜。因此做出见与不见的决定并不困难。与他们举行正式会谈，将显示出我们对其民主进程的支持以及对他们作为被占领国家的合法代表的尊重。

我邀请他们到我的寓所，斯巴索别墅，而不到我的办公室，是因为我要保证苏联当局看到我们的会谈是公开的，没有任何秘密的活动——一旦局势有变，这可能对我的客人不利。

萨尤季斯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政党（共产党以外的党仍遭禁止），而是一个包括共产党和非共产党在内的支持改革的运动。它组建不到 1 年，在 3 月的大选中大获全胜，竟选 36 个席位，获得了其中的 33 席，而且大都以压倒性的多数获胜。当时，我也渴望会见一些新当选人，了解一下他们的想法。

六位代表结伴而来，鱼贯进入我取名为音乐室的斯巴索客厅。他们作自我介绍时，一个个表情庄重，甚至有点严肃。瓦伊多塔斯·安塔纳伊捷斯教授，以其密集整洁的白胡须而独具特色，他是一位森林生态学专家，还是立陶宛“绿色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卡兹米拉斯·安塔纳维丘斯，50 刚出头，但显得更年轻，经济学博士，是维尔纽斯经济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布罗尼斯拉夫斯·根泽利斯教授，虽然不到 60，已经谢顶，只剩下一绺灰色的头发，在立陶宛国立大学教哲学。该小组中唯一的律师卡兹米拉斯·莫季耶夫是立陶宛国立大学的研究生，在维尔纽斯开展业务。罗姆阿尔达斯·奥佐拉斯，参选时为维尔纽斯出版社的编辑，是萨尤季斯的副主席，他那满头黑发和杂草一般的黑胡子格外引人注目。萨尤季斯的总书记维尔吉利尤斯·休帕提斯没有到场。

奥佐拉斯首先讲话，解释说萨尤季斯主席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要求举

行这次会见的目的，是要正式向美国政府通报他们的计划。但他有事外出，故让小组代表他及整个运动转达这层意思。

〔229〕经过一番介绍，成员们轮流阐述该组织现行战略的方方面面，看得出，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取得经济自治，使立陶宛文化免遭俄罗斯化的灭绝，而是到 1990 年中期取得彻底独立。

这些计划将分阶段付诸实施，同步处理有关法律、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问题。他们将宣布 1939 年纳粹一苏联条约的秘密协定无效，并推翻 1940 年以武力强迫立陶宛议会通过的“进入法案”，从而消除并入苏联的法律依据；自 1990 年 1 月 1 日起把立陶宛的企业置于维尔纽斯或地方当局的控制之下。如果可能的话，在 1989 年底之前，但无论如何不迟于 1990 年初，选出新的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如果萨尤季斯赢得多数——这似乎不成问题——最高苏维埃将按照立陶宛独立的模式建议起草新的宪法,并不迟于 1990 年 6 月交由全民公决通过，此后将选出一个全新的被称为塞马斯的议会，其名称系沿用 20、30 年代旧称。在独立国家里，苏联操纵的选举全部无效。

听着这一大胆的计划，首先想到的就是事态已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我简直不敢相信立陶宛会在一年内取得独立。甚至两三

年也算是一个奇迹。

但是，关键不在于客人们的时间表是否现实，而是他们都严谨而有经验，不受传统说教的束缚，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场就有效地组织了政治竞选。在苏联统治下所受的苦楚和经历使他们对现行制度失去了幻想。这时，他们明确期望获得成功。

让我感到变化之大的并不是这些。我早就知道大多数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要求独立。那不是什么新鲜事。新颖之处在于他们在谈论这一目标时毫不畏惧。仅在三四年前，公开号召分离的人都会受到要么投入拘禁营，要么送入精神病院的处罚。40 年前，则要被处决。

如今，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政治组织领袖，不仅敢于谈论和〔230〕撰文呐喊独立，而且更以其事业和生命作赌注专注于这一目标。最让我吃惊的是他们竟然自己找上门来，与一名美国大使恳谈，把心里话告诉外国势力，而不怕被指责为叛徒。

这些行动来自心理自由的人们。自 1989 年的那一天起，我再也不怀疑他们终将胜利，这一天不会等到下一世纪遥遥无期的年代，本世纪结束之前就会实现。

他们必胜，但代价多大？会不会激起共产党内的保守派、克格勃和军界的武力镇压？几周前，中国已经表明血腥镇压至少暂时是起作用的。但是如果企图弹压立陶宛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就可能触发内战，并在国际上导致冷战的恢复。这将增加对我们所有人的风险。

“你们认为苏联将作何反应？”我问。

“噢，他们会尽力阻止我们。但我们相信，只要不屈服于挑衅，我们就会成功。他们要阻止我们，就得屠杀成千上万的人。而如

果他们那样做，改革就会终结，戈尔巴乔夫也会下台。我们认为他们清楚这样的后果。”

“你所说的屈从挑衅是什么意思？”

“以武力对武力。他们试图挑起我们动武，然后以我们的反应为借口动用军队。最艰巨的任务是让我们的人民，尤其是一些年轻人明白，只有采取

和平方式，我们才能打赢。忍受愚弄、侮辱、甚至暴力，比持枪对准眼前的士兵射击需要更大的勇气。”

“你们真的以为这样行吗？”

“是的。每走一步，戈巴乔夫就将面临如下的选择，是允许我们逼近我们的目标，还是破坏他的整个政策，抑或葬送他的统治地位。一旦我们开创了事业，就不想失去它。”

客人们接着问我，如果立陶宛宣布独立，美国将作何反应，如果苏联实行经济封锁，他们能否得到美国的援助。

我解释说，对他们的问题，我不可能给予官方答复，我估计〔231〕华盛顿也只会给一个抽象的回答。政府不喜欢假设的问题。我只能作出个人的评估。

关于第一点，如果立陶宛宣布独立，美国政府，事实上所有美国人都会予以同情。不过，不可能立即承认，因为这牵扯到该政府是否实际上控制了宣布拥有的领土。如果立陶宛仍然在苏联有效的控制之下，不管是多么地同情，美国政府很可能不会承认新政府的独立。

我还告诉他们，美国的立即承认可能会鼓励苏联强硬派动用武力。对他们来说，这似乎是一个直接挑战，而且莫斯科知道，无论出于什么感情，美国都不会为立陶宛提供军事保护而冒核战争的危险。过早的承认，苏联温和派就不可能就独立问题进行谈判，因为政敌会攻击他们屈从于冷战的“敌人”。

关于经济援助，我只能说，一旦苏联封锁，外部力量，不管是美国、德国、瑞典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有所作为。苏联控制着他们自称是苏联领土的边界，如果他们禁止物资进入，外国强行投放无异于发动战争。一旦立陶宛的行动激起莫斯科的军事或经济制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心存侥幸，指望美国或其他任何外国提供直接帮助。

有一位客人（我忘了名字）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说：“如此看来，我们只好孤军奋战。你们支持民主和民族自决，但我们只能靠自己。”

话中带刺。

“无论是精神上还是政治上，你们完全不是孤立的，”我换一个角度说，“我们并不承认你们在法律上是苏联的一部分，而且我们今后也决不会，除非立陶宛人民出于自愿做出那样的选择。只要有任何对你们动武或经济抵制的企图，我们将作出强烈的、尽管是非暴力的反应。

“我不敢对今后怎样事先打保票，因为那将取决于具体情况。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样的行动将打断刚刚开始的美苏合作。与美国和整个西方保持良好关系对改革至关重要。如果在立陶宛——或波罗的海其他地方出现镇压行动，一切都将化为乌有。因〔232〕此我并不是说我们会无动于衷，不支持你们。如果你们的计划实施得很成功，分量就会加重。因为莫斯科知道，如果动用武力，必将面临西方的真正报复性反应。

“但是，如果事情真的办糟了，并且苏联动用了武力，我们也无法提供保护。你们将像天安门广场上的中国学生一样束手无策。从这个意义上说，你们又的确是在孤军奋战。我希望不会是这样，但是如果光拣好的说，就不是讲真话。”

沉默。10 秒钟。也许 20 秒。似乎更长。接着有人开口了：“你这么一说，我想我们不得不同意。我们也未曾指望他人为我们做好一切。”

接着，我们转向了轻松的话题。我们需要相互了解，因为我和我的同事在今后几个月还要与今天来到这里以及没有来这里的萨尤季斯领导人经常打交道。

民族主义者走向前台

早在 1987 年，爱沙尼亚就试图争取主权，虽然让戈尔巴乔夫压制了下去，但是仍坚持不懈，而且近邻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也行动了起来。

到 1988 年 2 月，这 3 国都将自己的语言定为“ 国语 ”。以前俄语和各共和国的语言同为官方语言，但是俄罗斯居民很少学当地的语言，因此他们与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交往时只用俄语。而今，经过一段过渡时期，所有人和公共机构都必须根据要求使用当地语言。

紧接着，一环扣一环，三国的最高苏维埃宣布经济自治，并开始限制移民。5 月，立陶宛议会通过了一个主权宣言，几乎与莫斯科 6 个月前断然否定的爱沙尼亚宣言相同。7 月，拉脱维亚如法炮制。

对纳粹—苏联秘密协定的怒火继续燃烧。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在其第一届会议上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调查此事。苏联高级官员不再矢口否认有这个秘密协定，但声称原件找不到，因此无法证明〔233〕确有其事。8 月份协定周年纪念日之前该委员会没有拿出报告，立陶宛最高苏维埃自行宣布秘密协定为非法，因此从即日起无效。

到 1989 年，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特别是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的共产党新领导人开始越来越公开地与人民阵线合作。2 月份，爱沙尼亚举行独立周年庆典，独立的爱沙尼亚国旗在塔林古老的塔尔赫尔曼塔顶上高高升起，新党魁瓦伊诺 · 瓦利亚斯参加了庆典仪式。

在立陶宛，阿尔吉尔达斯 · 布拉藻斯卡斯更为激进。1988 年末，他成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后向天主教会做了很大让步，从而赢得了民众的尊敬。但他却不能阻止立陶宛党委的强硬派翌年 2 月份对萨尤季斯加强反攻的企图。不过，这些强硬派人物在 3 月的大选中节节败退。6 月份党的另一次全会上将忠于莫斯科的亲信从立陶宛中央委员会里驱逐了出去。到 7 月份，立陶宛共产党讨论了一个新计划，旨在从法律上减少对权力的垄断，将立法权移交给选举产生的大会，创造一个独立的、民主的、法治的立陶宛国家。计划已经拟就，单等年底交党代会通过。这些议案即使按修正后的改革标准看也是异端邪说。

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共青团，更是走到了党的前面。6 月，立陶宛共青团正式与全苏共青团脱钩。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共和国共青团组织控制的报纸成为传播人民阵线观点的喉舌。

在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共产党掌管的议会和部长会议从未来的新选举着眼，也开始努力适应新的公共思潮。1985 年以来，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从没有进行过选举。直到 1989 年，这些机构都是按部就班地充当着傀儡，每年聚集两三天，一致通过共产党起草的立法议案。

觉悟的选民对面临真正选举的政客正产生极大的影响。认识不到这一点的观察家们一定会为这种变化而吃惊。首先，面对来自莫斯科的反对，立法者支持自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干脆转向直接要求独立。到 1989 年秋，3 个从前的傀儡议会都已背弃〔234〕了他们那些所谓的爱国主义兄弟。

爱沙尼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阿诺尔德 · 吕特尔带头为爱沙尼亚的事业奔忙。在拉脱维亚，阿纳托利 · 戈尔布诺夫也是如此。

人民阵线的活动家获提名担任共和国政府的高级职务。特别是在 3 月大选显示出民族情绪在广大公众中的强大力量之后，许多政府官员开始拥护民族事业。例如，经济学家卡兹米拉·普隆斯基涅是萨尤季斯委员会的成员，曾赢得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个席位，7 月被任命为立陶宛副总理。民众要求分离的呼声在 1988 年还微乎其微，而今已不绝于耳。

帝国反击

赢得大多数波罗的海民族支持的民族主义热潮不仅引起了莫斯科当局的警觉，而且震动了初来乍到的移民。这些移民大多是莫斯科国营企业的职工，或者是苏联军人及其家属。

波罗的海，特别是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生活水平，要比苏联其他地方高，而且工业企业很容易招到俄罗斯人。驻扎在波罗的海的军人经常就地转业而不是回到俄罗斯或其他苏联共和国。

这样的移民，加之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人口出生率较低（二战时波罗的海人口损失惨重，使外来移民大批涌入，后又历经政治清洗），导致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人口结构发生巨变。例如，拉脱维亚人曾经占这个独立国家人口的 77%，到 1989 年只占 52%的微弱多数。照此趋势发展下去，到本世纪末他们在自己的国度里将成为少数民族。在爱沙尼亚，情况虽不那么严重，但势头也十分凶猛：38%的人口为非爱沙尼亚人，而在 30 年代还不到 20%。另外，在爱沙尼亚东部，俄罗斯已成为主要居民。立陶宛人在他们共和国里仍占多数，达 80%，但是他们也为外来户日益增多而不安。〔235〕

在该地区的许多（但绝非全部）非波罗的海人为日益蔓延的民族主义情绪深感不安。如果波罗的海人掌管他们的国家，限制移民，他们还会允许俄罗斯人呆下去吗？即使允许，他们会不会被视为二等公民？会不会被迫学习迄今为止可以忽略的当地语言？

莫斯科的要员们利用了这些担忧。经济部的官僚们认为在波罗的海建立起的工业基地是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在克格勃、共产党保守派和军官们的积极支持下大力煽动反波罗的海情绪，并开始在波罗的海国家组建受他们操纵的反对组织，以期阻止波罗的海独立运动。

他们的主要方法就是创立组织——其构成大都为俄罗斯族，一般称为‘国际阵线”或者“国阵”，组织罢工、游行来抗议民族组织的行动。这些活动由中央新闻媒介予以报道，以便使波罗的海以外的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相信波罗的海民族主义者是危险的极端主义者，不能得到整个人民的支持。但是，这种宗派活动仅仅使当地人口两极化，加剧了波罗的海人和外裔社区间的紧张。

1989 年夏，莫斯科知识分子互开玩笑说：“民族主义者就是说两种语言即母语和俄语的人。”那么什么是国际主义者呢？“咳，只说俄语的呗。”

分而治之在俄罗斯帝国传统中早已习以为常，而任何未得到莫斯科赞成的区域合作都被认为是可疑之举。随着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开始从莫斯科争得更多的自治，它们之间也开始开辟更好的合作途径。这些共和国在根本利益上生死与共，而且对于大多数爱国者来说，如果单枪匹马的行动，谁也不可能实现独立。

5 月，立陶宛萨尤季斯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人民阵线的代表〔236〕组建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理事会，并因三方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中的人民阵线代表的大力参与而得到进一步推进。这些代表的第一个公开行动就是走

出人代会，抵制建立一个宪法监督委员会的建议。他们担心，这个委员会由于权限不明，可能推翻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立法，限制分离的宪法权力。为了避免公开分裂，戈尔巴乔夫在这一问题上做了让步。

最引人注目的行动发生在 8 月。值此纳粹—苏联协定签署周年之际，人民阵线得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共产党领导人的合作，于 1989 年 8 月 29 日发起并组织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游行即“ 波罗的海之路 ”。

200 万多人响应了号召，手拉手形成人链，不间断地绵延于首都塔林、里加和维尔纽斯之间。生活在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差不多有 500 万，因此，参加者令人震惊地达到了全部波罗的海民族人口的 40%。③

这天，暖风拂面、阳光灿烂（这在波罗的海沿岸夏季并不多见），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游行者拿着鲜花、一路高歌，走到指定地点。我没有机会直接看到这壮观景象，因为作为驻苏大使，组织纪律不允许访问被占领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以免我们的不承认政策打了折扣。不过参加者和观察家们都一致认为气氛祥和、良好。

一对当时正好在立陶宛度假的俄罗斯夫妇向我讲述了他们是如何为当时的激情所感染，并与立陶宛朋友结伴而行参加了游行。他们感到没有任何敌意；立陶宛人张开双臂欢迎他们，甚至在他们身上撒遍了鲜花。回到莫斯科后，他们已深信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事业是正义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不独立，民主就不会光临俄罗斯。

不过，对戈尔巴乔夫和莫斯科当局来说，夏天的事态，尤其是“ 人链 ”显得目中无人。共产党总部对“ 波罗的海之路 ”做出迅速反应。8 月 26 日，莫斯科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出强硬警告。④

我看到新闻报道的声明时，正远在萨哈林岛旅行。官方的感〔237〕情用事、前后不一让我吃惊。声明中提到“ 民族主义、极端主义组织 ”利用“ 民主和开放 ”蛊惑群众。指责人民阵线建立类似“ 法西斯占领时期 ”的组织，利用它们进行“ 恐吓、欺骗和造谣 ”。还说“ 民族主义领导人 ”“ 滥用国际关系自由，与外国组织和中心接触 ”（如美国大使馆？），“ 把他们奉为高参和导师 ”。

“ 8.23 ”运动组织者的罪名是煽动“ 民族主义歇斯底里 ”，强迫人们接受仇视苏联制度、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军队的口号。声明接着老调重弹：“ 如果民族主义分子达到目的，波罗的海人民的命运将处在危险之中……后果不堪设想。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本身的生存就可能打上问号。 ”⑤

换言之，如不悬崖勒马，将予以严惩。

这种陈词老调不符合事实，也有悖于逻辑，因为要求独立的游行者是在行使宪法保障的正当权力。在法制社会——这也正是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行使权力算不得犯罪。

人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与外国组织接触就受到怀疑的话，还有什么“ 国际关系自由 ”（这也在宪法保护之列）可言。

苏共中央所述的“ 事实 ”与其逻辑一样难以令人信服：没有可信的证据证明人民阵线在使用威吓、欺骗、或者造谣等手段——事实上，这是“ 莫斯科中央 ”、克格勃和军方惯用的手段，这也不是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独立运动的特点。他们的策略不是欺骗，而是直截了当。

正是中央委员会在威吓和造谣，即使抛开声明中赤裸裸的威胁，其表现

出的惊慌失措也是可笑的。苏联共产党这个庞然大物

在伴着歌声、鲜花、手拉手的游行队伍面前发抖了。

令人费解的是，声明的发表未经过戈尔巴乔夫的批准。即使该声明交到新闻界时戈尔巴乔夫不在莫斯科，发生这种情况也难以想象。

〔238〕格鲁吉亚创伤

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挑战是和平的，但 1989 年在苏联帝国南部边疆却爆发了暴力冲突。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对抗持续了整整一年，但是杀伤性的冲突只是时断时续，而且规模很小。在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则有大批人死于非命，在其他方面，这三个共和国鲜有共同之处。

格鲁吉亚的首府第比利斯首当其冲。4 月 9 日，军方野蛮地镇压了一次和平示威，打死或伤残至少 19 人。正值全苏联的改革派争取和平示威权的时候，却有人做出了弹压的决定。因此即使官方避免伤亡，任何以武力驱散和平示威者的行为也都将成为政治问题。

镇压第比利斯游行算是提交人代会的第一桩公案。它是由拉脱维亚代表而非格鲁吉亚代表提出来的。

1988 年入夏以来，第比利斯的游行从未间断过，一些年轻人，主要是女学生在秋季宣布绝食。他们要求采取更迅速的步骤迈向格鲁吉亚自治，同时也抵制格鲁吉亚的少数民族获得更多自由的要求。一连几个月，地方当局虽敌视他们，但并没有认真干预。4 月 8 日，星期六，天气温暖，大批人聚集在中央广场上助威。

午夜过后，军队挥舞着挖战壕的铁锹和气枪袭击集会群众。目击者描述了他们的野蛮行径。倒在地上的人被打死，毒气直接喷向手无寸铁趴在地上的人们脸上。几十人被送进了医院，许多人中毒。

令人不解的是，负责这项行动的军方当局拒绝承认曾用毒气来对付示威群众。他们或否认用过毒气，或者说只是用了催泪瓦斯。但是受害人的症状表明用了大量的有毒气体。格鲁吉亚医生〔239〕无法鉴别所用的化学物质，故不能对症下药。

事件发生后，安·萨哈罗夫立即飞抵第比利斯，察看情况，并提供帮助。当他和其他人在当地查不出用的是什么气体时，打电话向我求助，问美国医生是否能帮忙。我立即与国务院的苏联处联系，他们又向美国的毒气专家请教，然后分析出哪种毒气会造成所表现的症候，并答应派专家到第比利斯现场咨询。

华盛顿对萨哈罗大的请求做出迅速和有益的答复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军方以恢复秩序为幌子采取的这种行动只能被认为是犯罪。而莫斯科当局对此事的处理着实令我吃惊。他们首先作出的反应不是去追查罪犯，而是隐瞒真相；此举未成，就栽赃于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朱姆贝尔·帕提亚舍维利身上。屠杀过后不几天，他就被解职了。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组成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要求当局作出解释。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都否认他们事先知道要动用军队。帕提亚舍维利承认是他请求调军队来驱赶示威群众，但是一口咬定地方军队总指挥伊戈尔·罗基昂诺夫将军向他保证会和平解决，不会伤害任何人。伊戈尔声称伤亡的起因是游行者自己先动武，然而目击者和当时的电视录相都反驳了这种说法。

现行“体制”决心保护那些本应对发布动武命令负责的人，这最终成为关键的问题。全苏联的改革分子加大了行动力度，为集会自由谋取更有效的法律保障。在格鲁吉亚，此事件造成的影响更为深刻。谁也不相信，没有莫斯科的指示，地方官员会采取行动。他们谁都知道，当时的总司令正如大多数军人一样也是俄罗斯人。

从 1989 年 4 月起,格鲁吉亚的政治气氛从期望在苏联内部加强共和国的自治地位转向全面的独立运动。过去在格鲁吉亚人和〔240〕俄罗斯人之间总有一些紧张，但是相对于其他民族群体之间的关系来说还算比较和睦。但现在它们的关系迅速恶化。到秋天，格鲁吉亚似乎与波罗的海在朝同一方向迈进。不过，格鲁吉亚的反对派不是团结在一个人民阵线的周围，是分散于几十个互相竞争的政治团体之间。

中亚的暴力冲突

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暴力冲突更为血腥，但渊源不同。6 月，乌兹别克人与一个名为麦斯凯特土耳其的少数民族发生暴力冲突，100 多人死于乌兹别克的福加纳山谷。几天后，在里海北岸发生了同样的骚乱。哈萨克斯坦人车臣和住在诺维乌赞这个仓促修建的油城里的其他北高加索人发起进攻。

麦斯凯特土耳其人是斯大林民族迁徒政策的牺牲品。直到二战前，他们还生活在格鲁吉亚和土耳其交界的山区里。他们说土耳其语，信奉什叶派伊斯兰教，远离山下的格鲁吉亚基督徒。战争时期，斯大林把他们迁到乌兹别克，因为他们有不忠的嫌疑。起初，乌兹别克人对他们很友善，在战时艰难岁月里甚至同吃同住。但是土耳其人与他们的民族近邻始终不冷不热，忘不了自己是寄人篱下——当然他们本来也是如此。赫鲁晓夫后来允许部分背井离乡的人返回自己的家园，但麦斯凯特土耳其人仍不得不留在乌兹别克，格鲁吉亚人早已占据了他们曾生活的地方，并拒绝让他们返回。

当局把仍与乌兹别克人居住在一起的麦斯凯特土耳其人疏散到军事营地，然后又疏散到俄罗斯农庄，此时骚乱才算是告一段落。但是土耳其人对此并不满足，坚决要回到世代相传的家园。1990 年和 1991 年，他们的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了无数次游行，但都无济于事。

官方对骚乱缘何而起，死伤为何如此惨重从未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对谣言也从未予以澄清。地方党政官员和克格勃煽风点〔241〕火，借此显示民主化的风险，以迫使莫斯科武力镇压。不管这些谣言是否属实，很明显的是，在导致出现流血事件之前，中央和地方当局都未采取有效措施来阻止冲突。

第比利斯和福加纳事件的对比说明：首先，当局不顾血的代价镇压和平示威；其次，他们未能或拒绝阻止疯狂的暴徒滥杀无辜。

诺维乌赞的骚乱虽然没有这么严重，但也显示出苏联对民族和经济问题的政策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工业设施仓促上马，不顾它对环境的影响和对正常生活的侵害。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出生率很高，迫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背井离乡到城市里谋生。到城市后，他们只有住在拥挤的贫民窟里，很难有机会过上好的生活。许多不同的民族争夺有限的资源，小事也会突然引发大骚乱。

人民阵线集聚力量

西南部的三个共和国，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此时也开始效仿一年前的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

5 月，谢尔比茨基的强硬派乌克兰政权攻击“鲁克”和乌克兰赫尔辛基联盟为“反苏集团”。然而，在西部地区，特别是在利沃夫，示威愈演愈烈。联合教会各派咄咄逼人，并得到梵蒂冈的支持。戈尔巴乔夫认识到，如果不废除对乌克兰天主教的官方禁令，与教皇保罗二世的会谈就不会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鲁克”在概念上，相当于立陶宛的萨尤季斯（两个词都是运动的意思，都打着改革的旗号，联合一些非正式团体）。该组织于 9 月初在基辅召开首届大会，推选诗人、乌克兰作家协会负责人伊万·德拉奇为主席。德拉奇 50 多岁，身材矮胖，不仅以诗闻名，而且是乌克兰语的积极鼓吹者。有一次我在基辅发表演说之〔242〕后，他曾写道，令人费解的是，生活在乌克兰的俄罗斯官员没有尝试说乌克兰语，而仅仅是来此访问的美国大使却能做到这一点。

虽然“鲁克”在基辅有了根据地，但其主要支持力量仍在乌克兰西部，特别是利沃夫城和附近地区。在那里，从前的两位政治犯维亚切拉夫·乔尔诺维夫和米哈伊·霍尼正领导着方兴未艾的乌克兰自治运动。

9 月底，谢尔比茨基被迫辞去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职务，接替他的是来自卡吉大的乌克兰人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在卡吉夫，乌克兰的民族情绪比西部弱。伊瓦什科的观点似乎接近于戈尔巴乔夫，虽在政策上比谢尔比茨基更能兼收并蓄，但他决心使基辅的政策与莫斯科保持一致。

不过，民族情绪正在滋长。年底前，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决定自 1990 年 1 月 1 日起乌克兰语成为国语，新议会选举定于 1990 年春。鲁克及其同盟运动蓬勃发展。11 月底，戈尔巴乔夫访问罗马前，解除了对乌克兰天主教的禁令。联合教大会开始接管 1946 年划归俄罗斯东正教的各教堂。

乌克兰共产党受到两面夹击。切尔诺贝利事件三年后，媒体最后揭露出事故引发的辐射量比公布的要大得多，更多的地区居民不得不疏散。显然共和国的共产党领导参与了掩盖真相的活动，对核事故未能做出适当的反应。

紧接着，在主要产煤区多耐盆地，矿工举行了大罢工。他们甩掉当地党政领导和党支持的工联，组织了自己的“工人委员会”，比官方当局更有效地管理着这一地区，从而打破了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的神话。戈尔巴乔夫许诺不久将进行地方选举和经济协调。

但西部的民族主义与东部富于战斗精神的工人尚未形成强有力的联盟。西部要求政治改革和乌克兰化；东部要求改善工作条〔243〕件，提高生活水平，对该地区逐渐俄罗斯化并不太在意。

虽然白俄罗斯活动家在 1989 年的大部分时间受到了更大的压制,但切尔诺贝利真相的揭露在那里产生了甚至更强烈的影响。其原因是它地处核电站的迎风带，受辐射面要远远超过乌克兰，受辐射污染的程度也比乌克兰严重得多。

明斯克的知识分子继续揭发斯大林的暴行，复兴白俄罗斯语言文化，抵制破坏环境的政策，但是共产党当局不断阻挠他们，禁止党员参加相当于萨尤季斯和鲁克的白俄罗斯组织，即阿德拉真尼运动，拒不审批阿德拉真尼领导人在明斯克召开成立大会的场所。大会被迫在邻近的立陶宛维尔纽斯举行。对之表示同情的报纸编辑们受到威胁说，如果他们报道这个非正式团体的活动，就会丢掉饭碗。

在 3 月的苏联人代会选举中，持不同政见者击败了几个党棍，其中有明

斯克党组织领导人。某些阿德拉真尼的领导人，如瓦西里·比科夫，与莫斯科改革派党政官员交情甚好，在明斯克对强硬路线颇有微词，指责现行政策与改革宗旨背道而驰。这些努力促使《真理报》7 月发表社论，批评白俄罗斯领导层“不着边际”。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隐瞒切尔诺贝利真相的愤慨日益增强，一份发表的地图显示出受辐射污染地区正在扩大，但没有采取疏散行动，也没有向许多当地居民发出警讯。共和国 20%的耕地受到影响。9 月，灾区居民聚集在明斯克举行群众示威，在公众的强大压力下，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批准了一个移民计划，将 10 万人迁出灾区。计划耗资几乎是整个白俄罗斯政府正常年预算的两倍。除非莫斯科一反常态，慷慨解囊，否则根本不清楚钱从何来。〔244〕官方的敌视使阿德拉真尼受惠。到 1989 年末，该组织已发展到 10 万会员，其中 60%是在该组织被迫在立陶宛召开大会之后加入的。

摩尔多瓦的运气不错，在恢复文化遗产方面比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得到了共产党的更多支持，但他们也有难念的经：少数民族越来越反对他们的行动。

摩尔多瓦人民阵线在其成立大会前后的一年中，迅速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到夏末，人阵召集了 30 万人的大游行，支持摩尔多瓦语为国语，恢复在罗马尼亚使用的拉丁字母。在这种压力下，最高苏维埃把摩尔多瓦语定为国语，指定俄罗斯语为“族际交流语言”。在议会里，代表们交叉使用摩尔多瓦语和俄语，并为那些双语不熟练的议员准备了同声翻译耳机。

摩尔多瓦人民阵线的声势激起俄罗斯族也建立了一个名为“统一”的反对组织，类似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国际阵线”。加告兹（基督教土耳其人）和保加利亚等更小的民族也组成了以民族为基础的组织。

有好几个月，当局不给这些组织办理正式登记手续，但它们最终还是于 11 月正式注册。同月，彼得卢·卢钦斯基被推举为共和国党组第一书记，接替保守派塞米扬·格罗素。后者神出鬼没地出国了，到苏联驻墨西哥使馆填补了一个极不起眼的农业代办的外交空缺。

卢钦斯基虽有斯拉夫的名字，却是摩尔多瓦人，曾是塔吉克斯坦的第二书记。他还不到 50 岁，比格罗素年轻，更支持改革。像他的乌克兰同行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一样，他的大政方针与戈尔巴乔夫接近，这就意味着最终他除了能讨得戈氏的欢心外，不会取悦任何人。比起前任，他给人阵一派以更多的自由，此举令主张统一的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大失所望。但他反对更为极端的民族主义立场。他试图安抚分离主义的要求，调停摩尔多瓦民族主〔245〕义和实力雄厚的俄罗斯少数民族间的矛盾，但他的努力最终却葬送于统一毫无妥协余地的争吵。后者连安慰摩尔多瓦多数派的象征性妥协都不愿意做出。

1990 年，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反对派运动日趋强盛。戈尔巴乔夫将卢钦斯基和伊瓦什科召至莫斯科，把他们拉进改组后的苏共政治局。

民主还是独立

羽翼未丰的苏联反对派组织刚刚开始联合时，却呈现出相互矛盾的趋势。一方面，各组织要求更民主、更开放，结束一党制，俄罗斯的反对派组织强调个人自由。另一方面，人民阵线强调的则是其民族的自治和独立。

这种差异从 1989 年夏天起日益明显，当时叶利钦、波波夫、阿法纳西耶夫和其他跨区域集团的创始人，试图把有民族头脑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代表拉入他们的组织里，有些人如爱沙尼亚的维克多·帕尔姆教授从一开始就是

这些组织的成员。但大多数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人犹豫不决。他们支持跨地区代表团的目标，也愿在最高苏维埃里投赞成票，但他们感到他们的议程已走在整个苏联民主进程的前面，因此想尽快与苏联脱钩。他们虽然站在反对派中间，但又提防着不过多地卷入其中。

大多数俄罗斯改革派原则上赞成民族自决，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问题上一般投票支持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民族领导人。但是他们感到唯有苏联的民主进程才能开启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独立的大门。将民族主义置于民主之上最终只能在分崩离析的各共和国里产生苏联体制的翻版。另外，作为议会和最高苏维埃的少数派，“ 民主派 ” 需要得到尽可能多的帮助。但是，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另起炉灶的倾向却日益明显。

其他共和国的民阵虽处在发展初期，却也正显示出同样的倾向。4 月以后，格鲁吉亚代表绞尽脑汁在其共和国与莫斯科之间保〔246〕持距离。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代表已习惯于将焦点集中在卡拉巴赫问题上，摩尔多瓦人也强调自我发展，但在试图寻找回他们的罗马尼亚文化之根时，遇到了来自斯拉夫少数民族的强大阻力。戈尔巴乔夫进退两难。尽管党内、军方和警方内部的反对势力在增长，他仍然打算使现行体制实现自由化。但是，那些“ 以自我为中心、权欲熏心的民族主义者 ” ——他是这样来形容他们的——使他很难如期进行改革。

正是这种态度扩散到了 8 月份的中央委员会上，使其向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发出了不祥的警告。

还有一个个人因素促使戈尔巴乔夫否定了跨区域集团推行的路线，并排除了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达成妥协可能性，那就是叶利钦打下向他挑战基础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1989 年夏，叶利钦和改革力量的联盟已经形成。他虽然没有成为跨区域集团的唯一领袖（一些像萨哈罗夫那样的显赫人物仍怀疑他是打入内部的密探），却是该组织主席团成员和最孚众望的人物。如果说 1986 年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地位如日中天、而叶利钦还是一个忠实小伙伴的时候，就已对叶利钦博得的民心大发醋意的话，那么，当他现在感到四面楚歌、而叶氏在选民中一呼百应之时，其反应不是会更加强烈吗？

不过，1989 年夏，谁也不能绝对肯定戈尔巴乔夫会做何反应。他已显示出非凡的处变能力，他或许能继续把握自己。既然现在很难压服叶利钦，他可能会认识到再次联袂仍不失为明智之举，这样他在伙伴关系中仍能略胜一筹。

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和克格勃

与戈尔巴乔夫最终和解是跨区域集团组织者的初衷。他们自认为正在给他的目标提供关键的政治支持。大多数人明白，为了免遭赫鲁晓夫的厄运，他几乎不敢公开支持这一组织。但他们希望他能提供间接的保护，以便集聚力量，一旦跟保守派摊牌，也〔247〕好助他一臂之力。

就叶利钦个人来说，这些希望不久就破灭了。戈尔巴乔夫对他保持不冷不热。到秋季，种种迹象明白无误地显示出对他新一轮的不信任又开始了。第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在叶利钦访美之行后接踵而至。

6 月间，叶利钦曾向我提到他想去美国考察。我已经就如何为他安排一次美国之行提出了一些想法。他很少出国，更没去过美国。我相信，如果他能更好地了解我们，将符合两国的利益。不过，既然他是国家建设委员会的

副主席，外交礼节就要求首先应邀请他的上司。我们在住房方面有官方的合作协议，包括人员互访。我想，等国家建设委员会主席访美之后，就可立即邀请叶利钦。

他后来被选入最高苏维埃就改变了形势。这时，他是建设和住房委员会的主席，因而就扫除了程序上的障碍。我请求国务院促成一个国会拨款委员会来邀请他，但夏季里没有付诸行动。劳动节后，我从西伯利亚和苏联远东地区旅行归来，获悉他已在加利福尼亚埃萨伦基金会的詹姆斯·加里森的协助下安排好了出访，将于 9 月 9 日启程赴美作巡回演说。

此时，我对叶利钦有了更深的了解，但情况令我担忧。他无疑希望引起官方的极大关注，但我没有把握访问的组织者是否有资格安排一些他想要的会谈。向国务院快速查询后，我得知并没有安排什么约见。我立即去见他，看一看进展如何。

我们的会面是在莫斯科宾馆的接待厅，那里是供最高苏维埃代表接见来访者的专用地点。他预定第二天飞往纽约，并给我看了美方资助人事先准备好的计划。按此计划，他每天要做两场、三〔248〕场——有时甚至四场演说，常常不在同一城市。其中有一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中午要在迈阿密做一个演讲，而接下来在晚餐之后还要到明尼阿波利斯演讲。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说着把稿子还给他，“你精力过人，但这样的日程非累死你不可。我看谁也坚持不下来。你必须告诉赞助方把日程安排得轻松一些。”

他说他自己也有点纳闷，更让他生气的是新闻报道说，他此次访美是想从演讲中赚些钱。他强调说这绝非是他的目的。“演讲所得的款项将转交我们的组织用于控制艾滋病的蔓延，”他说，“我计划为我们的医院购买一次性消毒针（苏联医院仍照常使用旧注射针头。俄罗斯南部的一家医院最近发生几名儿童感染上致命疾病的事故）。不过，这也不是我的主要目的。我的主要目标是政治性的，去拜访你们的领导人，也想了解一下你们的国家。”

我向他保证将尽我所能在华盛顿安排一些会面，但不容乐观的是由于时间过于仓促，有些政要可能正好不在。他接着问，到达纽约时谁会到肯尼迪机场迎接。我说还不清楚，想必赞助方会安排好的。“不过，国务卿贝克会来，是吧？”一开始，我以为他在开玩笑，接着我意识到他是认真的。我解释说，高级官员到机场会见观光客，即使是最重要的客人，也不符合我们的惯例，况且贝克正在华盛顿而不是在纽约。

“噢，要是那样，卡奥莫州长肯定会在那里吧。”他继续说。我不得不打消他的这种奢望，指出州府在奥尔巴尼，而且纽约有那么多显贵的外宾。州长哪怕只到机场迎接其中一小部分，也就没有时间干别的了。“哎，从奥尔巴尼坐直升机不过一小时嘛。”他嘟囔着。

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他压轴戏的前奏：至少，他期望在华盛顿时要与布什总统见上一面。

这是我预料之中的。我们已经与国务院的官员们讨论过此事，结论是叶利钦不可能与总统会面，但是国务卿贝克和总统安全事〔249〕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倒有可能接见他。

我尽量安抚他，表示他无疑会在白宫和国务院受到高规格的接待，但别期望非见总统不可。他坚持说，如果在最近的竞选之前他已经去过美国的话，就不会想要见总统了，不过现在情况不同。总统不是接见过来自民主国家的

反对派领导人了吗？

对此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会见偶尔会有，但不是惯例或者必须如此。我不好直说跨区域集团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能算是一个反对派组织，苏联也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他也不是反对派组织中的唯一主席，而只是几个主席之一。他无疑已考虑过这些没有必然联系的技术问题，其逻辑有点像“如果你们想要我们成为民主国家，为何不先把我们视为民主国家来帮助”？

会谈后，我的心情反而比以前更为沉重了。叶利钦的期望如此之高，不让他失望实在很难。而且，如果他试图按照我看到的这个计划行事的话，到最后肯定会累垮，后果难以预料。

下午剩下的时间，我一直打电话与国内的人员联系，看形势能否有所改观。叶利钦曾提到，奥伯林学院院长、美国最敏锐的苏联问题观察家弗雷德里克·斯达尔参与了此行的赞助，他期望斯达尔至少陪同他部分行程。如果叶利钦没有搞错，我也就稍微放心一些。我跟斯达尔很熟，知道与俄罗斯人打交道比他更在行的找不到第二人。

弗雷德里克当时不在奥伯林。我的秘书从新奥尔良寻到了他的踪迹，总算与他接上了话。我把事情原委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令我沮丧的是，几个月前虽然赞助单位找过他，当时他也同意为叶利钦此行提供帮助，但后来就再也没有人跟他提起此事了，因此目前的计划他并没有参与。

我们下一步是敦促国务院的同事们在华盛顿争取一些高规格〔250〕的会晤。我请他们重提与总统见面之事，这倒并非为了取悦叶利钦本人（我们能够应付他的任何失望），而是因为这样人们可以看

到总统与他打交道，这将是对苏联民主进程的支持。

与叶利钦的会谈证实了我的猜测，他希望利用此次出访提高在国内的政治地位。这样，外界就会看到他作为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领袖正在加紧活动。

当然，我了解，白宫的扭扭捏捏事出有因：谁都不愿意做任何冒犯戈尔巴乔夫的事。然而，我认为，白宫的态度是因为没有得到好的建议。苏联要想沿着民主的方向前进，就必须允许反对党发展。其领导人必须明白，外国政府与反对派领袖接触是完全正当的。我认为决策建立在个人基础上是危险的。我们应该支持原则，而非人情。

当然，如果叶利钦支持的政策与美国的利益不一致，避免采取助纣为虐的行动也是明智之举。但事实并非如此，叶利钦赞成比戈尔巴乔夫更快地削减军备预算，加快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民族自治进程。他的政策比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更接近于我们的期望。我认为，引导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及其民主同盟合作有益无害。从长远看，这也符合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利益。

在叶利钦抵达华盛顿之前，我们达成了一个妥协：不安排与布什总统的正式会谈，但是总统和副总统丹·奎尔在叶利钦与斯考克罗夫特会谈时顺便去看看他。这种方式似乎合情合理，但令人吃惊的是，我接到通知让我通过外交部向戈尔巴乔夫作出解释。我依命而行，但感到多此一举，而且有悖常理。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向玛·撒切尔首相解释总统为何会见了工党领袖内尔·金诺克；为什么没有注意戈尔巴乔夫曾经说过，他希望创立一个民主政府体制？如果对我们的行动有何疑问，他可以提出来，至于是否做出解释要看有无时间。

叶利钦的美国之行进展顺利，我心中总算石头落地。新闻报道似乎持肯定态度。《今日美国》头版标题《鲍里斯·叶利钦：新〔251〕《星升起》，

其中这样写道：“独立的苏维埃立法者‘就叫我鲍里斯’叶利钦风靡美国——与乞丐、政治家和管道工握手，拍肩，交谈。”⑥

不幸的是，叶利钦抵达华府之时，他已开始显得疲惫，在白宫留下的印象很不好。白宫负责欧洲事务的罗伯特·布莱克威尔事后告诉我说，叶利钦进入西厅准备与斯考克罗夫特会谈时，突然停下来，挥挥手，宣布如果不是去见总统，他就不再向前跨出一步。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通知他，总统只是在会谈期间过来一下，不过他的举止也的确不讨人喜欢。据报道，会谈本身进展顺利，但在场人员感到他并没有讲出一个协调一致的计划。他口若悬河，斯考克罗夫特几乎睡了过去。列席会议的人谁也瞧不起他，把他视作夸夸其谈、无足轻重的政客，认为他在政坛上只会昙花一现而已。

苏联新闻界对叶利钦在美国的活动一开始显得漫不经心。《真理报》发表了塔斯社有关他与斯考克罗夫特以及与总统会谈的简短报道，并根据白宫的声明称：布什总统在会谈中提到他与戈尔巴乔夫的良好关系以及对改革的支持。同期还转载了《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引用了不透露姓名的“官方圈内人士”的话说，叶利钦的计划非常空洞而且不切实际。

《真理报》对叶利钦出访的兴趣猛增是在意大利报纸《共和国》上刊登了一篇讽刺叶利钦的长文之后。该报驻华盛顿记者维多利来亚·朱可尼把叶利钦描写成一个醉醺醺的小丑，闹出一个又一个恶作剧，不断让主人感到难堪。他的描述与我所认识的那个人并不相符。据我了解，叶利钦有时，特别是在累了或者生气的时候，很可能在社交场合显得失态。但我也注意到朱可尼所讲的并非一律准确。例如，他把“杰克·丹尼尔酒的属性”说成是“肯塔基威士忌”，这足以在田纳西对立的各派美食家之间挑起争端。

苏联报纸尤其是《真理报》转载外国报刊的整块文章是非常罕见的。具体来说，此次例外的原因很明白：那就是千方百计地诋毁叶利钦的声望。通过引用非共产党的报刊，《真理报》的编辑〔252〕们希望增加有关这位苏联领导人窘态的真实性。

朱可尼讲述的故事出现在《真理报》上也可能没有得到克格勃的协助，是通过驻罗马的塔斯社分社电传过来的。不过，随后的事件显然是出自克格勃之手。叶利钦访美几周后，最高苏维埃委员们收到了美方组织人詹姆斯·加里森给其董事会写的绝密信的复印件。它以平朴的笔调描述了叶利钦万般丑态的花边新闻，与朱可尼描写的没有两样。

苏联政治家跟我提到，信的俄语译文神秘地出现在他们的信箱里。乌拉尔的一位代表送给我一份，让我鉴定其真伪。我感到复制得很内行，可能是激光照排，俄语翻译干净利落，从瑞士苏黎士邮出，却没有实际地址。

我给送复印件的代表回信说，无法确定一封私信译件的真伪，不过他可自己想一想，谁能够而且有意去截获私人信件、译出、复制并从国外寄回。

自 1989 年秋，发生了一系列与叶利钦有关的事。他开始收到恐吓信，有时是匿名的，有时好像是代表克格勃。他对此采取藐视态度，因为他不相信克格勃甚至会愚蠢到让他以身殉职的地步。他们的目标无非是想削弱他在公众中的威信，并吓唬吓唬他本人。

1992 年，叶利钦能够接触到克格勃档案以后对我说，他自 1987 年离开政治局后，就一直受到严密的监视。他仍然是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本应免受这种对待，但就连他的厨房（苏联家庭常在此拉家常）也遭窃听。按他所说，如果把窃听材料的副本摞起来，准会堆起二三十英尺高！⑦

难以置信的是，戈尔巴乔夫竟对克格勃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

〔253〕经济上的灾难

正当一个针对戈尔巴乔夫共产党机器的反对派形成之际，经济方面的消息也完全令人沮丧。物资日益短缺，生产开始滑坡，犯罪率上升。改革的初衷是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但人民的生活状况却越来越糟。谁也不再完全相信当局所说的变化会改善他们的生活。

事实上，在大谈新政策、新思维的背后，官僚们仍然无视再也无法掩盖的缺点，仍在抵制一切有益的改革。由于了解到了更多有关国外生活的准确信息，大众已敢于直言不讳，而且传媒揭露出来的缺点越多，人民的不满情绪就越强烈。

1987 年通过的“国营企业法”许诺给工厂经理松绑，激励竞争和创新，最终过渡到“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中央计划的指标大大简化，工厂经理有权在中央指令体制以外出售一部分产品，从而形成一种“国家订购”（政府机关完成认购合同）与开放市场自由买卖相结合的混合型体制。

与此同时，共产党官员停止瞎指挥，并减少主管经济的党政官员人数。如果相应裁减政府计划和中央部委人员，经营者会有更大的独立性。但这点并没有落实；相反，行政当局由于逃避党的已经很少的监督，变得更加专断了。

莫斯科围绕经济问题无休止地争论着。如果只听他们的发言，简直会断定正在发生一场工业管理革命。不过到各州去走走，跟经理们聊一聊，却发现一切还是老样子。

在西伯利亚和苏联远东地区，我向几位行政官员询问了国家订购任务与市场自由买卖的比重。结果无一例外，国家订购占产量的 90%以上。

萨哈林一个大渔场的主任说，如果让他自行处理，所有产品〔254〕干脆由国家订购一包到底。由于没有公开市场供选购，他虽然在名义上有权在市场上出售 10%的产品，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只有接到国家订单，才能得到打渔船队所需的燃料供给。因此，他不得不将捕捞量削减了 10%。

乌兰乌德羊毛场的经理骄傲地跟我说，她的厂子百分之百地靠政府订购。她坚持认为必须这样，因为没有政府计划调拨，她就无法得到羊毛、燃料、配件等。

显然，在提法上将计划产量改为国家订购不会带来实质性的变化。企业经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地方党政官员事无巨细的监管，但仍像以前一样依赖政府计划和有关部委。但现行体制已处在问题成堆、修修补补、穷于应付的状态，比以前更难有效地运转了。

1988 年通过的《合营法》为合营的小企业敞开了大门，其进展要好于《国有企业法》。许多从事贸易和服务性行业的合营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但这种通往市场经济的令人鼓舞的局面因地方官员的敌视、沉重的税收以及接踵而至的大量犯罪诱因而受到了扼制。不过，到 1989 年底仍有 100 多万人受雇于合营企业，其收入一般也远高于国营企业职工。

但是，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领导层仍然敌视私有制概念。戈氏继续坚持不允许生产资料私有制，措辞语气与他谴责 1988 年爱沙尼亚议会尝试私有化时如出一辙。

自 1987 年起，戈尔巴乔夫将改革与革命等同起来。在政治领域里，他促成的变化具有潜在的革命性。但他发出的经济信号却混乱不清。他一方面不

断地呼吁激进的改革，另一方面却从未赋予这些口号以任何实质性内容。

总理雷日科夫是渐进主义的坚定信徒，对实施经济改革负主要责任。他承认变革的必要性，尤其是从军品向民品生产转变的必要性。但他认为这只能循序渐进，并在上级指导下进行。他对新的制度建立起来之前就打破旧体系感到担心，他没有认识到，只要旧制度〔255〕未受触动，并仍有强大的抵制力，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起来。

整个 1989 年，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的关系非常紧张，但双方都努力避免将其公开化。虽然雷日科夫不赞同利加乔夫的意识形态狂热，但在经济问题上却越来越与他走到一起，此时，戈尔巴乔夫则在敦促加速变革。然而，正如跨区域代表团中的改革者不断指出的那样，双方谁也拿不出促使经济复苏的锦囊妙计。

第十一章〔256〕关键的一年

真正大刀阔斧的改革其实是从 1989 年开始的。自此，实际上开始了既转变我们的经济体制，又改变我们的政治体制的进程。

戈尔巴乔夫 1990 年 1 月①

联邦主义的观念在苏共体制下是根本不能接受的。

苏共中央委员会公报 1989 年 9 月 20 日②

1989 年 9 月戈尔巴乔夫结束了他一年一度的休假，从克里米亚回到莫斯科。这时他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正在改善，但这仅仅是令人沮丧的画面中的一个亮点而已。经济继续滑坡，商店里商品短缺日益严重，购物的队伍越来越长，消费者日益不满；新议会里，势力颇大的反对派与党和政府背道而驰。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政治家开始大谈分家散伙，许多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者正在集聚力量，东欧也摆出改革架势。莫斯科还不清楚华约能否经得起冲击。面对诸如此类的压力，共产党明显地给人一种惊慌失措的印象。派别活动虽然仍为党章所禁止，但已明显存在。越来越多的共产党高级官员开始怀疑总书记制定的路线。

〔257〕最急需认真对待的还是风雨欲来的民族分离情绪。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度假时花了很大精力思考这些问题。

什么样的联合？

几年来，不断传闻苏共中央将召开全会处理“ 民族问题 ”。问题正积弱成疾。1988 年，几十年来党的文件首次开始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但是，问题的解决似乎遥遥无期，莫衷一是。全会推迟，推迟，再推迟。

到 1989 年秋季，事态发展已明显超前于苏共决策。如果共产党还想对局势发展施加影响的话，就不得不做出根本性的选择。期盼已久的“ 民族全会 ”最后于 9 月 19 日召开，专门讨论这一问题。

结果，谁也不满意。

全会通过的冗长文件承认，在对待各民族群体的方法上存在严重缺点，呼吁建立一个“ 革新的联邦 ”，同时，它特别明确拒绝为建立一个真正的联邦而改变政党结构。

有一个德国谚语，大致可译为“ 既已说 A，必将说 B ”。看到中央委员会通过的民族政策草案，不由得想起这句话。在我看来，中央委员会似乎是要设法说出“ A ”，但却排斥“ B ”。文件中含糊地表示，可能有某种“ A ’ ”之类的方案取代“ B ’ ”，来完成字母顺序的排列。

不管怎样，该文件毕竟承认斯大林开创的“ 行政命令体制 ”“ 忽视了民族发展的要求 ”，“ 把各加盟共和国的自治压缩 ”到了极点，使宪法赋予的主权“ 在很大程度上 ”变成了一种“ 形式 ”。文件进一步指出，还存在着“ 大规模的压制 ”现象，整个民族被迫重新迁徙，知识分子被错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而遭“ 迫害 ”。文件承认，许多经济决策没有考虑到可能带来的社会和生态后果，这严重损害了民族的价值观和传统。文件还谴责了那些认为民族间〔258〕分歧日益缩小、民族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的观点。

走到这一步，已算不错。这与 1986 年党代会发表的溢美之词大相径庭，与戈尔巴乔夫在 1987 年写成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的判断也大不相同。

然而，它对问题的诊断并不彻底，甚至是误导性的。因为，文件还（事实上不止一次）断言，现存联盟是“ 完全自愿的 ”。③这样做的理由很清楚。因为文件辩解道，事情弄糟是在列宁逝世之后，也只有恢复真正的列宁政策，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故而不可能承认列宁下令武力合并这些共和国是错误的。

如果救治处方合理，这种不诚实也可算作必要的自欺欺人之谈而得到宽恕。然而，尽管文件大谈“ 新联邦 ”将是如何截然不同，但却排除了任何可能付诸实施的具体方案。最重要的是，它公开宣布，在共产党自身内部，绝不可能存有联邦主义的想法。

苏联宪法依然保留着众所周知的第六条款，该条款确立共产党为国家唯一合法的政治组织，并享有全社会“ 领导角色 ”的地位。如果唯一的合法政党不能建立在联邦原则的基础上，那么任何“ 联邦 ”宪法都将是一种耻辱。

此外，文件还特别否定了各共和国提出的如下更重要的要求：各加盟共和国的法律优先于苏联法律；其法律的制定无需同苏联颁布的“ 基本原则 ”保持一致；可限制其他共和国的移民，居民享有投票权。文件还强调继续执行征兵制，没有任何拒服兵役的规定。各共和国的财产属于共和国也属于苏联，但谁能得到主要份额，谁有权力处置财产，是不言而喻的。

民族全会一结束，谢瓦尔德纳泽就赴美国华盛顿和怀俄明开会，并在联合国发表演说。他似乎对苏联最终面对这一问题谨慎乐观，感到现在不得不考虑有关分离的宪法权利。他预言说，苏联当局将制定程序，以使分离有序地进行，但他又怀疑，如果当局更加谨小慎微地处理这一问题，事情能否发展到这种地步。他〔259〕向大家保证，不管是在东欧还是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都不会动武。他还特别提到，无论在哪里动武，都将意味着改革的终结，且极有可能导致戈尔巴乔夫的下台。

民族全会结束后，委员会开始认真地为苏联界定一个新的宪法结构。几篇学术文章发表，有的暗示正在考虑一种灵活的联盟，其中包括加盟共和国可以不同的方式确定跟中央的关系。有的作者援引沙俄的占领地区为例，说当时芬兰便享有与各地不同的宪法地位，他们还注意到波多黎各、密克罗尼西亚同美国的关系与其他州就不一样。

对我来说，这种方案作为联盟的基础似乎是不切实际的。19 世纪的芬兰和 20 世纪的波多黎各的方式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它们例外于国家大部分地区一致遵循的宪法原则。换言之，我可以想象出一个仅有几个地区享有特殊地位的苏维埃联邦，但却难以想象在一个联邦中各加盟共和国都享有独特的地位，而且可按各自的意愿对其加以改变。最终，灵活（或按俄语直译为“ 多变 ”）联邦的想法由于行不通而被抛弃。

除有关新苏维埃联邦性质的争论之外，由戈尔巴乔夫发起的这个委员会的其他工作进展缓慢，总是落后于事态的发展。许多观察家后来惋惜道，如果 1989 年能为各共和国提供一个具体、宽松的联邦方案，它们将会心存感激地予以接受,并很可能阻止那种刚露头的分离主义——不过,谁能说得准呢？

“ 卫星帝国 ”的崩溃

正值苏联内部民族主义压力逐步加大之时，苏联在欧洲的“ 联盟体系 ”（实际上是一个没有正式名称的帝国）以惊人的速度走向崩溃。

该地区第一个非共产党政府于 8 月份在波兰成立。匈牙利和〔260〕捷克斯洛伐克也紧步波兰后尘，虽然匈牙利的共产党领导人要比捷克斯洛伐克的

领导人灵活些，但也未能扭转乾坤。

苏联公众面对这一地缘政治的巨变，明显持消极态度。一些知识分子敏锐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尤其是波兰的局势以及西方的反应，大多数居民由于正忙于应付严重的物资匮乏和日常生活问题而无暇他顾。多数居民并不关心外围帝国，因为这与他们的个人利益毫不相干。许多人确信，东欧人由于苏联的支援，生活得比他们还要好；果真如此，甩掉更好。

如果苏联老百姓相信失去东欧将影响国家安全——或者说他们仍然认为美国及其盟国是潜在的侵略者，他们无疑会有另一番感受。在此种情况下，苏联在欧洲边界的退让将会造成战争恐慌。但是，这并没有发生。谢瓦尔德纳泽和雅科夫列夫倡导的“新思维”已经扎根，这主要是因为苏联人完全了解西方对苏联政策变化所作出的适应性反应，更清楚从前苏联那些在西方看来是富于侵略性的政策。

早在四五年前，苏联公众得到的信息是，美国在欧洲部署了导弹，因此它可能对苏联实施核打击，但到 1989 年，气氛就大不相同了。

戈尔巴乔夫当时没有想到华约会这么快解散。不过，他的国内政治改革进程使他完全可以放手处理此事。他明智地决定找出必要的理由，以理解的心情，体面的方式，接受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人做出的选择。

不过，德国是另外一回事。虽然苏联人在很大程度上对其他东欧和中欧国家的事态漠不关心，但对德国却是个例外。对苏联民众——尤其是对军方来说，德国的分裂是谁打赢了二战的最好明证，也是德国再也不会威胁苏联或俄罗斯的最可靠保证。〔261〕戈尔巴乔夫易于接受在东柏林出现一个“改革的共产党”，甚至——虽然困难——一个非共产党政府，但其前提必须是保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受触动。1989 年秋，出于对维持这种局面 10 年或 10 年以上的幻想，莫斯科坦然接受了当时正在发生的迅速变化。就戈尔巴乔夫而言，德国统一肯定是未来的问题，也许要由以后的领导人来加以解决。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10 月访问莫斯科期间，在苏联外交学会作演讲时语惊四座。当时他评论说，一个分裂的德国能立于一个分裂的欧洲之中，但却不能存于一个统一的欧洲之内。如果苏联希望有一个“共同的欧洲家园”，不久他们将不得不面对德国统一问题。在座的对外政策专家对此做出的反应好像他们从未做过如此设想。即使有过这种想法，他们也必定会将其毫不留情地抑制下去，而不会公开讲出来。

等到苏联领导人领会到布热津斯基讲话的真实含义时，已到了年终。12 月初，刚从马耳他首脑会议归来，我就与谢瓦尔德纳泽讨论了东欧的局势。他重申，无论发生什么，决不会使用武力，他似乎对北部地带的局势表示满意。他还预言保加利亚不久也会改革，但对罗马尼亚表示悲观，因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已经走向压制而非改革。具体到东德而言，他说他对新领导人就其“国家的地位”作出的承诺印象很深。换言之，德国统一还需等待时日。

但是，不出几周，苏联决策者就开始意识到一个严峻的事实，他们正面临德国统一不可抗拒的压力。11 月柏林墙倒塌，东德和西德边界开放。面对泛滥的移民潮，没有人再相信边界开放之后，一个分立的东德还会存在下去。就在新年前夕，我见到了当时苏共国际部的负责人和苏联德国问题“首席”专家瓦连金·法林。他评论说：“我们一直希望德国统一是未来的一个问题，但现在很清楚，事已临头。”④

这确是事实，而且这也成了 1990 年戈尔巴乔夫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

一。

继德国之后，在祸不单行的苏联阵营中，对苏共和克格勃挫伤最大的是年底在罗马尼亚发生的血腥革命。对于针对齐奥塞斯库及其家族和受到憎恨的保安部秘密警察的暴力事件，苏联新闻〔262〕界进行了大量详尽报道，电视也唯恐观众错过任何一个暴力镜头。但当反齐奥塞斯库的武装请苏联介入给他们以支持时，莫斯科拒绝了，它要以此显示，军事干涉东欧事务——哪怕是在西方可以容忍的情况下——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对许多苏联官员来说，罗马尼亚是一个震动。但是其中的教训却是模棱两可的。改革派认为它说明了现存体制抗拒变革将会造成的后果。但是，克格勃和苏共保守派明白，在反共革命中，秘密警察和党魁们的下场将是被钉在耻辱柱上。

公开化受到责难

群众要求改革的压力与新闻自由的扩大越来越呈相互推动之势。《莫斯科新闻》，一份一直名不见经传的小报，在雅各·雅科夫列夫的领导下，一跃而成为全国性反对派力量的喉舌。维塔利·科罗季奇的《机关报》描述了充满恐怖的斯大林罪行，披露了浪费巨大的国防开支。费得罗·布尔勃拉茨基的《文学公报》刊登了一些耐人寻味的文章，揭露了过去对外政策因无知而造成的恶果和侵犯人权的行为。谢尔盖·扎利金在《明天》上刊载了描述生灵惨遭涂炭的系列文章,并且自 70 年代索尔仁尼琴遭流放以来首次发表了他的作品。伊万·拉普托夫也使《消息报》成了一份很受欢迎、报道客观的报纸，让读者了解全国局势的发展，积极推动农庄的私有化和自由企业制度。

但是，这些编辑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其中一些较大胆的编辑同苏共的意识形态部门进行了较量。如果他们的越轨言行被认为特别严重，就会被瓦季姆·梅德维捷夫召来训话，后者取代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接管了负责意识形态的部长职位，有时戈尔巴乔夫还会亲自训斥他们，多数人受到训斥后在一两个问题上会收敛一些，但此后又回到他们所喜爱的题目上。他们在党的压力下如履薄冰，但谁也没有掉下去。

科罗季奇得出的结论是，戈尔巴乔夫不时地训斥他们，是为了向利加乔夫、亚佐夫和鲁茨科伊显示，他已让他们作了检讨。但他并不真正期望他们改变做法。这一推测在利加乔夫的回忆录中也间接地得到了证明。他在回忆录里写道，他不能理解科罗季奇〔263〕如何能够不断地保证“改过自新”，然后又不断地从事他发誓不再做的揭内幕活动。不过，其他人则发现戈尔巴乔夫越来越咄咄逼人了。

有一种情况令戈巴乔夫感到无法忍受，那就是常常出现一些对他的声望表示质疑的文章。1989 年 10 月，《论据与事实》刊登一篇短文，说在其读者中间；萨哈罗夫比戈尔巴乔夫更孚众望。就是这篇报道使苏共最后下决心要把印刷媒体重新置于党的控制之下。

事件的主谋并不是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于 1986 年、1987 年间提拔的编辑，而是一位白手起家的斗士。是他把一份默默无闻的简报办成了一份全国最有影响的大报之一。

《论据与事实》几十年来一直是内部发行的大事综述，供知识协会主办巡回演讲时参考。该协会是苏共控制的民间组织，致力于成人教育和宣传。直到 1988 年，这一刊物才向普通公民开放征订。然而该报的老编辑弗拉基斯米拉夫·斯塔尔克夫决定放弃宣传，转而提供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客观事实。

在 1981 年，他就曾设法瞒过审查，披露出波兰独立贸易联合会即团结工会颁布的整套计划，但是这一周刊发行量太小，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

《论据与事实》向大众一公开，发行量猛增。1989 年就超过 2000 万份，1990 年将近 3400 万份。表面上看，该刊给人的印象并不深。8 页的小报，单面印刷，对折之后也不切边，且只能按照页码顺序阅读。它备受青睐的秘诀是什么呢？首先，名副其实，提供给读者的是“ 论据与事实 ”，前看已充斥于苏联社会，但后者却显得贫乏，而斯塔尔克夫强调的正是后者。与大多数苏联报纸杂志相比，他的文章简明扼要，切中要害，而其他报纸杂志最多只是偶尔摆一下观点。其次该周刊便宜，报亭售价 2 戈比，年订价仅 1 卢布 4 戈比，按当时贬值的官方汇率还不到 2 美元。

1988 年，我接受该刊采访时，斯塔尔克夫的不同风格引起了我的注意。苏联刊物刚刚开始敢于采访美国大使（《机关报》是〔264〕第一个），但往往要避开有争议的话题。不过，斯塔尔克夫却单刀直入，触及美苏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他的最后一个问题一定会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 我们真的窃听了你们的使馆吗？ ”他问，“ 如果是真的，你有证据吗？ ”⑤

“ 是的，你们的确那样做了。 ”我回答说，“ 而且我已掌握证据。 ”他的提问和我的答复都原封不动地发表了。公众喜爱他的刊物，因为它问了他们想问的问题，而且给予直截了当的回答。

斯塔尔克夫尽管很勇敢，但并没有加入任何政治组织。他可能采访利加乔夫，也可能采访萨哈罗夫。民意测验的数据过去总是不予公开，随着民意测验的普及，《论据与事实》开辟专栏予以报道。

10 月份的一篇文章显示，《论据与事实》的读者认为萨哈罗夫是国内最孚众望的政治人物。这一下惹怒了戈尔巴乔夫。为实现更开放的政治体制，正在同党内保守派进行斗争的戈尔巴乔夫认为，凡是对其领导权威和威望提出挑战的行为，都是不忠诚的表现。他立即于 10 月 13 日召见主要编辑、记者和作家到中央委员会，指责他们诋毁改革。⑥

第二天，梅德维捷夫传唤斯塔尔克夫到中央委员会，要求他辞去《论据与事实》编辑职务，接受一份别的工作。他可选择去编辑一份苏共资助的在布拉格发行的日报，或去卢基扬诺夫主管的《最高苏维埃公报》。

照过去的惯例，专门负责新闻事业的政治局委员提出的要求必须服从。但斯塔尔克夫拒绝默默地离去，而将此事提交给了他自己的编委会投票裁决，结果是以 47 比 2 的票数支持他。形式上，他不是党的雇员，而是属于其董事会成员很少碰头的知识协会。

一连几周，他和那些与新闻自由利害攸关的改革派焦急地等待着迫使他离职的进一步行动。可是一直也未见动静。戈尔巴乔夫显然决定不强行介入这一问题。不过，这一事件促使苏联知识分子认识到，他们需要法律的保护以免受这种压力。于是他们发起了一场立法运动，以保证新闻采编独立于共产党控制。

戈尔巴乔夫虽未强行介入这一问题，但却相当不必要地树立了一个敌人。斯塔尔克夫曾经是改革事业最积极的支持者之一，且〔265〕始终不渝，但他绝不会原谅戈尔巴乔夫企图炒他的鱿鱼。1992 年，斯塔尔克夫警告我说：“ 如果谁把开放的成果归功于戈尔巴乔夫，那么就是对我们所有这些不得不与他分道扬镳者的侮辱。1991 年 8 月之前，党中央委员会一直在找我们的麻烦。不是戈尔巴乔夫给我们带来了公开化，是我们自己闯出来的。 ”

我问他，戈尔巴乔夫是真的想开除他呢，还是仅仅想吓唬他一下。他肯定说，戈尔已乔夫是真的要迫使他辞职。“ 那他为什么没有那样做呢？ ” 我问，“ 如果他坚持到底，肯定能做到。 ”

“ 不，他办不到。 ” 斯塔尔克夫回答，“ 世道已变，今非昔比。 ” 我没有问他是谁最初开创了那种变化的契机，因为很显然，戈尔巴乔夫 1989 年的所作所为已使斯塔尔克失对这一事实不以为然了。

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抢先一步

由结果判断，9 月份共产党全会公布的“ 民族问题 ” 决议和 8 月份中央委员会发表的强硬声明，是刺激而非阻碍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三国的独立运动在秋季和冬季获得了动力，几乎每天都有新的进展。到 1989 年底，当三国以不同的策略向同一目标前进的时候，立陶宛人从爱沙尼亚人手中接过了领导大旗。

8 月，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共产党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对付中央委员会的威胁。表面上，他们力图在不放弃原则立场的前提下做出和解的姿态，但是爱沙尼亚和立陶宛“ 负责意识形态的书记 ”（传统上最保守的领导职位）公开谴责莫斯科的声明。人民阵线甚至更加无所顾忌：例如拉脱维亚人阵称声明是“ 不适当的和专横的 ”，并将其与 50 年前莫斯科吞并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时的态度相提并论。⑦

立陶宛并不限于批评“ 8 月声明 ”。他们的领导人还向莫斯科提出进一步挑战，呼吁召开 12 月党代会，讨论如果苏共拒绝允许立陶宛共产党自治，该党将考虑退出苏共。

〔266〕利用放松旅行限制之机，来自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人民加强了同外国人的接触，包括同那些在斯堪的纳维亚和西欧的波罗的海社区的联系。爱沙尼亚人开始把到芬兰探亲当作很平常的事。许多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裔美国人也开始到此访问，有的还留下来提供帮助和咨询。

10 月份，我接到了一份会见请求，发出请求的是将要代表爱沙尼亚人民阵线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一次正式会议的爱沙尼亚代表。3 人中有 2 人我认识。伊戈尔 · 格拉金，一位 37 岁的法学教授，高前额，留小胡子，笑容可掬，是斯巴索别墅社交性集会的座上宾。虽然他家住塔图大学城，但却是由帕鲁农区选出的代表。其父是俄罗斯人，母亲是爱沙尼亚人，他说俄语带爱沙尼亚口音，喜欢用爱沙尼亚语拼写他的名字而不愿用俄语名字格利亚琴。马留 · 劳利斯庭是塔图大学的哲学教授，头发金黄，态度严肃，生于爱沙尼亚的名门望族：她父亲曾是爱沙尼亚独立时的一名共产党员，主持过“ 请求 ” 加入苏联的议会。然而，她却是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向戈尔巴乔夫发难的代表之一。格拉金和劳利斯庭得到了哈尔多 · 阿斯梅的响应。阿斯梅作为塔林贸易联合会的地理学家后来当选为该市市长。

与 7 月份的立陶宛不同，爱沙尼亚没有设计出一个独立的大战略，但强调他们有决心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暴力的手段建立一个独立的爱沙尼亚。虽然他们觉得爱沙尼亚是一个权利受到剥夺的被占领的国家，但他们更明白，仅仅确认这一事实并不能自动获得独立。他们将不得不去谈判，并采取灵活的策略。毕竟他们必须避免诉诸武力。正如夏天的立陶宛客人一样，他们很清楚，暴力将使争取自由的努力付诸东流，给人民带来不必要的灾难。

他们想从我这里听到对美国政策的解释。他们注意到了我们的不承认政策，但想弄清其内涵。特别是，他们不清楚，与苏联当局谈判的行动和参加

苏联的某些政治机构是否会削弱他们认为苏联吞并爱沙尼亚是非法行为的立场。他们很可能已从拜访过我的立陶宛客人那里了解到了我的态度，之所以没有提到这一点，是想直接从我这里听到答案。

我向他们介绍了我们的政策，正如 7 月份曾向立陶宛人所做〔267〕的一样。我强调，“ 不承认 ” 政策不可能改变，因为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在努力获得自由时是被迫加入到苏联机构中去的。只要他们没有在一次自由、公正的选举中投票赞成加入苏联，他们加入该 “ 体制 ” 就不能被用来证明苏联接管是合法的。与此同时，我解释说，宣布独立并不足以保证独立国家的身份获得认可：在可望得到正式承认之前，独立必须已是既成事实。

来访的爱沙尼亚人平均比萨尤季斯代表团成员年轻，这大概纯属巧合。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人民阵线运动汇集了大批年富力强的人才。也许是由于格拉金、劳利斯庭和阿斯梅会说英语，故被选中。但值得注意的是，三人都是二战后不久出生的——在 1949 年与 1952 年之间。他们并不是已过中年、仍怀念着已逝去的田园诗般童年的那种人。作为一代人，他们是 “ 苏维埃爱沙尼亚 ” 的产物。另外，三人都是共产党员。其中两人不久后退党，另一位也没有落后太久。

封闭的社会相信谣传。由于正常的信息来源不可靠，人们就转向亲友、家属、同事，甚至是道听途说，信口开河。尤其是，出自某某认识的某某在政府部门供职的嫂子或小姨子的话可能比政客和大众传媒更为可信。

这就是苏联公众的心态。虽然新闻界日益开放，但还不足以改变人们的观念。他们认定当局故意误导民众，隐瞒事实，混淆是非。

到 1989 年秋，东欧已开始摆脱了苏联。夏天，波兰共产党在选举中失败，匈牙利共产党严重分裂，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在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式（即外柔内刚）的革命已遍布全国。东德的昂纳克下台，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被解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前途未卜，年底前就将死于非命。

〔268〕事件走马灯式地一个接一个，就在这时，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官方发言人都宣布布什和戈尔巴乔夫计划于 12 月初举行马耳他会晤。

戈尔巴乔夫对布什关于会晤的建议作出了热烈的响应。在过去，当对结果没有把握时，他就会推迟会晤，而近一年来却迫不及待地要与布什总统举行正式会谈，以确保美国政策能继续里根确立的进展势头。进一步讲，他开始更热中于到国外旅行，与外国领导人打交道，而不喜欢处理日益混乱的国内事务。马耳他之行很容易配合盼望已久的对意大利的访问以及对教皇保罗二世孜孜以求的拜访。

从美苏双方角度来看，都有充分的理由举行马耳他首脑会晤。但是计划一公开，就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和苏联其他地方引起轩然大波。一时谣言四起。盛传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已经或将要做一笔交易，用东欧的解放换取默认戈尔巴乔夫按自己的意愿处理苏联民族问题。1989 年初，有关基辛格建议与苏联领导人就东欧前途举行谈判的报道更增加了人们的疑虑。

谣言引起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政治新领导人的警觉。他们组成的一个代表团要求立即见我。这次三国都有代表，10 月份见过我的那三位爱沙尼亚人也在其中，另外还有两名 7 月份见过我的立陶宛人（安塔纳伊捷斯和莫季叶卡）。新面孔中包括艾吉迪尤斯 · 比斯卡乌斯卡斯。他时年 34 岁，是维尔纽斯检察院的律师。满头黑发，戴一副无边眼镜，留着小胡子，喜欢芽黑色衬衫。他不久被提名为立陶宛常驻莫斯科代表（相当于大使），从而成为我的

重要同行。另外，该代表团中最能言善辩的是经济学家卡兹米拉·普隆斯基涅。他最近被提名为立陶宛副总理，不久将成为总理。

代表团中还有两位拉脱维亚人，比舍尔斯·伊尔马斯和马夫里克斯·乌尔夫松斯。比舍尔斯是立陶宛州立大学的法律系教授。也是像我这样的年龄（年近 60），体魄高大健壮，头发稀疏，戴一副有角质架的眼镜。我们早些时候见过面。当时他是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的副主席，率一行要员访问过美国。他的俄语无可挑剔，但当我见到他妻子时，才意识到其家眷在家里都说拉脱维亚语。她的俄语口〔269〕音很重，有时抱怨自己难以用俄语表达。乌尔夫松斯年近古稀，头发全白，在里加艺术学院教政治学，是最高苏维埃国际事务委员会里的活跃分子。他是犹太人，由此使人想起要求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独立的政治活动家并非只是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各民族。

由于天已不早了，我们就在斯帕索别墅大餐厅的桌前坐定，这样记录方便，同时旁边还有甜点饮料。

客人们准时到达。布什和戈尔巴乔夫真的像传说中的那样做了交易？虽然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我身上。但这次我欢迎这种提问，因为我能给他们带来好消息。

“你们要担心的事很多，但这不在其中，”我说，答案是“没有，绝对没有这样的交易。从来不曾有过交易，而且今后也不会有”。

他们不相信，忧虑之情溢于言表。一位客人询问：“但马耳他会晤中会谈些什么呢？”

我并不确切了解，尽管我期望双方就军控、东欧以及未来的经济关系进行深入的讨论。不过，我可以确定不会发生什么，那就是我们拒绝承认苏联吞并波罗的海国家的政策不会发生改变。”

“但是，如果戈尔巴乔夫要求以东欧自由为代价换取这种变化呢？”

“布什总统不会同意。我也认为戈尔巴乔夫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与我们经常打交道，知道这样做行不通。此外，他怎么能使干涉东欧的威胁切实可信呢？他已无法在那里动武，几乎谁都明白这一点。”

话题接着转到经济援助的可能性上，而在这一问题上，我无法做出肯定的答复。我指出，即使苏联政府允许（而这一点也是难以捉摸的），美国的预算赤字也将使它难以提供大规模的援助。我向他们建议说，他们应假设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援助也是有限的，他们应该调动国内的资源来支持他们可能采取的任何政策，这样他们就将站在一个更为合理的基础之上。

会谈结束时，我还不能确定已使他们相信美苏之间不可能达成某种交易，但事态的发展很快就印证了我对他们讲的话。

官方观点〔270〕

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独立浪潮成为许多场合的热门话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布热津斯基来访时与雅科夫列夫的谈话。我们问了许多有关东欧的问题。雅科夫列夫使我们确信，在任何情况下，即使那些国家结束共产主义统治，苏联也不会使用武力。这也是我们从谢瓦尔德纳泽那里听到的信息。

布热津斯基接着问，如果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宣布独立，将会出现什么情况。亚科夫列夫毫不犹豫地回答说：“那将是改革的结束。”他接着说，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应先尝试实行五六年“真正的联邦”，看是否可行。他补充说，它们可拥有“政治经济主权”。他没有确切具体他说明为什么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独立会结束改革，但我们理解他的意思是，如果波罗的海沿岸国家

执意独立，强硬派将上台。

几周后，我见到了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他的观点大不相同。作为中东问题专家，他已辞去了苏联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职务（他是取代雅科夫列夫就任此职的），当上了最高苏维埃联盟委员会的主席，其职位相当于我们的众议院议长。他相信，自 1990 年 1 月 1 日起给予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经济自治将产生积极的作用。他认为，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将会了解到，没有联盟其他组成部分的支持，它们不可能有所作为。这一现实会使它们翻然醒悟，脱离的呼声也就自然会平息下去。

大多数苏联公民感到很难理解的是，即使因独立而导致经济恶化（并不一定会这样），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人民的态度也不会改变。他们也难以理解民族独立不一定意味着打破现存的贸易纽带，中断人民的正常往来。这种困惑的理由是可以理解的。几十年来，苏联生活在铁幕之后，这一铁幕隔断了人民与外界的交往，也使〔271〕所有的贸易离不开官方的对外贸易部的指导。许多本应懂得更多的政治领导人甚至把独立想象成了孤立的同意词。

部分是由于这些错误的观念，多数俄罗斯人并不同情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事业，甚至更不同情中亚诸国的追求。因为他们相信——错误地相信——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高生活水准证明它们享有的资源和投资超过了应得的份额。

然而，1989 年俄罗斯开始组织起来的民主力量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并尝试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一起致力于共同的事业。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希望采取民主联邦或邦联的形式也不愿看到苏联解体，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明白，抓住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不放，违背它们的意愿，是有悖于民主精神的。

马耳他会晤

到 12 月 1 日，当布什总统抵达马耳他与戈尔巴乔夫开始酝酿已久的会晤时，他终于确信他能够而且也应该支持改革。美国媒体批评他缺乏创新和领导才能，受此触动，他决心改变在公众中的形象，先后宣布了一系列改善美苏关系的计划。其中许多计划就是经济方面的。

布什班底仍然感到担忧的是，戈尔巴乔夫会利用这次首脑会晤之机，提出一些轰动性的建议，来取得宣传上的优势。但我认为无需有此担忧。我们已不断地警告苏联要避免雷克雅未克式的意外之举。他们也对此做出了保证。我相信他们，因为我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利益决定了他们必须与我方配合，而不是一味的哗众取宠。他在西方人眼里表现得还算不错，并没有玩弄宣传游戏。

布什希望赶在戈尔巴乔夫之前提出一揽子重要建议，但总统班底一般都要从华盛顿官僚机构互动的过程中取最大的保险系数。事实上，华盛顿已产生了一个拆除某些冷战贸易壁垒的进程表，其中的大多数措施本可以也应该是在 6 或 8 个月之前就提出来的。不过，令人鼓舞的是，我们终于还是前进了一步，允许建立一种更为积极的经济关系。

戈尔巴乔夫来到马耳他是准备抱怨布什政府在发展伙伴关系〔272〕方面过于消极。然而，布什在会议一开始就提出了拆除经济壁垒的计划，从而消除了他的疑虑，戈尔巴乔夫显然很高兴。不过，在有关苏联经济问题的会谈中，布什和贝克都为戈尔巴乔夫对市场经济知识的贫乏而深感吃惊。例如，他辩解说，在西方，许多财产归集体所有，股份公司即是明显的例子。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非常模糊，有时也不准确。

但是，布什忽略了他所说的公司所有制是集体的这句话的意旨。戈尔巴乔夫正在试图对“社会主义”产权重下定义。虽然他仍在“私有财产”这个术语上纠缠不清，但准备把持股人拥有的公司看作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集体所有制”形式。如果他能够使这一定义站住脚，必将为国有大型企业的私有化开辟一条道路。因此，这也标志着他思想进程中的一次重大飞跃。

不过，这种误会在此次峰会上只是个例外。仅次于里根一戈尔巴乔夫雷克雅未克会晤，此次会晤比任何其他美苏首脑会晤的结果更富有实质性意义，尽管并没有签署什么重要协议。马耳他

会晤最有意义的事情，除了拆除贸易壁垒以外，当数在有关东欧、德国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问题上达成的非正式谅解。这些并非是背着第三者达成的“交易”——对此我们的盟国和东欧国家理所当然地会反对——而是基于对形势的斟酌，相互做出的保证。

戈尔巴乔夫向总统保证不会在东欧动武，也意识到了苏联军队将不得不从那里撤走，并将允许东欧人民自由地选择其政治和经济制度。他仍然希望保住华沙条约组织，但不会为此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布什则告诉戈尔巴乔夫，只要不使用武力，美国就不会试图利用东欧的变化，也不会采取行动来增加戈尔巴乔夫在目前形势下所面临的困难。

戈尔巴乔夫在有关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问题上的保证不像在东欧问题上的保证那样明确。他说，他决心尽可能避免进行镇压，因〔273〕为使用武力就意味着改革的终止。

他真正在为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寻找一切可能的联合形式，但不可能允许单方面的脱离；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行为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要求。

布什提醒戈尔巴乔夫，美国从未承认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兼并，而且今后也不会这样做。但他向戈尔巴乔夫保证，只要不使用武力对付独立运动，美国就不会采取任何使局势恶化的行动。不过，他接着说，只要莫斯科诉诸武力，反苏情绪就会席卷美国，并阻碍我们关系的进一步改善。

在一次私下会谈中，双方讨论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问题。我得到简报时，觉得总统定下的基调是正确的，他说得很明确，苏联不管是在东欧还是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使用武力都将中断美苏合作的进程，但他又向戈尔巴乔夫保证不会利用迅速变化的局势。同时，他一直回避有关东欧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未来地位问题的谈判，坚持戈尔巴乔夫也认可的自由选择原则。

并非所有的会谈都如此和谐。布什强烈谴责苏联向拉美出售武器并支持古巴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他告诉戈尔巴乔夫这些行动只要不停止，就将成为双方间的重要刺激因素。

戈尔巴乔夫也表达了他的一个重要不满：反对布什认为“西方价值观”已经胜利的观点。一开始，布什不理解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会反对他的这一看法，指出西方价值观体现的正是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同一原则，比如透明度和公开性，在各领域刺激增长的措施及自由市场。雅科夫列夫解释说，这个词暗指西方价值与东方价值，或北方或南方价值不同，因此对许多苏联人来说将意味着是西方意识形态帝国主义。根据贝克的建议，大家都同意接受用“民主价值观”作为共同宣言的基础。⑧

如果里根还在位的话，有关军控的谈判或许会比实际达成的成果多。布什政府依然没有确定在战略武器谈判中对某些关键问题的立场，因此不能乘机利用谢瓦尔德纳泽 9 月份提出的倡议，倡〔274〕议要求将削减战略武器与

防御和空间系统脱钩。

华盛顿关心的似乎仍然是国会能否批准新武器系统而不是寻找减少两国过剩的危险武库的途径。

不过，军控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是苏联关注的中心。削减战略武器谈判，特别是欧洲常规武器谈判，对戈尔巴乔夫确实非常重要，但在马耳他，他还有比这更重要的议题。随着苏联在东欧的地位迅速崩溃，他需要美国保证不要表现出正在利用他的弱点使他难堪。他需要显示他是以一个平等的而非懦弱的对手在与布什打交道。在他推动改革向前发展时，他需要美国经济支持的前景。

所有这些，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都得到了，但当他飞回到莫斯科时，这些成果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一个支离破碎的人民代表大会正在等着他。

改革的议事日程

各共和国的选举日益临近，人民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跨地区代表集团的领袖们在这一形势的鼓舞下，制定了一个综合性政纲。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修正苏联宪法第六条，该条确立了共产党在上层建筑中的主导性地位。那些共产党员——实际上除萨哈罗夫外全部都是共产党员——也都要求改变党的集中领导，允许党派发展。至于经济方面，该集团反对雷日科夫政府继续维持中央控制的做法，主张除了事关整个国家的少数几个部门外，管理职权下放给企业、地方和各共和国。此外，他们还迫切要求修正宪法，制定法律以使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企业得到经营自主权。许多人觉得苏联将不得不变成一个联邦，莫斯科的中央机构将只行使共和国自愿让予的权力。

戈尔巴乔夫全盘否定这些倡议，一则因为他无法让政治局赞成这些倡议（根据第六条）；二则因为他确实认为这些想法不可取〔275〕（如土地私有化）。在 12 月份的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对这些问题的辩论进入了高潮。戈尔巴乔夫在此次会议上采取的策略是，避免全面讨论这些根本性的问题，这使许多改革家得出结论认为，戈尔巴乔夫更感兴趣的是如何保住他的总书记位置，而不是完成他开创的改革事业。

最富有戏剧性的对抗发生在 12 月 12 日，即人代会的第二天。萨哈罗夫建议修改议程，以便就土地和财产所有权、企业及第六条——即宪法中那些正阻碍着改革的条款——进行辩论。他主张，人代会必须废除宪法上的禁令，以便为最高苏维埃通过适当的法律铺平道路。

作为主席的戈尔巴乔夫对此极为恼火，没等萨哈罗夫对其建议进行解释，就将其逼下了讲台。接下来，戈尔巴乔夫下令就是否将这些问题加入议程的动议进行投票，并使之遭到否决，但结果显示，反对票数并不占压倒性多数。如果戈尔巴乔夫支持这一建议，它将很容易获得通过，但他显示出的固执比第一次会议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萨哈罗夫因试图提出一个极为合理的建议而遭到戈尔巴乔夫的侮辱，此情此景，当晚即在国家电视台播放了出来。知识分子改革家大为愤慨：对他们来说，戈尔巴乔夫的反应就像是个地方党的老板（当然这也正是戈尔巴乔夫大半生的职业），而不像一个人们期待的、致力于改变国家的国家领导人。

两天以后，萨哈罗夫在熟睡中安然死去。他的许多朋友都认为是戈尔巴乔夫在人代会上对他的野蛮态度导致了他致命的心脏病发作。

人代会拒绝把萨哈罗夫的建议纳入议事日程，并未能阻止对问题的辩论。关于第六条，戈尔巴乔夫坚持此问题应该在起草新宪法时解决，并指出，

一党制并非是经宪法的认可才确立的，不能简单地通过删除宪法条文就将其予以废除。

其他问题与政府要求分阶段转向“市场关系”的建议密切相关，该建议由总理雷日科夫于 12 月 13 日提交大会。它呼吁分两个阶段、各用三年时间实现渐进转变，一切都必须由莫斯科周密〔276〕计划。雷日科夫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嘲讽了有关取消中央经济指导的要求：

这样设想一下吧。1990 年，我们告诉大家从现在起中央将不会再控制资源的分配，你们都自己找米下锅吧。接着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我不想去吓唬大家，但那的确会是一场经济危机。不出两三年人民就会无工可做。⑨

仍然是全国头号经济杂志编辑和跨地区代表集团的主席之一的加夫里尔·波波夫，斥责了雷日科夫的中央指挥的渐进主义：

过去 5 年已经表明自上而下的改革观念行不通，需要另找出路。中央必须准备不去全力以赴地挽救濒临倒闭的企业，而应该把扭亏工作移交给其他更了解情况和有兴趣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即各共和国和地方苏维埃，最重要的是，交给那些深受其害的人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的企业经常处在被“淹没”的状态，并不是因为它们不懂如何游泳，而是因为中央缚住了他们的手脚，在他们的脖颈上系上了磨石，然后再指手画脚地教其如何浮出水面。⑩波波夫当时指出，市场体系不能一鳞半爪地引进，因为各部分都是相互依存的。发动机如果没有汽化器就不能起动汽车，同理，基本的市场机制也不得不同时引进。根据他的分析，有五方面的法律必不可少：所有制、土地、企业、各共和国的经济独立及地方自我管理（这些基本都是萨哈罗夫提到过的），他指责人代会在那次会议上拒绝就此问题进行辩论。不过，他强调更多的是有必要赋予人民做出经济决定的权力：

我最近发现了一份俄罗斯联邦加盟共和国的统计报告，报告显示，1987 年前 9 个月，每只母鸡平均产 182 个蛋，1989 年同期平均产 183 个蛋。或许现在该是政府停下来、并理解在一个鸡蛋丰富的国度，无需决定一只母鸡该下多少蛋的时候了。（11）

然而，议会还是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政府的计划，否决了为各〔277〕共和国争取更多经济独立的要求。这次会议使许多代表的幻想破灭。乌克兰基辅理工学院院长佩特罗·帕兰丘克在当地电台发表了措辞尖刻的评论：

共和国拼命工作，中央却把一切都搜刮殆尽，然后又逼迫你向中央作揖乞讨这乞讨那，这还算是什么鬼联盟？……我无法相信政府想要做的事能靠那些给我们带来如此多社会灾难的旧的部委得到贯彻……我们需要立即打破行政命令体制。我们共和国辛苦劳作，然而 95%的收获都缴给了中央，只有 5%能留下来，这种做法必须废止。（12）

一位改革殉道夫

当我们惊悉萨哈罗夫逝世时，丽贝卡和我正在布鲁塞尔出席美国驻欧洲大使会议。国务院问我是否认为布什总统应派一名特使参加葬礼。我说，法定程序并不要求非派使节不可，但是派一个是完全合适的，实际上，政治上也是需要的。“戈尔巴乔夫会不会因此恼怒？”有人问我。我回答说他可能更喜欢不派任何高级代表，但我感到这对决策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最重要的是，萨哈罗夫不仅已成为苏联人权和民主的代言人，而且是民主变革的重要象征。

我希望布什总统派一位高级官员或私人助手代表他来参加葬礼。我认为

萨哈罗夫应该因他代表的事业而不是出于形式的需要受到礼遇。如果尊崇萨哈罗夫让戈尔巴乔夫感到不舒服，那将是令人遗憾但却是有益的。因为如果他还希望得到世界的尊敬，就不能不考虑到他从事的正是萨哈罗夫支持的事业。给萨哈罗夫的葬礼以特别关注正好能将这样的信息传达给戈尔巴乔夫。

几小时后，我得知美国已经决定不派使节，而是指定我为总〔278〕统的代表参加葬礼。这当然是我极为欢迎的荣誉，但我不禁怀疑做出此决定是否由于对戈尔巴乔夫个人想法的过分关心。难道华盛顿有一种过分倚重某一个人的危险倾向？但愿不是这样，但又不能排除这种担心。

12 月 17 日，星期日，我们飞回莫斯科，从机场直奔萨哈罗夫遗体安放的青年宫。气温在华氏零度以下，但已排成了长长的人流，有的并排而立，沿共青团大街延伸了几个街区。大多数人不得不站几个小时才能看一眼里面的棺材。作为外国的官方代表，我们被让到了队伍的前排。等待我们的是催人泪下的一幕。

萨哈罗夫的灵柩放在平常供展览用的、可升降的平台上。四周摆满了鲜花，每一位凭吊者都在向已经拥挤而有序的花丛锦上添花。我们从敞开着的棺材前走过，驻足默默地祈祷，并向其遗孀叶琳娜·波纳及其他家属表示问候。随后，我退后静观场面。

来人自然各种年龄的都有，但是年轻人的人数确实引人注目。不管萨哈罗夫的活动在警察、将军和共产党的党棍中间激起多大的仇视，但他显然已经抓住了那些将主导国家未来的受过教育的青年一代的心（而且我希望也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啜泣伴随沉闷的脚步声缓缓通过灵柩。许多人向花丛抛撒手写的挽联，有的大如标语牌。挽联几乎都不出三个主题：“原谅我们，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决不会重演”，“俄罗斯知识分子最优秀之花”。

第二天，萨哈罗夫的遗体安放在科学院。戈尔巴乔夫和其他党政要员出场并在吊唁册上签名。我和其他外宾也都如此照做。公共葬礼原订于下午进行。叶琳娜·波纳坚持仪式安排在一个有意者均可参加的场所，但没有一个场馆能容纳所有愿意参加的人群，因此，尽管气温低于冰点，葬礼还是改在莫斯科邻近的鲁日尼基体育馆的一个露天场地里举行。

根据讣告，葬礼仪式安排在从下午 1 点到 2 点举行，3 点钟到〔279〕莫斯科郊区沃斯特亚科夫斯克叶公墓安葬。叶琳娜·波纳要求只准家属和亲友去公墓，因为地方太小，容不下那么多人。

丽贝卡和我由使馆一位办事能力最强的政治官员塔季亚娜·沃尔科夫—格福勒陪同，中午一过就动身前往参加葬礼。我们知道人一定很多，很想有充足的时间找到合适的位置。可是，鲁日尼基人山人海，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一开始，我以为仪式将在体育馆举行——讣告也没有说清楚，但我们被引到了一个已经聚集了成千上万人的空地里。我们从人群中钻来钻去挤到前面，因为我知道让其家属知道我的到来是非常重要的。人们认出我之后，纷纷让道，把我引到了一个约有 1/4 公顷大小的方地里，那里已经圈起来，中间架好放棺材的平台（一个更大、更高一些的讲台），还有几排椅子。当我们走近隔离区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阿赫罗梅耶夫将军穿着制服，庄重地站立在人群中间。我们目光相遇，频频点头示意，但他没有要走近我们的意思。

今天，他亲临鲁日尼基参加葬礼，令我困惑不解。他曾是萨哈罗夫最尖

刻的批评者。如果他感到有必要表示一下尊敬，那天早晨在科学院就理应在吊唁册上签名。而今，他迎着寒风，站在萨哈罗夫最狂热的支持者中间。这是何意？我后来问叶琳娜·波纳（她并不知道他的到来），她认为他只是出于好奇，来凑一下热闹。不过，我怀疑并不这么简单。他的好奇心完全可以从新闻报道或从下属的报告中得到满足。我揣摸他的敬意实际上是献给作为苏联氢弹之父、而不是后来作为政治活动家的萨哈罗夫。或者，他是出于对一个捍卫自己信仰的人的敬意，而不管他是谁。我后悔阿赫罗梅耶夫还在世的时候，没有去问一下他当时为何而来。那时我只顾感慨于人际关系是何等微妙，常常要碰到出人意料之事。

到了“内圈”之后，我们又等了很长时间才见到灵柩和送葬〔280〕队伍——事实上超过了一小时。我们紧裹着厚厚的外套、皮帽和手套，但是冷风开始穿透我们的衣服。站在冰冻的雪地里，首先感觉到冷的是脚。很遗憾，俄罗斯农夫们穿的靴子硬邦邦的，实际上既不防潮，也不御寒，万万不可当作外交服饰。但是，我们周围的人群却在一个劲地增加。多少？10万？不止。20万？只多不少。50万？可能不到。但人数之多足以为我们挡风御寒。

最后，殡仪官抬棺而来，家属和致悼者相聚在台上。按照东正教的传统，致悼词时，我们这些在圈内的人得轮流举起点燃的蜡烛，伫立于棺木四角。但这不是一个宗教仪式。

悼词并不仅仅是对亡者的溢美之词；大多数还是政治演讲。跨地区集团的领导人都来了——叶利钦、阿法纳西耶夫和波波夫，以及许多非俄罗斯民族的代表。萨哈罗夫是大家心目中的英雄，对他逝世的哀悼将各个民族团体团结了起来，这是政治问题所办不到的。

由于演说家一个接着一个地呼吁采取政治行动，我开始担心会不会把葬礼变成政治示威。但接着我认识到在这种场合谈论这样的内容是合适的。这正是萨哈罗夫的遗愿：以死为动力，促发一场运动来实现他确定的目标。

我们起身送葬之前，短促的冬日已近黄昏。叶琳娜·波纳把我们挑出来劝我们陪同家属参加仪式的时候，她已友好地排除了有关丽贝卡和我是否被视为“亲朋好友”之疑。在烛光下，她亲吻死者，殡仪官合上棺木，将其降至最后的安息地。我们每个人轮流铲土填坟。这位比他同时代任何人都更能体现忧国忧民之心的伟人已经永远告别人世。

当我们通过公墓小径怀着沉重的心情返回车里时，已感觉不到一丝寒意。与下午的演讲不同，葬礼仪式富有人情味，冲淡了政治色彩。萨哈罗夫留给他的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并不仅仅是政治计划，尽管这方面也令人仰慕，而且还在于一种态度、一种道义力量。我想起前天人们拿到青年宫和那天下午带到葬礼〔281〕上的传单，脑海里力图完整解释那些挽联悼词。“原谅我们，当他们折磨您时，我们却无动于衷”，“我们再也不会没有勇气面对独裁”，“您为我们指出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天职”。

不，最后那一句不十分正确。我怎么能把俄语词语所表达的情感完全翻译出来呢？俄语的知识分子一词本身也是从拉丁语（intellignsia 和 intelligent）借用过来的。“知识分子”一词不行。在英语里，知识分子用来指人时含有一种冷漠尖酸的意思。在俄语里，ИНТеЛЛИГеНТ（智者）发音时带一个辅音“r”——有不同的意思，因为它带有不容推卸的道义意味。智者（ИНТеЛЛИГеНТ）不仅是一个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еКТуаЛ），而且是一个既博学多闻、又致力于社会公益的人。他不是一位“行善者”，而

是一位握有道义指南的人。

正是萨哈罗夫准确的道义指南给他的同胞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其哀悼之情溢于言表，其承诺郑重鲜明。但我不禁想问，果真经受考验时，他们会作何实际反应。答案直到 1991 年 8 月才揭晓。

立陶宛共产党的分离行动

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各种压力在整个秋季继续增加，而 1990 年初地方选举的前景更是推波助澜。其趋势日益明显，如果各共和国的共产党不能更好地顺应民意，就会在即将来临的大选中一败涂地。扭转颓势的唯一举措将是保证实现独立。

立陶宛的分离热情最高（在三个共和国中，这里的共产党也是第一个支持独立的）。越来越多的党员要求，如果苏联共产党拒绝沿着联邦路线重组，给予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自由行动的权力，立陶宛共产党应该与其一刀两断。如果继续依附于莫斯科，党在大选浪潮中必将被淘汰无疑。

戈尔巴乔夫将全部立陶宛领导人召至莫斯科与苏共政治局举行前所未有的联席会议，但他威逼这些立陶宛人的企图并未成功。立陶宛共产党的领导人阿尔吉尔达斯·布拉藻斯卡斯向戈尔巴乔〔282〕夫解释道，在立陶宛，党组织如果不与莫斯科保持距离，它就不能作为一支政治力量而生存下去。戈尔巴乔夫驳斥了这一观点，同时也打消了任何按照联邦路线重建政党的幻想。在莫斯科控制下的一元化领导将继续下去。

顺从戈尔巴乔夫等于政治自杀，逆风而上则可望在大选中立于不败之地。面对两种选择，立陶宛义无反顾地沿着分裂的道路走下去。布拉藻斯卡斯从与苏共政治局的对抗赛回到了维尔纽斯之后，立即宣布立陶宛共产党开始筹备一次代表大会。分离现在已在所难免。民意测验显示，立陶宛只有 16%的党员反对分裂。由于非立陶宛人占该加盟共和国 16%以上的人口，这就意味着，一些俄罗斯和波兰裔人也加入到了立陶宛人的独立队伍之中。

1989 年 12 月 20 日，立陶宛共产党代表大会在维尔纽斯召开，宣布脱离苏联共产党。不同意、退席或宣誓继续效忠莫斯科的代表还不足 1/5。

戈尔巴乔夫立即召开中央紧急全会，处理立陶宛引发的危机。虽然立陶宛党代会得到立陶宛绝大多数党员的支持，但戈尔巴乔夫仍坚持反对他们的行动，无条件地维护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而没有如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等人敦促他的那样按照联邦原则重建政党。他的话引人注目：

如果我们越过这条界线（以联邦结构取代共产党一元结构），你们就可能会说我们故意纵容肢解苏联的行为，对所有苏联人民来说那将是一个历史死胡同。这难道不是很清楚的吗？（13）

第二天，当我在报刊上读到这一内容时，甚感惊讶。戈尔巴乔夫可能认为，在党内当时那种气氛下，不可能公开支持联邦主义，对此我虽能理解，但却不能明白他为什么觉得有必要以这种绝对化的措辞来谴责它呢。毕竟，如果他打算创建一个真正的联邦，就应该为建立党的联邦结构的可能性敞开大门。进一步说，由〔283〕于坚持立陶宛的地位与其他苏维埃共和国等同，他也就排除了那种将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与其他 12 个共和国区别对待的可能性。而恰恰就在这一讲话的前一天，人民代表大会已经通过决议，宣布纳粹—苏维埃协定为非法。我当时认为，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明智的做法就该是坚定地支持这样的主张，即由于已发生的历史不公，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应该与其他共和国区别对待。但是，他的讲话似乎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戈尔巴乔夫冗长的讲话还有一个方面让我不安。他在斥责萨尤季斯和闹分离的立陶宛共产党时，谴责他们“叩开”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和华盛顿白宫的“大门”，把问题“国际化”。早些时候，他在声明中曾指责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征求外国意见，但这次是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公开点名批评我们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接触。这些接触显然使他感到不安。在我决心继续这样做的同时，对于戈尔巴乔夫是否能得到准确的信息没有把握。他的讲话增加了我对克格勃的怀疑，他们在报告中是否做了篡改，以“证明”立陶宛及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正按我们的挑唆行事。

事实上，鉴于我们的不承认政策，即使我们真的给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提供咨询，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们并没有给他们咨询，因为如果莫斯科进行镇压，我们无法保护他们。如果戈尔巴乔夫接受了克格勃有关外部煽动的论证，将会减少他理解时局的能力，而且会增加他决定动武的机会。

尽管戈尔巴乔夫措辞强硬，但全会并未立即否定建立一个自治政党的要求，而是将最终决定推迟到了 1 月份戈尔巴乔夫访问立陶宛之后。不过，戈氏的讲话和全会的决议使他的回旋余地很少。他对立陶宛的访问很难成功，除非他设法说服立陶宛放弃其既定路线。

公开化取得成功

编辑，尤其是电视制作人仍然感到政治当局在“指导”他们的工作。新闻媒介仍不自由，党组织中的保守派正在加紧把大众信息置〔284〕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尽管如此，到年底，改革派已稍感宽松。斯塔尔克夫已挫败把他清除出《论据与事实》的企图，改革派仍在主编《莫斯科新闻》、《机关报》、《消息报》和《文学公报》。就连《真理报》现在也换了领导。其保守派编辑维克多·阿法纳西耶夫已经由戈尔巴乔夫的私交伊凡·弗洛罗夫取而代之。勇敢的新闻工作者、编辑和学者不断努力，成功地揭露了过去的许多暴行和丑闻，所有这些情况以前都要沉淀到奥威尔式的“记忆孔”里。

一年多来，苏联军方也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环，受到批评。像《机关报》和《莫斯科新闻》这样的刊物都在抨击其过去的错误和现在管理的混乱。美加研究所所长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在 70、80 年代作为苏联外交政策的发言人在美国极负盛名。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谴责苏联防务预算膨胀，军队人浮于事，军事装备远远超出了国防需要。

自从二战以来备受青睐和称赞的苏联高级将领对此极为愤怒。阿赫罗梅耶夫将军与阿尔巴托夫的指责针锋相对，公众也因此能像美国人那样一饱眼福：看到就国防开支广泛地进行辩论。苏联人民从不知道在“国防”的名义下耗费了多少资源。随着真相大白，公众越来越认定他们受到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愚弄。

过去肮脏的秘密被曝光了。官方一开始半抵赖，接着不置可否，最后正式予以承认。内务委员会（克格勃化名之一）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屠杀波兰军官一案就是这种情况。几十年来，苏联政府坚持说德国人占领了这一地区后，盖世太保杀害了这批波兰人，追究内务委员会的责任纯粹是纳粹杜撰的反苏宣传。

1989 年，《莫斯科新闻》发表的文章证据确凿，明白无误地指出斯大林应受到谴责。事实上，在苏军与纳粹瓜分波兰后，被苏军俘获的全部波兰军官团都根据他的命令被处死了，目的是防止〔285〕战后波兰“资产阶级”卷土重来。波兰军官大部分不是职业军人，而是留守人员：律师、医生、商人。

如果清除了波兰“资产阶级”，时机成熟时就可以把它变成对苏联唯命是从的“工人国家”。在斯大林扭曲的心灵中，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逻辑”。

《莫斯科新闻》的这篇文章显然是要敦促当局承认已经酿成的悲剧。毕竟，波兰共产党已经行动起来。如果苏联在明摆着的事实面前继续持否认态度，就很难与波兰政府建立正常的、友好的关系。

但是，苏联政府仍在犹豫。然而，到 10 月下旬，已有迹象显示，对所发生的不幸给予官方承认可能为时不远。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到达莫斯科之前，曾要求允许参观卡廷谋杀现场。苏联外交部出人意料地同意了，事实上，还为参观作出了安排。布热津斯基请我作陪，借以表明美国政府对了解事件的全部真相很感兴趣。我自然欣然同意。

当我们到达一个已竖起纪念碑的墓地时，目睹了一个动人场面。几辆载满波兰人的汽车已经到达，许多人是死难军官的亲属，在万灵节这天来悼念亡灵。苏联竖起的这块纪念碑称它是 1941 年盖世太保杀害的波兰军官之墓。有人用手写体“内务委员会”和“1940 年”等字样覆盖在“盖世太保”和“1941 年”上面。苏联看守并没有将其擦掉。

一位天主教牧师领着波兰参观者祈祷。我们立正颔首，心里为此地发生如此惨绝人寰的罪恶而悲愤交加。

我们正要离开墓地时，一位俄罗斯电视记者向我们走来，请布热津斯基接受采访。他同意了，并发表了一个富于雄辩的声明，呼吁苏联政府承认这一暴行。他指出，苏联和波兰都是斯大林政策的受害者，承认事实将为苏波和解奠定基础。当我被要求发表评论时，只能重申布热津斯基的话，并补充说了一句，只有反省过去，苏联人民才能确保这样的悲剧不致重演。

那天晚上，电视一频道晚间新闻联播向全苏联播放了波兰赴〔286〕卡廷悼亡团的场景、纪念碑上的修正字样的特写镜头以及对布热津斯基和我的采访。几周后，苏联政府发表公告，承认斯大林和内务委员会应对当时的暴行负责。

我一直不明白，苏联当局为什么花那么长时间才认识到承认斯大林的罪行符合他们的利益。很显然，其体制中的权力机关仍在企图掩盖真相。1992 年，我找到了答案。为写这本书，我重访莫斯科去采访一些官员，并同俄罗斯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约见晤谈。约定的时间已到，一位助手来到前厅通知我会见晚些时候开始。主要由受害者亲属组成的一个波兰代表团当时正在与鲁茨科伊会谈，而且会谈超过了预定时间。

15 分钟后，波兰人走了出来，我们一行人被引到鲁茨科伊的办公室。鲁茨科伊是职业军人，他似乎还没有从刚才会见的震动中恢复过来。“那些家属们希望得到一些既简单又合情合理的东西。”他不问自答，“而且他们有权提出这些要求。但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我问他，他本人究竟有些什么想法。他说，波兰亲属希望把遗骨挖出来，可能的话做一下辨认，然后再适当地重新安葬，而此事正在办理。但是，他们还要求从克格勃档案中了解有关暴行的全部事实真相。他正是怀疑是否能做得到这一点。我问为什么这会成为问题。

他解释道：“没有任何关于战争罪时效的法令。参加那场屠杀的人依然在世。叶利钦总统和我都一再做出努力，想获得全部文件。我认为戈尔巴乔夫也在努力。但正是‘机关’不愿透露消息。他们想保护他们自己，其他则

不会考虑。我们将继续努力，但我怀疑全部资料是否还会重见天日。”(14)

克格勃，国中之国。尽管其前任领导已经蒙受耻辱，解甲归田，组织也已改组成俄罗斯安全部，但它依然如此。1989 年，官方之所以承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想必一定是迫于来自像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等人的巨大压力和戈尔巴乔夫的支持。

卡廷森林大屠杀只是官方对过去罪行所作证实的一系列事件：〔287〕之一。圣诞前夜，人民代表大会最后通过决议，宣布希特勒和斯大林签订的秘密议定书自签字之日起就在法律上无效。在此之前，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领导的委员会曾递交了一份长篇报告，证实西方联盟在德国发现的协议文件是真本，不过俄文原件尚未找到。(15)

并不是所有公开的罪行都发生于斯大林时期：人民代表大会还调查了 4 月份在第比利斯对示威者的大屠杀，并在 12 月通过一项决议，谴责使用武力，下令考虑采取进一步行动。但许多人认为其调查报告并不令人满意。特别是报告似乎显示出苏联军方隐瞒了究竟是谁对动用武力的决定负责的信息。因此，这一立法调查在开创了一个有益的先例的同时，也表明其调查委员会尚缺乏从一个不愿配合的官僚机构那里取证的适当权力。

1986 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揭露，对共产党官员在公众中的形象甚至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因为它表明苏共以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参与了大规模隐瞒危及几百万人生命的事实真相的活动。1989 年显示放射级别的精确地图首次发行。从中可看出，住在某些受辐射最严重地区的居民，既没有得到疏散，甚至也没有得到警示。事实上，以前作为民防计划组成部分而发放的放射线测量仪反而被收回，以防止当地居民测出日益升高的放射级别。

对许多人来说，1989 年是改变对现存制度态度的转折点。大多数人只知道过去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弊端，这一年不断曝光的那些具体证据则激起了全国民众对当局的憎恨。

乌克兰宣布独立以后，我曾问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总统是何时从信仰共产主义转变为认定乌克兰必须独立的。他回答说：“是在 1989 年。”他接着解释道，尽管过去他对存在的弊病和暴行有一般性的了解，但在 1989 年以前一直未见到真凭实据。1989 年的所见所闻使他坚定了这一信念：唯有独立，未来他的国家才能免遭此类劫难。(16)

叶戈尔·利加乔夫的一个判断是绝对正确的。新闻媒体发起〔288〕的揭露苏联历史黑暗面和现存体制缺点的运动，直接动摇了这一帝国的根基。

戈尔巴乔夫的战略

从 1988 年春天起，我一直坚信，戈尔巴乔夫是在认真追求苏联的政治改革，而这就需要其做出真诚的努力来协调与西方的关系。从那时起，事态的发展也强化了我的这一信念。我也完全清楚，他在共产党内面临着强大的反对势力。可以肯定，虽然这一反对势力多数时间处在被动状态，但现在正开始越来越公开地唱反调。在共产党内部形成一股更加紧密的反改革势力的前景有可能成为真实的现实。按我的理解，如果不能打破党机器的控制，改革计划就不可能成功。

然而，我不知道戈尔巴乔夫是否已认识到，如不打破他所领导的共产党的束缚，其改革就不会有成功的机会。他仍在夸夸其谈，似乎他能把党变成改革的守护神。我不知道他这样做是为赢得时间而做表面文章呢还是出于真

心。如果他真的相信共产党能够创造民主制度，改革将无从谈起。

不过，我认为戈尔巴乔夫在以智挫败其对手方面的纪录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根据需要灵活应变的能力也说明了这一点。考虑到这一纪录，我在给华盛顿的备忘录中以及向莫斯科的美国新闻记者作背景介绍时指出，利用戈尔巴乔夫目前面临的困境拆他的台是一种冒险行为。尽管戈尔巴乔夫受到来自保守派和改革派的两面夹击，却仍不失为全苏联最有声望的政治领袖。如果他能给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注入更多的民主程序，这种声望就将是一笔不可取代的财富。

我当时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戈尔巴乔夫会努力保持住在苏联政治结构中的权威地位，与此同时，我对他的经济改革计划是否能成功则缺乏信心。事实上，这一计划似乎注定要失败。在〔289〕我看来，主要问题是戈尔巴乔夫能否及时采取一项更激进的、更根本的变革计划。他似乎注意到了各方面的平衡，但对隐藏在种族和民族主义骚动背后的真正力量却视而不见。我怀疑他在处理这种问题时不像他说服党的干部参加真正的选举时那样得心应手。对于竞选，他似乎知道需要什么，甚至知道何时该走迂回路线。至于民族问题——包括俄罗斯和非俄罗斯族问题，他要么不知道需要什么，要么就企求一些可望不可即的东西：自愿同意的帝国控制。

越来越经常听到的一种批评是，戈尔巴乔夫没有明确的前进方向。正如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在回忆录中所指责的那样，他已把政策置于情感之中，对于政策意欲实现的目标则不明确或者说不理解。就在离开莫斯科对意大利和梵蒂冈进行国事访问并准备同布什总统在马耳他举行首脑会晤的前夕，戈尔巴乔夫发表了一篇回应这种批评的长篇文章。

文章的题目是《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性的改革》，刊登在 1989 年 11 月 26 日即周日的《真理报》头三版上。文章的署名为“米·戈尔巴乔夫”，没有官衔，表明文章代表的是他个人的观点，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我读了这篇文章，戈尔巴乔夫自 1987 年十月革命周年讲话和《改革》一书发表的两年来，思想变化之大深深打动了我。文章一方面仍表示坚持“社会主义”，但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把这个词的内涵做了新的界定，其内容与其说是属于列宁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毋宁说更接近于西方的社会民主。

一开始，他承认自 1985 年执政以来他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声称：“我们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许多事物。”接着，他解释道：

起初我们以为，改革基本上只是一个纠正我们社会机体中的个人歪风、完善已经发展了的制度的问题，而今我们要说，必须从根本上重塑整个社会制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包括）改革产权关系、经济机制和政治制度，同时改变社会的精神和道德风气。（17）

接着，他既排除了保存现有的计划经济的可能性，也排除了〔290〕接受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其取代方案是主张创建一个“人道的、自由的和理性的社会”，他声称这是一个与“马列主义理论相联系”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将排除“官僚集权主义”，有利于“劳工集体自愿联合会”管理。工人将拥有其使用的生产工具，农民将成为其土地的主人。

在政治方面，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平民社会和一个法制国家。“民主和自由”被誉为“伟大的人类文明价值观”，它只需再加一项“社会主义的内容”就会成为合适的目标。考虑到强硬派会反驳说西方民主不是真正的（也即经济的）民主，他指出，虽然他的目标是创造真正的民主，但经验表明形

式上的民主也很重要。

这一公式间接但明白无误地否定了传统的共产主义论点，即“资产阶级”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戈尔巴乔夫似乎是说，民主就是民主，如果我们必定要有民主的话，就必须在西方民主的基础上重塑我们的政治体制。接着，他话锋一转又指出，社会主义的理想不得不同“经过时间考验”的代议制民主“机制”相结合，包括立法、行政和独立的司法明确分立。

他的结论是，共产党在“新的社会体制”中将起“一种特殊作用”，因为它是苏联社会的“政治先锋队”。但这也要求它停止计划经济，并进行自身内部改造。他坚持认为在“目前社会变革的复杂阶段”，维持一党制度是“有利的”，但他警告说，党本身必须发展思想上的多元化和竞争，并扩大公开性。戈尔巴乔夫虽未称赞叶利钦在过去两年里一直表达的那种思想，但却沮丧地写道，作为一个整体，社会正迈向民主，而党始终落在后面。

抚卷沉思，我多了一些勇气，少了几分气馁。我生性乐观，通常更多关注的是注入空瓶里的水，而不是还有多大空间没有灌满。我不能说戈尔巴乔夫究竟是给改革目标的瓶子注入了 20%、还是 40%、抑或 60%的水。可以肯定的是，瓶子中仍留有很大的空间。但看得出戈尔巴乔夫正在从经验中学习。由于他所遇到的困难，他〔291〕的目标正变得更趋于激进而非谨慎。

这篇论文避而不提阶级斗争，其基本的民主制度概念与西方也没有什么两样。然而，戈尔巴乔夫的经济观念却相当混乱。充斥于他 1987 年“周年”讲话中的那种教条式马克思主义公式已经荡然无存；现在他模模糊糊地选择了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营思想，并继续坚持捍卫作为一般概念的“社会主义”。他没有指出走向市场关系制度的重要性，也根本没有承认没有私有财产权就不可能有政治民主。

当然,我不能奢望即使是最有眼光的苏联领导人在 1989 年会撰文为资本主义辩护。如果戈尔巴乔夫真的这样做了，那么他苏联领导人的位置也就不会维持多久了。他对西方社会民主半推半就的心态在当时也许只能走到那一步。不过，我当时有一种感觉，他为一种重新界定的“社会主义”辩护远非一种策略；他似乎真的相信集体所有制比个人所有制优越。这些想法若不是为随后的经历所动摇，就会在未来一直在他的思想中游荡。

比较而言，他对党的评论给我的感觉是，尽管“先锋作用”不离口，但却正准备放松党对政治进程的控制。一党制不再被说成是必不可少的政治制度：它仅是特定时期的“权宜之计”。戈尔巴乔夫虽然呼吁党应是社会的先锋，但又指出社会比党变革得快。换言之，社会是先锋，党在拖后腿。如果党继续抗拒改革，阻碍国家，后果将是什么呢？

戈尔巴乔夫没有说，但我想我知道。他的下一逻辑步骤将是在党外为自己建立一种权力基础，然后再迫使党跟他走。如果失败了，他最后也能挣脱出去而不至于自动丢掉事业。

可以推测，戈尔巴乔夫的战略是既要推动政治变革，又要保住权力宝座。但我没有把握说，我理解了他在危机四伏的经济和：〔292〕民族问题上的战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他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是错误的。

苏联的大多数大中型企业控制在莫斯科的中央部委及其官僚们手中。这不仅导致了效率低下，而且浪费严重。经理和工人都对这种无形的控制不满。在俄罗斯各州和各省，这种控制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后果；在其他共和国，这种控制被视为一种凌辱，一种明目张胆的帝国主义。整个改革时期，人们谈

论较多的是把管理职权下放到企业，但这从未付诸实施。只要中央部委不革新，它就不会实现。戈尔巴乔夫有时似乎理解这一点，但他好像不愿也没有能力推动一项具体变革。

财产所有制问题对民族问题也有一定的意义。只要国家占有全部生产手段，各共和国的政治领导人就有一种强有力的动力，在切实可行之时，谋求脱离中央。宣布独立不仅使他们得到了共和国的政府机构，还使他们得到了土地和财产。即使现行体制允许相当规模的私有财产存在，或者允许当地小规模的集体所有制存在，独立带来的显而易见的好处也要远远超过它们。戈尔巴乔夫不时地攻击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恢复私有制的企图，但他似乎忽视了中央所有制对联盟造成的威胁。

因此，在我看来，戈尔巴乔夫在抵制财产私有化、并拒绝给各共和国真正的经济自主权的同时，也给自己的政策带来了诸多难题。他也许不能转过来支持直接的私有化，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为什么感到有必要对这种观念予以严厉的斥责呢。如果不能启动全国的私有化进程，他至少应该允许经济改革的决策权转到民选的各共和国领导人那里。否则，如果经济继续恶化，经济压力就会激起民族情绪，只要莫斯科一显示出力不从心的迹象，国家将顷刻分裂。

就立陶宛和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而言，我当时感到独立已是势在必行。如果尽快地给予允准，并为其他共和国提供真正的联邦体制，戈尔巴乔夫也许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和其他共和国之〔293〕间建立一条“隔离带”。官方已承认纳粹—苏联条约从来就不具有法律效力，这就为恢复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主权但同时又对其他共和国区别对待提供了基础。戈尔巴乔夫也许不能立即同意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独立和再生，但他本可以为减轻这一进程的阻力做更多的事情。然而，他在整个 1989 年的做法似乎没有给自己留有活动余地，甚至还在毁掉他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民众心目中的信誉。

在 1989 年底，我觉得戈尔巴乔夫在未来的几年里仍然能够保住权力，如果苏联本身能继续维持下去的话，也许能呆到 1994 年他任期届满之时。不过，我怀疑他能否实现他的目标。他是一个学得很快的人，我期望他的处境会变得更好。但事实上，他正像共产党一样日益落后于整个民意。除非他能在 1990 年拿出绝招，扭转乾坤，否则 1991 年将会陷入严重的困境。

致命缺陷？

得益于事后的情况分析，我可以说，1989 年是苏联犯了致命错误的一年。公众的信心随着获得言论自由而一落千丈。集中控制的经济使民族主义获得了滋生的温床。经济改革已经止步不前——或者根本就没有认真地做过尝试，摇摇欲坠的经济加剧了不满情绪。共产党的控制机制已经受到破坏。

这很严重但也许还未到极至。在我看来，戈尔巴乔夫有两种选择。他可以分裂共产党，使其失去有效控制，并努力调动各共和国和各州民选的领导人以及主张改革的知识分子去完成改革；他也可背弃改革，尽可能恢复旧制。事实上，后者正是利加乔夫鼓动的道路，只要是在改革辞藻的烟幕后进行，雷日科夫也必定会同意。这样也无需宣布政策发生了变化，因为莫斯科只要后退几小步，就能重新控制局面。

〔294〕第一种战略的问题是，如果戈尔巴乔夫采用它，就有重蹈赫鲁晓夫命运覆辙的危险。

第二种战略的问题是，从长期来看是行不通的，即使成功地重新控制局

面，但国家却会比改革前还要糟，到头来发动另一场改革只是时间问题。但到那时，就不是戈尔巴乔夫所能左右的了，他将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失败者而永载史册。

〔295〕第十二章骚动不安的冬季

现在，我们的目标更加明确和具体：建立一个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自由和公正的社会。

戈尔巴乔夫 1989 年 12 月 31 日的新年祝辞①

奴隶不是被戴上镣铐的人，而是虔诚地亲吻自己的镣铐的人。我们要解除自身的束缚和镣铐。

卡兹米拉斯·莫季耶夫在戈尔巴乔夫到达维尔纽斯当天在公众集合上的演讲②

假如（戈尔巴乔夫）打算依靠右翼的力量，他将失败；相反，如果他与进步的力量合作，全党和全国人民将全力支持他。

叶利钦 1990 年 1 月③

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

叶戈尔·利加乔夫 1990 年 2 月 2 日④

每年 12 月 31 日午夜，在新年的钟声敲响之前，最高领导人向全国人民致辞已成为苏联长期以来的一个传统。通常，这些致辞主要是对过去一年所取得成就的庆贺和对来年取得更好成绩的期盼。

但是，在 1989 年 12 月 31 日的新年致辞中，传统的祝辞已不合适。这一年中积压的问题太多，试图掩饰这些问题的存在必将激起公愤。戈尔巴乔夫明白这一点，并且换以清醒而镇定的口气对其国民致新年贺辞。他承认 1989 年是“改革最困难的一年”，也承认经济改革“处境艰难”，但是他声称 1989 年尽管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痛苦，但却为未来的和平与繁荣奠定了基础。冷战的结束使 90 年代有可能成为“文明史上最繁荣的时期”。最需要的是“理智、友好、耐心和容忍”。

〔296〕我和丽贝卡以及堪萨斯州来访的朋友在斯帕索住所的楼上书房通过电视看了戈尔巴乔夫的新年致辞。我试图给朋友作同声翻译，因此我得更加注意新年致辞。戈尔巴乔夫的新年致辞结束后，克里姆林宫敲响了午夜的钟声，我们拔掉香槟酒瓶的瓶塞以示庆贺，但我总感到祝辞中缺少一点什么似的。

当我们为新年而干杯时，我忽然意识到：戈尔巴乔夫的祝辞中没有提到列宁、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这些东西对苏联领导人来说，在这种场合的发言通常是必须提及的话题。会不会是这一切被忽略的第一年呢？

家里的客人安睡后，我查遍自己所有的录像带，找出了一年前我录制的苏联领导人的新年祝辞。重新放了一遍后，我发现自己的记忆并没有错：1988 年 12 月 31 日，戈尔巴乔夫谈到了“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构想的复兴”以及“列宁主义政党的职责”。

那天晚上，宗教取代了列宁而成为热门话题。一个电视频道专门转播围桌而坐的牧师们讨论信仰的社会和人文价值，并由俄罗斯东正教的大主教布道。过去大众媒介提及宗教只是为了攻击它，而现在与过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实际上，过去在复活节时安排最流行的娱乐节目已成惯例，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不使年轻人到教堂去，而把他们吸引在电视机前。

除夕之夜的电视节目是未来事情的预兆。一个星期后，根据公历，俄罗斯东正教在列宁格勒举行圣诞仪式，一座教堂整整三个小时的庆祝活动以及

牧师对仪式的解释全部进行了电视实况转播。一年后，那些著名的政治人物开始在节假日参加礼拜。

进入 1990 年，节日的气氛变淡并很快烟消云散。戈尔巴乔夫还没有从 1989 年的烦恼事中缓过气来。在党内，他面临着一场因立陶宛人退出苏联共产党并要求结束共产党独裁而引发的危机；日益衰退的经济；日益增长的反改革势力；东欧剧变以及德国重新统一引起的动荡不安；对外政策第一次遭到批评而不是称赞。以前主要集中在气候温暖季节的大型抗议性示威游行已成为许多加盟共和国的冬季活动，特别是在波罗的海沿岸和外高加索地区的〔297〕一些加盟共和国。阿塞拜疆地区的暴力冲突仍继续不断，并且开始蔓延到格鲁吉亚的部分地区。

戈尔巴乔夫最迫切的政治使命是出访立陶宛。中央委员会 12 月 25 日的全体会议谴责了立陶宛共产党要求独立的企图，但是在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出访这个共和国时推迟了采取最后行动。显然，他希望说服立陶宛共产党留在苏联共产党内，并希望立陶宛人在坚持分裂之前给予“真正的联邦”一个尝试的机会。

立陶宛之行必定是他艰难的政治生涯中最艰巨的任务之一。戈尔巴乔夫喜欢出访，也喜欢与友好的人们融为一体。但是这次出访所受的礼遇，尽管彬彬有礼，但实质上是怀有敌意的。三天出访期间所进行的对话大多数是聋子式的对话。

萨尤季斯在戈尔巴乔夫 1 月 11 日到达维尔纽斯这一天组织了一次群众集会。组织者还邀请戈尔巴乔夫参加，但是，戈尔巴乔夫选择了市内一家更为友好的工厂作为他露面的主要场合。同时，教堂广场上人山人海，甚至街道两边也挤满了人，他们积极参与这一要求独立的集会。苏联中央新闻媒体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戈尔巴乔夫身上，因而实际上忽视了这一大型的集会，但是我们驻列宁格勒总领事的代表当时在场，美国国外广播信息服务局通过立陶宛电台的广播把集会的演讲都翻译了过来。

卡兹米拉斯·莫季耶夫，去年夏天会见我的立陶宛人之一，于下午 2 点宣布集会开始，并宣布“不独立，毋宁死”。萨尤季斯主席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走到主席台上的麦克风前发表演讲，他说，不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大多数政治领导人都“劝告立陶宛人民不要仓促和慌忙”。这些人应该到苏联来并在苏联生活，以设身处地地感受一下他们的忠告意味着什么。在兰茨贝吉斯在台上发表演讲的同时，台下集会的人们反复地高呼着“自由、自由”。兰茨贝吉斯在演讲中指出，莫斯科假装没有听到发自立陶宛人民的清晰呼声：180 万人联名要求在立陶宛只能实行立陶宛法律的请愿书；150 万人签名要求废除“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298〕请愿书；六个月前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代表要求谈判独立问题的一封信。“我们该说的都说了，因此莫斯科不能假装成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兰茨贝吉斯为戈尔巴乔夫不能参加他们的集会而深感遗憾，但是他又说他相信戈尔巴乔夫的善意。“他是我们东面一个强大而危险的国家的领袖，同时他也是这个国家新政策的象征。我们希望与这个国家在相互尊重和互利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友好和经济互利的关系。”

并不是每个演讲者都愿意如此这般地相信戈尔巴乔夫。维尔纽斯的俄罗斯人尼古拉·梅德维捷夫说：“我非常愿意相信戈尔巴乔夫，但是我知道他的后台是谁……我记得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是如何被唾弃的，

我记得他们是如何不愿承认在布尔什维主义国家里发生的灭绝种族的大屠杀。由于他们一直在撒谎，我没法相信他们。神圣的俄罗斯仍然存在着可怕的马克思主义流毒。”⑤

戈尔巴乔夫那天下午在一个电气设备厂发表讲话，强调他在整个访问期间再三重复的一个话题，苏联是一个紧密联系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果出现分裂，整个国家将受到破坏；分裂企图会导致种族冲突和流血；立陶宛人民在一个新型的民主联邦中可以获得他们想得到的一切；苏联共产党应该保持中央集权体制，为新的联邦提供一种凝聚力；加盟共和国要求自治的主张犹如要求拆去支撑一座大桥的支柱。

显然，甚至从有关这次访问的官方文件中也可以看出大多数立陶宛人并没有接受戈尔巴乔夫的这些看法。他们认为独立不是割断经济和人员联系，经济联系和开放边界仍要保持。也不会发生流血事件，因为不存在种族冲突的基础。而且，他们不相信戈尔巴乔夫能建立一个真正的联邦，尤其是如果他不允许在共产党内建立联邦体制的话。他反对立陶宛 80%的共产党员要求自治的要求表明将来任何形式的联邦都是一种虚假的托词。

1 月 13 日，在戈尔巴乔夫离开维尔纽斯准备回到莫斯科时，他对这次失败的出访强装欢颜。他说，“我们已奠定了继续对话的良好基础”，希望已与莫斯科断绝关系的立陶宛共产党重新考虑他〔299〕们的所作所为，并能够参加下一届党代会。布拉藻斯卡斯在送别仪式上对戈尔巴乔夫的这番话作了强硬但又不失礼节的答复，他重申，立陶宛共产党退出苏联共产党已不可挽回。⑥双方的对话不会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条件进行。

戈尔巴乔夫离开维尔纽斯两天后，布拉藻斯卡斯当选为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立陶宛共产党中忠于莫斯科的一小部分人，尽管在加盟共和国享有戈尔巴乔夫给予他们的广泛权力，但实际上已失去了所有的政治影响。

让人纳闷的是，为什么戈尔巴乔夫要进行这次注定失败的出访。任何一个了解立陶宛人态度的人都知道戈尔巴乔夫的话在立陶宛民众中缺乏号召力。那么为什么他还要去那里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在为政策变动做准备。他可以出访立陶宛，在那里尽量争取好的结果，然后在返回莫斯科时他可以说，立陶宛给他的教训是将来只有实行联邦的政党体制党组织才能生存下去。但实际上，他并未这样做。在他离开立陶宛之前，他已拒绝考虑作出这个唯一可证明他此次出访有必要的让步。

他心里可能有许多马基雅维利式的策略。他有可能打算利用这次访问证明立陶宛人是如何的“不可救药”，并用这一点来作为其后镇压的借口。但是，这种可能性也不符合事实。在整个访问期间，虽然他碰到一连串带侮辱性的强硬言论和问题，但他从未发出过一次威胁。他没有像去年 8 月那样大喊大叫。而且，对立陶宛的镇压将意味着改革的终结，他显然是要推进改革，而不是要放弃改革。

那么，他为什么要访问立陶宛，并且甘冒民众反对其请求从而使他的个人权威受到损害的风险呢？我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克格勃关于立陶宛“民族主义者”只是一小撮的报告使他蒙骗上当，因此，他完全相信他可以利用当地的力量来对付“分裂主义者”；其二，他进行这次访问是为了向党内的保守势力证明他决不纵容那些分裂党的人。他当时正在准备有关改革党和政府体制的主要提案。这些提案要得到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通过会有相当的困难。如果他在民族主义势力面前过于软弱的话，事情可能会变得更

糟，他也许会落得和赫鲁晓夫同样的下场。

戈尔巴乔夫也可能是担心当地的武装力量在克格勃内和党内保守派的支持下试图制造暴力事端，并期望迫使他进行干涉——〔300〕一年后他们正是这样干的，甚至强迫他下台。因此这次立陶宛之行也可能是他为了赢得时间的一次努力。

事实上，党内保守派和军方的许多高级官员把反对波罗的海沿岸诸加盟共和国独立看作是对国家忠诚的一次决定性的考验。他们看到了东欧剧变和德国正迅速走向统一时苏联所面临的处境，决心以抵制分裂加强苏联自己的边防。实际上，所有了解苏联政治内幕的观察家都认为，没有一个苏联领导人能让立陶宛、更不用说所有的波罗的海沿岸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而继续留在台上。我相信戈尔巴乔夫当时对形势也是这样估计的，这样就可以解释他后来在这一问题上所采取的一系列策略了。

阿塞拜疆流产的革命

正当戈尔巴乔夫还在立陶宛进行毫无意义的访问并告诫人们分裂主义将导致流血斗争时，阿塞拜疆发生了骚乱和屠杀，数十人死于非命。然而，这一事件不是分裂主义的结果，而是种族仇恨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郁积的结果。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争端在 1989 年间逐渐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埃里温和巴库的民众定期地举行示威游行，但是很少出现导致人员伤亡的冲突。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不是由阿塞拜疆当局来管理，而是由苏联最高苏维埃派遣的专员——一位资深的共产党官员阿尔卡基·沃尔斯基来管理。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都不满意最高苏维埃的这一安排，但是亚美尼亚人比阿塞拜疆人更能接受这一现实。亚美尼亚人希望这是该地区划归亚美尼亚的第一步，而阿塞拜疆人认为这是对其共和国领土完整的侵犯。

1989 年 11 月，我访问了埃里温和巴库。很明显，两个城市的局势非常紧张。亚美尼亚虽然仍处在一年前的毁灭性大地震所造成的混乱之中，但公众似乎更加关注生活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亚美尼亚人的命运。要求把该地区划归亚美尼亚的呼声日益强烈，引起了掌权者们的深切关注。但这一地区领土的变动显然会引起阿塞拜疆人的强烈反应，亚美尼亚共产党新的第一书〔301〕记苏连·哈鲁丘年私下告诉我，唯一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是让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处在莫斯科的直接控制之下，但他担心不仅阿塞拜疆不能接受这一解决办法，而且戈尔巴乔夫也不会接受这一解决办法。

巴库共产党书记阿卜杜尔拉赫曼·维吉罗夫提出另一种解决办法。他认为亚美尼亚人可以永远居住在阿塞拜疆并且永远受欢迎。苏姆盖特的骚乱是地痞流氓聚众闹事引起的，这类事件不会重演。他觉得众多的亚美尼亚人惊慌失措地逃离家园是不幸的，并决定保留他们的工作和居所，希望他们能尽早返回家园。那些从亚美尼亚地区驱逐出去的阿塞拜疆人也应该被鼓励重返家园。他建议，亚美尼亚人放弃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领土要求。

他认为亚美尼亚人的领土要求激怒了阿塞拜疆的民众，结果在两个加盟共和国之间导致事实上的战争状态。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这两个加盟共和国。双方公众舆论的要求（不幸的是，双方的知识界精英在给这些要求火上浇油，他们以扭曲的和夸张的历史观煽动人们的情绪）很难有妥协的余地，事态正朝着一触即发的方向发

展。

11 月 28 日，我回到莫斯科才几天，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结束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特别管理的决议，决定把它交还给阿塞拜疆管辖。莫斯科当时这样做是为了迫使两个加盟共和国通过谈判解决相互间的争端。事实证明莫斯科这样做是一个悲剧性的失误。

亚美尼亚人立即聚集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首府斯捷潘纳克特，抗议将他们交还给阿塞拜疆管辖。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谴责莫斯科的这一决定，并于 12 月 1 日批准合并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阿塞拜疆则利用从莫斯科运往亚美尼亚的所有燃料和大多数商品都要经过其领土这一有利条件，作出了反击，对亚美尼亚进行物资封锁。

两个加盟共和国民众的骚动情绪不断发展，在阿塞拜疆尤为厉害。早在几个月前，阿塞拜疆共产党书记维吉罗夫就同意给予其合法地位的阿塞拜疆国民阵线利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争端问题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并且开始在好几个城市强迫共产党官员让权。1990 年 1 月 11 日，戈尔巴乔夫访问维尔纽斯的这一〔302〕天，示威游行者封锁了阿塞拜疆第二大城市连科兰的政府办公大楼，⑦在巴库的市中心也有大规模的群众集会。

两天后，阿塞拜疆的首府发生了自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最残酷的骚乱。暴徒们攻击亚美尼亚人居住的公寓大楼，屠杀居住在

大楼里的亚美尼亚人。妇女和儿童被暴徒们从楼上的窗户中抛下来，惨死在公寓大楼下面的人行道上。

阿塞拜疆“ 人民阵线 ”夺取了加盟共和国的领导权。阿塞拜疆共产党的领导人维吉罗夫逃亡到莫斯科，“ 人民阵线 ”控制了首府的所有要害部门。1 月 15 日，莫斯科派遣军队进入该地区，但是直到 1 月 19 日军队才大规模进入巴库。戈尔巴乔夫第二天晚上发表电视讲话，呼吁保持冷静与和平，并指责两个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和政府官员未能团结合作。维吉罗夫被解除阿塞拜疆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职务，这说明他对这次骚乱负有责任。

1 月 21 日，苏联军队完全控制了巴库，但是这座城市并不平静。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如果苏联军队继续占领该城市，那么阿塞拜疆将就退出苏联一事举行全民公决。

在莫斯科，我们听到这些令人震惊消息时都深感恐慌。莫斯科中央电视台对该事件做了许多可信的报道，尽管播音员只描述了所发生的暴力行为而没有把它们在电视屏幕上曝光。1 月 21 日，我看完了电视新闻后，匆匆记下以下一段文字：

昨天采取了军事行动后，巴库基本上恢复了平静，但是全体居民的情绪仍很激昂。一名将军在接受采访时说，局势“ 紧张到了极限 ”。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不到 100 人，但是人人都觉得远不止如此。整个事件在今晚的“ 七天 ”——星期天晚间的“ 一周评论 ”——这一新闻栏目中有详细的报道。英国广播公司的消息说纳戈尔诺地区已宣告从苏联分裂出去。

我注意到苏联的媒体没有说那里的局势是平静的。阿塞拜疆“ 人民阵线 ”宣布明天进行总罢工，并举行纪念大会。显然，宵禁没有得到普遍的遵守。

由此看来，苏联领导层似乎已别无选择，只有动用军队，并下令遇到抵抗时可以开火。但是，如果这次行动不迅速，或〔303〕者这次行动拖延太久，或者死亡人数过多，都将增加人们普遍的不满情绪。

还有一件事是显而易见的：共产党在该地区的统治彻底崩溃了。在某种

程度上，该地区有序还是无序都取决于“人民阵线”和苏联军方。它们二者起着同样的“领导作用”。当我看到国防部长亚佐夫发表在1月26日《消息报》上的声明后，我意识到我最初的关于武装干涉是必要的想法可能是错误的。亚佐夫宣称军方逮捕了“大约80名”“人民阵线”和其他非正式组织的成员，并对逮捕行动作了以下说明：

我们的任务不是要扣留所有这些非法分子，而是要摧毁他们在所有的企事业单位和机关设立的政权组织机构。

我并不是信口雌黄，我的意思确实是指政权。他们正准备夺权并且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他们自己宣布1月18日晚11点，也就是军队进入巴库的前一天，全城处于紧急状态。当时，苏维埃和党的机构在该市的许多地区已失去了作用。他们号召在1月20日举行一次公众示威游行，并打算届时宣告由“人民阵线”掌权执政。

因此，军事干涉的最初意图不是为了拯救百姓的生命，而是为了夺取“人民阵线”的权力。的确，从中可以推断出，既然“人民阵线”在苏联军队干涉之前就已宣告处于紧急状态，那么它可能已制止了骚乱。

几天以后，我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新任书记安德烈·吉连科请教了这些问题。当他还是克里米亚的党书记时，我就已经认识他。最近，他调到了莫斯科的共产党书记处工作。阿塞拜疆发生骚乱后，他和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一起被派到了巴库，他说他们于1月14日，即骚乱发生的第二天抵达巴库，并试图“寻求政治解决”。但是，他们发现阿塞拜疆“人民阵线”的“进步成分已经丧失”，并转化为“恐怖主义”。1月18日，“人民阵线”宣布处于紧急状态，第二天早晨，“人民阵线”占领了政府和共产党所有的办公大楼。1月19日，莫斯科发布戒严令并动用军队。

〔304〕像亚佐夫一样，吉连科指出，在苏联军队干涉以前阿塞拜疆的秩序已经恢复，军队干涉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共产党的统治。

这是大多数阿塞拜疆人和苏联穆斯林所得出的结论。“人民阵线”的支持者强调说，1月13日所发生的针对亚美尼亚人的骚乱是由那些被亚美尼亚驱逐而无家可归的阿塞拜疆人挑起的。阿塞拜疆当局试图回避给被驱逐的阿塞拜疆人永久性的重新安置，希望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能够共同安置这些返回的难民。“人民阵线”的支持者同时强调，在暴乱开始时，政府当局处于瘫痪状态，“人民阵线”实行了强有力的控制，并且稳定了局势。

我认为这种解释难以自圆其说，因为“人民阵线”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问题上始终采取强硬立场并因此为1月13日的骚乱创造了条件。但是不管怎样，回过头来看，显而易见的是苏联军队对巴库的占领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人员的伤亡，而且做出这一决定时，政治因素的考虑多于人道主义因素。

由军方取代“人民阵线”的决定引起了该加盟共和国国民的不满，并且只能增强将来要求分裂的呼声。它也在俄罗斯公众舆论中产生了一些严重的负面影响。俄罗斯的好几个城市举行了示威游行，抗议将苏联军队部署在巴库（不是因为对阿塞拜疆“人民阵线”的同情，而是因为那些军人的家属不希望自己的亲人冒生命危险）。俄罗斯人也开始认识到，他们也可能成为种族冲突的目标。迄今为止，大屠杀只是发生在诸如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等少数民族身上。但是，在苏联军队占领巴库后，为确保他们住在阿塞拜疆的家属的安全，不得不让他们撤离。

军事干涉作为将来恢复加盟共和国秩序的方式，开始显示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俄罗斯公众越来越不愿意为维持苏联帝国的生存而付出代价。

帝国主义者的讲坛

不管怎样，苏联帝国还有一批卫道士，当他们看到苏联在东欧的地位崩溃、非俄罗斯民族要求独立以及中央集权削弱时，他们开始联合起来，最初是对这些变化表示关注，然后又感到恐惧。〔305〕1990 年 1 月初，一位叫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的年轻作者在《俄罗斯文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份保守的文学周刊成了那些准备不惜任何代价维护苏联帝国的人们的讲坛。⑧普罗汉诺夫攻击戈尔巴乔夫的领导削弱了苏联统一的基础，即社会主义信念，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他预言如果苏联照目前的形势发展下去，紧随着外来入侵的就是混乱和内战。

虽然普罗汉诺夫的这篇文章是在一份发行量不大的刊物上发表的，但它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因为它为有沙文主义倾向的俄罗斯人的政治联盟进行了辩护，这些人大多数在感情上都依恋着沙皇的统治制度，因而本质上是反对布尔什维克以及共产党的政治机器、军队和警察机关的。但统一这一话题与帝国密不可分，只有共产党能够把帝国团结在一起，那么帝国主义者也将支持共产党。这是俄罗斯爱国集团所遵循的信条，该集团到 1989 年年底时已有 12 个俄罗斯“ 爱国运动 ”组织，并力图在即将进行的加盟共和国选举中支持它们心目中的候选人。⑨

我读了普罗汉诺夫的文章和俄罗斯爱国集团的宣言，感到十分担忧。他们进一步坚定了我多年来的信念，即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都是性质相同的政治运动，都是基于以武力的独裁集团统治。传统上，西方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的学者，总是受到下述观点的迷惑：法西斯主义是“ 极右 ”运动，而共产主义是“ 极左 ”运动，因而它们是对立的。本世纪 30 年代，许多西方学者没有谴责斯大林的大清洗，因为他们担心这样做会对希特勒有利，因此即使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了苏德协定，也没有动摇许多人心目中的这种信念。1956 年苏联入侵匈牙利时，法国学者当中持这一观点的人仍占主流，到 1968 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有些人还持这种观点。与此同时，“ 保守派 ”学者却经常为右翼的专制政权辩护，因为他们觉得右翼专制政权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实际上，独裁者通常觉得接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要比建立民主制度更容易一些。所谓“ 左—右 ”二分法完全弄混了现实〔〕问题，掩盖了妄自尊大的不受任何约束的专制权力。

值得警惕的是，这些自诩为俄罗斯“ 爱国者 ”的帝国主义分子往往拥护沙皇俄国最令人厌恶的那些东西。他们大多数是排外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者，尽管只有极端主义者才如此公开宣称。所有这些人都认为俄罗斯负有统治从“ 君士坦丁堡 ”到太平洋、从波罗的海到印度这一广大的区域的使命，并且应在所有的边缘地带实现霸权。他们认为，俄罗斯帝国是俄罗斯民族的标志。维护帝国的完整应该高于个人利益，高于俄罗斯民族以外其他民族的利益。尽管他们痛恨俄罗斯东正教会受到布尔什维主义无神论斗士的打击，传统乡村生活遭到斯大林农业集体化的破坏以及环境因无知的工业化而受到蹂躏，但他们愿意与这些维持俄罗斯帝国完整却糟踏过这个国家的凶手合作。

最初，普罗汉诺夫和其他一些著名的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代言人在他们的公开言论中避免指名道姓批评戈尔巴乔夫，尽管他们的攻击是直接冲着戈尔

巴乔夫的政策而来的。1989—1990 年冬春之交，他们还希望能影响戈尔巴乔夫，尤其希望能阻止戈尔巴乔夫向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民族主义作出妥协。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共产党、克格勃以及苏联军队中的保守力量的利益是一致的。

党内改革派的组建

改革派把他们的计划付诸有组织的行动比“ 帝国缔造者们 ” 更为迅速。来自 78 个城市的 400—500 名共产党员于 1 月 20—21 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周末会议，会上建立了“ 苏联共产党民主讲坛 ”。会议的组织者包括人民代表大会的“ 地区间集团 ” 领导人以及矿区罢工委员会的代表。

会议要求建立多党制；把共产党转换成一个普通的政党；反对“ 民主集中制 ”；通过秘密投票从基层选举共产党官员。一些组织者，如鲍里斯 · 叶利钦，认为新建立的“ 民主讲坛 ” 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共产党内部的改革上。而另外一些组织者，如经济学〔307〕家加夫里尔 ·波波夫和历史学家尤里 ·阿法纳西耶夫，认为如果即将进行的共产党选举不能以民主的方式进行的话，应促使共产党内部发生分化。亚历山大 · 雅科夫列夫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他被公认是一位无声的支持者，他的得意门生、在中央党校部门任职的维亚切斯拉夫 · 索斯塔科夫斯基是这次会议的领导者之一，实际上还起草了改革计划的许多文件。

回过头来看，对共产党实行“ 民主化 ” 显然是毫无希望的空想。事实上，大部分“ 讲坛 ” 领导人对其改革计划的成功前景并不乐观。尽管如此，但他们感到在即将召开的党代会上显示一下改革者的力量十分必要，戈尔巴乔夫只有在确信自己能够赢得大选时才会果断地对党内保守派采取措施。因此，改革派认为对戈尔巴乔夫继续进行国内改革给予充分的支持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其次，他们清楚普通的共产党员憎恨专职的共产党干部享有的权威和特权。始于基层的民主选举的确能把只是因为讨好巴结其上司而成为共产党官员的那些人赶下台。大量裁减共产党的官僚机构也会削弱共产党官员控制或主导选举机构的能力。最后，还有共产党的大量财产问题，尤其是它对许多传媒的所有权。如果改革派完全脱离共产党，这笔财产会落入保守派之手。无论如何，显示一下改革派的力量可能在将来的派系分裂中得到共产党财产的一份。

然而，改革派组织起来的根本意图在于争取或强迫戈尔巴乔夫给予保护。尽管要求戈尔巴乔夫公开承认他们的合法性还为时过早，但他的改革计划如果不采取“ 民主讲坛 ” 所开列的措施的话，就不会取得成功。

妥协与折中

整个 1 月份，戈尔巴乔夫的顾问们都在忙着起草将于月底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主要政策文件。但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使得全体会议推迟一周，到 2 月 5 日才召开。〔308〕戈尔巴乔夫班子中改革派的态度与“ 民主讲坛 ” 的那些人的态度一致，敦促他与保守派决裂。其中的一份文件被法国记者贝纳德 · 格特带到法国，稍作删改后发表在 1 月 31 日的《世界报》上。⑩该文件指出，共产党内部的保守派现在是改革的主要障碍，他们开始与社会上最反动的沙文主义分子勾结起来。因此，戈尔巴乔夫不能够继续在党内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寻求折中来领导这个国家。如果改革想要取得成功，戈尔巴乔夫必须与激进的知识分子结成联盟，与党内保守派决裂。这正是叶利钦近三年来采取的步骤。

虽然这一文件没有在苏联的新闻媒体上发表，但对党内保守派而言，戈尔巴乔夫正在考虑与他们决裂已不是秘密。当共产党内部的争论愈演愈烈时，好几个政治观察家告诉我，党内的保守派，包括利加乔夫，都确信戈尔巴乔夫已经偏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已蜕变成了一个西欧式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党内的保守派人士看来，戈尔巴乔夫反对阶级斗争就已经抛弃了共产主义政权所依赖的主要意识形态信条。从东欧的退出证明他背叛了用自己的生命去打败纳粹德国的那些人，削弱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使他的整个国家正面临着陷入混乱的危险。显然，他甚至不愿意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因为他反对使用武力镇压波罗的海沿岸诸加盟共和国以及别处的分裂活动。

在 2 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之前，利加乔夫接受了一位意大利记者的采访，他对意大利记者说，他担心苏联正在失去其最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以及对未来的信心。整个国家正变得难以控制，事事都会引起争论和分歧。“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他 借用了戈尔巴乔夫在 80 年代早期讲的一句话。但戈尔巴乔夫是在谈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萧条”时讲这句话的，而利加乔夫却是针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而讲这句话的。利加乔夫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重新恢复共产党对全国的统治，换句话说，就是逆转戈尔巴乔夫自 1987 年 1 月以来所推行的政治改革进程。（11）〔309〕对谙熟苏联政治的观察家而言，利加乔夫的观点并不令人惊讶。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他的这些观点是在公众场合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表露的。毕竟，他在 1988—1989 年间攻击叶利钦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指责叶利钦利用外国的传媒评论苏联的局势。共产党内部斗争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地在国内外的传媒中曝光。我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发展，是走向政治开放和政治成熟的一步。这种状况确实与传统的苏联领导人政治斗争的秘密性形成鲜明的对照。

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依靠公众辩论来为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做准备。实际上，他非常谨慎，没有透露他的计划。相反，他玩弄诡计和手腕，以确保控制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尽管许多中央委员会委员表露出对他的政策不满。另外，他事先还采取了好几个步骤以防止叛乱的发生。

首先，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之前更换了好几个加盟共和国党的书记。这就提醒了中央委员会委员：引起戈尔巴乔夫的不快会带来痛苦的后果。

其次，他于 2 月 2 日接见了一群好斗的矿工，允许他们发表强烈批评党组织的言论，他自己就此发表的评论文章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的那天早上刊登在《真理报》上。

第三，他对 2 月 4 日星期天莫斯科支持改革的大型示威游行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进行干涉，这刚好发生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召开的前一天。在外地代表下榻的莫斯科宾馆周围的广场上，聚集了至少 20 多万示威游行者，要求更加迅速地进行改革。

当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时，我感到戈尔巴乔夫已老练地布置好了舞台。有关他的反对派的政治流言四处传播，他还在反对派的道路上设置了一些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除上面已经提及的三个步骤外，他还在开幕式上宣布全体会议所有过程全部出版发行。我在日记中作了以下的评论：

那么，那些气势汹汹地来到莫斯科、迫不及待地要抨击当前政策的各加盟共和国的党书记能干些什么呢？几个加盟共和国党的书记的更换“提高了戈尔巴乔夫的权威……”星期天骚动人群。〔310〕的场面是布加勒斯特市的翻版。戈尔巴乔夫对矿工们的讲话是对中层党组织开战的宣言，接着他（突

然地？）意识到在这里所讲的每一句话都将在明天见报。对改革发了一通牢骚以后，矿工们各自回家注意事态的发展。或者也许是……一种更谨慎的策略吗？

至于戈尔巴乔夫的整个战略，我相信也正变得更加明显。昨天发表演讲时，他提到了研究总统制好处的必要性，反映出他确实打算为自己准备一个有充分权力和权威的职位，从而在今年晚些时候让出他的党中央总书记的职位。无论怎样，如果共产党正迅速走向衰退，为什么他还想控制这个党直至它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呢？

垮台的谣言

自 1988 年党代会对戈尔巴乔夫政策的反对公开化以来,莫斯科的流言家们定期地放出一些戈尔巴乔夫政治地位岌岌可危的流

言。我认为这些周期性出现的流言是共产党内部明争暗斗的歪曲反映，一般情况下不予理睬，因为我相信戈尔巴乔夫有能力控制共产党组织机构的运转。然而，当美国有线电视网驻莫斯科记者于 1990 年 1 月 30 日报道了这种流言后，引起了纽约交易所股票价格的急剧下跌，并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我是参加了美国出版商马尔科姆·福布斯举办的庆祝晚宴后回到斯帕索住所时才知道有线电视网的报道的。那是非常尽兴的一天，让我想起了伍蒂·爱伦所说的生活中的 90%只是炫耀的那种感觉。作为一个大使，在适当的时候出头露面是工作的一个主要方面。有时这种礼节性的场合令人厌倦，它被一连串生硬无趣的演讲搞得拖拖拉拉，但大多数情况下是令人愉快的。

那天，有许多令人高兴的事：在克里姆林宫的钟楼上举办一个很有特色的海外镶珠法贝尔彩蛋展览。这是多年来第一次允许外国人在克里姆林宫主办展览，展览开幕后我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发表评论说，这是我们两国之间正在增强新信任的象征。

〔311〕接下来是为马尔科姆·福布斯和圣地亚哥的市长莫里恩·奥康纳（他帮助组织了这次展览）举行的欢迎会和午宴。苏联新任文化部长、演员兼戏剧导演尼古拉·古本科做东款待，使我有机会和他谈妥让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及其指挥的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来莫斯科演出一事。

罗斯特罗波维奇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大提琴演奏家和最伟大的指挥之一。他在本世纪 70 年代被迫离开苏联，当时他与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交情很深。当他离开苏联时，他和他的妻子、歌唱家加丽娜·维什涅夫斯卡娅被剥夺了苏联公民权，还剥夺了他们所有的荣誉。他后来成为美国国家交响乐团的音乐指挥，并把该乐团培养成世界上最优秀的乐团之一。自他被驱逐出境以来，现在是第一次打算让他重返莫斯科。我对罗斯特罗波维奇重返莫斯科这件事有浓厚的兴趣，这不仅是因为来访的是美国的乐团，而且还因为即将来访的罗斯特罗波维奇是我本人的座上客。当我还在白宫任职时，他曾跟我说过，只有当我做驻苏大使并允许带他的乐团的情况下，他才会重返莫斯科，因为我“会保护他”。现在这两方面的条件都成熟了，他重返莫斯科也水到渠成。

我向古本科谈到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公民权问题。虽然没有把恢复公民权作为他重返莫斯科的条件，但显而易见的是现政府对勃列日涅夫时期所做的惩罚做一些小小的改动非常重要。

古本科得意地告诉我，他已经说服戈尔巴乔夫同意恢复罗斯特罗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的公民权，并恢复他们的所有名誉。

午宴以后，我们匆匆忙忙地参加了苏联第一家麦当劳快餐店的开业仪式。看到店里俄罗斯工作人员面带微笑，动作麻利，让人感到很高兴。苏联餐馆的服务一般都是慢腾腾的，男女服务员认为顾客令人讨厌，因为顾客的来到打搅了他们的闲暇。美国人经营管理的麦当劳快餐店培养服务人员把顾客当作受欢迎的宾客看待，这方面的成功使我真正确信：俄罗斯人给予适当的刺激和培训，也能像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干得出色。如“巨无霸”面包，除了番茄酱外完全用当地的原料制作，其口味就像在美国制作的一样。

后来，我和丽贝卡回到斯帕索住所为主办克里姆林宫展览的美国同胞举行一个欢迎会。福布斯一家被允许乘坐其名为“资本主义工具”的家庭喷气式飞机来莫斯科，还允许马尔科姆·福布〔312〕斯把他的热气球停放在莫斯科市中心附近。（12）而在一年前，苏联官员一想到允许这种“资本主义宣传”进入莫斯科市中心，就会吓得脸色惨白。

欢迎会后，我们直接去重新装修一新的萨沃伊宾馆参加庆祝宴会，这次宴会由马尔科姆·福布斯做东款待。我的座席紧靠着奥康纳市长，他向我谈了许多有关圣地亚哥在一年前举办美苏艺术节的情况。当时最大的问题出在格鲁吉亚代表身上。

4 月份游行示威者遭屠杀以后，格鲁吉亚人拒绝参加苏联的任何节日，尽管他们早先签订了参加协议。我参与了调解，让格鲁吉亚外交部长说服格鲁吉亚人派一支舞蹈队参加艺术节，他们最后答应了这一要求，但是他们仍然拒绝按照早先的承诺参加博物馆展览。在圣地亚哥，格鲁吉亚舞蹈队拒绝上台表演节目，直到所有的苏联国旗从演出大厅拿走。奥康纳市长认为，圣地亚哥市难以让格鲁吉亚人履行协议表明，第比利斯大屠杀后反苏情绪极其强烈，同时一些苏联机构开始脱离莫斯科而单独行动。

无论如何，我是怀着愉快的心情回到家里。这一天充满了真正的和鼓舞人心的变化迹象。这个国家正在走向开放；正扩大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正与流亡国外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持不同政见者重新讲和。自由企业得到了生存的机会。格鲁吉亚人对所受暴行的反应增强了要求在将来形成一种机制以反对滥用权力的压力。

我们回到斯帕索住所的大门口时大约是 10 点 30 分，这时电话铃响了。我拿起听话筒，听出对方是詹姆斯·多比斯，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他在电话里讲，有线电视网报道说戈尔巴乔夫将辞去总书记的职务，请我们弄清楚这一报道的准确性。我告诉他我没有听到这样的消息（当时我们在莫斯科还收不到有线电视网的节目），也不相信戈尔巴乔夫有辞职的打算，但我会就此进行调查。

当时华盛顿还是下午的早些时候，显然我们不能等到第二天早晨再提供详细的材料。我打电话给我的副手迈克·乔伊斯，请他让我们的使馆工作人员找一找有关有线电视网报道的情况，因为我可能很快要向总统或国务卿回话。五分钟内，我们的政治顾〔313〕问打电话告诉我，有线电视网驻莫斯科记者站的报道说，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别墅与其最亲密的朋友开会考虑他是否应该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作为共产党全面重新改组的一部分。他们不清楚他是否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决定。

当电话铃再次响起的时候，我几乎没来得及宽慰地舒口气（我们大使馆在消息方面毕竟不会很迟钝，我们也知道他们正在开会）。这次是国务卿贝克打来的，我在电话里高兴地告诉他，有关戈尔巴乔夫辞职的报道显然有点

为时过早。但是，我指出，如果戈尔巴乔夫在将来某个时候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不足为奇。但是，我认为只要戈尔巴乔夫在不断变化的时局下还可以有效地领导这个国家，那么他是不会辞职的。我确信他不会自愿地放弃国家的领导权，同时他的对手在当时也无力把他赶下台。

一个星期后，戈尔巴乔夫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纽约时报》记者比尔·凯勒注意到戈尔巴乔夫耍弄了同样的政治花招：

现在戈尔巴乔夫先生，政治家中的胡迪尼，再次稳坐钓鱼台，准备他的下一任执政。他闯过了立陶宛和阿塞拜疆这两个可怕的麻烦，又一次混淆了受骗的旁观者的视听，这些旁观者相信，每次主人都会被套上枷锁，丢到河中，他们正冷眼观察他最后的花招。（13）

共产党独裁的终结

1989 年 12 月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甚至拒绝讨论改革派要求修订宪法第六条的建议，该条款为共产党实行一党专政提供了法律基础。发生争论的那天，戈尔巴乔夫因这个问题攻击安德烈·萨哈罗夫，并拒绝给他发言权。我当时在想，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如此坚决地反对这个建议？当我同亲近戈尔巴乔夫的人，诸如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讨论这个问题时，我所得到的答复是“时机不对”，或者是“实际上，我们已经实行了多党制，只要看一看波罗的海沿岸诸国的情况就知道了”。

〔314〕后来我才得知，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以及谢瓦尔德纳泽在 1989 年时曾就结束共产党合法的独裁专政问题，试图得到政治局的支持，但没有成功。戈尔巴乔夫在 12 月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对萨哈罗夫以及其他改革派的粗暴态度可能是因为他不得不为一个他反对的东西而辩护的缘故。他可能知道要求结束共产党独裁专政的那些人是对的，但是他对这些人在公开场合向他提出这一建议不满意，他受共产党纪律的约束而必须反对这种建议。

那场激烈的争论过后还不到一个月，就有迹象表明戈尔巴乔夫的立场可能已有所变化。在他访问立陶宛期间，当有人提及宪法第六条时，他暗示不会再维护宪法第六条。“我认为多党体制并不是坏事……只要它作为正常的历史过程出现并且满足社会的需要”。（14）莫斯科的政治观察家们把戈尔巴乔夫的这一声明解释为一种试探性的气球，赞成结束共产党独裁专政的情绪显然正在酝酿中。

2 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的前几天，我打电话给苏联政府报纸《消息报》的编辑伊万·拉普季夫。拉普季夫的观点与戈尔巴乔夫非常接近。但是，他能比政府官员更加坦率地讨论这些问题。每个问题都能从他那里得到详尽而迅速的答复，他的讲话速度快并且常有省略，这要求我必须高度集中注意力以免遗漏任何一个重要的字。以前，我曾听人说他讲的东西很有价值；他的观点和预测往往异常准确。

当我问及有关宪法第六条的问题时，他说在召开下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时将删除这一条款。他坚决主张建立法治；同时认为除非剥夺共产党凌驾于普通政府部门之上的权力，否则法治就不可能实现。正如他所指出的，习惯于控制其他三个政府部门的“第四个政府部门”必须转变为“一个普通的政党”。

拉普季夫还说他赞成实行总统制，这样戈尔巴乔夫在共产党中更有自主性，共产党对整个国家的行政控制也将被打破。赞成实行总统制还有其他一些人，诸如费德罗·布尔拉茨基，他是赫鲁晓夫的演讲稿撰写人，现是《文

学报》编辑，这是一份在知识分子中有广泛影响的周报。但是，戈尔巴乔夫直到 1989 年秋还反〔315〕对这种主张，指出总统制会把太多的权力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直到 2 月 5 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时才最后摊牌。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正式理由是确定下一届党代会召开的日期和通过一项提交党代会讨论的计划草案。只有党代会有权改变共产党的体制，戈尔巴乔夫迫不及待地要在下届党代会之前贯彻他心目中的改革。1988 年，党的全体会议提出一些激进的解决办法并引起了一些人事变动，但是没有改变共产党的组织和使命。党章规定每五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但没有说不能多开几次全体会议。然而，党内“保守派”清楚他们在下一届党代会上可能失败，因此，他们反对在规定召开党代会的时间之前，也就是在 1991 年的 2 月或 3 月之前召开另一次代表大会。

1989 年 12 月，戈尔巴乔夫不顾反对派的反对，促使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将党代会提前六个月召开。现在是决定党代会研究什么问题的时候了。主要问题有：共产党是否应该放弃它一党专政（宪法第六条）；它的“统治机关”是否应该重新组织和调整；联邦体制是否可行；总统制是否应该在国家的体制中采用。经济改革的基本问题是私有财产问题：能否允许个人拥有土地以及诸如商店和工厂这些生产性资产？

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致开幕词时强调了共产党本身进行“革命性变革”的必要性，并正式提出放弃共产党一党专政。正如他所指出的：“在一个正在更新的社会中，共产党只有作为一种民主的组织力量才可以存在并履行它的先锋模范作用。这意味着它的地位不应该由宪法条款来确立。”（15）他没有强调党内人士提出的建立总统制的建议，但是这一点在打印好并分发给代表们的有关共产党改革的方案中有详细的说明。戈尔巴乔夫又一次没有经过公众的广泛讨论而突然提出了一个主要提案，不〔316〕给反对派以有组织反抗的时间，希望能够强行通过。

这一策略成功了。经过三天激烈的争论后，中央委员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提案。这些提案完全是革命性的。如果这些提案能够得到落实的话，这些重大的改革步骤会创造一个完全独立于共产党的最高权威，共产党自身只有赢得选举才能继续掌权。

我很清楚戈尔巴乔夫为什么提出这些提案。尽管他没有在公众场合如此讲过，但是正如叶利钦所指出的，共产党机关已成为改革的主要障碍。戈尔巴乔夫被迫抑制他的改革进程以免遭到没有同情心的中央委员会的驱逐。真正的选举的开始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创设，给他提供了一些赫鲁晓夫不可能得到的保护。但是，这种保护仍不够。如果由中央委员会选择的话，它会撤消戈尔巴乔夫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从而迫使他辞去国家元首的职务，因为他是共产党在人代会的代表。而总统有规定的任职期限，这样他就不会受到这种阴谋诡计的陷害。总统制的创设也为戈尔巴乔夫削弱共产党提供了一种动力，尽管他仍是共产党的总书记。

那么，戈尔巴乔夫是如何说服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使其通过了这一将导致他们自己走向毁灭的提案呢？

首先，正如我上面所提到的，戈尔巴乔夫给反对者心理上设置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永远支持总书记的传统还有影响力，尤其在党内“保守派”中有影响力，他们清楚，如果他们处于这场争论中不利的一边，有可能会终

结他们的政治生命。对当前形势的笼统批评是可以的，但不应该公然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具体提案。

其次，公众舆论，尤其是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地莫斯科的舆论强烈地转向支持激进改革。2 月 4 日，大型的示威游行就是最好的证明。“布加勒斯特 12 月的回忆”在身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的高级干部的脑海中还记忆犹新。

第三，戈尔巴乔夫谨慎地与党内“保守派”妥协，并在他们反应最强烈的一些问题上做了答复：他继续坚持反对各加盟共和国的“分裂主义”的强硬路线，继续支持中央集权制的共产党体制。他不支持党内的宗派斗争合法化。他继续为“社会主义”辩护——虽然要求重新予以界定——反对土地私有化。

这些妥协最终削弱了改革的力度，但在 1990 年 1 月时，戈尔〔317〕巴乔夫不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认为总统职位的设立和在宪法中增加承认多党政治体制的条款是先于其他方面的改革的。在他摆脱党内上层人物把他赶下台的危险之前，他不能在所有的方面推进。

实际上，2 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争论是激烈而广泛的。一个接一个的发言者指出国家的危机和共产党的危机。大多数发言者的讲话有一种潜在倾向：国家需要更强硬的领导来恢复纪律，尽管这些言词是针对戈尔巴乔夫的，但同时也使得反对他设立总统职位的提案更为困难。戈尔巴乔夫含蓄地说：“好吧，你们想要一个更强硬的领导，这正是一个机会。”

利加乔夫无疑说出了许多与会者想说的话。他指责政治局和政府在推行改革过程中犯了“严重的失职和错误”。他反对把共产党变成一个“乱七八糟的组织，一个政治俱乐部”，并抨击了私有财产合法化的企图。他还用警告的口吻谈到德国正走向统一，并把“二战后边界的修订”比作 1938 年在慕尼黑对希特勒的绥靖。戈尔巴乔夫在德国统一的条件问题上还没有与西德总理科尔达成协议，利加乔夫在公众场合提醒他注意：在这一问题上妥协将在国内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16）但利加乔夫并不反对对宪法第六条的修订，也不反对设立总统职位，显然政治局事先在这些方面已达成一致。

另一方面，叶利钦却不受政治局纪律的约束，利用这一机会提出了改革共产党的 10 点计划——基本上是“民主讲坛”观点的概括。他要求删除宪法中“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际上已成为没有民主的集中）；对所有共产党官员的选举实行无记名投票；取消专职的共产党官员；废除任命制；有组织不同派别的自由；由基层控制党组织经费；在共产党内部采用自愿的联邦体制。（17）

他的大多数建议未被采纳，于是他单独投票反对改革草案。立陶宛是另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12 月 25 日中央委员会全〔318〕体会议推迟对脱离关系的立陶宛共产党做出决定，以等待戈尔巴乔夫 1 月访问这个加盟共和国，现在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了，这次又是 12 月全体会议的重演。双方都坚持他们以前的观点，戈尔巴乔夫继续坚持中央集权的共产党体制，而分裂主义领导人布拉藻斯卡斯,拒绝改变去年 12 月在维尔纽斯党代会上投票脱离苏联共产党的决定。

在这一问题上双方唇枪舌剑，但全体会议通过的决议却显得比较温和。它在谴责大多数立陶宛共产党员脱离共产党的同时，表扬了一小部分仍然忠于莫斯科的立陶宛共产党员。因此，会议决定把共产党在立陶宛的财产置于

这一小部分人的控制之下，同时，中央委员会请求立陶宛共产党重新回到苏联共产党的怀抱，并派代表参加即将在莫斯科举行的党代会。

“ 民主主义者 ” 叛变

我无法估计反对共产党内部改革的力量，但是我听说他们的力量是强大的。因此，我惊叹戈尔巴乔夫的高明之处，他能够保证正式通过改革措施，而这些措施将使他摆脱党内保守派的强大压力。如果他最终的打算与我想象的一样，我是不愿意在事后对他的手法加以评说的。然而，国内的改革派并没有如此厚道和仁爱。他们对戈尔巴乔夫在党内民主问题上所作的妥协感到惊诧，认为在即将召开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选举代表时，党内的保守派将占上风。尽管他们原则上愿意支持总统制，但他们对戈尔巴乔夫未经充分讨论便企图强行通过它持保留态度。

刚好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后，200 名主张改革的 “ 莫斯科共产党俱乐部 ” 成员（基本上是莫斯科地区的 “ 民主讲坛 ” 的成员）在一起聚会，并发表声明说，中央委员会通过的政纲草案 “ 混乱、自相矛盾、完全不符合现实的需要和要求 ”。声明中还说，〔319〕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提到了但没有解决多党制的问题，批评会议没有废除民主集中制原则，认为实行总统制‘ 在目前情况下具有反民主的特征 ”。

后面的责难显然是针对戈尔巴乔夫个人的，这类言论足以引起戈尔巴乔夫的敌意，同时这些批评也不是没有道理。毕竟，戈尔巴乔夫作为改革前共产党的总书记，拥有不受任何宪法和法律规定所约束的权力。他现在提出解除共产党对整个国家的压制，并创设一个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权力有限的职位，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没有这种变革，所有的改革努力都将失败。这些改革的 “ 理论家们 ”（如他所称）所进行的繁琐的细节争论，使党内保守派有时间组织起来阻挡任何真正的改革。

敌视改革的那些人比改革派更能看透戈尔巴乔夫的心理。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利用戈尔巴乔夫对个人批评的敏感性，强调了群众集会上 “ 民主人士 ” 发表的批评言论，或把非批评性言论歪曲成攻击政府的言论。（18）例如，2 月 4 日大型的群众性示威游行支持戈尔巴乔夫促成中央委员会通过修改宪法第六条和设立总统职位，但是克留奇科夫认为这是一次反政府的举动，因为他所收到的克格勃报告中强调了少数几个示威游行者发表的批评言论，并把尤里 · 阿法纳西耶夫的 “ 1990 年和平的 2 月革命万岁 ” 的口号错误地解释成是反戈尔巴乔夫的口号。实际上，这次示威游行主要是支持和拥护戈尔巴乔夫的，但是克留奇科夫歪曲的报告导致了完全不同的效果。

当同一批组织者要求 2 月 5 日星期天在莫斯科再举行一次甚至规模更大的示威游行时，戈尔巴乔夫感到惊恐万状。这也许是由于日期的问题：2 月 25 日（旧历）是 1917 年沙皇被推翻的日子，俄罗斯人喜欢历史性的纪念日；也许是由于上一次示威游行的假情报；也许是由于克留奇科夫孜孜不倦地散布的谣言，他谎称示威游行者计划冲击克里姆林宫。很可能是所有的这一切，再加上戈尔巴乔夫实行总统制的计划受到质疑所引起的愤怒。

不管是什么原因，戈尔巴乔夫没有支持这次示威游行，也没有将其作为人民支持改革的证据，相反，他试图阻挠示威游行。谣言家们散布着计划发动暴乱的谣言，并警告人们不要卷进去。最〔320〕高苏维埃通过一个声明强调，只允许在被认可的地点进行被批准的示威游行。总理雷日科夫发表电视讲话，要求老百姓呆在家里不要离开。最后，允许示威游行者在高尔基公园

举行集会，并沿着莫斯科宽阔的花园环形道到外交部前面的广场一线进行游行，但是，军队被调入莫斯科城以加强警戒，防止示威游行者进入市中心冲向克里姆林宫。

一般情况下，我都远离政治示威游行，因为对一个外交官来说，公开支持某个政治派别是不合适的，并且我是众所周知的人物，那样做不可能不被人发觉。但是，这次事先安排好的示威游行刚好要从离我们住所仅几个街区的地方经过，我和丽贝卡步行过去，站在街道边上观看示威游行，只想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我们觉得官方的恐慌和预防措施完全没有必要。一切都很平和，气氛更像是节日庆典。10 万名左右的示威游行者聚集在高尔基公园，然后平和宁静地沿着花园环形道向斯摩棱斯克广场移动，在斯摩棱斯克广场搭起了一个演讲台。没有人试图冲进市中心，更没有人想冲击克里姆林宫。演讲的内容也没有特别革命性的：他们的要求完全与“地区间集团”和“民主讲坛”的改革者们几个月来一直在追求的目标一样。一个巨幅标语引起了我的注意，上面写着：“72 年走投无路”，这与戈尔巴乔夫后来所暗示的并没有很大的不同。

但官方对这次有计划的示威游行的反应激怒了民主运动。戈尔巴乔夫对民主的理解如此肤浅以致他要用武力来阻挠言论和集会的自由吗？命令军队进入莫斯科以防止一场从来就不存在的对克里姆林宫的进攻至少表明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谁会喜欢一个强硬的表现出如此荒谬猜疑的总统呢？反对戈尔巴乔夫实行总统制提案的人增多了。

示威游行两天后，当政府实行总统制的提案最后提交给最高苏维埃时，“地区间集团”的许多成员批评总统制有缺陷。大多数人同意总统制最终是应该实行的，但同时认为对授予合法权力这一问题考虑得太匆忙，而且授予总统的权力过大。

〔321〕谢尔盖·斯坦凯维奇首先对该提案提出批评，他认为由于立法授权总统不与各加盟共和国协商就可作出影响各加盟共和国的决定，因此该提案带有“帝国总统职位”的特点。因此，他建议采纳该提案之前应该对提案草案进行进一步修改。（19）斯坦凯维奇对提案的发难引起了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共鸣，同时还提出了他自己的建议：戈尔巴乔夫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被暂时授予特殊权力，然后修改总统职位法，明确和限制总统权。（20）

那天晚上，我通过电视观看了整个会议的过程，我注意到当与会者一个接一个站起来指出戈尔巴乔夫提交的草案的不足之处时，他显得很不高兴。在戈尔巴乔夫提出投票表决之前，他站起来为他自己的提案辩护。他的脸色显得很疲惫，他的讲话更多的是出于防卫和感情冲动，而非出于必要。但是，他已知道他有足够的选票，他似乎已没有必要再做更多的事情，他只需要说，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以修改宪法之前，将给上述建议以充分的考虑。

在他那缺乏条理的讲话中，有许多讽刺影射和偏激的词句，我觉得更像爆发了一场情人之间的争吵而不是一场政治争论。他谴责批评家们“虚伪而蛊惑人心”并试图以拖延“葬送”他的提案。所有人的发言都暗示他正在寻求更大的权力，他因此而受到伤害。“这和戈尔巴乔夫有什么关系呢？”他不合逻辑地反问，好像没人知道谁会“当选”为总统。（21）

这种行为无法令人心悦诚服，但戈尔巴乔夫所说的与表决的结果无关。最高苏维埃以压倒优势决定在 3 月 12 日召开特别人民代表大会，并接受了将创设政府总统制的立法草案作为修订宪法的基础。

鲍里斯·叶利钦不同于他那些民主运动的许多同仁，他投票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提案。他想讨好戈尔巴乔夫吗？或者他仅仅是希望他自己最终能担任这个得到设立的职位？确实，只有他自己清楚，但当时他私下里仍说他没有非分之念，只想加入到戈尔巴乔夫的班子里。

立陶宛毁了党〔322〕

正如我的萨尤季斯朋友 7 月份所希望的那样，1989 年底以前立陶宛没有组织选举，但他们在 1990 年 2 月 25 日举行了选举，这比大多数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选举早一些。正如所预料得那样，萨尤季斯赢得了绝对多数。最后选举在 3 月 4 日和 8 日举行，立陶宛新的最高委员会（立陶宛宁愿不用西方语言中的“ 苏维埃 ”这个词）第一次全体会议计划在 3 月 10 日举行。

事态似乎正朝着立陶宛人曾向我谈论过的方向发展。新议会 2/3 以上的成员是以独立的政纲选举产生的。人们认定他们将首先通过一个正式的独立宣言，但何时宣布还不清楚。

立陶宛选举不久以后，萨尤季斯领导人要求与我们在 3 月 7 日见面，这一天他们打算来莫斯科。见我们的目的是为了给我们讲一讲选举后立陶宛的局势。我邀请他们上午 11 点来斯帕索住所。

那天，我醒来以后感到头皮发紧并有些发烧，显然是莫斯科一年中这一时期很普遍的“ 24 小时流感 ”在我身上发作了。这种流感来势凶猛但往往持续的时间不长。我在想我是否应该呆在家里休息一下以治好流感。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征求我的医生的意见，我的办公室便通知我说，谢瓦尔德纳泽有重要的事情希望能在上午 10 点钟私下见我一面。外交部离我所住的斯帕索住所只有三个很小的街区，我经常步行过去参加约会，但是这一次我穿得严严实实，并驱车前往外交部。

一般情况下，我与谢瓦尔德纳泽见面时，房间里至少有两个别的人，即我们双方各有一名记录员对我们所讨论的事情作记录。由于他经常邀请他的副手或一些专家来参加我们的讨论，所以经常有更多的人在场。然而，这一次却只有我们两人。

他热诚地向我问好，但表情非常严肃，并为在顷刻间召见我而表示歉意。他让我坐在我平常所坐的地方、靠近他手扶椅的沙发上。一个助手走了进来，给他一杯奶茶，给我一杯清咖啡后，又〔323〕出去了。我的来访相当频繁，因此助手也知道我偏爱的饮料。谢瓦尔德纳泽从文件夹中拿出一张写满字的纸条放在他前面的桌子上，我注意到纸条的字是用他的母语格鲁吉亚文而不是用俄文写的，显然这张纸条是他自己写的。

他非常严肃地看着我，并对我说他希望向我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他想要我们理解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即 3 月 10—12 日，对苏联的前途将是“ 决定性的 ”。戈尔巴乔夫计划实行总统制和建立一个主权国家联邦，但是引起了强烈的反对。虽然国家的经济问题严重，但比较容易处理，相反，民族问题解决起来相当困难。

他以前曾私下里跟我们谈到过民族问题的棘手性，因此，他认为这些问题仍比引起公众注意的经济问题更严重毫不足怪。我当然了解戈尔巴乔夫的设想，也知道存在强烈的反对。我感到奇怪的是，谢瓦尔德纳泽竟然觉得本周末事态就会向危机方面转化。我没有问为什么，他进一步向我解释。

他说国内的局势已经达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特别是苏联军方。若一步走错完全会引发一场内战，导致军事独裁专政。他接着讲，立陶宛的局势尤

其棘手。如果它的新议会在人民代表大会实行总统制提案之前就试图宣布独立的话，一场内战将不可避免。他没有准确详细地说明内战将如何开始，但他指出立陶宛有很多防御工事，并驻扎了许多军队，其言下之意是苏联军方可能在没有取得戈尔巴乔夫同意的情况下夺取立陶宛的政权——他们甚至可能将戈尔巴乔夫赶下台。

我瞥了一下手表，时间将近 10 点 30 分，与立陶宛萨尤季斯领导人的会谈时间是 11 点整。我觉得推迟这次会谈并不是很好，而且，即使想推迟也来不及了。在萨尤季斯领导人来我住所之前，我没法通知他们会谈的时间已经改变，而且不与他们见面也没法解释清楚。他们肯定会告诉新闻界，许多人因此会得出结论说，美国对波罗的海沿岸诸国的政策已经有了变化。

与立陶宛萨尤季斯领导人的会谈不得不如期举行，但我并非没有考虑谢瓦尔德纳泽的提醒，局势可能正像他所说的那样微妙。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有人会毫无证据地猜测立陶宛人和美国大使间的任何接触都意味着美国正操纵着苏联的解体。对这些人而言，这将是支持用武力镇压立陶宛和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独立运动强有力的证据。

我对谢瓦尔德纳泽说，我欣赏他的坦率，我相信我国政府理解他对局势的阐述。正如他所了解的那样，虽然我们从来不承认把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强行并入苏联，但我们不会怂恿波罗的海沿岸诸国采取轻率的行动。实际上，他通过他自己的情报渠道可以确信（我知道克格勃在我房间安装了窃听器），我一直在告诉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在它们完全独立之前别指望得到美国的承认，我还对他们进一步指出，如果苏联不允许的话，来自外部的经济援助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当我们不提供任何建议也不给予任何援助时，我们的政策相当于一个慎重的忠告。

我接着说，至于我会见萨尤季斯领导人的事，按事先计划将在几分钟后进行。我认为不应推迟。当我回去以后，他们可能已经到达了我的住所，如果我不与他们见面，这可能会成为我们两国政府间的一个重大问题。但我向谢瓦尔德纳泽保证，我不会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怂恿他们采取轻率急躁的行动。

当我向谢瓦尔德纳泽解释我不会推迟这次会谈时，他的脸拉得很长，但是他没有提出异议。他仅仅问了一下会谈能否尽可能短一些。我告诉他说，我已感到很虚弱，会谈不会进行很长的时间，因此他可以相信我不会沉溺于冗长的讨论之中。

我开车回到斯帕索住所时，立陶宛萨尤季斯的领导人也正好〔325〕到达。领队者是萨尤季斯的主席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他很可能在宣布独立后当选为立陶宛的领导人，同他一起来的还有其他几张熟悉的面孔，诸如罗姆阿尔达斯·奥佐拉斯、瓦伊多塔斯·安塔纳伊提斯、艾吉迪尤斯·比斯卡乌斯卡斯。

我向他们问候致意，并向他们说明我患了流行性感冒，因此只能与他们进行短时间的会谈，在我提前离开后欢迎他们继续与在座的大使馆其他官员会谈。按照谢瓦尔德纳泽的请求，我可能需要装病，但事实上我不用假装：脑袋正在嗡嗡作响，我感到面颊发烫，嗓子也开始发哑。

在提醒他们我很快就不得不提前离开之后，我强调我们都必须特别小心（因为克格勃的窃听装置像来访的人一样多），以免这次会谈以及别的类似的会谈被人误解。我们美国人不会对他们一些具体的决定和行动出主意，我

们本身不会给他们任何的建议。他们不是按照美国的指示办事这一点对我们两国很重要。我强调说，苏联的政治发展很快，这意味着所有的改革参与者应在采取行动时极度小心。然后，我问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

兰茨贝吉斯解释说，他们是来告诉我们立陶宛最高委员会将在本周末召开会议，很可能宣布独立。他们这次来主要带着两个问题：第一，美国对立陶宛宣布独立将做出何种反应；第二，美苏之间在民族问题上是否达成过一些共识。

我回答说，正如我在去年夏天对他们中的一些人说过的那样，宣布独立不会引起美国的自动承认。通常只有当该政府能有效控制它的领土时，美国才会承认。仅仅宣布独立并不意味着控制领土，因此他们不应该期望得到美国的承认。

至于他们所提的第二个问题，我向他们保证说，美苏在民族问题上绝对没有达成过“共识”。我解释说，我们之间有时讨论这些问题，但只有在我们相互阐明各自的政策时才这样做。我们始〔326〕终一致地向苏联当局重申，我们不承认波罗的海沿岸诸国是苏联的一部分，我们这一政策不会改变。

兰茨贝吉斯说，立陶宛绝大部分石油都是从苏联输入的，所以，如果石油供应被停止的话，立陶宛将会不堪一击。如果莫斯科对立陶宛停止石油供应，美国会援助立陶宛吗？我回答说，由于莫斯科控制了立陶宛的港口和机场，我不知道美国怎样才能提供援助。

其中一位来访的客人又一次提出承认问题：为什么美国不愿意承认一个经自由选举产生的、它一直认为法律上是独立国家的政府呢？我再次解释说，承认某一政府包括确认该政府已控制了它声称拥有的领土。另外，我补充说，美国立即承认立陶宛对立陶宛人是危险的。我们的承认不是为强硬派以武力镇压立陶宛独立提供了借口吗？仅在几个星期前，阿塞拜疆人民阵线就被苏联军队用武力赶下台。虽然阿塞拜疆的形势与立陶宛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苏联政府已经表示它有能力用武力恢复对各加盟共和国的控制，如果它决心这样做的话。如果立陶宛出现了武装干涉，为此付出代价的不是美国人。

过了一会儿，他们几个中的一人——我不记得是谁了——说他同意我的看法。实际上，美国推迟承认立陶宛是最好不过的了，因为苏联军队会认为美国承认立陶宛是一种挑衅，从而唆使他们采取行动。兰茨贝吉斯没有反驳他的看法。

在我离开之前，我问他们为什么急于在本周末作出宣布独立的决定。兰茨贝吉斯回答说，时间非常紧迫，因为他们想在戈尔巴乔夫行使总统权力之前就宣布独立。他们相信戈尔巴乔夫为了扼杀他们的独立运动正在谋求这些特别权力。

我说我不能对戈尔巴乔夫说三道四，但是我告诉他们，他们应该知道，苏联官员告诉我们的并不是这么回事。苏联官员跟我们说，戈尔巴乔夫决定不使用武力，但是在代表大会确立总统的职位之前，宣布独立会被看作是一种挑衅行为从而导致武力冲突。我强调说，我们不能为这种解释作担保，但是我们没有驳斥它的任何证据。

“我们完全不相信他。”兰茨贝吉斯回答说，“他得到总统权〔327〕力之后肯定会镇压我们。”

“你是说如果他想镇压的话，他现在无权使用武力来镇压吗？”我质问他。他默不作声，我接着说：“我认为他得到总统的职位之后，不会比现在

更容易使用武力镇压你们。”然后，我重申我的立场，我不会给予他们任何的建议，但他们应该知道我对局势的看法与他们的看法不一样。

我与立陶宛萨尤季斯领导人会谈了 15 分钟之后，感到身体状况越来越糟，我说了声“对不起”就先离开了，并请他们继续与我的同事们讨论，我回到了自己楼上的书房。在吃大夫送来的药之前，我一气呵成写完了概括上午有关事情的报告，并让人送到大使馆发回华盛顿。然后，我争取好好休息一下，因为在应付这个繁忙的周末之前，我必须康复过来。

晚上的时候，我感觉好多了，我能够去参加我们为美苏学者组织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在现代世界中的意义的讨论会。讨论会非常生动，活跃。莫斯科一份文学杂志随后发表了会议记录，但是我无法全身心投入讨论之中。谢瓦尔德纳泽关于迫在眉睫的军事政变的预测是有充分道理的，我感到坐立不安。我觉得立陶宛人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他们正在从事的这一切活动的风险，我也不理解为什么他们认为在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总统之前宣布独立是很重要的。如果戈尔巴乔夫决心要镇压他们，他是不会考虑他们宣布独立的时机的。

我并不同意戈尔巴乔夫谋求得到总统的职位是为了镇压立陶宛人这种看法。显然，他更可能把总统职位作为他摆脱共产党监护以及更好地控制那些强烈要求制裁波罗的海沿岸诸国的军队的一种手段。如果是这样的话，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应该欢迎戈尔巴乔夫获得总统职位而不是先发制人。但这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我没有可靠的证据来证明，因此不可能说服我们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朋友。

讨论会刚刚结束，与会者刚刚散去，华盛顿打来了电话。这是我的老朋友斯坦普利顿·罗伊打来的，他当时是国务院行政秘〔328〕书（后来做了美国驻华大使）。他告诉我说，我的报告引起了总统的直接关注，明天早晨我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指示。

他的预测与往常一样是很准确的。第二天早上 7 点 15 分（华盛顿时间晚上 11 点 15 分），他又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应该想法与谢瓦尔德纳泽举行一次会谈以进一步讨论形势。虽然 3 月 8 日是苏联的节日，政府部门不上班，但外交部的值班人员告诉我们说，谢瓦尔德纳泽乐意在当天晚些时候与我见面。接下来，下午 6 点我被邀请与谢瓦尔德纳泽见面。

我的感冒已经全好，感觉基本上正常，因此我步行去外交部。不应该让人们对美国大使在节日与苏联外交部长会谈产生猜疑，但如果我的挂着美国国旗的公车停放在外交部大门前面的话，可能会引起猜疑。

在外交部呆了一会儿后，谢瓦尔德纳泽接见了我。像一天前一样，他单独与我会谈。我告诉他美国总统和国务卿非常重视他前一天的讲话，美国不会对苏联紧张的局势火上添油。然后，我简要地向他谈了前一天我与立陶宛萨尤季斯领导人会谈的情况。虽然我猜想他可能已从克格勃那里获得了他希望知道的一些情况，但我开始怀疑克格勃的情报并不总是很准确，我觉得他和戈尔巴乔夫直接从我这里得到有关会谈的情况会更好。毕竟，这也不是什么秘密情报。

谢瓦尔德纳泽听我把话讲完，尽管他没有表示赞同，但他显然很满意我与立陶宛萨尤季斯领导人的会谈方式。我告诉他，兰茨贝吉斯及其同事们显然决定在本周末宣布独立，我觉得谁也没法劝阻他们。但是，如果局势像他所描述的那样不可挽回的话，我觉得还有一种值得考虑的办法。

我接着说，立陶宛人急于宣布独立的根本原因是他们不相信戈尔巴乔夫谋求总统职位的动机，这一点很明显。在这一点上，我对他们判断的准确性表示怀疑，但我也无法使他们相信在这一点上他们是错误的。如果他们确信戈尔巴乔夫不会利用他的总统职位来使用武力镇压他们，他们可能会推迟一个星期左右宣布独立。让他们相信这一点不容易，并且这样做的时间也不多了，但我愿〔329〕意向布什总统建议，我们私下催促兰茨贝吉斯和他的同事们推迟一个星期左右，如果戈尔巴乔夫以他个人的名义保证他当选总统之后会以友好的方式就立陶宛独立问题进行谈判。我强调说，我事先不能够保证兰茨贝吉斯会同意。他对戈尔巴乔夫的猜疑很深，考虑到戈尔巴乔夫近来的一些言行，我能理解他这一点。然而，我想不出别的更好的办法来说服立陶宛人等待。

谢瓦尔德纳泽说这个主意很有意思，但它提出了许多微妙的问题。在没有得到戈尔巴乔夫的同意前，他不会同意这一办法。

我对他说，我完全理解事情的微妙之处。为了说服兰茨贝吉斯，我们有必要告诉他，我们已从戈尔巴乔夫那里得到了许诺，但如果他做出许诺的事被外界知道的话，苏维埃中的反对派将以此来反对他。因此，如果戈尔巴乔夫没有兴趣这样做，我也能够理解。我只想说明一点，如果他认为确定了总统职位之后才宣布独立很重要的话，那么就值得冒险。

谢瓦尔德纳泽说他感谢我提供了与萨尤季斯领导人会谈的有关情况，并会去核实一下。他要我们不要再进行任何活动直到他允许我们“ 继续干 ”。我向他保证本周末，我会一直呆在家里，他可随时与我电话联系。

我感到他没有一天前那样担心了，他起身送我到门口，眼睛看着我，显得很激动，并对我说：“ 杰克，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如果出现了独裁专政，我打算辞职。我不愿成为手上沾满血腥的政府中的一分子。 ”

我蹒跚地走出他的办公室，我因从一个政治局委员口中得知恢复独裁迫在眉睫这种荒唐的现实而失去平衡。当他在 12 月发表了震惊世界的辞职演说之后，他的话得到了兑现。

整个周末，谢瓦尔德纳泽都没有给我打电话。维尔纽斯的事态发展正如兰茨贝吉斯告知我的那样如期进行。3 月 11 日，星期〔330〕天，凌晨，正好是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五年之后，立陶宛最高委员会以 124 票赞成、6 票弃权、0 票反对宣布恢复立陶宛民主独立的共和国地位。议会确定国家的名称为“ 立陶宛共和国 ”，取代以前的“ 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音乐学教授维陶塔斯 · 兰茨贝吉斯当选为主席和国家首脑。

主席的选举是以秘密投票的方式进行的。兰茨贝吉斯获得 92 票，从莫斯科分裂出来的立陶宛共产党主席阿尔吉尔达斯 · 布拉藻斯卡斯获 31 票。投票还没有结束时，就已表明了布拉藻斯卡斯的冒险是成功的，他和他的政党作为立陶宛的一支政治力量而保存下来，尽管这时他还不是多数党。如果他听从了戈尔巴乔夫的建议或屈从于他的压力的话，他可能会在立陶宛正在进行的这场政治选举过程中失败。几天以后，卡拉兹米拉 · 普隆斯基涅当选为立陶宛总理，布拉藻斯卡斯当选为第一副总理。

〔331〕第十三章非民选总统

总统制的施行应该是新的民主宪法中的一个完整、统一和有机的组成部分，唯其如此，它才应该施行。超出这样一种不可或缺的宪法背景，总统的权力将是危险而无法预测的。

尤里·阿法纳西耶夫 1990 年 3 月 12 日
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①

我将在民主的基础上运用总统权力，使它在全面改革过程中真正发挥决定性的促进作用。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1990 年 3 月 15 日
在总统就职仪式上的讲话②

自从得到中央委员会原则上的同意，事情就已清楚，只要戈尔巴乔夫能够采取足够迅速的行动对试图组织起来的反对派先发制人，他便能够确保宪法修正案得到通过，设立总统职位。最高苏维埃以压倒优势赞成总统制表明他控制了这一组织——在中央委员会正式支持他的态度时至少如此。最高苏维埃投票决定召开一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这是他实施行动计划过程中取得的又一根本性胜利，只有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修改宪法。

1990 年 3 月 12 日，大约在最高苏维埃作出决定两周后，立陶宛宣布独立的第二天，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于在克里姆林宫召开。尽管会议的结果人们都已预料到，但它仍将成为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里程碑，因此我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事实上，我所亲身感受到的火药味比我估计得更为浓烈。

改革派发难〔332〕作为“ 地区间集团 ”的代表，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西耶夫认为“ 草率地 ”推行总统制是“ 一个明显而且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 ”，他要求政府考虑把总统制推迟到缔结新的联盟条约、选举出新的立法机构和建立多党制之后。另外，他强调指出，新的苏联总统应该通过全民投票选举产生，并且不允许在担任总统的同时还担任党的高级职务。他反对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观点如下，即国家出现了许多问题是行政权威削弱造成的。相反，他认为这些问题是因为戈尔巴乔夫“ 反复无常和危险的 ”领导削弱了群众的信赖。他进一步要求摈弃“ 陈旧过时的共产主义观念 ”，并列举了斯大林的罪过以及勃涅日列夫的腐化堕落，其言下之意是总统制会使这种现象重现。这时，他被告知发言时间已到。他请求延长发言时间，但作为主持人的戈尔巴乔夫拒绝了他的要求，他被迫离开了讲坛。

我预料到阿法纳西耶夫和其他“ 地区间集团 ”的成员会强烈要求在建立总统制之前进行深入的讨论，他们提出的五个条件也在人们的预料之中，因为他们已公开讨论了很长时间。然而，阿法纳西耶夫对戈尔巴乔夫无所顾忌的人身攻击确实让我感到震惊。我意识到戈尔巴乔夫对民主改革派怀有偏见的批评以及他对 2 月 25 日示威游行的公开敌视已经在他们之间造成了难以愈合的敌对情绪。几个星期前，“ 地区间集团 ”的领导人（也许叶利钦除外）仍然愿意对戈尔巴乔夫的良好愿望做出让步，但是现在他们显然像兰茨贝吉斯一样与戈尔巴乔夫疏远了，他们怀疑戈尔巴乔夫谋求更大的权力只是为了收拾他们。

我为他们之间的分裂感到痛惜。我觉得阿法纳西耶夫和他的“民主主义者”的同仁们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他们的策略带有指导性错误。如果苏联最终成为一个民主国家，那么他们的五个条件将会得以满足，但是首先应允许戈尔巴乔夫确立他的独立于共产党的权力，在此之前就满足他们的要求显然是自我拆台。要想〔333〕建立一个民主体制，必须冲破共产党对政治进程的束缚。除了设立总统职位或名义不同但实质相同的职位之外，没有别的实际办法能解决这一问题。

戈尔巴乔夫的计划包括修订宪法第六条，即删除共产党“领导作用”的提法以及允许建立多党政治体制。在我看来，这是实行总统制的基本前提条件。戈尔巴乔夫能够成功地获得中央委员会的通过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阿法纳西耶夫和民主改革派似乎对戈尔把乔夫所取得的这些成就毫无颂扬之意，这些成就仅在几个星期前还是他们争取的主要目标。

如果戈尔巴乔夫接受他们提出的所有五点建议，那么他想在共产党之外建立政治领导地位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他取消了共产党的控制而共产党仍旧能阻挠政治变革时尤其如此。在他辞去共产党领导职务前，他必须在共产党之外建立一套统治体制。总统制为达到这一目的提供了庇护，我认为，他的目的十分明显：在即将召开的党代会上重整共产党，以使共产党将来不再能通过控制正式的政府部门而直接统治国家。

当我私下与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和批评者讨论这些问题时，我有时怀疑自己是否太轻信、太天真。戈尔巴乔夫是一个非常有个人魅力的人——至少他与外国人打交道时是这样——他知道如何应答以投合来访的外国人。我们之间正保持着日益信赖的私人关系，这一点肯定会影响我对他的态度。我回想起我的前任之一、最知名的前驻苏大使卢埃林·汤普森，他因受到与赫鲁晓夫私人关系的影响，忽略了赫鲁晓夫的地位正在削弱并可能被他的同事们赶下台的种种迹象。

1963 年，我作为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一名年轻官员向汤普森报告说，很可能是由勃涅日列夫领导的一个派别正准备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事实上，我当时就感到汤普森对此极为不快。作为美国国务院苏联事务的高级顾问，汤普森给莫斯科的美国官员发了一份电文，指出我们不应沉溺于对“克里姆林宫的推测”，这可能会破坏华盛顿对赫鲁晓夫政治生命的信任。1964 年 10 月，我们描述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由列昂尼德·勃涅日列夫领导的一个派别从赫鲁晓夫手中夺过了权力。

60 年代早期的经历告诉我，因个人的爱憎而影响决断是危险〔334〕的。我经常向我手下的人详细讲述我早期的经历，并请求他们如果发现我身上也有类似的倾向，要坦率地向我指出。

在分析局势时，我清楚地知道，同苏联本国的人——他们消息更加灵通，其判断力也为我所尊重——相比，我对戈尔巴乔夫的目标有更多的信任。我将此视为一个警告，我应重新思考得出结论的理由。我这样去做了，但是，无论我多少次反复思考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我只能理智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戈尔巴乔夫谋求总统职位是为了做他声明要做的事情——加快改革进程，以及做一些他不能够说的事情——排斥共产党以使他能最终废除共产党。

我得出这一结论主要不是根据他公开或私下的言论。我知道这一结论即使正合他的心意，他也会表示异议。我是根据他的行动以及分析他面临的选

择而得出这一结论的。他过去的所作所为——尽管在某些方面有缺点，有时反复无常——以及他所处的地位均说明，他对改革是认真的。

无疑，他喜欢权力。确实，他一想到失去权力就毛骨悚然。的确，他脸皮太薄，对批评过于敏感，把善意的批评看作是对他的背叛。不过，如果他的目标仅仅是为了提高他自己的个人权力，那么他的行动就缺乏逻辑性。如果他的目的是要镇压立陶宛人和把矛头对准改革派，他有什么必要去谋求总统职位呢？如果这些是他的主要目标的话，那么他利用现有的政党、警察和军事机构将更容易、更有保证地达到他的目的。如果权力是他唯一或主要目标的话，他不用改变他所继承的现有体制就可以更有效地运用权力。为了试图改革这个国家，他正在冒很大的风险，我找到的唯一能解释他冒此风险的理由是：他确立了一个目标，即建立一个法治的国家。

而且，我认为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暂且支持戈尔巴乔夫的决定对改革派不会有什么坏处，至少在目前是这样。虽然总统制的基本立法没有包括各种制约机制，也没有为完全实行民主提供必要的平衡机制，但它的确对权力进行了某些限制，这与对权力毫无限制可言的现有体制相比，显然是一大进步。

最重要的是，我认为绝大多数改革派应意识到，如果戈尔巴乔〔335〕夫有解除共产党权力的任何希望的话，时机是至关重要的。虽然总统制本身无法做到这一点，但是任何其他方式也没有成功的希望。

总之，我认为对于改革派来说，眼下明智的做法是：作为权宜之计，支持尽快推行总统制，同时宣布新宪法必须满足某些条件，这一制度从长远来看才是可以被接受的。对于戈尔巴乔夫的意图，最好是在即将召开的党代会之后再做出判断。如果他没有利用这次党代会来削弱保守的共产党组织，他理应受到更直接的反对，但是时机不成熟的反对只能削弱他的力量，使他无力对付那些真正想阻挠变革的人。

避免直接选举

因为这些原因，当我看到“ 民主主义者 ”和戈尔巴乔夫之间日益激烈的人身攻击时，深感苦恼和悲哀。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双方都会受到损害。然而，阿法纳西耶夫提出的五个条件中有一条在我看来是有道理的，即总统应该通过直接选举产生。

显然，如果新总统由人民直接授权，会比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具有更大的政治权威。事情很清楚，如果戈尔巴乔夫想要取得他所谋求的改革成就，他将需要他所能够调动的所有权威。不过，提交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草案规定，最初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总统任期为五年，以后总统通过普选产生。

戈尔巴乔夫的名望仍然相当高，尤其是与其他的政治家相比。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如果立即进行总统普选的话，他可能会赢得绝大多数选票。我奇怪他为什么不充分利用这一优势，而是逃避选举这一关，从而使他的地位受到削弱。

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的几周里，我与许多苏联的政治家和新闻记者讨论了这个问题。反对戈尔巴乔夫的人认为，他避免直

接选举只是因为他怕落选。支持戈尔巴乔夫者则指出，选举会浪费和分散时间，如果戈尔巴乔夫想继续改革进程的话，时间绝对是不可缺少的。

〔336〕然而，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其好处是显

而易见的，我觉得戈尔巴乔夫支持者的观点令人难以置信。当立法草案最后出版发行时，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在 1990 年逃避竞选运动。根据立法草案的规定，总统选举由多数加盟共和国的多数票决定。这一规定显然是为了避免俄罗斯控制总统选举。如果只管票数而不管是否得到多数加盟共和国的支持，那么即使得不到任何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多数支持，俄罗斯也可以选举出一个总统来。非俄罗斯族的加盟共和国不会接受存在着这种可能性的宪法。

对戈尔巴乔夫及他的政治顾问来说，要得到多数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支持显然是有困难的。在 15 个加盟共和国中，7 个（包括三个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三个外高加索加盟共和国以及摩尔多瓦）已经严重与苏联疏远，戈尔巴乔夫想赢得其中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的支持都极端困难。这意味着他必须得到所有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支持，而这些加盟共和国则会趁机在自治的要求上加码，以此作为支持的价码。

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戈尔巴乔夫选择了比较容易的方式，提议总统最初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2 月份在最高苏维埃投票赞成建立总统制的鲍里斯·叶利钦此时宣布，他只支持民选的总统。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他在接受意大利《晚邮报》记者的采访时说：“ 戈尔巴乔夫想由人民代表大会而不是由人们来选举总统，我不赞成并将反对这种选举方式。 ”然后，他又补充说：“ 这将改变通过普选制选举总统的日期，可能是四年，或许甚至是一年。如果戈尔巴乔夫不改变选举方式的话，便有必要取而代之。 ”③

关于总统制的争论在 3 月 12 日仍在进行，第二天早上接着辩论。但两个小时之后被强行停止，并开始举行投票。建立总统制的提案以 1817 票赞成、133 票反对、61 票弃权得以通过。

接下来的议程是选举第一位总统。除戈尔巴乔夫外，总理雷日科夫和内政部长瓦季姆·巴卡金也被提名为候选人。但由于他们两人都退出竞选，戈尔巴乔夫成为唯一的候选人。④

设立总统制的法律是以记名投票的办法通过的，总统选举却〔337〕不同，它是无记名投票。由于代表们是进行无记名投票，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势力让人感到吃惊。他以 1320 票对 495 票赢得大选，但还有 313 名代表要么弃权，要么投了无效票，这意味着他赢得的选票低于 60%。

天空中已布满了乌云，反对票和弃权票只是其中的一块。尽管这个国家正面临着一场暴风雨，但不可逆转的事实是，从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公开谈论改变政体结构的可能性以来，在短短几个星期的时间里，苏联帝国的政体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共产党不再有合法的权力进行专制统治，国家和政府的组织与以前万能的共产党机构没有正式的联系。虽然这种变化具有潜在的革命性，但是要贯彻落实仍将是未来的事情。

立陶宛人的挑战

立陶宛人宣告独立并没有引起谢瓦尔德纳泽所担心的政变，但是它肯定给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带来一些紧张气氛。戈尔巴乔夫显然曾希望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能够成为他的总统就职仪式。

从第二天早上起，代表们开始要求讨论立陶宛的局势。来自维尔纽斯的瓦伊多塔斯·安塔纳伊提斯代表立陶宛议会在人民代表大会作了发言。他指出，在此次代表大会上立陶宛代表只是观察员而不是与会者，他宣告立陶宛最高委员会已投票通过恢复立陶宛的独立，呼吁代表大会促成立陶宛与苏联

当局间的谈判。

虽然爱沙尼亚人还没有正式宣告独立，但其代表已向戈尔巴乔夫正式提出了就爱沙尼亚独立问题举行谈判的请求，并宣称他们将不参加总统选举的投票，因为这将会影响爱沙尼亚的地位。

针对要求谈判的呼声，戈尔巴乔夫在大会上明确表示：“与立陶宛、爱沙尼亚或拉脱维亚举行任何谈判都是不可能的。”人民代表大〔338〕会第三次会议在结束之前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告立陶宛最高委员会恢复独立的行为无效，并要求苏联总统、最高法院和部长理事会保障立陶宛所有苏联公民的合法权利和那里的苏联财产。⑤

兰茨贝吉斯毫不妥协，他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一封信，反对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橡以往一样，为了不把事情闹得太僵，他公开表示：“我们不指望苏联明天就会接受立陶宛的立场，他们也不应指望我们会改变我们的立场。”但是，最后他忿忿不平地指出：“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宣告了侵略者有统治其受害者的权利。”⑥

那个周末，维尔纽斯和立陶宛其他城市举行了相互对立的集会。在立陶宛人庆祝他们独立的时候，俄罗斯居民被动员起来示威游行，反对立陶宛独立。所有示威游行井然有序，但苏联民众从苏联中央电视台得到的印象却不是这样。

那个周末，我正在中亚地区旅游，并认真看了莫斯科的电视新闻。以前，关于波罗的海地区事件的报道尽管对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主义者抱有偏见，但有时也对他们的活动和要求进行一些客观的报道。留心的电视观众还是可以通过这些报道，去掉歪曲的部分，比较准确地看到事情的全貌。现在这种情况有了变化，显然莫斯科发布了命令，只报道莫斯科对事件的看法。

对立陶宛当选领导人所作的歪曲和诽谤的报道，使我感到震惊。他们仅对反对独立的示威游行进行了详细的报道，电视镜头还夸大了示威游行的规模。最近从立陶宛搬迁出来的俄罗斯族人在电视上用激烈的言词谴责立陶宛当局剥夺他们最基本的人权，尽管他们没能拿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一切（随后我们得知许多示威游行者并非来自立陶宛！）。然后，电视演播室里请来的评论家们一本正经地告诉电视观众，宣布独立的“极端主义分子”仅仅是一小撮立陶宛人，他们实际上是曾与希特勒狼狈为奸的法西斯主义者的徒子徒孙。这种苏联老一套诽谤方式的重现让我感到震惊，我意识到公开化的成果很快在电子媒体中被取消了，它仍处在比报纸更有力的中央控制之下。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雷日科夫和戈尔巴乔夫都发布了法令，要〔339〕求立陶宛人上交所有的武器，执法机关“保障立陶宛苏联公民的权利和合法利益”，边防士兵“加强保卫”立陶宛的边境，安全机关“制止外国人的违法行为”。⑦如果从字面意义来看，有些法令似乎不可思议：既没发生立陶宛人引起的骚乱，也没有武器广泛流散的证据（与外高加索的情况截然不同）；没有证据表明立陶宛边境已不在苏联的控制之下，也没有证据表明外国人没有签证便进入了立陶宛。这些法令明显带有挑衅性，为执法部门搜查民宅、没收财产和驱逐外国人提供了借口。立陶宛政府立即宣布这些法令无效。双方法律上的冲突已不可避免，若其中一方竭力坚持自己的要求，法律的冲突就可能逐步升级成流血冲突。

实际上，驻扎在立陶宛的苏联军队已开始显示其力量，他们增加了战斗

机的数量和地面军事演习的次数。立陶宛总理普隆斯基涅于 3 月 21 日给雷日科夫发了一份电文，抗议这种行为方式，并指出驻扎在立陶宛的苏联军队的法律地位还没有确定下来。

到了 3 月 22 日，莫斯科对维尔纽斯的恐吓变得更加严重，立陶宛议会发表了“ 告世界各国书 ”，指出“ 另一个国家正在准备用武力侵略立陶宛共和国，这一点一天天变得越来越明显 ”，议员们呼吁世界其他国家“ 用抗议来阻止对立陶宛可能的侵略 ”。⑧

3 月 23 日，我们收到苏联外交部的一个通知，要求在立陶宛的所有外交官必须在 12 小时内撤离。虽然我们在立陶宛没有固定的办事处，但近几周我们临时安排了至少两名外交人员呆在维尔纽斯观察事态的发展。同时，苏联外交部还“ 告知 ”新闻记者“ 暂时 ”不会批准去立陶宛采访（外交官和新闻记者的旅行一直是受到控制的，尽管去波罗的海诸国首府的旅行通常会得到批准）。驱逐外交官的命令太突然了，以至于发通知的那些人没有去核查一下交通条件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驻立陶宛的代表是从列宁格勒总领事馆调去的，他们既订不到飞机票，也购不到火车票，为了在最后期限撤离，只得租用了一辆小汽车，自己驾车离开那里。

〔340〕把所有的外国人（外交官、新闻记者、普通公民）赶出立陶宛的决定在许多人看来是莫斯科迄今为止采取的最可怕的一个举动。它表明莫斯科方面认为暴乱可能迫在眉睫，它准备采取的行动不是使用武力，就是挑起一场冲突。莫斯科之所以把外国人从立陶宛驱逐出去是为了达到双重目的，既可消除“ 外来的煽风点火者 ”，又可以排除这场镇压的目击者。

我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对驱逐命令立即表示抗议。不过，外交官们别无选择，只能服从。但结果表明莫斯科也无力驱逐所有的外国

记者和平民，其中一些人在立陶宛当局的保护下仍滞留在立陶宛。

我于 3 月 24 日星期六结束了中亚之旅回到了莫斯科,并立即召集大使馆的高级官员讨论最近事态的发展。我指出，戈尔巴乔夫正试图恐吓立陶宛人，但可能仍希望避免使用武力。但是问题在于，立陶宛人受到的挑战愈直接，他们可能愈加好斗。虽然立陶宛人尽力想避免武装冲突，因为他们知道用武力的方式他们不会获胜，但是苏联官员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不住为挽回面子而采取武力行动的诱惑。军方高级官员已被要求为了防止立陶宛分裂，必要时可使用武力，得知这一消息后，我感到特别不安。虽然两个星期前谢瓦尔德纳泽的担心没有成为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担心毫无根据。

华盛顿方面担心的是，立陶宛发生任何严重的暴力冲突将会中止美苏关系的总体改善，破坏我们之间裁减军备的谈判，并使中、东欧遗留问题的解决复杂化。虽然一些愤世嫉俗者会怀疑美国可能“ 牺牲 ”立陶宛以及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来保证这些“ 更重要的 ”目标，但没有一个美国政府会与一个使用武力控制波罗的海沿岸诸国的苏联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在苏联出现了镇压之后，国会将限制试图与它照常往来的任何一位美国总统。

虽然我猜测苏联领导人知道美国对武力解决立陶宛问题是极力反对的，但我不能肯定他们领会到了我们反应的强烈程度。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好几个苏联高级官员向我抱怨，他们没有得〔341〕到美国反应的预先警告。1981 年，有人对我说：“ 当阿宫汗政府一个接一个地垮台时，你们摆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但当我们做我们认为有必要做的事情时，你们大发脾气，破坏了 10 年来在我们之间建立的所有关系。 ”

1979 年，苏联领导人可能不会被警告所威慑，但到了 1990 年，他们与美国及整个西方关系的改善对它已更加利害攸关。重要的是，要让戈尔巴乔夫不抱这种幻想：即使在立陶宛实行了武力镇压，与美国的密切关系仍将会保持下去。我认为给戈尔巴乔夫一个清醒的警告正是时候。

在这一点上，华盛顿的考虑与我不谋而合。我刚起草好一封建议白宫高层领导人发出警告的信，就得到华盛顿方面的通知，国务卿贝克写给谢瓦尔德纳泽的信正在传递途中时。贝克的信星期天的早上到达，我们马上予以转达，因为事态发展太快，我不想等到第二天再与谢瓦尔德纳泽见面。

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在同一天抵达莫斯科。他很少出访，但每次总是很有成效。他把他与政府所有可能的政治分歧都抛在一边，不断地将他的活动详情通知给我们，并努力确保他的所作所为是在支持两党共同的对苏外交目标。在敦促解决人权问题时，他尤其有影响力。

当我到机场去接他时，看到他正处于极度的不安之中。在召开新闻发布会前，他要我向他简单介绍一下立陶宛的局势。我告诉他那里还没有出现严重的事件，但局势已经非常紧张，并且正朝着危险的方向发展。然后，他走到记者面前，强调和平解决立陶宛问题的必要性，并且指出如果发生了暴力事件或镇压，将会危及美苏关系。

这些讲话是重要而有益的。我们已在私下里表达了我们的立场，有鉴于此，由一位著名的民主党人士传递与我们相同的信息是益的，尤其是他可以在公开场合传递这一信息而不给人一种威胁的感觉。

那个周末，我开始看出一些迹象：莫斯科新闻媒体缓和了他们到目前为止一直坚持的反立陶宛立场。星期五晚间的电视新闻

对维尔纽斯事件进行了反面的报道，但是，紧接其后播放了布什总统认为有必要对话的声明，并电视采访了研究苏联民族问题的美国著名专家盖尔·拉皮德斯教授。拉皮德斯教授对电视机前的〔342〕苏联观众说，他们的民族问题只能通过给予最大限度的自由来解决，特别是立陶宛，它在获得自由之前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但这些非常明智的话语并不是出自戈尔巴乔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之口。苏联中央电视台显然有人正试图对波罗的海事件进行比我们近来所看到的更客观的报道。

第二天，《消息报》刊登了一篇从立陶宛发回的报道。这是一篇比我们的期望还要全面一些的报道。该报道准确地引用了最近兰茨贝吉斯写给戈尔巴乔夫的短信，在信中，兰茨贝吉斯否认立陶宛正在组建军队。他把目前的局势称为一场“ 神经战 ”。然后该报又引用一位立陶宛议员的话说，现在是寻求共同利益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谈判的时候了。这是自立陶宛宣布独立以来，我在莫斯科的新闻媒体上看到的第一份以公道的措词描绘立陶宛局势的报道。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官方立场松动的信号还是主编伊万·拉普季夫自由化态度的反映。我注意到《真理报》没有刊载同样的报道，虽然这篇报道发自于官方的新闻机构塔斯社。

实际上，苏联对立陶宛的压力并没有放松，接下来的一周我从苏联官员那儿听到的消息令人难以释然。最高苏维埃联盟委员会主席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于 3 月 26 日设午宴款待肯尼迪参议员,立陶宛自然是我们关注的中心话题。我和肯尼迪向普里马科夫强调了与立陶宛开始谈判的必要性，他说立陶宛领导人使用的策略使得双方不可能谈判。如果立陶宛改变策略，讨论还是可以的，但谈判决不可能。我问他这两个词在语义上是不是不可混淆的：

为什么“ 讨论 ”和“ 谈判 ”之间有如此明显的差别？普里马科夫问我美国总统是否会与国内的其他政治集团谈判，我回答说总统当然可以这样做：他与国会、州政府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的谈判是家常便饭。

“ 但是，他不会与要求独立的州长谈判。 ”他指出。

“ 可能不会， ”我回答说，“ 但是我们的宪法并没有赋予各州脱离联邦的权利。 ”

〔343〕“ 我们的加盟共和国有权脱离联盟，但它们必须依法行事。 ”普里马科夫回答说。

在我正要问他使用“ 权利 ”前为什么还需要得到其他人同意这个问题时，有人转换了话题。正如他所知，当时最高苏维埃正在辩论的“ 脱离法 ”草案规定，做出脱离苏联的决定必须得到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同意。

虽然普里马科夫坚决拒绝考虑与立陶宛“ 谈判 ”，但他确实向我们保证他们不打算使用武力。不过，其他一些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并不很令人乐观。当时美国刚离任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威廉 · 克劳上将正在莫斯科访问，在为他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当有人向谢尔盖 · 阿赫罗梅耶夫元帅问及立陶宛局势时，他回答说，苏联边境的稳定是改革的前提条件，军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国家，反对外来威胁，“ 必要时 ”也可用来解决国内问题。显然，他的话证明谢瓦尔德纳泽的担心是有根据的。

当然，苏联军队对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有根深的感情。他们在那儿有一些重要的军事基地，特别是空军防御基地，但我们大使馆的武官——我专门倾听了专家的意见——认为波罗的海沿岸诸国独立后，只要它们没有落入敌对国家的控制之下，苏联的防卫力量将不会受到严重损害。而且，如果莫斯科方面 1990 年愿意与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就独立问题进行谈判,它或许可保留其在波罗的海地区最重要的军事基地。

苏联军队对波罗的海地区的依恋可能有军事需要的问题，但更多是情感上的问题。苏联对军队的教导是：为保卫苏联所有的领土而献身，在军队看来，波罗的海沿岸诸国是苏联领土的一部分。

寻求解决办法

布什总统的公开声明，以及随后贝克国务卿传递给谢瓦尔德纳泽的信息，都是很及时的，但是双方似乎仍没有就缓和紧张气氛进行对话的意思。戈尔巴乔夫正面临要他“ 采取某种行动 ”的强大压力，迄今为止他一直避免直接使用武力，他在向立陶宛施加心理压力，但他这样做显然正冒着很大的风险：一个小冲突会〔344〕逐步升级，使局势难以控制。

我开始问自己，然后又问其他人，美国或别的国家是否能做些事情帮助双方缓和紧张局势并开始对话。通常，我们波罗的海的朋友仅仅考虑面临的威胁，苏联官员则只是一味地建议立陶宛人放弃宣布独立，并加入到新联盟条约的谈判中来。后者肯定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们已竭尽所能地坚决反对镇压，但仍有必要找到某种方法来克服所有阻碍有效对话的“ 原则立场 ”。

“ 脱离法 ”草案虽然还没有正式通过，但却为解决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尽管它包括一系列难以接受的条款，但它的确承认分裂在某种情况下是合法的，它规定通过加盟共和国的全民公决，2/3 有效票就可以着手进行脱离联盟进程。在我看来，就全民公决本身而言，这一要求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立陶宛能够被说服同意举行全民公决，与莫斯科就谈判达成谅解，接下

来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他们完全可以获得同意独立的 2/3 多数。这将为莫斯科提供了一种挽回面子的解决办法。

当我和立陶宛人以及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人讨论这一问题时，他们最初是犹豫不决的。第一，他们不同意他们是在脱离苏联这种观点，因为他们认为（正如我们所认为的）他们从来就不是苏联的合法组成部分，而只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第二，如果要他们遵守苏联的法律，即使是部分法律，这不是等于让他们承认苏联的管辖权吗？第三，虽然立陶宛人相信他们能够获得 2/3 以上人民的支持，但如果他们开了同意举行全民公决的先例，这不等于背叛了另外两个波罗的海邻邦吗？特别是拉脱维亚人的比例不到拉脱维亚共和国人口的 2/3。

我向他们指出，他们的问题并非法律的细节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现实问题。他们持有无懈可击的法律依据却仍没有获得独立。而且，他们也不需要正式宣布其全民公决是按照莫斯科的法律要求来进行的。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而举行的全民公决可以向全世界表明，莫斯科所宣称的绝大多数立陶宛人不想独立的说法是错误的。

】5i 他们认为默认苏联的司法权会削弱其合法地位，这种担心在我看来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他们是一个被强占的国家，他们为获得独立而被迫采取的任何行动不应被理解成自愿接受苏联的管辖。

最后，我指出，通过一些明智的政治宣传，三个波罗的海国家都应该能赢得赞成独立的 2/3 多数。我认为投票不会完全按照种族界线划分，许多非波罗的海民族的人也会赞成独立。例如，在拉脱维亚，倡导独立者如果能获得 80%的拉脱维亚人和 40%的非拉脱维亚人的支持,他们就会赢得 2/3 的多数，如果进行计划周密的游说，目标应该能够达到。

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代表的多次会谈使我相信，虽然立陶宛人最初犹豫不决，但他们确有可能同意举行全民公决，只要戈尔巴乔夫真的同意在 2/3 多数赞成独立的情况下开始谈判。

我们已对镇压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可怕后果做了预先警告，我觉得以这种建议作为对警告的补充是有用的。因为它为当时双方摆脱面临的困境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法。我计划周末回美国参加谢瓦尔德纳泽在华盛顿的会谈，并参加我两个儿子的婚礼。我打算尽力使这一建议得到批准。

华盛顿方面的想法与我们在莫斯科的想法仍然不谋而合，并且在时间上也相同。我于 3 月 29 日晚上飞抵德国的法兰克福，打算第二天飞回美国。但是，午夜以后我被电话铃声惊醒，华盛顿方面打电话通知我天亮以后重返莫斯科，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

我的副手迈克·乔伊斯到莫斯科机场接我，他不仅能非常熟练地处理大使馆繁重的业务，而且我不在的时候还独当一面。飞机到达机场时，我们只剩下不多的时间驱车前往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的办公室去参加事先约好的会谈。迈克在车上谈了一下基本情况。布什总统给戈尔巴乔夫的私人信件当天早上已由迈克转达给谢瓦尔德纳泽。布什总统在信中坦率地说，他正面临着日益增加的在立陶宛问题上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压力，并指出，如果双〔346〕方事先都同意将尊重投票结果的话，全民公决为双方打破目前的僵局提供了一种解决办法。那天下午，苏联联盟委员会召开会议，布什总统想把信在会前交给戈尔巴乔夫，因为会上有可能就立陶宛问题做出决定。我的任务是与雅科夫列夫讨论这封信，并就总统建议的背景提供更多的细节。

我的使命可用两句话来表达："向雅科夫列夫指出镇压立陶宛人的危险性，得到他对总统提出的通过全民公决解决目前僵局这一办法的反应。向他说明如果因任何原因而发生镇压，那么苏美两国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卓有成效的合作关系将不会保持下去。"任何一个外交官，不管能力多差，也知道如何令人信服地向他的谈话者表明这些观点。

但可笑的是，我发现给我的指示写了满满两页纸：好主意完全被冗长的陈词滥调遮掩了。我所面对的是一种典型的官僚主义的产物，官僚们试图向其同事和上司证明他们是多么地了解情况的。尽管有些内容一看就明白，但每一点都是罗罗嗦嗦地作了详细的说明。文件的起草者似乎担心收信人水平不高，理解不了，但是我对我们自己的这一"体制"太熟悉了，我认为不应该这样指责起草文件的人。所有的官员，包括总统在内，都会受到不想留下任何余地的"跨部门委员"的同样对待。

这份长信有一个好处：我可以用俄语念给雅科夫列夫听，然后给他留下英文的原稿。这可表明我所传递的信息的确是官方的，并不是我个人杜撰出来的。然后，我们可以开始真正的讨论。

我们知道雅科夫列夫与谢瓦尔德纳泽一样，是对立陶宛抱有同情态度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我希望他至少会表现出一丝对全民公决的支持。然而，他对立陶宛人最近的行为进行了强烈的谴责。他说，双方的对话是不可能的，除非立陶宛停止宣布独立以及其他行为。如果立陶宛人想进行对话，他们可以在当天举行的联盟委员会会议上这样做，但是他们拒绝出席。他们"大胆而挑衅"的立场使得任何对话的尝试都无济于事。

［347］雅科夫列夫承认，全民公决可以成为脱离联盟的一个开始，如果立陶宛人这样做的话。他说，倘若现在要举行全民公决的话，立陶宛人应首先恢复他们宣布独立之前的局势。他指责立陶宛人不顾与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建立起来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歪曲历史。虽然"纳粹—苏联"的秘密条约是不合法的，但是 1940 年立陶宛投票赞成加入苏联是有效的，现在的立陶宛领导人不能简单地以独立把这一切抹掉。

他饱含激情地强调，立陶宛的行为是"送给保守力量的一份厚礼"，将使改革进程受到干扰。他指出，苏联要求使用武力解决立陶宛问题的呼声日高，同时要求立陶宛人用硬通货支付苏联的所有援助物资。不过，他向我保证，贸易还用卢布结算，因为如果使用一种可兑换货币的话，那么所有人都会受到影响。

我记得雅科夫列夫几个月前曾跟我说过，立陶宛宣布独立将是"改革的终结"。我也意识到党内的保守派因立陶宛人的背叛而责怪他：他们指责他于 1988 年夏天访问立陶宛时提出反对"阶级斗争"理论，从而引发了波罗的海各国分裂进程。虽然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但是他无疑怕别人抓住他的政治辫子，并力图确保与我会谈时紧密地与当时的官方路线保持一致。

我告诉他说，由于我们彼此了解对方的立场，争论立陶宛的合法地位问题毫无用处。但显而易见的是，缓和在立陶宛问题上的紧张气氛符合苏联和立陶宛双方的利益。显然，在对话没有进行时就要求一方投降，这样的对话将很难开始。但苏联领导人目前正是这样做的。不管立陶宛人宣布独立明智与否，他们显然不会仅仅为了进行对话而改变这一决定。

雅科夫列夫不停地重复他的观点，只有立陶宛人恢复原来的局势并且'停止他们的非法行为"，全民公决才可以接受。

因为他以现存的密切的经济关系作为反对独立的一个理由，所以我向他指出，独立并不意味着必须断绝现有的联系。他应该考虑一下他曾呆过的加拿大：以前它曾是大不列颠帝国的一部分，现在它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仍与英国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和人员往来。

〔348〕他对我的提问未作回答，但是抱怨说，试图“恐吓另一方”是不合适的。苏联指责美国近来在巴拿马和菲律宾的行为时，从来没有暗示美苏关系会受影响。美国在立陶宛问题上的“恐吓”将会“起相反的作用”。

我回答说，当我们表示镇压立陶宛将使两国关系不会继续发展时，我们并不是在恐吓。我们只是在阐明一个政治事实。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的立场被误解，我们就玩忽职守了。

我们兜了一个大圈子，很明显雅科夫列夫得到的指示是决不“妥协”。会谈结束时我指出，莫斯科目前的策略将无助于解决问题。当戈尔巴乔夫认识到这一点时，他可能会发现，全民公决将为他谈判独立的条件提供一个政治依据。

立陶宛问题犹如幽灵一直纠缠着谢瓦尔德纳泽此后一星期在华盛顿的会谈，会谈没有在这一问题上取得进展。不过，谢瓦尔德纳泽的访问确实达到了目的：确定了下一次美苏首脑会议的日期。戈尔巴乔夫将于5月底6月初来美国参加首脑会议。我对这一协议表示欢迎。我确信每年的首脑会议都很有意义，此次首脑会议还将促使戈尔巴乔夫尽一切努力避免当年春天在立陶宛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动武。他无疑知道立陶宛以及其他波罗的海国家的流血将会取消他计划好的与布什总统的会晤。

1990年4月9日返回莫斯科后不久，我们接待了由国会多数党领袖乔治·米切尔率领的由七名美国参议员组成的访苏代表团。他们与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会谈，这又给我们提供了一次试探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宛问题上态度的机会。

会谈一开始，戈尔巴乔夫就对改革的重要性以及改革所面临的困难作了很长的介绍。他没有直接涉及立陶宛问题，但是在结束他的开场白时，他指出，他对“美国国会对这里某些事态发展的反应感到吃惊”。显然，他是指国会通过的支持立陶宛的提案。

米切尔参议员向他询问了有关美苏削减战略武器会谈协议和〔349〕处理立陶宛问题的前景。戈尔巴乔夫简单地回答了执行美苏削减战略武器会谈协议的情况，指出国务卿贝克不久将访问苏联，希望能够解决遗留问题，虽然美国似乎仍在谋求某些单方面的优势。然后，他把话题转到立陶宛问题上，尽管他表示最近就立陶宛问题已讲了许多，不知道该补充些什么，但是他还是用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陈述他的观点。

他认为，由当前的政治领导人统治立陶宛人是不幸的。他们拒绝参加对苏联体制进行的彻底改革。他眼睛看着我说，他不知道谁在给立陶宛人出主意，但他们的政策也许是出于无知和政治无能。他们迫不及待地决定在苏联建立总统制之前采取行动，但是后来他们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戈尔巴乔夫宣称，我们是有耐心的。如果立陶宛人独立了，我们将与他们断绝关系，并把他们当作一个国家来看待。他们的日子恐怕肯定不好过。但问题的症结在兰茨贝吉斯本人，而不在立陶宛人民，我们不想让立陶宛人民遭受痛苦。

像雅科夫列夫一样，戈尔巴乔夫认为，只有立陶宛“恢复到它3月10

日的局势”，也就是说，恢复到它宣布独立前的局势，才可以就立陶宛独立问题开始进行谈判。他分析道，即使达到这一点，谈判也可能是漫长而艰难的，因为有 80 多万非立陶宛人生活在那里，很多人将离开。然后，他强调说，如果人们明白这些谈判将会出现的结果，他们是不会支持“分裂主义者”的。

就他本人而言，他正承受着解决这一问题的巨大压力。人们正在指责他缺乏主见和过于软弱，但是他深信目前的局势要求克制和忍耐。不过，如果形势需要的话，他不会拒绝考虑采取严厉的措施和行使总统权力。

最后一句话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显然与谢瓦尔德纳泽以及其他人所讲的仍然决定不使用武力的说法是矛盾的。但是，戈尔巴乔夫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着，不给别人提问和发表看法的机会。他对美国国会采取的行动尤其敏感，因此，他不会放过劝告这个由知名的参议员组成的代表团的机会。

〔350〕他说，美国国会不应该出面干涉这些问题，或充当教训者的角色，这样只会引起反感。而且，他认为除苏联以外，其他许多国家都担心立陶宛脱离苏联可能会开创一个先例：巴西、印度、加拿大、南斯拉夫等联邦国家都会受到影响。

戈尔巴乔夫似乎越来越脱离现实，我不知道他是否能把话题转回来。他显然已准备结束会谈，但忍不住又发起了最后的攻击。他说，“并非事事都取决于我们，”又一次暗示立陶宛人应该做出调整，“我在访问立陶宛时就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认为独立只是举手或投票之类的事情，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事情远比这一切要严重得多。但是，许多人已在想方设法改变目前的领导人，因此可能还有希望。顺便说一句，他们在宣布独立之前曾访问过马特洛克大使，他们可能还会这样做。他们显然想从大使那里得到一些建议，但是我不知道大使跟他们讲了些什么。”

讲到这一点时，我没等翻译把他的话翻译过来就打断了他。我用俄语对他说：“他们不是来征求我的建议，他们也没有得到任何建议。”

戈尔巴乔夫微微一笑，表示他的话并无敌意，他接着说：“对了，在过去几个月里，他们如同煎烙饼一样已通过了不少法律。”

他重申，如果立陶宛人希望就脱离联盟开始谈判，他们必须恢复到 3 月 10 日的局势。

他终于停了下来。米切尔参议员试图使他承诺不采取武力政策，米切尔机敏地对戈尔巴乔夫说，希望他能对他所作出的以非武力方式解决立陶宛问题的承诺发表一点看法。戈尔巴乔夫立即对他的话予以纠正：“我只说过非暴力方式是最理想的。”

米切尔不打算做长篇大论的讲话，但他提醒戈尔巴乔夫注意美国传统的不承认政策。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这一事件并不仅仅是苏联管辖范围的内部问题。但是，美国希望对话将把事件引向和平解决的道路。戈尔巴乔夫对立陶宛政府最近的一些行为发了一阵牢骚后，会谈结束。会谈持续了近两个小时，其间戈尔巴乔夫几乎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讲话。

当我们离开房间时，我停下来对戈尔巴乔夫说，他所说的关于我给立陶宛人出主意的话是没有根据的。立陶宛代表不时地向我们阐明他们的政策，我告诫他们既不要指望美国的自动承认，也不要指望经济援助。所以，虽然我们已清楚地表明我们不承认波〔351〕罗的海沿岸国家是苏联的一部分，但我们并没有怂恿他们采取具体行动。戈尔巴乔夫抓住我的胳膊，微笑着对我说：“别担心，我了解情况，有人向我汇报过。”

我回答说：“ 我相信有人向你汇报过，我只想确保他们告诉你的是准确的。 ”

加紧钳制

戈尔巴乔夫在会见美国参议员代表团时的“ 独唱 ”没有使我得到安慰，反而增添了不少忧虑。虽然他没有讲什么特别新的东西，但是他的言论表明，他 1 月份从立陶宛回来后对那里的局势一无所知。在此之前，我已注意到，他不像谢瓦尔德纳泽那样愿意作出明确的避免使用武力的保证。这次会谈清楚地表明，他不愿放弃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并把“ 如果有必要拯救生命 ”作为使用武力的理由。但是，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都可以以此为理由进行公开辩护。1 月份对阿塞拜疆的镇压便是如此。

戈尔巴乔夫似乎仍被兰茨贝吉斯并没有获得多数人支持的幻想所蒙蔽。虽然这两人彼此间的厌憎一段时间以来很明显，但在最近的选举期间以及其后，兰茨贝吉斯获得了压倒多数的支持，这一事实应该使戈尔巴乔夫认识到——用戈尔巴乔夫最喜欢的话来讲——他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 政治现实 ”。相反，戈尔巴乔夫似乎相信兰茨贝吉斯自己的人民正试图抛弃他。这种天真的想法很可能是克格勃的假情报导致的，克格勃编造这些假情报的目的在于劝阻他与当选的立陶宛领导进行认真的谈判。

其他国家会受到立陶宛所开“ 先例 ”的影响，这种观点显然是挖空心思杜撰出来的。我不时听到苏联外交部官员说“ 其他国家担心我们开创一个先例 ”之类的话，但是我从来没有找到任何表现出这种担心的证据。可能南斯拉夫除外。其他联邦国家的大使们向我保〔352〕证说，他们的国家从来没有因为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独立可能影响他们的国内问题而表示或暗示要加以反对。而西方绝大多数国家并不承认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属于苏联，声称恢复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独立为瓦解他们自愿组成的联邦开了先例是不合逻辑的。立陶宛的地位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与魁北克或旁遮普的地位都毫不相关。

我意识到戈尔巴乔夫正在为巩固其地位作最后的挣扎——作为一个狂热鼓吹者——他会这样做的。但是我怀疑他是否真的相

信这种观点。在给我们介绍情况的文件中写着“ 许多联邦制国家可能对这个问题很敏感 ”，到戈尔巴乔夫嘴里就变成了“ 许多联邦制国家对这个问题很敏感 ”。如果戈尔巴乔夫真的相信“ 许多联邦制国家对这个问题很敏感 ”的话，他在处理现实问题时将会遇到许多的麻烦。

他显然确信所有居住在立陶宛的非立陶宛族人都反对独立的要求，这一点反映了他对实际情况的误解。在最近的选举中，大约有一半的非立陶宛人投了萨尤季斯的票，立陶宛东正教也积极活动，要求独立。戈尔已乔夫似乎也没注意到这一现实。

虽然戈尔巴乔夫再三强调遵守宪法程序的重要性，但是他忽略了宪法赋予的“ 权利 ”与自称贯彻执行这些权利但实际上限制并可能取消这些权利的法律之间固有的矛盾，从逻辑上讲，宪法赋予的权利居优先地位。他也忽视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观点，即它们不存在从苏联分离出去的问题，因为它们是被非法强迫加入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本人曾是个律师，这些方面几乎不可能不引起他的注意，但是，他现在扮演的角色不是律师而是一个政治家，当法律细节与政治目标不相容时，他会忽略法律细节。

戈尔巴乔夫关于他处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以及“ 很少有机动余地 ”的言论道出了他为何坚持一面之词的原因。一方面，是他得到了错误的情报；另一

方面，是他故意对显而易见的事实视而不见，但最主要的是，这是他对强硬派所提出的以一切必要手段结束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独立运动作出的反应。

一个多月以来，莫斯科对立陶宛宣布独立所作的反应只是施加心理压力而没有采取具体的强制措施。但是，4 月 15 日这一天，〔353〕戈尔巴乔夫决定加大对立陶宛的压力。

我花了一整天举行记者招待会和会见来访的美国参议员。那天晚上吃完晚餐后，米切尔、比尔 · 布雷德利以及其他几位贵宾被邀请到叶夫根尼 · 普里马科夫的私人别墅参加一个小型的聚会。这既是美苏关系发生变化的迹象，也是苏联高层政治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向外界公开的迹象。传统上，外国人只在饭店或专门招待外国人的特殊 “ 宾馆 ” 受到招待。他们从来不会被邀请到苏联领导人的家里做客。

普里马科夫的别墅是一幢中等大小的带凉台的平房，离市中心几英里远，掩映在树丛中，别墅舒适而不奢华。普里马科夫向我们介绍说，他在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任所长时，就用他自己的钱建造了这幢别墅，总花费为三万卢布。大多数苏联高层官员居住在政府建造的别墅里，这是国家的一项补贴，而普里马科夫住在他自己的别墅显然过得更加舒适，他非常自豪地带我们参观了他的别墅。

普里马科夫长期以来一直是外交事务方面的学术专家，尤其是中东问题的专家，他现在又要调动工作了。他是苏联最高苏维埃委员会联邦院主席，但是刚刚被任命为戈尔巴乔夫新的总统委员会成员。从 70 年代起，我就认识他了。在 1986 年 10 月的雷克雅未克美苏首脑会议上，他是苏联方面有关地区问题的主要谈判者，此后，他越来越频繁地充当了非官方的外交政策发言人。很显然，他与戈尔巴乔夫关系密切，许多人认为他正在窥视谢瓦尔德纳泽的外交部长职位。

那天晚上，整个别墅的气氛非常轻松愉快，用苏联的话讲，是两党合作，因为阿纳托利 · 索布恰克也在被邀请的人数不多的贵宾之列。作为一个最直言不讳的改革者，索布恰克经常批评戈尔巴乔夫采取折中主义的改革措施，被认为是反对派的领袖，尽管当时还不存在正式意义上的反对派，而且他仍是一名共产党员。

普里马科夫的女儿成了我们的女招待，当我们看到他的家庭照片以及其他一些纪念品时，想起了曾降临在他头上的不幸：在他妻子去世后不久，他才十几岁的独生子也夭折。普里马科夫曾有一个非常幸福美满的家庭，至今他仍然承受着失去亲人的心理〔354〕创伤。他给我们看了他妻子生前的照片，并对我们说，虽然他妻子已经去世四年了，但是他毫无再婚的兴趣。他现在显然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

尽管谈到了这些令人伤感的往事，但是那天晚上气氛轻松愉快，并谈了许多有关美国国会和最高苏维埃可能互换信息和携手合作的事。不过，那天早些时候，普里马科夫使戈尔巴乔夫和平解决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问题的全面承诺的不确定性加大了。当有人要求他发表一个直截了当的决不使用武力的声明时，普里马科夫回答说，“ 没有人 ” 希望发生动乱，因而也不打算使用武力，但最终每个国家必须 “ 保护其重要利益 ” 而不管其他人怎么想。在他心目中，留住立陶宛显然是一种 “ 重要利益 ”，不过，他并没有暗示将马上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迫立陶宛就范。

米切尔和布雷德利两位参议员与我一起驱车回到城里。当我们的车停靠

在他们下榻的宾馆门口时，我注意到许多电视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聚集在那里，我怀疑出了什么事。两位参议员下车的时候，照相机的灯光忽然打亮，记者们一起拥上来，其中一个大声问道：“你们如何评价对立陶宛采取的经济制裁？”

布雷德利参议员使用了他在篮球场上曾多次使用的声东击西的方法，急忙低头，从左侧溜进了宾馆。闪光灯一直照着米切尔和我。米切尔向我投来一个探询的眼光，我耸了耸肩，因为我对“制裁”的了解不比他多。然后，他老练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说，他不能对他还没听说过的声明发表任何的评论，但是他真诚地希望尽快开始对话。重要的是不能用压力和暴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制裁声明是参议员们与他们的贵宾共进晚餐时由莫斯科电台播发的。声明说，戈尔巴乔夫已向兰茨贝吉斯发出威胁的信号，如果立陶宛议会不取消最近的一系列决定，包括限制公民行为、中止苏联军队在立陶宛征兵、以及企图占有莫斯科在立陶宛的财产，就会向立陶宛“停止供应”通常是卖给国外换取外汇的物资。立陶宛人被限定必须在 48 小时内按声明的要求去做。⑨

〔355〕目前尚不非常清楚哪些“物资”被看作是“卖给国外以换取外汇的”，但是石油显然在这一范围之内。实际上，立陶宛所有的石油和天然气都来自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而且石油和天然气也是苏联最大的出口收入来源。正如立陶宛领导人所意识到的那样，他们最大的经济弱点是他们对莫斯科石油的依赖，因此戈尔巴乔夫现在利用他们的这一弱点毫不足怪。

不过，我对声明在时间挑选上的愚蠢和残忍感到震惊。戈尔巴乔夫是在受难节向一个传统上而且目前仍基本上是罗马天主教的国家发出最后通牒的，而最后期限又是在复活节！人们几乎很难想象比这更愚蠢的时间了。兰茨贝吉斯毫不犹豫地要求注意这一事实，并答复说立陶宛人会照常过复活节，过完节之后才会考虑如何答复。

星期六早上，我与参议员们一同驱车到机场时，我们讨论了美国该作出何种反应。我告诉他们我难以预测政府的反应：显然总统会尽其全力阻止向立陶宛施加如此压力，但同时他也会希望避免发生冲突，以免增强苏联强硬派的力量。不过，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只要苏联对立陶宛进行经济制裁，美国就应中止与苏联就新的贸易协定进行谈判。

戈尔巴乔夫 5 月份去华盛顿时，显然希望能签订一个贸易协定。我觉得如果他仍然对立陶宛施加经济压力的话，我们应该拒绝签订这样的贸易协定。在我们试图与苏联扩大贸易的时候，它却把贸易作为攻击立陶宛的武器，对我们来说，这是矛盾的。长期以来，我一直赞成在适当的条件下扩大美苏经济联系，但是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要把它作为一种潜在的手段来对付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如果戈尔巴乔夫对立陶宛实行石油禁运，那么现在是使用贸易武器的时候了。参议员们同意这是一个恰如其分的反应。不管怎样，他们认为如果莫斯科对立陶宛实行经济制裁的话，参议院会拒绝批准任何贸易协定。⑩

尽管我认为我们应该就莫斯科对立陶宛的惩罚性经济手段作出反应，但是我还认为避免过分的反应也很重要。那里可能会发生更糟的事情，诸如大规模逮捕或暴力镇压，因此我们必须保持防止更严重的镇压行为的能力。

复活节后的星期一，立陶宛最高委员会开始讨论他们对戈尔〔356〕巴乔夫和雷日科夫最后通牒的答复。这场讨论持续了三天，最后于星期三以全票

赞成通过了一项决议。（11）一方面，决定对莫斯科提出的取消他们以前通过的法律的要求不予理睬，另一方面，组成了一个代表团准备与莫斯科谈判，并宣布假如谈判能够开始的话，在 5 月 1 日前将不通过新的有重要政治意义的法律。

莫斯科不顾立陶宛方面的建议,于第二天即 4 月 19 日开始限制向立陶宛提供石油和天然气。那天早上，通过输油管供给立陶宛炼油厂的原油停止了供应，天然气的供应减少了 85%。虽然这些措施引起了恐慌，使许多立陶宛人抢先到汽油站购买汽油，但是他们的行为也提醒了莫斯科，如果它试图通过经济制裁来惩罚立陶宛的话，同样也会给莫斯科带来困难。立陶宛炼油厂提炼的原油同时也供应其他加盟共和国，实际上，供应给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地区（前东普鲁士的一部分，二战以后从德国手中获得）的所有石油都要经过立陶宛。拉脱维亚的一些地区、白俄罗斯以及俄罗斯自身也要靠立陶宛核电站来提供电源。如果立陶宛失去了能源供应，那么势必殃及其他地区。

然而，局部的经济制裁持续数周之后给立陶宛带来了许多困难，每个人都提心吊胆。苏联军队趁机加紧军事活动，增加 “ 军事演习 ” 的次数，并频频地在各个城市间调遣部队，进一步增加了紧张气氛。立陶宛议会终止了武装征兵法，但莫斯科认为这是非法的，国防部明确表示，它计划在全国加强春季征兵。立陶宛宣布独立后，许多文陶宛士兵离开他们的部队回到了家乡，国防部对此反应激烈，表示对这些 “ 逃兵 ” 要严加捉拿。

莫斯科也发布了强占办公大楼的命令，这是最终会导致流血的一种做法。就在发出经济封锁的威胁之前，苏联内务部的武装警察强占了立陶宛共产党档案馆大楼，这显然是为了防止它落入分裂出去的立陶宛共产党手中。

〔357〕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选择独立

恐吓立陶宛的种种尝试也是为了防止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闹独立，但这些努力起了相反的作用——正如所有了解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人所预测得那样。虽然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领导人不急于马上宣布独立，但他们正以坚定的信念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兑现了爱沙尼亚人民代表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发出的警告，3 月 30 日，它宣布苏联在爱沙尼亚的统治从其强加之日起就是非法的，并且宣告爱沙尼亚进入“ 重新恢复 ”二战前爱沙尼亚共和国的“ 过渡期 ”。（12）4 月 12 日，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又以爱沙尼亚是一个被外国占领的国家为由，投票通过了一个议案，终止爱沙尼亚人在苏联军队服役。

像其他两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一样，拉脱维亚人民阵线在 3 月份的选举中赢得了该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领导权。新议会虽然有可能采取较少冲突的策略，但它跟在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之后朝着独立的方向发展的决心是坚定的。

戈尔巴乔夫再三强调，排除与任何一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 “ 谈判 ” 的可能性，并且拒绝与立陶宛派往莫斯科的谈判代表进行对话。但是，到了 4 月 19 日，即减少对立陶宛供应石油和天然气的那一天，他分别会见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代表。戈尔巴乔夫的目的不是与他们谈判而是劝他们不要重蹈立陶宛的覆辙。他敦促爱沙尼亚人撤消他们的 “ 3 月 30 日声明 ” ，并告诉两个加盟共和国的代表说，他们的加盟共和国只有两种选择。如果他们想要独立，他们必须遵守苏联新出台的有关脱离联盟的法律。但是，如果他们愿意就自愿联邦事宜进行谈判，并愿意留在重组的联盟中，他们可以取得完全自

治的特殊地位。（13）

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人没有接受戈尔巴乔夫的意见。爱沙尼亚拒绝做出让步，不到两周，拉脱维亚新议会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宣告拉脱维亚并入苏联是无效的，并且恢复了拉脱维亚的战前宪法。

莫斯科的施压促使波罗的海地区国家进行合作。就在对立陶宛〔358〕进行经济制裁以前，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政府签署了一项旨在建立一个统一的波罗的海大市场的经济合作协议，并将在里加设立“波罗的海合作理事会”，协调地区投资银行、商业协会以及其他机构的工作。（14）但是，真正的合作只有在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领导人从莫斯科手中夺取了经济控制权后才有可能。1989 年，苏联最高苏维埃曾通过一项法律，同意从 1990 年 1 月 1 日起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获得“经济自治”，但是到 1990 年春季，情况实际上没有任何变化。莫斯科的部长们仍然认定这三个加盟共和国的工业设备是属于他们的财产，反对由地方政府控制这些工业设备的所有尝试。这一教训使得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不再相信戈尔巴乔夫的许诺。

4 月 3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脱离联盟”法，这一经戈尔巴乔夫签署的法律使人产生了更多的怀疑。尽管理论上允许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但是它规定的脱离程序是如此的复杂和充满“陷阱”，以至于实际上要遵守这些规定是不可能的。全民公决要求有 2/3 多数赞成，达到这一要求后才能开始谈判，在谈判的不同阶段还须得到苏联总统、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将确定过渡期的时间，最长可达五年之久，并且只有经人民代表大会做出决议才能结束。在整个过渡期间，苏联法律在加盟共和国仍然有效。（15）

这一新法律表面上是贯彻宪法授予的脱离权，实际上与斯大林时代的宪法条款一样虚伪。我明白了为什么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拒绝遵守。

到了 5 月份，莫斯科与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议会的关系陷入了僵局。戈尔巴乔夫继续拒绝进行任何不符合“脱离”法的谈判。所有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领导人也拒绝撤消他们已经宣布的独立声明。莫斯科继续加紧对立陶宛施加压力，对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施加的压力稍微轻一些，施压以不引起全面暴力冲突为标准。〔359〕甚至经济制裁也远非全局性的。尽管经济制裁引起了一些困难和许多的烦恼，但是经济制裁不足以导致严重的损害。虽然军队和警察的耀武扬威显示出不祥，但还没有出现流血冲突。戈尔巴乔夫显然把加紧施压作为安抚强硬派的一种方式，强硬派坚决要求戈尔巴乔夫采取某些行动迫使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就范。不过，他本人也想“给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上一堂课”，让它们知道它们的经济完全依赖苏联。不论第一个动机起了什么作用（强硬的讲话和强有力的法令有可能确实制止了将戈尔巴乔夫赶下台的企图），第二个动机却注定是要失败的。经济上的施压不足以使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屈服，但其引起的痛苦却足以增强它们要求独立的决心。戈尔巴乔夫和他的顾问们认为施压会使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就范，这一假设收到了完全相反的效果。

组织总统机构

戈尔巴乔夫在竭力阻止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独立的同时，着手组织总统机构。他敦促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设立两个顾问组织：一是联邦委员会，由各加盟共和国议会的领导人组成；一是委任的总统委员会。这两个机构的权利和责任并不清楚。显然，总统在做出决定时可以

随意地采纳或者不理睬他们的建议。不过，这两个机构提供了一种集体决策的外表。

我觉得戈尔巴乔夫设立联邦委员会的意图是，让各加盟共和国议会感到它们在中央政府中有发言权。该机构能否产生这一效果将取决于它能否对涉及各加盟共和国的重要决定产生影响。至于设立总统委员会，我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试图用它来取代政治局。如果他把政治经济改革政策的讨论从共产党机构转移到由他本人直接控制的总统办公室，他就可以远离共产党机构并最终忽视它的存在。

设立总统职位两周之后，戈尔巴乔夫宣布了他任命的总统委〔360〕员会成员。其中包括几个主要政府部门的官员，诸如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内政部长巴卡金、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尤里·马斯柳科夫。戈尔巴乔夫还任命了两名他的亲信：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以及他在中央委员会中的助理瓦列里·波尔金。总统委员会中还包括三个温和的改革派：物理学家尤里·奥西潘、经济学家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作家欣吉兹·艾特马托夫，为了保持平衡，委员会中还有三名众所周知的“保守派”，即西伯利亚作家瓦连金·拉斯普庭、乌拉尔地区的一名工人维尼亚明·亚林——保守派们认为他是潜在的“右翼莱克·瓦文萨”，以及拉脱维亚农场企业的负责人阿尔伯特·卡乌尔斯。

戈尔巴乔夫在挑选总统委员会成员时，显然对性格以及政策的协调考虑不多，更多的倒是考虑政治平衡。只有激进的改革派似乎完全没有被考虑，虽然沙塔林院士后来成为一名激进的改革者，但当时仍被看成是一名温和的改革者。我可以理解确保这个国家的每一重要集团在总统委员会中都有其‘代言人”的政治用处，但是我不清楚这个机构将如何协调行动。事实上，它从来也没有过协调一致。

不过，戈尔巴乔夫尽力给总统委员会树立威信。总统委员会成员任命后的第二天，他与该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并确保这次会议得到了很好的宣传。他还让委员会成员搬进了克里姆林宫宽敞的办公室，这是为苏联最高级官员保留的。到秋天的时候，根据协议草案，总统委员会取代党的政治局成为高层领导机构。在 11 月份正式的国庆招待会上，总统委员会的成员们接见了各国的高官显贵，他们所站立的地方在前几年只有政治局成员才可以站在那里。

设立了总统机构以后，苏联部长会议仍然保留了下来，这样一来，苏联的政体不像美国总统内阁制，而有些像法国——部长理事会与总统职位分开，而且总理通常是另一政党的人。我觉得戈尔巴乔夫想把部长会议置于他更直接的控制之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部分原因是因为政府机构的强烈反对，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公开羞辱总理雷日科夫。雷日科夫曾支持设立总统职位，并且拒绝成为与戈尔巴乔夫对立的总统候选人。不过，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观察家都希望戈尔巴乔夫缩小部长会议的规模，一旦〔361〕政治上有可能时，立即把大多数政府经济部门的职能转移到各加盟共和国，但是，最初总统机构的设置并没有给部长会议的机构和人员带来重大的变化。

4 月份发生的许多事情显然与我所做的猜测完全相反，我曾猜想戈尔巴乔夫在即将召开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将削弱共产党对政府的控制。共产党内部的激进改革者为党代会准备了一个完全符合当时党的纪律的“民主主义政纲”。我认为戈尔巴乔夫不会赞成这个政纲，因为它遭到了大多数共产党官

员的反对，但我确实希望戈尔巴乔夫会鼓励政纲的发起人继续留在党内。没有这些激进的改革者，在党代会的辩论中改革就会缺乏有力和坚定不移的支持。在戈尔巴乔夫自己的参谋班子中，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在 1 月份就建议他与这些改革派知识分子达成共识。虽然他在许多问题上采取了妥协态度，并批评了在总统职位上讨价还价的改革者，但是我认为他知道他需要他们——即使没有其他原因而只是为限制他的保守派同事。而且，改革派们正在进一步表明他们会在重要的地方赢得选举。3 月份“ 民主俄罗斯 ”联盟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以及其他几个主要城市均获得了胜利。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些胜利——像早些时候叶利钦的胜利一样——似乎冒犯了戈尔巴乔夫，而不是使他进一步确信民主运动对他有益。戈尔巴乔夫不仅没有允许“ 民主主义者们 ”在党代会的代表选举中施加尽可能大的影响，反而试图在党代会召开之前将他们驱逐出共产党。1990 年 4 月 11 日，正当全国共产党组织准备开始选举党代会代表时，《真理报》发表了中央委员会的一封公开信，实际上是要求“ 民主政纲 ”的发起人脱离共产党。这封公开信谴责“ 民主政纲 ”的发起人试图“ 把我们的党变成由完全自由的宗派和集团组成的不成样子的社团 ”。然后，它又反问是否可以让“ 这种人留在苏联共产党的队伍之中 ”，虽然它不承认这样做是在搞清洗，但它实际上已经这样做了，因为它号召共产党所有组织起来反对那些“ 组织宗派集团的人 ”。（16）

戈尔巴乔夫曾经亲自点名批评过的尤里 · 阿法纳西耶夫告诉〔362〕我，那封信发表以后，他觉得他没必要再留在党内了。4 月 18 日，他公开宣布脱离共产党。（17）不过，其他大多数改革者则决心继续呆在共产党内，至少到党代会召开，以便使保守派不会因改革派缺席而获胜。

但是，官方对“ 民主政纲 ”的倡议者们施压并没有促使他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结成统一战线。不久就出现了一轮公开的争吵，其本质往往是个人之间的斗嘴。尼古拉 · 什梅列夫在《消息报》上撰文谴责加夫里尔 · 波波夫主张的定量供应原则。改革派经济学家拉里萨 · 波亚谢娃指责说，她被“ 民主俄罗斯 ”开除代表候选人资格，是因为她批评了伊利亚 · 扎基拉夫斯基的某些观点。（18）总之，“ 民主主义者 ”的政纲一发表，有关它的争吵就接踵而至。

最初，“ 民主俄罗斯 ”的支持者们在联合起来支持候选人方面也是不成功的。当戈尔巴乔夫辞去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务而成为总统时，人民代表大会要选举一名继任者。戈尔巴乔夫支持过去是副主席的阿纳托利 · 卢基扬诺夫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务，但是遭到了普遍的反对，尤其是遭到了改革派的反对，改革派们认为卢基扬诺夫感兴趣的是维护共产主义的原则而不是促进改革。然而，他们没能就推举一个候选人达成一致，他们的选票也因而分散在好几个候选人身上，包括法律教授康斯坦丁 · 留本琴科和阿纳托利 · 索布恰克，物理学家叶夫根尼 · 维利霍夫，来自鄂木斯克的代表阿列克谢 · 卡扎尼克——他把自己在最高苏维埃中的位置让给叶利钦，以及来自伊尔库茨克的经济学家根纳季 · 费尔申。尽管反对派四分五裂，卢基扬诺夫也只得了 56 · 3% 的微弱多数，这意味着他的对手们倘若能够团结起来，胜利也许是属于他们的。（19）

这一教训促使改革派在几个星期后俄罗斯新议会开会时团结在叶利钦的周围。如果戈尔巴乔夫当初支持像留本琴科这样的温和派而不是卢基扬诺

夫，我不知道改革派是否还会这样做。由于支持了一个以反对快速推进政治、经济变革而闻名的候选人，戈尔巴乔夫无意中帮助叶利钦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中建立起了自己的联盟，并且增大了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两个机构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卢基扬诺夫因其长长的马脸和粗哑的嗓音，给电视观众的印象极糟，他在民众中受欢迎的程度根本无法与戈尔巴乔夫相比。但要是遇到一个像康斯坦丁·留本琴科那样英俊、充满活力且能言善辩的人，情况就很难说了。

〔363〕经济改革的标准

戈尔巴乔夫不愿或无力重组部长会议这一中央政府机关，既是严重经济危机的征兆，又是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原因，正如我当时对春季形势所分析的那样，事态继续发展下去，苏联的经济前景只会非常暗淡。

真正的经济调整一拖再拖，成为一种长期的顽疾。我觉得除非能找到一种办法取消莫斯科官僚机构对经济的控制，否则公众的士气以及对戈尔巴乔夫领导能力的信任将一落千丈。

在莫斯科以外的其他地方旅游期间，我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表明经济决策权正从莫斯科向地方转移。尽管人们在谈论市场经济的种种优点和好处，但是建立市场经济的步伐迈得极小，而且没有成效。这与政治体制急剧而根本性的变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那里，被释放出来的各种政治势力正在极力推动着国家向民主方向发展。但是没有一种力量能够解脱官僚机构对经济的束缚。

虽然最高苏维埃在经济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是改革的法律基础仍旧严重不足。例如：

·财产法没有承认真正的私有财产。

·土地法没有结束国家和集体农庄对土地的垄断。

·租赁法没有对日益增加的租赁提供真正的奖励。

·有关银行、竞争和取消垄断的基本立法甚至还没有制定，而所有这些领域的新法律是改革取得成功的保证。

·新税法征收的税率太高。它们不可避免地会降低工资和其他奖励，抑制增长，怂恿腐败。

·缺少适当的法律机制来使新制度走上正轨——我发觉人们也不太清楚怎样去创建这种机制。

同时，整个国家苦于缺乏真正了解市场如何运作的人才。各加盟共和国和各地区对莫斯科经济控制的憎恶情绪不断上升，进而加〔364〕深了种族之间的不和。戈尔巴乔夫似乎仍旧依靠国家计划委员会以及政府各部门来规划和实施他的经济改革，这等于引狼入室。

我担心正在推行的零零碎碎的改革措施实际上恶化了局势，因为这些零碎的改革措施并不是伴随着体制上的变革而出现的，只有体制上的变革才能使这些改革措施产生效果。

例如，农产品的“征购价”刚刚上涨，但是由于粮食生产和分配体制还没有改变，这一措施很难改善粮食供应，相反有可能增大预算赤字和导致通货膨胀。农民们会把这仅看作是一系列物价上涨的开始，因而宁愿把他们的农产品囤集起来而不卖给国家。而且，在农村地区消费品奇缺，没有必要用农产品去换取毫无价值的卢布。

暴露出来的问题非常明显，对于美国使馆来说，要描述这些问题简直不

费吹灰之力——虽然我怀疑戈尔巴乔夫手下的人能否给他提供一个客观的描述。决定采取什么措施将苏联经济成功地纳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是苏联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每个经济学家显然都有他或她喜欢的方案，但是这些方案往往忽视了政治上能否行得通这一关键因素。1989 年，我曾建议美国政府对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 标准 ”进行综合研究，但据我所知，这一研究还没有进行。在我们分析苏联经济改革成功前景时应注意些什么呢？在这一问题上，专家们，不论是政府内的还是政府外的，尚未达成一致意见。

到了 1990 年,我已意识到使馆不能指望华盛顿告诉我们如何报告苏联的经济形势。要使我们报告的情况具有一致性，并使我们判断基于可靠的标准，我们就必须自己去摸索。我要求使馆的经济和政治部门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研究工作由对苏联非常了解的两位很能干的外交官约翰 · 布兰尼和雷蒙德 · 史密斯负责。我们定期见面进行讨论，这些会议很像在大学里举行的研究生讨论会，只有一点不同，“ 教授 ”实际上是学生。〔365〕同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多次讨论以及通过我自己对日益恶化的苏联经济的观察，我确信苏联领导层可采取的最有效措施是取消中央经济部门，强迫中央经济部门把它们的大多数职能移交给企业管理部门，某些服务性质的工作可由加盟共和国来完成。这些措施将在结束中央对经济的控制、取消垄断生产者、最终创造一个私有化框架的方向上迈出第一步。（20）在短时期里，这一激进措施将是痛苦的，并易引起混乱，但是它解放了生产力，创造了一种竞争经济。在我看来，迅速摧毁中央集权控制——剪断中央部门与企业部门联系的脐带——会产生几个不可避免的影响：

· 企业经营者必须创造生存的市场。

· 如果各加盟共和国和地方有直接的经济管理职权，那么戈尔巴乔夫可以避免对将来的错误负责。

· 宣布独立的经济诱因以及种族冲突的根由将减少。

· 一旦给予了机会，一些加盟共和国会迅速地使私有财产以及其他公共机构合法化，这些均是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这样将会创造一种竞争压力而迫使其他加盟共和国起而效之。

· 权力下放将使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市拥有可靠的税收基础，因为如果莫斯科不试图对遍布全国的效益不佳的企业进行补贴的话，中央政府只需要很少的财政收入。而且，阻挠改革的官僚们必须去企业和地方政府机构中找工作，这也会改变他们的观点。

如果我认为有必要采取的这些激进措施给社会带来过多的混乱，那么它们肯定会失败。目前没有人能肯定它们的具体衡量尺度，因此必须同时采取一些措施来缓和它们对普通公民的冲击。在我看来，以下几点是伴随经济决策权全面下放而必须采取的最低限度的措施：

1. 把加强卢布地位作为一种经济手段，方法是控制货币供应量和减少预算赤字——大部分预算赤字是由不必要的军备生产、〔366〕对效益差的企业给予补贴和为大量的官僚机构支付薪水而导致的（减少“ 卢布过剩 ”的一种办法是把国有资产出卖给私人企业家）。

2. 取消垄断并采取严格的反垄断立法。

3. 鼓励主要国家机构之外的、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机构的发展，例如商业和投资银行、实施商业法规的机构以及发展所需新技能的培训中心。

4. 主要的社会服务事业从国有企业向地方政府和市政府转移——这是私

有化成功的前提条件。社会服务事业的资金可通过财产税和中央预算基金的再分配来解决。

5.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失业救济；最低固定收入指数化，例如对生活费用的补贴；通过食品印花税计划等给最穷的人以补贴。对固定的集团提供援助比目前体制下给每个人食品和住房补贴的预算开销要小得多。

显而易见，要做到这些需要时间，但是我认为除非采取迅速而具体的措施来达到这些目标，否则改革就会失败。官僚机构不会进

行变革，除非它们被迫进行变革，官僚们不会变成企业家，如果他们仍可以四平八稳地当官的话。但是，如果他们没有选择余地，许多人会很快适应一个不同的环境。如果一个人体质上适合游泳而拒绝学游泳，教他学游泳的唯一方式是把他丢进深水中去。

我知道，对局外人来说，不论对情况多么了解，也不论动机多好，都没法为苏联人民做这些事情。苏联人民必须自己去做这些事情。我并不愿意在苏联人民面前装腔作势，或试图“兜售”我关于改革的好主意。但是到 1990 年春季时，我心里终于有了一套标准来衡量各种改革计划，这些改革计划将在以后几个月进行讨论。

戈尔巴乔夫设立总统职位之时，他显然感到政治环境无法承受我认为必要的这些激进的经济改革。当他巩固他的总统地位并在夏季的党代会上改组共产党时，他会准备采取这些措施吗？我至少必须等到秋天才会有答案。最关键的问题是他是否愿意取消中央集权制度对经济的控制。

〔367〕第十四章俄罗斯做出抉择

同志们，如果你们对他（叶利钦）的话作认真的分析，你们就会发现，他在恢复俄罗斯主权的幌子下要求瓦解联盟。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90 年 5 月 23 日①

我认为我们必须放弃以前的提法：一切为了强大的中央。只有各加盟共和国强大了，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联盟才会强大，如果各加盟共和国更加强大和更加独立自主，中央和联盟才会更加强大。

鲍里斯·叶利钦 1990 年 5 月 31 日②

1990 年 6 月 2 日，星期六，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参加其第二次美苏首脑会议的第三天。正式的会谈在前一天已经结束，两位总统在马里兰州布什总统的戴维营休养地度过了轻松愉快的一天。晚上，双方代表团的高级官员参加了两位总统所设的晚宴。

仅仅在四天以前，刚好是戈尔巴乔夫离开莫斯科来美国之前，我在戈尔巴乔夫到来之前赶往华盛顿、简要汇报情况后的第二天，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议会主席。我没有机会试探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当选有何看法，这一定给了他重重的一击，尤其是他曾公开阻止出现这一情况。我希望晚宴搞得比较随便些，使我有机会把他拉到一边聊聊天。

晚宴正像我所希望的。宾客们混杂在中心楼随便选取白葡萄酒和桔子汁（没有烈性酒，令一些苏联官员感到失望），闲聊着戈〔368〕尔巴乔夫如何第一次玩掷蹄铁套柱游戏，以及开高尔夫机动车时他几乎撞在了树上，这时戈尔巴乔夫走了进来。

我是那晚唯一不用翻译可与戈尔巴乔夫交谈的美国人，这使我们不用担心别人能听懂我们的谈话内容。寒暄几句后，我就问他将来是否能与叶利钦共事。

“你告诉我吧，”戈尔巴乔夫耸耸肩说，“近来，你与他见面的次数比我还多。”

他的话，一半是真话，一半是恭维，这是戈尔巴乔夫惯用的一种谈话技巧，当他不想多说什么时，便用这种办法来转移话题。他的话暗示了我是苏联国内政治斗争中起作用的一个因素，其中既有恭维，又有警告，对一个大使来说，置身于所在国的国内政治是危险的。撇开影射嘲讽不谈，我知道他所说的话是真的：我在过去几个月里与叶利钦见面的次数确实比他多。在我看来，出现这种结果似乎不是因为我过于主动热情，而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政治上的判断失误。他应该去面对叶利钦，不管他本人是多么讨厌叶利钦。不过，我决定从表面上来理解他的话而不让他回避我的问题。

“好吧，他跟我说他想与你合作，”我回答他，“我觉得他是真诚的。但我的看法不算数。你的看法才是最重要的。”

“这完全取决于叶利钦是否愿意起建设性的作用，他有些爱玩政治游戏。但是，如果他能脚踏实地，办事认真负责，我们是能在一起共事的。”戈尔巴乔夫补充说，叶利钦近来的言论给了他一些他们将来能够共事的希望。但他喜欢发表一些“蛊惑人心的声明”，结果助长了“平均主义”，为建立一系列改革需要的经济激励机制带来了更多的困难。

我没有与戈尔巴乔夫争辩，但是我认为他最后一句话是不公平的。叶利钦对共产党特权的攻击是针对不正当的特权，而不是一概而论。戈尔巴乔夫用“平均主义”这个字眼来描述叶利钦言论产生的影响是一个讽刺。叶利钦在 1987 年与我第一次会谈,当他谈到改革要想成功就有必要改变人们的观念时，用的正是这个词。事实上，他并不反对经济激励机制，但显然，有人让戈尔巴乔夫确信他反对经济激励机制。叶利钦之所以越来越喜欢在讲话中宣传平民主义，据我看，是因为他必须为自己赢得选票以重返〔369〕政治舞台，而不是他对改革持不负责任的态度。如果戈尔巴乔夫能够尽更大的努力把叶利钦保留在他的领导班子里，并且推行更激进的改革进程，叶利钦就失去了他正利用的某些问题而大做文章的机会。

俄罗斯选举

叶利钦费了很大的劲并以极微弱的多数当选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3月份，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使得该机构发生了严

重分裂，叶利钦的支持者在其中成为少数派。

不过，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以及其他几个主要城市，民主改革派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中赢得了这些城市中的绝大多数席位。这些当选者许多人已经脱离共产党而打着别的旗号，也有一些压根儿就不是共产党员。70 年代，一些非常有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曾作为政治犯长期在监狱呆过，也在这次选举中当选。生物学家谢尔盖·科瓦廖夫是安德烈·萨哈罗夫的朋友，他因编辑地下刊物《当前大事记》而于 1974 年逮捕，该刊物多年来是了解勃列日涅夫政权滥用人权的主要信息来源，他当选为莫斯科一个区的代表。格列勃·亚库宁是俄罗斯东正教的一名传教士，他曾因为宗教自由辩护而受到监禁，当选为莫斯科一个郊区的代表。德米特里·沃尔科高诺夫上将，曾写过批评斯大林的传记，因为他支持民主改革而被迫从苏联军队退出现役，他当选为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的、乌拉尔山以东一个叫奥伦堡州的代表。《论据与事实》的编辑弗拉基斯拉夫·斯塔尔科夫当选为莫斯科我所居住的那个区的代表，戈尔巴乔夫当初曾试图撤换他。

在广阔的俄罗斯土地上，选举情况大不相同。“民主派”与“民主俄罗斯”运动只保持松散的联系，没有一个范围广泛的全国性组织，甚至在许多选区没有推举自己的候选人。在那些地区，当地共产党组织因为其他组织缺席而在选举中占优势，共产党基层组织的领导和国有企业的经营者被选进了人民代表大会。尽管共产党不再有合法的垄断权，但是它在国家的许多地区仍旧掌握着权力杠杆。

直到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在 5 月份召开之前，我像其他的观〔370〕察家一样，无法推断各种政治倾向间的力量对比。政党、集团和联盟处于不断变动之中，一个星期前的联盟在下一个星期就土崩瓦解了。许多新当选的代表在政治上是难以预测的人物，我们无法预测他们的政治态度。但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足以使我们感觉到，改革派当选的前景将比去年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要好一些。“民主俄罗斯”的支持者虽是一个少数派，但却是一个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少数派。共产党对大会的控制要达到其对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控制程度显然是有困难的。

恰好在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后的那一天，我邀请两名新当选的代表共进午餐：一位是政治学家列昂尼德·沃尔科夫，他是莫斯科地区的代表，

曾帮助建立了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另一位叫瓦列里·基塞瓦尼，他是来自西伯利亚库兹涅茨克煤田的前采煤工人。两人都是“ 民主俄罗斯 ” 联盟的成员，但是他们关于经济改革的观点有分歧：沃尔科夫认为改革会带来痛苦的调整和改组，而基塞瓦尼坚决反对可能会增加失业和导致急剧通货膨胀的任何改革措施。不过，关于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趋向问题，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相信“ 民主俄罗斯 ” 最多能获得 40%的选票。要想使“ 民主俄罗斯 ” 占上风，它还必须从共产党的自由派别中吸引相当多的代表过来。

我问他们，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可能性有多大，他们回答说，叶利钦当选是有可能的，但远未肯定。不过，共产党候选人亚历山大·弗拉索夫比叶利钦当选的可能性还小，因为人们觉得他过于被动而不能进行有效的领导。弗拉索夫在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所作的毫无生气的演讲增强了他给人们留下的过于软弱的印象。虽然民主派从他们早些时候的失败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并将给叶利钦以坚定的支持，但是这两位代表认为，只有当叶利钦能够获得共产党代表 10—20%的选票时，他才会获胜。否则，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一职可能被候选人中的黑马获得，诸如苏联内政部长瓦季姆·巴卡金。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选举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举行，它证实了这些预测的第一点。尽管得到戈尔巴乔夫的强有力支持，但弗拉索夫还是在第一轮投票中未能当选。第一轮竟选共有七人。叶利钦得到的选票超过了弗拉索夫，但也不足半数。弗拉索夫和其〔371〕他三名候选人的名字在第二轮选举中被抹掉。叶利钦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强硬派共产党头头伊万·波洛兹科夫，他已经公开宣称反对改革。在第二轮选举中叶利钦又得票最多，但仍缺少 28 票。与此同时，强硬派通过支持波洛兹科夫而显示了他们的力量，所得的选票几乎与叶利钦一样多。

当我离开莫斯科去华盛顿参加美苏首脑会议时，我觉得叶利钦所得的选票可能已经达到最高记录了，这也许给新的候选人诸如巴卡金留下了空缺。但是，波洛兹科夫退出第三轮竟选后，弗拉索夫又想杀回来。对波洛兹科夫强硬路线的忧虑和确信弗拉索夫不能胜任这一职务，使大量的中间派选票转向叶利钦。叶利钦得以侥幸获胜：在 1000 多张选票中，他仅以 4 票的优势而当选。

这是一次非凡的但又是微弱的胜利。那些投他票的代表们并没有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集团，叶利钦立即宣称他与任何政党或派别都没有关系，而是代表整个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的利益。所以他拒绝作任何努力来控制正在组建的“ 俄罗斯共产党 ”，也拒绝组建他自己的政党。当时这一决定显然在策略上是非常精明的，但这一点最终损害了叶利钦有效地处理他与他的立法机构关系的能力。

他需要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 2/3 的选票同意他修改宪法、设立总统职位和进行直接总统选举，他能否做到这一点十分令人怀

疑。他和他的支持者已经开始谈论俄罗斯实行总统制的必要性，原因显而易见。如果被给予这样的机会，叶利钦可能在直接总统选举中赢得压倒性多数，从而使戈尔巴乔夫难堪，因为在苏联设立总统职位时，戈尔巴乔夫曾避免这样做。但是在 1990 年夏秋之交，叶利钦想推行总统制却得不到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的支持。

不过，在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中，他已直接同戈尔巴乔夫对抗并

且获得了胜利。当戈尔巴乔夫的威望开始下降时，他的威望正在上升。

具有独立主权的俄罗斯〔372〕

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大约两星期后，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投票表决宣布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为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它当然并不是苏联 15 个加盟共和国中第一个宣布独立的加盟共和国——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加盟共和国和阿塞拜疆早已率先这样做了——但是俄罗斯宣布主权独立在政治上的影响之大是无可比拟的。俄罗斯的行动引起其他加盟共和国争先恐后地仿效，到年底以前所有 15 个加盟共和国都通过了“主权独立”声明。

早些时候，波罗的海沿岸诸加盟共和国议会通过的声明显然是朝着脱离苏联的目标迈出了一步。但就俄罗斯和大多数其他加盟共和国而言，其行动是模棱两可的。在严格的法律意义上，主权声明是多余之举，苏联宪法中已经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拥有“独立主权”，宪法这样写道：“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是具有独立主权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各加盟共和国联合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③

随着苏联统治的逐步发展，宪法中规定的主权就像脱离权一样变得有名无实，通过主权声明或主权的恢复，各加盟共和国实际上确认它们有权根据它们自己的条件而不是莫斯科方面的条件来重新谈判“联盟条约”。戈尔巴乔夫答应建立一个以自愿为基础的“真正联邦”，但到 1990 年夏，事情已十分清楚，他所设想的谈判是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谈判，而中央政府对权力分配有最后的决定权。越来越多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觉得戈尔巴乔夫出尔反尔：他们开始支持叶利钦的观点，即各加盟共和国作为一个主权实体应该自己决定它们所希望的联盟形式，然后再把它们的意愿强加给中央政府。

对于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原则，戈尔巴乔夫无法反对。他在 1990 年 5 月 23 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致辞中说，他对他们提出的主权问题表示赞赏，并宣称他全力支持“你们要求增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主权的努力”。④然后，他提出了他认为应采取的增强主权的一系列措施，诸如增加经选举产生的各个层次的议会（苏维埃）的权力；给予各加盟共和国〔373〕经济资源使用权；提高各个民族的文化生活水平。戈尔巴乔夫的这些建议中没有一条能够增强加盟共和国的自治权。

戈尔巴乔夫当然不会承认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但是他认为他的主权概念与叶利钦的主权概念之间的差别在于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不同态度。他觉得叶利钦是要让各加盟共和国放弃社会主义，甚至摆脱苏联的领导，并指出叶利钦已提议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称简化为“俄罗斯共和国”，把“社会主义”和“苏维埃”两个词省略。⑤他断言，这种对主权的解释只能导致联盟的瓦解。

这些言论作为一种无可辩驳的言词，无疑是针对叶利钦的建议的，但它似乎并不是很有预见性。放弃“社会主义”和苏维埃的政府形式并不会自动导致苏联的瓦解。就在这一年之内，戈尔巴乔夫本人也建议把苏联改名为“主权国家联盟”，放弃了仅在一年前他还为之辩护的两个基本目标。同时，他维护中央集权控制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成为他建立一个自愿联盟的障碍，而他一直宣称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自愿基础上的联盟。

不过，俄罗斯主权宣言在两方面对随后的局势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虽然这两方面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第一方面，也是较为深刻的方面，即暗

示了俄罗斯应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来加以界定；第二方面与当时的政治更直接相关，即对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地位产生影响。

纵观苏联的历史，俄罗斯在各加盟共和国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尤其作为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加盟共和国，它本身就是一个正式的联邦，但它本身的机构非常软弱无力。在大多数方面，它直接由苏联各部部长管理。像其他各加盟共和国一样，“俄罗斯共产党”没有正式分离出来。苏联科学院掌管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科学研究，而其他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科学院。苏联文化部控制着俄罗斯主要的影院、歌剧院、博物馆和图书馆，但并不控制其他加盟共和国的这类设施。在理论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是 15 个加盟共和国之一,但实际上其大多数机构与苏联的机构合并在一起。

这使公众对“俄罗斯”的自身特性产生了混乱的概念。尽管〔374〕名字不同，但它实质上能等同于苏联，是俄罗斯帝国的直接继承者吗？或是它的范围更小一些，仅限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边界以内？苏联在法理上说的是一回事，但在实践中常常指的是另一回事。对那些赞许第一种解释的人来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脱离苏联的观念在逻辑上是荒谬的。俄罗斯的一部分脱离俄罗斯怎么仍旧还是俄罗斯呢？不过，对那些赞成第二种解释的人来说，如果俄罗斯有必要摆脱共产党中央集权的控制，或有必要解除支持苏联其他欠发达加盟共和国的义务的话，脱离将是一个理智的办法。

当俄罗斯发表它的“主权宣言”时，它含蓄地承认了俄罗斯国家与整个苏联相比只是一个更有限的实体。⑥从逻辑上讲，如果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发表主权声明，其他 14 个加盟共和国也要求同样的权利，这意味着它们不是俄罗斯固有的组成部分。从政治上讲，如果其他加盟共和国想以同等的地位谈判新联盟条约的话，俄罗斯人的行动便要求它们也声明自己的主权。

鲍里斯·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议会主席，以及他赞成通过主权声明，使他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政治斗争发生了变化。他不再仅仅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相对不重要的立法委员会主席，不再仅仅是仍很弱小且未形成组织的反对派假定领袖，而是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的领袖。以前，他的目标旨在迫使戈尔巴乔夫让他重返苏联的领导班子并对他的建议给予注意。现在，他拥有独立于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基础。如果他能控制已与他发生分裂的立法机关并与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领导达成共识，他可以迫使戈尔巴乔夫让出许多权力，如果不能成功地控制立法机关，他可以对联盟本身表示非议。他们之间的政治游戏与从前相比更带有“零和”特征——尽管戈尔巴乔夫自 1987 年以来似乎就持这样的看法。

在 1990 年，通过破坏联盟来攻击戈尔巴乔夫的可能性仍旧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叶利钦再三——我认为他是认真地——指

出，俄罗斯不应强迫联盟解体。支持叶利钦的大多数人也持相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叶利钦竟选的胜利和俄罗斯的主权声明可作为对戈尔巴乔夫的压力，迫使他下放经济决策权，并与叶利钦携手进行经济改革。

属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跨地区代表小组”成员以及刚当选〔375〕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民主俄罗斯”成员中的改革者们认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促成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的合作。戈尔巴乔夫似乎已转向反对党

内的改革派，他对那些批评他设立总统职位的人发起了怀有偏见性的个人攻击，并支持中央委员会发布要求他们脱离共产党的通知，这使改革者们忧心忡忡。我几乎每天都可见到一些改革者，在与他们的交谈中，几乎所有人都提到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之间有必要进行政治和解。

事实上，莫斯科的社会话题像华盛顿长期以来一样，主要集中在政治方面。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4 月份，我参加了维多克与奥克萨娜婚礼的庆祝晚宴。维多克是跨地区代表小组成员，当选为莫斯科我们大使馆所在地区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我们开玩笑地称他为“ 我们的国会议员 ”。叶利钦是那天婚礼上最得意的人，并成为舞会的中心人物，他邀请所有在场的女士们跳舞，并频频向新婚夫妇祝酒。

不过，在频频的祝酒中间，话题一律是非常严肃的。奥克萨娜的客人是来自她所在单位克里姆林宫博物馆的馆员，而维多克的客人们则都是政治家。尽管事实上“ 民主俄罗斯 ”在 3 月份的选举中成为仅次于共产党的第二大政治力量，但是潜在基调是不祥的。国家似乎正在走向土崩瓦解，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的争斗如果不能制止就会导致混乱和内战。参加婚礼的客人们一个又一个跟我谈到有必要找到一种办法促使他们两人合作。

晚宴的主持人根里赫 · 伊吉济扬是一名苏联人代会代表，负责埃里温现代艺术博物馆，他的话更是一针见血。在嘈杂的音乐声中，他对着我的耳边大声喊道，“ 我们必须拯救戈尔巴乔夫和拯救立陶宛 ”，“ 那些强迫立陶宛留在苏联的人一有机会就会把戈尔巴乔夫撵下台的。只有与叶利钦联合才能拯救他和立陶宛 ”。正如伊吉济扬和晚宴上的其他政治家所意识到的那样，真正的悲剧是戈尔巴乔夫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376〕俄罗斯共产党

当其他各加盟共和国的分裂主义倾向正在加强时，俄罗斯的共产党员们建立一个独立的“ 俄罗斯共产党 ”的要求也在增强。1922 年苏联建立，共产党的名称从“ 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改成了“ 苏联共产党 ”，从那以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就一直没有独立的共产党组织。好像是要故意混淆两种“ 俄罗斯 ”含义间的区别，共产党领导人坚决反对在俄罗斯建立一个类似于其他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组织。

早在几年前，我常常问俄罗斯的官员们，他们是否认为一个独立的“ 俄罗斯 ”共产党是令人满意的。共产党员中的普通成员常常说，他们认为建立一个独立的“ 俄罗斯共产党 ”是令人满意的。共产党的现有体制实际上是歧视俄罗斯人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不过，高级官员站在现时的立场上，认为没有任何必要建立一个这样的组织。例如，1989 年在一次电话交谈中，我向俄罗斯总理亚历山大 · 弗拉索夫提出这个问题。总的说来，在谈到他自己的观点时，他比其前任们更加坦率，但是这一次他赞成官方的立场，认为俄罗斯建立一个独立的共产党组织是不受欢迎的。他解释说，目前的情况是：一有问题他可以直接把它提交给苏联政治局做出决定。但是，如果建立了俄罗斯共产党组织，他必须先通过它，然后再提交给政治局。他说，仅仅是增加了一个决策过程的官僚层，却减弱了俄罗斯政府的影响力。

1990 年春季时，戈尔巴乔夫也反对建立“ 俄罗斯共产党 ”组织。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机构向中央提出挑战和非共产党政党开始在俄罗斯内纷纷建立时，共产党内部赞成建立“ 俄罗斯共产党 ”的人急剧增加。当时任苏联共产党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该机构是苏联共产党内部进行秘密民

意调查的机构）的伊万·安东诺维奇后来告诉我，到 1990 年春季，俄罗斯65%以上的共产党员同意建立一个独立的俄罗斯共产党组织。⑦5 月下旬，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致辞时，终于同意建立俄罗斯共产党组织。6 月份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共产党官〔377〕员们开始疯狂地做组建俄罗斯共产党的准备。

要么是因为时间过于仓促，要么是因为专注于其他事情（在此期间他花了近一个星期访问美国），要么是因为政治上的失算（诸如他在 5 月份向中央委员会致函严厉指责改革者），戈尔巴乔夫对这一发展进程失去了控制。6 月份，俄罗斯共产党组织的代表进行了集会，这次会议成为俄罗斯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当时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者明显占少数。⑧实际上，似乎是最顽固保守的地方党组织领袖之一、来自克拉斯诺达尔（该地区邻近戈尔巴乔夫的家乡斯塔夫罗波尔）的伊万·波洛兹科夫将可能出任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任书记。他是众所周知的对改革抨击最厉害的人。

戈尔巴乔夫试图阻止波洛兹科夫当选，可为时已晚。伊万·安东诺维奇详细讲述了这一过程，那天午夜过后他在家里接到一

个电话，电话里说戈尔巴乔夫想立即见他，来接他的车正行驶在路上。他到达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时大约是凌晨 2 点，戈尔巴乔夫非常憔悴，显然几天没有睡觉了。安东诺维奇回忆说：“ 他的脸色非常阴沉。 ”“ 戈尔巴乔夫非常疲惫时，他的脸上就黯然失色。 ”

戈尔巴乔夫告诉安东诺维奇，他作为俄罗斯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一名成员，要尽一切可能避免波洛兹科夫当选。安东诺维奇同意尽力阻止波洛兹科夫当选，但是他发现支持波洛兹科夫的势头非常之大，此时离投票只有几个小时，已不可能阻止了。⑨同一天的晚些时候，俄罗斯共产党代表大会选举波洛兹科夫为第一任书记。这样一来，尽管安东诺维奇当选为俄罗斯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但是新的共产党组织——迄今为止苏联共产党最大的单位——仍处于戈尔巴乔夫的批评者的控制之下。

当时，我并不知道戈尔巴乔夫阻挠波洛兹科夫当选所进行的最后一分钟的努力，但是每个人都很清楚的是，新的俄罗斯共产党组织不会支持戈尔巴乔夫所主张的改革，而且很可能会阻挠改革。这当然是戈尔巴乔夫所不欢迎的，但是如果他的目的是为了剥夺共产党官员在政府管理中的作用的话，他的候选人的失败则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他在共产党之外建立一个权力基础的欲望现在更加强烈了。

〔378〕但是，改革派被激怒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仿效尤里·阿法纳西耶夫，纷纷宣布脱离共产党。

鲍里斯·叶利钦却并不在乎建立俄罗斯共产党。在他当选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几个星期后，他和奈娜接受了邀请参加我们在斯帕索住所举办的晚宴，我问他俄罗斯共产党反改革的领导人是否对他是个问题。“ 根本不会是个问题，” 他天真地咧着嘴笑着回答，“ 他们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打算掌管俄罗斯政府。 ”

我问他是否打算留在共产党内。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回答说，他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他打算参加只有几天就要召开的共产党代表大会，看一看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是共产党改革其自身的最后一次机会。

奈娜然后讲了一句：“ 当你毕生和一个组织密切相联时，马上就脱离它并不那么容易。 ”

几个星期后，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感情冲动地大踏步离开了共产党代表大会，他脱离共产党这一组织看起来很容易。

波罗的海地区的僵局

在对立陶宛施加了不公正的经济制裁后，戈尔巴乔夫似乎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经济和军事压力不仅没有动摇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独立决心，反而增强了它们的反抗意识。苏联军队、克格勃与共产党内的保守势力正迫使戈尔巴乔夫采取果断的行动使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与中央保持一致，但是他不能冒使用武力的风险。他决定在 5 月底出访美国，并希望签署一个贸易协定。苏联经济比以前更加脆弱，新闻媒体和公众舆论正在谈论国家的危机。他迫切需要西方的大量援助来减缓经济的衰退。武力镇压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将会使得到西方大量援助的希望成为泡影。

5 月份，当国务卿贝克为华盛顿美苏首脑会议做准备而访问莫斯科时，立陶宛是会谈的主要话题。贝克继续施压，要求苏联与立陶宛两党之间进行真正的谈判，并决定与苏联领导人会谈之后将与立陶宛总理普隆斯基涅会谈。

当初，在私下讨论时，谢瓦尔德纳泽告诉我们要戈尔巴乔夫〔379〕同意就波罗的海沿岸诸加盟共和国独立进行谈判没有任何希望。实际上，他一反常态，教训了贝克一通。当贝克指出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法律地位与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法律地位要区别对待时，谢瓦尔德纳泽反对说，高加索地区的人民完全像波罗的海沿岸诸国一样强烈感到他们是被迫并入苏联的，中亚的许多加盟共和国也这样认为。他还指出他虽不喜欢以此作为“内政”问题而回避讨论，但美国应该理解苏联是个大国，有它的尊严。他和戈尔巴乔夫愿意尽量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但苏联的统一对他们更为重要。如果他们允许任何共和国脱离联盟，内战将随之而发。

他进一步指出，戈尔巴乔夫因这一问题而受到了强烈批评，有些人还提到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是比他更为有效的领导。如果这种情绪占了上风，过去五年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会付诸东流。

他讲的许多话都是人们所熟悉的，但是谢瓦尔德纳泽第一次公开地告诫我们，如果被迫在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和维护苏联领土完整之间选择，戈尔巴乔夫将会选择后者。谢瓦尔德纳泽的讲话和普里马科夫 4 月份所作的讲话如出一辙。

第二天，戈尔巴乔夫装出愿意和解的样子。他刚和立陶宛总理会谈过。我们认为这可能是一个信号：在去美国进行他的第二次华盛顿美苏首脑会晤之前，他将准备结束对立陶宛的经济制裁。他没有答应就立陶宛独立问题进行谈判，他说，如果立陶宛人“取消”他们的独立声明，他立即成立一个对话委员会并结束他所施加的经济制裁。贝克知道立陶宛人可能觉得不去实行他们的独立声明要比取消他们的独立声明本身更容易接受些，因此就问戈尔巴乔夫，如果满足了这一要求，他该怎么办，但戈尔巴乔夫没有直接回答。

与戈尔巴乔夫会谈之后，贝克来到斯帕索别墅与普隆斯基涅女士会谈。陪同她一起来的还有兰茨贝吉斯的两位副手：勃罗纽斯·库兹米卡斯和谢斯洛瓦斯·斯坦凯维休斯，以及立陶宛驻莫斯科代表艾吉迪尤斯·比斯卡多斯卡斯。直到那时虽然我还不知道普隆斯基涅和兰茨贝吉斯之间关系紧张，但是她所带领的代表团的构成表明，兰茨贝吉斯是派他的两名副手来监视她。她应该〔380〕带她自己的副手或助手更合乎常规。几个月后，当她被迫辞职

时，我已有所准备，因而并没有感到特别惊讶。

与兰茨贝吉斯相比，普隆斯基涅也同样献身于立陶宛的独立事业，但她更是一个谈判的高手。她避免只是重复口号和装腔作势——这是兰茨贝吉斯的习惯——她知道如何去聆听其他人的建议和看法，并知道如何机智地对这些建议和看法做出答复。那天，她主要担心的是取消立陶宛独立声明的行动是否表明立陶宛自愿承认接受苏联的管辖。贝克向她保证说，在这一点上不论立陶宛决定采取什么行动，美国将坚决坚持其不承认政策。尽管他没有给立陶宛人提任何建议，但是他话中的言外之意很清楚：如果立陶宛取消其独立声明，与莫斯科进行谈判，它并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失。

普隆斯基涅与贝克进行会谈之后，我送她到大门口，我问她何时返回维尔纽斯。她回答说将乘立陶宛政府的飞机立即返回。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细节。莫斯科一方面拒绝接受立陶宛的独立声明并对立陶宛政府施加各种压力，同时又允许立陶宛在许多方面从事独立活动。立陶宛“政府的飞机”无疑是指苏联在立陶宛发表独立声明之前就已分配给它的苏联民用航空总局的飞机。立陶宛领导人现在可以用它自由地往返莫斯科以及其他地方。这再一次证明，戈尔巴乔夫尽管口头上敌视立陶宛，但并没有打算完全击败这些选举产生的立陶宛领导人，以保留某种谈判的可能性。

美苏首脑会议期间，对立陶宛问题的讨论没有达成新的解决办法，但是戈尔巴乔夫希望签署一个贸易协定，为美国反对使用武力提供了某种制衡力量。我早些时候就已建议当莫斯科 4 月份实行经济制裁时，有关贸易协定的谈判应该停止，但是现在谈判继续进行，条件是直到停止对立陶宛的制裁，贸易协定方可生效。〔381〕但是，这不是唯一与贸易协定有关的问题。我们曾再三地告诫苏联领导人，直到苏联政府通过一项法律保证移民自由，美国总统才会签署一项贸易协定。立法草案几个月之前就已提交给最高苏维埃，但戈尔巴乔夫出访华盛顿时还没有通过。

戈尔巴乔夫抵达华盛顿的前一天，布什与他的顾问们讨论了这个问题。虽然他没有做出最后决定，但他显然倾向于直到最高苏维埃通过一项可接受的移民法以及戈尔巴乔夫取消对立陶宛的制裁，他才同意签署贸易协定。第二天，当美苏首脑会谈开始时，国务卿贝克告诉谢瓦尔德纳泽，考虑到当前的形势，布什总统可能不会签署贸易协定。谢瓦尔德纳泽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恼火，并指出协定都已经对外公布了，如果布什拒绝在上面签字，双方的冲突情绪会重新出现。他强调与立陶宛人的对话已经开始，移民实际上已不受任何限制。

此后有关问题的谈判由布什和戈尔巴乔夫私下里进行，当双方高级官员 6 月 1 日聚集在白宫东厅参加签署首脑会议期间所达成的协定时，谈判仍未结束。裁减化学武器协定已准备就绪，等待签字了，但对于贸易协定，布什当时还没有决定是否签署。

戈尔巴乔夫最后说服布什签署了贸易协定，但是他不得不接受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已经公开宣布，即最高苏维埃通过移民法案后布什才把贸易协定提交给国会；第二个条件仍然是秘密不公开的，即贸易协定得到国会批准之前戈尔巴乔夫必须解除对立陶宛的经济制裁。

戈尔巴乔夫参加美苏首脑会议后回到莫斯科不久，对立陶宛的施压开始停止。6 月 12 日，兰茨贝吉斯与戈尔巴乔夫进行会谈，第二天与雷日科夫进行会谈，并得到增加天然气供应的许诺。兰茨贝吉斯回到维尔纽斯以后，普

隆斯基涅向立陶宛最高委员会建议，在与莫斯科进行谈判期间，独立声明处于“暂停”阶段。然而，这一建议虽然得到了总理和议会主席的支持，但是在最高委员会中却引起了比〔382〕预想严重得多的争论，直到6月30日才得以通过。

这一决定带来了制裁的正式终结，并改善了维尔纽斯与莫斯科之间对话的气氛。但僵局仍未打破。莫斯科方面继续坚持谈判要么根据脱离法进行，要么在新的联盟条约的背景下进行，而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加盟共和国则坚持独立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唯一可讨论的问题是如何独立。

德国——欧洲——统一

到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抛弃了德国的统一是将来的事情的幻想。两人都曾希望等到他们的继任者来处理这一问题，可现在他们被迫应付这一现实问题。当他们意识到他们已难以阻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倒向西方这一政治浪潮时，他们便希望能为这一进程规划出一个结果。包括叶戈尔·利加乔夫在内的共产党保守派与苏联军方领导人一起，企图阻止德国统一，并不惜一切代价保存东德。长期研究德国问题的专家，诸如前苏联大使瓦连金·法林，现在是共产党国际部主任，意识到要阻止两个德国的统一是不可能的，但是他指出，统一后的德国应该脱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并发誓保持中立。

苏联领导人对如何实现统一也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同意东西德政府通过渐进的谈判过程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的话，在几年之内仍可保持分裂和各自的主权。这就允许苏联军队继续留在东德较长的时间，也许这一不确定时期将为苏联在外交上影响德国统一的条件提供机会。如果两德基于赫尔穆特·科尔总理的讲话、根据西德宪法第23条实现统一的话，苏联就会失去这些优势。按照这种方式，东德单独遵循联邦德国的宪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完全消失了，它的宪法成分吸收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中，而后者的宪法结构没任何的改变。

〔383〕苏联领导人在这些问题上采取了强硬的立场。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汉斯·莫德罗于3月5—6日访问莫斯科时，戈尔巴乔夫对新闻记者说，统一后的德国不论以何种形式参与北约都是“绝对不允许的”。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新闻发言人宣称苏联政府已经同意，德国统一不能根据西德宪法第23条来实现，柏林的一家报纸引用谢瓦尔德纳泽的话，表达了同样的意思。（11）但是，一些苏联官员很快做出暗示，苏联的态度不可能像官方声明所说的那样强硬。他们都知道苏联很想与统一后的德国建立一种友好关系，他们期望不要被看作是德国民族意愿的敌人。

4月份，接替普里马科夫担任享有盛誉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职务的弗拉德伦·马季诺夫在我的斯帕索住处共进晚餐时对我说，“某些西方国家”（指英国和法国）在德国统一前景问题上的态度比苏联更加暧昧，但是在它们看来，苏联是强烈阻挠德国迅速统一的国家。马季诺夫说：“它们不得不感到惊奇，我们不打算承担阻挠德国要求统一的自然愿望的责任。”

1990年初，驻莫斯科的大多数西方外交官，包括我本人在内，对戈尔巴乔夫同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立即消亡、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以足够的权威使改革继续下去以保证他政治上的存在不抱太多的希望。未来的北约将统一后的德国包括在内不会损害苏联的利益。实际上，从苏联安全的角度来看，应该鼓励德国留在北约。德国作为北约成员国为反对将来某些德国政府决定

拥有核武器——对苏联领导人而言是最大的安全噩梦——提供了保证。戈尔巴乔夫知道，美国在欧洲、特别在德国的某些军事存在，也是苏联的利益之所在，北约是这一点上唯一的法律和政治基础。（12）他希望美国在欧洲的驻军少一些，但并不想让他们全部撤离欧洲。

问题不在于戈尔巴乔夫不明白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对苏联安全不会有威胁，而在于他难以向自己的人民解释这一点。华沙条约组织已经处于崩溃的最后阶段，北约扩大到包括所有的德国，苏联军队放弃了这一地区，苏联其他的“盟国”或保持中立，或成为潜在的敌人，公众仿佛觉得苏联打了一场败仗。〔384〕

国务卿贝克认识到 1990 年初各方所面临的问题,并且主动带头创造一个谈判的框架，在减少戈尔巴乔夫所面临的政治问题的同时，允许德国及其西方盟友实现它们的目标。

贝克在 1 月份访问莫斯科时，向谢瓦尔德纳泽提出了一个谈判方案，他把该方案称为“2＋4”方案。也就是说，两个德国谈判统一的内部安排，然后加上二战后对德国具有占领权的四个大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谈判有关统一的“外部方面”的问题。

谢瓦尔德纳泽而带微笑首先问道：“来一个‘4＋2’怎么样？”贝克回答说，这两个阿拉伯数字的顺序在数学上可能无关紧要，但在政治上就不一样了。外部大国不可留下是它们在安排德国统一的印象。东西德首先必须相互之间协调，只有那时其他四个国家才参与谈判。经过进一步的讨论，戈尔巴乔夫点头后，谢瓦尔德纳泽接受了这一方案。

3 月份，西德总理科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选举中赢得了压倒性多数的胜利，所获选票是它的主要竞争对手社会民主党的两倍以上，这时，已经很迅速的德国统一步伐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势头。东德基民盟领袖罗塔尔·德梅齐埃担任东德的总理后，与科尔总理密切配合，按照科尔的建议推进德国的统一进程。在 3 月初莫德罗访问莫斯科的两个星期之内，形势已逐渐明朗，德国统一将通过东德并入西德来实现，而不是通过两个主权国家的逐渐联合来实现。莫斯科操纵软弱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苏联的利益与波恩进行谈判的企图证明是一种幻想。这也加剧了戈尔巴乔夫在国内面临的政治问题。消除东德共产党政治影响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选举刚好发生在立陶宛宣布独立一个星期后，即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总统几天之后。

在科尔总理的积极合作以及征得其他北约盟国同意的情况下，〔385〕贝克提出了改革北约机构和原则的一揽子计划，并就此于 5 月份在莫斯科与戈尔巴乔夫进行磋商。他解释说，将会出现一个新北约和一个新德国。戈尔巴乔夫竭力寻找一种方法使国内政治免受因德国问题而引起的爆炸性争议的影响，他尽力使北约看起来对苏联公众的威胁小一些。谢瓦尔德纳泽对北约布鲁塞尔总部进行了一次正式的访问，并对北约于欧洲安全的贡献说了一些称赞的话。他还邀请北约秘书长曼夫里德·韦尔纳访问莫斯科。

但是，事态的发展是如此迅速，甚至外交上的急速调整都很难跟上形势的发展。5 月 18 日与贝克会谈期间，戈尔巴乔夫继续坚持不同意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因为它意味着力量平衡的“根本改变”，并且看起来像是苏联的失败。当贝克列举了美国、德国以及它们的盟国试图考虑苏联利益的种种办法时，戈尔巴乔夫坚持说，围绕德国中立，欧洲需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安全

结构。虽然他没有确切详细地说出他的心里话，但他显然是认为西方也应采取与华沙条约组织解体相应的行动。当贝克指出北约绝对不会通过解散其自身来维持某种力量平衡时，戈尔巴乔夫说，他本人可能被迫申请成为北约成员国。虽然他向惊讶得瞪大了眼睛的贝克保证他完全是认真的，他却没有对苏联成为北约成员国这一问题做进一步的解释。最后，戈尔巴乔夫承认贝克提出了一些有充分根据的观点，并表示他将给予认真考虑，从而结束了有关德国问题的讨论。

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对我们强调的是政治因素，而他们对德国人谈论的是金钱。当科尔的国家安全顾问霍斯特·泰尔奇克于 5 月份在莫斯科和苏联领导人秘密会晤时，雷日科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详细地谈论了苏联的经济困难，并强调需要大量的贷款。愤世嫉俗的人会蔑视这种敲诈勒索行为，但现实主义者不应感到惊奇，要使戈尔巴乔夫同意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就必须让他得到某些看得见的利益来平衡他付出的政治代价。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一结束，戈尔巴乔夫就迅速采取行动，全身心处理德国问题。在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即将结束之际，北约秘书长韦尔纳于 7 月份对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我和各国大使们〔386〕在用来迎接国家元首站台上等候着向他致意，我感到非常惊奇的是，一排排北约的旗帜迎风飘扬。近五年前，苏联猛烈的宣传运动还把北约诬蔑成一个罪恶的、决心发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侵略性联盟。而现在北约秘书长正受到国家元首的礼遇，该联盟还被描绘成国际和平与安全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终，德国做出了让步，满足了戈尔巴乔夫对签署协议提出的条件。当作为整体的美国和北约协力合作重新确定北约的使命时——这些决定在 7 月 5—6 日的北约首脑会议上正式成文——只有德国人能够提出限制他们的军队数量和提供各种类型的财政援助，以减轻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困境。6 月 15 日，科尔总理去莫斯科与戈尔巴乔夫进行会谈，最初会谈在靠近戈尔巴乔夫家乡的基斯洛沃茨克举行，然后又转移到莫斯科，最终达成了协议。德国军队限制在 37 万人以内；德国支付 120 亿马克（约 80 亿美元）以加快苏联军队撤离德国；签订友好条约并提供其他形式的经济和技术援助。

这样，在基督教民主联盟在东德选举中获得胜利之后的四个月内，德国统一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几周之内进行了最后文件的谈判和签署：8 月 31 日签署“德国统一条约”；9 月 12 日签署“2＋4”条约；9 月 13 日签署“苏德友好条约”；10 月 1 日达成了结束四大国对德国和柏林占领权的协议。

迟至 1989 年夏，德国统一似乎仍是一个遥远的目标，而在 1990 年中欧的树叶枯黄落地之前却已成为现实。事态发展如此迅速，以至于许多西方人在经历了最初的惊奇和不相信之后，开始认为德国的统一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几乎是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无疑，人为造成的东德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它命中注定会走上逐渐崩溃的道路，因为它从来就没有合法性：它显然是外部大国强加的一种组织结构。不过，解决德国重新统一问题和结束欧〔387〕洲大陆人为分裂的时机、做法和形式并不是必然的。我相信历史会把 1990 年 3—6 月间进行的谈判作为一种外交模式,也会把谈判结果看作是政治家们最显著的成就之一。

“但戈尔巴乔夫是否因地位太软弱而无力反对呢？”怀疑论者可能会问，“他的国家正在四分五裂，他在国内的地位如此脆弱，这使他几乎无法与西方的要求对抗。西方国家必须做的唯一事情是决定他们想要做什么，其

余的事情都会自然而然地发生。”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虽然冷战结束后苏联不再能够在国外运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但戈尔巴乔夫在德国统一的谈判中仍可扮演捣乱者的角色，从而提高他在国内的政治地位。虽然他不能关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边境并在东德重新强加一个傀儡政权，但他也无需为统一唱赞歌。他在东德有 37 万军队，德国和北约其他国家都不能使用武力驱逐他们。统一后的德国要想保持稳定，至关重要的是苏联同意这种统一的安排，同意从东德撤出苏联军队。在德国和北约盟国看来，至关重要的是苏联取消其对德国领土的所有特权要求，并承认德国有权自由选择其盟友。戈尔巴乔夫本来完全可以拒绝参与这种统一的安排。如果是这样的话，德国人会面临这样一种困境：他们或是成为北约的成员国，或是统一，但不会同时得到二者——至少当时不会。总有一天，要求接受中立的舆论压力将会增长。

在西方领导人中，对德国统一谈判的成功贡献最大的有两个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和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科尔看准了时机，并知道当具备了有利于达成协议的条件时就应该抓住。贝克发起了外交努力，他认识到应该允许德国人自己决定他们统一的内部安排，并抵制脱离北约的压力，同时他也认识到要使戈尔巴乔夫在条约上签字，还必须给他一些好处作政治“掩护”。

戈尔巴乔夫当时受到了指责，自苏联解体以来也一直受到攻击，说他在德国统一问题谈判期间没有充分地维护苏联（和俄罗斯）〔388〕的利益。这种指责无疑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当一个国家经历了许多的冲击，而这种冲击又震撼了俄罗斯和前苏联地区的其他国家时。但是，这些指责是错误的。德国统一的解决办法显然考虑到了当时苏联——即今天的俄罗斯——的利益。一个统一的德国几乎不会对苏联构成威胁，条约只允许它保留不多的军队，其中的大部分处在北约的指挥之下。一个友好、繁荣的德国是苏联或俄罗斯有益的贸易伙伴和潜在的投资者。要明白这些好处，就要求用“新思维”来取代二战时的态度和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并承认当一国不再试图用武力征服邻邦时，邻邦将会更友好和更有用。

当戈尔巴乔夫签署协议时，他是绝对忠于他的国家利益的。他抛弃了过去的成见，认识到国家真正利益之所在，抵制了国内要求走一条不同道路的政治压力，他的这些功绩应该载入史册。他面对的这些压力都是实实在在的，在 7 月初召开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十分明显。直到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结束之后，他才与科尔签署协议并不是偶然的。

被排斥的苏联共产党

戈尔巴乔夫没有确立对新的俄罗斯共产党领导权的控制，因而增加了几天以后召开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的风险。虽然这次党代会打上了尖锐批评戈尔巴乔失政策的烙印，但是党代会在选举高层官员时还是接受了戈尔巴乔夫的建议。

不过，选举的结果表明，政治局和书记处没有被改革派控制。

新的共产党领导人由中间派组成。政治局以前的“左派”和“右派”的忠实成员大多已退出或被迫辞职：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都退出了政治局，一些不大被公众所熟知的人物取而代之。戈尔巴乔夫保住了他总书记的职务，（虽然有近 1/4 的代表投票反对他），（13）他提名弗拉米基尔·伊瓦什科担任新设立的副总书记的职务，结果也获得通

过。伊瓦什科在此之前曾接替弗拉米基尔·谢尔比基茨担任乌克兰共产党书记。

利加乔夫并不是悄悄地离开他的领导岗位的。他不仅强烈要求戈尔巴乔夫辞去共产党领导职务，而且反对由伊瓦什科担任共〔389〕产党副总书记的职务。虽然他的这些努力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他也得到了数量相当可观的代表的支持。

党代会上的许多言论清楚地表明，戈尔巴乔夫与西方建立友好关系的外交政策不再是纯粹的政治资本。事实上，外交政策已成为公众争议越来越大的问题之一。越来越多的人谴责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丢失了东欧，指责他们允许德国重新统一而丧失了二战的胜利果实。但许多人仍旧避开直接攻击戈尔巴乔夫，而把他们的矛头集中指向谢瓦尔德纳泽。

谢瓦尔德纳泽毫不犹豫地进行反击，以他外交生涯中最动人、最感人的演讲来答复他的批评者。关于丢失东欧的问题，他说：

同志们……当我们 1956 年用武力入侵匈牙利时，当我们 1968 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当我们入侵阿富汗时，当我们在改革年代前与中国发生纠纷时，我们丧失了我们的战略盟友。波兰的危机不是伴随改革而开始的，而是在改革开始很久以前就开始了。

谈到德国，他否认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送给波恩的任何“交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将自己来决定其命运，这就是事实的全部。”他解释说。（14）

戈尔巴乔夫为其外交政策辩护时不是很积极，但这只是反映了他政治上的谨慎，并不说明他将会改变其外交政策。

当我分析了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的结果后，我的感情非常复杂。党代会上的争论已经表明，在共产党内部，反对改革的势力正在迅速发展。但这并没有阻止戈尔巴乔夫再一次达到他的目的。选举领导人实行无记名投票，这是一种创新，是自斯大林掌权以来第一次实行真正选举的党代会。

然而，新政治局中没有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这样重要的改革派人物。与前一届政治局相比，唯一的好处是它缺乏影响力：戈尔巴乔夫在需要时可以更轻易地对它置之不理。这确实是他秘而不宣的目标。在党代会上，他的反对者对他指责最多的一点，就是他在做出决策前不同政治局商量。不〔390〕过，尽管党代会上许多人强烈批评他的对德政策，但是党代会结束后刚过几天，他就与科尔总理达成协议。新的政治局并没有表现出不满的迹象。

总之，党代会的结局与我对戈尔巴乔夫意图的猜测是一致的。虽然他没有赢得对更加激进的改革措施的响亮赞同，但是他得以保住共产党领导的职务，并实际上降低了共产党中央机构的权力。他现在所处的地位很适合与改革派结成联盟，将来如果共产党机器反对他，他便可以将其抛弃。

在 1990 年 7 月的时候，至少在我看来情况是这样。独立热潮俄罗斯的主权宣言在其他加盟共和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6

月份宣布拥有主权的有乌兹别克斯坦和摩尔达维亚；（15）7 月份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8 月份是土库曼斯坦、亚美尼亚和塔吉克斯坦。到 10 月底，所有的 15 个加盟共和国要么宣布拥有主权，要么宣布完全独立。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领导人仍试图与戈尔巴乔夫联合组成一个联邦，它们是最后宣布主权独立的两个加盟共和国。

1990 年的春夏，我到摩尔达维亚、乌兹别克、土库曼、哈萨克以及俄罗斯的一些自治共和国如乌德穆尔特和布里雅特作了一趟旅行。与一年前相比，它们的态度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

基什尼奥夫以前是个静谧的省城，而我们 5 月初到达那里时却热闹异常。摩尔达维亚议会几个月前通过了一项语言法，规定其语言恢复使用拉丁字母。这种语言已正式被称做摩尔达维亚语，但与罗马尼亚语非常接近，就像美国所用的语言与英语一样接近。该法律还要求社会公共部门（诸如邮局、储蓄所、医院等）服务人员在五年之内学会使用摩尔达维亚语。与此同时，传统的罗马尼亚蓝、黄、红三色旗取代了苏联的红旗。

摩尔达维亚人因胜利而喜气洋洋，并且已计划好周末在与罗〔391〕马尼亚接壤的普鲁特河岸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项活动。那天，摩尔达维亚人与跨过边界的罗马尼亚人欢聚在一起，互送鲜花。甚至连当地的共产党也同意举行示威游行——去年夏天反对“波罗的海之路”的举措徒劳无益，他们可能从中吸取了某些教训。共产党第一书记卢钦斯基告诉我说，他打算以个人身分参加这次示威游行。

但是，该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人深切感受到当地民族主义浪潮的威胁。一天晚上，我和丽贝卡在当地一家餐馆的包间用晚餐时，我们亲眼目睹了双方之间激烈的争论。人民阵线的两位领导人伊翁·纳迪尔萨和伊翁·温古雷安努也与我们共进晚餐，他们来了以后就提出他们不得不提前离席，因为他们要接受一个电视采访。德涅斯特河东岸的两个城市捷尔诺波尔和宾杰里的地方委员会拒绝悬挂新的摩尔达维亚国旗。这两个城市的人绝大多数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因此，这一行动是为了抗议摩尔达维亚人日益增长的武断行为。摩尔达维亚最高苏维埃当天进行了投票表决，宣布这两个城市地方委员会的行动违宪。同我们共进晚餐的两位客人当天晚上被邀请对电视观众解释这一立场。进餐时，我问，他们觉得德涅斯特河东岸的挑战的严重程度如何，他们回答说，由于这两个城市企图从共和国分裂出去，所以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然后，他们详细他讲述了摩尔达维亚遭受俄罗斯移民歧视的情况，并辩解说，新的语言法基本上是公正的。在公共事业部门工作的俄罗斯人将被给予时间学习摩尔达维亚语，并达到在公共事业部门用摩尔达维亚语从事工作的程度，如果他们不学摩尔达维亚语，将被解雇。在议会用摩尔达维亚语或用俄语均可，所有的议会演讲都将进行同声传译。

与基什尼奥夫的其他人一样，他们两人也向我提出了同一问题：我是否认为摩尔达维亚是苏联合法的一部分。他们知道，我们不承认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并入苏联。既然摩尔达维亚也是纳粹一苏联秘密条约的牺牲品，摩尔达维亚人认为他们应该得到和罗的海沿岸诸国同样合法的对待。

波让他们感到沮丧的是，我不得不解释，他们与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在法律上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现今的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大部分领土属于罗马尼亚，不像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那样是独立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罗马尼亚将这些领〔392〕土正式割让给苏联。尽管这样做是被迫的——罗马尼亚是战败的德国的盟国，而且该地区处于苏联的实际占领之下——但领土割让已经写进了对罗马尼亚的和约之中，而且美国也是签约的当事一方。所以，我们没有根据对摩尔达维亚是苏联的一部分这种地位提出挑战。

“太糟了。”纳迪尔萨说。过了一会儿，他强调说：“我们无论如何都

要争取独立。然后，我们才能考虑是回归罗马尼亚、保持独立还是与苏联谈判建立某种形式的联合。”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摩尔达维亚高级官员提出把独立作为一个现实目标。当时，纳迪尔萨不仅是摩尔达维亚人民阵线的领袖，而且是摩尔达维亚议会副主席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温古雷安努曾担任过舞台设计和电影制片人，当时是摩尔达维亚的文化部长。

当我们与邀请的摩尔达维亚族客人讨论他们的政治和文化抱负时，我们邀请的俄罗斯族客人柳德米拉·洛勃佐娃则默默地观注着这一场面，但满脸的不高兴。柳德米拉·洛勃佐娃曾是一名英语教师，现在是当地的普希金博物馆馆长（普希金是俄罗斯人，19 世纪 20 年代政治流放到基什尼奥夫长达两年之久），在她的帮助下，我们前些日子的旅行令人着迷。在我们的谈话停顿的时候，她忽然提出用俄语背诵一首摩尔达维亚诗人米哈伊尔·埃米利斯库写的诗，并翻译成英语。其他的客人洗耳恭听，然后继续前面的谈话，柳德米拉又表现出满脸的不高兴。

当纳迪尔萨和温古雷安努离席去电视台而其他的摩尔达维亚客人在一边交谈时，柳德米拉突然向我流露出她作为一个俄罗斯人的沮丧和担心。她觉得摩尔达维亚的“极端主义者”把俄罗斯人看成是“侵略者”，并打算将俄罗斯人驱逐出摩尔达维亚。她在基什尼奥夫居住多年却没有学摩尔达维亚语，对此她辩护说，她把时间都花在学英语上了，“英语对每个人都有用”。她工作勤奋，用 13 年的积蓄买了一套公寓房，与苏联其他地区没有任何联系。

她抱怨说，“民族主义者”正企图把普希金的雕像从以他名字命名的公园中央搬迁到公园的一隅。就算是雕像原先就在那里，但是公园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雕像应该放在更显眼的地方。她还〔393〕反对俄罗斯因 1812 年兼并比萨纳比亚（今天的摩尔达维亚）而被看作是侵略者的观点。她强调说：“我们保护了信奉东正教的摩尔达维亚人免遭土耳其人的压迫。”

讲了这些话以后，她又详细讲述了她自己的身世。她是一个海军军官的女儿，还是一个小女孩时，她生活在靠近太平洋海岸的哈巴罗夫斯克。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她父亲又转调到摩尔达维亚黑海海岸的一个港口伊斯梅尔。她在基什尼奥夫上了大学，此后一直在那里生活。现在，人到中年之时，她在这个日益充满敌意的城市中感到很孤单，害怕失去她的工作和唯一的房子。

在谈到这个话题时，我们邀请的摩尔达维亚客人打消了她的顾虑。他们保证说，她完全可以在五年中学会摩尔达维亚语，足以接待来参观博物馆的摩尔达维亚人。这个要求既非不合情理，也非难以做到，它将保证她在摩尔达维亚社会中继续占有一席之地。

但是，柳德米拉本能地感到即使她愿意做出努力，她的问题也不会如此简单地得到解决。她觉得冒犯的态度似乎预示着一种政策，即摩尔达维亚仅仅属于摩尔达维亚人，或许最终还将导致布加勒斯特的统治。真正的交流在大多数摩尔达维亚人和俄罗斯人之间已不复存在。

虽然我在摩尔达维亚看到的这种人心骚动的状况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似乎并不存在或者处于压抑状态，但是，当地共产党当局也在采取行动以便从莫斯科争取更多的独立，并且企图吸引当地的民族主义势力。

在撒马尔罕，当地的共产党书记帕拉特·阿卜杜拉赫曼诺夫向我详细介绍了他改变棉花单一经营，更多地种植水果和蔬菜的计划。他对加工当地产

品的工业未能得到发展而感到恼火，棉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在那里尤其具有发展前景。不过，这一地区仍然能够感受到中央经济部门的严格控制，他抱怨说，现在仍然不允许乌兹别克人以计划外的产品进行自由贸易或者出口这些产品换取硬通货。几个月前，法律条文便允许这种交易了，但是有关部门仍然没有做出调整来适应新的法律条文。

中亚地区的大多数大城市正在兴建新的清真寺，尽管穆斯林〔394〕组织仍处在严密的控制之下，而且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共产党当局拒绝给穆斯林的政党以合法的地位。沙特阿拉伯准备向中亚地区各国提供了 100 万套《古兰经》，但还未能得到落实，因为莫斯科方面没有发进口允许证。（16）但是，中亚各共和国当局已改变了长期以来禁止庆祝传统穆斯林节日的政策。1990 年，整个乌兹别克斯坦地区几十年来第一次欢庆纳夫鲁茨节，该节日是庆祝农业年的开始。

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给我的印象与大多数已发生巨大转变的其他地区相比，旧式的苏联色彩更浓一些。我想找一些人谈谈，尤其是与学生、年轻人以及非官方人士，但都未能实现。与高层官员的会谈与前几年类似的会谈没有太大的不同。

例如，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第一书记伊斯兰·卡里莫夫在党的塔什干总部大厦的一间豪华的会议室里同我见了面（现在，豪华的办公大厦被视为不合时宜的狂妄举动，在许多其他共和国，共产党为谋求较低的姿态，已开始将新的办公楼转交给政府和其他组织，例如，基什尼奥夫的共产党大厦已改为一所儿童医院）。他以一副老派共产党领袖的命令口吻回答我的问题。当我问他为什么还没有按照新的苏联法律给主要的反对党联盟“伯利克”“登记注册”时，他简单地回答说，之所以没有给它登记注册是因为它接受了不可靠的人员，这些人组织了有可能导致混乱的示威游行，在我结束访问几个星期之后，卡里莫夫使自己当选为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于是，中亚各国的共产党领导人都急急忙忙地给自己戴上更堂皇的头衔。这种特别时尚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中亚地区。

卡里莫夫当时确实容忍了一个很小的反对集团的存在，该集团由一些从“伯利克”组织中退出的乌兹别克杰出的知识分子所领导。我和丽贝卡邀请他们之中的三个与我们共进晚餐。

艾尔金·瓦西多夫是一位 50 岁刚出头的杰出的乌兹别克诗人，他向我解释了他所领导的“艾尔克”运动。“艾尔克”是乌兹别克语“意愿”的意思，其宗旨是建立政治、经济自治的乌兹别克斯坦。该集团的成员准备以“议会道路”作为其唯一的斗争方式，而避免采用可能会引起暴力行为的大规模群众游行示威的方〔395〕方式。那天晚上与他一起来赴晚宴的另外两个人也都是作家：罗拉利·卡布尔写小说和政治短评——最近一篇关于乌兹别克斯坦前途的短评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而且还经营一家出版社；阿曼·马奇安编辑一本面向年轻人的刊物，尽管他本人还很年轻，但值得一提的是，他已经出版了 20 多本小诗集。

他们对环境恶化的关注并不使我感到意外，在中亚地区，对于那些兴衰系于选票的政治运动来说，忽视环境问题无异于自杀行为，这一点是显而易见。但是，他们的建议已超出了人们通常涉及的范围，即结束棉花的单一经营状况；增加对咸海的排水量；采用浪费较小的灌溉技术；建立以当地原材料为基础的加工工业。他们——不同于莫斯科的许多知识分子——还认识

到，除非承认私有财产的所有权，否则便不能解决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问题。

他们希望说服乌兹别克的立法机关通过一部新宪法。当我问他们在起草宪法时参考什么书籍时，他们抱怨说塔什干的图书馆没有太多的材料来源帮助他们理解苏联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宪法。不过，他们有安德烈·萨哈罗夫起草的宪法草案副本和一部俄文版的美国宪法，这部俄文版的美国宪法是他们集团中的一位成员在我的斯帕索住所与我见面时得到的。我们经常提供一些令我们的客人感兴趣的出版物，发现其中有人实际上正在利用我们出版物时确实是令人欢欣鼓舞的。（17）

“艾尔克”的大多数目标似乎是要确保在苏联内部实现自治，因此，当我们邀请的一位客人宣言他的抱负是做独立的乌兹别克驻美国大使时，我感到非常吃惊。

“这是真的吗？”我问他。

“现在还不是真的，我需要五年时间。”他大笑着回答。然而，他不是开玩笑。

我在 6 月份再次访问了哈萨克斯坦，它与其南部相邻的加盟共和国在政治上形成鲜明的对照。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取代科尔宾成为党的书记，他非常坦率地谈到了加盟共和国的问题和自己的愿望。他说哈萨克斯坦想留在苏联，戈尔巴乔夫也全力支持他这样做，但是联盟必须重新定义，给予各加盟共和国完全〔396〕的主权。他准备与叶利钦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合作，使这一愿望得到实现，当时他正与其他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合作起草一个联盟条约草案，以取代由莫斯科提出的草案。

他敏锐地意识到了哈萨克所处的殖民地地位，并且决心改变哈萨克的这种地位。他反对莫斯科盛行的一种观点，即哈萨克接受的投资基金多于它产出的资金。他指出，如果用市场价格来取代由莫斯科指定的低价格的话，哈萨克共和国可利用它自身的丰富的资源与其他加盟共和国进行贸易。他相信中亚需要更好的地区合作机制，他在一个星期前主持了一次中亚地区领导人会议，尽管莫斯科对此持敌视态度。

尽管不像莫斯科那样自由和随心所欲，但是哈萨克的政治与塔什干相比似乎更少一些控制，更多一些自发性。几年以前，一位名叫奥尔扎斯·苏莱曼诺夫的杰出诗人组织了内华达—塞米巴拉金斯克协会，开展反对核试验的运动（苏联的绝大多数核试验在阿拉木图东北的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基地进行）。该组织成功地推迟了一些事先计划好的核试验，并正成为一个影响广泛的政治运动。苏莱曼诺夫本人是在任的苏联议会成员。虽然他仍然是一名共产党员，但是他似乎正在为他自己的运动开辟一个独立的前景。

打破帝国中央控制的决心正在所有的加盟共和国中得到加强。一些加盟共和国，诸如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摩尔达维亚，其主权独立的动力来自通常由知识分子领导的民族运动。其他加盟共和国，诸如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其动力来自共产党官员。他们迫切希望维持对政治体制的控制，如果改革在他们的共和国深入人心，就会危及政治体制。甚至像纳扎尔巴耶夫那样既想改革又想保持联盟的领导人，也要求结束帝国的控制。

在绝大多数加盟共和国占主导地位的分裂主义情绪现在也正渗入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本身。俄罗斯好几个“自治”共和国的领导人也开始提出主权要求。8 月份，与芬兰接壤的卡累利阿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宣布拥有主权。几个星期之内，九个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从乌拉尔山

的乌德穆尔特自治共和国和鞑靼自治共和国到西伯利亚东部的雅库特自治共和国（又名萨哈自治共和国）和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都投票赞成主权独〔397〕立。许多自治共和国还改换了它们的正式名称，去掉了“自治”这个词，就像加盟共和国那样自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更多的是一种象征，因为改换名称就要求与那些加盟共和国一样有同等的权利：对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有控制权，独立的征税权，以及脱离权。

对中央集权的憎恨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追求主权独立的热潮开始扩展到越来越小的单位，包括一些人口很少的“自治”州和地区。

这些自治实体绝大多数集中在俄罗斯，但有两个在格鲁吉亚共和国：阿布哈兹最高苏维埃宣布了它的主权并在8月25日声明具有加盟共和国的地位（因而从格鲁吉亚分裂出去），但是格鲁吉亚立即宣布其主权独立无效。9月份，南奥塞梯自治州苏维埃也宣布它是一个共和国，但也同样遭到第比利斯的拒绝。这两个自治地区的主权声明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绝大多数自治地区的主权声明相比，反映了更深的分歧：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强烈要求格鲁吉亚把它们划归给俄罗斯——或者说成为苏联的一个有主权地位的国家。当时，这两个地区与格鲁吉亚的战争一触即发——实际上，南奥塞梯已经开始卷入战争。

而另一方面，俄罗斯的大多数自治实体的主权声明都公开宣称，主权共和国仍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它们要求对其政治制度、资源和经济有更多的控制权，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它们希望削弱中央控制以及纠正过去的不公正而作出的自然反应。但是，有时候地方领导人仅仅是利用削弱中央权力之便来为他们谋取更大的政治权力。一些地方领导人——特别是格鲁吉亚内的那些地方领导人——从莫斯科保守的官员那里获得支持。在叶利钦的反对派中，一些目光短浅的人认为通过给俄罗斯制造困难，他们可以削弱叶利钦与其他加盟共和国协力反对中央官僚的努力。在格鲁吉亚问题上，苏联的强硬派人士，尤其是军方和克格勃中的强硬派，决心惩罚格鲁吉亚，因为它选举了前持不同政见者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为总统，而且它还急于走向独立。一些观察家确信戈尔巴乔夫本人赞成这些冒险之举和破坏性策略。

叶利钦和加姆萨胡尔季阿对这些压力反应不同。加姆萨胡尔〔398〕季阿拒绝谈判，他作出的反应是进行逮捕并以武力相威胁——在南奥塞梯就是这样。而叶利钦却相反，他决心继续支持权力分散。当选为俄罗斯立法机构的主席不久以后，他访问了好几个自治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的许多地区。鞑靼共和国是这些“自治体”（自治共和国的通俗叫法）中要求独立最坚决的一个，叶利钦在其首都喀山对听众们说：“你们将得到你们能够承受的所有主权。”

这些话后来就像鬼魂一样缠住了他，但在当时它显然是明智的政治策略。在 1990 年夏天，除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外——可能还包括摩尔达维亚和格鲁吉亚，很少有人认为苏联的任何一部分在认真地考虑脱离出去，更不用说俄罗斯自身的领土了。在地位和权力的争夺战中，叶利钦将竭尽全力保卫他的后方和侧翼。

第十五章〔399〕窃取资产的灾难

把国有资产转移给新的所有者是经济领域改革的主要工作。

加夫里尔·波波夫①

在改革中，我们唯一应该禁止的是使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字眼。玩文字游戏将把我们带入到死胡同。

拉里莎·皮亚谢娃 1990 年 8 月②

你怎么能改革莫须有的事物呢？

亚历山大·伊万诺夫③

就经济改革的内容和时间而展开的辩论在 1990 年愈演愈烈。雷日科夫政府、官方的或自行组成的各类委员会以及苏联国内外的经济学者们抛出了一个接一个的计划。虽然最高苏维埃同意了政府建议中的某些原则，但是它还是再三拒绝政府的建议，并把包括实质性内容的建议细节退回给政府继续修改。

早在冬季，我就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虽然仍需要克服过去的习惯和老一套做法，但是切实的改革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并不是意识形态，而是苏联经济的官僚体制。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根据“国家委托管理”的理论，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能够产生收益的资产都被没收充公，并将其交给官僚们进行管理。任何从指令经〔400〕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企图都会被经济部门视为对资产的窃取，是对它们过去的“正当”特权的侵犯。

立法机关赋予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经济自主权实际上在莫斯科各中央部委的阻碍下失去了效力，从而加强了这些国家要求独立的力量。现在，它们又阻止以任何形式下放经济决定权，这种做法犹如向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火上浇油。“意识形态”官僚们——即职业共产党官员——正处于混乱和退却之中，然而“经济”官僚们却仍然牢牢地控制着经济。④

布尔什维克对资产的国有化确实给苏联政权带来了灾难。除非能够找到一种方法来放弃当年开国元勋者们所攫取的大量资产，否则苏联势必四分五裂。由于绝大多数资产原来的主人都已过世，因此不再有可能把资产返还给个人；况且除了国家这个整体以外，别无其他合法的申请者能够要求获得苏联时期所创造的固定资产。如果苏联想要生存下去，它就需要找到一种途径，赋予国民直接拥有和自由处置资产的权力。从理论上说，国家官僚体系是人民赖以托付的对象，但是事实证明他们不仅效率低下，而且贪污腐败，不可信赖。

因为使用卑鄙手段窃取财宝而受到诅咒，许多背景不同文化都有这类传说。无论是偷窃的珠宝还是理查·瓦格纳巡回歌剧中盛传不衰的莱茵黄金或是其他类似的故事，一个始终不变的特点是，非法所有者们的贪婪往往使他们看不到占有这些财产的危险。

在 1990 年和 1991 年，我看到进行经济改革的努力一再受挫，常常不禁想起这些传说。除非国家能够找到方法舍弃对收益最大的资产的控制，否则改革就不会站稳脚跟，因为不这样做就不可能进行市场经济中真正意义上的经济交换。除非戈尔巴乔夫能找到一种途径来结束中央政府对苏联境内的绝

大部分资产的控制，不然他自己的地位就会在新近强大起来的加盟共和国的压力下崩溃。它们再也不愿意由莫斯科的官僚们来决定它们国家的经济命运了。然而，正如无数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样，戈尔巴乔夫似乎也不了解眼前的灾难。但他无法忍受把自己的部分权力让给他人的想法。他紧紧地抓住对资产的支配权不放，从而注定了他的权力宝座和所领导的国家将走向灭亡。

政府做事一团糟〔401〕

雷日科夫和他的部长们从来不知道需要去做些什么以建立市场经济。尽管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在意识形态上持教条态度或是个性贪得无厌，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但问题并不在这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希望屏弃一些过时的教条，而对剩下的重新给予诠释。一方面，有些政府成员毫无疑问非常贪婪；但是另一方面，改革后的经济无疑会比行将崩溃的经济更能满足他们无止境的贪欲。他们从一开始就失败了，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建立起一个可行的市场体系。

即使是他们所运用的术语也令人十分迷惑。当刚刚开始允许以赞同的口吻谈论市场体制的时候，他们的用词是“社会主义的市场”，但他们从未解释过社会主义的市场同其他市场有何不同。到了 1990 年，政府的目标成了“受管制的市场”，这个提法也没有人去下任何定义。它难道意味着要用类似于欧共体共同农业政策的方法来对整个经济进行管理吗？还是像西方对待公共事业（例如，美国的糖业政策）那样来进行管理呢？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我们就很难把它纳入市场体系的范畴，因为不管西方国家在特定的行业或特定的情况下所进行的市场控制作用如何，它们只有被当作为一种特例而不是规则的时候才能发挥出作用——作用大小取决于它们施行的范围。除了行政控制以外，不存在任何“管制”整个市场的方法，但是行政控制已经在苏联被证明为无效，而且它正是改革发誓要消灭的东西。

雷日科夫和他的同事们不仅未能掌握市场经济的本质，而且也不了解没有一定程度的私有制，就很难、甚至于无法产生市场关系。实际上，根本不能指望国有企业会以真正造就市场的方式彼此进行竞争。然而，政治领导层中对私有资产（尤其是土地）的敌对情绪随处可见，甚至连那些承认在当地服务业中应该鼓励私人企业主的领导人也仍然认为，“集体所有制”是最好的所有制形式，也是唯一能够适用于各种规模企业的所有制形式。〔402〕由于对促使市场运转的因素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他们也就无法设计出市场所需要的规章制度。有效率的银行系统、市场导向的会计制度、既能够征收到必要的岁入又不会压制个人积极性的税收制度——人们可以列出一长串使市场体制正常运转的基本规章制度，而这些都是苏联所缺乏的。这些规章制度不可能一夜之间全都建立起来，但是政府所有改革计划共同的致命缺陷就是缺少一种战略来建立这些规章制度或者是促进其发展。

尼古拉·雷日科夫在 1990 年年底以前一直担任总理，他是戈尔巴乔夫时代最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人之一。他比戈尔巴乔夫更敏感，而且没有他那么不可一世；他在个人关系上也更加灵活，总之，雷日科夫没有什么恶意。他知道整个制度需要改革，但是他认为可以一步步地来。假如国家计划委员会下令军工企业每年把若干比例的产品转为民用产品，那么在若干年后所有的商店就会摆满琳琅满目的商品，人人都会高兴。但是，在苏联官僚体制的现实世界中，这不可能发生。这个制度天生就是为了扼杀个人的创造性。把市场的规章制度零零碎碎地移植到现有的经济体制中来显然会遭到拒绝，如同一

个病人拒绝移植一只黑猩猩的肺一样。

这个事实导致了雷日科夫理解上的另一个失败。无论是当政时期还是卸职以后，他最喜欢说的是他希望“创造，而不是摧毁”——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高尚的情操。但是，如果旧事物原封不动，新事物就会因受到压制而无法成长。

在苏联政府内——其各个机构只维护本部门的狭隘的利益，而不考虑国家利益——概念混乱和官僚程序是一种普遍现象，其结果是，政府的计划往往使本来就十分糟糕的情况雪上加霜。最令人吃惊的错误就是宣布在未来几个月中许多消费品将要提价。议会反对这个计划，但公众得知这个消息后，商店的货架立刻被抢购一空。人人都希望在价格上涨之前做好储备。工厂和农场也开始停止外运产品，希望它们的货物能卖个更好的价钱。

许多苏联产品的价格大大低于国际市场价格，有些甚至低于制造成本。不明智地扩大货币供应量产生了“货币倒挂”，不可避免地〔403〕加重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向市场体制迈出的任何实际步骤都不得不伴随着价格的进一步提高。为市场创造条件时势必引起价格（和工资）的上涨，以适应市场的内在动力；这与简单地宣布涨价并提前很长时间通知公众有着本质的区别。尽管每次这样做都要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仍然一再犯类似的错误，这就是雷日科夫政府所推行的改革方法的特点。事实上，这些计划的目的在于以改革的辞藻为掩护，维持经济官僚对经济的控制。

俄罗斯分离主义的蔓延

尽管叶利钦希望加快废止中央各经济部委，但他所采用的措辞不能帮助公众了解其前景。政治上的本能使他演讲时一味迎合公众的希望而不加节制。他争辩说，必须进行激进的改革，而且在实施过程中决不能让公众受苦。他提出只要把经济决定权交给加盟共和国，繁荣将近在咫尺。1987 年和 1988 年，他曾经正确地批评了戈尔巴乔夫，因为后者暗示用不着作出牺牲就能够实施改革。现在，他取得了权威，但看上去却正在犯同样的错误。但是，又有哪个政治家会打着“提高价格”、“减少福利”、“增加失业”的牌子去竞选呢？

一名以私有资产政纲参加竞选的政治人物在被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选为叶利钦的副手后，开始崭露头角，这就是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他是莫斯科普列汉诺夫学院的一名经济学家，他的祖国是车臣—印古什共和国（位于高加索山脉北部）。过去，他还在格罗兹尼（车臣—印古什共和国的首府）的时候，就已经被选入了俄罗斯人民代表会议。我过去从未见过他，所以他当选之后不久我便请求进行一次礼节性拜访。

哈斯布拉托夫 40 多岁，相貌英俊，他使我想起了我的朋友法吉尔·伊斯康德尔，一个深受人们喜爱的作家，来自离格罗兹尼不远

的阿布哈兹，但是那里属于格鲁吉亚共和国而不是俄罗斯。然而，他说的话给我留下的印象比对他的相貌更深刻：他的思想比当时的叶利钦还要激进。在俄罗斯高级官员中，他第一个告诉我俄罗斯将很快成为苏联的继承者。他预测苏联将会变成一个松散的邦联，不需要统一的宪法，因为它将不带有国家的属性。它将由一个简短的联〔404〕盟条约来定义，这个条约将在联盟各共和国之间商定，可能会包括 10 到 12 项原则性条款。只有各共和国有权征税，它们将决定向联盟预算作出多大的贡献，这非常类似于联合国成员国的做法。

他表示他十分同情戈尔巴乔夫，也愿意看到他走好运。但他觉得雷日科夫政府是“套在（戈尔巴乔夫）脖子上的沉重负担”。他认为，经济决策权应交给各加盟共和国，这样做对戈尔巴乔夫有利。“我们可以帮助他，办一些他在中央无力办的事。”他说，俄罗斯迫切希望实现经济私有化，但现有官僚体制阻碍了任何真正的进展，只有将权力转移到各加盟共和国，才能够绕过各官僚机构，实现私有化。

他在很大程度上希望戈尔巴乔夫掌握对外政策的决策权，但是俄罗斯将坚持在苏联驻外大使馆中派驻自己的代表，因为它希望独立地处理它的对外经济关系。以后，它将逐步采取与苏联有所区别的政治立场——例如，在反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问题上，它主张采取比戈尔巴乔夫更为强硬的立场——最终，海外的苏联大使馆将变成俄罗斯大使馆，因为俄罗斯将是继承国。

事实上，哈斯布拉托夫认为不管建立何种联盟，它都将只具有极少的几项职能：对核武器的控制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对常规军事力量的控制将转给各个共和国。它将取消目前的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而由创始国选出的 10 名代表组成参议院进行治理。哈斯布拉托夫估计作为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将承担苏联债务的 75%。

我离开哈斯布拉托夫的办公室时感到十分震惊，正如我在 3 月份听到谢瓦尔德纳泽宣布辞职的消息时那样。绝大多数的俄罗斯改革者们都预测苏联将会继续存在。如果他们的预言正确的话，苏联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将会变得很小，但是将会保留外交政策的决定〔405〕权，提供共同防卫，保持一种货币制度，以及实行对电讯、长途运输等基础设施的控制。他们推测几个位于外围的小加盟共和国（例如，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可能坚持更大程度的独立，但是会把避免损害苏联占据的“经济空间”当成重要的任务。这样一来，它们就会在寻求加强共和国力量的同时又不使苏联解体。有些人认为美国式的联邦是最理想的；其余的人则希望建立某种更加松散的形式，以适应民族差异和满足国家的自尊，但是这种松散的形式仍然会拥有联邦权力，具有国家属性。

叶利钦本人也曾多次表示赞成建立起一个联邦或邦联的目标。他不但否认戈尔巴乔夫的指责，即他的言行将导致苏联的解体，并且还争辩说，一个强大的联盟需要强大的加盟共和国。⑤但是，现在他的主要副手却在直言不讳地谈论俄罗斯将成为继承国的问题，在这个联合国的地区性翻版中，俄罗斯与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关系将非常松散。

在我会见哈斯布拉托夫两个月之前，我曾经给华盛顿发出消息，指出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并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苏联解体。我并不赞成美国采取行动去促成这种解体（但是在坚持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拥有恢复其独立地位的权力这一问题上除外），而是认为我们有必要做好应付这种后果的准备。尽管我看到可能导致苏联分崩离析的力量正在不断发展壮大，但我仍然预测如果苏联真的解体，其原因也是其他加盟共和国（特别是乌克兰）坚持要求独立，迫使俄罗斯解散苏联。我从未想到除了几个梦想家以外，俄罗斯的政治家们竟然也会认为俄罗斯会欢迎并将促成苏联的解体。

哈斯布拉托夫并非一个古怪的梦想家，而是在俄罗斯议会中赢得第二把交椅的著名的经济学家。戈尔巴乔夫在决定国家的经济改革目标上表现出无能，一些对此感到越来越沮丧的人开始谈论起同样的观点。米哈伊·波察罗夫就是其中之一。

波察罗夫是从一个经理转变成政治家的，他同时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最近刚被任命为俄罗斯议会高级经济委员会的主席。6 月份时，他曾作为候选人竞选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即总理），但是没有获得过半数的选票。

自从 1989 年年初以来，我就定期与波察罗夫会晤，所以比较熟〔406〕悉他的观点。他坚信，要建立起市场经济，必须通过激进和迅速的行动来结束中央对经济的控制，解散国有企业并从而形成竞争。然而直到 1990 年夏，他仍然是从苏联的整体来考虑问题的。

但是在 8 月份当我们闲谈的时候，我发现他所关注的焦点已经转变了。虽然他对戈尔巴乔夫最终做好真正的经济改革的准备满怀希望，但是他感到如果有必要的话，俄罗斯也完全有办法独自进行改革。因此，假如戈尔巴乔夫再一次在进行根本性改革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他预计俄罗斯将会牵头，与其他加盟共和国进行直接谈判，这将导致产生新的结构来取代顽固的中央管理体制。他认为向市场关系的转变将会非常困难，但是一旦发生了就应该迅速进行。他预测其结果是，苏联将类似于 1993 年马约生效之后的欧洲共同体：一些主权国家拥有共同的“ 经济空间 ”和统一的货币，并且拥有行使管理功能或者建议功能的机构，例如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和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⑥因此，哈斯布拉托夫绝不是唯一认为俄罗斯将成为苏联的继承国的人。像波察罗夫这样的人之所以得出以上的结论，并不是因为他们抽象地拥护俄罗斯分离主义，而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无力对经济改革作出全面承诺，令他们感到失望。他们的人数将不断增加，除非戈尔巴乔夫朝着解除中央经济控制迈出切实的步伐。

从未到来的 500 天

从 7 月中旬到 8 月份的这段时间证明了我对戈尔已乔夫的意图的直觉是正确的。在剥夺了共产党制定政策的权力之后，戈尔巴乔夫再一次谈到了激进的经济改革，同意与叶利钦合作出台新的速成计划，并和叶利钦一起指派了起草该计划的委员会。苏共全国代表大会刚刚结束，他就迅速离开，同德国总理科尔签订了历史性的〔407〕协定，显示出他与苏共强硬派大相径庭；而且他似乎也准备在国家经济转变方面作出同样的表现。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共同挑选了一些专家，他们将起草一份改革计划，以取代雷日科夫政府杜撰出来的那些流产了的计划。他们选择了总统委员会的成员斯坦尼斯拉夫 · 沙塔林院士来担任这个专家小组的主席，同时从两人各自的阵营中挑选了大约 12 名经济学家：例如尼古拉 · 彼得拉科夫，他同斯坦尼斯拉夫 · 沙塔林一样也是总统委员会的成员；而格里戈里 · 亚夫林斯基和鲍里斯 · 费奥德罗夫却来自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政府。虽然由叶利钦提名的人选比来自戈尔巴乔夫阵营的人更加年轻，也更加激进，但是出于共同的需要——即迅速采取措施解除中央对经济的控制，正是这种控制压抑了经济活动并且加剧了帝国内部的分离情绪——这个群体似乎团结得很好。

他们从 8 月 6 日起集中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别墅内工作，为的是避免办公室及家庭的打扰。他们把亚夫林斯基及其助手研究数月的计划作为草案的基础。这个草案在经济圈和政治圈中被称为“ 500 天计划 ”，因为它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时间表，要在 500 天内建立起一个市场体制。

虽然时间表似乎过于乐观——在短短的 18 个月里就建立起市场体制显

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它所阐述的步骤看来正是以内在的力量走向市场经济所必需的；而且也是开创民主政治体制所必需的，因为民主政治体制最终需要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分散经济力量。它认识到国家有必要放弃对经济决策权的垄断，并且为此拟定了紧迫的时间表。

沙塔林的委员会受命在 30 天内提出一份报告，但是它在 8 月 21 日，即只花了 15 天就完成了计划草案。这与苏联官僚很少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工作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沙塔林草案保持了“ 500 天计划 ”的轮廓，尽管名称上有所不同。该委员会在 9 月份的《消息报》上发表了长篇文章，提出了改革建议的概要，强调需要把资产还给人民；对此文章是这样解释的：

私有化……是一种机制，它将把财产分配给所有希望为社会发展条件和社会发展水平承担责任的人……〔408〕资产掌握在每一个人手中是对社会稳定的保证，也是防止社会动乱和民族动乱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⑦

这个小组还提出个人有经济活动的自由，消费者有选择的自由，无论私营企业、集体合作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有管理上的自由；中央经济部委将被取消，国家对企业的补贴将被停止，厂长经理们将被要求在各自的供应商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 水平联系 ”，而不再是简单地听从来自莫斯科部委的命令。需要进行痛苦的调整才能获得这种“ 管理自由 ”，但是它必会有所回报：厂长经理们可以租赁和出售资产（在此之前这是禁止的），直接从事对外贸易，自己进行投资和贷款的交易而不用再等上面的拨款。

建立经济规则这一基本责任将移交给各共和国和当地政府，而苏联政府将只保留对联盟资产和各共和国所委托行使的职能的权力。

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沙塔林计划的缺陷：许多细节仍没有制订出来，一些时间表并不实际，作者提出的许多建议不过是为了迎合公众流行的说法而已——这种失误在此后几年里继续困扰着俄罗斯的改革者。例如，作者们声称“ 迈向市场的行动牺牲的是国家，而不会使普通个人付出代价 ”，⑧甚至于认为公民的“ 权利 ”之一就是“ 立刻过上更好的日子，而用不着等到遥远的将来 ”。⑨

然而尽管有所有这些缺陷，这个计划仍然是当时最好的、最有可能施行的方法。它要改变的正是一旦全面展开改革就必须加以改变的那些基本原则。

即使是那些不实际的时间表也有一点长处：它将剥夺经济官僚们最有效的武器——耽搁。在苏联乃至于其他任何地方，当一个官僚面对自己不同意的命令时，通常的做法是“ 在原则上 ”赞成，但是以时间不完全成熟为由拖延命令的实施。当然，时机将永远也不会成熟，但是上司却可能早就更换了，或者失去了兴趣，或者失掉了热〔409〕情。因此，如果在要求上下坚定、在规模上不激进、在执行方面不迅速的话，任何旨在摆脱经济官僚控制的计划都不会有效。

此外，在某些问题上缺少细节实际上非但不是缺点，反而还是优点。我们不可能为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方方面面都作出计划。绝大部分规章的建立都要在国家结构之外、通过赋予个人自由来完成。政府不能建立一个市场体制；它只能使市场体制成为一种可能，它要做的是不作拦路虎，允许个人根据他们正当的个人利益行事，最终建立起市场，雷日科夫从来不懂这一点，但是沙塔林却十分清楚，这也是为什么他称自己的建议为“ 方案 ”而不说是“ 计划 ”的原因。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别人称之为“ 沙塔林计划 ”。

整个夏天，戈尔巴乔夫对沙塔林的计划多次作出了热情洋溢的评价，似乎他就要接受这个计划了。我觉得冬季的情景看上去就像是一出戏剧的剧本，而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它的上演。他获得了总统的职位，废除了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重组了苏共以缩小其影响，现在他似乎准备好好利用新形势下的行动自由。他在发表了大量言论之后现在已经做好了行动的准备，推动经济体制中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与此同时，他也是在为冷战的墓碑刻写墓志铭。

与西方的共同利益

谢瓦尔德纳泽和贝克 8 月 1 日在伊尔库茨克会谈之后，双方就德国统一和在整个东欧地区清除铁幕的最后遗迹达成了一致，尽管并非所有问题都已经盖棺定论。谢瓦尔德纳泽与贝克建立了融洽关系，正如谢瓦尔德纳泽和舒尔茨之间的关系一样，贝克去年在怀俄明的杰克逊霍尔安排会议时曾给予谢瓦尔德纳泽热情款待，谢瓦尔德纳泽希望对此作出回报。

伊尔库茨克附近的景色没有大蒂顿那样宏伟，但是它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离它不远的贝加尔湖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⑩其自然景色未遭破坏，湖光秀色无与伦比。选择这个地点来举行两个外长之间的一次极其和睦的会谈无疑是明智的。

〔410〕他们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我们双方在战略武器谈判和阿富汗问题上仍存在着分歧——但是分歧只是例外而不占主导地位，而且这些分歧本身也不像过去美苏之间的问题那样往往具有重要意义。两国外长之间几乎不存在什么严重分歧，以至于他们有空暇乘水翼船沿安加拉河到贝加尔湖进行了为时半天的短途旅游，并且在一所具有乡村风味的小渔屋内享用了一顿愉快的晚餐。

在 8 月 1 日上午的最后会谈中，我们接到了令人不安的消息：有报道说伊拉克军队已经越过边界进入了科威特。起初还不清楚这只是小规模的擅入还是全面的入侵，于是会议只好停止以便有时间仔细讨论这个报告。贝克接着前往蒙古进行计划之中的访问，丽贝卡和我以及贝克一行中的一些人同谢瓦尔德纳泽一道返回莫斯科。

当我们到达莫斯科的时候，得到了伊拉克占领并宣布吞并了科威特的消息。贝克最亲密的助手中有两位同我们一起在莫斯科，他们是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贝克的中东问题专家丹尼斯·罗斯和一直处理德国事务和经济事务的国务院顾问罗伯特·佐利克。显然，贝克必须立即返回华盛顿，不能再继续他计划之中的蒙古内陆的旅行了。然而，问题是他是否应该借道莫斯科，以期望就联合国安理会采取一致行动问题与谢瓦尔德纳泽达成一致，还是绕道北京或东京（从蒙古到华盛顿，以上两条路线距离相等）。如果有希望争取苏联同意在安理会进行联合行动，那么就值得在莫斯科停留。

伊拉克直到那时一直是苏联的盟国，接受了苏联供应的大量的军事装备。成千上万的苏联军事顾问和教官居住在那里。虽然我们知道并不是苏联在背后支持入侵科威特，但是要使苏联同我们一致行动以结束这场侵略将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将意味着苏联改变它的整个中东政策，可能还会使相当数量的苏联公民处于危险的境地。

然而利益攸关，值得一试。于是我们决定应该尽一切努力来说服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加入到我们反对伊拉克侵略的行列中来。如果“新思维”和“人类共同利益”还有些意义的话，那么它应该意味着苏联谴责入侵行径，同我们一道向伊拉克施加撤军的压力。

苏联的第一个反应令人鼓舞：外交部于 8 月 2 日发表声明，呼吁〔411〕“ 伊拉克军队迅速无条件地从科威特撤出 ”，这是对包含同样要求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支持。苏联还召见了伊拉克驻莫斯科大使，正式传递了同样的信息。这与过去相比是一个受欢迎的转变，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莫斯科愿意同美国一起把伊拉克科威特赶出去。

罗斯同苏联外交部的对等人物谢尔盖 · 塔拉申科谈论了回国路线问题。塔拉申科说，尽管谢瓦尔德纳泽尚未下定决心，而且他的中东问题专家们一直怂恿他拒绝同美国联合行动，但是如果贝克亲自去跟他谈的话，也许能够说服他。这并非我们所希望得到的绝对的保证，但是贝克决定就这么做，于是告诉他的飞行员出了乌兰巴托之后朝西飞，而不是朝东飞。

莫斯科的伏努科沃机场从来不用于商业飞行，只是用于外国首脑和苏联领导人专机的起降。贝克和谢瓦尔德纳泽在这个中转站会晤了几个小时。塔拉申科的建议被证明是准确的：双方同意发表联合声明，这也是后来在联合国安理会一系列一致投票的先兆。最后，美国似乎有可能根据最初的计划行事了。有关世界新秩序的谈话取代了冷战时期的唇枪舌战。

对于许多外交家来说，1990 年 8 月不像往年那样是个休假的季节。当伊拉克对科威特的控制不断加强、有关暴行的报告不断增加的时候，布什总统开始组织多边力量来施加军事压力。谢瓦尔德纳泽和贝克之间达成的协议是令人鼓舞的，但是布什如果想以安理会决议为基础成功地组建联合阵线，他就必须确定戈尔巴乔夫将继续给予支持。为了确保这种支持，他提议在赫尔辛基举行首脑会谈，对此戈尔巴乔夫立即表示接受。

两人在 9 月 9 日（星期日）几乎谈了一天，讨论的话题主要是海湾危机。戈尔巴乔夫希望得到两个方面的保证：使用军事压力旨在使萨达姆 · 侯赛因不战而放弃科威特；当科威特被解放了之后，美国军队应该撤出该地区。布什允诺将尽一切努力不依靠战争手段来〔412〕解除伊拉克对科威特的控制，但是如果萨达姆 · 侯赛因继续不作妥协，布什拒绝保证仍然不使用武力。至于美国军队，他保证科威特解放之后就把它们削减到正常水平。多年以来，美国一直在海湾地区维持一定数量的海军，戈尔巴乔夫并未要求把它们全部撤走，只是要求撤走调入该地区专门对付伊拉克入侵的部队。

他们广泛讨论了苏联经济和需要外援的问题。布什保证继续支持改革，但是没有作出提供大规模财政援助的承诺。相反，他只是给予口头上的支持，并保证尽力废除冷战给贸易带来的壁垒，提供某些人道主义援助和技术援助，鼓励私人投资者。

两人谁也没有说出这两个问题有任何联系，但是有一点是不言自明的，如果美国愿意支持苏联的改革，就可能会打消苏联反对西方的海湾政策的想法。如果可能的话，戈尔巴乔夫决心在海湾地区避免一场由美国领导的战争，然而，他一定已经意识到，如果他无法迫使伊拉克不经战争而退却，他肯定无法阻止由美国领导的入侵。他所需要的是至少得到几个月的时间来尝试寻找政治解决的方法。布什总统很乐意答应这一点，主要原因是成功的军事行动所需的准备将要花费些时间。

在赫尔辛基举行的会谈达成了以上谅解，尽管有时气氛紧张，偶尔还出现彼此间的误解。德国统一后，美苏在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中的政治合作使得许多人相信，这两个昔日的对手正在形成一种非凡的新型伙伴关系。此外，在达成谅解之前的几个月中，两位政治家间频繁的接触——既有直接的（通

过电话）又有间接的（通过信件和各自的代表）——使他们建立了极其密切的个人纽带。

布什派出了一个代表团

甚至在戈尔巴乔夫就未来的经济改革路线作出决定之前，布什总统已提出要在 9 月中旬派商务部长罗伯特·莫斯巳赫率领一些〔413〕高级公司经理前往莫斯科，探讨投资和贸易的可能性。戈尔巴乔夫当然感到高兴，因为他那摇摇欲坠的经济需要从西方引进资本和管理专家，这一点日趋明显。

我也认为在合适的时间很好地组织这样一个代表团将是十分有益的。然而，建议选择的时间十分不利，除非其本意就是迫使戈尔巴乔夫接受沙塔林的计划，其实，由总统本人私下里接受这一计划可能会更有效。如果沙塔林的计划已经被接受了，而且实施的机制也已经建立了起来，那么代表团将会有东西可谈。但很清楚的是，在代表团计划到达莫斯科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具备这些条件。

像布什对改革的支持一样，总统商务代表团的建议也没有同安理会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投票联系起来。这似乎是一种明智的方法，它可以使戈尔巴乔夫注意到，如果苏联同美国合作，它将在经济上得到更多的好处。

起初似乎没有理由反对这种不言而喻的贿赂，但是当我考虑到代表团可能带来的后果时，我开始感到不安。首先，我怀疑戈尔巴乔夫是否需要额外的恩惠才会在海湾问题上同我们合作。苏联在中东的地位成为萨达姆·侯赛因之流手中的人质显然不符合苏联的利益。“新思维”的基本动力之一就是摆脱传统的苏联外交政策所导致的孤立。只有反对伊拉克的入侵，戈尔巴乔夫才能使自己成为在该地区最终和平解决问题的倡导者之一。因此，认为美国需要做点什么以换取苏联的支持看来是对苏联利益的错误理解。

其次，同反对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一样，苏联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命运对于美国来说，至少具有同样长远的重要性。我们有能力把戈尔巴乔夫推向正确的方向，但是我们并没有使用这种影响力。总统将千 9 月派出的商务代表团一事，在最好的情况下是浪费潜能，而在最坏的情况下，是发出一个错误信号，即不管苏联是否采取有效的改革计划，只要它在外交政策上与我们一致，美国就会提供经济援助。这是一种危险的幻想，可能最终带来痛苦。

8 月下旬，戈尔巴乔夫表现出不再支持沙塔林计划的迹象，于〔414〕是我更加不安了。政府成员、总理雷日科夫和保守的共产党官员正在积极游说反对这个计划，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他们争辩说这项计划将带来罢工、动乱甚至于内战。最后，在 8 月底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戈尔巴乔夫指出沙塔林小组的建议应该同政府的计划结合起来。

这个建议听上去就像是要把两个对立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对于两个计划各自的作者而言，这两个计划是完全无法共存的，也根本不能结合。叶利钦、雷日科夫和沙塔林在第二天都纷纷表示反对这个意见。

这时候，我感到总统的商务代表团可能会遇到潜在的灾难。美国的大公司经理们可能不希望对正在考虑之中的各种改革建议表示明确的立场，这也是对的。但是如果他们同政府官员一道出现并进行讨论，势必给人留下他们愿意向没有改革的苏联经济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印象，从而给两派均造成严重的误解。除非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继续合作——假如戈尔巴乔夫拒绝沙塔林的计划，这是不可能的——否则美国工商业就可能陷入两大权力中心的角逐

之中。

我知道白宫几乎不太可能推迟这次访问，因为毫无疑问，这次访问被视为确保戈尔巴乔夫在海湾问题上支持我们的战略的一部分。而且，代表团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政治竞选的主要赞助者，他们可能认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自己才被选入这个代表团。由于国家的原因而要求他们调整日程可能会使他们感到忿忿不平。

无论如何，我还是认为自己有责任向华盛顿提出反对建议，尽管这种意见并不受欢迎。于是，我向国务卿贝克送去了个人的意见，指出计划中的总统代表团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危险。我意识到突然提出推迟这次访问可能会发出错误的信号，但是我仍然建议应该问一下戈尔巴乔夫：把代表团的访问安排在苏联政府确定了行动方针之后是否对他会更有利。他几乎肯定会说，“按计划来吧”，但是他也会事先得到警告，即我们了解当前的混乱，对现政府的“改革”计划缺乏信心。

我的建议没人理会，代表团还是按计划来了，而且中途还在赫尔辛基与9月9日刚刚结束同戈尔巴乔夫会晤的布什总统进行〔415〕了简短的会谈。我曾经希望，既然这个代表团是一个“总统代表团”，那么就应该给他们提一些建议，使他们了解鼓励加快经济改革的必要性，然而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他们得到了厚厚的简报表，上面写满了有关具体问题的数据，但是却没有涉及明确的政策指导方针。

事实上，总统的代表团应验了我最坏的担忧。戈尔巴乔夫先是抱怨他经常从外国领导人那里得到有关经济政策的相互矛盾的建议，然后就把这个代表团交给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尤里·马斯柳科夫。尤里·马斯柳科夫向来访者们保证，他们不久就可以得到一份欢迎外来投资的企业的名单，他还与莫斯巴赫达成一致意见，在两周内任命一个联络小组来协调谈判。他指责沙塔林的计划充满幻想，具有破坏性。使我大为吃惊的是，当代表团第二天同雷日科夫会晤时，有几个人竟称赞他没有听从“那些激进分子”是对的。虽然我很清楚地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工商业巨子都能理解外国政治中的微妙之处，但是我从来没有料想到令人尊敬的显赫的美国商人竟然赞同保留由国家进行控制的共产主义制度。

代表团没有安排同叶利钦举行会谈，尽管事实上俄罗斯议会已经正式认可了沙塔林的方案，而且叶利钦也表示他的政府将控制俄罗斯境内的贸易和投资。

目送代表团离去，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关于苏联未来经济制度的辩论正在进行；苏联此时邀请美国派出专家提建议，其意义虽然含蓄但却准确无误，而我们竟然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事实上，苏联领导人非常可能得到了一个与我们希望给予的完全相反的印象。

甚至连马斯柳科夫向莫斯巴赫许下的有限的诺言也没有得到兑现。尽管我们的使馆一再催促，马斯柳科夫始终没有送来待出售的企业的名单，也没有提名什么联络小组。每当我们询问时，答复总是一成不变：“过几天就会准备好。”

〔416〕幽灵般的双重权力

由于历史和教育上的原因，俄罗斯人非常憎恨政府高层的权力斗争。过去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往往导致内战或者外来侵略，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因此，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同意建立沙塔林委员会、表现出明显的停战迹象

时，绝大多数苏联公民都对此表示欢迎。如果他们都赞同委员会的建议并且确保在各自的议会获得多数支持，那么他们就能够成为很好的搭档，携手实施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计划。

该委员会在 8 月底提交了报告，戈尔巴乔夫指出这个报告需要同政府计划结合在一起，这使得公众大吃一惊。叶利钦当即明确表示，这样做对他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而且他的政府将立即着手实施沙塔林计划。在 9 月 4 日的一次会议上，叶利钦告诉我和一群美国参议员：这两个计划的合并是不可能的，他也不会接受“ 协调 ”的结果。他认为苏联部长会议长期以来无所作为，它应该被规模较小的总统委员会所代替。他补充说，自己并不寻求同苏联政府对抗，但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其他加盟共和国将坚持承担它们目前的许多职责，因为它们希望在经济改革方面向前迈进得更快，而不愿被顽固的中央官僚制度拖延。但是，他非常愿意把国防、通讯、能源分配、铁路和航空运输等职能留给中央政府。

他对我们说的话同他在公开场合上讲的一样——也许同他私下里对戈尔巴乔夫讲的也一样。然而，戈尔巴乔夫似乎既没有听取叶利钦的意见也没有听取争论双方经济学家的意见。除了戈尔巴乔夫自己以外，我找不到其他人会相信这两个计划能够结合或者协调。尽管如此，雷日科夫还是在 9 月 7 日宣布，戈尔巴乔夫已经下令把他的政府计划同沙塔林的计划结合在一起，并且挑选阿贝尔 · 阿甘别吉扬负责这项工作。

阿甘别吉扬又高又胖，生于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父母都是〔417〕亚美尼亚人。他先是在莫斯科学习经济；当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成立之后，他于 1961 年迁移到新西伯利亚。西伯利亚分院的经济研究室对当时的“ 社会主义经济 ”进行了比较激烈的批判性研究，这种事情在莫斯科的总院是不可能的。1983 年，阿甘别吉扬编辑的杂志上发表了培基亚娜 · 扎斯拉夫斯卡娅对中央计划经济进行批评的文章，此后这被称做新西伯利亚研究。这是最初推动改革的启蒙思想的代表作，因此戈尔巴乔夫掌权后，阿甘别吉扬和扎斯拉夫斯卡娅被双双调入莫斯科就不是什么巧合了，1990 年，阿甘别吉扬开始执掌坐落在莫斯科的国民经济学院，人们希望它成为苏联的哈佛商学院。虽然他依然被认为是一名经济改革家，但是他的立场不如沙塔林集团所支持的人那么激进，而且在这个集团中还有他的一些对手。

雷日科夫在宣布阿甘别吉扬将糅合两个计划的同时，辩解说政府的计划是“ 现实的 ”，并且暗中批评沙塔林计划中关于下放权力的建议，声称应该保留“ 强大的国家 ”，防止经济分离主义。

雷日科夫没有提到叶利钦威胁必要时将在俄罗斯独自实行改革以及同其他加盟共和国进行“ 水平安排 ”的问题，只是补充说道，他的政府将会促使戈尔巴乔夫下达总统令，要求现存的经济联系在 1991 年全年必须保持原样，否则将进行严厉的惩罚。他还建议苏联政府同各加盟共和国协调行动，处理包括下一年的经济合同等问题。

叶利钦毫不犹豫地作出自己的回答。9 月 11 日，俄罗斯议会以 213 票赞成、1 票反对、4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他的建议，即原则上同意沙塔林的计划，并且要求苏联最高苏维埃也通过这个计划。它还命令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在一个月内提出实施计划的详细建议。鉴于俄罗斯议会原来每次投票时都会出现巨大分歧，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几乎一致的意见给人们以极深刻的印象——如果戈尔巴乔夫继续坚持不理会俄罗斯议会的感情，

这也将是一个不祥之兆。

雷日科夫政府的公众支持率直线下降，人民怨声载道。俄罗〔418〕斯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两次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但是叶利钦解释说这一提案“不成熟”，因而没能被通过。而且，即使通过不信任议案也不具有法律效力，因为只有苏联议会可以撤换总理。尽管如此，这仍然是对雷日科夫的沉重的政治打击。

即使在戈尔巴乔夫已命令阿甘别吉扬合并两个计划之后，许多观察家仍希望这不过是一种表明文章，其结果仍将是以沙塔林的“500 天”方案为基础，民意测验显示绝大多数苏联国民都赞成向市场体制转变（尽管许多人并不理解什么是市场体制），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人已对雷日科夫政府失去了信心。戈尔巴乔夫多年来一直在谈论激进的改革，现在他实施这种改革的时机成熟了，如果他不这样做，就有陷入同叶利钦和俄罗斯议会持久斗争的危险，有鉴于此，许多人都相信他肯定只是把沙塔林计划稍作些修改。

当 10 月中旬妥协文件最终公布的时候，这些希望全都破灭了。该文件包含了沙塔林计划的主要内容——迅速私有化和权力下放——但也保持了已经被事实证明行不逅的政府方案的主要特点，例如通过颁布命令来提高价格。

发布这一文件的次日，我邀请阿甘别吉扬和其他几位经济学家与正在莫斯科访问的国防部长切尼共进午餐。这些经济学家都没有为雷日科夫政府工作，包括奥列格·波戈莫洛夫和帕维尔·布尼奇。他们均表示不理解阿甘别吉扬怎么会同意把这样一个七拼八凑的方案署上自己的名字。阿甘别吉扬承认是他起草了草案，但是坚持说整个方案都是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指示写成的，包含了许多他并不赞同的内容。他还说戈尔巴乔夫曾经一字一句地反复看了多次，实际上，他花了 40 几个小时仔细阅读了这个计划。

这个结果证明了许多人的推测：戈尔巴乔夫总的来说对经济不太了解，特别是不了解市场经济。甚至有人猜测是否他已经失去了政治敏感，因为他通过的这个计划毫无疑问将增加苏联内部的紧张。

〔419〕叶利钦在一次车祸后已经三个星期未在新闻媒介上出现了，这时候他重新回到了公众的视野，他批评这个计划并且指出它迫使俄罗斯只能作出三种选择：完全拒绝；根据自己的方案走自己的路；等待观望六个月，直到不可避免的经济崩溃到来而被迫采取另一种办法。

苏联议会并没有因为俄罗斯的反对而动摇，戈尔巴乔夫成功地确保议会通过了他自己的计划。随即，他的经济队伍开始分裂。11 月 3 日，主张改革的《共青团真理报》刊登了一份由沙塔林委员会的主要人物署名的措词尖锐的声明，这些人中有两人还是总统委员会的成员。声明指出妥协方案所作出的让步太少、出台得太迟、并且也行不通；戈尔巴乔夫背弃了加盟共和国的支持（除了爱沙尼亚外，所有共和国都已经在 8 月份通过了沙塔林方案）；声明还预言已经开始的通货膨胀将会不断上升直至失去控制。“向市场关系的转变现在不能靠稳定卢布来进行，而是应通过通货膨胀以及遏制通货膨胀的传统措施来进行。”他们忧心忡忡地、然而也是预言般地得出了这一结论。（11）

与此同时，叶利钦政府正在加紧同其他加盟共和国签订经济协议，宣称拥有种种的权力，包括在俄罗斯境内征税的权力和决定向中央政府上交多大份额税收的权力。双重权力的阴影正在开始成形。

到了 10 月份，我意识到自己在春季和夏季对戈尔巴乔夫策略的估计没有

得到证实。虽然戈尔巴乔夫已成功地把共产党削弱到不再能够自动地阻碍改革，但是他没能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乘胜追击。沙塔林计划是有缺陷，实施起来也不会像它的作者预计得那样顺利，但是它能使经济体制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拒绝这个计划是戈尔巴乔夫最致命的错误之一。

当他确实有机会进行激进的改革时为什么又退缩了呢？可能是因为他担心失去自己的权力。政府官僚、保守的共产党的官员以及克格勃都加入了反对改革的力量，他们说，迅速地向资产私有化转变和取消中央对经济的指导将会导致公众的混乱，罢工和游行将无法控制。戈尔巴乔夫对本来可能成功的改革计划的热情现在已经被恐惧所取代，而在恐惧下产生的支离破碎的方案是行〔420〕不通的，戈尔巴乔夫的犹豫不决加强了分裂帝国的各种离心力量，与此同时，帝国自身的统治机器也在分崩离析。

〔421〕第十六章戈尔巴乔夫向右转

独裁统治即将来临；我是以完全负责的态度下此结论的。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 1990 年 11 月 20 日①

就在他（戈尔巴乔夫）为右翼辩护时，全国都还在朝左行进。

安德烈·萨哈罗去 1989 年 11 月②

虽然经济正在恶化，民族间的紧张关系在不断升温，而且暴力犯罪也日益成为严重的问题，但在 1990 年夏末，许多苏联知识分子还是充满了少有的乐观情绪。戈尔巴乔夫似乎已经抵挡住了党内强硬派的进攻，并且奠定了与包括叶利钦的俄罗斯在内的各加盟共和国进行讨价还价的基础。

然而，人们的乐观期待很快即告破灭。戈尔巴乔夫命令将沙塔林和雷日科夫的计划结合起来的做法，着实令不少人感到意外。10 月，戈尔巴乔夫—阿甘别吉扬的新版计划公布，原来有少数观察家曾希望，戈氏对上述两计划的"调和"只是为保留沙塔林方案要点作些表面文章，现在他们也大失所望。当时无人相信这种"调和"行动能行得通，戈尔巴乔夫的声望、权威和实际力量也因此而加速下滑。

与此同时（也许并非巧合），有关戈尔巴乔夫即将被政变推翻的谣传也多了起来。这些谣传从未特别指明究竟是谁在策划推翻〔422〕总统，只是认为由保守的共产党官员、军官和警官组成的阴谋集团很可能会利用国家政治上的混乱和戈尔巴乔夫日益不得人心的局面。某些愤世嫉俗者怀疑是戈尔巴乔夫本人在鼓励这种谣传，以便为扩大总统权力寻找正当理由。

戈尔巴乔夫受到围攻

最初，戈尔巴乔夫试图从最高苏维埃获碍特别授权，颁布有关经济问题的法令，建立旨在"促进全联盟市场形成"的规章制度，借以支撑其权威地位。他的建议在最高苏维埃引发了激烈的辩论，不过最后还是获得了通过。③某些改革家，如莫斯科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支持该建议的理由是，为迫使阻力较大的官僚机构和共产党体制进行改革，需要增加行政部门的权威。但恰恰在戈尔巴乔夫的正式权力增加之时，他似乎越来越无力采取决定性行动。

整个秋季似乎都无所作为。11 月 7 日十月革命纪念日举行的红场阅兵式，传统上是炫耀苏联军事力量的机会，但也被企图暗杀站在检阅台上的戈尔巴乔夫这一事件所搅乱。正当一名来自列宁格勒的男子将手枪瞄向总统时，卫兵们将其摔到了地上。两发射向戈尔巴乔夫的子弹偏离方向，射向天空。尽管无人受伤，阅兵式也像什么都没发生似地继续进行，但该事件却使整个城市都非常紧张。这似乎应验了公众对暴力失控的印象，而且它可能促使戈尔巴乔夫采取他随后宣布的一系列行动。

红场事件几天之后,戈尔巴乔夫召集了一次有 1000 多名经选举担任公职的军官参加的会议。④对戈尔巴乔夫而言，此次会议竟是一场灾难。这些官员毫不隐瞒他们对戈尔巴乔夫的愤怒，认定他应对国家的不幸负责，并公开说他们对他的领导已不抱任何幻想。⑤这次会议无疑加深了戈尔巴乔夫的如下担忧，即军队将会支持一场旨在推翻他的阴谋。

〔423〕仅仅三天之后，依然对此次对抗心存余悸的戈尔巴乔夫向人民代

表大会提交了一份冗长报告，却引起了代表们的怀疑和敌视。⑥这使得他的失望达到了顶点，最后使其下决心支持强硬路线。他返回办公室后立即召集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主要来自党内的其他顾问。由于得到了与会者的支持，戈尔巴乔夫决定推行一些已有的应急的计划，用来加强总统办公室的权力，并使政府直接服从其领导。⑦

次日，戈尔巴乔夫再次来到议会大厅，提出要彻底重组他的总统权力班子。此计划制定的甚是匆忙，许多高级官员都未曾过目。雷日科夫也是在戈尔巴乔夫去最高苏维埃途中从车上给他打电话时才第一次听说此事。⑧如果人民代表大会同意其计划，刚成立不到一年的总统委员会将被解散，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取得优势地位；还将设立副总统一职；而内阁也要取代部长会议，其规模尽管未予特别规定，预计会小于美国总统的内阁；联邦委员会将成为中央与加盟共和国关系的顾问机构。⑨

代表们对这个计划比对前一天的“联盟共和国”国情咨文更有兴趣。虽然其变化主要集中在机构重组而不是激进的新政策上，但戈尔巴乔夫已经意识到需要有所行动了。立法者们兴致勃勃，但当他们就该计划进行辩论时，却发现其中的模糊表述将使戈尔巴乔夫无需同他们协商即可使这些新的设置具体化。

即使如此，大多数改革者还是准备支持总统拥有更大的权力，前提是总统要用这些权力来推行他们所赞成的改革。一批杰出的“民主派”还签发了一封公开信，呼吁戈尔巴乔夫要么作出一些果敢决定，要么就干脆辞职。他们要求赋予各加盟共和国以真正的主权，把土地分给农民，军队和地方政府摆脱共产党的直接控制，成立具有改革思想的新内阁，以及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建立工作伙伴关系。⑩

戈尔巴乔夫非但不赞成这些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非常明智的建议，反而把这些要求当成是一种反叛行为，甚至在思想上还更坚定地站在了他曾扶植过的改革派知识分子的对立面。（11）实际上，他很难使最高苏维埃赞同这样的政策，但那些政治家们急切地希〔424〕望人们看到他们并非无所作为，因此，戈尔巴乔夫的坚定努力也许能够说服他们。

如往常一样，最高苏维埃起初否定了戈尔巴乔夫的计划，认为它过于模糊，只是在戈尔巴乔夫同意逐点进行讨论后，他们的态度才缓和下来。有了这些保证，最高苏维埃投票“原则上”批准了这个计划，条件是戈尔巴乔夫必须在两个星期内提供更详细的内容。总理雷日科夫虽未公开反对戈尔巴乔夫的计划，但他让大家都知道，戈尔巴乔夫事先并没有征求过他的意见，他对将部长会议转变成总统内阁的打算也颇感沮丧。

12 月，设立副总统职位和戈尔巴乔夫建议成立的其他机构的宪法修正案得以通过，戈尔巴乔夫最终获得了他想从立法机关得到的绝大部分东西。

然而，立法上的动作并没有像一年前那样吸引公众的注意。令多数公民忧心忡忡的是商店中食品与商品的短缺，他们花在排队购买生活必需品上的时间越来越多。他们还注意到一个新的趋势，即莫斯科的官员们现在讲起话来都比较强硬。法律和秩序成了新的口号，而且 11 月以后几乎天天都要颁布一个新的严厉政令，发表一次威胁性讲话，或由某一持强硬路线的政治家取代了某一要职。

11 月中旬，戈尔巴乔夫下令由宣传喉舌列昂尼德·克拉夫琴科接替米哈伊·涅纳谢夫的职务，后者曾经为电台和电视台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性，

并且计划建立四个独立的频道。这一步骤显然旨在加强对电子媒体的控制。

对立陶宛和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威胁也在增加。当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政府继续维护它们的主权、通过立法、并扩充其行政管理机构时，戈尔巴乔夫间接加强了使用武力的威胁。在发布“保护公共和集体组织财产”这一法令之后，他授权增派军队进驻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

11 月 27 日，国防部长亚佐夫在电视上露面，警告说将使用武力来防止对军事设施和军事人员的骚扰。第二天，政治局又发表了一份不同寻常的声明，敦促戈尔巴乔夫同立陶宛境内“侵犯苏〔425〕联公民人权的行为进行斗争”。12 月 1 日，戈尔巴乔夫发布政令，宣布各加盟共和国颁布的国防立法全部无效。此前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政府已经开始组建自己的防卫机构，但依据这一政令，苏联可用武力去阻止它们的这种努力。同一天，令公众吃惊的还有，戈尔巴乔夫任命强硬派人物鲍里斯·普戈接替了瓦季姆·巴卡金的内务部部长职务。

自 1988 年受命担任内务部长以来,巴卡金的声望日增,被认为是苏联(也可能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对法制含义有所理解的警察首脑。他十分英俊，经常身着做工考究的西服，也许好莱坞会挑选他出演詹姆斯·邦德，但他在现实中则是一个勤于思索而非因循守旧的人。当我邀他讨论执法问题时，他非常坦率地描述了苏联“民兵组织”的缺陷：缺乏训练、低收入、腐败——所有这类问题都没有容易的解决办法。然而，他明白，要想使之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发挥效用，就不得不为此民兵组织重新定向。正如其回忆录所言，他曾试图建立起一支服务于“法律和国家，而不是意识形态或者苏共”（12）的警察队伍。在他担任部长之前，警察的行动只受共产党支配，他上任后才开始改变这种局面，而且他还坚持完全恪守法律准则，因而多次触怒了党内的强硬派。

1989 和 1990 年期间，他还常常同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在公众游行示威的政策上发生冲突：巴卡金认为只要是以和平方式进行就应该允准，而克留奇科夫则坚持主张多数游行应予禁止。巴卡金也反对在民族主义活动比较积极的加盟共和国实行总统直接统治的主张。尽管克留奇科夫反对，他还是同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政府签订了协议，允许当地政府对警察拥有更多的控制权。由于在一次正式的总统委员会会议上就反对沙塔林计划问题指责总理雷日科夫，他也激怒了他的这位顶头上司，到秋季，人数众多的“保守派”联盟要求戈尔巴乔夫撤换巴卡金，这些人中有：总理、克格勃主席、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失势的共产党组织、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共产党领导人、及苏联最高苏维埃中支持以一切手段维持联盟的激进派。（13）

尽管巴卡金将保住总统委员会成员的位置，随后并被提名进入了新的安全委员会，但他离开内务部这一事情本身却终止了在〔426〕执法机构中间建立法制的全部实际努力。他是掌管三大“强制机构”（其他两个是克格勃和军队）之一的唯一一位全心全意支持发展文明社会、尊重法制的高级官员。他被一个以因循传统方式处事而闻名的人所取代，可谓不祥之兆。

鲍里斯·普戈的行为很快即验证了公众对他的猜疑。12 月 5 日，他在一篇措辞强硬的讲话中发出警告说，他已从戈尔巴乔夫处得到指示，要在全国范围内“确保彻底贯彻苏联宪法”。翌日，戈尔巴乔夫就在一次工业部门经理会议的讲话中预告说，“严厉的、不受欢迎的措施”不可避免。12 月 11 日，克留奇科夫也发表讲话，警告说国家正面临着解体的威胁，并指责“外

国情报机构”正试图“破坏”苏联的“稳定”。

人民代表大会下一次会议计划在 12 月 17 日召开，审议正式加强戈尔巴乔夫权力得那项宪法修正案。但有迹象显示，戈尔巴乔夫已不可能用这种新的授权去实施其在 11 月 18 日的公开信中所强调的那种改革了。一切都在向相反的方向演化。

重新定义联盟的概念

在前一年的冬季，戈尔巴乔夫曾敦促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和其他地方的分离主义者在脱离苏联之前去尝试组建一个“真正的联邦”。他还暗示说，几个月内就能订出新的条约，此条约将为联盟提供一个全新的和自愿组合的框架。有关谈判在 1990 年断断续续地进行，但联盟条约草案的公布已是 1990 年 11 月 24 日。虽然当时并不清楚究竟有多少共和国准备接受这个条约，但我还是仔细阅读了草案，以确定戈尔巴乔夫愿意容忍变革的程度。

事实上，草案内容在“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的关系上体现出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它规定“除了联盟施政所必需的部分以外”，加盟共和国将控制各自的土地和资源，并确定了划分联盟与共和国权限的总原则。不过，其中许多方面含糊其辞。从制定经〔427〕济发展战略到使用黄金、钻石储备到规划社会政策等许多职能，都被称做是“共同控制的领域”。对于怎样划分这些重要职能的权限，将由谁裁决，一旦联盟和共和国权限相抵触时怎么办等相关的问题，该草案却没有明确的规定。对“自治”实体的作用和权利未作明确规定，更没有体现保障人权的条款。各加盟共和国有可能脱离联盟的程序也不清楚。

接近戈尔巴乔夫的高级官员当时预估，15 个加盟共和国中的多数会很快达成五项协议。例如，苏共副总书记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在草案公布的前一天告诉我说，他认为极可能有多达 12 个左右的加盟共和国赞成这个条约。（14）但当我看到草案全文时，我意识到这种预测是不现实的。

没有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参加很难形成任何形式的联盟，但两共和国的领导人都对草案的某些部分表示了保留意见；而且他们同时还在与其他加盟共和国进行着另一个协议的谈判，这个协议最终可能成为一个没有戈尔巴乔夫介入的联盟条约的基础。

在条约草案发布之前，我曾到基辅访问了几天。在那里，乌克兰议会主席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告诉我，虽然他将参加起草联盟条约的会议，但除非乌克兰订定了新宪法，并根据宪法进行了全民公决，否则它不会认可任何新的条约。当我问道新宪法何时能够通过时，他回答说：“不会早于明年下半年。”同一天，叶利钦为签订一份俄乌双边协议也来到了基辅。

访问基辅期间，我不仅先后拜会了克拉夫丘克、最高苏维埃主席斯坦尼斯拉·古连科（15）及共产党领导人，而且还坚持邀请了几位来自“鲁克”的领导人共进晚餐。共产党领导人当时已开始对“鲁克”领导人的行动施加压力，而我认为使他们得到官方重视十分重要。他们对拟议之中的联盟条约的态度并不是完全消极的，根据克拉夫丘克提出的条件衡量尤其如此，但他们预料，任何联盟条约都只是在走向完全独立的过渡阶段发生效力。

〔428〕我问他们是否认为乌克兰的独立是一种切实的选择，来自基辅一个工业区的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代表拉里莎·斯科里克回答说：“不会马上实现，但是在几年之内实现是毫无疑问的。我们计划用 3—5 年的时间实现完全独立。”虽然他们在乌克兰议会中不占多数，但我并未视这种看法仅为一种

梦想。如果莫斯科试图继续推行其帝国统治，难道不会有很多共产党人转向他们一边吗？

至于俄罗斯，叶利钦和俄罗斯民主派从草案一出台即对之开始发难。业已成为反对派联盟的“民主俄罗斯”的代表于 12 月 8 日和 9 日集会，宣布该草案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侵犯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主权”。他们还进一步要求在采纳新的俄罗斯宪法之后，由各加盟共和国直接谈判制定条约。其立场同克拉夫丘克 11 月向我描述的乌克兰方案不谋而合。

当总结不同的加盟共和国对联盟条约草案的反应时，我的结论是只有中亚各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很可能支持与已公布草案类似的条约，而它们甚至也会要求作些修改，从而使其在对外政策、对外经济联系和自然资源方面拥有更多的支配权。俄罗斯、乌克兰和阿塞拜疆支持组成一个松散的联邦，但俄乌两国只有在采纳了新宪法之后才会同意加入。我于夏季从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处听来的那类想法似乎正在迅速传播。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都在寻求完全独立，独立之后它们才会考虑建立某种松散的联邦关系，而摩尔多瓦虽不得不对付国内日益增长的反对力量，但也在朝这一方向努力。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甚至对谈判一项新联盟条约也毫无兴趣。

对于许多加盟共和国而言，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争具有关键意义。在这场争论解决之前，它们中的大多数宁愿玩时间游戏，并避免作出任何最终承诺。戈叶两人的冲突扩大到了谈判的实质问题。戈尔巴乔夫的谈判代表向位于俄罗斯境内的大部分自治共和国许诺，将在新的联盟中给予它们“成员”的地位，由此它们在许多方面将享有同俄罗斯及其他加盟共和国一样的权利，借此向叶利钦施加压力。然而，各加盟共和国都认为，这一想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而且，运用这一策略的结果也证明是短视之举。戈尔〔429〕巴乔夫正在失去以自愿为基础构筑联邦制联盟的有利时机。由于试图对俄罗斯采取分而治之的战术，他失去了无法挽回的时机。

谢瓦尔德纳泽敲响警钟

1990 年 12 月 20 日，苏联外交部长原计划在这一天向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作报告。然而，当谢瓦尔德纳泽站上讲台时，他却庄严地宣布，这次“也许是他一生中最简短和最困难的讲话”。他先是简要提到了一些有关苏联对伊拉克政策和被指称向海湾派遣苏联军队的“计划”所引发的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是具有侮辱性和煽动性的。他抱怨在高层缺少对他的支持，他特别暗示说，议会主席卢基扬诺夫试图整垮他。讲完这些之后，他投下了他的重磅“炸弹”：

民主主义者们，我将直言不讳。民主主义者同志们……你们在临阵退缩。改革家已躲在幕后。独裁统治即将来临；我是以完全负责的态度下此结论的。谁都不知道那将是怎样一种独裁，也不知道谁将成为独裁者，或出现什么样的王朝。

我想接下来声明：我准备辞职……如果你们愿意，就让这成为我的贡献，成为我对独裁统治进击的抗议吧。（16）

那天上午，我正在距离莫斯科两个小时路程的杜夫纳“科学城”，当我为赶午餐招待会返回斯帕索别墅时，我的新任副手詹姆斯·柯林斯在门口告诉了我上面的消息。

尽管谢瓦尔德纳泽 3 月份时曾经作出了暗示，但是我仍然十分吃惊。“他

是说已经辞职了还是准备辞职呢？”我问道。

“听上去是最后的决定。他的原话是（我准备辞职）。”（原文俄文有误，未改。——译者）

谢瓦尔德纳泽的副手之一亚历山大·别洛诺哥夫来参加了午餐招待会，我们向他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他声称在听到演说之前，他对辞职一事毫不知晓。我问他是否认为谢瓦尔德纳泽有可能被说服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他回答说："按我对他的了解，这〔430〕是不可能的。他不希望别人把这件事看成是一种表演。这是关系其名誉的大事。"

的确如此。对于任何一个真正了解谢瓦尔德纳泽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愚蠢的问题。

然而，还是有许多人并不那么了解他。那天下午，代表大会复会，我现场聆听了几位德高望重者的发言，其中包括历史学家德米特里·利哈乔夫和编辑谢尔盖·扎利金。他们建议不接受他的辞职，并要求他继续担任外长职务。而其他人则对他大加攻击。维克多·阿尔克斯尼斯是对谢瓦尔德纳泽批评最多的人之一，几天前他就说过，他们的目标先是巴卡金，接下来的一个就是谢瓦尔德纳泽。此时，他又语无伦次、不着边际地发泄了一通。罗伊·梅德维捷夫 60—70 年代曾被认为是一名持不同政见者,此时已加入共产党的保守派阵营。他自以为是地评论说，一个过于敏感的格鲁吉亚人已没有能力去承受批评。不过，听众都在等着戈尔巴乔夫讲话。上午的会议上，他显得既惊讶，又似乎有些愤怒。此时已过了几个小时，他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考虑并拿出自己的意见。

走上讲台时，他看上去就像腹部受到重击刚有所恢复的样子。戈尔巴乔夫首先讲道，最使他寒心的是，谢瓦尔德纳泽竟未事先告知他打算辞职的想法。尽管他在谢瓦尔德纳泽发表辞职讲话后与其通了两次电话，依然不能确定究竟是什么原因促其提出辞职，但他得出的印象是，谢瓦尔德纳泽自认为是在同各种“利用所出现的困难并对改革政策发难”的企图进行着抗争，既然如此，他就更不应该放弃，而是应该了解前进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也是需要持之以恒的。故而，戈尔巴乔夫只能谴责谢瓦尔德纳泽的行为和其采取逃避的方法。

接着，戈尔巴乔夫继续嘲笑独裁统治可能即将来临的想法。他本人并不期待获得独断的权力，仅希望取得领导整个社会完成转变所必需的那种权威。至于其他人，他说：

作为总统，我拥有广泛的信息，但迄今尚没有任何消息证实某人在某地准备把一个军人政权或其他形式的独裁加在我们头上……不，我没有得到这样的信息。（17）

〔413〕当代表们步出会场时，议会宫走廊上一派沉闷气氛，少数极端爱国者炫耀性的欢呼声使这种沉闷气氛愈显浓厚。当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皱着眉头快步走向衣帽间的时候，我跟了上去，问他如何看待未来。

他答曰："这种政治迫害不会带来什么好结果。还记得你们国家的麦卡锡主义吗？它带来的只有破坏。今天我们的情况也是同样。"

就在那天晚上，电视全文转播了谢瓦尔德纳泽和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当时我看得全神贯注。要捕捉两位政治家讲话时反映出的那种情感抑制力，非要有莎士比亚那样的能力不可。五年半以前，他们共同开创了一项艰难的事业。虽然谢瓦尔德纳泽在使对外政策目标适应改革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但此时戈尔巴乔夫在国内战线上却正明显退却。我自信非常了解谢瓦尔德纳泽，知道他并非是一个逃兵。他对批评意见显然比较敏感，但只要有赢的希望，他就一定会进行反击。他一定是察觉到，戈尔巴乔夫准备牺牲他去迎合那些正为采取强硬行动而聚集力量的强硬派。

奇妙的是，戈尔巴乔夫对谢瓦尔德纳泽辞职声明所作出的反应恰恰证实了这一点。他说他打算提名谢瓦尔德纳泽担任副总统。但这一新职位并无明确职责。若议会批准这一提名，也实属明升暗降，更何况要使议会批准还必需经过一番令人不快的争斗。（18）

一年多以来，人们一直在猜测谢瓦尔德纳泽可能会更换工作。认为他会是理想的总理人选，果真如此，以其对非俄罗斯民族态度的关注，就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戈尔巴乔夫的盲目。不过，一旦戈尔巴乔夫选择了右翼政府，就不可能选择谢瓦尔德纳泽出来领导它了。

我怀疑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很显然，谢瓦尔德纳泽希望他要求“ 民主派 ”及时站出来再次发挥作用的呼吁能使他们团结起来。难道他得到了有关政变计划的消息？或戈尔巴乔夫本人僭取独断权力的计划？我不得而知。

尽管谢瓦尔德纳泽同意在继任者获任命前再在对外事务部呆上“几天”，但他不可能马上得到一项新的任命。为得到对谢瓦尔德〔432〕纳泽辞职行为的进一步解释，我拜访了他最亲密的助手之一谢尔盖 · 塔拉申科。塔拉申科告诉我，关于辞职问题，谢瓦尔德纳泽已经严肃地考虑了一年左右。加快他作出决定的原因，在于一连串的事件使他感到苏联政府中放宽使用武力的主张占了上风，而他不愿与之同流。让他特别感到不满的是，当军方违背某些由他谈判达成并经由戈尔巴乔夫本人批准的军控协议时，后者很少给他以支持。（19）卢基扬诺夫甚至扣压外交部递交的待批条约，每每到最后一刻才将其交到代表之手，他还虚伪地指责外交部未能及时递交，以此在最高苏维埃破坏谢瓦尔德纳泽的形象。他还计划在谢瓦尔德纳泽出国因而无法回答所提问题之际举行听证会。塔拉申科认为，如果戈尔巴乔夫坚定支持谢瓦尔德纳泽，卢基扬诺夫就不会这样做。

塔拉申科证实，除妻子、子女、培拉申科本人及另一位助手特伊姆加兹 ·斯捷潘诺夫之外，谢瓦尔德纳泽事先并没有征求其他人的意见。他们一致同意他应该辞职。

我问塔拉申科，谢瓦尔德纳泽有没有得到即将发生政变的具体消息。他回答说，谢瓦尔德纳泽并不知道任何具体的阴谋，但感到存在着决定以武力掌握国家命运的团体，而戈尔巴乔夫目前的政策对他们是有利的。虽然戈氏也许认为自己正赢得时间，但最后他还是要被他所依赖的人抛弃。考虑到这些因素，谢瓦尔德纳泽不可能继续留在政府里。他觉得从外部聚集民主力量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

所有各派都向我们保证，苏联的对美政策不会出现任何变化。戈尔巴乔夫在圣诞节给布什总统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再次保证不会改变谢瓦尔德纳泽所推行的政策。（20）谢瓦尔德纳泽本人则告诉我们，如果对美苏关系的建设性进程已不可逆转这一点没有把握，他就不会提出辞职了。三星期后，当戈尔巴乔夫提名谢瓦尔德纳〔433〕泽的继任人时，他挑选了职业外交家亚历山大 · 别斯梅尔特内赫。据说，这不仅是因为他重视别斯梅尔特内赫的能力，也是希望消除美国的疑虑。

我们非常了解别斯梅尔特内赫，对之甚为尊敬。他曾长期在华盛顿供职，

后在莫斯科担任外交部美国司司长。谢瓦尔德纳泽成为外交部长后，很快就将别斯梅尔特内赫提升为第一副部长，1990 年初又派其担任驻华盛顿的大使。

其才智、坦诚、及建设性的态度与熟知美国行为方式结合在一起，使他成了苏联利益的真正有效代表和广受欢迎的同行。70 年代初以来，我就一直在同他打交道，当时我是国务院苏联事务部主任，他是苏联驻美使馆的政务参赞。很明显，“ 萨沙 ”——我们都这样称呼他——在冷战时期就已是一名很突出的苏联外交官了。虽然他从未对苏联政策表现出不忠，但他能理智平和地讨论问题，我们的感觉是，甚至在不可能同意我们观点的时候，他也能理解我们在说些什么，并会准确地向上汇报。

葛罗米柯有一次给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捎来了一个个人口信，要求他禁止在美国上演一部由欧洲拍摄但莫斯科认为失礼的有关列宁的影片，对此我非常生气。在参加那天晚上苏联使馆举行的招待会时，我把别斯梅尔特内赫叫到一边，责怪他未向莫斯科说明此举是何等的不智。他不去为此口信辩解，而是评论说，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引起情绪激动的问题。接着，他推测道，对列宁作出公正的评价也许要等 10 年或 10 年以上的时间。

就一名苏联高级外交官而言，在勃列日涅夫政权正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自由思想进行抨击时作此评述自是非同寻常。他是一个能独立思考，并在其职责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做到诚实的人。

我是在 1 月中旬得知戈尔巴乔夫挑选别斯梅尔特内赫接替谢瓦尔德纳泽这一消息的。在谢瓦尔德纳泽辞职到别斯梅尔特内赫获得任命的几个星期里，虽然美苏关系出现了紧张，但其诱因与苏联的这两位外长皆无干系。

新的副总统〔434〕

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在谢瓦尔德纳泽的辞职震荡之后草草收场。大会通过了戈尔巴乔夫提议的大多数宪法修正案，也勉强批准了根纳季·亚纳耶夫担任副总统的提名。（21）

亚纳耶夫 50 刚过就担任了共青团中央的领导职务,后又担任官方工会的领导。我在 70 年代就见过他几次，那时由美国青年政治领袖理事会组织的各代表团曾到莫斯科同苏联的青年“ 政治家 ”举行过几次会议，而且 1986 年在拉脱维亚的杰马拉召开的肖陶夸会议上，他还是组织会议的苏联官员之一。近来，我没有看到过他，原因是我们与受控制的苏联工会没有保持联系。尽管他早先给我的印象不是很深，但在他担任副总统后不久我就提出了拜访的要求。

他在共产党总部的一间办公室里接待了我。虽然他最终要搬到克里姆林宫去办公，但此时副总统的办公室尚未准备就绪。我们进行了愉快、轻松的讨论，他向我保证，戈尔巴乔夫决心继续推动改革进程，也了解同美国保持密切关系的必要性。不过，亚纳耶夫给我的印象不像是一个坚定的领导。他似乎没有属于自己的观点，我还感到他稍微有点紧张不安。在我们谈话期间，他不停地抽烟，抬起的手有时也微微颤抖。我不能想象为什么苏联的副总统对会见一名外国大使会感到紧张，唯一的结论是他不善于同陌生人轻松相处，即使是对于一名来自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家来说，这也是一种最不寻常的特征。

起初，我难于理解戈尔巴乔夫为何要选择亚纳耶夫担任副总统，后来才想到他之所以同叶利钦分手即是其嫉妒叶利钦的声望使然。很明显，他不可

能容忍在公众影响方面有可能成为对手的高级官员。而根纳季·亚纳耶夫在这方面显然不会对其构成威胁。然而，戈尔巴乔夫需要的是能加强总统职务威信的人，让我感到不可理解的是，如果副总统一定得是位无足轻重之人，他为什么要费力去修改宪法呢。

〔435〕经济危机加深

1990 年岁末，经济似乎在加速下滑。在这个困难的年头，尽管谈论的都是改革计划和“反危机”方案，但形势仍在继续恶化。

就在戈尔巴乔夫否定沙塔林计划之际，叶利钦宣布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将独自实施这一计划，但后来发现这根本行不通，因为大部分经济企业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中央各部委的手中。于是，苏联和俄罗斯之间的法律之争便接踵而至，由此引起了进一步的混乱，俄罗斯议会通过立法，宣布当俄罗斯的法律同联盟的法律出现冲突时，俄罗斯的法律高于联盟的法律，而且，只有经俄罗斯议会的批准，联盟的新法律才能生效。为与之抗衡，戈尔巴乔夫颁布了一项政令，宣布在专门解决权力分配的联盟条约生效之前，苏联的法律是至高无上的。

有关税收与分配的争论尤其耗时费力。俄罗斯宣称保有在其境内征集全部税收的权力，而且仅向联盟财政转交不足通常数目 1/5 的税收。在第四届人民代表会议的最后一天，即 12 月 27 日，财政部长瓦连金·帕夫洛夫告知大会，联盟与俄罗斯之间关于预算的谈判已告破裂。

戈尔巴乔夫随后加入了辩论，指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只批准为 1991 年苏联预算提供 234 亿卢布，比 1990 年的上缴额竟少了 1190 亿卢布！他警告说，除非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批准正常的岁入分配，否则苏联就会解体。（22）大多数人认为，叶利钦是要证实戈尔巴乔夫已别无选择，只能同他妥协，并在联盟财政崩溃前屈服，但对此谁也不能肯定。叶利钦非但没有趁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际留在莫斯科讨论这个问题，反而飞到了位于西伯利亚东部的雅库茨克。

在 1990 年即将结束之际，戈尔巴乔夫试图利用其新获得的权力发布大范围的政令，使局势恢复某种秩序。其中有一政令指示所有企业和部委在 1991 年继续执行 1990 年的契约。其目的在于〔436〕制止各加盟共和国和各企业改变中央计划部门所作安排这种不断增长的趋势。该政令的作用可谓与市场经济的目标背道而驰，因为它保留了中央计划体制的绝大部分特征。

其他政令规定了重要的新税种：5%的销售税；向企业征收设立“稳定基金”的种种新税。销售税在 1 月 1 日开征，不习惯附加销售税收的公众很快就将之称为“戈尔巴乔夫的新年礼物”。其实，苏联传统上的税收一直很高，只不过其税收体制使公众不了解自己交纳的数目罢了。戈尔巴乔夫的销售税违反了传统的隐蔽征收形式，因而加深了公众对其领导的不满。

直到 1 月份的第二周，苏联才和俄罗斯达成一项预算协议，1990 年 12 月出现的资金危机遂得以缓解。

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和其两名助手米哈伊尔·扎多尔诺夫及阿列克谢·米哈伊洛夫在 1 月 2 日刊于《消息报》的文章中，归纳了大多数观察家都已感觉到的种种挫折和失望，严厉指责政府对经济危机的处理方式。他们嘲笑克留奇科夫和其他人关于问题的根源在于外部“破坏力量”的观点，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体制本身和其受到不当管理的症结。文章预言政府靠提高税收和冻结种种经济关系来治愈经济的尝试定会失败，还会导致生产进一步滑

坡，通货膨胀加剧，预算赤字增大，以及更为严重的结构失衡。接下来，亚夫林斯基及其助手敦促政府采取类似于他们先前在“500 天计划”中提出的一系列政策：着手进行工业和农业的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建立商品交易、股票交易机构和真正的控股公司；打破生产垄断；控制预算赤字；逐步放开价格，发展职业介绍所和社会福利计划。他们指出，最重要的是必须从中央到各加盟共和国“重新分配”经济上的权力。

〔437〕毕恭毕敬

自斯大林时代以来，苏联就有拒绝接受经济援助的传统，其思路是这些援助会成为外国施加影响的潜在因素。甚至在 1986 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发生之后，戈尔巴乔夫也拒绝接受外国政府的援助。但当 1988 年 12 月亚美尼亚发生地震时，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苏联政府多年来首次感激地接受了外部提供的许多援助，并在向亚美尼亚运送装备、生活用品及专家过程中给予了通力合作。

当国家经济条件恶化时，官方的立场不断发生变化，而且，到 1990 年秋季，戈尔巴乔夫不仅开始直接呼吁外国提供信贷和信贷担保，而且还呼吁赠送食品和药品。

我们在使馆工作的经济学家并不像苏联政府那样沮丧。他们认为，尽管有些地方在饮食方面可能会受到些限制，但苏联有足够的粮食避免发生饥荒。总的说来，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食品多么匮乏，而在于分配体制中固有的浪费和不稳定。只要在粮食加工和分配领域实行私有化就可解决大部分问题，可惜，在这方面根本未作任何尝试。

药品短缺现象相对要严重些。苏联的医疗保健体制向来资金不足，它的制药业不仅非常原始，而且是该国最严重的污染源之一。还有一点，在苏联集团的经济合作组织经互会中，东德是专门从事医药生产的，苏联使用的大部分药品都需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口。随着德国的统一，此类进口开始要求支付现金，因此受到急剧削减。与此同时，为限制环境污染，苏联的许多化学工厂被关闭了。结果，苏联的医疗保健体制出现危机；在许多地方甚至连阿斯匹林都非常匠乏，至于现代药品也就只有那些权贵和有海外亲朋的人可以享用了。

在以使馆名义向华盛顿提交的建议报告中，尽管我们指出向某些确实存在短缺现象的地区和孤寡老人等弱势团体提供食品援〔438〕助是有益的和可取的，但并没有预测饥荒情况。无论如何，要使援助发挥效用，就要将其直接运送到受援者手中，而非纳入苏联的集中分配体制。因为这一体制既无效率可言，又非常腐败，大部分援助物品往往是要么被运往黑市出售，要么就成为掠夺物。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药品援助，除这里讲的情况外，量比较大的援助可通过飞机运送。鉴于欧共体已着手一项主要提供食品援助的计划，并可能通过火车来运送，我们建议美国将主要精力集中在药品援助上。

最终，华盛顿拿出了一项提供药品和医疗设备的总统倡议。尽管名称动人，但所得政府资金非常有限：最初只有 500 万美元用于支付私人公司捐赠的运输费用。“希望工程”这一非盈利组织承担起了募捐和向最亟需援助的关键城市组织空运的责任。他们的责任心和效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许多苏联医院的病人也因而受益。然而，价值仅仅数百万美元的药品在一个如此紧缺的国度也只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

由于担心即将来临的冬季会发生异常情况，苏联官员在支持外国的援助努力方面采取了少有的合作态度。戈尔巴乔夫指定第一副总理维塔利·多古泽夫负责协调外国运送的人道主义援助。我们迅速就人道主义援助的基本规则达成了共识，苏联政府同意捐赠者有权直接向受援者，甚至向当时仍禁止外国人出入的地区运送援助物资，在我的外交生涯中，这也许是最容易的一次谈判了。官方的合作不仅是对形势日益恶化的绝望之举，而且也是观念出现深刻变化的一个标志。以前，苏联官员（及其之前的俄罗斯帝国官僚）常常宁愿让老百姓受苦，也不愿让外国人接近他们。

看到西方这么多的政府和私人组织开始向苏联亟需援助的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我感到很受鼓舞。这证明铁幕两边相互为敌〔439〕的现象已经淡化——实际上确已消失。这也使苏联公民感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并未忘记或嫌弃他们。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极为重要的，并且是鼓舞人心的事情。

不过，我承认，即使是一项计划周密的人道主义援助计划，也难免包含着危险。首先，它并不能帮助一个国家解决其体制上的问题，体制问题要求进行内部改革。其次，现实很少能与宣传相符。以苏联这个面积巨大、情况各异、滥用权力的国度的需要衡量，大部分可行的援助计划必定都会嫌小。因此，不可避免的是，许多人根本见不到大吹大擂的援助，从而生出某种受蒙骗的感觉。第三，这类计划还常常给捐助国留下错误的印象。许多人的印象是援助的数量远大于实际的需要，于是，当这些援助不能改变受援国的状况时，对各类援助的支持就会下降。

我当时认为，这些危险不能成为反对人道主义援助的依据，而是对期望过高的告诫。政府和公众都需要了解，对于一个亟需在政治、经济制度上进行根本变革的国家来说，人道主义援助计划并不能替代组织良好、计划周密、协同一致的努力。一方面，苏联面临的问题并非外部世界要承担的道义责任，因为这些问题不是外部世界带来的；另一方面，外部世界对于这些问题的成功解决确有浓厚兴趣。如果苏联和其各构成部分不能建立起开放、民主的政治体制，不能作为全面的参与者进入更大的世界经济体系，就会再次对其邻国和美国构成安全问题。

对我而言，这似乎是一清二楚的事。但是，华盛顿从未对苏联在过渡时期的种种可行选择进行过认真研究，而且，总统一心考虑的是如何维持一个统一战线，把伊拉克从科威特赶出去。我们的西欧盟国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分歧，且国内问题也使其无暇它顾。日本政府将其对苏政策同归还北方四岛挂钩，因而也受到了束缚，归还北方四岛的要求虽属公正，但靠直接压力不可能见到成效。

甚至在戈尔巴乔夫向其西方伙伴征求建议时，他们既未使其理解也不肯向其清楚传递这样的信息，即他只有放弃中央计划经济并开始引进市场机制，才会得到西方的帮助。相反，西方的领导人往往只满足于发表一些带有感情色彩的声明，给戈尔巴乔夫〔440〕个人以一般性的支持。例如，据切尔尼亚耶夫讲,科尔总理 11 月 9 日在波恩与戈尔巴乔夫会见时向后者作了如下保证：

我十分郑重地告诉阁下，无论是作为德意志联邦总理还是普通公民，我，赫尔穆特·科尔，都对您，戈尔巴乔夫先生，充满信心。我相信您，而不是您周围的其他任何人……因此，在您努力实现您的最终目标之际，我感到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同您一道工作。您可以放心，在这段坎坷的道路上我将一

直站在您一边。（23）

根据切尔尼亚耶夫的记录，10 天之后，当戈尔巴乔夫和布什在巴黎举行的欧安会会议上会面时，布什总统向戈尔巴乔夫保证道：“ 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将竭尽全力帮助你。 ”（24）

在这两次谈话中，戈尔巴乔夫均被问到了他与叶利钦的关系问题。他虽自称在努力寻求合作，但声称，面对叶利钦的“ 高调、煽动、对抗 ”政策，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25）无论是科尔还是布什，似乎都未想到得体的做法是要向戈尔巴乔夫暗示，避不履行沙塔林改革计划可能会导致一些人对他的改革承诺提出疑问，他们也未意识到有必要向其提出警告：如果高压导致国家分裂，外部援助将干事无补。

当然，他们有种种理由感谢戈尔巴乔夫给苏联对外政策带来的变化，并觉得在其国内问题引起讨论之际，他们不应对之采取责备和教训的口吻。但实际情况是，叶利钦的国内计划要优于戈尔巴乔夫的计划，而且后者如无前者的合作肯定要失败。当戈尔巴乔夫加快同这样一个政治对手决裂之时，向他个人许诺他将会获得无条件的支持不仅是轻率的，也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做法。其后果是促使戈尔巴乔夫以为，无论他做什么，都会得到西方的支持，而且这也使他无法认识到，一旦他自己的政策带来错误的行为，任何外来的支持都不可能挽救他。

如果西方领导人在对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表示赞赏的同时，也对其国内政策趋势表示关切之意，就会体现出一种更实在的友好姿态。援助的承诺不应是针对他本人而作（尽管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希望如此），而是应该面向将推动苏联走向民主和市场的各种政策。其内含的信息应该是，“ 我们很想提供帮助，但如果你继续沿〔441〕着目前的道路前行，我们就无法再提供帮助了 ”。如果西方的领导人确实打算这样讲，定会在脑海中形成实质性的救助腹案。

难道是他们对苏联已形成的政治、经济危机不了解？或者是不理解戈尔巴乔夫否定沙塔林计划的含义？不，这根本不可能。所有西方国家的大使馆都在详细报告我已列举过的那些事件，而且，我们这些身临其境的外交人员对这些事件的含义都有普遍的共识。不存在任何“ 情报失误 ”。事实上，无需求助秘密特工和通信窃听就完全可以了解局势。由众多外交官和记者提供的现成信息即可满足进行政治判断的全部需求。

如果说有理解上的失误，也是存在于西方领导人脑海里和感情之中的事。由于精力主要放在了其他事情上，且迷恋于苏联领导人这位新朋友，他们并不希望听到戈尔巴乔夫的地位愈发岌岌可危的消息，而且本能地否定了他本人至少应对其困境负部分责任的想法。就像一个秘密俱乐部中的青少年一样，他的敌人也成了他们的敌人，个人相互间的承诺成了衡量忠诚与否的标准。

当戈尔巴乔夫亟需连贯性建议和有助于实施一项政治上可行的改革政策的国际结构时，西方想的却是要去享受果实。而到 1990 年年底，戈尔巴乔夫突然向危险的方向倾斜，所凭借的即是他的外国朋友作出的天真承诺：他们将会全力帮助他。

“ 外部鼓动者 ”的逃避

当一个社会在力争解决带根本性的问题时，蛊惑民心的政客往往会指责说，所谓的问题并不真正存在，而是由不怀好意的外国人捏造出来的，借此

来回避这些问题。遵循这一模式，切勃里科夫不时地公开抱怨说，美国正采取隐蔽行动来破坏苏联的稳定。在他被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取代之后，此类公开指责才变得少起来。毕竟，戈尔巴乔夫的利益所在，是使全国相信其对外政策在消除同美国关系的紧张因素方面正取得成功。〔442〕1990 年，人民代表大会中某些喜欢吵闹的沙文主义者，特别是维克多·阿尔克斯尼斯上校和尼古拉·彼得卢申科，开始指责中央情报局为颠覆东欧并使其脱离苏联阵营已花费了“数十亿”美元。阿尔克斯尼斯还声称有证据表明中央情报局在阴谋分裂苏联。尽管一伙斯大林主义者和极端沙文主义者不断重复这些指责，甚至指控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在接受中央情报局的佣金，但并没有多少人对之给予特别重视，他们知道这样的指责毫无意义。

随着戈尔巴乔夫“向右转”，克格勃再次公开指责西方秘密机构正试图瓦解苏联。12 月，克留奇科夫的两次讲话都谈及美国的颠覆行为。这些指责极不恰当：不仅荒谬，且有悖苏联的对外政策。这类言辞只能削弱人们对戈尔巴乔夫是否有能力实践其本人所签协议的信心。

到 12 月底,我要求与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政策助理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会面讨论这件事。对能否让克留奇科夫保证停止制造谎言，我不抱幻想，但我清楚，如不对谎言立即予以驳斥，苏联官员就会以为这种甚至最无耻的指控都是有根据的。而且，我知道至少切尔尼亚耶夫了解这类言论会对美苏关系造成何种伤害，希望他能向戈尔巴乔夫建议，命令克留奇科夫停止此类活动。

我和克留奇科夫约定元旦一过即举行会谈。1 月 3 日下午，我来到新的克格勃大楼，这栋大楼位于铁匠桥附近，对面是臭名昭著的鲁比扬卡。在克留奇科夫宽敞的办公室中，我和他在一张长会议桌的两边相对而坐。

在简短的寒暄之后，我告诉他之所以要求同他会谈，原因是我们对他的一些指责感到困扰。接着，我拿出了他刊登在《真理报》上的一篇讲话，并在作出评论之前先引用了其中的几段话。

对于他有关美国情报机构正隐蔽地破坏苏联稳定的指责，我谈到，如果是其下属作出的这类指控，他就应该解雇他们，因为不会有真实的证据证明这种指责能够成立。我们的现行政策是尽力支持苏联有序地向民主和健康的市场经济转轨，苏联不稳定不符合这一政策。

他在讲话中还提到，收集经济信息是一种危险的间谍行为。我〔443〕向他解释说，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里，有关硬通货储备的数据和原材料、燃料及食品的目录清单都是向公众公开的，而且政府与众多私人机构也要定期发表。这种信息对于正常的经济决策至关重要。如果苏联希望作为一个完全的伙伴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就必须学会发布这类信息，而不是把收集这类信息视为一种敌对行为。

因为他拿“自由电台”作为中央情报局活动的例证，所以我指出，该台已有 10 多年中断了同中央情报局的联系，其活动也无秘密可言，完全由国会公开资助。其政策也是禁播煽动性的评论。如果在广播中出了什么差错，也有人提醒要其注意有违上述原则的行为。自由电台的管理机构愿意采取更正行动。

有关苏联正在成为无耻外国商人的牺牲品的指责，我指出，它不仅不准确，而且会增加苏联实施其公布的吸引外国投资政策的难度。任何国家都会有一定比例不成功的商业交易，商业行为也不会总是尽善尽美，但有商业机

制会去进行调节。把偶然出现的不幸合同看作是对付苏联的国际阴谋的证据，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外国企业可能也会发现，苏联的部分企业存在着至少相同数量的未履行合同事件，但谁也没有荒谬地指责这都是精心策划的旨在破坏西方政府的阴谋。

对其关于美国同一些工人组织保持隐蔽联系的指责，我指出，我们同这些组织的所有联系都是公开和正当的。我们既没有保持秘密的关系，也不想利用这些运动；我们的政府官员只希望去了解它们，以使我们的工会去同它们进行合作。

在对其讲话结束评论之前，我指出，那种把苏联的问题归咎于各种外来影响的企图不仅未切中要害（因为问题的根源是在本土），而且会加大解决问题的难度。

克留奇科夫对我的讲话听得很专注。当我结束讲话时，他顿了一会儿，然后直视着我说，他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是仔细〔444〕起草的，实际上已经降低了调子。对于所有的论断他都有证据。不过，他清楚，破坏苏联的稳定并不是美国的政策。那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然而，说到情报组织的活动，不可能每次计划都要通知大使们。他说：“ 有些责任我们并不交给我们自己的大使，我肯定中央情报局亦是如此。 ”

我也清楚，苏联的大使们常常声称自己并不完全掌握克格勃在其派驻国的活动，让我觉得有趣的是，克留奇科夫竟然如此草率地证实这一情况，仿佛这应该是一种常识似的。这甚至更清楚地表明，他以为中央情报局将系统地从事有悖于美国政策的行动：这种说法更适合克格勃而不是中央情报局。虽然他应该了解美国的运作程序，但就大使消息是否灵通这一点，我决定对他的论断予以驳斥。

“ 主席先生，我不知道你们的程序如何， ” 我说道，“ 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政府在贵国的所有活动都会通知我。事实上，没有任何旨在破坏苏联稳定的活动。 ”

他终止了这个话题，几乎是以道歉的口吻说，当时苏联“ 极易受到伤害 ”，（其含义是）有些过度敏感。他说，他个人欢迎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准备与美国开展各种形式的直接合作：例如，同贩毒现象和恐怖主义作斗争。不过，他也意识到间谍活动会继续存在。

我告诉他，我同他讨论的并不是关于情报搜集问题，而是他在讲话中提到的或暗示出的所谓隐蔽的政治行动的问题。

在我离去之前，克留奇科夫问我如何看待他们面临的形势。我告诉他，老实讲，我认为情况很严峻。许多人都在抱怨经济状况及其不妙的前景，可我认为最具爆炸性的问题则是那些与种族关系有关联的问题。由各种因素导致诉诸武力的倾向特别令人担〔445〕心，因为暴力只会滋生更多的暴力，最终会出现一次吞噬掉每一个人的大爆炸。因此，我们美国人希望这些问题在不诉诸武力的前提下得到解决。从长远来看，我坚信，只有向其主要民族证明继续作为苏联的一部分与它们利害攸关，苏联才能作为一个健全的国家生存下去。要做的事情就是使它们相信这一点。但如果对其采取强制手段，它们就会失却信心。另一方面，如果赋予它们更多的权力，允许它们在不受中央压力的情况下自行作出安排，它们就会确信继续留在苏联内部在经济上和安全上都有好处，从而就可能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新的联合体。

他向我表示了感谢，对我的这些看法也未予置评。于是，我直接问到，

他是否认为有必要在一些加盟共和国进行总统直接治理。他回答说，他个人的意见是有这个必要，但又补充说，总统直接治理并不意味着逮捕或军事高压。

第二天，我拜访了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我曾经请求把约会安排在此前的那个星期，但被告知他当时很忙（毫无疑问，的确如此）。然而，我怀疑真正的原因是当时他还没有准备好如何谈论谢瓦尔德纳泽的辞职。他像往常一样热情地接待了我。切尔尼亚耶夫总是一副平静和胸有成竹的样子，即使是在讨论易于引起争论的问题时亦是如此，鉴于过去两个星期刚经历过紧张和刺激，此时他显示出的轻松尤其予人以深刻印象。我猜想他在假期一定是得到了很好的休整。

我首先问他戈尔巴乔夫准备怎样对待谢瓦尔德纳泽的辞职。切尔尼亚耶夫回答说，戈尔巴乔夫并不希望谢瓦尔德纳泽离去，

且一直竭力劝其留任或承担其他工作，但他也意识到谢瓦尔德纳泽已下决心不再继续在政府供职——事实上，考虑到自身的荣誉感他也不可能这样做，因此，戈尔巴乔夫已决定顺应谢瓦尔德纳泽离职的心愿。当谢瓦尔德纳泽出乎意料地宣布辞职时，戈尔巴乔夫对其事先未同自己商量非常沮丧。此后，他才开始明白，谢瓦尔德纳泽避不同自己商谈是因其离职的决心已定，担心他予以劝阻。

切尔尼亚耶夫强调说，有一件事我们可以放心，即苏联的对外政策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其核心仍是同美国的关系，戈尔巴乔夫也非常明白这一点。

当我问到关于苏联的总体形势这一问题时，切尔尼亚耶夫回〔446〕答说，戈尔巴乔夫的感觉是比两个星期前改善了很多。局势看上去在趋向稳定，预算危机似乎也已解决（事实上，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才同俄罗斯达成协议）。

对于刚发生的内务部队占领里加国家印刷厂事件，切尔尼亚耶夫称之为“令人恼怒”之事，并说他肯定戈尔巴乔夫不会被卷入其中。让我感到疑惑的是，对于是谁下令采取的行动怎么会有疑问：内务部部长普戈掌管着这支部队，作为一名拉脱维亚人和该地区前共产党书记和克科勃首脑，他同拉脱维亚的局势演化一定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因想起克留奇科夫在前一天还评论说，有些地方可能需要实行总统直接治理，我就问切尔尼亚耶夫是否同意这一看法。他说，只有在某一地方出现了生命受到威胁的形势，才会依据特定的权限采取这类行动。即使真采取这一步骤，也并不意味着要通过警察或军队来镇压，采取如 1988 年将阿尔卡基·沃尔斯基流放到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那种做法的可能性会更大。尽管最后会采取何种行动暂时还不能肯定，但不会出现逮捕、军事管制或解散立法机关这类现象。

这种解释不足以使我宽慰。任何“中止”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议会的企图毫无疑问都会引发大规模的示威行动，如果人们坚持这样做，逮捕、军管及流血冲突几乎可以肯定会接踵而至。虽然克留奇科夫对自己的态度毫不隐瞒，但他认为有必要在“某些地区”实行总统直接管制这一肯定说法也足以令人担忧了。听到切尔尼亚耶夫竟承认可能需要这样做时，我感到戈尔巴乔夫一定也在对此做着非常认真的考虑。

在离开切尔尼亚耶夫的办公室之前，我告诉他，我希望戈尔巴乔夫总统不要相信阿尔克斯尼斯之流有关中央情报局阴谋的毫无根据的指控（实际上，我很想知道戈尔巴乔夫是否直接从克格勃那里得到了同样的报告，但又

觉得直接问这个问题有些不礼貌）。切尔尼亚耶夫的答复是我们不用担心。他说，有些右翼分子是理智的，但阿尔克斯尼斯根本就不理智，戈尔巴乔夫对他的胡言乱语不屑一顾。戈尔巴乔夫十分清楚布什总统对他是支持的，而且不希望他垮台。切尔尼亚耶夫还提醒我，不要认为阿尔克斯尼斯是军队或者上校一级军官的典型代表。他声称，绝大部分人都没有阿尔克斯尼斯那样的想法。

〔447〕我当然也知道阿尔克斯尼斯是一个典型的极端主义者，但我怀疑在苏联军官队伍中，拥有同他一样想法的人会远远超过我们或者戈尔巴乔夫所相信的数字。

我告诉切尔尼亚耶夫，他向我作出的对外政策不会改变的保证和他对国内形势正趋于稳定的感受让我感到宽慰。尽管如此，但从 11 月中旬开始，苏联国内政策的调子确实发生了变化。难道戈尔巴乔夫真的没有改变大政方针吗？

切尔尼亚耶夫强烈否认已发生了任何根本性的变化。他说，那些大肆谈论“民主派”被“击垮”的人完全错了。他相信他们没有被击垮，只是过去的经验教训使他们变得更加实际罢了。例如，波波夫和索布恰克就在进行比从前更加富有成效的合作。

当切尔尼亚耶夫讨人喜欢的助手塔玛拉·亚历山大洛娃把我送出中央委员会大楼时，我的感觉是，切尔尼亚耶夫有关苏联对外政策的评价是准确的，但说国内形势正在改善就缺乏说服力了。我不明白他怎么会否认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已转向强硬路线，而且，他对“民主派”作用的观察似乎也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当时，我不知道他正在竭力劝说戈尔巴乔夫任命阿纳托利·索布恰克担任总理，这一点我是阅读了他在 1993 年出版的回忆录之后才清楚的。如果戈尔巴乔夫当时愿意任命索布恰克任总理，并予以大力支持，就可能使改革派团结在他的周围，以开展建设性的工作。

上年度风云人物

从当选总统开始，戈尔巴乔夫的民众支持率就直线下降。尤里·列瓦达的“全联盟公共舆论中心”的民意调查册就清楚地记载了这种持续下降的记录。1989 年 12 月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有 52%的被调查者完全赞同戈尔巴乔夫的行动。到 1990 年 1 月，这个数字降到了 44%，5 月份是 29%，7 月份是 28%，而 10 月份只有 21%了。（27）1990 年年底挑选“年度风云人物”的民意调查显示，32%的被调查者支持叶利钦，只有 19%的人选择了戈尔巴乔夫。一年前，支持戈尔巴乔夫为年度风云人物的公众有 46%，支持叶〔448〕关于叶利钦，当时有人认为到年底时他的威望已开始下滑。因为他既不能掌握自己的人民代表大会——该机构尚未准备修改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以设立总统职位，也不能有效抵制戈尔巴乔夫的计划。

至少有部分公众已开始注意到，他趋向于开空头支票；在压力面前容易改变想法；不能遵守自己作出的承诺；行为反复无常；有时几个星期都不露面。

即使如此，但他已显示出，他只要愿意就能阻止戈尔巴乔夫提出的任何有限倡议。他支持改革派所倡导而强硬派共产党人非常痛恨的那些根本性变革。现在，他是全国最受欢迎的政治家，或许还是最有影响的政治家，因为他同大多数加盟共和国当选的领导人都保持着一种虽不够深入但却良好的工

作关系。

戈尔巴乔夫要想在政治上生存下去，要想保留某种形式的联盟，唯一的希望似乎有赖于他同叶利钦和民主派从事共同事业的愿望和能力。可是，回想一下 1991 年初的形势就可明显看到,戈尔巴乔夫当时非但没能认清在我看来非常清楚的形势，而且其实际的所作所为恰与我的预测背道而驰。

他和我到底是谁看走了眼？是我错误地估计了他，还是他有了变化——或是他将再次及时调整战术，放弃共产党机器，组建反共的改革联盟？由于群情激昂，局势比 1990 年 8 月更为困难了。

必须承认，我当时并不知道该问题的答案。这对于一个四个月前还自信了解戈尔巴乔夫所作所为的人来说，无疑是件痛苦的事。